

近代中国史稿

《近代中国史稿》编写组

人民出版社

近代中国史稿

下册

《近代中国史稿》编写组

人民出版社

第 八 章

戊 戌 维 新 运 动

第一节 民族资产阶级革命和改良的两条路线

一、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

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为了掠夺中国人民，攫取高额利润，争向中国输出资本，进一步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从而扩大了中国的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这就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正如列宁所说：“资本输出总要影响到输入资本的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大大加速那里的资本主义发展。”^①

清政府兴办了三十多年的所谓“洋务新政”，经过了中法和中日两次战争，业已彻底破产，官办或官督商办的企业已进入末世，官方再也没有财力来兴办新式企业，原有的企业因为无力支持，有的已改为商办，有的已被外资所并吞，有的奄奄一息，这就给民族工业的发展造成了一些隙缝，使它得以在艰苦的岁月中一步一步地成长起来。

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和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动员着中国人民为挽救民族危亡而斗争。当时的爱国人士把发展工业当

^①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第785页。

作挽救民族危亡的手段，他们鼓吹“设厂自救”，要求“开民厂”，抵制“洋商洋厂”。而清政府在甲午战后，因允许外资在华“设厂制造”，又为了加强反动统治，解决财政危机，需要增加税收，便放宽了民间设厂的限制。就在这种情况下，有更多的人投资创办新式企业，使中国出现了一个兴办工业的浪潮。

一八九五——一八九八年间，中国商办企业有了显著的发展。^①

从发展的速度来说，在这短短四年中，新创办的厂矿达六十二家之多，总投资额达一、二四〇多万元，这速度和规模都算是可以的。另外，从这期间设立的厂矿资本额，按年代来看，一八九五年投资为三三〇万元，一八九六年为四三〇万元，一八九七年为五七〇万元，一八九八年为四三〇万元，虽然略有波动，但总的趋势是向上发展的。再从上海、广州、武汉、杭州、无锡、天津等城市历年设立厂矿的情形看，一八九五年为十七家，一八九六年为二十家，一八九七年为二十三家，一八九八年为二十家，也是向上发展的趋势。这就说明，在这期间中国民族工业确有一定比较显著的发展。

从分布地区来说，民族工业的特点之一是集中性很大，集中在上海、广州、天津等大城市，主要分布在东南地区。但这绝不是说其他地方就没有，如山西祁县，有一家益新电气织染公司，资本亦达十二万元。又如广西贵县，湖北阳新，福建邵武等地，也有机器采煤业的创办，这就说明民族工业的发展虽然微弱，但终究有了一层薄薄的基础，不仅通都大邑有其影响，而且

^① 详见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869—920页。这里应该说明两点：（1）这里只分析从一八九五年到一八九八年这四年设立的厂矿，此前此后均不在论述之列；（2）仅采取纯粹商办的企业，对于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官办招集商股等各种类型，亦不加以论列，以便在性质上严格加以区别。

穷乡僻壤也有一点影响了。

从发展的部门来说，重工业的发展微乎其微，轻工业的发展则比较有些声势。从这期间的六十二家厂矿来说，属于重工业的有燃料采掘四家，都是煤矿，金属开采冶炼三家，其中一家是银矿，其他两家不明，机器厂一家，共计八家，所占比重不到八分之一。这里唯一值得注意的是一家机器厂，但投资仅仅一万元而已。所谓煤矿业，实际上都只是民用煤的开采，属于工业用煤的绝少，广东北海煤矿投资额最大，也只有八十三万元。轻工业能够比较快地提供利润，符合资本家的要求，这固然是轻工业发展快的一个原因，但更主要的是因为重工业多掌握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手里，民族工业在重工业领域难以得到发展，只有沿着阻力较少的轻工业道路前进。六十二家厂矿中有五十四家是轻工业，其中缫丝厂多达三十四家，超过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以上，而缫丝厂又大多开设在广东顺德；纺纱厂七家，比重占第二位，如果把和它有联系的织染、轧花共三家也算在内，该是十家了，比重是六分之一强；与食品工业相联系的面粉、榨油、碾米等共七家。这就说明民族工业百分之八十以上是轻工业，经济基础是脆弱的，不巩固的。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虽然有了初步的发展，但它在小农经济的茫茫夜空中，犹如繁星点点，若隐若现，其力量是很薄弱的，加以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发展就更加困难。帝国主义挟其雄厚的资本与廉价的商品侵入中国，在政治和经济上又享有种种特权，民族资本无力与之竞争。清政府虽然在税收上标榜“华洋一体待遇”，但实际上“洋货在其本国，大率免出口税，销至我国，完至轻之正税，其子口税名完而实免。分运熟货固如是，采购生货亦然。外商货物，成本皆轻，足以制内商之死命而

有余矣”^①。这种税收上的不平等，使民族工业受到很大的打击。

“无如华商智虑初开，行销未广，已成之厂，获利无多，未成之厂，集资匪易，洋商见我工商竞用新法，深中其忌，百计阻抑，勒价停市。上年江浙、湖北等省缫丝、纺纱各厂，无不亏折，有歇业者，有抵押与洋商者，以后华商有束手之危，洋商成独揽之势。……商力甚薄，尤为惴惴，此近年商务之实在情形也。”^②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帝国主义排挤、并吞中国民族工业的情形。据一八九八年海关册记载，在外国棉纱的打击下，上海中国纱厂“亏折甚巨”，裕晋、裕源等纱厂“岌岌自危，不可终日”。湖北阳新炭山湾煤矿，因欠有法债，后来落入法商手中；由华俄道胜银行买办创办的裕晋纱厂，后来终被外商吃掉，改名协隆；由丁丙、庞元济创办的世经缫丝厂，开办不久，即于一九〇〇年停工，由日商以七万元购去。中国民族工业不仅被“洋商抑勒于外”，而且还被封建势力“阻困于内”。封建的土地制度、封建的官僚制度和清政府执行“抑民奉外”的反动政策，都严重地阻碍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力量也逐渐成长起来。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期间，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力量发展较为显著，而中下层力量的发展却十分有限。据不完全的统计，从一八九五年到一九〇〇年创办的企业共有一〇四家，资本总额为二、三〇二万元，其中资本在十万元以下者为四十九家，占厂矿总数的四十七点一，总资本额为一

① 张謇：《拟请提议照约速定裁厘加税请秘密会议文》，《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3，第33页。

② 张之洞：《华商用机器制货请从缓加税并请改存储关栈章程折》，《张文襄公全集》卷45，奏议，第18、19页。

七三万元，占资本总额的百分之七点五强。其中资本在十万元以上者为五十五家，占厂矿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二点九，总资本额为二、一二九万元，占资本总额的百分之九十二点四强。资本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厂矿，多是由官僚、地主、富商和买办创办的，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保持着较多的联系，拥有的厂矿不仅数量多，而且资本比较雄厚，在商办的新式企业中占着优势。他们属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资本在十万元以下的厂矿，主要是由那些普通工商业者所创办的，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关系较少或没有关系，拥有的厂矿数量少，资本薄，在商办的新式企业中所占有的比重很小。他们属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中下层。

民族资产阶级由于自身经济力量的增长，势必要求建立一个符合于自己阶级利益的政权，在中国迅速发展资本主义，挽救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因为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关系比较密切，保持着较多的联系，因而选择了改良主义的道路，企图自上而下，不要发动人民群众，不要进行革命，采取不流血的和平手段，建立地主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君主立宪制度。民族资产阶级的中下层，因为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关系比较淡薄，他们受压迫较重，发展资本主义和挽救民族危亡的要求也比较迫切，因而选择了革命的道路，企图运用革命暴力，消灭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民主共和国。由此可见，民族资产阶级内部阶层的区分，是民族资产阶级改良和革命的两条路线出现的社会基础。在十九世纪末期，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较有力量，而中下层的力量极其薄弱，所以改良路线占着优势，革命路线在艰难困苦中为自己开辟着前进的道路。

二、孙中山与兴中会

资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代表人物是孙中山。

孙中山（一八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名文，号逸仙，在日本进行革命活动时，曾经化名为中山樵，后来人们就通称为中山，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县）翠亨村人。他出身于农民家庭，父亲孙达成是个农民，因为家境艰难，曾经到澳门当过裁缝，以缝纫的收入来补助家用的不足。他的家乡在鸦片战争前后，既是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先进地区，也是传统的反清秘密结社天地会活动的地区。太平天国起义前后，广东地区许多人跟洪秀全参加了太平军。太平军也曾几次进入广东地区活动。一八五四年，以陈开和李文茂为首的天地会起义军，曾经遍及两广各州县，几乎无一地没有这支农民军的活动。因此，在这里广泛流传着关于太平天国的口碑。幼年时期的孙中山，目睹了农民受封建剥削和外国侵略者压迫的疾苦，又常常听到太平天国革命故事，从小就在思想上播下了革命的种子，曾以洪秀全第二自居。

孙中山的哥哥孙眉，先到檀香山当佣工，后在茂宜岛经营农牧业，逐渐上升为华侨中的资本家。一八七八年，十三岁的孙中山，随着母亲到檀香山去，“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他在那里入教会学校，学习英文，受西方资本主义教育。一八八三年中法战争前夕归国，在香港皇仁书院读书，一八八六年在广州博济医院附属学校学医，一八八七年转入早期改良主义者何启所办的雅丽氏医学校学习，并于一八九二年毕业，此后即在广州和澳门一带行医。家庭出身及求

学环境，使孙中山受封建孔孟之道的影响较少，接受的主要是西方的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

中法战争的失败，使年青的孙中山受到很大震动。他怀着爱国的激情，立志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从此“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借医术为入世之媒”^①，积极进行政治活动。他结识了一些对清朝统治极端不满的青年和会党成员。如会党人物郑士良，是他在广州博济医学校的同学，为人豪爽讲义气，后来成为他的亲密战友。陈少白、尤少纨、杨鹤龄与孙中山四人，经常在一起，“所谈者莫不为革命之言论，所怀者莫不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为革命之问题，四人相依甚密，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数年如一日，故港、澳间之戚友交游，皆呼予等为四大寇”^②。还有孙中山的同乡、总角之交的陆皓东，也是他最初的同志。不过，这时孙中山等人所研究的“革命问题”，还跳不出改良主义的圈子，严格说来，这时他还不是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他同早期改良主义者何启、郑观应关系密切，一度受过改良思潮的影响。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他感到民族危机严重，北游京、津，写了《上李鸿章书》，幻想得到李鸿章的支持，希望清政府实行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这里所表现的还是改良主义思想。他认为“人能尽其才，则百事兴；地能尽其利，则民食足；物能尽其用，则财力丰；货能畅其流，则财源裕”^③。清政府只要真心实意地进行变法维新，改革封建专制政治，仿行西方资本主义教育制度，提倡科学技术，发展农业，振兴工矿贸易，中国就可以富强起来。由于这次投书遭到李鸿章的拒绝，加上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的刺激，使他更加认识到清

^{①②} 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68、169页。

^③ 孙中山：《上李鸿章书》，《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5页。

朝统治的黑暗腐朽，“知和平方法无可复施”^①，于是摒弃改良幻想，比较坚定地走上革命道路。

一八九四年冬天，孙中山再到檀香山，在华侨中建立了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这标志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正式开始。兴中会起初是极端秘密的，由刘祥、何宽任正副主席，主持其事。参加兴中会的成员，以经营小商店和小农场的华侨为主体，还有相当数量的工人、医生、会党等，起初是二十余人，后来达到一百二十余人。有一个统计说，一八九五年广州起义前兴中会会员共一六〇人，其中有商人（包括农场主）八十六人，工人三十八人，医生三人，会党十人，还有少量的公务员、传教士、水师官兵等。^②由此可见，这个组织的基本成员是中小资本家、自由职业者，还有部分劳动人民。

兴中会成立时，发表宣言说：“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为了“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于将倾”，决定“联络中外华人，创兴是会，以申民志而扶国宗”。^③

一八九四年十二月，孙中山和他的同志邓荫南等，从檀香山到达香港，联合杨衢云、谢赞泰等组织的“辅仁文社”，于一八九五年二月成立兴中会总部，对外称“乾亨行”，以商业为掩护。孙中山此际风尘仆仆，来往于港澳和广州等地，为革命而动员会党，联络绿林豪杰，筹划起义经费，扩大革命组织，他成为职业革命家，后被会众公推为会长。他将檀香山《兴中会宣言》作了重要修改，揭发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所造成的瓜分危机，斥责了清

① 孙中山：《伦敦被难记》，《孙中山选集》上卷，第24页。

② 冯自由：《兴中会初期孙总理之友好及同志》，《革命逸史》第3集，第1页。

③ 《檀香山兴中会成立宣言》，《辛亥革命》第1册，第85页。

朝统治“暴过虎狼”的罪行，大声疾呼有志之士，迅起救亡，“振兴中华”^①。在会员誓词里，他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②的革命纲领。合众政府一词是仿照“美利坚合众国”而来的，合众政府就是联邦政府，它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一种形式。兴中会把握住了国家政权这个革命的根本问题，并且把推翻封建的清王朝和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结合起来；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兴中会决定采取武装斗争的方法。这是兴中会及其领袖孙中山对民主革命的一个贡献，也是资产阶级革命路线同改良主义路线最本质的区别。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广州裁撤了一批原来准备开赴前线的援军，他们因失业而愤懑不平，便加入了革命队伍。还有三元里当年抗英的团体，北江和西江地区的绿林豪杰，也都成为兴中会组织的起义力量。他们原定于一八九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计划先由香港兴中会方面运来起义者三千人，由朱贵全、丘四等率领进广州发难，起义军以红带为号，口号是“除暴安良”，所需经费与饷械由杨衢云在香港负责经办。杨衢云想乘机夺取起义的领导权，孙中山为了团结对敌，便把兴中会会长职务让与了杨衢云。孙中山会同郑士良、陆皓东等到广州，设立秘密机关，对外称“农学会”，以研究农业科学为掩护而进行起义部署。到二十六日早晨，广州方面的起义者齐集机关待命，忽接杨衢云来电称，须推迟二日，人械始能前来。当时，因叛徒告密，风声已泄露，孙中山立即回电“止办”，但香港的复电却说：“货已下船，请接。”清两广总督谭钟麟得此消息后，起初并不相信。他说：“孙文一狂土耳，其创农学会，李少帅（鸿章）且赞助之，焉敢

① 《香港兴中会宣言》，《辛亥革命》第1册，第87页。

② 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第18页。

造反？”后又得香港密探电告，始大惊失色，急忙调来长洲营勇一千五百人到省防卫，并逮捕陆皓东等人。二十七日，香港船到广州，船上的起义者二百多人一上岸，朱贵全、丘四等四十余人就被逮捕，手枪六百余支也被查获，余众惊散而走。这次起义经过半年多的准备，是革命党人发动的第一次武装起义，其目的是夺取广州，建立革命根据地。因为步调不一致和叛徒告密，使这次起义尚未发动，即被清政府扼杀于摇篮之中。革命党人陆皓东、朱贵全等四十余人牺牲。当时孙中山、陈少白尚在广州城内，后来辗转逃出，由香港到达日本，在日本横滨设立了兴中会的分会，日本报纸大量刊载中国革命党人活动的消息。从此，孙中山名闻海内外，成为革命党人公认的领袖。这次起义被称为“乙未广州之役”。

兴中会的成立，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纲领的提出，并组织广州起义准备将革命纲领付诸实践，标志着资产阶级革命路线已经初步形成。但是，由于当时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经济力量还很微弱，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既没有形成完整的民主主义思想体系，又没有取得中国革命主力军农民的支持，所以国内资产阶级革命的社会基础极其薄弱，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早期活动，还只限于海外华侨和广州一带，对国内政治生活尚未发生重大影响。

三、康有为与“公车上书”

资产阶级改良路线的代表人物是康有为。

康有为（一八五八——一九二七年），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县银塘乡人。他的祖父康赞修，为道光年间举人，

做过连州训导，他的父亲康达初，做过江西补用知县，可以说他是出身于地主小官僚的家庭。他的父亲早逝，幼年的康有为主要是跟着他的祖父，学习中国古代的典籍——诸子百家，但主要攻读孔孟之道的封建主义文化。一八七六年，康有为执贄于同邑大儒朱次琦门下，这个朱次琦是很崇拜顾炎武的，其治学也以经世致用为宗旨，这对康有为有着一定的影响。一八七八年，闭门探索“经世”之学的康有为，由于广泛涉猎了法家著作和魏源的《海国图志》等近代名著，开始接受了通达国体、真切实用的法家思想的影响，而对韩愈之流的封建道学则产生了厌恶心理。他认为韩愈“道术浅薄，……窃谓言道当如庄（子）、荀（子），言治当如管（仲）、韩（非），……即《原道》亦极肤浅，而浪有大名。”^①这说明青年时期的康有为，曾经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公开谴责了封建道学而为法家说了几句好话，从而碰撞了千百年来封建统治的思想牢笼，标志着他的思想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尽管他对韩愈的抨击是无关痛痒的，但却触怒了他的老师和同学，遭到了斥责和围攻。朱次琦骂他狂妄，同学说他不逊。然而，老师的怒容恰好暴露了这位师爷的儒家横暴的本来面目。康有为虽然挨了这顿没头没脑的闷棍，但他并没有裹足不前，而是在当时动荡时局的推动下，一步步地开始了新的政治生涯。当时中国面临着严重的边疆危机，洋务派却在“自强新政”的幌子下加紧镇压人民革命，并极力阻挠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正在形成中的民族资产阶级，为了本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开始酝酿着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正是在这民族危亡、社会矛盾加剧和改良思想兴起形势的推动下，遂使康有为对于那种

^①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第4册，第113页。

日埋故纸堆中，皓首穷经的考据之学，逐渐发生了厌倦的情绪。他认为即使著书满架，名噪海内，又复何用？他开始朦胧地意识到应该探求一种新兴的学问了。

一八七九年，康有为终于离开了朱次琦，移居西樵山白云洞。这时，他一方面仍然探求所谓经世致用之学，如阅读了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等，另一方面开始接触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既而得《西国近事汇编》、李□《环游地球新录》及西书数种览之。……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乃复阅《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①这个年轻人在西学的影响下，开始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新事物，并如饥似渴地向西方寻找真理。

一八八二年，康有为前往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没有考取。南归时“道经上海，……大购西书以归讲求焉”。^②为了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康有为这时候只要是西方的资本主义文化，不论什么书他都看，从外国侵略分子林乐知创办的《万国公报》，到徐继畲的《瀛环志略》，从中外地理到声、光、化、电之学，他是无不接触的。他吸取了西方传来的进化论和资产阶级政治观点，继承了历史上法家的爱国和主张变革的思想，经过“专精问学，新识深思……日新大进”^③，初步形成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体系。

一八八八年康有为再一次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这时正是中法战后，民族危机日趋严重，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的激情不断高涨。面对着这种形势，康有为写出了五千言的《上清帝第一书》，

^{①②③}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第4册，第115、116页。

去叩紫禁城的大门。这个三十一岁的青年人，凭着他的爱国之心，也凭着他的忠于清廷的臣下之心，指出外患极其严重，中国面临着被俄、英、日、德等国侵略的危局，清政权则腐朽堕落，民穷财尽，若不急起直追，必将外而亡于列强，内而被人民起义所推翻，变也得变，不变也得变，拖是拖不下去了。在这次上书中，他进而提出了挽救危亡的三策，即变成法、通下情和慎左右。所谓变成法，就是革除弊政，参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结合中国当前具体情况，适当加以改变。所谓通下情，就是要了解社会中下层的动态，要给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有发表意见的机会，政府要设立“训议之官”，以备谘询。所谓慎左右，就是要提拔维新人才，参预新政，罢逐顽固守旧的官僚。在这里，康有为作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领袖人物，第一次向清政府提出了变法维新的主张，这好象在一潭死水中投入了一块巨石，必将引起一场政治波动。

布衣之士康有为的上书，轰动了整个北京的官场，遭到了顽固派和洋务派的攻击。这年冬天，塘沽海口封冻，康有为暂时无法乘轮南返。于是，他留在京师，继续进行政治活动。他结识了许多比较开明的小官僚，他们后来大都成为维新派的人物，如翰林院编修黄绍箕、刑部郎中沈曾植、国子监祭酒盛昱等；并通过盛昱结识了当政的大官僚、光绪皇帝的师傅翁同龢。他帮助都察院御史屠仁守起草奏稿，参劾醇亲王奕譞，要求停修颐和园，实际上指责那拉氏的挥霍；要求宦官不得干政，矛头直指那拉氏的亲信李莲英。此折上后，那拉氏勃然大怒，给予屠仁守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康有为的活动，引起了顽固派的嫉视，他们加以阻挠，不肯把他的上书转达给载湉。康有为这次本来已经考中举人，但顽固大臣徐桐认为“如此狂生，不可中”，竟临时抽出了

他的考卷，使他没有考取。但康有为并不悲观，他赋诗言志说，“治安一策知难上，只是江湖心未灰”。^①他把自己比作上治安策的汉代贾谊，并决心继续从事改良变法的准备活动。一八八九年十月，康有为南归。一八九〇年，他开始在广州云衢书屋（一八九一年转长兴里，一八九六年移“万木草堂”）收徒讲学，宣传变法维新的思想和主张。他的弟子有梁启超、陈千秋、徐勤、麦孟华等人，其中特别是梁启超，成为维新运动中的主要人物，后来康、梁并称。

梁启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年），字卓如，号任公，别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县茶坑村人。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封建文人，出身于和资产阶级有联系的地主家庭。十五岁时，梁启超受业于阮元在广州创办的“学海堂”，沉酣于乾嘉学派的所谓训诂词章之学，他还没有摆脱“中学”的旧框框。梁启超十七岁考中举人，一八九〇年到北京参加会试，在这里他开始看到《瀛环志略》和江南制造局翻译的外文书籍，初步接触到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这年他没有考取，回到广东后拜见康有为。他在康有为的启发下，“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于南海之门”。^②从此，他系统地接受了改良主义的思想体系，成为康有为的得意门生。这时的康有为在广州是白天教书，晚上著书，他的学生梁启超等则一面受业，一面帮助他著作。康有为在这期间陆续完成了一批思想理论方面的著述。其中主要是《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

《新学伪经考》是康有为的第一部理论著作，于一八九一年

① 康有为：《感事》，《南海先生诗集》，《戊戌变法》第4册，第336页。

② 梁启超：《三十自述》。

刻版刊行。这里所说的“经”，是指儒家的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相传这些书是经过孔老二编订的，成为没落的奴隶主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经典”，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西汉末年，在孔丘旧宅的墙壁中，发现了一批用籀形文字（即秦统一前的篆文）所写的儒经，与当时用隶书所写的通行本子有别，从此产生了古文经和今文经两个学派。两派各争正统地位，长期争吵不休，后来古文经学占了优势，今文经学逐渐泯灭。康有为站在今文经学的立场，经过多方论证，说古文经是刘歆帮助王莽“篡汉”而伪造出来的。所以，他把古文经学称为“新学”，即王莽的新朝之学，以此来打击古文经学，说它不是经过孔老二删订的“真经”，而是伪经。应该说，康有为的论断并不正确，古文经不一定是伪造的东西，康有为的这种考证，主要是为其改良主义政治目的服务的。他把封建统治阶级长期以来奉为神圣不可触犯的儒家经典，突然宣布为一堆伪造的古董，这不能不引起封建顽固派的仇视和惊恐，从而在当时的思想界引起了一场政治风波。虽然《新学伪经考》遭到了清政府禁毁，但它的问世，却把“恪守祖训”

和泥古不化的孔孟之徒狠狠地给了一闷棍，既然他们的儒家经典全是伪造的，那么以孔孟之道为精神支柱的封建专制统治不就失去存在的理论根据了吗？这就为被儒家思想桎梏着的人们，开辟了思想解放的途径。正是从这个意义



康有为的部分著作

上说，《新学伪经考》具有明显的反儒倾向。但是，《新学伪经考》要打倒古文经，却要树立今文经在思想界的支配地位，还是想从儒家经典中寻找变法维新的根据。可见康有为倡导维新变法时，他只是给孔丘的僵尸穿上了时髦和吓人的盛装而已。

《孔子改制考》是《新学伪经考》的姊妹篇，是一八九二年开始撰写，一八九六年定稿，一八九七年在上海刊行的。这部著作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它提出和论证了历史进化论的观点。反动的儒家历史观是复古主义的，是颂古非今的，认为尧、舜、禹、汤、文、武的时代都是至治的盛世，而后来则一代不如一代，这是反对社会发展前进的反动史观。康有为于一八九六年阅读了严复所译《天演论》草稿，吸收了西方进化论思想，结合法家“法后王”的主张，附会公羊学派的“张三世”说，提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三世进化学说，认为后一阶段都比前一阶段进步，历史愈变愈进步。但是，康有为的进化论，归根到底是一种庸俗进化论。他只承认量变，不承认质变，宣扬和平渐进，反对飞跃和根本的变革。他虽然承认历史是进化的，但却认为这种进化是“循序渐进”的过程，既不能超越阶段，又不能进行剧烈的变革。这种历史进化论，成了康有为鼓吹和推行改良主义路线的理论武器。

第二，康有为发挥了“托古改制”的思想，把孔丘打扮和美化成变法维新的鼻祖。康有为编造说：被儒家奉为经典的“六经”，都是孔丘为了改变当时的社会现状，按照自己的政治思想假托古人的言论写出来的，这说明孔丘是托古改制的鼻祖，“六经”是托古改制的范本。但是，事实上，孔丘并没有搞过“托古改制”，更不是什么变法维新的鼻祖，而是一个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言人，一切反革命复辟势力的祖师爷。康有为的孔丘改制说，实际

上是他借孔丘这个“权威”来宣传自己的托古改制论，企图拿孔丘作为资产阶级改良派实行变法维新的护身符。康有为有过一段表白：“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①这充分表现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软弱性。

《孔子改制考》的问世，在当时社会中同样引起了很大反响。

此外，康有为还于一八八四——一八八七年间写了《人类公理》一书，一九〇一——一九〇二年，他在流亡印度期间，把《人类公理》修改成《大同书》。《大同书》是康有为混合公羊学派的“三世”说、《礼记》的“小康”和“大同”说、佛教的慈悲平等说、卢梭的天赋人权说、耶稣的博爱说，吸收了西欧一些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拼凑、臆造而成。《大同书》共分十部，第一部“入世界观众苦”，揭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人生的各种苦难。但他说：“贫贱人有苦，富贵人、甚至帝王也有苦。”这就抹煞了阶级界限，企图调和阶级矛盾。康有为认为人生苦难的根源在于私有财产制度，并提出用“公工、公农、公商”的办法以“去人之私产”。但是如何达到“公工、公农、公商”？他说：“此事甚易”，“去人之家”即能实现。梁启超说：《大同书》“全书数十万言，……其最要关键，在毁灭家族。”^②这显然是办不到的。《大同书》其余九部具体地描绘出他所幻想的“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的“大同之世”。《大同书》反映出康有为既害怕资产阶级革命的“铁血之苦”，更害怕当时世界上已经出现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铁血之苦”，想乞灵于人的“本性”，发挥“不忍之心”，劝诱人们不要进行阶级斗争，放弃革命，不分阶级地携起手来，走向“大同”。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

^①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中华书局一九五八年版，第267页。

^②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戊戌变法》第1册，第439页。

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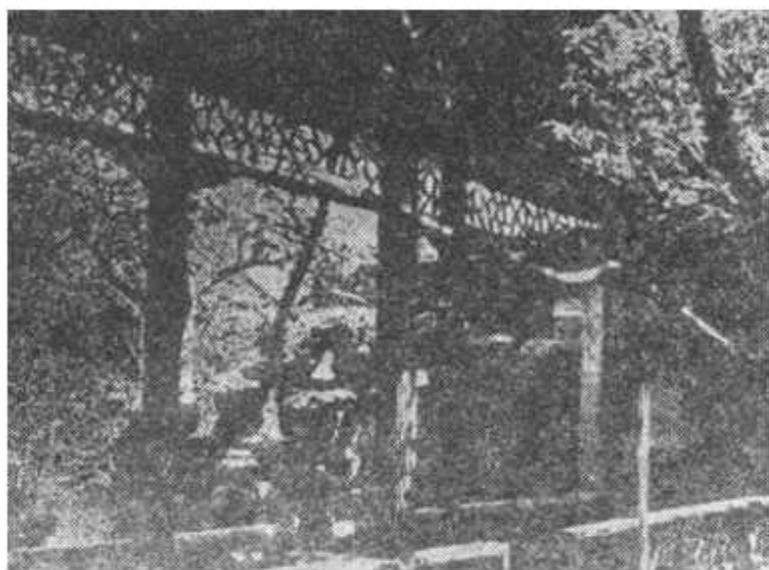
康有为不仅制造了变法维新的理论，把改良主义思潮发展成为完整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体系；而且发动了带有一定群众性的“公车上书”。

一八九五年三月，康有为、梁启超到北京参加会试。四月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来，群情悲愤，立即掀起了反对割地求和的浪潮。康有为联合广东、湖南两省籍举人，到都察院上书反对割台，主张抗战，这就大大地激发了人们的救亡热情。于是，都察院门前车如流水马如龙，上书如雪片一般飞来，台湾籍举人包围了都察院长官的车轿，垂涕请命，希望用自己的泪水，洗刷清廷统治的污垢，恢复祖国的尊严和独立。随着救亡浪潮的迅速高涨，康有为决定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政治请愿运动。他联合全国十八省举人聚集达智桥松筠庵，讨论联合上书请愿，会后康有为写了万言书，签名举人共一千三百余人，并于五月二日到都察院呈递，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②，即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二书》。上书以后，虽然都察院借口和约已经签字，无法挽回，拒绝为他们代呈，但这个上书已经为人传抄，广为流传，在社会上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这次上书中，康有为提出四项办法，来解决当前的国是：一、载湉下罪己、明罚和求才之诏，这叫做“下诏鼓天下之气”；二、要求将首都从临近沿海的北京，迁到内地长安，以便进行抗战，以二万万两赔款充军费，誓不对日求和，这叫做“迁都定天下

①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1360页。

② 汉代的取士制度主要是通过察举和征召，被征召的士子用公家的车子接送，称为“公车”，后来便称入京会试的举人为“公车”，含有尊称的意味。“公车上书”，就是会试举人上书的意思。全文内容见《戊戌变法》第2册《上清帝第二书》。



松筠庵——公车上书开会的会址

之本”；三、要求选将、练兵、购械，与日本决一死战，这叫做“练兵强天下之势”；四、中国目前“当数十国之覬觐，值四千年之变局”，非进行变法不足以挽救危亡，这叫做“变法成天下之治”。康有为认为：这四项办法中的前三项，都是治标的办法，叫做“权宜应敌之谋”，只有后一项才是治本的办法，叫做“立国自强之策”。关于变法的本身，他提出了富国之法、养民之法和教民之法三项建议。富国之法是国家发行钞票，允许私人投资办工业，包括铁路、工厂、轮船公司和采矿等。养民之法是使农业现代化，鼓励商业发展，包括农业生产机械化，发展农业科学，成立合股公司等。教民之法是讲求西学，改革科举，成立图书馆和创立报馆等。另外，他提出了裁撤冗官，紧缩机构，澄清吏治，改革官制，在各地设立“议郎”，即实质上要求设立议院等。总之，康有为的“公车上书”，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改良派进行变法维新的政治纲领。

以康有为为首的“公车上书”，是将酝酿多年的资产阶级改

良主义思想变为政治运动的起点。它冲破了长期以来清朝黑暗统治下一潭死水的局面，带来了思想解放的潮流。顽固守旧的闸门已被打开，社会上广泛谈论着变法的事情，上海专门出版了《公车上书记》的小册子，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更加广泛地传播起来。

从改良思想的酝酿，到变法理论的创立，再到发动具有实际斗争意义的政治请愿运动，说明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路线已经基本形成。

四、维新运动的高涨和帝国主义的阴谋

中日甲午战争后，改良派与帝党相互利用而结合，逐步开展着维新运动。

正当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帝后党争愈演愈烈的时候，资产阶级改良派打着变法图强的旗帜，登上了政治舞台。帝党企图利用改良派这股新起的社会力量，通过变法维新，排斥后党，扩大本集团的势力，来挽救摇摇欲坠的清朝统治。改良派蔑视人民群众的力量，坚持英雄造时势的唯心史观，认为“中国人主之权，雷霆万钧，唯所转移，无不披靡”^①，幻想依靠载湉的“政治权威”及其亲信大臣的“力量”，作为进身之阶和推动变法的桥梁。于是，帝党和改良派在相互利用的基础上结合起来。当然，他们之间也有矛盾，因为改良派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代表，要求参加政权，主张民权平等，实行君主立宪；而帝党则是封建统治集团，要求巩固封建皇权，憎恨民权平等说，但又不得不暂时容

^① 康有为：《上清帝第四书》，《戊戌变法》第2册，第188页。

忍它。

“公车上书”后，康有为考中进士，并被任命为工部主事，但他觉得这个职位太低，不值得为这个小差事去奔走，所以没有就职。一个月以后，五月二十九日康有为写成了他的《上清帝第三书》，陈述了自强雪耻的策略，分为富国、养民、教士和练兵四项，这封上书终于在六月三日被上递到载湉手里。六月三十日康有为又写出了他的《上清帝第四书》，这在北京官场里引起了很大的注意。帝党重要人物翁同龢亲自去拜访康有为，两个人反复地商讨了变法事宜。其他帝党官僚如孙家鼐、文廷式、徐致靖、徐仁铸、杨深秀、高燮曾、张荫桓、李端棻、杨锐、林旭、刘光第、黄遵宪、汪康年、黄绍箕等，都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同党”，与康、梁往还密切、时相过从。改良派和帝党的结合，使资产阶级改良派获得了政治后台或靠山，这就加速了维新运动的发展。

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派除上书请愿外，还成立学会、出版报纸和兴办学堂，加紧对知识分子和官僚进行宣传组织活动。

一八九五年七月，康有为和他的弟子们自己出钱，办《中外纪闻》报，由梁启超、麦孟华帮同撰稿，其形式与朝廷的《邸报》相同，每日木刻一小册，共印千余份，托送《邸报》的人随之分送在京官员，不收报费，企图借此打开官僚们的眼界，转变他们的思想。八月，康与文廷式等在京组织强学会，这是一种具有研究时政和政党两重性质的组织，既借以讲习资产阶级政治，也借以把他们组织起来，成为一种政治力量。学会每十日集会一次，每次有人演说，还出版报刊，准备办一个图书馆。学会的负责人是陈炽，康有为负责起草序文和章程。

参加强学会的人，不仅有帝党的大官僚如翁同龢、孙家鼐等人，而且还有一些地方督抚和将军们。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

督刘坤一、直隶总督王文韶各捐五千两以充会费，提督宋庆和聂士成各捐数千金入会，道员袁世凯也捐款五百元入会。李鸿章表示愿意捐献二千两申请入会，因这个卖国贼臭名昭著，遭到拒绝。李鸿章对此深为不满，他在出国考察时的前夕，曾凶相毕露地扬言：“若辈与我过不去，我归，看他们尚做得成官否？”^①张、刘、王、袁等所以捐款入会，并不是真的赞成维新运动，而是阳借“赞助”之名，阴行控制之实，以便将维新运动纳入他们那一伙买办官僚搞的洋务活动的范围之内。

随着维新运动的蓬勃发展，以那拉氏为首的顽固派人物，如荣禄、刚毅、徐桐、怀塔布、许应骙等，群起反对，企图把这次运动扼杀于摇篮之中。他们对改良派视如仇敌，徐桐准备参劾康有为，要求将他严办。京师大街上发现了对改良派进行诽谤和攻击的揭帖，风声有些紧张。在陈炽的劝告下，康有为为了避祸，离京南下，于一八九五年十月二十九日到了上海。十一月，康有为在上海成立强学会，翌年一月出版了《强学报》。上海强学会成立后，江浙一带著名人士如张謇、陈三立、章太炎、汪康年、黄遵宪等都纷纷入会，上海的维新运动也发展起来。这种形势，使改良派很高兴，他们说强学会“主之者内有常熟（翁同龢），外有南皮（张之洞），名士会者千计，集款亦数万”。^②他们的眼睛总是向上看的，广大群众却不在他们的视线范围以内，这正是他们的运动的致命弱点。顽固派极力反对维新运动，刚毅说：“改革者汉人之利也，满人之害也。”李鸿章唆使其亲家、御史杨崇伊上奏参劾强学会，那拉氏便逼令载湉封闭了强学会和《中外纪闻》报。张之洞一看风色不对，便借口不同意“孔子改制”之说，停止供给

^① 汪大燮：《致汪康年、诒年书》，《汪穰卿先生师友手札》。

^② 谭嗣同：《上欧阳瓣菴师书》，《谭嗣同全集》第334页。

上海强学会经费，并查禁了上海强学会和《强学报》。

顽固派虽然封闭了京沪强学会，但是，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已经在各地展开而不可遏止了。一八九六年一月，黄遵宪、汪康年倡议，以上海强学会余款创办《时务报》旬刊，于八月九日出版，汪康年负责筹款，梁启超被电邀来沪担任主笔。梁启超以他那笔锋常带情感的风格，和通俗流畅的文字，陆续发表了《变法通议》等一系列论文，比较系统而又详尽地宣传了维新变法的理论，受到了读者的欢迎。据说“江淮河汉之间”的人士“争传诵之”。《时务报》出版以后，八个月之间行销万余份，“为中国办报以来所未有”，上海成为维新运动的重要地区。

在南方的是上海《时务报》，在北方的是天津《国闻报》，这是宣传维新思想的两个重要阵地。《国闻报》是由严复和他的朋友夏曾佑、王修植等，于一八九七年十月创办的，初为旬刊，后来增出日刊。严复（一八五三——一九二一年），字几道，号幼陵，福建福州人，出身于一个贫困的中医家庭。一八六七年，十四岁的严复，考入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楨所主持的福州造船厂的船政学堂，学习英文、自然科学和造船技术，毕业后在军舰上实习。一八七七年，二十四岁的严复被派往英国留学，学习了三年海军，他研究物理、化学、海军战术、枪炮、营垒诸学，并对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和社会政治学说有较多的了解。一八七九年学成归国，一八〇〇年在天津水师学堂任总教习等职达二十年之久，学生遍布于海军中。

中日甲午战后，严复深深感到国家民族危亡的严重性，他认为只有向西方学习，才能挽救自己的祖国。为此，他陆续翻译并出版了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穆勒的《名学》和《群己权界论》，甄克思的《社会通铨》，孟德斯鸠的《法意》等



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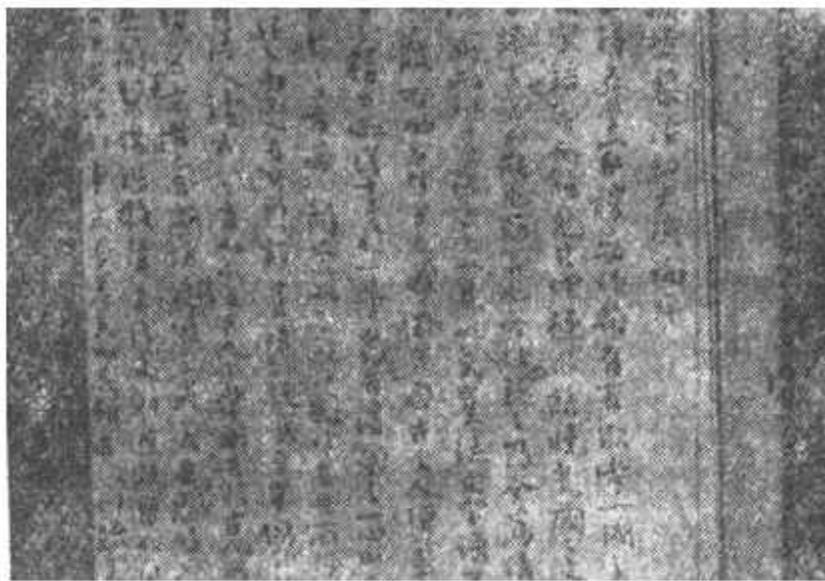
之得荆州，不足为喻，比经手录副本，秘之枕中。”^①鲁迅回忆他青年时代的生活时写道：“一有闲空，就照例地吃倭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②可见当时影响之深。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把严复同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并列为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除了翻译，严复于一八九五年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和《辟韩》四篇论文，通过这些论文，他宣传了资产阶级的文化，批判了中国的封建主义文化，提出了尊法反儒的观点，就改良主义的政治主张，发表了纲领性的意见；他希望提倡西学，设立议院，在中国建立一个象英国那样的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的国家。

① 吴汝纶：《答严幼陵》，《桐城吴先生全书》尺牍，卷1，第159页。

② 鲁迅：《朝花夕拾·屑记》，《鲁迅全集》第2卷，第406页。

书，第一次比较系统的把西方的资产阶级哲学和社会政治学说介绍到中国来，在社会上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尤以《天演论》一书出版以后，不胫而走，风行海内，在中上层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使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从中国儒家的典籍中摆脱出来，接受了资本主义的思想和文化。吴汝纶在给严复的信中写道：“得惠书并大著《天演论》，虽刘先主

除了北京、上海和天津以外，湖南也是维新运动最活跃的省区。长沙的“时务学堂”，是当时全国学堂中较好的。时务学堂的创办人之一，便是激进的改良主



严复手迹

义思想家谭嗣同。谭嗣同（一八六六——一八九八年），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出身官僚地主家庭，他父亲谭继洵，曾任湖北巡抚。谭嗣同青年时代，喜欢读法家王夫之、黄宗羲和尊法反儒思想家龚自珍、魏源等人的著作，后来游历全国各地，结识了不少进步朋友。中日甲午战后，谭嗣同首先在他的家乡浏阳发起成立了学会^①，这是湖南维新运动的起点。一八九五年，谭嗣同到北京去会见康有为，由于康已南归，未曾见到，他与梁启超在京订交，从此成为密友。一八九六年至一八九七年间，谭嗣同因其父为其捐官，在南京待缺江苏候补知府。他从中国古代法家著作中吸取营养，又从西方文化中学到一些科学知识，逐步形成了他的变法思想体系，写成了《仁学》一书和其他许多著述，主张冲决一切封建网罗，对封建制度和孔孟之道的纲常名教进行有力地批判。

一八九七年，湖南有一批主张变法的官吏，即湖南巡抚陈宝

^① 杨廷福：《谭嗣同年谱》第70页。按：此会无名，谭嗣同说：“先小试一县，邀集绅士讲明今日之时势与救败之道。”

箴和他的儿子陈三立、署按察使黄遵宪、提学使江标及其继任者徐仁铸等，邀谭嗣同回长沙主持新政。梁启超这时被张之洞排挤出上海《时务报》也前往湖南，加上当地唐才常等人，他们以南学会作为推动维新运动的核心团体，以时务学堂作为培养变法人材的处所，以《湘学报》和《湘报》作为鼓吹变法维新的喉舌。

时务学堂由梁启超任总教习，谭嗣同、唐才常等任分教习，学生第一批四十人，设立经、史、子、西学等课程，积极宣传改良主义思想。他们利用讲课和批改学生作业的机会，宣传民权平等和变法维新的思想，说“今日欲求变法，必自天子降尊始”，“春秋大同之学，无不言民权者”，“屠城屠邑，皆后世民贼之所为，读《扬州十日记》，尤令人发指眦裂”^①。南学会成为湖南新政的主要组织，具有学会与地方议会的两重性质。每周集会一次，举行讲演，演说国际形势与维新原理，这是学会性质。地方有事，通过会议而执行，这是议会性质。南学会会员千数百人，省城设总会，各州县设分会，浏阳、邵阳、长沙、郴州、常德、衡州等各地的学会，都是办得有声有色的。因此，湖南的维新运动发展得比较广泛和深入。

维新运动在湖南的发展，引起了顽固派的激烈反对，湖南地区新旧斗争激烈，势如水火。当地土豪劣绅王先谦、叶德辉等，率领顽固党徒，自称“保卫圣道”，打着孔孟之道的破旗，进行疯狂的反扑。他们咒骂改良派是“背叛君父，诬及经传”，说时务学堂是“伤风败俗”，“误尽天下苍生”，说南学会是提倡“一切平等，禽兽之行”，造成“无父无君之乱党”。王先谦上书陈宝箴，说康有为“心迹悖乱”，请即处死，以免“留此祸本，终成厉阶”。^②叶

^① 梁启超：《湖南时务学堂课艺批》，《戊戌变法》第2册，第548页。

^② 王先谦：《虚受堂文集》书札，卷1，第40页。

德辉则狂叫：“断不可以康有为搅乱时政，使四境闻鸡犬之不安。”^①思想斗争转成政治斗争，顽固派采取暴力行动，于一八九八年六月三日，他们麇集在长沙大成殿，祈祷“至圣先师”孔老二后，将邵阳分会会长樊锥驱逐出境，无耻地攻击他“丧心病狂”，“真汉奸之尤”。顽固派在长沙城厢内外，遍贴匿名揭帖，对维新人士进行攻击。他们哄散南学会，殴打《湘报》主笔，阴谋捣毁时务学堂。梁启超被迫出走，其他改良派人物也纷纷出走，维新运动受到很大的摧残。唯独谭嗣同不走，他说：“平日互相劝勉者全在‘杀身灭族’四字，岂临小小利害而变其初心乎？……今日中国能闹到新旧两党流血遍地，方有复兴之望。……今日但观谁勇猛耳。”^②他不愧为改良派中的勇猛斗士。毛主席说：“在从前，在旧中国，讲改革是要犯罪的，要杀头，要坐班房。但是在那些时候，有一些立志改革的人，他们无所畏惧，他们在各种困难的条件下，出版书报，教育人民，组织人民，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③谭嗣同等正是这些不怕杀头，不怕坐班房的志士。

从一八九五年到一八九七年，改良派在全国各地设立了许多学会、学堂、报馆和书局，进行变法运动。据统计，全国当时这类组织共五十一所，其中学会三十三，学堂十七，报馆九，书局二，以地区来说，湖南十五，江苏十三，广东十一，北京六，广西二，陕西、湖北、浙江、福建各一。这是最低估计，实际数字当会更多，这说明维新运动已经带有一定的群众性，在全国各地已经发展起来。

① 叶德辉：《与南学会皮鹿门孝廉书》，《翼教丛编》卷6，第23页。

② 谭嗣同：《上欧阳瓣菴师书》，《谭嗣同全集》第303页。

③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510—511页。



戊戌时期出版的报刊

维新运动的兴起，引起帝国主义列强的极大注意。这时，以沙俄为首的俄、德、法集团和以英国为首的英、美、日集团，竞相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拚命争夺对清朝政府的控制权。封建性很大的沙俄，支持中国最顽固保守的后党，通过后党控制了清政府。后党在沙俄的武力保护下，维持其封建统治，并为沙俄实现其“促进俄化中国的计划”而卖力。为了对抗沙俄和夺取对清政府的控制权，英、美、日集团便倾向于支持当时还不甚当权但正在争取当权的帝党，并拉拢已与帝党结合的改良派，阴谋操纵维新运动，改变它的性质，将其引向符合自己利益的轨道上来。一八九五年强学会成立，英、美使馆很感“兴趣”，表示愿助图书仪器。英国驻华公使欧格纳、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美国传教士李佳白都公开加入了强学会，对帝党、改良派施加影响，企图把他们培植成自己侵略中国、夺取特权的工具。李提摩太拜访翁同龢，提出所谓改革中国政治的意见书（即次年发表的《新政策》），托他转呈载湉。《新政策》的实质是要帝党在推行新政时把中国

的军、政、财、文大权统统交给英、美侵略者，妄图把中国变为它们的殖民地。日本帝国主义也不甘落后，一八九八年初，日本政府派神尾光臣等三个特务到中国，宣扬什么“中日亲善”、“同文同种”、“兄弟之邦”，表示要帮助中国变法。他们到汉口见谭嗣同，兜售“中日同盟”的黑货。日驻沪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则在上海召开“亚细亚协会分会”，拉拢帝党和维新人士。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等对伪装支持维新运动的帝国主义分子缺乏认识，幻想得到英、日的帮助以对抗沙俄支持的后党，推进维新运动，竟然提出了联英、日的主张。唐才常说什么“今日人既愿联盟我，且愿密联中、英相犄角，且愿性命生死扶持，千载一遇，何幸如之”。^①九月，日本军国主义头目、甲午战争罪犯伊藤博文亲自出马到北京，大唱“共筹东亚安全之策”的滥调，宣传沙俄对中国的威胁，表示要帮助中国变法图强，共同抵抗沙俄在东方的扩展。他得到改良派的信任，并受到载湉的召见。有人甚至奏请留他为指导新政的客卿。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经过乔装打扮的日本战犯和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分子，不论其口头上唱着什么高调，他们干的都不外是要继续在中国掠夺特权，以达到其最终变中国为殖民地的罪恶目的。

^① 唐才常：《论中国宜与英日联盟》，《戊戌变法》第3册，第104页。

第二节 尊法维新与尊孔守旧的大论战

——近代第二次思想解放潮流

一、爱国与卖国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传播和维新运动的开展，引起地主买办阶级的极大仇视和疯狂反对。改良派和顽固派、洋务派在政治思想领域内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爱国还是卖国，是双方论战的主题之一。

中日甲午战后，面对着帝国主义变本加厉的侵略，民族危机的空前严重，怎样对待帝国主义侵略，就成了中国各阶级和各阶层的首要问题。

在瓜分大祸迫在眉睫的严重关头，清朝封建统治者坚持妥协投降路线，公开宣扬卖国主义，企图依靠帝国主义，镇压维新运动，维护其摇摇欲坠的统治。醇亲王载沣就曾无耻地宣布：

“我国之兵，为防家贼而已，非为御外侮也”。^①顽固派大臣刚毅根据那拉氏“抑民奉外”的反动政策，无耻地说什么：“我家之产业，宁可以赠之于朋友，而必不畀诸家奴。”^②另一个顽固派大臣徐桐“恶西学如仇，门人言新政者，屏不令人谒”。^③他公然宣称：

“宁可亡国，不可变法。”这就是说，他们为了维持自己的反动统治，不惜出卖民族利益，甘心充当帝国主义的走狗，而决不允许人民起来造反，决不允许资产阶级进行变法维新。洋务派头子

^{①②}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戊戌变法》第1册，第290页。

^③ 《清史稿》卷471，《徐桐传》。

李鸿章打着孔老二“礼之用，和为贵”的破旗，高唱“以和为妥”的滥调，卖身投靠帝国主义，特别是匍匐在老沙皇的膝下，力图让清廷“托庇于其势力之下”。^①后起的洋务派头子张之洞公开扬言：如果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亦当有小朝廷，吾终不失为小朝廷之大臣也。”^②奴才的嘴脸，汉奸的灵魂，真是暴露无遗。

改良派继承了历史上法家的爱国传统，抨击帝国主义的侵略，批判清朝统治者的卖国主义。他们反复申述对于外国欺凌的激愤，对于民族命运的忧虑，对于国家富强的期望。康有为把当时的中国譬喻为一个“枯干瘦羸，渐无精气”的垂死老人。他指出：“俄北瞰，英西睽，法南瞬，日西眈，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③“吾中国四万万人口，无贵无贱，当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割宰……奇惨大祸，真有不能言者也。”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卖国，致使两个月来，“失地失权之事，已二十见，来日方长，何以卒岁！”他大声疾呼：“人人有亡天下之责，人人有救天下之权”，号召人们奋起救国，只要“吾四万万人皆发愤，洋人岂敢正视乎！”^④谭嗣同在评论《马关条约》时，尖锐地指出：“和约中通商各条，将兵权、利权、商务、税务一网打尽。随地可造机器，可制土货，又将火轮、舟车、开矿、制造等利一网打尽。将来占尽小民生计，并小民之一衣一食皆当仰之以给，自古取人之国，无此酷毒者！”^⑤他怒斥清政府“竟忍以四百兆人民之身家性命，一举而弃之”。^⑥严复也惊呼帝国主义的侵

① 梁启超：《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第87页。

②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戊戌变法》第1册，第269页。

③ 康有为：《强学会叙》，《戊戌变法》第4册，第384页。

④ 康有为：《三月二十七日保国会上演讲会辞》，《戊戌变法》第4册，第407、409、410页。

⑤⑥ 谭嗣同：《上欧阳瓣菴师书》，《谭嗣同全集》第289、288页。

略已经把中国推上“无以自存”的险境，他特别揭露沙俄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趁火打劫，“垂手而得我黑龙江之东部，于是俄肇有海参崴自由之海口”。他看出沙俄企图以海参崴为基地，阴谋侵略我国东北的野心，因而痛感“中国若长此终古，不复图改，将土地有分裂之忧，臣民有俘虏之患”。^①

改良派认为要挽救祖国的危亡，就必须变法维新。只有变法维新，才能“图自强，以雪国耻，而保疆宇。”^②在他们看来，救国是变法维新的出发点，而变法维新则是救国之道。正如梁启超所说的：“故必有忧国之心，然后可以言变法；必知国之危亡，然后可以变法；必知国之弱，由于守旧，然后可以言变法；必深信变法之可以致强，然后可以言变法。”^③

改良派虽然抨击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还存在着根本性错误。他们看不清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认为中国本身的落后引来了外国的侵袭。康有为说：“吾既自居于弱昧，安能禁人之兼攻？吾既日即于乱亡，安能怨人之取侮？”^④他们甚至把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活动，看作能够刺激中国发奋图强的一副良药。谭嗣同认为“东西各国之压制中国，天实使之，所以曲用其仁爱，至于极致也”，“然而中国则冥然而罔觉，悍然而不顾，自初至终未尝一动也。”^⑤正是基于这种错误认识，改良派主张不必进行反帝斗争，而把精力放在自身的改革上，“专求自强于一己”。^⑥在他们看来，“使中国一旦自强，与各国以比权量力，则彼将阴销其侮夺觊觎之心”。^⑦

①⑦ 严复：《上皇帝万言书》，《戊戌变法》第2册，第321、314、312页。

② 康有为：《上清帝第三书》，《戊戌变法》第2册，第166页。

③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戊戌变法》第1册，第293页。

④ 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戊戌变法》第2册，第190页。

⑤⑥ 谭嗣同：《仁学》，《谭嗣同全集》第61、37、78页。

二、变成法与“祖宗之法不可变”

要不要变法，是双方论战的第二个问题。

顽固派根据“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的思想，反对维新，反对变法，反对对封建制度作任何的改变。他们认为：西方有轮船、枪炮、机器，中国有纲常、礼义、诗书，西方有新式武器，中国有孔孟之道。前者不过是“形而下”的“小器”，后者才是“形而上”的“大道”。他们认为，小器是敌不过大道的，用孔孟之道的破旗，足可抵挡侵略战争的威胁。因此，他们看不惯一切新事物，把机器技术看作“奇技淫巧”，把学西方政治制度看作是“离经叛道”。他们从封建王朝的古董铺里，配上一副有色的眼镜，越看新鲜事物越觉得讨厌，他们回过头去看上古三代，一切都是那么美好，他们硬说那“茹毛饮血”的野蛮时代，才是圣人制礼作乐的理想之国。他们搬出儒家“敬天法祖”的教条，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胡说什么如果“子孙而欲革先人之法，其祸乱必甚于未革之世”。^①因为他们认为“中国一切皆非为制度之不良，而但为人心之败坏而已。”^②这批人物整天在“以拙制巧”、“用夏变夷”的昏梦中过日子，认为“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才是祸乱的根源。

洋务派和顽固派是一丘之貉，所不同的是洋务派具有较多的买办性，打着“变”的幌子，兜售不变的黑货。李鸿章认为中国封建统治已处于“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③当中，要在这种大“变局”中苟延残喘，就“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他说的“和戎”，就是向帝国主义投降；他说的“变法”，就是举办洋务。在他看来，只

^{①②} 曾廉：《习用论》，《觚庵集》卷8。

^③ 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第11页。

有“和戎”“变法”，才能达到所谓“尊古（中外反动主子）庇民（地主买办阶级）”的目的。张之洞精心炮制了《劝学篇》，宣扬“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反动谬论。他摆出一副变法倡导者的架势，煞有介事地提出设学校、译西书、办报纸、变科举、提倡农工商业等主张。但是，他说：“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①又说：“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所谓道本者，三纲四维是也，若并此弃之，法未行而大乱作矣，若守此不失，虽孔孟复生，岂有议变法之非者哉！”^②这就是说，只有法制、机器、工艺，即一些具体的规章制度和生产技术是可以变的，而封建等级制度和孔孟伦理道德则是万万变不得的，否则天下就要大乱了。

改良派根据法家主张变革的历史观和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批评了顽固派和洋务派。他们认为清朝封建统治已如朽木粪墙，百孔千疮，必须参照西方资产阶级的“新学”、“新政”、“新法”、“新器”，来变地主阶级之法，维资产阶级之新，才能保存中国，使之走上富强的道路。康有为根据“物新则壮，旧则老；新则鲜，旧则腐；新则活，旧则板；新则通，旧则滞”的发展规律，指出“法既积久，弊必丛生”^③，从而论证了变法的必要性。他说：“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观大地诸国，皆以变法而强，守旧而亡。”^④他把洋务派的“自强新政”批评为“饰粪墙，雕朽木”，是“变事而已，非变法也”。^⑤他提醒清朝统治者说：“自（割）台（湾）事后，天下皆知朝廷之不可恃，人无固

^{①②} 张之洞：《劝学篇》，《张文襄公全集》卷203，第19页。

^{③④} 康有为：《应诏统筹全局折》（《上清帝第六书》），《戊戌变法》第2册，第198、197页。

^⑤ 康有为：《敬谢天恩并统筹全局折》，《戊戌变法》第2册，第216页。

志，奸宄生心，陈涉辍耕于陇上，石勒倚啸于东门，所在而有，近边尤众。伏莽遍于山泽，教民遍于腹省。”^①他指出，不仅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无已，民族危机十分严重，而且国内的农民暴动随时可能爆发，还有“教案”问题也相当厉害。他认为国内外的形势都是十分严重的，必须变法维新，才能渡过难关。可见，康有为变法维新的目的，除了挽救民族危亡之外，还要防范农民起义的发生，企图以改良的手段去修补清朝的统治。

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一文中，首先阐明一切事物都在不断的变化，因而人类社会也没有不变的制度。以中国的赋税制度为例，初为贡助法，再变而为租庸调，又变而为两税制，后来变成一条鞭法等，其他如军事、政治和文化教育等制度也是一样，“无时不变，无事不变”。由此可见，变是“天下之公理”，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不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②在阐述了变法的必然性以后，他提出了自己的变法主张，即倡西学，设学校，育人才，改科举等。

谭嗣同同样积极主张维新，主张变法。他以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的观点，论证了新的事物必然代替旧的事物。他说：“天不新，何以生？地不新，何以运行？日月不新，何以光明？四时不新，何以寒暑发敛之迭更？草木不新，丰缡者歇矣；血气不新，经络者绝矣！”^③“昨日之新，至今日而已旧，今日之新，至明日而又已旧，所谓新理新事，必更有新于此者。”这就是说，人类不能守旧，要跟着时代不断地前进。他说：“守旧之鄙生，断断然曰不

① 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戊戌变法》第2册，第192页。

② 梁启超：《变法通议》，《戊戌变法》第3册，第18页。

③ 谭嗣同：《仁学》，《谭嗣同全集》第34、35页。

当变法”，是由于“茶敝（疲倦）惰怯之私”^①所致。他在这里指斥了守旧的顽固派，说他们是腐朽的，由于私心杂念和一味享受，因而是反对变革的。

严复也是主张改变现状，实行变法。他通过赫胥黎的《天演论》，把达尔文的关于生物进化的规律引用到社会领域中来，按照这个理论，生物不是自古不变的，而是“使生生者各省其所生，而又代趋于微异”。所以会有这种进化现象，是因为“物竞”与“天择”。“物竞者，物争自存也，以一物与物物争，或存或亡，而其效则归于天择。……天择者，存其最宜者也。”^②这个理论到了社会现象中，“小之极于跋行倒生，大之放乎日星天地。隐之则神思智识之所以圣狂，显之则政俗文章之所以沿革；言其要道，皆可以一言蔽之，曰天演而已！”^③严复认为在种族与种族、国家与国家之间，也存在着“优胜劣败，物竞天择”的竞争局面。现在侵略中国的正是“优者”，被人家侵略的中国正是“劣者”，在这种国际竞争的严重关头，中国究竟是甘于沦亡还是发奋图强，必须迅速地作出抉择。这个理论经严复介绍到中国以后，曾经风靡一时，使爱国的中国人受到很大的刺激，它震动了人们的视听，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忱，使中国人在痛切地感到如果再不力图振作，就必然成为弱肉强食的牺牲品，就会成为帝国主义宰割践踏的对象。应当指出，《天演论》的前半部讲的是自然进化论，是唯物主义的；后半部却把自然进化论的法则用来解释人类社会，则是唯心主义的。帝国主义正是利用人类社会也是“优胜劣败”的“理论”，干着侵吞弱小民族的罪恶勾当。

严复在《论世变之亟》一文中，提出了世界是变化的，事物是

^① 谭嗣同：《仁学》，《谭嗣同全集》第35页。

^{②③} 《严译名著丛刊》，《天演论》卷上，《观察》第1、《趋异》第3、《广义》第2。

在变化中不断前进的论点：“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他把事物变化的规律称为“运会”，认为“运会既成，虽圣人无所为力”。他说顽固派坚持反对变法，妄想“使至于今，吾为吾治，而跨海之气舟不来，缩地之飞车不至，则神州之众，老死不与异族相往来，富者常享其富，贫者常安其贫”，这是办不到的。他批判顽固派说：“夫士生今日，不睹西洋富强之效者，无目者也，谓不讲富强，而中国自可以安，谓不用西洋之术，而富强自可致，谓用西洋之术，无俟于通达时务之真人才，皆非狂易失心之人不为此。”他认为反对维新，坚持守旧的顽固派，无非是一些瞎子，是一些丧心病狂的糊涂虫而已。

改良派与顽固派、洋务派的论战，不仅在书报上进行，而且作了面对面的交锋。

一八九八年一月，翁同龢、李鸿章、荣禄、廖寿恒（刑部尚书）、张荫桓（户部侍郎）在总理衙门接见康有为，代载湫“问变法之宜”。

荣禄气势汹汹地先说：“祖宗之法不能变。”

康有为反驳说：“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也，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有于祖宗之法乎？即如此地为外交之署，亦非祖宗之法所有也。因时制宜，诚非得已。”

廖寿恒问：“宜如何变法？”

康有为答：“宜变法律、官制为先。”

李鸿章责难说：“然则六部尽撤，则例尽弃乎？”

康有为据理辩驳说：“今为列国并立之时，非复一统之世，今之法律官制，皆一统之法，弱亡中国，皆此物也，诚宜尽撤，即一时不能尽去，亦当斟酌改定，新政乃可推行。”^①

^①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第4册，第140页。

康有为对荣禄、李鸿章的围攻，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打击了顽固派的气焰。

总之，改良派用进化论批判顽固派和洋务派的不变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于加强爱国人们救亡图存的激情，冲破地主买办习惯势力的网罗，促进社会改革，有着积极意义。但是改良派所说的变，只是量变、渐变，而不是质变、突变。他们只限于提倡一种不消除旧有统治阶级的主要基础的改良，坚决反对根本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的革命。他们甚至企图用改良来抵制农民革命运动，把革命消灭于无形之中。由此可见，他们宣传进化论，反对不变论，完全是为改良主义路线服务的。

三、君民共主与君主专制

君民共主还是君主专制，是双方论战的第三个问题。

君主专制是地主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是有利于维护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的一种政体。顽固派和洋务派从地主买办阶级利益出发，死死抱住君主专制不放，拚命地反对兴民权。他们鼓吹“三纲五常”的孔孟之道，大肆贩卖“君权神授”的黑货，叫嚷什么“独今日言民主则万万不可举，万万不可法”^①，“民有权，上无权矣”，“议院设而废君，大逆不道之事更多矣”。^②张之洞更狂呼：“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③，甚至招致外国干涉。他

① 王干臣：《实学平议》，《翼教丛编》卷3，第18页。

② 宾凤阳等：《上王益五院长书》，《翼教丛编》卷5，第7页。

③ 张之洞：《劝学篇》，《张文襄公全集》卷202，第23、24页。

公然祭起三纲五常这个“法宝”，胡说什么：“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①在他看来，三纲五常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民权说是万万行不得的。他不仅大肆宣扬“君为臣纲”的说教，而且无耻地为清朝君主专制统治歌功颂德。他捏造清王朝有所谓薄赋、宽民、恤商、慎刑等十五条“仁政”，他以封建奴才的口吻说道：“试考中史二千年之内，西史五十年以前，其国政有如此之宽仁忠厚者乎？”他要求“凡我报礼之士，戴德之民，固当各抒忠爱，人人与国为体，凡一切邪说暴行，足以启犯上作乱之渐者，拒之勿听”。^②湖南劣绅叶德辉也跟着狂叫：“数年以来，康、梁倡伪经、改制、平等、民权之说”，使“民无论智愚，人人得申其权，可以犯上作乱”。^③那拉氏召开“御前会议”，攻击改良派设议院、倡民权的主张。顽固派大臣世铎对那拉氏说：“新法非所习，但闻有议院等制，是以民制君，上下倒置，则万不可行”；荣禄、王文韶提出“大经、大法自有祖宗遗制，岂容轻改”；刚毅气势汹汹地叫嚣：“今欲倾我大清者为康有为，而新法皆有为所臆造。今用新法，是用有为，以叛徒执政，实从古所无。”^④

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改良派以西方资产阶级民权学说为武器，猛烈批判君主专制制度，要求建立君民共主的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联合专政的政权。

改良派依据卢梭《民约论》中“社会契约说”和“天赋人权”

①② 张之洞：《劝学篇》，《张文襄公全集》卷202，第13、11—12页。

③ 叶德辉：《长兴学记驳议》，《翼教丛编》卷4，第39页。

④ 费行简：《慈禧传信录》，《戊戌变法》第1册，第468页。

论，批判了孔孟“君权神授”的反动观点。严复在《辟韩》一文中，集中批判了唐代儒家韩愈的《原道》一文，批判了韩愈所宣扬的儒家道统，批判了儒家的天道观和圣人创世说。韩愈在其《原道》中伪造历史，说什么“圣人”教会了人民衣食住行，才得以免除了禽兽之害，“圣人”制作了礼乐刑政，才得以免除了人民的互相杀害，胡说“无圣人，人之类久灭矣”。韩愈认为，皇帝是天生的统治者，是专门来发号施令的，而老百姓只能交纳赋税，供养皇帝，如果不能这样，就该杀死，这是“天之意”，“道之原”。严复针锋相对地指出：如果按照韩愈的说法，那么圣人及其祖先必定不是人，而是生有羽毛鳞爪的禽兽，否则，不等到他们长大，早已被禽兽害死，又怎能制作礼乐刑政呢？严复又指出：人民才是国家真正的主人，即“斯民者，固天下之真主也”。封建帝王之权，是窃之于民的，所以，他们不过是“大盗窃国者”，而韩愈偏偏要人民来尊重他们，这难道是“天之意”，“道之原”么？这些论述，虽然不脱资产阶级民权论的轨迹，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有力地批判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有力地批判了孔孟之道。此文发表以后，因为影响很大，张之洞竟指使屠仁守，在上海的《时务报》发表《辨辟韩书》来维护韩愈，攻击严复。谭嗣同也用相似的观点批判了君主世袭制。他在《仁学》一书中提出：“有民而后有君，君末也，民本也”，君主和大臣本来是“民”选出来为大家办事的，事办不好，就可以撤换，这本是“天下之通义”。^①他猛烈地攻击君主巧妙地利用三纲之名，制定制度、刑律，把君权置于不容侵犯的地位，把“君统”变成“独夫民贼之嗣绪（世袭制）”。^②基于这种观点，他认为洪秀全领导起义，是受君主和官吏压迫的结

^{①②} 谭嗣同：《仁学》，《谭嗣同全集》第56、66页。

果，是人民为了“救黄人将亡之种，以脱独夫民贼之鞅轭（当牛马驾御统治）”的一种尝试，因而“其情良足悯焉”。他对太平天国表示同情，并谴责清朝血腥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和湘军“淫虏焚劫”东南数省人民的滔天罪恶，认为曾国藩、李鸿章所谓“中兴诸公”都应该受重刑。^①

改良派在批判君主专制制度的基础上，提出了设立议会制度的主张。梁启超认为“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②他明确指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富强之原”，决不是洋务派所说的坚船利炮，而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他竭力歌颂西方资本主义议会政治，但反对在中国实行民主共和，而企图调和君权和民权的矛盾，实行所谓“君民共主”。他认为设立议院，可以调和“君权”与“民权”的冲突，并能使“立法”与“行政”截然分离。“君权与民权合，则情易通，议法与行法分，则事易就，二者斯强矣。”^③

改良派反对君主专制，鼓吹“民权”学说，主张人人都应享有“自主之权”，目的并非为人民群众争取民主权力。梁启超强调“权者，生于智者也。”“今日欲伸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④在他的心目中，劳动人民“智慧”不够，是不配享有民主权利的。他认为“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⑤“绅权固当务之急矣，然他日办一切事，舍官莫属也。即今日欲开民智、开绅智，而假手于官力者，尚不知凡几也，故开官智又为万事之起点。”^⑥由此可见，他的所谓“兴民权”，实际上是为资产阶级上层和中小地主争取

① 谭嗣同：《仁学》，《谭嗣同全集》第62页。

② 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后序》，《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28页。

③ 梁启超：《古议院考》，《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94页。

④⑤⑥ 梁启超：《论湖南应办之事》，《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第41、43、45页。

参与政权的权力；他的所谓“开民智”，实际上是要“开绅智”、“开官智”。

改良派对顽固派和洋务派关于实行君主立宪是“离经叛道”、“用夷变夏”等指责，采取了为自己辩护、洗刷的态度。康有为向《礼运》的“大同”说寻找民主政治的根据，胡说什么“民主之大公，尤为孔子所愿望”。梁启超也对古代典籍极尽穿凿附会之能事，胡诌《孟子》所说的“诸大夫”和“国人”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上议院”和“下议院”；汉代的议郎已具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议会议员的性质，企图借此证明议院并不是舶来品，实行君主立宪并不是“以夷变夏”。

四、尊法反儒与尊儒反法

在维新与守旧的大论战中，还伴随着一场尊法反儒与尊儒反法两种社会思潮之间的激烈斗争。这是历史上的儒法斗争，在新形势下的继续。

顽固派和洋务派为了阻挡社会变革，维护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秩序，都主张尊孔读经，反对要求革新和进步的法家思想。所不同的是，顽固派“恶西学如仇”，洋务派则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改良派为了变地主阶级之法，维资产阶级之新，积极提倡新学，反对旧学，大力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和尊法反儒思想。

严复在《论世变之亟》一文中认为，中国要富强，就必须“大讲西学”。他把中学与西学作了一系列的比较说：前者重三纲，后者倡平等；前者亲亲，后者尚贤；前者尊王，后者隆民；前者夸多识，后者尊新知；前者委天数，后者恃人力。这是比较委婉的

对于旧学的批判，也是比较委婉的对于新学的推崇。严复在《救亡决论》一文中，驳斥了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谬论，指出中学和西学是根本对立的；并批评洋务派仅袭西方资本主义的皮毛，而排斥西学，那是“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他对顽固派说：“公等从事西学之后，平心察理，然后知中国从来政教之少是而多非。”

严复不顾“非圣无法”的罪名，对孔孟之道进行了批判。他大胆地提出“诸公何必学孔子”的质问。^①他指出所谓“亚圣”孟轲，是造成脱离生产、游手好闲风气的罪魁祸首。他说：“后车十乘，从者百人，孟子已肇厉阶。”^②严复对孔老二在《论语》中所说的“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的谬论进行了批判。他说，说话算数，办事有始有终，却成了浅薄固执的小人，这是造成封建统治者言而无信，行而无果，说假话，耍两面派的根源。^③他认为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孔孟之徒，实际上是趋炎附势，“苟利一身”的禄蠹。这些所谓“儒者”，对“民转沟壑之中而不自知救，指其行为，诚皆不仁不义之尤”。这些自以为“通天地人之儒”，实际上“否塞晦盲”、“一物不知”^④，是一些无耻又无知之徒，因此，“举世不见通儒之用，而儒术遂为天下病”。^⑤严复猛烈抨击封建八股和科举制度，他指出这些东西有三大害，一是“锢智慧”，二是“坏心术”，三是“滋游手”，其罪状是“害在使天下无人才”。他说，从这里培养出来的人，只能是孔孟之徒的“儒”，而这种“儒”是“谬妄糊涂”，“使天下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堕坏志节于冥昧

① 严复：《有如三保》，《严复诗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

②④ 严复：《救亡决论》，《严复诗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

③ 严复：《原强》，《严复诗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

⑤ 严复：《论治学治事宜易二途》，《严复诗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

之中，长人虚骄，昏人神智”。^①既然如此，废除八股、科举以后，出路何在呢？他认为，出路就在于兴学校，学西学，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政治学说。他认为“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谋亦在此”。^②他沉痛地指出，中国社会的落后和国家的危亡，其原因便是孔孟之道的所谓仁义道德害人和骗人，若不迅速改弦更张，中国只有沦落为殖民地的悲惨前途。

严复在批判儒家的同时，肯定了中国历史上的优秀文化遗产——法家思想。他把自己说成是法家事业的继承者，认为实行法家路线，国家才能富强。一八九六年他在给《时务报》负责人汪康年的信中说：“苟二千年来，申、商、斯、高之法，熄于此时，则《时务报》其孺矢也。”^③他把维新事业，看作是申不害、商鞅、李斯以来法家事业的一个新的开端。他赞扬了秦始皇，认为秦始皇“并天下，更古制，更井田而为阡陌，废封建而置郡县，黜儒术而任名法”^④，是顺应了历史潮流的壮举；说“秦之销兵焚书”，是为了“大一统”的需要^⑤，对反动儒生，“秦皇坑之，未为过也”。^⑥他赞扬了王安石的变法，批判那些“至今言青苗，无不疾首痛绝”之辈，是不懂得其“法之良，意之美，无可议也”。^⑦他对于历代的法家代表人物和他们的革新事业，都给予了肯定的评价。他认为中国历史上，凡是实行了法家路线的，国家就比较富强，“凡为强效，大抵皆任法者也”。他的结论是：“法，治国之经制也。”^⑧由此可见，严复的尊法反儒思想是比较显著的，是有典型

①②⑥ 严复：《救亡决论》，《严复诗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

③ 严复：《与汪康年书》。

④ 严复：《论中国教化之退》，《严几道诗文钞》，卷2。

⑤ 严复：《论世变之亟》，《严复诗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

⑦ 《严译名著丛刊》，《原富》甲部第102页按语。

⑧ 严复：《法意·按语》。

意义的。

谭嗣同也是著名的尊法反儒的思想家。他对法家人物秦始皇有过肯定的评价，他说：“夫开创之盛，其唯秦乎？六而一之，国而郡县之。”“数万里咸奉一主，开辟以来，未尝有也。”^①他对于法家著作，如《管子》、《孙子》、《论衡》等书，都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长于致知”、“长于治国”。^②他对于尊法反儒的思想家魏源和龚自珍是很推崇的，认为只有他们才是当世的人才。

谭嗣同的反儒思想，主要表现为批判封建制度和封建道德，主张冲决封建主义的一切网罗和儒家的“纲常名教”。他号召人们“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学之网罗，次冲决君主之网罗，次冲决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罗，终将冲决佛法之网罗。”^③他认为纲常名教是封建统治者统治人民的工具，其“惨祸烈毒”泛滥数千年之久。他揭露提倡纲常名教的封建帝王和官吏豪绅，他们自己就是不讲伦常的无耻之徒。他说，皇帝的妃嫔极多，就是“湮乱夫妇之伦”。他说，所谓忠臣，就是替君主掠夺人民财产的奴才；所谓贞节，不过是对妇女的酷刑，不过是把家庭变成监狱。他认为只有向这种“箝制天下”的纲常名教进行斗争，才能获得理性的解放与自由。他指斥封建帝王是“独夫民贼”，是烧杀抢掠的“大盗”。

康有为要求改革清朝沿袭的“六朝唐宋元明之弊政”，实现变法维新，因而积极提倡“西学”和推崇法家的作为。康有为多次上书大讲“欧洲所以骤强之由”，并“请广译日本书，大派游学，

① 谭嗣同：《石菊影庐笔识·思篇》，《谭嗣同全集》第266页。

② 谭嗣同：《与唐绂丞书》，《湖南历史资料》一九五九年第4期，第129页。

③ 谭嗣同：《仁学·自叙》，《谭嗣同全集》第4页。

以通世界之识。”^①他赞扬“少正卯在孔子时为一国大师，能与孔子争教，其才可想”。^②他建议载湫效法法家，要“上考管子，师其经国之意。”^③他对法家人物秦始皇的历史作用，作了肯定的评价。他认为秦始皇废封建、建郡县，是完成“大一统”的重要措施，“自是以后，中国一统，虽累朝之末犹有争乱，中叶安宁，卒得数百年，人民得父子夫妇白首相保者，比之战国首虏之祸，其相去岂不远哉！”他赞扬“汉高祖凡有高才，不次拔擢”。“汉武帝修废举坠，东征西讨，……将帅若卫青、霍去病，金日磾，或拔之布衣，或起自奴仆，唯才是用。”^④他说“诸葛亮之佐蜀也，工械究极，用兵不戢，屡耀其武，率皆君臣上下，振刮摩厉，乃能自立”。^⑤由此可见，康有为希望学习古代法家的榜样，以法治国，使国家走上富强的道路。显然，这同复古倒退的儒家路线是大相径庭的。

康有为尊崇法家，而批评儒家。康有为反儒的特点，是打着儒家旗号反对儒家，在孔教的形式下宣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康有为的作法，正象马克思说的那样：“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例如，路德换上了使徒保罗的服装”。^⑥康有为则穿上了孔丘的服装，推行变法维新，所以梁启超说：“先生者，孔教之马

① 康有为：《请广译日本书派游学折》，《戊戌变法》第2册，第222页。

②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中华书局一九五八年版，第315页。

③ 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戊戌变法》第2册，第198页。

④ 康有为：《上清帝第三书》，《戊戌变法》第2册，第171—172页。

⑤ 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戊戌变法》第2册，第153页。

⑥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3页。

丁·路德也。”^①

当然，康有为也有些反儒的言论。他在《孔子改制考》中，就曾指出：“人情皆厚古而薄今，儒者之说又迂远而难于信。”^②他在引用法家韩非的话后评论说：“孔子、墨翟皆自以为真尧舜”，把自己打扮成圣道的继承者，但实际上尧舜都是古人伪造出来的，所以不能“定孔、墨之诚”。^③他又说：夏商周“三代文明，皆借孔子发扬之，实则茫昧也”^④，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孔老二极力推崇的“盛世”。他还引用《墨子·非儒》篇抨击孔老二，说孔某在陈、蔡地方被围，不问弟子送来肉、酒的来源，就大吃大喝，而解围后在鲁哀公宴请他时，又装模作样地讲起“礼”来，席不正不坐，肉切得不正不吃，被墨翟骂为：“饥约则不辞妄取以活身，赢饱伪行以自饰，汗邪诈伪，孰大于此？”^⑤康有为虽然将这类言论归在“异教非儒，专攻孔子”条中，并说墨子“轻薄恣肆”，但这不过是掩饰避祸的托词而已，如果真是尊重孔老二，怎么能在自己著作中大量引用痛骂、抨击他的言论呢？岂不太“大不敬”^⑥了吗！

尽管改良派的尊法反儒思想是很不彻底的，但也触动了清朝封建统治的思想基础。因此，以那拉氏为首的卫道士们，纠集孔老二的徒子徒孙，针对改良派的尊法反儒思想，进行疯狂的攻击。他们把改良派视为“名教罪人”、“士林败类”，将这场斗争看成是一场“翼教”即保卫孔教的斗争。他们将反对变法维新、鼓吹尊儒反法思想的奏折、书信、文章汇集成《翼教丛编》。这部文

^① 梁启超：《康有为传》，《戊戌变法》第4册，第15页。

^{②③④⑤}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中华书局一九五八年版，第273、49、6、175页。

^⑥ 按：《大清律》有“大不敬”条。规定：对“孔圣”、帝王等有失敬行为，应处以重刑。

集和张之洞的《劝学篇》，成了当时尊儒反法思潮的代表作。

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大肆宣扬儒家的纲常名教，说什么：“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礼政之原本，人禽之大防。”^①他狂叫要力倡“孔门之学”，要“明我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旨”。^②《劝学篇》颇得那拉氏和帝国主义的赏识，那拉氏吹捧它“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命令各省“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卮言”。^③帝国主义分子把它译为英文，改名《中国唯一的希望》，在纽约报纸上发表。

封建卫道士们使出全身解数，攻击康有为的反儒思想和行动。

苏舆给康有为罗织了五大“罪状”：“伪六籍，灭圣经也。托改制，乱成宪也。倡平等，堕纲常也。伸民权，无君上也。孔子纪年，欲人不知有本朝也。”^④

叶德辉咒骂康有为“假素王（指孔丘）之名号，行张角之秘谋，尼山（指孔丘）有灵，岂能听其流毒宇内哉！吾终见其灭亡已矣”。^⑤他着意攻击康有为考证古文经为刘歆伪造之说，惊呼“六经既伪，人不知书，异教起而乘其虚，岂非孔子之大祸？”^⑥

顽固派大臣文梯认为康有为“明似推崇孔教，实则自申其改制之义”。^⑦

他们判定康有为“其貌则孔也，其心则夷也”。^⑧“惑世诬民，

① 张之洞：《劝学篇·序》，《张文襄公全集》卷202。

② 张之洞：《劝学篇》，《张文襄公全集》卷202，第27页。

③ 张之洞：《劝学篇·上谕》，同上书。

④ 苏舆：《翼教丛编序》。

⑤ 叶德辉：《长兴学记驳议》，《翼教丛编》，卷4，第35页。

⑥ 叶德辉：《与南学会皮鹿门孝廉书》，《翼教丛编》，卷6，第23页。

⑦ 文梯：《严参康有为折》，《戊戌变法》第2册，第484页。

⑧ 叶德辉：《与刘先端、黄郁文两生书》，《翼教丛编》，卷6，第17页。

非圣无法，同于少正卯，圣世不容”。^①他们主张象孔丘杀少正卯那样杀掉这个“叛逆”。

顽固派和洋务派在大肆尊孔的同时，对法家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安维峻拾孔老二之余唾，骂少正卯“其言伪而辩，行僻而坚”。^②张之洞指责荀子“法后王，杀诗书，一传之后，即为世道经籍之祸”；辱骂“商鞅暴横，尽废孝弟仁义”；诽谤韩非“惨刻无理”，韩非、李斯之学是造成“暴秦之政”的根源。^③叶德辉等攻击秦始皇推行法家路线是“禽兽之行”^④；胡说什么“秦政焚书千载唾骂”。^⑤叶德辉还认定康有为著《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诬孔子以惊世骇俗”，是深受龚自珍、魏源的影响，目的是为了“抹杀二千年先贤先儒之传注”，破坏封建统治的思想支柱。他叫嚣具有这种“罪恶”的人，“可杀”。^⑥这显然是为镇压改良派制造舆论根据。

改良派同顽固派、洋务派的大论战，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正象恩格斯所指出的：“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任何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各社会阶级的斗争或多或少明显的表现，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⑦这次大论战，归根到底，是民

①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第4册，第128页。

② 安维峻：《清毁禁〈新学伪经考〉折》，《翼教丛编》卷2，第1页。

③ 张之洞：《劝学篇》，《张文襄公全集》卷202，第20、27页。

④⑥ 叶德辉：《长兴学记驳议》，《翼教丛编》卷4，第37、40—41页。

⑤ 朱一新：《答康有为第三书》，《翼教丛编》卷1，第7页。

⑦ 恩格斯对《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德文第三版所作的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2页。

族资本主义和封建的生产关系的矛盾在政治思想领域的反映，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和地主买办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改良派批判了顽固派、洋务派的尊儒守旧的思想，宣传了尊法维新的思想，形成了近代中国第二次思想解放潮流。

第三节 百日维新与顽固派政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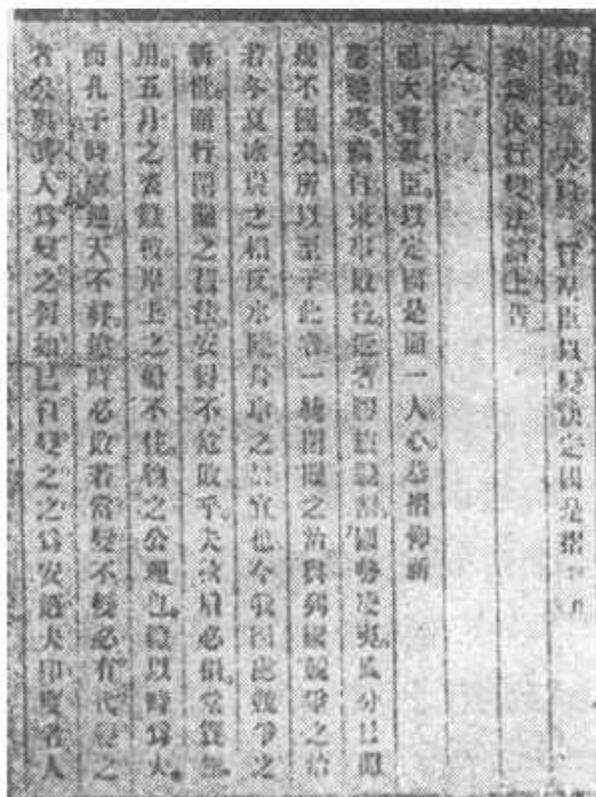
一、改良派的幻想

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德国强占胶州湾，民族危机日趋严重。中国人民反瓜分、反租借的斗争，一浪高过一浪，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在这样形势的推动下，改良派也加紧依靠载湉，幻想实现改良主义的目的。于是，变法维新运动，也进入了高潮时期。

这年十二月，康有为又一次来到北京，写出了《上清帝第五书》。他指出目前的形势是：“若不及时图治，数年之后，四邻交逼，不能立国。”“万国报馆议论沸腾，咸以分中国为言。若箭在弦，省括即发，……瓜分豆剖，渐露机芽，恐惧回惶，不知死所。”他告诉载湉，如果再不弃旧图新，赶快变法，他和他的诸大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关于变法本身，他提出了上中下三策，请载湉加以选择执行。上策是仿照俄国彼得大帝和日本明治天皇的办法，进行改革，学习他们的榜样，是谓“采法俄、日以定国是”；中策是挑选有才能的官吏逐日召见，商讨变法的方案和步骤，是谓“大集群才而谋变政”；下策是由皇帝命令各省督抚，在他们所在的省区内，进行变法，是谓“听任疆臣各自变法”。他认为：“能行其上，则可以强；能行其中，则犹可以弱；仅行其

下，则不至于尽亡。”^①康有为的这封上书递到工部，工部尚书崧澐是一个顽固派，认为语多不逊，不愿代呈。但上书已经轰动了北京城，官吏们辗转传抄，流传殆遍，津、沪的报纸已经全文发表。倾向维新的给事中高燮曾，上奏推荐康有为，要求载湉召见并委以重任。一八九八年一月，翁同龢、李鸿章、荣禄等人奉命接见康有为后，翁同龢为了扩大帝党力量，也借此机会把康有为在载湉面前大大夸奖了一番。载湉遂下令命康有为条陈变法意见，并送《日本明治变政记》、《俄彼得变政记》。

一月二十九日，康有为奉命上《应诏统筹全局折》即《上清帝第六书》。这是康有为历次上书中比较重要的一次，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变法的政治纲领。他首先指出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因为守旧不变，终至沦亡，而中国当前的形势是“我今无士、无兵、无饷、无船、无械，虽名为国，而土地、铁路、轮船、商务、银行，惟敌之命，听客取求，虽无亡之形，而有亡之实矣。后此之变，臣不忍言”。^②这就是说，中国快要灭亡了，如果不赶快下定决心，进行变法，力求自强，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关于变法本身，他提出了三项主张：一是大誓群臣以定国是，就



康有为的奏议

^① 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戊戌变法》第2册，第188—197页。

^② 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戊戌变法》第2册，第197页。

是幻想依靠载湫来推行新政；二是立对策所以征贤才，贤才就是改良派，由他们参预政权；三是开制度局而定宪法，就是改革旧制度，订立新宪法。康有为指出，目前的六部九卿司道大多为顽固守旧人物，必须设制度局来主持新政，在制度局下面分设法律、度支、铁路等十二个支局，来主管各部门的具体改革。二月二十八日，康有为再呈送《上清帝第七书》，主要内容是建议载湫学俄皇彼得大帝到国外游历、观察、借鉴外国政事，以进行国内改革。载湫支持康有为的意见，决定变法。但是，载湫的变法意图还是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要求变法有着不同的阶级目的。第一，清政府由于甲午战争失败，军事力量几乎瓦解，割台、赔款，政治、经济实力大为削弱，而如火如荼的农民反封建斗争和孙中山领导的反清武装起义，却又严重地威胁着地主阶级总头子——封建皇帝的统治地位。载湫从这个现状出发，感到清朝统治机构中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部门中的弊病太多，必须“锐意改革”，才能继续维持封建制度的存在。他认为“方今时事艰难，自以练兵为第一要义”。^①故于一八九八年七月十五日，严令各省督抚“无论水陆各军一律挑留精壮，勤加训练，俾成劲旅”，并“力行保甲，诘奸禁暴，相辅而行”。^②可见载湫的变法，主要为了强化封建国家机器，以镇压人民起义。在对外态度上，当然，如果某个帝国主义国家要取消他的统治地位，他自然“不欲为亡国之君”。但是变法能“交通外人，得其欢心”，得以“挟持重势而排沮太后之权力”^③，他是会投靠愿意支持他的帝国主义的。对待帝国主义的态度，改良派与载湫是有区别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

^{①②} 《德宗实录》，卷414，第17页；卷420，第16页。

^③ 章炳麟：《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756页。

虽然与帝国主义有较多的联系，对它抱有幻想，但由于他们是作为帝国主义的对立物出现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①，这个矛盾又决定他们有抵御外侮、救亡图强的爱国要求。在对待人民起义的态度上，改良派站在刚从地主、官僚、买办转化而来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剥削阶级立场上，为维护其私有财产起见，主张镇压人民起义，这同载湉有一致性。但载湉将镇压革命，巩固封建统治放于首位，而当时改良派并没有把抵制革命作为改良变法的主要目的。第二，载湉接受康有为的变法建议，还为了借机选拔和笼络效忠自己的人材，罢逐后党大臣，增强帝党集团势力，对抗后党以摆脱那拉氏的束缚，从她的手中夺回部分权力从而使自己成为掌握实权的专制皇帝。因而载湉对于改良派的根本主张，即“立行宪法，大开国会，以庶政与国民共之，行三权鼎立之制”^②的要求，内心里是反对的。因为载湉毕竟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总代表，他决不会甘心让资产阶级改良派分权。总的说来，载湉对改良派的变法主张，完全是以有利于强化封建国家机器及其个人统治权位为取舍标准的。章炳麟曾尖锐地指出：“其迹则公，而其心则只以保吾权位也。”^③不过，载湉在当时的形势下，在客观上支持了具有进步性质的维新运动，这又使他不同于血腥镇压改良派的后党。

随着改良派和帝党关系的进一步密切，帝国主义也更加注视着中国政局的发展，企图加以利用。改良派认不清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他们从狭隘的本阶级的利益出发，主张联英、日以

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640页。

② 康有为：《请定立宪开国会折》，《戊戌变法》第2册，第237页。

③ 章炳麟：《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75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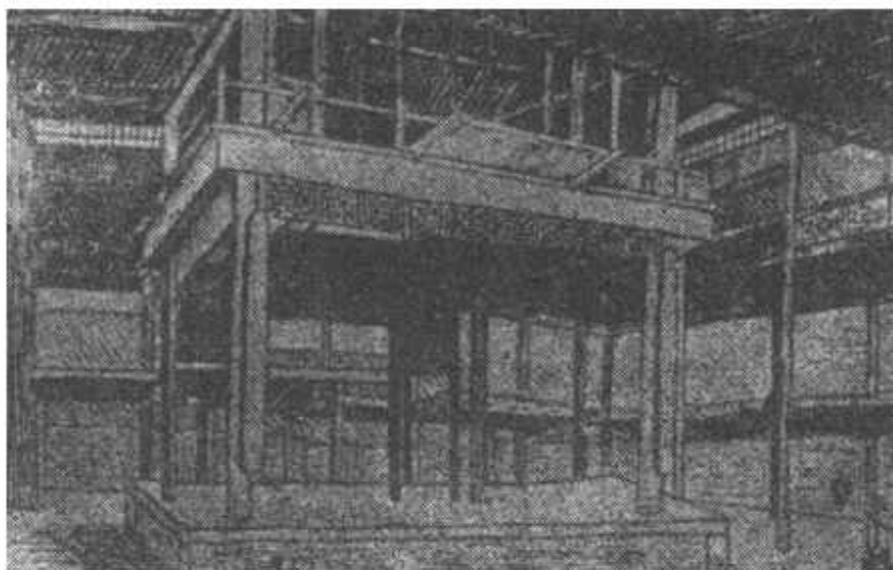
制俄。有主张就有行动，康有为曾与日本公使矢野文雄商议，将马关条约赔款延期十年偿付，以此款充变法经费。矢野表示同意，但附有政治条件，即中日两国召开“合邦大会议”，并订出了详细的章程。帝俄此际提出强租旅大要求。帝党反对，主张联英、日以抗沙俄。后党主张让与，认为中国无力作战。在御前会议时，载湫斥责奕訢和李鸿章说：“汝等言俄可恃，与订（中俄密）约，输以大利，今约期未半，不独不能阻人之来分，乃自渝盟索地，密约之谓何？”奕訢和李鸿章回答说：“若以旅大与之，密约如故。”载湫大怒，而那拉氏痛骂载湫说：“此何时，汝乃欲战耶？”^①这个软弱无能的载湫立即默然无言，帝后两党在对外政策上的分歧，正是反映了帝国主义在华利益上的矛盾。

德国强占胶州湾以后，民族危亡迫在眉睫，维新派为救亡图存而奔走呼号。康有为和梁启超乃于一八九八年四月十二日组织了“保国会”，并通过了《保国会章程》三十条。章程以救国图强相号召，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中下层官吏和知识分子参加的不少，有些富商大贾也列名会籍。在保国会的推动下，以北京为中心，全国各地纷纷组织了类似的组织，如有保浙会、保滇会、保川会等各种名称。

保国会的成立，使顽固派与维新派的斗争更加激化，顽固派荣禄大骂道：“康有为立保国会，现在许多大臣未死，即使亡国尚不劳他保也。其僭越妄为，非杀不可。你们如有相识入会者，令其小心首领可也。”^②经此恫吓，许多人便纷纷声明退会，御使李盛铎原是保国会发起人，摇身一变，上奏参劾保国会，企图免祸。虽然由于载湫的庇护，没有查办，但已无形中趋于瓦解。礼部尚

^①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第4册，第141页。

^② 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第1册，第350页。



保国会第一次大会会址

书许应骙攻击康有为说：“逞厥横议，广通声气，袭西报之陈说，轻中朝之典章，其建言既不可行，其居心尤不可问。”^①要求将康驱逐回籍。御史文梯说康“名为保国，势必乱国”，“徒欲保中国四万万万人，而置我大清国于度外”。^②这就是什么“保中国不保大清”这类谣言的由来，并成为后来那拉氏大兴党狱的借口。由于帝后党争日趋激烈，载湉向庆亲王奕劻说：“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那拉氏听到后大怒说：“我（也）早已不愿他坐之。”在奕劻的劝说下，那拉氏答应暂时“由他去办，俟办不出模样再说。”奕劻转告说：“太后不禁止皇上办事。”^③于是，在康有为等改良派人物的主持下，打着载湉旗号的“百日维新”宣告开始。

① 许应骙：《明白回奏并请斥逐工部主事康有为折》，《戊戌变法》第2册，第482页。

② 文梯：《严参康有为折》，《戊戌变法》第2册，第485页。

③ 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第1册，第331页。

从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一日载湫下诏“明定国是”，决定变法起，到同年九月二十一日戊戌政变发生止，共计一百零三天，这就是昙花一现的“百日维新”运动。在此期间，资产阶级改良派抓住了一个皇帝，企图得以进行社会改革的尝试。在载湫的诏书中，一方面表示要“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另一方面却表示要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①说来说去，不过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的翻版。这又一次证明帝党实行变法的目的，主要是向后党夺取实权，以维持封建专制统治。六月十三日，载湫命令康有为预备召见，命令黄遵宪、谭嗣同等由湖广总督送部引见，命令梁启超由总理衙门察看具奏。十六日，载湫召见了康有为，对于康有为在召见时所说的变法的方针和具体建议，几乎都表示了赞同的意见。但是，当康说：“皇上之圣既见及此，何为久而不举，坐致割弱。”载湫“以目睨帘外，既而叹曰：‘奈掣肘何’？”康有为也深感载湫“碍于西后，无如何”。^②这说明载湫还是软弱的，害怕的。康有为对此则从改良主义立场出发，认为如果不能全变，可以部分先变，如果守旧大臣阻挠，可以把他们撇在一边，只用新进的地位较低的人才进行变法。康有为这种折中的极力妥协的方案，实际上仍然是一种行不通的幻想。载湫命令康有为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并许专折奏事。康有为陆续呈上他的许多有关变法的著作和条陈，这既是和载湫保持联系的一种方式，也是指导百日维新的一种办法。

在这期间，资产阶级改良派通过载湫，颁布了一系列的变法诏书，其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① 《德宗实录》卷418，第15页，《戊戌变法》第2册，第17页。

^②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第4册，第145页。

第一，经济方面：（1）在北京设立农工商总局，在各省设立类似机构，凡能采用西法开垦土地，设立工厂，出版书籍者，给予鼓励甚至特赏。对于工商业的发展，要尽力保护；（2）在北京设立铁路矿务总局，其他粤汉、沪宁各线，亦须即日迅办，并勘查京西芦沟桥至门头沟运煤铁路，着手筹款兴办；（3）对于凡是著有新书，创行新法，制成新器，对发展生产确有帮助者，给予奖励，给予官职或专利权；（4）命令各省督抚将军裁尽空粮，节省饷需，整顿厘金，清查屯田地亩，订出征租章程，传旨编制国家预算和决算，命令户部将每年收支款项，编成表格，按月刊报；（5）取消满人寄生特权，准许自谋生计，取消从前计口授田成案。

第二，政治方面：（1）鼓励创办报纸和给予出版自由命令上海《时务报》改为官报，派康有为督办其事，连同各地报纸，均须随时进呈。命令康有为译出西洋各国新闻条例，制成中国报律呈览。译书局、编译学堂所出版的书籍一律免税。在京城设立报馆；（2）提倡上书言事，允许大小臣工及士民各抒谏论，以备采择。凡上书言事者，都察院应随到随递，不要拆阅，不准积压；（3）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臚寺、太仆寺、大理寺等闲散衙门，裁撤“督抚同城”的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及东河总督。澄清吏治，提倡廉洁。

第三，军事方面：（1）裁汰绿营，精练陆军。各省军队包括八旗兵一律改习洋枪，改练洋操，命令湖南巡抚筹办制造枪、弹两厂；（2）命令各地督抚拨款给福州船厂，以便筹造兵轮，添设海军。命令增加水师学堂学生名额，添置练船，培养海军人才。

第四，文化教育方面：（1）广设学堂，提倡西学。命令开办京师大学堂，以为各省之榜样。官书局和译书局并入大学堂。

各地书院以及祠庙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的学堂。学堂用书，由官书局编译颁发。凡捐建学堂者，应予奖励。京师创办小学堂和武备大学堂，创办各种专门性的医学堂、茶务学堂、蚕桑学堂，上海办翻译学堂，在华侨所在国亦设华侨学堂，并兼习中西文字；（2）废除八股文和改革科举制度，改试策论，开办经济特科，定期举行。此后之会试，改试历史、政治、时务等，以讲求实学为主，不凭楷法的优劣；（3）派遣王公贝勒出国游历，命令各省督抚简派学生到日本留学，学习矿务；（4）命令在北京、通商口岸及各府州县，一律举办邮政局，原设驿站，一律裁撤。

从这些改革可以看出：资产阶级改良派在经济方面的目的，是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条件。在政治方面的目的，是为资产阶级参预政权创造条件，给予封建官僚机构、贪污腐化现象以一定的限制。在军事方面的目的，是淘汰旧军队，建立新军队，使军队近代化。由于资产阶级改良派手中无权，特别是没有军权，所以在这方面的措施又少又空洞，他们从一开始就不努力去抓军队，这是他们软弱无力和后来失败的原因之一。比较起来，他们更多的注意了文化教育方面，为资本主义文化在中国的发展创造了某些条件，给孔孟之道以一定冲击。

在百日维新时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借载湉之手取得了颁布上谕的权利，还获得了一些言论和出版的自由。在北京创办了京师大学堂，为日后大批学生出国留学创造了有利条件。奖励农工商的诏令，对日后兴办民族工业产生了积极的作用。维新运动虽然为时很短，但它促进了全国思想解放潮流的迅速发展，一种议论时政的新的社会风尚正在形成，这有利于促进广大群众政治上的觉醒，这都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但是，改良派的软弱性和帝党的反动性，也从百日维新时期

暴露出来了。载湫发布上谕，曾经严饬地方官办理保甲，查拿“盗匪”，以镇压人民革命运动。载湫命令各地保护教堂和传教士，并把不平等条约纂集成书，咨送各级官吏遵守，保护帝国主义的在华特权。经济上，他们不敢去触动封建土地制度；政治上，他们没有彻底改造旧官僚机构；军事上，他们没有触动旧军队的一根毫毛，文化上，他们没有去彻底批判孔孟之道。因此，百日维新是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妥协的产物，它没有触动封建专制制度的根基，而只是进行了一些枝枝节节的改革，不过是在封建国家的衰老躯体上，缀上零零落落的资本主义花环而已。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这种改革的目的是要保存旧的制度，办法是使它具有新的、人们比较能够接受的形式，即所谓教它学会采取新的姿态。”^①即使是这样一些微弱的改革，它也碰到顽固派和一切守旧势力的猛烈反抗，各地督抚除陈宝箴还能推行一些新政外，都是阳奉阴违，拒不执行。不过，这时正是维新运动的高潮时期，改良派和帝党是不会罢休的，他们决定要继续干下去，不顾一切阻挠而继续推行他们的新政。

七月三日，载湫赏梁启超以六品卿衔，命他专办译书局事务。八月二十九日，载湫命令严复、杨锐、刘光第、林旭等人预备召见。九月初，谭嗣同也从湖南赶到北京，载湫召见了。这期间所发生的六部堂官的罢免和军机四卿的擢用，把新旧两派的斗争推向了高潮。原来，礼部主事王照上奏言变法之事，礼部尚书许应骙不肯代递，王照上奏参弹许应骙，许应骙也上奏说王照咆哮署堂，借端挟制，又劝皇上出国游历，倘遇刺客怎么办，可见王照居心叵测，请加惩办。载湫为了使变法得到贯彻，九月四日

^① 马克思：《内阁的成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58页。

下令把借端阻挠的礼部六堂官即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左侍郎坤岫、署右侍郎徐会沣、右侍郎溥颢、署右侍郎曾广汉给予革职处分；说王照不畏强御，勇猛可嘉，赏给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以资鼓励。六堂官罢免以后，改良派欢欣鼓舞，争着上书言事，各衙门的封奏每天数十份，载湉处理不完，乃于九月五日谕内阁，将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四人，赏给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这军机章京官虽然小，但职务重要，所有大小臣工的奏折，都由他们批阅，诏书上谕亦由他们起草，他们是载湉的重要助手，实为推行新政的“宰相”，时称“军机四卿”，这是顽固派所极不愿意的。

随着顽固派压力的增大，改良派和帝党之间的矛盾也逐渐显露出来了。还在组织强学会时，康有为就对帝党官僚丁立钧不太满意，认为他过于“畏谨”。康有为也曾批评翁同龢，认为他对后党太软。翁同龢起初赞成变法，极力推荐康有为，后来又害怕顽固派政变，据说曾经偷改了自己的日记，日记中说康“居心叵测”，讲了一些康的坏话。湖南巡抚陈宝箴也说：“《孔子改制考》伤理而害道，其徒和之，持之愈坚，失之愈远，器然自命，曾为康学。而民权平等之谈炽矣，甚或逞其横议，几若不知有君臣父子。”可见帝党变法是手段，争权是目的，并不真正赞成资产阶级的民权说。帝党另一首脑孙家鼐，反对召开国会，认为“若开国会，则民有权而君无权矣”。^①张謇在变法前期，引康、梁、谭为同党，书信往来，诗酒唱和，但当变法来临之际，就成了叶公好龙，开始横加指责了：“在京，闻康有为与梁启超诸人图变政，曾一再劝勿轻举，亦不知其用何法变也。至是张甚，事固必不成，祸之

^① 康有为：《戊戌奏稿》第40页。

所届亦不可测。”政变发生后，张謇害怕了，赶忙和康、梁划清界限：“余与康、梁是群非党，康、梁计划举动无一毫相干者。”^①由此可见，帝党与改良派虽然共同推行变法维新，但两者却是同床异梦的。维新运动愈深入，二者之间的矛盾也愈大，改良派所依恃的就是这样一个远不可靠的同盟军。翁同龢与张謇都曾有抽身免祸的念头或举动，其他诸人也就可想而知了。

二、那拉氏的屠刀

面对帝党与改良派的结合，后党暂时采取了“以退为进”的策略。他们企图在容忍变法的幌子下，紧紧抓住中央的军政实权，以待变法激怒了一切腐恶的社会势力时，再一举扑灭维新运动。那拉氏的老搭当、头号亲信荣禄就曾对其同党说过：“欲废皇上，而不得其罪名，不如听其颠倒改革，使天下共愤，然后一举而擒之。”^②正是基于这种计谋，那拉氏才假惺惺地对载湫说：“变法乃素志，……毋操之过蹙而已。”“苟可致富强者，儿可自为之，吾不内制也。”^③但是，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深知只有勾结帝俄、执行尊孔崇洋卖国路线才能维护自己统治地位的那拉氏及其亲信，在载湫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后，却在暗中加紧布置，准备发动政变。荣禄、奕劻、刚毅等不断到颐和园和那拉氏密商政变步骤，暗中监视载湫，并针对新政采取了几项反动措施。

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五日，即“明定国是”诏书颁布后的第四

① 张謇：《啬翁自订年谱》，第45、49页。

② 佚名：《新党某君上日本政府、会社论中国政变书》，《戊戌变法》第2册，第604页。

③ 费行简：《慈禧传信录》，《戊戌变法》第1册，第464页。

天，那拉氏迫使载湫下令将翁同龢开缺回籍，以削弱帝党实力，孤立和打击载湫。又令二品以上大臣授新职要到太后面前谢恩和陛见，控制了载湫的人事任免权，防止改良派获得高级职务。六月二十三日，那拉氏迫使载湫任命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统率北洋三军，即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袁世凯的新建陆军，这是那拉氏控制军事机器，手握屠刀，待机而动的阴险措施。那拉氏又以载湫名义宣布定于十月十九日往天津阅兵，届时，由那拉氏与荣禄密谋发动政变，迫载湫让位。从六月十六日到二十四日，那拉氏相继任命刑部尚书崇礼为步军统领（即京城卫戍司令），以怀塔布管理圆明园八旗官兵，包衣三旗官兵及鸟枪营事务。以刚毅管理健锐营事务，并更换了一批八旗都统。这样一来，后党业已完成了控制京津地区军事上的部署，只待伺机而动了。赶走了翁同龢，那拉氏又任命裕禄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以控制政权的中枢部门。那拉氏派出大批爪牙，监视载湫和改良派的活动，内廷中布满了他的亲信太监，出入人员虽王公贝勒必须盘查，紫禁城也由步军统领所派的八旗兵把守，遇有可疑人员立即向那拉氏报告。此际，京津道上顽固派人物往来密谋，行色匆匆，警犬四布，密探成群，改良派和若干帝党人物已成为那拉氏的囊中物，俎上肉，政变即将发生，大祸已经临头了。当然，有些统治集团外围的顽固派还没有看透这种阴谋诡计，当有人跪请那拉氏阻挠新政时，那拉氏还假惺惺地说：“汝管此闲事何为乎？岂我之见识犹不及汝耶？”当有人问荣禄，荣禄却毫不掩饰地说：“姑俟其乱闹数月，使天下共愤，罪恶贯盈，不亦可乎？”^①反动派已经屠刀在手，天罗地网已经撒成，

^①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戊戌变法》第1册，第261页。

这是一场政治大风暴到来的前夕。

改革科举制度以后，使那些靠“八股取士”往上爬的孔孟之徒失掉了进身之阶，因此他们对变法维新恨之人骨。湖南举人曾廉上书那拉氏，请立即杀死康、梁，可算这类人的代表。废淫祠和停书院以后，许多僧巫和土豪劣绅失掉生活依据。他们危言耸听，说康有为在宫廷里设立了礼拜堂，进行煽动。闲散衙门裁撤以后，大批旧官僚将失业，他们是和新政誓不两立的。上谕命令满人自谋生计，将使许多满人失掉寄生特权，内务府总管大臣立山率一批满人前往颐和园，请那拉氏临朝训政。六部堂官革职后，怀塔布的妻子到颐和园找那拉氏哭诉，那拉氏安慰她等待时机。李鸿章被赶出总理衙门后，他的亲家杨崇伊即赶往天津与荣禄密商对策。庆亲王奕劻和太监李莲英，也一道跪求那拉氏，要她实行训政。那拉氏所居的颐和园，和荣禄的天津直隶总督衙门，成为顽固派集中密谋的两大黑据点。他们策划于密室之中，准备进行反扑。“当那些主张改良和改善的人还不懂得，任何一个旧制度，不管它怎样荒谬和腐败，都是由某些统治阶级的势力所支持的时候，他们总是会受拥护旧制度的人们愚弄的。”^①温和改革还是触动了相当一大批的封建贵族和社会渣滓的利益，这些人骤然失掉种种特权，惶惶不可终日，如丧考妣。他们成为反对新政的社会基础。

而改良派却是孤单的，他们没有力量，没有军政实权，没有广大人民群众作后盾，只有一个空架子的皇帝来挡风，而这个皇帝连自己的地位也岌岌可危了。天津阅兵，阴谋政变的消息传到载湫耳朵里以后，他相当惊慌。他对奕劻表示，他是誓死也不

^①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2卷，第446页。

去天津的。改良派建议载湫自任海陆军大元帅，又建议他仅带“通才”数十人迁都上海，以摆脱顽固派的压力，但这实际上都办不到。当此风声越来越紧之际，改良派似乎才想起了应该抓军队，抓几个武人作靠山。林旭认为董福祥及其甘军可靠，康有为和谭嗣同等却认为袁世凯及其新建陆军较为可靠，他们的理由就是袁世凯参加过强学会，似乎同情变法。袁世凯（一八五九——一九一六年），字慰亭，别号容庵，河南项城人，出身官僚地主家庭。袁世凯因两次投考举人不中，乃于一八八一年投入吴长庆军，先为幕僚，从张謇学习，甲午战争前曾随军到朝鲜。一八八五年受李鸿章赏识，升任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全权代表。甲午战后，经李鸿藻的推荐，任荣禄部下的新建陆军督办，于一八九五年在天津小站练兵，共计七千人。在他的周围，逐渐聚集了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徐世昌等人，这是袁世凯后来赖以起家的政治资本，这支军队就是北洋军，这些人物就是北洋军阀的骨干，北洋军阀集团就是从此诞生的。

维新运动开始后，袁世凯投机加入强学会，伪装赞成变法，借以窥测方向，以求一逞。改良派认为可以靠他的武力谋杀荣禄，维护载湫，以推行新政。于是派康有为的亲信弟子徐仁禄到小站试探。袁世凯当着徐的面吹捧康有为，并表示对载湫的忠心耿耿，于是康有为向载湫推荐袁世凯。九月十一日，袁奉上谕来京陛见。十六日载湫召见，详询练兵事宜，并夸奖几句，传旨赏以侍郎衔，令专办练兵事宜，以示笼络。实际上，袁这时在北京遍访权贵如刚毅、裕禄、王文韶等，探听风声，了解内情。他已经断定载湫和改良派都是无力量的，而那拉氏一边却是有力量的。第二天，载湫再度召见袁世凯，要他与荣禄以后各办各事，互不掣肘，言外之意，他可以不买荣禄的帐了。此际，顽固派业

已调兵遣将，准备下手，京津一带风声鹤唳，空气相当紧张。九月十三日，当载湫往颐和园，请那拉氏开懋勤殿以议制度，那拉氏即冲冲大怒，将他痛斥一顿而加以拒绝。载湫知道大祸已经临头，当天密诏给康有为说：“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此诏于十四日由杨锐带出，由于杨锐惊慌失措，积压了五天才交给了林旭。载湫等了几天，不见回音，急于十七日又降密诏给康有为，交林旭带出，密诏说：“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外出，不可延迟。”^①即叫他赶快逃命。十八日，林旭把这两个密诏交给了康有为，康有为一方面准备次日逃往上海，一方面召集谭嗣同、梁启超、康广仁、徐仁禄等在南海会馆开会，商讨办法。既无军队，又无群众为后盾的改良派，此时束手无策，抱头“痛哭不成声”，最后决定孤注一掷，派谭嗣同去说服袁世凯，叫他举兵勤王，扶载湫，杀荣禄，消灭旧党。

十八日深夜，谭嗣同密访袁世凯，将维新派的全部计划和盘托出。他拿出载湫的密诏给袁看过，然后要他在天津阅兵的时候发动反政变，诛戮后党，恢复帝党的权力。他还对袁世凯说，如果你不干，可以到颐和园去告密，把我谭嗣同杀了，也可以得富贵，这两条道路由你选择。袁世凯“正颜厉色”地说什么：你把我袁某看作什么人？！皇帝是我们共事的圣主，救驾的责任你有我也有。袁还说，阅兵时，如果皇上迅速跑到我袁某的营里，杀荣禄和杀一条狗一样容易。袁又郑重地说，事关重大，他必须立即返回天津，要调换几个军官，贮备一些弹药。谭嗣同信以为真，自认为策划已经成功，又向袁叮嘱一番，才辞别而归。

^① 《上谕》，《戊戌变法》第2册，第92、97页。

改良派除了把自己的政治赌注押在袁世凯身上以外，还把希望寄托在帝国主义身上。十九日早晨，康、梁又聚集于容闳寓所，决定由康有为去走访李提摩太，要他转请英国公使窦讷乐出面协助。但这时窦讷乐到北戴河避暑去了，康与李提摩太未能见到。康有为又去找伊藤博文，请伊藤去说服那拉氏。二十日康有为离京南下，二十一日他从天津搭乘英商太古公司的轮船由海道赴沪，而把搭救载湉的事情托付给梁、谭和康广仁等人。二十日，载湉又召见袁世凯，要他保护新政。袁世凯说：“新进诸人，固不乏明达猛勇之士，但阅历太浅，办事不能缜密，倘有疏误，累及皇上，关系极重，总求十分留意。”^①这里已经透露了杀机。退朝之后，袁世凯立即回到天津，当晚即向荣禄告密，出卖改良派。荣禄闻听后大惊失色，立即挂专车进京到颐和园向那拉氏报告。袁世凯用维新党人的鲜血，染红了他的顶戴，这个叛卖者立即以“才堪大用”而被那拉氏所赏识，从此飞黄腾达起来，成为近代中国臭名昭著的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代表。

九月二十一日，戊戌政变突然发生。那拉氏于黎明由颐和园间道入西直门，直入紫禁城，怒气冲冲地进入载湉的寝宫，把所有的奏折稿件全部拿走，把载湉囚禁到南海的瀛台。那拉氏公开诡称皇帝生病，不能处理公务，再三恳请“训政”，不得不“俯如所请”，于二十一日起临朝听政。她发布“谕旨”说：“已革工部主事康有为，学术乖谬，大悖圣教，其所著作，无非惑世诬民离经畔道之言，著将该革员所有书籍板片，由地方官严查销毁，以息邪说而正人心。”^②那拉氏公开利用违背孔老二“圣教”的罪名，开始镇压改良派，并将百日维新的新政除京师大学堂及保甲制

^① 袁世凯：《戊戌日记》，《戊戌变法》第1册，第553页。

^② 《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总4208页。

度保留外，全部宣布废除。接着，那拉氏又下令大捕改良派及倾向维新的官员，一时“缇骑遍地，海内沸腾，风云扰攘，天地变色，无一省不受荼毒者”。^①戊戌政变中，不少人被斩首、通缉、监禁、充军或罢逐。康有为得英国帮助，由天津经烟台逃亡香港再到日本。梁启超受日本使馆保护到东京。谭嗣同拒绝逃亡国外的劝告，并声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②遂于九月二十八日，同林旭、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一起被顽固派杀害。史称“戊戌六君子”。谭嗣同临刑前愤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③这是他给自己走改良主义道路得出的结论，但也反映了为革新不怕牺牲的精神。



谭嗣同狱中遗札

①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戊戌变法》第1册，第286页。

② 梁启超：《谭嗣同传》，《戊戌变法》第4册，第53页。

③ 谭嗣同：《临终语》，《谭嗣同全集》第512页。

严复在维新运动期间，在天津水师学堂当总办，并进行译述，在《国闻报》上发表宣传维新的文章，他参加实际的政治活动较少，和康、梁等人的接触似乎不多。由于别人的推荐，他曾经去北京应经济特科，载湫还召见过他一次，问了他一些关于变法和西学的事情。政变发生后，他连忙回到天津去，《国闻报》也被封闭，他虽然没有被逮捕入狱，并仍然做他的学堂总办，但行动上受着监视和限制，心情是很沉闷的。他在政变后所写的《戊戌八月感事》诗中写道：“燕市天如晦，宣南雨又来。”显然这是以悲愤的笔锋，指责盘踞在北京的封建顽固派把社会搞得天昏地暗；而谭嗣同、林旭等人的被杀，连青天也为之洒雨以示悲悼。这些诗句，表现出了严复对于维新党人的深切同情和对顽固派憎恨的心情。

那拉氏上台以后，恢复了全部旧制，她授怀塔布左都御史兼内务府大臣，许应骙擢闽浙总督，李鸿章出督两广，袁世凯授护理北洋大臣，加赏西苑门内骑马。戊戌变法运动犹如昙花一现，历史又暂时地倒退回去，反动派却在血泊里弹冠相庆了。

三、改良主义道路走不通

戊戌维新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作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准备时期的一个发展阶段，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是有进步意义的。

这次改良主义运动的产生和发展，是与国家民族危亡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是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兴起和发展的。因此，这次变法运动具有显著的救亡特点与爱国性质。严重的民族危机是推动变法运动的力量，变法运动的爱国性质，又成为它得以蓬

勃兴起的原因，这两个方面是交织在一起的。改良派人物都是当时爱国的青年，他们深信只有变法才能挽救国家的危亡，只有维新，中国才能够富强起来。他们的目的是救国，他们的手段便是变法，他们是把这两者有机地统一起来了。

戊戌维新运动是一次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革运动。改良派企图在不改变封建专制制度的大前提下，让中国成为资本主义社会，让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进行联合的专政，建立君主立宪制度。他们对于封建社会的一套制度，采取了尽可能不去触动它的办法，而对于资产阶级的一套新制度则尽可能使之带上“古已有之”的色彩，使它尽可能与旧制度谐调起来。他们的社会改革方案虽然是很温和的了，但在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在封建君主专制长期统治的历史条件下，对封建势力不能不说是一次冲击。

改良派所发动的维新运动，从经济上说，是企图冲破封建生产关系的桎梏，排除帝国主义的压迫，力求为解放生产力，为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创造一定条件。他们对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有切肤之痛，谭嗣同说：“以商为战，足以灭人之国于无形，其计至巧而至毒。”^①他们对于外资在华设厂表示反对，认为“遍地通商，免税免厘，兴创机器，制造土货，其祸之烈，直无办法”。^②改良派要求在中国兴办工业，发展资本主义，恳求载湉“下明诏奖励工艺……成大工厂以兴实业……皆优与奖给，则举国移风，争讲工艺”。^③因而在明定国是的诏书中，颁布了许多发展民族工业的方案。这对后来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是有影响的，这种要求也是符合于社会向前发展的历史趋势的。

^{①②} 谭嗣同：《思纬壹壹台短书——报贝元征》，《谭嗣同全集》第422、407页。

^③ 康有为：《请厉工艺奖创新折》，《戊戌变法》第2册，第227页。

改良派在一定程度上举起尊法反儒的旗帜，给孔孟之道以冲击。康、梁、谭、严都是各自程度不同地与尊儒反法思想进行过斗争。这是因为千百年来孔孟之道紧紧地束缚着人们的思想，不对它进行猛烈的冲击，就难以得到思想上的解放，就不能实现政治改革。但是，他们的改良主义本质，决定了他们的斗争是软弱的。改良派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搞托古改制，只是胆怯地以今文经学的孔老二去反对古文经学的孔老二。虽然这样，经过戊戌变法，毕竟把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科学技术传播了进来，在上层建筑领域里给了孔孟之道以一定打击。此后，孔孟之道不再是金科玉律，君权神授的观念也发生了动摇。顽固派惊呼，阅“近日少年文字及聆其谈论，往往矜奇斗异，肆为大言，诋讥孔孟，称扬叛逆”。^①

总之，戊戌变法作为中国近代时期的政治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一个发展阶段，它的进步意义是应该予以肯定的。但是，它确有着许多致命的弱点，以致带来了失败的结局，这是值得我们永远记取的。

改良派幻想依靠某些帝国主义帮助中国变法维新，是政治上犯了认敌为友的根本错误，因而不可能挽救祖国的危亡。改良派从感性上认识到中华民族的危机，从舆论宣传到发动政治运动，以期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然而却不能从理性上认识帝国主义的本质，不仅看不清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而且由于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同帝国主义有密切联系，更导致了改良派把实现变法维新事业的希望，寄托在英、日、美等帝国主义的帮助上。他们说日本是“唇齿之邦”，说英国是“救人

^① 《翰林院侍讲学士恽毓鼎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506页。

之国”，幻想依靠英、日来抵制后党及其后台沙俄。把帝国主义侵略者当成抵御侵略、挽救危亡的朋友和老师。这完全是一种与虎谋皮的想法和作法。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因此，帝国主义必然要千方百计地阻挠和破坏中国任何的政治改革和经济发展，决不允许中国发展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尽管英国、日本或美国，在表面上“赞助”改良派，但本意决不是为了中国的富强和独立，而是基于同沙俄争夺在华霸权的需要，阴谋操纵维新运动，培植自己侵华利益的另一批代理人。后来，当英、日、美等帝国主义摸清了帝党与改良派的底细，看到军政大权仍牢牢控制在后党之手，它们的阴谋不能实现时，也就不愿再给改良派以实际的援助。政变发生后，改良派请李提摩太见英国公使，派梁启超见日本公使，容闳见美国公使求救，均无结果。这时，英、日、美决定仍然继续维持同顽固派、洋务派控制的清政府所谓的“和好”关系，以保持既得的侵略利益。这证明帝国主义国家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虽然彼此间存在着矛盾，但他们都是一丘之貉。改良派企图依靠那些要变中国为殖民地的几个帝国主义来实现变法图强，发展资本主义，是幼稚而危险的幻想，犯了政治上认敌为友的错误，其结果无疑是使中国仍然走不出半殖民地的死胡同。

对于封建主义的妥协和乞求，注定改良派不可能进行真正的改革。事实上，改良派几乎等于跪在封建势力面前乞讨变法的。康有为自己承认，他不敢发表《大同书》就是因为怕顽固派接受不了。他搞“托古改制”，也是因为事体重大，为免祸计，只好打着古人的旗号来进行变法。他原来主张裁撤一切旧衙门，罢斥一切守旧派官吏，后来感到反动派的压力太大，便对载湉说，不要去掉旧衙门，也不要罢斥旧官吏，只增置新衙门，提拔改

良派人物当助手就行了。他们是极力绕道而行，似乎这样可以减少阻力。对于那拉氏的统治虽然深感不满，但他们不敢说，不敢反对，只能佝偻爬行，不可能挺起胸膛，迈步前进。当反动势力组织力量，准备反扑时，他们却束手无策，眼睁睁地看着顽固派在京津之间或策划于密室，或隐现于军中，而没有组织自己的力量，没有把军队抓过来。他们认为只要有舆论的力量，有一个傀儡皇帝来发布上谕就可以了。以致使敌人得以从容布置，而把自己置于坐以待毙的可悲地位上了。

由于对于人民的敌视态度，使改良派陷于孤立无援而失败。资产阶级改良派是用反动的眼光来看待农民起义或农民革命的。他们内而感到人民起义的威胁，外而感到帝国主义的侵略，这就是他们所谓的“内忧外患”，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内则伏莽窃发，外则强敌凭陵”。^①他们把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一样看待，认为都是威胁他们生存的可怕力量，这就表现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也表现了剥削阶级仇视劳动人民的反动性。他们既然看不见人民的力量，也不可能依靠这种力量来进行斗争，这就使他们变成软弱无力的可怜虫，当顽固派进行反扑时，他们就被轻易地镇压下去了。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②改良派只相信他们自己的少数天才，而不知道创造历史的都是人民群众。康有为说过：“自古非常之事，必待有为之君。”^③梁启超也说：“有非常之才，则足以济非常之变。呜呼，是所望于大人君子者矣！”^④因此，他们搞变法维新

① 《兵部学习主事范轼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96页。

②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932页。

③ 康有为：《公车上书》，《戊戌变法》第2册，第153页。

④ 梁启超：《变法通议》，《戊戌变法》第3册，第21页。

运动的社会基础是十分狭小与脆弱的。一当那拉氏发动政变时，“君子”们就不得不“引颈受戮”，不得不孤零零地悲惨失败。这充分说明没有人民力量的支持，任何事情也办不成功的。

从顽固派利用儒家思想破坏和镇压戊戌维新运动的事实说明，要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发展，就必须坚决彻底地批倒复辟倒退的孔孟之道。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严复等人进行了尊法反儒的斗争，但是由于受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他们不可能用科学的世界观深刻揭露孔学复辟奴隶制的反动内容，批判走向没落的封建统治阶级利用孔孟之道维护其腐朽统治的反动实质。加上康有为、严复等人自幼受过儒家的熏染，在他们的思想和变法理论中都夹杂着许多封建余毒。如戊戌维新时期严复、谭嗣同的著作中，崇法批儒是主流，但也混杂有不少孔孟的思想言论。康有为则受今文经学影响较深，他运用西方进化论附会《公羊传》中的“通三统”、“张三世”的观点，来说明自己的变法主张是符合孔孟之道的，并以此反对顽固派坚持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儒家论点，这是软弱无力的，极不彻底的。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

“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无力和世界已经进到帝国主义时代，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①改良主义很快破产的结局，不仅说明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脆弱；还说明了改良派的思想武器是不堪一击的，依靠它是冲不垮也不可能冲垮孔孟之道的。

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同地主买办势力的斗争，就其本质来说是阶级斗争，是新的生产关系要求代替旧生产关系这种性质的

^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657页。

斗争。但要达到这种更替，按照阶级斗争的规律，则必须走暴力革命的道路。革命导师马克思曾科学地总结了生产方式变更的普遍规律，他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①列宁更进一步指出：“新政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同旧政权并存的条件下，在反对旧政权的斗争中产生出来、成长起来的。不用暴力来对付握有武器和政权机关的暴徒，就不能把人民从暴徒的压迫下解放出来。”^②但是，改良派反对依靠劳动人民采用暴力手段推翻帝国主义走狗清王朝，他们坚持“变之自上者顺而易，变之自下者逆而难”^③的信念，死死抱住并无实权的皇帝，幻想通过他颁布空头诏令，以实现一种“不必消除旧有统治阶级主要基础的变更”。^④企图实行与旧基础相容的变更。这显然是由于他们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剥削阶级地位，同封建土地关系联系较多的特点，以及他们坚持的唯心史观所决定的。改良派人物的流血事件，证明了反动派不仅要镇压革命，就是连这样软弱的温和的一些改良也是绝不允许的。要想不触动封建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而使中国和平地过渡到资本主义，从而导致封建制度的逐步消亡，这是办不到的幻想。戊戌变法的历史证明，处于帝国主义时期，在中外反动势力相互勾结而变得更为凶恶强大，并已建立了共同压迫、剥削中国人民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形势下，要改变中国这种社会地位，没有坚强的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广大农民为主力军，不以革命的暴力反抗反革

^①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版，第1卷，下册，第819页。

^② 列宁：《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列宁全集》第10卷，第215页。

^③ 唐才常：《致欧阳中鹄书》，《戊戌变法》第2册，第579页。

^④ 列宁：《几个争论问题》，《列宁选集》第2卷，第479页。

命的暴力，而坚持走改良主义的道路，是注定要失败的。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时代在继续前进。许多人接受了血淋淋的教训，扔掉了改良主义的旗帜，踏上了革命的大道，他们丢掉幻想，准备和敌人继续搏斗，直到把这个反动的清朝政府消灭为止。在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中，就有许多是这样从改良转入革命营垒的战士。这是历史的必然。

但是，改良派头面人物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却仍然执迷不悟，不肯放弃改良主义路线，而使自己背离了时代前进的车轮，在他们的头上逐渐消失了维新的“圣光”，开始走向自己的反面。其实，这是不奇怪的，这是由他们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本来，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为代表的改良派，是一批刚刚从地主、官僚、买办转化过来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人物，他们的阶级基础是脆弱的，成员是复杂的。这些人大都与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康、梁等人，本来就是地主官僚子弟，自幼受着封建教育的严重熏陶，又长期顺着“八股取士”的进身阶梯爬来爬去。只是到了中法战争前后的数年之间，由于民族危亡的加深，才唤起了他们对黑暗现实的严重不满，发奋向西方寻找救亡图存的真理。然而，他们是骑着封建文化的门槛去接受西方资产阶级先进文化的。他们既追求西学，却又舍不得孔学。他们表面上学了点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骨子里却仍旧保留着浓厚的封建素质。这同康有为的表面形象一样，嘴里讲的是声光化电，后脑勺上却拖着一条长长的辫子，具有鲜明的两重品格。虽然他们拚命鼓吹改良，却一贯诋毁暴力革命。因此，一旦有了适当的气候和条件，他们的封建性的素质就会本能的故态复萌了。严复虽然系统地接受了西学教育，引进了西方资产阶级庸俗进化论、民权平等思想等，但他毕竟是由布衣寒士变成了

“大清”海军学堂的总教习，自然他无论如何是不肯轻易丢掉这个铁饭碗的。所以，他在变法维新运动中，尽管可以发表许多激进的言论，却不肯做出一点点“冒险”的行动。如前所述，这些人倡导变法维新，固然有着救亡图存的进步意义，但另一方面却又有杜绝农民革命发生的叵测用心。因此，阶级的利益注定改良派的头面人物终究要同革命人民站在对立面的。变法运动失败后，亡命于日本的康有为、梁启超继续死抱住光绪皇帝不放，幻想载湫有朝一日能够重新执政，使自己能够再推行改良主义路线。这不仅有机阶级根源，而且也同改良派坚持庸俗进化论的宇宙观分不开的。严复认为：“民之可化，至于无穷，唯不可期之以聚”，康有为说：“欲骤（质）变而未能。”他们只承认社会的发展有“渐变”，而否认能“骤变”。显然，这是否认阶级斗争是社会发
展动力的唯心主义的历史观。这种唯心史观，反映在政治上就必然要坚持社会改良，反对阶级斗争，反对社会革命。随着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广泛开展，康有为所代表的改良主义路线同孙中山的革命路线的矛盾就日趋激化了。从此，他们公开与革命为敌了。他们和他们当年所反对的封建顽固派一样，自己也变成了顽固派而极力阻挠革命潮流的前进，成为阻碍时代前进的绊脚石。阶级斗争的规律告诉我们：顽固守旧，复辟倒退，总是要从儒家的破烂武库中寻找思想武器的。自然，早被康、梁背诵得纯熟的孔孟之道，便成了他们用来对付革命的得心应手的大棒。于是他们在文化战线上，从尊法反儒的阵地上退却下来，而一头扎进了尊儒反法的营垒，成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尊孔派。特别是康有为，一变而成为尊孔派的首领，疯狂的喊叫“孔子万岁”，陷入了泥淖而不能自拔，变成了被时代所唾弃的可怜虫。从康有为、严复在戊戌时期作为先进的中国人，主张尊法

反儒，救国维新，到后来堕落为尊孔保皇、复辟派的历史教训说明，任何人一定要同孔孟之道彻底决裂，肃清头脑中孔学的流毒，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前进，不要倒退。

第九章

伟大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

第一节 瓜分声中义和团狂飙突起

一、侵略激起了反抗

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两年，在祖国的大地上，又掀起了震撼世界的义和团革命风暴。义和团运动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反帝爱国运动，是近代中国第二次革命高潮。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究竟是中国人民组织义和团跑到欧美、日本各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去‘杀人放火’呢？还是各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因而激起中国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贪官污吏？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可以不辩论清楚。”^①

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各国妄图瓜分中国，把半殖民地的中国推进殖民地的深渊。正如列宁所揭露的：“欧洲资本家的贪婪的魔掌现在已经伸向中国了。……欧洲各国政府一个接一个拚命掠夺（所谓‘租借’）中国领土，瓜分中国的议论并不是无的放矢。如果直言不讳，就应当说：欧洲各国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国政府）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了。不过它们在开始时不是公开

^① 一九六七年四月一日《人民日报》。

瓜分的，而是象贼那样偷偷摸摸进行的。”^①义和团运动正是帝国主义侵略加深、民族灾难空前严重的产物，是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国人民反侵略、反瓜分浪潮的洪峰。

不仅如此，义和团运动也是长期以来彼伏此起、遍及全国的群众反洋教斗争的一个总汇合。

洋教、洋货、洋炮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主要工具。帝国主义对中国除了进行军事、政治、经济的侵略以外，还处心积虑地开展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传教士以帝国主义大炮为前导，以不平等条约为护符，成批地窜进中国的广大城乡。到十九世纪末，在中国的欧美天主教、耶稣教、沙俄东正教共有外籍传教士三千二百多人，建立了四十个教区，六十多个教会，招引入教者达八十余万人。仅山东一省，就在七十二个州县中，设有各种教堂会所一千一百余处，传教士三百多人，教徒八万多人，出现了“教堂几遍天下，传教洋人相望于道”^②的景象。

这些口念“圣经”的洋教士，都是欧美资产阶级的忠实走狗，帝国主义殖民侵略的先锋。美国传教士狄考文曾露骨地宣称：“传播基督教的工作，很适当地被比作军队的工作。军队的目的，不单是尽量杀伤和擒获敌人，乃在征服全部敌人……基督教的工作目标也是一样，它不单在尽量招收个别信徒，乃在征服整个中国，使之服从基督。”^③他们通过宗教宣传，向中国人灌输一种“忍耐、保守和受苦受难的精神”，诱骗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和平相爱”，妄图消灭中国人民的爱国心和革命性，使其“乐天

① 列宁：《中国的战争》，《列宁选集》第1卷，第214页。

② 《山东省志资料》，一九六〇年第2期，第83页。

③ 《在华新教传教士一八七七年大会记录》第173页。

知命”，安于被奴役的地位，忍受残酷的殖民统治，而不进行任何的反抗斗争。

洋教士在中国还创办了许多所谓“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诸如开医院、兴学校、办报纸和吸引留学生等等。这些所谓“慈善事业”、“文化事业”同“宗教事业”一样，都是直接为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服务的，目的“在于造就服从它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①在这方面美帝国主义是罪魁祸首。毛主席指出：“美帝国主义比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②据统计，截止一八九九年底，洋教士在华设立的医院共六十一个，美国就占三十二个；创办的学校学生一万六千八百三十六人，美国就占九千七百五十九人，远远超过了老牌帝国主义英国。美国传教士供认：他们设立医院“无非是用治病为传教的手段。”^③他们创办学校，无非是因为学校“常常起着尖兵的作用，是布置轰炸敌人堡垒的工兵和弹药手。”^④美帝国主义的险恶用心，已经昭然若揭了。

洋教士们在“圣洁”面纱的遮掩下，除了妄图从精神上征服中国外，还干着其他种种罪恶的勾当。

首先，他们是帝国主义侵华的谋士。洋教士们往往以“中国通”的资格，直接参与或策划帝国主义对华军事进攻和政治压迫。比如，中英《南京条约》的起草人，是英国传教士小马礼逊。美国传教士伯驾曾鼓动美国政府利用鸦片战争之机侵华，并充

①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593页。

② 毛泽东：《‘友谊’，还是侵略？》，《毛泽东选集》第1395页。

③ 《在华新教传教士一八七七年大会记录》第119页。

④ 《在华新教传教士一八九〇年大会记录》第445页。

当了强迫清政府签订《望厦条约》的美国使团的中文秘书，因侵华有“功”，后来担任驻华公使。德国在山东的主教安治泰，亲自晋见德皇威廉二世，主张利用“巨野教案”，出兵占领胶州湾。这些清楚地表明：洋教士是帝国主义侵华的急先锋。一八五八年美国驻华公使列威廉直言不讳地说：“传教士及与传教运动有关系的那些人，他们所作的努力，对于我国的利益是非常重要的。若没有他们充当译员，公事就无法处理。没有他们的帮助，我在这里就简直无法履行我的责任”。^①美国资产阶级学者丹涅特接着说：“列威廉所描绘的情况以后仍在继续，直到十九世纪末年，差不多经常有一些美国传教士在驻华公使馆或各领事馆中担任重要的职务。在极大多数的情况下，真正和中国官吏接触的人，与其说是这些传教士的名义上的上峰，毋宁说正是这些美国传教士们。”^②

其次，他们是常驻中国的高级间谍。这些传教士一闯入中国，就“上察朝廷政令，下图山河形势”，无孔不入地刺探各种情报。美国传教士斯贝杰自供，他们都“受命把其所在地的一切情况向领事汇报”。^③美国国务卿斯汀生供称：“我们对中国最普通的消息，都来自……这个巨大的传教运动”。^④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也说：“这些先锋队（按指美国传教士）所搜集有关（中国）民族、语言、地理、历史、商业，以至一般文化的情报，将其送回国内，对于美国的贡献是很大的。”^⑤美国传教士如此，其它国家的传教士也莫不如此。

①② 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第556页。

③ 斯贝杰：《十字架征服中国》第175页。

④ 斯汀生：《远东的危机》第154页。

⑤ 《美国外交档案》一八八八年，第221页。

第三，他们是大地主和投机商，贪得无厌地盘剥中国人民。英国人宓克说：“教中神父于择地建堂诸事，皆极精能，且善于治生，广置田宅，经营蕃息，川至云兴。其中办事之人，皆理财能手，佃田赁屋，概凭大道生财。”^①一八六〇年中法《北京条约》订立后，传教士假借“抵还教堂”名义，在十多个省份霸占了大量田产。山西省长治天主堂的田产登记簿残本，记载着从一八五九——一九一一年，共收进田产一百一十七份，其中买的八十三份，典的八份，献、让、换、罚、补足、布施共二十六份。献、让、罚之类等于霸占，买、典的也近似霸占，因为买、典价极低，一八六三年买的一所窑院，价仅一千八百文。

传教士不仅霸占大量田产，以大地主的身份盘剥农民，而且经营非法贸易，进行投机倒把活动。一八九七年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向国务院报告：“在中国各地的传教士，从事各样各色的职业，是非常普遍的……他们设印刷厂、订书局、实业学校、工厂、商店及诊疗所。他们充任医生、宗教书售卖人、报纸通讯员，还有开设旅店、饭馆，招待过往客人的。他们制造各种各样的家俱，公开售卖。”^②瓦德西描绘美国传教士说：“此辈常以服务教会为纯粹面包问题，凡认为可以赚钱之业务，无不兼营并进。”^③美国传教士如此，其他国家的传教士也不例外。

第四，他们是清朝地方政府的太上皇。外国传教士公然侵犯中国主权，在中国的土地上，称王称霸。“各国教士，无论有无官爵，辄与各省大吏抗衡”。^④山东传教士自称巡抚，以一省最

① 宓克：《支那教案论》（严复译本）第58页。

② 《美国外交档案》一八九七年，第105页。

③ 瓦德西：《拳乱笔记》，《义和团》第3册，第171页。

④ 《清史稿·列传》卷52，第39页。

高长官自居，公然命令山东各级地方官吏服从教堂的指示。许多教堂私建反革命武装，如山东武城十二里庄、禹城韩庄、平阴白云塔等处教堂均拥有快枪百余杆，其中有的甚至私藏大炮。这些教堂筑起城堡，自订法律，私设牢狱，包揽词讼，简直成了无法无天的“国中之国”。

第五，他们与地主恶霸勾结，称霸一方。外国传教士千方百计地招诱地主豪绅、地痞流氓入教，使之成为自己的爪牙。而这些家伙“一入教中，即成化外。官且无可奈何，乡党亲戚更无忌惮”。^①教民依靠外国传教士的包庇，“作奸犯科，无所不至。或乡愚被其讹诈，或孤弱受其欺凌，或强占人妻，或横侵人产，……或因公事而借端推诿，或因小忿而殴毙平民，种种妄为，几尽难述。”^②美国传教士爱利乌德供认：“中国人民中的恶霸分子，常常认为入教是对他们有利的。他们看到，每一个外国传教士，是一个有力的保护人，每一座外国教堂是一个得救的岩石”。^③

对于这些无恶不作的侵略者，中国人民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从外国传教士窜入中国之日开始，中国人民就奋起抵制、驱逐和惩罚他们，这就是反洋教斗争。但是，媚外成性的清政府，却死抱住“袒教抑民”的反动政策不放，袒护教士、教民，镇压被欺凌而奋起反抗的人民群众。一八九八年清政府甚至发布《地方官接待传教士章程》，规定中国官员和洋教士按照级别，“以礼相答”，限令民（人民群众）教（教民）争执事件，应和洋教士“和衷相办拟结”，如遇重大案件，须由洋教士“转请教皇委托保护天主教之国之公使或领事”，会同清政府办理。清政府的倒行逆施，更

① 《清季教案史料》第56页。

② 李东源：《传教论》。

③ 一八九六年《美国及加拿大海外传教会及社团的国际会议记录》第128页。

加助长了教士、教民的反动气焰。正如山东巡抚李秉衡所供认的，教士袒护教民欺压平民，早已造成民教“积不相能”，平民因此控案到官，可是教士“必为间说”，甚至“多方恫喝”，而地方官则“恐以开衅取戾，每多迁就了结”，这就造成“曲直未能胥得其平，平民饮恨吞声，教民愈志得意满”。这样，久而久之，“民气遏抑太甚，积不能忍，以为官府不足恃，惟私斗尚可泄其忿”，于是就“聚众寻衅，焚拆教堂”奋起反抗教会侵略，为此“虽至身罹法网，罪应骈诛，而不暇恤”。^①就是从这些对人民斗争充满偏见，对中外反动派极尽回护的文字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正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抗。而帝国主义越是在中国横行霸道，中国人民的反抗烈火就愈烧愈旺。

从一八六一年贵州人民揭起反洋教的义旗，到一九〇〇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反洋教斗争大小数百次，范围遍及全国各个角落，是这个时期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说来，这四十年间反洋教的斗争，可以中法战争为标志，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前期，斗争的规模比较小；斗争形式一般是暴动、拆毁教堂和殴打教士；斗争的主力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劳动人民；而一些地方官吏和有权势的士绅，由于外国教会和传教士霸占田产房宅，干涉地方行政，损害了他们的独占的统治权，并担心不拜天地、不敬祖宗的洋教的侵入，会引起“风俗人心”的大变，动摇封建统治秩序，因而主张驱逐外国教会侵略势力，曾经混迹于反洋教斗争的行列之中，但是，他们经不起一两个回合，便偃旗息鼓，仓惶退却了。

^①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6页。

前期，比较著名的反洋教斗争有：一八六一年贵州人民斗争，一八六四——一八六九年四川各地、尤其川东各属连年不断掀起的斗争，一八七〇年天津人民的斗争，一八七六年四川邻水、江北厅、涪州的斗争，一八七五——一八七九年福建延平、福州、建宁、福清的斗争。

在广泛的反洋教斗争的声浪中，一八七〇年爆发的天津人民反洋教斗争，是前期具有典型性的一次。这次斗争的直接导火线是教堂拐骗和虐杀中国幼童。天津天主堂的传教士和其它洋教士一样，对于“育婴”怀有浓厚的兴趣，目的是通过“育婴”，骗取群众对教堂的好感并获取实际利益。在教堂的引诱下，迷拐幼童送与教堂领取酬金成风。在育婴堂里，由于教士们的百般虐待，许多幼童病死或被折磨毒打而死。一八七〇年六月，育婴堂死去幼童数十名，同时不断发生幼童被迷拐事件，而拐犯的供词都牵连到望海楼教堂。这就激起天津人民的无比义愤。市民集会，“书院停课”^①，反教会侵略的揭帖贴遍全城的大街小巷。六月二十一日，成千上万群众从四面八方聚集到望海楼教堂门前举行抗议。法国领事丰大业蛮横无理，竟持枪威逼北洋三口通商大臣崇厚镇压群众，并向天津知县开枪，击伤随从。群众忍无可忍，立即将丰大业毆毙。随后，天津居民又鸣锣聚众，救出育婴堂幼儿，放火烧毁了望海楼教堂以及法国的“仁慈堂”、美国“布道堂”、英国“讲经堂”等多处，并打死为非作歹的洋教士等二十名，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火烧望海楼”。天津教案发生后，法、俄、英、美、德等七个帝国主义国家立即纠集在一起，向清政府提出无理抗议，各国军舰纷纷在天津海口和烟台一带进行武

^① 王文杰：《中国近代史上的教案》第76页。

力恫吓，逼令清政府镇压爱国群众的反抗斗争。清政府慌忙派大卖国贼曾国藩、李鸿章先后赶到天津“查办”。曾国藩、李鸿章等明知“曲在洋人”，但却抱定“弹压士民，以慰各国之意”^①的卖国方针，对爱国群众开庭严刑熬讯，横加罗织“罪状”。他们先后屠杀群众二十人，流放地方官二十五人，赔款给法国四十六万两，各国数万两，并派使节到法国道歉，竭力讨好外国侵略者。曾国藩、李鸿章在向清政府奏报中还无耻地说：“办理不为不重，不惟足对法国，亦堪遍告诸邦”。^②

面对外国侵略者的武力威胁和清政府的血腥屠杀，人民群众并没有被吓倒。二十名爱国群众就义前，当众痛骂帝国主义和卖国贼，并表示为了给被虐杀的幼童报仇，为了给天津人民除大害，他们拚命不怕死。广大群众目睹这英勇悲壮的斗争场面，莫不义愤填膺，同仇敌忾。二十位爱国群众牺牲以后，天津人民曾决定为他们举行盛大的公葬，并“立碑建祠，以资纪念”。北京人民要在西什库天主堂（北堂）前聚会抗议，声援天津人民的斗争。天津人民隆重追悼死难的烈士，还创作诗歌、快板书、木刻、泥塑和绘画，来纪念和赞颂这一次反帝斗争。在天津人民斗争的影响下，全国各地反教会侵略斗争同时并起。全国舆论纷纷谴责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大卖国贼曾国藩在国人皆曰可杀的唾骂声中可耻地死去。

中法战争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加紧，教会势力日益扩大，教堂、教士的罪恶活动更加猖狂。因此人民群众反洋教斗争的怒涛汹涌澎湃，斗争的规模越来越大；斗争的方式除一般的暴动、拆毁教堂和殴打教士外，出现了有组织、有纲领的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72，第31页。

② 同上书，卷77，第18页。

武装斗争；原来曾经在反教会侵略的洪流中浮沉的一些地方官吏和有权势的士绅大部已经退了出去，封建地主阶级中虽然有少部分人继续留在斗争的行列里，但他们的影响就更小了。所有这些，构成了这个时期反洋教斗争的特色。

九十年代初，在四川大足、长江中下游和热河朝阳三个地区，爆发了大规模反洋教的武装斗争风暴，影响遍及十几个省区。其中热河朝阳金丹道教起义，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一八九一年十一月，在长江中下游各省反洋教斗争的推动下，热河朝阳一带人民，在金丹道教的领导下，发动武装起义。金丹道教首领李国珍、杨悦春率众攻占朝阳。在理教首领郭万淳率众响应。起义之初，参加者只有数百人，几天内即发展到几千人，一月之间更发展到数万人。李国珍建号“扫北武圣人”，分设将帅，立三十六营，横扫朝阳、平泉、建昌、赤峰四州县，焚教堂、毁官署、劫监狱，所至大震。起义前后共惩办了作恶多端的传教士和教民八百余人，同时也惩办了一些清朝地方官吏和蒙古族反动王公。外国侵略者说起义群众“公开地以消灭外人，消灭传教士及推翻清朝政府为旗号”。^①清政府调直隶、热河、奉天三省军队前往“合剿”。起义者以劣等装备与清军苦战两个多月，凡大小数十仗，终因寡不敌众，被镇压了下去。郭万淳等壮烈牺牲，二万多起义群众遭到屠杀。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却推动了直隶、奉天、热河人民的反帝斗争，并在相当长的期间内，使清朝统治者惶恐不安，感到“隐患未已”。

中日甲午战后，面对着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人民群众反帝情绪空前高涨，反洋教斗争犹如野火燎原。一八九五年五

^① 《美国外交档案》一八九二年，第87—89页。

月，四川成都发生了大规模的反洋教斗争，由成都而嘉定、叙州、新津，群众闻风而起，打毁教堂七十多处。八月，福建古田的秘密结社——斋教，发动群众焚毁教堂，杀死外国传教士十余人。一八九六——一八九七年间，两湖、四川、两江、贵州、山东等省反洋教斗争风起云涌。一八九八年广西天地会和四川大足县农民发动武装起义。广西天地会起义军，宣称“起事之故，因西人过横，中国脂膏都被吸尽，立誓驱尽洋人，以保卫华民。”^①四川大足起义群众在檄文中历数外国侵略者的罪行，号召驱逐外国侵略者，“剪国仇”，“除民害”，“敌彼凶残，同泄呼天之痛”。^②他们在四川“闹教三十余州县，焚毁教堂医馆二十余处”。^③

一九〇〇年的义和团运动，既是中日甲午战争后革命形势的总爆发，又是长期以来波及全国的群众反洋教斗争的最高峰，它超越了反对帝国主义教会侵略的范围，形成了波澜壮阔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运动。

二、广大群众的反帝爱国组织

义和团，又名义和拳，原是农民反封建的革命组织。它是民间流行的操演拳术的结社和信奉白莲教的群众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其特点是“以练习拳棒为由”^④，组织群众，武装群众，进行反清斗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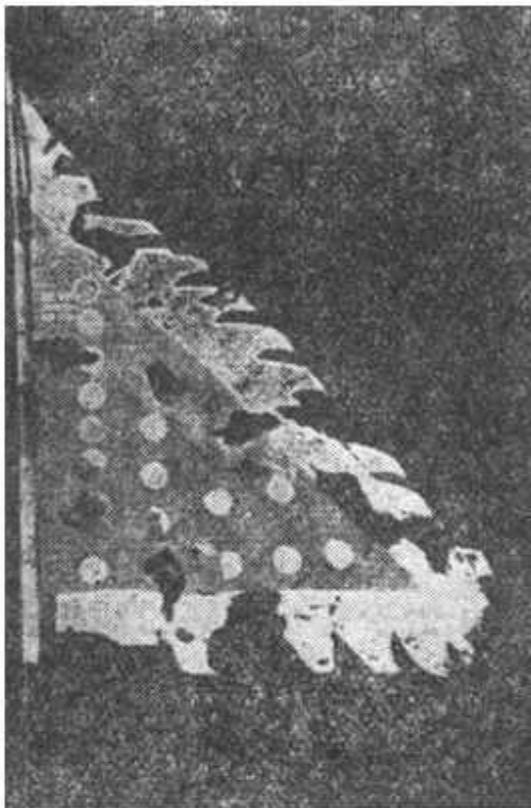
义和团的主力是农民。据当时地主分子记载，义和团民“俱

① 《昌言报》第4册，第2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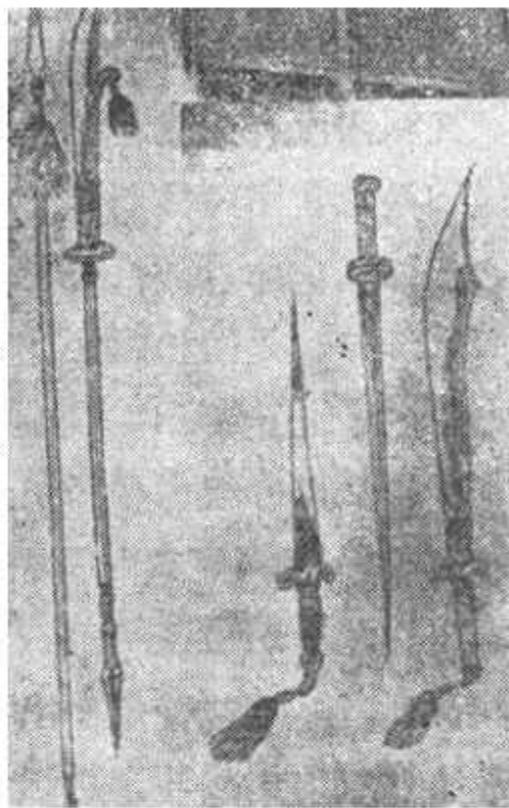
② 《余栋臣告示》，《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第364页。

③ 《德宗实录》卷457。

④ 劳乃宣：《义和拳教门源流考》，《义和团》第4册，第438页。



义和团的三角旗



义和团的武器

是乡间业农粗笨之人”^①，“皆农家者流”^②；“平时受人欺压，无可伸理，一闻‘匪’说，冀借神道以凌人，以泄积愤，乃相率弃其农业纷纷入城，甘为‘匪’类”。^③正是这些“乡间业农粗笨之人”，担负了反抗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挽救民族危机这一重任，充当了时代的主角，做出了震动世界、永垂千古的丰功伟绩。义和团除农民是基本群众之外，还有破产的小手工业者、运输工人和小商贩等，即所谓“穷民，失车船店脚之利，而受铁路之害者”^④和“肩挑负贩者流”。^⑤参加义和团的有男子，也有妇女。有的地方青少年妇女组织了“红灯照”，中年妇女组织了“蓝灯照”。“女的红灯

① 仲芳氏：《庚子记事》第12页。

②⑤ 唐晏：《庚子西行记事》，《义和团》第3册，第486、471页。

③ 佐原笃介：《拳匪纪事》。

④ 袁昶：《乱中日记残稿》，《义和团》第1册，第347页。

照，男的义和拳，赶也赶不散，捉也捉不完。”^①他（她）们敢于蔑视貌似强大的敌人，表现了英勇顽强的斗志和宁死不屈的精神。

义和团没有建立起统一的组织和统一的领导机构，它的基层组织是坛，团民分别属于各个坛口，并围绕坛口进行各种活动。坛口是求体、排刀、过枪、操练比武的场所，因而又称坛场或拳厂。坛口也是义和团法庭和各支首领“拜坛”之所在。有的地区，几个或十几个坛口之上，还设有总坛口，总坛口有调动或指挥其所属坛口的权力和保护这些坛口的义务。各总坛口之间，没有统属关系。而当斗争需要联合行动时，可以散发帖子邀请，由有声望的大坛口统一组织指挥战斗。由于有着共同的斗争目标，所以能够做到“传单一出，千人立聚”^②，虽远至百里之外，也能迅速前来参加战斗。总坛口的负责人是老师，一切军政事务，出战领队，授以神法，皆由老师总理。坛的首领有大师兄、二师兄等名目，大师兄为正，二师兄为副，大师兄不在由二师兄代管坛内各种事情。

义和团有严格的纪律。“立坛之始，有愿投坛者须有切实保人，且须向坛跪香立誓，有不愿者亦不强”。^③从首领到普通团民，都必须遵守戒条：“不爱财，不爱色，不拿老百姓财物，也不强迫老百姓送东西”，对群众“秋毫无犯”^④，而且“路遇不平，不惜躯命代为伸理”^⑤；要“除国之大害”^⑥，“不准公报私仇，以富压贫，依强凌弱，以是为非”^⑦；缴获胜利品一律归公，不准私自处

① 刘崇丰：《义和团歌谣》第36页。

② 劳乃宣：《拳案杂存》，《义和团》第4册，第466页。

③ 佚名：《天津一月记》，《义和团》第2册，第156页。

④ 南开大学历史系：《天津义和团运动调查报告》（油印本）。

⑤ 劳乃宣：《拳案杂存》，《义和团》第4册，第470页。

⑥ 刘以桐：《民教相仇都门闻见录》，《义和团》第2册，第188页。

⑦ 包士杰：《杂录》，《义和团》第4册，第148页。

理；作战要勇敢机智，严格服从命令。这种严明的纪律对义和团的胜利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义和团的宗旨原是“反清复明”，它反映了以农民为主体的劳动人民要求摆脱清朝封建统治的强烈愿望。甲午战争后，随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深入，在瓜分大祸迫在眉睫、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形势下，义和团表现了中国人民崇高的爱国主义品德，将矛头直指帝国主义侵略者，以“杀洋灭教”作为斗争的中心任务，成为团结群众进行反帝斗争的组织形式。御史刘家模说：

“方今天下强邻虎视，中土已成积弱之形，人心愤激久矣。每言及中东一役（按：指中日甲午战争），愚父老莫不怆然泣下。是以拳民倡议，先得人和，争为投钱输粟。……所至之处，人多赢粮景从。父兄莫可拴束，妻子不能阻挽，独悻悻以杀敌致果为心。”^①

中外反动派认为义和团“其用以感人者，谓能避枪炮”，“其借以动人者，谓图灭洋教”^②；义和团“传授邪术，煽惑愚民”，“意图耸众，杀洋灭教”。^③他们惊呼：义和团“一倡百和，从者如归”，“强年壮丁，举信从之”，广大群众“趋之若鹜”，“蜂起应之”，“愈聚愈众，声势甚张”。这说明，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激起了义和团的反抗；义和团的“杀洋灭教”斗争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和积极支持。

义和团的“杀洋灭教”斗争，从内容方面看，已经突破反洋教的圈子，而把锋芒指向帝国主义，指向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方面的侵略活动。

义和团英雄们，通过传统形式的歌谣、揭帖和乱语等，号召

① 《御史刘家模折》，《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77—178页。

② 袁世凯：《筹议官练私团事不可行据实复陈折》，《山东近代史资料选集》第69—70页。

③ 《樊国梁致某函》，《近代史资料》一九六三年第3期，第24页。

人民群众拿起武器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

“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①

“通商门开引洋人，洋人比那虎狼狠；吃人肉来吸人血，骨瘦如柴老百姓。”^②

“只因四十余年内，中国洋人到处行。三月之中都杀尽，中原不准有洋人，余者逐回外国去，免被割据逞奇能。”^③

“拆铁道，拔线杆，紧急毁坏火轮船，大法国，心胆寒，英美德俄尽消然。”^④

“最恨和约误国殃民，上行下效，民冤不伸。”^⑤

“好男儿要灭洋，好女儿要保国，灭了洋，保了国，我们才能活。”^⑥

“还我江山还我权，刀山火海爷敢钻，哪怕皇上服了外，不杀洋人誓不完。”^⑦

“一片苦海望无津，小神忙乱走风尘，八千十万神兵起，扫灭洋人世界新。”^⑧

在这里，义和团鲜明生动地揭示了他们所以要“扫灭洋人”，只是因为这些披着人皮的豺狼，伸着贪婪的魔爪，张着吃人的血口，疯狂地闯进了中原，抢夺中国的东西，抢占中国的地方，一心要把中国吞噬掉。“犹如虎狼狠”的“洋人”，由于“吃人肉来吸人血”，脑满肠肥。而中国的老百姓，却在“洋人”的蹂躏下，“骨瘦如柴”，挣扎在死亡线上。面对着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深重的民族灾难，他们挺身而出，高举反帝爱国的革命大旗；号召“男的

①②⑥⑦ 刘崇丰：《义和团歌谣》第28、3、71、45页。

③⑤ 佐原笃介：《拳乱纪闻》，《义和团》第1册，第120、112页。

④ 庚子拜蜂录：《义和团乱语》，《近代史资料》一九五七年第1期，第18页。

⑧ 王火：《义和团杂记》，《近代史资料》一九五七年第1期，第10页。

拿起刀，女的拿起枪”，为了争取祖国的独立，人民的幸福，实现“扫灭洋人世界新”的理想，积极投入“灭洋”、“保国”的战斗。

义和团不仅主张用武器的批判去“扫灭洋人”在中国的政治经济侵略势力，而且要肃清“洋人”在中国的文化侵略势力，用批判的武器去反对基督教的神学思想，凭借枪杆子去镇压和驱逐那些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洋教士。

“洋毛子，大坏蛋，明着来传教，暗地把人骗。”^①

“给你几块钱，叫你奉洋教；上了这圈套，早晚把命要。”^②

“大祸临头，尤有甚者。兹有洋寇，挟来邪说，欺世惑众，致使愚民为天主教、耶稣堂等邪教所惑。”^③

因此，义和团英雄们庄严宣告：他们“练习义和神拳”，目的是为了“保护中原，驱逐洋寇，截杀教民，以免生灵涂炭。”^④

综上所述，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要求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铲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这是完全正当的，是中国人民摆脱帝国主义压迫，争取民族独立所绝对必要的。但是，由于义和团是农民自发的反帝组织，农民当时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小生产者的地位，决定了他们对帝国主义的认识还处于“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他们的反帝斗争表现为“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⑤

义和团把“杀洋灭教”的任务提到首位，反映了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客观现实。民族矛盾的发展，在政治比重上，降低了国内农民和地主之间阶级矛盾的地

①② 刘崇丰：《义和团歌谣》第5、10页。

③ 《告白》，原载日本《邮报》，转译自《中国与联军》。

④ 包士杰：《杂录》，《义和团》第4册，第149页。

⑤ 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265、266页。

位，使之变为次要和服从的东西。但是国内农民和地主之间的阶级矛盾本身依然存在着，并没有减少或消灭。因此，义和团在反帝的同时，从来也没有放弃反封建斗争。不过，正因为民族矛盾已经发展成为主要矛盾，所以义和团的反封建斗争，基本上是从属于反帝斗争的。

义和团揭露了清朝封建统治的罪恶，把矛头直指清朝皇帝。

“清朝皇帝真稀松，慈禧太后太无用，见了鬼子身打抖，见了百姓抖威风。”^①

“清朝太无能，洋人当祖宗；多少财宝送了情，卖国人儿高官升。”^②

“百余年来，赃官见信于朝廷，官府为卖官鬻爵者开，官职随银价而定，惟巨富获高位于官府。……高官巨富，皇帝垂涎，大小官吏，辗转盘剥，衙门败坏，不堪言状，民食劫掠殆尽，庶民陷于水火。行会商场之中，钱能通神。贿赂官吏，比比皆是。苛捐杂税，名目繁多。贪官污吏，诡计多端，……敲诈勒索之外，别无他事。讼案多如牛毛，衙门绝少公断。无钱贿赂，势必败诉，草芥子民，何处伸冤。黎民百姓横遭杀戮，狼烟遍地，生灵涂炭，哭声直达天听。”^③

“罪魁乃当今皇帝，断子绝孙，后嗣无人。满朝文武，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置寡妇孤儿哭声于不顾，绝无忏悔从善之心。”^④

因此，义和团英雄们主张打倒清朝皇帝和贪官污吏，推翻清朝封建统治。

他们要求杀掉“一龙二虎三百羊”。一龙指载湉，二虎指庆王奕劻和李鸿章，三百羊指京官。他们说“京官可勿杀者只十八

^{①②} 刘崇丰：《义和团歌谣》第13、14页。

^{③④} 《告白》，原载日本《邮报》，转译自《中国与联军》。

人，余皆可杀。”^①他们宣传“上帝降神兵，扶保真君主，挪位让真龙”。^②“西北有真主，不久临世抚育海内苍生，……先行龔定中原，后复大战洋人，杀得尸骨堆山。”^③这就是说，义和团的“真主”已经出现，不久将打倒清朝和剿灭洋人，“杀尽鬼，斩尽妖，大家齐吹太平箫”。^④

他们不仅反对皇帝和赃官，而且打击皇帝和赃官的阶级基础地主老财。据反动官吏记载，义和团“以均粮为名，希图劫掠”。^⑤“粮赋差徭一概抗停，凡事不容地方官作主。”^⑥“凡有所需，莫不责供于富户”。^⑦

总之，在义和团英雄们看来，“大清亡，中国强”^⑧，只有推翻清朝封建统治，才能使国家走上富强的道路。

在义和团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洪流中，有些义和团组织打出了“扶清灭洋”旗号。这类旗号最早出现于甲午战后反洋教斗争中。

一八九八年春，四川大足反洋教起义，余栋臣宣称“但诛洋人，非叛国家”^⑨，旗号是“顺清灭洋”。^⑩

一八九八年夏，湖北覃培章反洋教起义，旗号是“保清灭洋”。^⑪

① 佐原笃介：《拳事杂记》，《义和团》第1册，第261页。

②③ 孙敬：《义和团揭帖》，《近代史资料》一九五七年第1期，第17、18页。

④ 义和团歌谣，南开大学历史系七一级义和团调查队搜集。

⑤⑥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72、585页。

⑦ 祝蒂：《庚子教案函牍》，《义和团》第4册，第378页。

⑧ 胡思敬：《驴背集》，《义和团》第2册，第516页。

⑨ 徐庆坚：《余栋臣与四川农民反帝运动》，《近代史资料》一九五五年第4期，第30页。

⑩ 《四川大学学报》一九五六年第1期，第115页。

⑪ 《格致益闻汇报》第44号，第1册，第350页。

一八九八年秋，山东义和拳首领赵三多发动反洋教起义，旗号是“助清灭洋”或“扶清灭洋”。^①

义和团兴起后，“扶清灭洋”口号就更加流传开来。这种情形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

首先，当时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空前激化，人民反帝斗争迅速高涨。有些地主士绅既不满于帝国主义侵犯其独占统治权力，反对“以夷变夏”；又害怕站在人民反帝斗争的对立面而受到群众运动的冲击，于是产生了附和并控制它，使之限制在自己所容许的范围的企图。反动官僚劳乃宣说：“莠民之狡者从之，良民之愚者亦从之，各处拳党、尽有衣冠之族、殷实之家杂乎其中，非尽无业游手也。”^②这些参加义和团的地主士绅，希望利用义和团来抵制洋教的侵扰和进行排外活动，但义和团的“灭洋”斗争虽然为他们所乐于利用，而义和团的反清斗争却为他们所畏惧。篡夺领导权、煽动排外、扭转反清方向自然就成为他们活动的主要内容。他们是某些义和团提出“扶清灭洋”口号的阶级基础。

其次，面对着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和人民的反帝怒涛，清朝统治者在一个短时间内，对义和团采取了欺骗、软化的政策。一八九八年六月山东巡抚张汝梅在武力镇压失败后，建议清政府“化私会为公举，改拳勇为民团”，“将拳民列诸乡团之内，听其自卫身家，守望相助”。^③同年清政府“谕令各省劝办团练”^④，“于是办团令下，便树旗曰‘义合团’，或又曰‘义和团’，有‘奉旨

① 山东大学历史系：《山东义和团调查报告》第44、50页。

② 劳乃宣：《拳案杂存》，《义和团》第4册，第452页。

③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5、16页。

④ 杨典诰：《庚子大事记》，《庚子记事》第79页。

团练’之旗，……有‘助清灭洋’之旗”。^①这表明某些义和团提出“扶清灭洋”口号，直接同清朝统治者策略上的改变有关。清朝统治者的欺骗软化政策是一种十分狡猾的政策，它既使混进义和团的地主士绅乘机打起“扶清灭洋”旗号，谋取合法地位，妄图把义和团引上邪路；又使义和团一部分成员受了蒙蔽，对清朝统治者产生了一些错误认识，以为清朝统治者在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有可能赞助人民群众的反帝斗争，因而接受了地主士绅提出的“扶清灭洋”口号。这反映了一部分农民对当时错综复杂的阶级矛盾认识不清，还没有看出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

某些义和团的农民群众虽然接受了“扶清灭洋”的口号，但他们是以“灭洋”为主要目标，同意“扶清”并不意味着拥护清朝封建统治。他们对“扶清灭洋”的理解是：“男练义和团，女练红灯照，砍倒电线杆，扒了火车道，烧了毛子楼，灭了耶稣教，杀了东洋鬼，再跟大清闹。”^②这种主张显然是和地主士绅妄图湮没义和团反封建性质根本不同的。他们“扶清”只是暂时性的，只是为了减少国内反动势力的阻挠，以便集中全力进行“灭洋”斗争。正因为这样，他们在组织和行动上，始终保持独立地位，不受清朝统辖。如二品顶戴纳继成击杀团民破坏抗战，被团民捉住准备严惩，载漪出面求情，团民义正词严地说：“王所遵者皇上，我们遵者玉帝。”载漪“无可奈何，任其杀之”。^③

尽管这样，历史事实仍然证明，“扶清”和“灭洋”本质上是互相排斥的，把两者联结起来，被害的是义和团，受益的是清朝统

① 袁昶：《乱中日记残稿》，《义和团》第1册，第345页。

② 义和团揭帖，见一九五九年天津历史博物馆中国近代革命史展览会。

③ 刘以桐：《民教相仇都门闻见录》，《义和团》第2册，第193页。

治者。

对于“扶清灭洋”口号，洋务派反对，他们认为“‘助清’者适为清忧，‘灭洋’者益增洋衅”。^①顽固派则表示“赞助”，他们企图控制、利用义和团，“扶保大清不坏”。

“扶清灭洋”口号，麻痹着群众对清王朝的警惕，消磨着群众反封建的思想，便利了清朝统治者破坏和出卖义和团。

三、席卷全国的农民反帝大风暴

“义和团，起山东，不到三月遍地红。孩童个个拿起刀，保国逞英雄。”^②甲午战后，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山东首当其冲，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因此，义和团反帝风暴首先从山东兴起。义和团英雄们，广泛采取武装斗争形式，举起了拯救祖国危亡的正义战争的旗帜。

义和团先是在农村进行着分散的活动。他们“杀洋灭教”，“聚众抗官”。平日备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欺压的劳苦大众，“群相信从”。在平全县共有八百六十余庄，习拳者多达八百余庄。屈从于帝国主义的清政府，害怕农民革命洪流会冲垮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诬蔑义和团为“邪教”、“会匪”，竭力施展“剿抚并用”的反革命两手策略，妄图消灭义和团。一八九九年三月，清政府改派署江宁将军毓贤接替张汝梅为山东巡抚。毓贤曾任山东曹州知府，因疯狂屠杀人民而博得那拉氏的赏识。这时清政府起用他为山东巡抚，显然是要他镇压义和团。毓贤到任后，接连八次出示严禁设厂练拳，并不断派兵“围剿”义和

① 《端中丞劝戒秦民告示》，《庚子国变记》第231页。

② 刘崇丰：《义和团歌谣》第25页。

团。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一切反动派的企图是想用屠杀的办法消灭革命，他们以为杀人越多革命就会越小。但是和这种反动的主观愿望相反，事实是反动派杀人越多，革命的力量就越大。”^①毓贤见武力镇压无效，就改“剿”为“抚”，承认义和团为民间团练，允许义和团在“扶清”的前提下公开活动，阴谋变义和团为封建统治者的工具。但是，多数义和团的基本群众，并没有受骗上当，义和团的革命烈火，不但没有被扑灭，反而越烧越旺了。

朱红灯、心诚和尚率领的一支义和团，是山东义和团队伍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

朱红灯“籍隶泗水，家无亲属，只身游荡”^②，一八九八年来到长清，以行医为业。“他见民心激昂，便号召大李庄农民学拳，在该庄安下了一个很大的厂子”。^③

心诚（一说本明）和尚^④，山东高唐人，自幼在禹城丁家寺为僧，对于拳技刀枪无不精熟，和朱红灯一起组织义和团。

朱红灯、心诚和尚率领义和团活动于茌平、高唐、长清一带。这些地方贫苦不堪，到处布满了干柴，朱红灯等举起“杀洋灭教”的火把，很快就燃成了燎原烈火。一八九九年秋，平原县李庄教

①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上的讲话》，《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第6页。

② 《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一日，济南府禀》，《拳匪朱红灯滋事卷》。另《季桂芬致泰安知府姚松云函》（《山东近代史资料选集》第57页）说朱红灯，原名朱占鳌，茌平县富户。蒋楷《平原拳匪纪略》（《山东近代史资料选集》第81页）说朱红灯，或曰茌平人，或曰长清之李家庄人。

③ 山东大学历史系：《山东义和团调查报告》第108页。

④ 《季桂芬致泰安知府姚松云函》（《山东近代史资料选集》第57页）说心诚是法号，原名周震甲，西寺僧人。另《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七日历城县禀》说，本明和尚，原名杨照顾，又名杨顺添，山东高唐人，自幼在禹城丁家寺为僧。毓贤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初四日和二十四日两折，说心诚、本明都有，但从文意看，心诚较可信，本明似乎是后加的。

民无故欺凌平民，激起拳民反抗。教民竟以“抢案”报官，平原知县蒋楷“袒教抑民”，捕拳民六人下狱。群情愤恨，派人邀请朱红灯前来救援。朱红灯随即率领在平、高唐、长清等县的义和团，赶到平原准备迎击敌人。蒋楷闻讯之下，率步骑一百余人，前来镇压。朱红灯列队应战。义和团每四人组成一个战斗组，采取“轮伏轮起，轮进轮退”的灵活机动战术，英勇顽强地战斗，结果把蒋楷打得大败而逃。义和团声威大振。蒋楷吃了败仗，恼羞成怒，竟勾结教会诬告义和团“谋变”，请求毓贤派兵镇压。毓贤先后派济南知府卢昌诒、管带亲军营官袁世敦（袁世凯兄弟）率大队步骑赶到平原。朱红灯主动将队伍撤至离城十余里的森罗殿，待清兵到后，就以数倍于敌的兵力攻击之。朱红灯身先士卒，团众个个奋勇作战，犹如猛虎下山，一阵冲锋就把敌人打垮了。有一个清兵说：义和团“真厉害，打他一个跟斗，爬起来再战，打一个跟斗，爬起来再追”。^①蒋楷也说：“‘匪’党力拒，……有中数枪弹始仆者”。^②森罗殿一战，义和团以冲天的勇敢精神，以粗劣的装备，给了用新式枪炮装备起来的敌人以沉重打击，后因敌我力量悬殊，主动撤出战斗。因为清军打了败仗，清政府传旨申斥毓贤，蒋楷被革职，永不叙用，袁世敦也被一并革职。平原战斗以后，朱红灯、心诚和尚率部转战禹城、长清、在平、博平等地，到处打击教会侵略势力和不断挫败清军的围剿。但是，到一八九九年底，朱红灯、心诚和尚等领导人不幸被捕，并在毓贤卸任前两天遭到杀害。此后，这支义和团队伍，在王立言等人的率领下，继续英勇战斗。

帝国主义者总是低估中国人民的反抗力量。当义和团刚从

^① 山东大学历史系：《山东义和团调查报告》第102页。

^② 蒋楷：《平原拳匪纪事》，《山东近代史资料选集》第86页。

山东兴起的时候，他们有的说义和团只是“一缕之微云”，有的“不过视为一隅之变，微末之事”^①，有的则“相信，只要下几天大雨，消灭了激起乡村不安的长久的旱象”，就可以“恢复平靖”。^②这当然是帝国主义老爷的逻辑，他们播下了仇恨的种子，却不准备尝尝复仇的果子。但是，当帝国主义者一旦看清了义和团反帝的本来面目，它们就象野兽看到了猎获物那样猛扑过来，恨不得一口就把义和团吃下去。在这方面沙俄公使格尔思的叫嚣，可算是一个标本。格尔思说：“我劝告总理衙门不要失去时机，在义和拳还没有强固和还没有在集于北京周围的大队士兵中获得信徒时，有力地将他们镇压下去”。^③各国公使也都异口同声、接二连三地要清政府镇压义和团。尽管毓贤在山东疯狂屠杀义和团，而且厚颜无耻地说：“上月击毙‘匪’徒多名，谅美领事无不知也。保护之力，可谓尽矣”。^④“贤迭派队勇，业将‘匪’首拿获，办理教案，似亦可对外人”。^⑤然而，帝国主义者对毓贤仍然不满意。美国驻华公使康格公然胁迫清政府撤换毓贤，改派袁世凯做山东巡抚。在康格的背后，站着贪得无厌的美国资产阶级。义和团运动的爆发，使美国资产阶级人士“大为震惊”，美国报刊连篇累牍报道“有关中国的消息和文章，数量之多，前所未见”，要求派“讨伐军”给义和团以“惩罚示众”的呼声甚嚣尘上。“铁

① 朴笛南姆·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义和团》第2册，第206—207页。

② 《实纳乐致英国外交大臣信》（一九〇〇年五月二十一日），《近代史资料》一九五四年第2期，第9页。

③ 《驻北京公使急件》一九〇〇年四月五日（十八日），《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215页。

④ 《东抚（毓贤）电》（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初六日到），《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2辑，第51页。

⑤ 《东抚（毓贤）电》（光绪二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到），《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2辑，第52页。

路商人、轮船主以及把中国市场看作宝贝的整个工商界”怀着对义和团的强烈恐惧和仇恨，“均对当局施加巨大压力”，“都在提醒美国政府必须采取坚决行动”。^①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五日，康格在致总理衙门的照会中说：“我再叙述昨天晚间会上我所说的话，就是假若这位巡抚（指毓贤）不能控制暴徒（指义和团）及保护这些人（指侵略者传教士），他必定要撤职，并且要派一位能做的代替他的职位，假若他没有充足的武力来做的话，可以从天津把操练很好的军队调来协助他”。^②这个“能做的”人指的便是袁世凯。清政府立即遵命照办。正如美国驻天津领事所说的：“我们的北京公使馆……要求撤换山东巡抚毓贤。对于这些要求的答复是：毓贤终于撤换了”，“袁世凯被任命为山东巡抚”。^③帝国主义者把镇压义和团、保持在华殖民特权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的身上。他们有的说：“从他（按：指袁世凯）的一般名望看来，外国人是预料并希望能有好的结果的”。^④有的说：“其时山东巡抚为袁世凯，乃一有魄力之人，稍知兵学，其部下有精兵一万，故吾人恃以无恐”。^⑤袁世凯不仅掌握着一支反革命的近代化武装——新建陆军，而且善于秉承洋主子的意旨行事。早在一八九九年七月四日，他就向清政府密陈山东问题，提出了“慎选守令”、“讲求约章”、“分驻巡兵”、“遴员驻胶”等一套主张。他假惺惺地说什么这些“固非统兵如臣者所应言”^⑥，事实是适应洋主

① 福森科：《瓜分中国的斗争和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中译本），第169—170页。

② 《美国对外关系》，转引自《义和团运动史论丛》，第1页。

③④ 《天津美国领事芮格斯戴致美国第一助理国务卿席尔报告》，《十九世纪美国侵华档案史料选辑》上册，第233页。

⑤ 朴笛南姆·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义和团》第2册，第204页。

⑥ 《总统武卫右军袁世凯折》，《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29页。

子的需要而向清政府毛遂自荐。果然，过了四个月，在外国主子的保举下，清政府就派他带兵到山东“就近防范”^①，接着就任命他署理山东巡抚。一八九九年十二月，袁世凯走马上任后，依恃他手中的反革命武装，死心塌地奉行“护洋人而剿拳‘匪’”^②的反革命政策。这时恰巧肥城发生了英国教士卜克斯被杀案。袁世凯就把它看做捞取媚外资本的好时机，别有用心地扩大案情，以重刑惩办乃至屠杀无辜人民，给教堂大量赔款，并建立“纪念碑”，借以讨好侵略者。袁世凯还精心炮制《严禁拳匪暂行章程》八条，重刑督促官绅吏役保甲查拿拳民，提倡告密，提被告人家产一部或全部充偿，凡有练拳或赞助设立拳厂者杀无赦。他并“与诸军约云，如‘匪’至即放炮，必不汝咎，若‘匪’至不痛击，则将领以下概正法”。^③袁世凯疯狂屠杀义和团，用革命者的头颅去换取洋主子的欢心。义和团领袖王立言等数十人和许许多多义和团战士都惨遭毒手。袁世凯在山东屠杀还不算，一直杀到直隶境内。仅东光一县，方圆十里地方，棵棵树上都挂满被害者的头颅。

袁世凯的大屠杀，固然使义和团付出了极大的牺牲。但是，同一切反动派一样，袁世凯也是色厉内荏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看得强大无比的七千“新建陆军”，在义和团的反抗洪流中，却显得渺小不堪。袁世凯又赶忙奏准扩充马步炮队二十营，把兵力增加到两万多人；同时勾结在青岛的德军和各地教堂武装，来加强对义和团的进攻。但是，人民却永远不会屈服。山东人民不但对袁世凯的禁令“抗不遵谕”，而且对袁世凯“皆有欲杀之

① 《军机处寄工部右侍郎袁世凯等上谕》，《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7页。

② 吴永：《庚子西狩丛谈》，《义和团》第3册，第375页。

③ 佐原笃介：《拳事杂记》，《义和团》第1册，第254页。

势”。他们愤怒地喊出了“杀了袁鼃蛋，我们好吃饭”的呼声，并“在抚署照墙画红顶花翎之大龟，伏于洋人臀后”，以表示人民对这条死心塌地的帝国主义走狗的痛恨！这个凶横的刽子手非常畏惧义和团的惩罚，“防范甚严，有于卧室外密护铁网之说”。^①

经过袁世凯的血腥屠杀，山东义和团遭到重大损失。有的留在山东继续坚持战斗，有的转战到直隶等临近地方。

直隶南部大名府一带的义和团斗争，与山东差不多同时高涨。早在一八九八年，山东巡抚张汝梅就说过：“直隶、山东交界之区，拳民年多一年”。^②一八九九年十月，直隶景州知州说：“卑州……拳党众多，一呼百诺，动辄集众千百，汹汹而来。无论欲拿不得，且实拿不胜拿，倘或冒昧从事，彼谓官长袒护教民，激成众怒，必至不可收拾。即使立刻请兵，亦属缓不济急。州县限于权力，故不得不暂顾目前，以无事为福”。^③这一席话，活画出了这些地方小官吏的矛盾惶恐心理。

山东义和团进入直隶后，与当地义和团汇合，使运动的声势更加壮大。直隶全境，南自大名，北至张家口、古北口，东自天津、静海，西到正定，义和团迅速发展起来。反动人物记载说：“京畿东南各属，一倡百和，从者如归。城市乡镇，遍设神坛”^④，“入其教者当不下万千之众，消息灵通，一呼立应，志不在小可知”。^⑤直隶总督裕禄等反动官吏和将领，遵从清政府的旨意，残酷地镇压义和团。提督梅东益在沧州纵兵攻杀义和团“三千余

① 佐原笃介：《拳事杂记》，《义和团》第1册，第254页。

② 《山东巡抚张汝梅折》，《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5页。

③ 转引自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第344页。

④ 胡思敬：《驴背集》，《义和团》第2册，第485页。

⑤ 劳乃宣：《拳案杂存》，《义和团》第4册，第467页。

人，河水尽赤”。^①自称一提起孔孟之道“未尝不三复而流涕”的“爪牙之士”^②的统领杨慕时，叫嚷对义和团“是决不可以仁义动也”^③，“外人以为杀百性，慕时以为杀‘匪’，即令非‘匪’，而与‘匪’相杂而烧铁道，则亦‘匪’也”，所以要“遇‘匪’即杀，不复迟疑”。^④裕禄等人对义和团的镇压，博得了帝国主义者的叫好。北直隶和北京天主堂主教樊国梁在给荣禄的信中说：“昨展惠复，具知各地方官业已张贴上宪告示，严拏拳‘匪’，封禁拳厂，本主教无任欣慰”。^⑤

反动派的严厉查禁，株连滥杀，既给义和团以严重的摧残，更激起了义和团的英勇反抗。运河两岸、芦保铁路沿线许多教堂悉付一炬。涑水县高洛村天主教势力嚣张，反动教民勾结官府欺压群众，群众组织义和团奋起反抗。定兴、涿州、新城、易县



义和团刀劈杨福同

① 李希圣：《庚子国变记》，《义和团》第1册，第19页。

②③④ 杨慕时：《庚子剿匪电文录》，《义和团》第4册，第333、339、338页。

⑤ 《樊国梁致荣禄函》，《近代史资料》一九六三年第3期，第25页。



义和团拆毁铁路

等地义和团，纷纷应邀前来支援。天主堂一面建立反动武装进行抗拒，一面勾结县令派兵镇压义和团。樊国梁写信给裕禄，要裕禄“严饬文武员弁，务将‘匪’徒凶犯认真拿获，不分首从，尽法惩办，以儆其余”。^①裕禄遵命派营官杨福同等率队前往镇压。义和团在石亭地方，以二、三千人的绝对优势兵力伏击敌人，一举歼灭杨福同所部七十余人。接着，义和团以二、三万之众，占领了涿州县城。为了阻止清政府调兵，义和团开始破坏京津、芦保铁路，高碑店、涿州、琉璃河、长辛店、丰台等火车站，连同那拉氏、载湉的“龙车”都被义和团焚毁。

天津是北京的门户。据调查，独流、南仓、葛沽等地，至迟从一八九九年春到一九〇〇年初，就开始组织义和团，准备“杀洋人，灭洋教”。^②一九〇〇年三月，天津城厢内外，已有义和团的揭帖，号召“先练义和拳，后练红灯照，杀了洋鬼子，灭了天主

^① 《樊国梁致裕禄函》，《近代史资料》一九六三年第3期，第22页。

^② 南开大学历史系：《天津义和团运动调查报告》（油印本）第14页。

教”^①，预言：“鬼子逃，洋奴斂，五谷丰登太平年”。^②四月，就“时有幼童演练义和拳，又有幼女演红灯照”。^③五月，天津已是“神坛林立，业冶铁者，家家铸刀，丁丁之声，日夜相续”。县官出示禁止冶铁，拳民“纷集县署，露刃逼官弛禁，不得已从之，冶炉遍衢巷矣”。^④义和团打开天津监狱，放出被捕的群众和义和团战士。义和团还砸开海关道署的军械库，用新式的武器装备自己。六月，裕禄被迫“以敌体礼”迎“静（海）津一带义和团首领”张德成、曹福田进入天津。张德成、曹福田、林黑儿（黄莲圣母）等人领导的义和团和红灯照，是天津几支最有战斗力最有影响的义和团队伍。

张德成，直隶新城县人，自幼当船夫，常往来于独流、杨柳青、胜芳、王家口、天津等地。一八九九年，他在家乡组织义和团，被推为领袖。一九〇〇年，他到独流建立“天下第一团”，六月进入天津城后，设坛于北门里小宜门。

曹福田，静海县人，出身贫苦，曾当过兵。一九〇〇年，他先在静海、盐山一带组织义和团。六月进入天津城后，设坛于吕祖堂。

林黑儿，船户出身，是船民李有的儿媳。李有因受洋人迫害入狱，民族仇、阶级恨使她决心赶走外国侵略者。一九〇〇年，她在杨柳青等地建过坛，后在张德成建议下，进入天津，组织红灯照，设坛于侯家后南运河船上。

天津全城参加义和团的群众多达五万人。他们声言“大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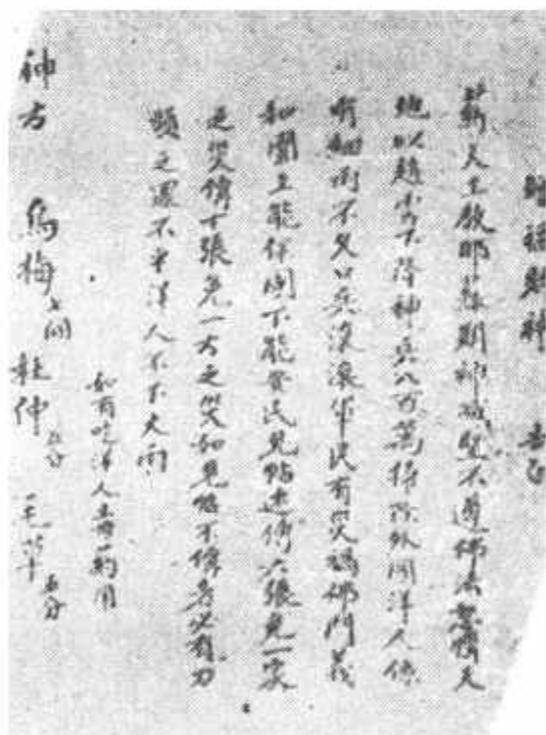
①② 南开大学历史系一九五六级历史班：《义和团在天津的反帝斗争》，《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第131页。

③ 佐原笃介：《拳乱纪闻》，《义和团》第1册，第109页。

④ 罗惇胤：《拳变余闻》，《庚子国变记》第26—27页。

兄，砍洋头；二师姐，杀官兽；杀尽洋和官，百姓有盼头”。^①义和团“最恶洋货”，有些洋行被焚毁，有的洋货受到禁止。对于帝国主义的桥头堡——洋教堂，普遍发起了进攻，又一次火烧望海楼。义和团还经常全副武装，高呼着“灭洋人”的口号，进行“踩街”。遇上坐轿、骑马的官吏，义和团则喝令他们下马、下轿，脱帽旁立。直隶提督聂士成经常攻击义和团，义和团恨透了聂鬼子。一次，义和团战士在河东兴隆街迎面碰上了聂士成，当即拔刀追赶，聂鬼子从马上掉下来落荒而逃。反动派的威风已经扫地。义和团的反帝革命烈火，在天津熊熊燃烧起来。

一九〇〇年春天，就连清王朝的心脏北京也有义和团传授拳艺了。开始他们多在僻静之处，后来就公开在大街小巷，率领少年练拳。义和团的揭帖，经常出现在交通要道，特别是教堂周围，揭露帝国主义如狼似虎的侵略和清政府“祸国殃民”的罪行，号召人民拿起武器投入战斗。六月上旬，京郊各县义和团三五十人或上百人一队，高举着“灭洋”的大旗，“以保国保家为名”^②，涌进北京城内。他们的到来，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甚至连守城的士兵也被他们的崇高的爱国热忱所感召，为他们肃立致敬，给他们



义和团揭帖之一

① 刘崇丰：《义和团歌谣》第32页。

② 仲芳氏：《庚子记事》第18页。

喝道让路，对于夜来者“即刻开城放入”“并不拦阻”。^①

北京全城设坛一千余处，义和团员不下十万人，前门外打磨厂等处的铁铺里，日夜不停地为义和团赶制刀矛。广大义和团队伍，始终保持着高昂的革命斗志。他们“自备资斧，所食不过小米饭玉米面而已”^②，“俱在庙宇及空闲客店内设坛居住”。^③他们“既不图名，又不为利，奋不顾身，置性命于战场，不约而同，万众一心”^④，“一心只想灭洋人”。义和团严禁洋货，号召老百姓不买洋货，还放火烧了老德记药房等洋行。义和团对所有的教堂，普遍发起了攻势，并勒令教民叛教。义和团把东交民巷改为“切洋鸡鸣街”，把御河桥改为“断洋桥”。高举“灭洋”大旗，手持大刀长矛的义和团战士，经常进行武装示威游行，他们的队伍“比之军伍尤觉整齐”^⑤，每走过一条街道，便带领群众高呼“杀洋鬼子”^⑥的口号。义和团宣称“愿得一龙二虎头”^⑦，决心把清朝的最高统治者送进坟墓。义和团还强迫一些媚外官吏到坛叩头焚表，并把其中罪恶昭著者杀掉。在义和团风暴的冲击下，清政府“各部院文武大小衙门一切公事，概行停止”。^⑧无怪乎帝国主义者丧气地说：“以庆王为其代言人的总理衙门已终止其为中国统治者的代表了，我感到它象推动这个政府的一架杠杆，现在已被压得粉碎”。^⑨帝国主义分子一片惊慌，老侵略分子赫德、樊国梁也都感到“前途极严重”^⑩，简直“暗淡无光”！^⑪他们“好象‘笼中之鼠’，日夜担心不知什么时候会遭遇大

①②③④⑤⑧ 仲芳氏：《庚子记事》第12、15、11、15、20、18页。

⑥ 鹿完天：《庚子北京事变记略》，《义和团》第2册，第398页。

⑦ 李希圣：《庚子国变记》，《义和团》第1册，第12页。

⑨ 《窦纳乐致英国外交大臣信》，《近代史资料》一九五四年第2期，第19页。

⑩ 赫德：《北京去电新字648号》，《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九），第8页。

⑪ 《窦纳乐致英国外交大臣信》，《近代史资料》一九五四年第2期，第8页。

难”。^①这些平日趾高气扬的家伙，现在都嫌自己腿短跑得不快，有的躲在大衣箱里，有的甚至躲进棺材里，雇人抬着，企图逃到城外去。

义和团在山东、直隶兴起后，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从北到南，从东到西，掀起了汹涌澎湃的反帝怒潮。

东北地区，一九〇〇年夏，义和团反帝斗争日益高涨。他们号召人民奋起斗争，把外国侵略者“驱逐出中国领土”。^②他们到处毁铁路，烧教堂，“驱逐洋人”。七月前后，奉天境内北至开原南至海城五百里的铁路，除鞍山站外，全被义和团拆毁。盛京城内外“洋人讲书堂”和“俄国铁路公司”也“拆毁殆尽”。天主教盛京总堂被烧，主教纪隆被击毙。吉林、黑龙江境内“教堂尽毁”，“育婴堂、小学堂毁灭无遗”。^③东北各地义和团在“根除洋人”的同时，对封建统治者也予以打击。义和团在奉天对“城市和农村的商人和富豪”，实行“课税”，制止他们的非法活动。^④“即或是带着随从的盛京将军的马车”，在街上遇到义和团首领，也不得不“让路”。^⑤

在山西，一九〇〇年五月，省城太原“揭帖遍张”，六月“北方义和拳结队入城，在抚院前设拳场，传拳术”。义和团反帝烈火很快燃遍全省城乡。义和团队伍“旗旒央央，器械纷纷，步伐整齐，俨然成军”。^⑥他们惩办洋教士和为虎作伥的教民，打击媚外虐民的清朝封建统治者。据不完全的统计，义和团在全省十一州、六厅、四十余县，焚毁教堂九十多处，制裁了罪大恶极的帝

① 赫德：《北京去函Z字859号》，《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九），第6—7页。

②④⑤ 司督阁：《奉天三十年》上卷，第182、201页。

③ 李秋：《拳祸记》第264页。

⑥ 《潜园琐记》卷3。

国主义分子及其爪牙一百五十余人。

在内蒙古，从一九〇〇年六月开始到七、八月间，口外七厅、土默特旗、四子王旗、河套地区、伊克昭盟各旗和阿拉善旗等地，普遍出现了义和团的反帝斗争。蒙、汉、满、回各族人民团结战斗，是内蒙古义和团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特点和优点。各族义和团战士，共同攻克和焚毁了绝大多数侵略者的据点——教堂，特别是萨拉齐二十四顷地总堂、四子王旗铁圪旦沟、乌尔图沟教堂和鄂托克旗城川教堂。义和团和广大群众惩罚了西南蒙古教区主教韩默理等一批恶贯满盈的帝国主义传教士以及一些作恶多端的教民，使中外反革命势力受到沉重的打击。内蒙古义和团还提出了“上打洋人，下打官”的战斗口号，把反帝、反封建斗争结合起来。

在河南，义和团会同大刀会、江湖会等秘密结社，在“杀了洋鬼头，猛雨往下流”的口号鼓动下，把反帝斗争推向广大城乡。全省数十州县，男女老幼齐动员，到处展开了“杀洋灭教”的战斗。除靳岗和新野两处教堂外，全省所有教堂几乎全被焚毁或砸坏。林县义和团攻打教堂时，打开教堂的粮库分粮给群众。在攻打周口教堂时，义和团还捣毁了教堂和教民开设的洋货店。同义和团的斗争相呼应，河南信阳铁路工人举行总罢工，“辍工者以数万计”，迫使侵略分子狼狈逃窜，工程中断。

在江苏，南京城厢内外义和团贴出了烧教堂、逐洋人的揭帖，徐州多处教堂被毁，扬淮数千盐民奋起斗争。

在安徽，一九〇〇年七月以后，婺源、宿松教堂被焚，“安庆、芜湖等地，遍贴匿名揭帖，杀洋人焚洋房，定即日起事”，十月，建德教堂也被焚毁。

在湖北，蕲州、枣阳、黄梅、广济、随州、襄阳、谷城等地教堂

被毁。

在湖南，一九〇〇年七月，衡州会党群众焚教堂，耒阳、衡山、常宁礼拜堂也被毁。

在江西，饶州、建昌等地会党斋教起义，全省毁教堂三十九所。刘坤一给清政府的报告惊呼：“半年以来，……惟江西省毁抢教堂，劫掠教民，至数十案之多，虽经……迭次严饬拿办，……有鞭长莫及之势。……本月二十六日，萍乡县又有武童为首，聚众滋闹铁路，打毁机器之事。声言路系洋人所造，故与为难。似此相率效尤，人心不靖，万一各国借口干预，为患何可胜言”。^①

在浙江，瑞安、平阳义和团“散布匿名揭帖，到处皆有”。白旗党、百姓教、斋教等会党发动起义，攻破江山、常山、开化县城。衢州、台州、绍兴、温州各属教堂纷纷被毁。奕劻、李鸿章徒唤奈何地说：“自今夏拳‘匪’肇乱，各省教案迭出，操纵两难。浙东民气浮动，攻教尤甚”。^②

在福建，漳州群众拆毁教堂，“与各洋教士为难，势甚汹汹”。富有反教会侵略斗争传统的南平人民，再次起来捣毁教堂。闽浙总督许应骙担心“闽地僻处海隅，谣传时有所闻”，加紧“分饬得力弁勇，妥为保护”“所有租界教堂”。^③

在上海，在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租界里也“谣言繁兴，人心惶惑”，一向被帝国主义压迫奴役的“西崽和苦力”也都认为：跟帝国主义侵略者“总算账的日子，已经近在眼前了”。

此外，在两广、云南、贵州、四川、陕西、甘肃、新疆等省，也都发生了规模不等的群众性反帝斗争。

① 《两江总督刘坤一电报》，《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831—832页。

② 《全权大臣奕劻李鸿章电报》，《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810页。

③ 《闽浙总督许应骙折》，《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31页。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在华北、东北地区以及山东等省，人民的反抗斗争，主要是在义和团的旗号下进行的，规模大，浪涛急，显示出革命源头的特点；在南方和西北各省，人民的反抗斗争，多是采取反洋教的形式，零星分散，旋起旋伏。各个地区的人民反抗斗争，虽然有着各种差别，但都是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义和团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彼此呼应，互相激荡，在全国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二次革命高潮。

第二节 反抗八国联军侵略战争 中的两条路线

一、帝国主义联合发动侵华战争

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蓬勃兴起，严重地威胁着帝国主义在华的侵略势力。当帝国主义看到清政府因腐败溃烂无力遏制人民的反帝浪潮时，就凶相毕露，公然亲自出马进行血腥屠杀了。

列宁说：“战争是政策的继续”。^①帝国主义联合发动的侵华战争，是帝国主义保护财政资本利益，掠夺和压迫半殖民地中国的政策的继续，其目的是为了镇压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义和团运动，一举瓜分中国。

帝国主义为了发动侵华战争，大肆制造反华舆论。各国资产阶级的喉舌，连篇累牍，用尽了一切恶毒语言，谩骂和攻击义

^① 列宁：《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列宁全集》第23卷，第23页。

和团。在这场反华大合唱中，沙俄扮演了极其可耻的角色。正如列宁所揭露的那样：沙俄“在报刊上大肆攻击中国人，叫嚣黄种人野蛮，仇视文明，俄国负有开导的使命”。“向政府和大财主摇尾乞怜的记者们，拼命在人民中间煽风点火，挑起对中国的仇恨。”^①其他各国也都不甘落后，竞相狂吠。化名朴笛南姆·威尔的英国人辛普生叫嚷什么义和团这“一缕微云”，“今已渐次发展，而障蔽大地之光线矣。”“尤可惊者，拳民之旗帜，已飘扬于空中，鲜红之布，……仿佛吾欧人之血所染也”。^②英国传教士宓克对英国政府说：“气氛虽如此之恶，然果力征经营，未必不归驯服。”他要英国象第二次鸦片战争那样，“用铁手钢肠，毅然与之从事”，“自行直取，问罪‘顽民’，使之痛深创巨”，“从此有所惩艾，不敢惹祸招灾”。^③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兴奋地说：“把势力伸展到中国的好机会到了，上帝不允许我们放过这个机会。”^④德皇威廉第二公然宣布自己是“黄祸论者”。

伴随着反华叫嚣，帝国主义各国加紧勾结拼凑联军，积极策划发动侵华战争。早从一八九九年底开始，各国公使就迭次警告清政府，用严厉的手段镇压义和团。一九〇〇年四月，英、美、德、法四国公使联合发出照会，限令清政府在“两月以内，悉将义和团‘匪’一律剿除，否则将派水陆各军驰入山东、直隶两省，代为剿平”。^⑤五月，各国公使开会讨论了樊国梁给法国公使的信。樊国梁在信里“主张必须调海军来北京”。各国公使一致认为樊国梁主教在北京已三十多年，且与中国各阶层人士有广泛的交

① 列宁：《中国的战争》，《列宁选集》第1卷，第216—217页。

② 朴笛南姆·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义和团》第2册，第206—207页。

③ 宓克：《支那教案论》，《编辑篇》。

④ 丁韪良：《北京被围记》。

⑤ 佐原笃介：《八国联军志》，《义和团》第3册，第169页。

往，“他对目前局势的明智意见决不可置之不理”。他们一面联名向清政府发出通牒，要求：（1）严禁团民练拳纠党，传布揭帖；（2）团民聚会之区，无论寺庙民居，将其住持屋主，一并收监；（3）将拘办拳民不力之员，概行惩处；（4）将为首焚杀之“匪”，一并正法；（5）将纵“匪”助“匪”之人，尽数诛戮；（6）直隶与邻省，有团民之处，地方官出文严禁^①；一面“主张不要坐失时机，立刻调兵保护使馆”。^②沙俄公使格尔思密电本国政府，要求“派遣载有陆战队的军舰到秦皇岛。决定在必要时召陆战队来此间”。^③五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各国公使更警告清政府：“不论中国政府的态度如何，各外国公使已决定调兵来北京，我们劝告中国政府让步，以免引起意外的后果”。^④在各国的压力下，那拉氏竟丧心病狂地批准了洋兵进京。据此总署电告裕禄：“洋兵护馆，准由火车运送”。这样，从五月底到六月初，俄、英、美、日、德、法、意等国侵略军四百余名，分两批乘清政府所提供的火车侵入北京。帝国主义者得意洋洋地说：“北京城敞开着，让外国军队走进”。^⑤同时，各国军舰也纷纷开到大沽口外示威。德国公使克林德狂妄叫嚣：“这些行动是瓜分中国的开端”。^⑥

面对着义和团反帝怒涛的冲击，帝国主义各国都要求联合

① 李扶：《拳祸记》第67页。

② 《窦纳乐致英国外交大臣信》（一九〇〇年五月二十一日），《近代史资料》一九五四年第2期，第13页。

③ 《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216页。

④⑤ 《窦纳乐致英国外交大臣信》（一九〇〇年六月十日），《近代史资料》一九五四年第2期，第15、16页。

⑥ 《布洛夫致克林德电》，《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2卷，第2页。

起来，共同对付中国人民。美国国务卿海约翰致电英国政府说：“如需兵力以平乱，兼保护教堂旅客，亦惟我两国同舟共济。……英美合力以相助，较他国协助为优”。^①沙俄公使格尔思也叫嚷：“情况千钧一发，只有列强有力坚决的合作才能制止运动”。^②正是在镇压义和团运动这一点上，他们暂时建立起“合作”关系。但是，这种“合作”即勾结，并没有消除他们彼此间的争夺。一九〇〇年四月，赫德就说过：“各国的态度分为两派，一派对中国说：‘你们如果不把义和团当作匪徒扑灭，我们就要自己采取行动’。另一派虽然不以可能闯祸的义和团为然，但是他们温和地向中国保证说：‘我们是你们的朋友，如果别国对你们不利，我们会来干涉’。”赫德认为“这种保证不过是想在扰乱中捞便宜”。在他看来，“目前局势非常紧张，各方暗斗激烈，而且似乎已箭在弦上，可以一触即发”。^③很显然，赫德所说的两派暗斗，就是指以英国为首的英、美、日和以沙俄为首的俄、德、法两个集团的争霸。英国认为沙俄“想在扰乱中捞便宜”。沙俄则反唇相讥，指责英国想利用义和团运动来实现“某些秘密阴谋”。

当时，英国所追求的目标，是瓜分中国，乘机吞并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但是，因为英国正在南非进行殖民战争，兵力受到牵制，又怕俄、德大量出兵，损害自己在华的侵略地位，所以一面尽力搜罗炮灰，侵入中国，一面拉拢日本，企图利用日本绞杀义和团，抵制沙俄势力的扩张。英国外交大臣在给日本外务省的

① 佐原笃介：《八国联军志》，《义和团》第3册，第172页。

② 《驻北京公使密电》（一九〇〇年六月七日），《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218页。

③ 赫德：《一九〇〇年四月一日北京去函Z字852号》，《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九），第5页。

备忘录中，请求日本多多出兵，并表示英国“乐于”提供“财政援助”。日本陆军大臣桂太郎认为日本参加这次战争，是“将来掌握东洋霸权的第一步”。^①因此，日本积极赞助英国的主张，日本派出的兵力，占八国联军总数的五分之二。美国为了“洞辟华门，大通商利之举”^②，并对抗沙俄，也同英国相勾搭，表示美国要“最积极地参加军事行动，永远站在最前哨”。^③

沙俄是帝国主义镇压义和团运动的急先锋。清朝驻俄公使杨儒就曾看出：“事系俄领袖调兵独多”。^④沙俄的罪恶目的，是瓜分中国，控制清政府，独霸东北，抵制英、日扩张势力。沙俄自称“与其他列强所追求的目标完全不同”^⑤，但又宁愿“不和其他国家分开，以便密切注视他们的行动，并能在任何时间宣布自己的要求”。^⑥它明明是这次侵华战争的带头羊，却又不“公开领导对中国作敌对行动”。^⑦它一边积极参加并想方设法控制联军，一边又向清政府表示“俄国现在必极力帮助中国，故各国调兵入京，俄必代中国设法阻止。如各国不从，则俄必多调得力之兵入京，以相抵制”。^⑧沙俄为了使自己“在远东的感召力高涨”^⑨，特地从旅顺调四千军队到北京。它还得意忘形地狂叫：“我国在当地驻有四千军队，列强在不得我国同意时不能采取任

① 井上清等：《近代日本的焦点》。

② 佐原笃介：《八国联军志》，《义和团》第3册，第172页。

③ 《美国外交档案》。

④ 李鸿章：《复鄂督张香帅》，《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22，第39页。

⑤ 《外交大臣上沙皇奏》，《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229页。

⑥ 《代理外交大臣致旅顺口海军中将亚历克先也夫密电》，《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223页。

⑦ 《外交大臣上沙皇奏》，《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221页。

⑧ 佐原笃介：《拳事杂记》，《义和团》第1册，第250页。

⑨ 《外交大臣上沙皇奏》，《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220页。

何政治措施”。^①当时德国支持沙俄，抵制英、日，并把这次侵华战争看作为德国“扩充”在华的“占有权利”和“发展东亚商业之最大的希望”。^②

帝国主义之间虽然矛盾重重，但在“弹压‘匪’类，救护使臣”的旗号下，结成了“对中国的同盟”。六月十日，英、俄、美、法、德、意、日、奥八国驻大沽口的司令官根据其政府的指令，迅速组成一支二千一百人的联军，由英国海军司令西摩尔率领，在大沽口登陆后，由天津乘火车向北京进犯。六月十五日，各国海军司令在俄舰上密谋策划夺取大沽炮台，作为大举进攻的桥头堡。六月十六日晚八时，由沙俄海尔德布郎将军领衔，各国海军司令联合向大沽炮台守将罗荣光发出最后通牒，蛮横宣称中国军队守卫大沽炮台，“于我西人代平‘匪’乱一事，实有不便”，狂妄地要求将“炮台暂借敝军看守”^③，并限令第二天凌晨二时交出。中国爱国官兵，严正地拒绝了侵略军的最后通牒。十七日凌晨，在沙俄海军司令的指挥下，八国联军悍然向大沽炮台发起进攻。中国守卫炮台军队，在义和团的支援下，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终因清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使守卫炮台官兵孤立无援，寡不敌众，大沽炮台遂于当天失陷。麇集于大沽口外的大批侵略军，纷纷从大沽登陆，进犯天津、北京，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战争。

至此，近代史上空前野蛮的八国联军侵略战争正式爆发了。

① 《外交大臣上沙皇奏》，《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221页。

② 瓦德西：《拳乱笔记》，《义和团》第3册，第7页。

③ 李秋：《拳祸记》第79页。

二、清朝营垒的破裂和资产阶级各派系的活动

八国联军闯进国门和义和团反帝风暴席卷全国，给清朝统治阶级和资产阶级各派系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是支持义和团，反抗侵略呢？还是剿杀义和团，对外投降呢？或者游移于两者之间呢？他们必须迅速地作出选择。

面对着侵略和革命的严重威胁，在斗争改变常态而突然以汹涌的阵势向前推进的时候，清朝营垒发生了破裂。这种破裂，突出表现于统治阶级中、下层某些人物的“联拳灭洋”，与统治阶级上层剿拳降洋之间的争斗。此外，统治阶级上层各派系之间的裂痕也在不断地扩大和加深。这种情况，基本地说来是有利于革命的。

那拉氏后党把持的清政府，早已变成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但是，最恭顺的奴仆也难免与主子发生摩擦。戊戌政变后，那拉氏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保证后党官僚不受“归政”的威胁，一心想搞掉载湫。她曾先后采取“谋害法”、“废立法”、立端王载漪的儿子溥儀为大阿哥（皇位继承人）“徐篡大统”法，但都因遭到英、日等帝国主义的干涉而没能实现。当时沙俄支持后党，英、日为了同沙俄争霸，袒护帝党企图豢养载湫，牵制那拉氏。那拉氏对于英、日等国阻挠“废立”，干涉“家务”，是既恐慌又仇恨的。八国联军突然攻陷大沽炮台，气势汹汹地扑向天津、北京，引起那拉氏后党的极大猜疑。尽管洋主子一再声明他们出兵是为了“救护驻华使馆，并助中国剿‘匪’”^①，绝非与清政

^① 侨析生：《拳匪纪略》后编，卷上，第9页。

府作对。可是奴才还是惟恐洋主子用兵含有暗助载湉之意，极其不安。

那拉氏后党控制的清政府，虽然同帝国主义存在某些矛盾，但这绝不足以影响他们敌视农民、媚外卖国的根本立场。义和团运动兴起后，他们就凭着反革命嗅觉，认定义和团是张角、徐鸿儒辈，是太平天国一类的“叛匪”，不遗余力地加以禁止和剿办。但是，他们的一纸禁令和血腥屠刀，都毕竟无法阻挡义和团反帝怒潮的高涨。他们陷于进退维谷，“剿抚两难”的困境。侵略中国多年的英帝国主义分子赫德曾经说过：“中国朝廷处于进退两难的地位，如不镇压义和团，则各国使馆将以采取行动相威胁；如准备镇压，则这一强烈的爱国组织将转变为反抗清朝的运动”。^①这时，一面是义和团在“京城蔓延已遍，其众不下十数万，自兵民以至王公府第，处处皆是，同声与洋教为仇，势不两立”^②；一面是八国强盗手持洋枪洋炮杀了进来，还有消息说洋人将以武力胁迫那拉氏归政。那拉氏后党政府惊恐万分，“方寸已乱”。六月二十日上谕供认：“近日京城内外拳民仇教，与洋人为敌，教堂教民连日焚杀，蔓延太甚，剿抚两难，洋兵麇聚津沽，中外衅端已成，将来如何收拾，殊难逆料”。^③在这种形势下，老奸巨猾的那拉氏采取了反革命的两面政策，一方面假惺惺地承认义和团为“义民”，并向帝国主义“宣战”，想借对外战争之名来躲过农民革命锋芒的打击；一方面在对外战争的幌子下，企图利用帝国主义的屠刀残杀义和团，利用义和团的力量攻打使馆区，

① 赫德：《一九〇〇年五月二日北京去函Z字858号》，《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九），第6页。

② 《军机处寄各省督抚等电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87页。

③ 《军机处寄各省督抚上谕》，《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56页。

强迫各国公使同意废黜载湫，另立溥儀，“大事既成，……虽割地以赎前愆，亦所不恤”。^①

与那拉氏后党的态度不同，以载湫为首的帝党，对外主和，对内主剿，双方进行了一场论争。

戊戌政变后，载湫被幽禁，帝党官僚多数遭斥。他们虽然处于受后党排斥的地位，但大地主阶级的本性却一丝一毫没有改变。他们对义和团怀着敌意，而对帝国主义却抱着好感。他们看得很清楚，义和团反帝爱国斗争，不仅打击帝国主义，而且必然触犯地主阶级的利益，载湫的脑袋和宝座，是依靠帝国主义才得以保存的，而要取代后党、夺取清朝最高统治权，离开洋主子的支持就更是幻想。因此，他们主张镇压义和团，投降帝国主义，推行一条赤裸裸的卖国主义路线。由于剿拳降洋路线的一致性，使帝党和洋务派走到一起来了，出现了帝党和洋务派相结合，以帝国主义为靠山，借以实现其政治目的的动向。

这时，载湫虽是徒有空名的皇帝，但在宫中开王公大臣、六部九卿参加的御前会议时，却一反常态跳了出来，拚命地反对对外宣战，反对义和团，大肆宣扬失败主义。当时人记载说：“今上（按：指载湫）自退政以后，恒恭默不语，此次独侃侃而谈，力言其不可，谓：‘断无同时与各国开衅理’”。^②那拉氏也说：“皇帝意在和，不欲用兵”。^③载湫极力散布帝国主义“器利而兵精”^④，“诸国之强，十倍于日本，合而谋我，何以御之？”^⑤又说：“中国积衰，兵又不足恃”^⑥，战则必败。他恶毒攻击义和团，胡说什么“用乱民以求一逞，宁有幸乎”。^⑦清朝中央政府里的一些洋务

①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义和团》第1册，第50页。

② 吴永：《庚子西狩丛谈》，《义和团》第3册，第435页。

③④⑤⑥⑦ 李希圣：《庚子国变记》，《义和团》第1册，第13页。

派官僚，与载湫一唱一和。他们对于载湫的投降主义理论颇为赞赏，所以“许（景澄）、袁（昶）皆云此次议和，必请皇上宸断”。^①载湫认为许景澄“久习洋务，特欲倚以为重”。他对许景澄说：“你是出过外洋的，又在总理衙门办事多年，外间情势，你通知道，这能战与否，你须明白告我”。^②许景澄答复说：“无论是非得失，万无一国尽敌诸国之理”。徐用仪和袁昶也“均从旁力赞其说”。他们的卖国论调与载湫心息相通，所以得到了载湫的“肯首”。^③王文韶对载湫反战主降这一套，大加捧场，说什么“圣虑及此，国之福也”。^④那拉氏要派许景澄去公使馆“宣战”，载湫“揽其袂不令往”，^⑤“相持而泣”。袁昶在日记中透露，“宣战”并非载湫的“本意”。^⑥载湫还暗示过荣禄，“好在兵权全在你手……不宜浪开衅故”。^⑦直至北京陷落，那拉氏挟载湫逃亡太原，当载湫获悉英、日等国公使要他回京主持“议和”时，他就不愿再远逃陕西，而要单独回京与各国“议约”。^⑧

六月二十一日，在那拉氏主持下，清政府向各国宣战。那拉氏在宣战上谕里，一面痛骂外国侵略者，说“诎三十年来……乃益肆泉张，欺凌我国家，侵占我土地，蹂躏我民人，勒索我财物，……负其凶横，日甚一日”，“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一面赞扬义和团，说“近畿及山东等省义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数十万人，下至五尺童子，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因此“何难剪彼凶焰，张我国威”。^⑨那拉氏要求各省

① 佐原笃介：《拳事杂记》，《义和团》第1册，第254页。

②③④ 吴永：《庚子西狩丛谈》，《义和团》第3册，第434、378、435页。

⑤ 赵声伯：《致适庵书》，《庚子事变文学集》下册，第1139页。

⑥⑦ 袁昶：《乱中日记残稿》，《义和团》第1册，第340、339页。

⑧ 李希圣：《庚子国变记》，《义和团》第1册，第29页。

⑨ 《上谕》（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62—163页。

督抚将“此等义民”，“招集成团，借御外侮”。^①她打着对外作战的旗号，加紧欺骗和控制义和团，派刚毅等人“办理义和团事宜”，并制定“团规”，规定：各处义和团要服从总团领导；团众“应与官军联成一家”；官军欺压团众，必须禀告清军统领办理，不得自行反抗等等。如若违背，就是“假团”，照“匪徒”办理，格杀勿论。她公然要求义和团“以忠义相勉”^②，“努力王家”^③，妄图改变义和团的革命性质，把义和团变为清政府的御用工具。

与此同时，那拉氏一再向各省督抚表明苦衷，积极与帝国主义谋求妥协。

六月二十五日，“宣战”才刚刚四天，那拉氏在答复两广总督李鸿章等强烈反对“宣战”的上谕中说：“此次之变，事机杂出，均非意料所及，朝廷慎重邦交，从不肯轻于开衅。奏称中外强弱情形，亦不待智者而后知。”^④二十六日，那拉氏称赞李鸿章等人“度势量力，不欲轻构外衅”的主张，是“老成谋国之道”；说明对外“宣战”，是因为义和团声势浩大，“剿之，则即刻祸起肘腋”，“只可因而用之，徐图挽救”。^⑤二十九日，那拉氏通知驻外使节继续留在各国，向驻在国政府解释：“朝廷非不欲将此种乱民下令痛剿，而肘腋之间，操之太蹙，深恐各使保护不及，激成大祸。……且中国即不自量，亦何至与各国同时开衅，并何至恃乱民以与各国开衅，此意当为各国所深谅。……现仍严饬带兵官照前保护使馆，惟力是视。此种乱民，设法相机自行惩办。”^⑥这就

① 《军机处寄各省督抚上谕》，《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63页。

② 《上谕》，《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215页。

③ 《上谕》，《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76页。

④ 《军机处寄李鸿章等电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86页。

⑤ 《军机处寄各省督抚等电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87页。

⑥ 《军机处寄出使俄国大臣杨儒等电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202—203页。

充分说明清政府的“宣战”完全是一场骗局，它不惜以对内镇压义和团的反抗，来求得帝国主义的谅解，最后保住自己的统治地位。

当时，在清朝统治阶级上层中，不仅帝后党争激化，而且在后党和东南督抚之间也出现了裂痕。东南督抚拒绝执行清政府的宣战命令，而同帝国主义结盟互保。当时有人写道：“南北判若两家，从古所未有也。”

一九〇〇年六月，正当义和团运动在北方迅猛发展的时候，东南各地人民的反帝斗争也方兴未艾。在这样的形势下，英国为了保持在长江流域的优势地位，镇压义和团，防止其他帝国主义借机插足自己的地盘，策动东南督抚搞所谓的“东南互保”。六月中旬，英国驻上海代总领事华仑致电英国外交大臣，建议“必须立刻与湖广及两江总督取得谅解”。^①英国外交大臣沙斯伯里很快就电复华仑，授权华仑“通知两江总督，假若他采取了维持秩序的方法，他将要受到帝国海军的协助”；并叫华仑也给湖广总督“一个同样的保证”。^②英国策动的“东南互保”刚刚出笼，美、日、德、法等国为了各自的利益就都插手进来，结果由英国独家经营，变成各帝国主义共同参预策划的分裂中国的活动。

“东南互保”的盟主是帝国主义，传递帝国主义意旨的是盛宣怀，出面与帝国主义协议的是刘坤一、张之洞。

义和团运动兴起后，盛宣怀凭着其买办阶级灵敏的反革命嗅觉，立刻“飞电荣相、裕督，拳民已毁路戕官，当以‘匪’论，请痛

^① 《华仑致沙斯伯里电》（一九〇〇年六月十四日），《义和团》第3册，第517页。

^② 《沙斯伯里致华仑电》（一九〇〇年六月十五日），《义和团》第3册，第518页。

剿，勿养痍貽患”。^①他催促裕禄及其手下文武，加紧镇压义和团，保护铁路和救护洋人。他秉承帝国主义搞“东南互保”的意旨，特地赶到上海，并以上海为基地，奔走于南京、武汉间，在东南督抚间穿针引线，出谋划策，指挥调度，可说是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了他的大买办阶级的特殊性格。六月二十一日，清政府发布了“宣战上谕”后，盛宣怀即刻“飞飭各电局，但密呈督抚勿声张”^②；同时致电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建议他们“万勿声张”，“如欲图补救，须趁未奉旨之先，岷帅、香帅会同电飭地方官上海道与各领事订约，上海租界准归各国保护，长江内地均归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保全商民人命产业为主；一面责成文武弹压地方，不准滋事，有犯必惩，以靖人心。北事不久必坏，留东南三大帅以救社稷苍生，似非从权不可，若一拘泥，不仅东南同毁，挽回全局亦难”。^③寥寥数语把帝国主义买办对形势的估计，对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人所寄予的希望，和盘托出。李、刘、张等人根据盛宣怀的献计，直接与帝国主义相勾结，搞所谓“东南互保”。他们把清政府的“宣战上谕”说成是“矫诏”，表示断不奉行。经过帝国主义、盛宣怀和东南督抚几度磋商之后，六月二十六日，由上海道余联沅和盛宣怀代表刘、张，与帝国主义驻沪各领事商定《中外互保章程》九条，明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保全中外商民人命产业”，“上海制造局火药局……军火专为防剿长江内地土‘匪’，保护中外商民之用”。^④这个约款表明，打着“保全中外

①② 盛同颐：《盛宣怀行述》，《洋务运动》第8册，第64页。

③ 《盛宣怀寄李中堂刘岷帅张香帅电》，《义和团》第3册，第332页。

④ 《盛宣怀电李鸿章并致江鄂督苏皖抚》，《义和团》第3册，第338—339页。

商民人命产业”旗号的所谓“东南互保”，保的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反的则是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分裂中国、巩固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的严重步骤。参加东南互保的，先后有江苏、江西、安徽、湖北、湖南、山东、浙江、福建和广东等省。

《中外互保章程》虽然由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而并未正式签订，但有关条款事实上都得到了执行。六月二十七日，华仑致电沙斯伯里说：“上海道台（余联沅）奉了总督的命令，昨天邀请各国领事们和他晤面讨论当前的局势，他要求到会的领事们给他们自己的政府去电，建议除了正在进行战争的北方以外，宣布其他所有地区的中立，并且假若能够做到这些话，那么他们就可以能够保证维持秩序的。”“领事们的答复是六月二十日联军司令官的通告，他们宣称各国仅向拳民及抵抗为了援救他们侨民派往北京的军队的那些人而作战的。”“中国的官吏们，应负起保持和平的责任，假若中国方面没有破坏和平或是发动有战斗行为的话，他们用不着忧虑我们这方面任何的攻击的”。^①东南督抚们正是按照帝国主义的旨意办事的，他们在宣布“中立”搞“互保”的同时，穷凶极恶地镇压东南各地人民的反帝斗争。李鸿章在两广“募巡警”、“办团练”、“清查人户，遇有身带火器刀械立即擒捕”。他还指使刘坤一、张之洞“必须严办‘匪’徒”。^②刘坤一、张之洞到处张贴告示：“禁谣拿‘匪’，敢有生事，立即正法，所有洋商教士，力任保护”。^③刘坤一的军饷、军火完全用于“剿匪”，从不接济北方对外作战之用。袁世凯在山东勾结德国对义

① 《华仑致沙斯伯里电》，《义和团》第3册，第523页。

② 《李鸿章复刘坤一电》，《义和团》第3册，第335页。

③ 《张之洞致刘坤一电》，《义和团》第3册，第327页。

和团“格杀勿论”，他的军队和军火同样不支援对外作战。刘坤一、张之洞等人还致电荣禄说：“各国洋电皆以‘拳匪’妄杀开衅，我不速剿，致动众怒”。他们认定“即不与各国开衅，亦应痛剿”，要清政府“明降谕旨，力剿‘邪匪’”，并向各国表示“决无失和之意”，“劝令停兵息战，我方好专力‘剿匪’”。^①由于这一群卖国贼的丧心病狂的镇压，不仅东南各省的义和团运动未能发展起来，而且还阻止了北方义和团的南下，从而严重地破坏了义和团运动的发展，给帝国主义帮了大忙。无怪乎帝国主义要对这帮奴才的“诚意”感激不尽呢。

在清朝统治阶级上层中，后党、帝党和洋务派都是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政治代表，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他们由于各自的处境以及与帝国主义关系的某些差异，在对待义和团和八国联军的态度上略有不同。但这只是形式上的不同，实际上却是殊途同归，目的都是为了对内镇压义和团，对外投降帝国主义。他们共同组成了一个卖国贼的营垒。

在清朝统治阶级中、下层中，有一部分爱国官绅，他们虽然同农民有阶级矛盾，但他们也受帝国主义的欺凌和大地主大买办的压抑。八国联军的大举进攻，使他们遇到了存亡的问题；义和团的反帝怒潮，推动他们倾向“联拳灭洋”，成为地主阶级抵抗派。

抵抗派是和投降派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抵抗派主张“推尊神拳，歼除洋人”^②，批驳了投降派的卖国论调。

第一，在战争性质问题上，投降派硬把八国联军侵略战争说成是“拳匪”“滋事”而“肇外衅”，为帝国主义开脱罪责，否定义和

^① 《李秉衡、刘坤一、张之洞等致荣禄电》，《义和团》第3册，第329—330页。

^② 赵声伯：《致适庵书》，《庚子事变文学集》下册，第1137页。

团运动的正义性。抵抗派则认为是侵略引起了反抗，是“洋人肇衅”^①，“而谓衅自我开，何其无耻乎！”^②在他们看来，“外洋欺侮中国，据我土地，夺我利权，干预我政事，且或借传教为名，纵教民以欺压平民。民间积怒既深，日思报复而无术，于是山东起有义和团，畿辅一带应之”。^③

第二，在和与战的问题上，投降派叫嚷对外国侵略者只能和，不能战。和则存，战则亡。抵抗派认为“外夷之欺中国，往往以和为进步”，^④得步进步，“决无以履其意”。^⑤“故和之祸，烈于战，速于战，毒于战，不至其时不见，至于见之，悔尚何及哉，故曰不可存求和之心”。^⑥他们揭露主和的投降派都是沾洋字边的家伙：“有通洋情而受贿者，有仗洋势而升官者，有借洋务而致富者，有隶名教堂而甘心从逆者，有资财寄顿于洋行、子弟游历于各国、直与洋人相依为命者，深恐洋人一败，彼亦随之而败；不然，则护其往日畏葸之罪者也；又不然，则保其垂老爵位之荣者也。情状不同，肺腑则一。彼既以和夷为生路，而国家之祸福遂漠然置之不问”。^⑦这些汉奸为了主和卖国，胡说什么：“兵力不足，餉项不充，以一国而当八国，其势不敌”。^⑧而抵抗派则断定“今日时势，非战无以立国”^⑨，历史说明战是能够取胜的，“三元里则民兵胜之矣，镇南关则官兵胜之矣”^⑩，“义和团以空拳捕贼，夷巢半焚；彼谓与西人战决无胜理者，果竟何如！”^⑪而要战

① 《翰林院侍讲檀璣呈》，《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223页。

② 左绍佐：《上徐桐书》，《近代史资料》一九五六年第4期，第42页。

③ 《给事中李擢英折》，《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60页。

④⑦⑧ 《御史徐道焜折》，《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255、255—256、256页。

⑤⑩ 左绍佐：《上徐桐书》，《近代史资料》一九五六年第4期，第40、43页。

⑥ 左绍佐：《致哈葛人（谷）书》，《近代史资料》一九五六年第4期，第52页。

⑨⑪ 《翰林院编修彭清藜等呈》，《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216、217页。

而胜之，那就得“急除大奸”，“大奸不除，不能成大功”。^①抵抗派主张杀掉李鸿章、袁世凯和东南督抚中的某些人，要求惩办盛宣怀和“重典”制裁那些“言和言约之人”。^②

第三，在对待义和团的态度上，投降派恶毒攻击义和团是“匪”，“作乱”而“招祸”，要剿团媚洋。抵抗派赞扬义和团是“义民”，认为“就大势言之，拳民总宜善抚，不宜遽剿。洋人总宜力拒，不可姑容。剿拳民则失众心，拒洋人则坚众志”。^③要对义和团“抚而用之，因其仇洋人，即以之御洋人攻洋人”。^④要“推广其法，行之各省，……俾家自为战，人自为兵”^⑤，使“处处是团，处处有备”^⑥，“中国二十余行省，四百余兆人，诚能亿众同心，何敌不克”。^⑦总之，在民族敌人深入国土的严重时刻，抵抗派主张“联拳灭洋”^⑧，这无疑有利于义和团的反帝爱国斗争。但是，抵抗派从他们本阶级的利益出发，企图利用义和团“御洋人攻洋人”，借以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因此，他们提出“抚而用之”的口号，想用招抚的办法，控制义和团，煽动义和团的排外心理，来湮没其反封建的性质，这显然有害于义和团运动的正常发展。

抵抗派代表统治阶级中、下层的利益，阶级地位决定了他们的态度是容易动摇的。在抵抗派人物中，有些侧重于制造抗战的舆论，如左绍佐、彭清藜、王会厘、王龙文等；有些则驰骋于疆

① 《翰林院编修王会厘呈》，《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266页。

② 左绍佐：《拟致军务处条陈》，《近代史资料》一九五六年第4期，第48页。

③ 《贝勒载灃折》，《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46页。

④ 左绍佐：《上李秉衡书》，《近代史资料》一九五六年第4期，第54页。

⑤ 左绍佐：《上徐桐书》，《近代史资料》一九五六年第4期，第41页。

⑥ 左绍佐：《致哈葛人（谷）书》，《近代史资料》一九五六年第4期，第51页。

⑦ 《翰林院侍讲檀璣呈》，《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223页。

⑧ 袁昶：《乱中日记残稿》，《义和团》第1册，第338页。

场，亲身参加抗战，甚至献出了生命，如在大沽保卫战中牺牲的罗荣光，在天津保卫战中牺牲的记名总兵李大川、营官守备孙祥云、游击苏豁然等。

面对着八国联军打进国土和亿万被压迫的农民群众的浴血奋战，民族资产阶级既害怕农民群众的反帝怒涛，又被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所吓倒，采取了结好列强、敌视农民的立场。毛主席说：“半殖民地的政治和经济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①民族资产阶级在义和团运动时期的立场，正是由他们的这种阶级性决定的。

资产阶级改良派康有为、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海外，组织保皇会，和孙中山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派相对立，堕落为保皇派。在他们看来，“今日议保全中国，惟有一策，曰尊皇而已”。^②因为载湉复辟是实行君主立宪的先决条件，而君主立宪则是富国强兵的不二法门。他们认为尊皇复辟的途径，有上策和下策之分，所谓上策就是乞求日、英、美联合干涉，胁迫西太后归政；所谓下策就是武装勤王，兴师以“清君侧”。

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康、梁等一面疯狂地咒骂义和团为“乱民”、“团匪”；一面幸灾乐祸地认为那拉氏“结‘匪’自蹈，激外自杀”，“亡可翘足而待”。就在这种情况下，康有为提出了起兵勤王“助外人攻团‘匪’以救上”的彻头彻尾的卖国口号。他主张依靠英国的支持，推翻那拉氏政府，然后在上海立国会，成立新政府，“迎上南迁，先布告各国，保护西人洋行、教堂等事，义军一起，即与各国订约通商，复我维新之治”。^③很显然，他们这个“维

①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133页。

② 梁启超：《尊皇论》，《清议报全编》卷3，第30页。

③ 《保皇会向海外华侨募款致各埠公函》。

新之治”，是在英帝国主义卵翼之下的，是以镇压农民革命、满足帝国主义的侵略要求为前提的，是对戊戌维新的反动。

梁启超也是兴师勤王的积极鼓吹者。他主张勤王军首先从广东发动，取广东为根据地，建立政府。他还规定了这个假想政府的内外政策。对外政策是：“（1）保护西人生命财产；（2）若用兵之地西人商务因我兵事而亏累者，我新政府必认数公道赔偿；（3）北京政府旧借国债，以海关作抵者，我新政府所管辖之地有税关者，即依其税关所抵之数照旧认还”。对内政策是：

“（1）将全国之地尽为通商口岸；（2）改正税则，豁免厘金；（3）国内人欲从何教，许其自由，政府不分别相待”。^①梁启超的这个施政方针虽然只是纸上空谈，并未变成事实，却十足地暴露了资产阶级保皇派的反动本质和丑恶面目。很明显，这六条政策的出发点，无非是要讨取帝国主义的欢心，满足帝国主义的欲望。执行这种政策的“新政府”，除了充当帝国主义的驯服工具，给中国人民带来更大的灾难，还能有什么结局呢？面对着严重的民族危机和革命农民的英勇战斗，康、梁等人竟堕落到如此丧心病狂的地步，连起码的民族利益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武装勤王的实际发动者是唐才常。他在上海创设自立会，组织自立军，联络长江流域的会党，策划武装勤王。他打着“讨贼勤王……以清君侧，而谢万国”^②的破旗，主张“请光绪帝复辟”、“不准伤害西人生命财产”、“不准烧毁教堂，杀害教民”、“不准扰害通商租界”^③，并且把“平内乱”^④即镇压义和团公然列为宗旨之一。他们幻想取得英帝国主义的支持，策动湖广总督张

① 赵丰田：《梁任公年谱长编》。

②③ 《大通起义安民告示》。

④ 孙仲愚：《日益斋日记长编》。

之洞搞两湖独立。这种与虎谋皮的反动活动，其结局不仅一无所获，反而被张之洞勾结英国租界当局所镇压。最后，唐才常也成了张之洞的刀下之鬼。

总之，这个时期的勤王活动，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保皇派在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作殊死搏斗中所进行的一种政治赌博。他们迫不及待的以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主权为赌注，押在帝国主义和买办官僚的身上，幻想依靠他们剿灭义和团，“谋保皇上复权”，以行所谓的“维新之治”，但结果却以惨败而告终，从此他们作为帝国主义走狗保皇派的丑恶面目也就暴露无遗了。

资产阶级革命派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坚持武力推翻卖国的清王朝，建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目标，发动了惠州起义。这是兴中会与保皇会、自立会的根本区别，是应该肯定的。但是由于阶级的局限，他们也骂义和团“妖言惑众，煽乱危邦”，在帝国主义的欺骗下，他们甚至拟借英国的力量“剿平”义和团和推翻清朝。值得注意的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派中也有少数人从爱国主义的立场出发，支持义和团的革命行动。有的人，如秦力山就痛感革命的必要，“主张乘时游说拳党首领”进行“革命排满”。有的人还公开发表《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一文，肯定义和团运动抵制帝国主义妄图瓜分中国的功绩，歌颂义和团“视死如归”、“前仆后兴”、“出于爱国之心”的革命精神，认为“义和团之揭竿而起也”，“开历史之辉光”，“茁固有民权之萌芽”。^①这表明在少数资产阶级革命派中，已经出现向农民群众寻求助力的动向。可惜，他们人数较少，影响不大。兴中会在义和团时期的表现，充分暴露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先天软弱性。

^① 《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59、60、61页。

三、义和团英勇抗击八国联军

八国联军的侵略战争，激起了义和团的英勇反抗。他们以无比英勇的革命行动，坚持了反帝爱国的革命路线，以鲜血和生命谱写了可歌可泣的战斗篇章。

天津、北京保卫战，是义和团反抗八国联军侵略战争的高潮。

一九〇〇年六月十日，英国海军司令西摩尔率领两千多侵略军，乘火车由天津向北京进犯。消息传来，京津铁路沿线各村庄（当时百分之九十的村庄都有了义和团的组织）的义和团立即动员起来，拆毁铁路、桥梁，拦击侵略军。十一日下午，侵略军刚刚爬到落堡，正在修复铁路的时候，武清、安次的义和团突然发起攻击，和侵略军展开肉搏战，打得侵略军伤亡累累。侵略军龟缩在车站和车厢里，凭借洋枪洋炮进行顽抗。义和团把附近村落大抬杆（一种老式土炮）拿来，猛烈还击，并乘势攻进车站，冲上车厢，杀死不少敌人。从天津乘火车去北京，本来只要三四个小时。但是西摩尔侵略军在义和团的阻击下，走了四天，才挣扎了六十公里，到达廊坊。十四日，当侵略军到达廊坊喘息未定时，义和团即向敌人发起猛攻。义和团战士个个“奋不顾身，直逼火车，持矛猛触”^①敌人，把侵略军打得失魂落魄。当晚，义和团再次攻击了留在落堡的侵略军，迫使西摩尔只好派兵回救落堡。第二天中午，两支侵略军会合后，又遭到大批义和团的攻击，战斗极其激烈，从中午一直打到天黑，义和团战士勇敢地挥

^① 李秋：《拳祸记》第84页。

动刀、矛，往返冲杀，使侵略军受到重大的伤亡。这时在沿途义和团的打击下，侵略军粮尽援绝、进退维谷。十八日，当侵略军从廊坊车站撤退，准备改由杨村水路进犯北京时，义和团和董福祥部的爱国官兵再次进攻廊坊车站。在枪林弹雨中，义和团战士争先恐后勇猛冲杀，一举消灭了几十名侵略军。十九日，西摩尔“召诸将议事，咸谓进京之路，水陆俱穷。且法军乏粮，他军缺弹药，惟回津之计可行”。^①但要从原路退回已不可能，因为沿途铁路已被义和团破坏，只好从杨村水路撤退。二十日，侵略军抢来六只木船，装运伤兵，其余的人伴随六只木船沿着河岸步行逃窜。因害怕义和团袭击，只好白天龟伏田间，晚上拚命狂奔。尽管如此，当侵略军沿途经过郎园、张家湾、横沟、赵庄子、北仓等地时，仍然遭到义和团以及爱国官兵的截击。据侵略者供认，他们一连几天，都是一面跑着撤退，一面在战斗中度过的，他们被义和团打得“势不能支，当即寻路逃散，亦有死伤者，抛弃……枪炮甚多”。^②二十二日，侵略军才逃到天津西沽，占领了清军把守的军械库，虽然天津租界近在咫尺，但侵略军再也不敢前进了，只好困守待援。直到二十六日，在以俄军为主的两千多侵略军的援救下，西摩尔侵略军才狼狈逃回天津。此次战役，西摩尔侵略军一共被打死七十多人，打伤二百余人，西摩尔手下军官三人受重伤，一人毙命，辎重皆失。事后西摩尔不无余悸地说：“义和团所用设为西式枪炮，则所率联军，必全军覆灭”^③。德皇威廉二世也说：这“使欧洲人在亚洲人面前丢脸，是没有任何疑问的了”。^④

① 李秋：《拳祸记》第8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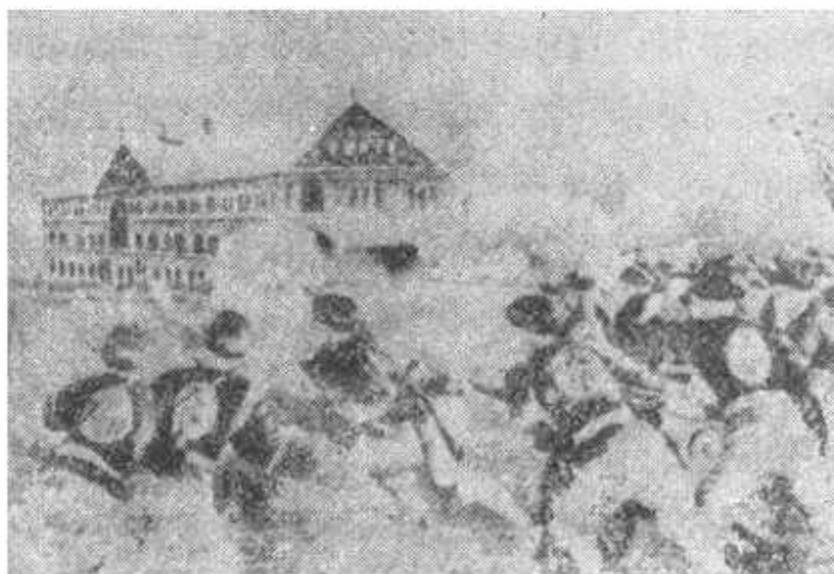
② 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义和团》第2册，第21页。

③ 上海广学会：《万国公报》辛丑年正月。

④ 《威廉二世谕布洛夫电》，《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2卷，第12页。

义和团在大败西摩尔侵略军的同时，进行了天津保卫战。六月十七日大沽失陷，侵略军大举进犯天津。当侵略军闯到陈家沟时，遭到义和团的迎头痛击，使“洋兵死伤不少”，终于败退。附近人民听到喜讯，纷纷给义和团送得胜饼和绿豆汤，“各铺户居民，皆用红纸书‘义和神团，大得全胜’八字贴门旁”。^①

老龙头火车站（天津东站），不仅是帝国主义要占领天津和入侵北京所必争之地，而且它隔海河与紫竹林租界区相对，是租界的一个通道。六月十五日晚间，义和团又火烧望海楼教堂，侵略军从租界窜出袭击义和团，“洋枪之声，彻夜不绝”。团民奋起抵抗，四百余人，合力相攻。侵略军败退下来，义和团乘胜追击，当追到老龙头火车站时，盘踞在那里的沙俄侵略军，向义和团开炮轰击，义和团伤亡很重。六月十八日，又有沙俄侵略军二千人，从大沽闯到老龙头火车站，用大炮轰击邻近的义和团驻地。在曹福田的指挥下，义和团奋起杀敌，激战十多个小时，杀死杀伤



义和团攻打侵占老龙头车站的沙俄侵略军

^① 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义和团》第2册，第16页。

沙俄强盗五百多名，狠狠地惩罚了沙俄侵略军，并把车站以北的沿线据点全部夺回。直到天津失陷前，曹福田指挥义和团，对老龙头火车站不断展开进攻。七月四日，义和团打得沙俄侵略军“万难支持”，“联军虽然强大”，“但终不能阻止”义和团的“暴烈行动”。七月十一日，义和团一举击毙敌人四十，打伤一百，给侵占老龙头火车站的沙俄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

义和团一面激战老龙头火车站，一面攻打紫竹林租界。

天津租界是帝国主义侵华的重要据点。早在大沽失陷前，帝国主义侵略军就以紫竹林租界为基地，屡次袭击义和团和屠杀手无寸铁的群众。义和团和爱国官兵，忍无可忍，立誓摧毁这个帝国主义侵华的桥头堡。

六月十七日，英、德等侵略军，为了控制海河两岸，企图强占位于英租界对角的河东武备学堂。学堂总监和教职员躲散一空，一些爱国学生奋起反抗。侵略军兽性大发，把据守房屋的学生全部烧死。义和团闻讯，赶来救援，迫使侵略军退回租界。义和团乘胜围攻租界。六月二十日，二千多侵略军从塘沽窜往租界，义和团在浮桥两端列队截击，奋勇冲杀，沉重打击了侵略军。据侵略军公布，这一仗义和团打死侵略军三十名，包括一名德国将军，打伤侵略军六十多名。经过义和团的多次猛烈进攻，租界里的侵略者被打得焦头烂额，胆颤心惊，赶忙“高挂白旗，以示不战”^①，企图缓兵待援。义和团识破了敌人的阴谋诡计，不让敌人取得喘息机会。六月二十七日，坚持“非一律扫平不可”^②的曹福田，向龟缩在租界的侵略者下了一道战书：“尔等自恃兵强，如不畏刀避剑，东有旷野，堪作战场，定准战期，雌雄立见，何必

^{①②} 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义和团》第2册，第18页。

缩头隐颈，为苟全之计乎。……神兵到处，一概不留。尔等……如愿开战，定准战期”。^①这份战书充分表达了义和团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把反帝斗争进行到底的坚强决心。但侵略军不敢离开租界到旷野，与义和团决战。义和团为了消灭侵略者，猛攻租界。七月一日，张德成率领团众会同聂士成部爱国官兵，杀向租界。据日本新闻七月二日报道，七月一日晚十一点钟时，“华兵欲来攻夺租界北面之桥梁，当为俄、法两国士兵开放枪炮击退。今晨两点钟时，华人又从东面攻入，战有两点钟”，“至午刻，西兵思欲驱散华人，冲突前进，力战有五点钟之久，未能取胜，只得退回。是役日兵阵亡武弁两人，兵士一人，法兵阵亡一人，受伤十二人，俄兵伤折更重”。^②

当时，张德成的“天下第一团”驻扎在租界边缘的马家口，象一把利剑直指敌人心脏。为了摆脱威胁，侵略军于七月六日晚偷袭马家口。张德成率领团民布下埋伏圈，歼敌大部，然后“乘势追下，并抵紫竹林交界，将附近租界一带之洋楼，焚烧多处。”九日又会同清军爱国官兵进攻紫竹林租界，“用炮轰毁洋楼一座，击死洋兵数十名”。^③侵略军为了固守老巢，在租界区的各个街口埋下地雷，妄图阻止义和团进攻。张德成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把几十头牛赶入布雷区，把敌人埋下的地雷全部破坏。义和团战士们立即冲入租界，挥舞大刀砍杀侵略军，并焚毁了日本三井洋行等建筑物。

在张德成“天下第一团”猛攻租界的同时，曹福田率领义和团联合部分爱国官兵，不断攻击老龙头火车站和法租界，毙伤侵

① 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义和团》第2册，第25页。

② 佐原笃介：《八国联军志》，《义和团》第3册，第192页。

③ 李秋：《拳祸记》第96、97、100页。

略军百余人。

义和团对天津租界的进攻，持续近一个月，毙伤大量敌人，打伤意大利司令官、英国戒严司令官等高级军官，炮击或摧毁英租界工部局——戈登堂、德军司令部和沙俄领事馆，打得敌人狼狈不堪，“相对而泣”。

在保卫天津的战斗中，义和团奋不顾身英勇杀敌，就连帝国主义分子也不得不承认：“华人此次甚勇敢，为从来所未见，向尚不信其有此耐战之心，目下观之，彼等之勇猛及耐心之处，较被围西人之心更胜矣”。^①由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和义和团爱国反帝精神的感召，一部分爱国官兵毅然参加了天津的反侵略战争，有的还加入了义和团，他们为保卫天津也作出了贡献。在义和团铁拳的打击下，侵略者丧魂落魄，哀叹“联军在天津被围，陆续不绝，或处于枪林炮雨之中，或处于将寡兵微之下，欲进不能，欲退不得，疲惫已极”^②，“伤亡甚重，内尤以俄兵受伤更巨。”^③侵略者还被迫一度计划退出天津。

但是，由于清政府推行卖国主义路线，一些前敌将领如宋庆、马玉昆等却置民族利益于不顾，在民族敌人杀进国土的时刻，竟然和侵略者夹击英勇抗战的义和团。他们不抵抗侵略者，但却“遇团即杀”，“尽力攻‘团匪’”，帝国主义乘机向租界大举增兵。十二日，在沙俄关东司令官阿列克赛夫的主持下，各国侵略军头子举行会议，决定在十三日清晨，派出侵略军五千人，分兵两路猛攻天津城。清朝的军政大员，不筹划战守，竟弃城而逃。裕禄、宋庆逃杨村，马玉昆退北仓，其余府县官吏纷纷逃往杨柳

① 佐原笃介：《八国联军志》，《义和团》第3册，第191页。

② 佛甫爱加来、施米依：《庚子中外战记》，《义和团》第3册，第299页。

③ 佐原笃介：《八国联军志》，《义和团》第3册，第194页。

青。人民，只有人民奋起抵抗。义和团和部分爱国官兵怀着保卫祖国的决心，同侵略军进行了英勇的搏斗。特别是在南门一带，“劲斗殊常，击毙日本大队长服部少佐，副将中村中尉，中队长吉泽大尉，日军死伤甚重。”^①这时，北京耶稣教美以美会派往天津递送情报的汉奸郑殿芳，将天津南面一段城墙曾经倒塌过很不坚固的详情密报日军。十四日晨，日军伪装成团民模样，混到城根，炸开那段城墙，侵略军乘虚而入。侵略军虽然侵占了南门，但被毙伤达七百五十多人，其中包括美军上校团长、法军司令等高级军官数人。这时坚守在东北角一带的义和团和部分爱国官兵，腹背受敌，在歼灭沙俄侵略军二百多人以后，被迫撤离。天津终于陷入敌手。

在天津保卫战的同时，北京义和团也同侵略者展开了激战。

一九〇〇年六月中旬，义和团大批进入北京后，各国侵略军和使馆人员、传教士等，全副武装集结于东交民巷使馆区和西什库教堂（北堂）。这批侵略者不断地向义和团进行挑衅，野蛮地残杀中国人民。康格在六月十五日的报告中供称：“使馆卫兵杀戮拳众近百人”。同日，有人亲见帅府院附近庙内义和团数十人“全被洋人杀毙”。^②六月十七日，克林德及其随员就打死义和团七人。英、美、日的“巡逻队”，在一个小庙里打死义和团四十六人。同一天，侵略者公然武力封锁东交民巷、东长安街和王府井大街一带，禁止中国居民通行。六月二十日，克林德在东单牌楼向神机营士兵开枪挑衅，士兵还击，克林德咎由自取，当场毙命。侵略军借机扩大挑衅，激起义和团无比愤怒，当天即聚集五、六千人，向侵略者盘踞的东交民巷发起猛攻。在义和团的攻击下，

^① 李秋：《拳祸记》第111页。

^② 《御史郑炳麟折》，《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55页。



义和团攻打东交民巷使馆区

不到三天，就有四个使馆被焚毁，迫使侵略军退守二道防线。在义和团的带动下，部分爱国官兵也参加了战斗。由于义和团夜以继日的攻击，侵略者的阵地越缩越小，尸体越堆越高。截止七月二十日，据侵略者自己的统计，法、日、德三国一百八十名侵略军，已死伤一百一十七名。其他各国侵略军也都伤亡累累，整个使馆区全线中炮约三千处，而“如再有三千弹，则无论何处，皆将摧毁无余，与地平矣”。侵略军官兵受伤治愈后重返前线者，“其气已较前为馁矣”。^①人民群众为了配合义和团打击敌人，也自动断绝了对使馆的粮食、蔬菜的供应，侵略者已成瓮中之鳖，危在旦夕。

六月十五日，义和团在攻打东交民巷以前，即已开始攻击侵略者的另一据点——西什库教堂。义和团和部分爱国官兵用炮轰掉了教堂钟楼的楼顶，炸毁了仁慈堂的东西两部分。在义和

^① 朴笛南姆·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义和团》第2册，第301页。

团强大攻势下，教堂内墙倒房塌。人民群众也同样自动断绝了对教堂的粮、菜供应。

义和团战士日夜奋战在攻打使馆和北堂的火线上，勇敢机智地打击敌人，使侵略者陷入绝望的困境。义和团的火攻，曾使敌人闻风丧胆。义和团的笳号声，也吓得侵略者胆颤心惊。事后一个侵略者还心有余悸地说：“闻此声，可以使人之血凝而不流”。^①在义和团的打击下，侵略者中有的因极度恐惧而精神失常，有的因绝望而自杀，曾经骄横不可一世的帝国主义分子，纷纷现出了纸老虎的原形。只是由于清政府的卖国行径，才使使馆区和北堂没被攻下。六月二十五日，清政府即在御河桥头立牌：“奉上谕保护使馆，即刻停止攻击，将有照会，自玉带桥递来”。^②清政府表面上派兵参加“攻打”使馆，而实际上却由军队“四面扎住，不许义（和）团帮打”，甚至“遇义和团亦用枪打”。^③清政府还“著荣禄速派武卫中军得力队伍，即日前往东交民巷一带，将各使馆实力保卫，不得稍有疏虞”。^④就连侵略者也说：“荣禄与法教士（指北堂主教樊国梁）友谊甚好，暗中维持，命军队不必猛攻，实有一种延缓之政策，与其所施于使馆者同”。^⑤七月十四日天津失陷，清政府更加恐慌，即派荣禄到使馆“求和”，又派人送去西瓜、冰、青菜、米面等。荣禄的武卫中军甚至“暗卖粮食军火”与侵略者。后来，那拉氏供认：“依我想起来，还算是有意意的，我本来是执定不同洋人破脸的，中间一段时期，因洋人欺负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动气。但虽是没拦阻他们，始终总没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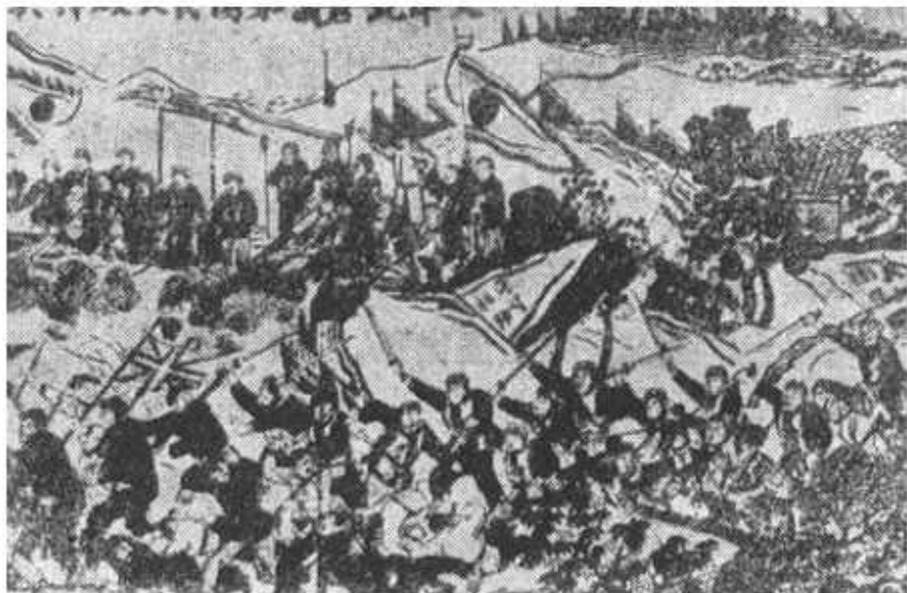
^{①②⑤} 朴笛南姆·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义和团》第2册，第216、265、293页。

^③ 袁昶：《乱中日记残稿》，《义和团》第1册，第348页。

^④ 《上谕》，《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44—145页。

他们十分尽意的胡闹，火气一过，我也就回转头来，处处都留着余地，我若是真正由他们尽意的闹，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①。这实在是一个难得的自白，以至于用不着加任何注释，就能使人看清其卖国贼的嘴脸。

清政府的屈膝求和，大大助长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它们为了镇压义和团，迫使清政府彻底屈服，以便勒索更大的特权，决定派兵攻占北京。八月初，八国联军近两万名，其中俄军四千八百人，占四分之一以上，从天津沿运河两岸向北京进犯。左岸是英、美、日三国侵略军，右岸是俄、德、法、奥、意五国侵略军。当时京、津之间，除数以万计的义和团以外，尚有清军多达数万人。四日，侵略军进逼北仓，马玉昆率军逃往武清，义和团大队数千人从附近各处赶到，会合部分爱国官兵，“血战良久”，毙伤俄兵六百余人，日兵四百余人，英兵一百二十人。六日，联军到达杨村，裕禄兵败自杀，宋庆率部退往蔡村。八日，李秉衡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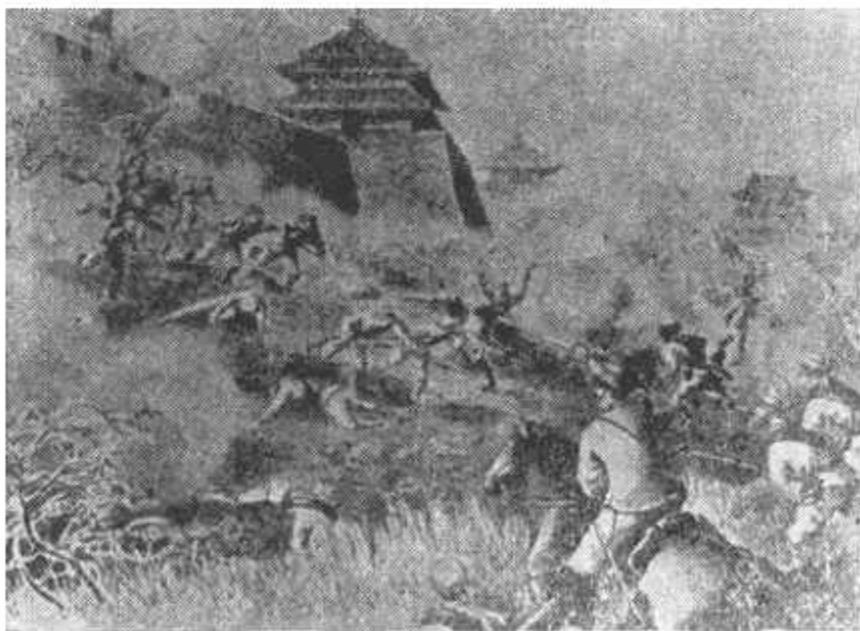


天津北仓义和团民大败 八国联军

^① 吴永：《庚子西狩丛谈》，《义和团》第3册，第438页。

帮办武卫军事务的名义，统率“勤王师”抵通州河西务，迎击侵略军，结果一触即溃。李秉衡败走张家湾，愧恨交集，于十一日服毒死。在自杀前，李秉衡上奏清廷说：“就连日目击情形，军队数万，充塞道途，就数日目击，实未一战。村庄巨镇，如河西坞、张家湾，俱焚掠无遗，小村亦然。身经兵火累累，实所未见。……兵将如此，岂旦夕之故”。^①这种惨败结局，完全是由于清政府奉行卖国主义路线造成的。在官兵纷纷溃散的情况下，唯有义和团“则日见其多”，他们“顽强地战斗着，既不存心投降，也无意临阵而逃”。义和团的英勇战斗，迫使侵略者每向前推进一步都得付出血的代价。

十三日，联军侵占通州，逼近北京。武卫军“闻洋兵欲至，相隔一舍（三十里）之遥而早遁也。”“旗兵神机、虎神等营，闻洋兵一至，如狼遇虎，而（如）鼠遇猫也。”^②当晚，沙俄侵略军首先进



义和团在北京朝阳门抗击八国联军

^① 李枋：《拳祸记》第11页。

^② 洪寿山：《时事志略》，《义和团》第1册，第92页。

攻东便门。义和团和部分爱国官兵奋起迎击，战斗“猛烈殊常”，毙伤沙俄军官安得罗果夫等多人。直到翌日傍晚，沙俄侵略军才爬进东便门。与此同时，日军向朝阳门、东直门发动攻势。义和团和部分爱国官兵“坚拒不下”，勇猛还击，打退日军的多次冲锋。十四日下午，日军袭用攻打天津南门的故伎，伪装团民和宋庆清军，骗开城门，一拥而入。当天，英、法、美侵略军也从广渠门侵入北京城。那拉氏挟载湉和亲信王公大臣，换便服仓惶逃离北京，奔向太原、西安，而义和团和部分爱国官兵，却怀着满腔仇恨，进行了顽强抵抗。他们筑起街垒，用枪炮、大刀、木棍、甚至拳头，同侵略军展开拚死战斗，打得敌人“面色灰白”，毙伤侵略军四百余人。



义和团抗击侵入北京城的八国联军

天津、北京保卫战虽然失败了，但是义和团前仆后继、英勇顽强的战斗，却为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史增添了极其光荣的一页。

在同侵略者英勇搏斗的行列中，青少年是一支生气勃勃的力量。他们在义和团运动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震惊中外的

“红灯照”，就是当时京津和北方许多地方女青年们的组织。她们在反帝斗争中，勇敢地冲破孔孟之道的绳索对劳动妇女的束缚，“不梳头”，“不裹脚”，走出家门，练习杀敌本领，与义和团并肩战斗，前方杀敌，后方锄奸，始终活跃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

“红灯女儿，一入兵阵，视死如归，惟恐落后”^①，她们决心要“远赴东洋，索还让地并偿二万万之款”。^②当时民谣说：红灯照“杀得东洋满天飞，杀得西洋投了降。有的吓得直磕头，有的吓得叫亲娘”。红灯照每隔几天就要进行一次武装示威游行，叫做“踩街”。她们高举红灯，紧握钢刀，齐声高呼“红灯照，义和团。亲兄妹，闹得欢！一个心，杀洋、官”^③的战斗口号，精神抖擞地走遍大街小巷。当时人称赞她们的战斗是“一振疲癯，不特寒众国之心，且壮中原之气”。^④红灯照的英勇斗争，充分表达了中国劳动妇女敢于与儒家的纲常名教决裂，敢于与外国侵略者血战到底的革命精神。红灯照的斗争，不仅为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而且为挣脱孔孟之道束缚的妇女解放运动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第三节 粉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迷梦

一、中外反动派绞杀义和团和《辛丑条约》的订立

那拉氏逃出北京以后，一面催令李鸿章迅速北上，授以卖国

①④ 林鹤年：《红灯照乐府》，《庚子事变文学集》下册，第1150页。

② 佐原笃介：《拳事杂记》，《义和团》第1册，第244页。

③ 刘崇丰：《义和团歌谣》第26—27页。

的全权，“便宜行事”，朝廷“不为遥制”，并加派庆亲王奕劻会同商办“议和”事项；一面下令镇压义和团。九月十七日，那拉氏在山西崞县发布“上谕”，无耻地叫嚣什么“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剿除不可。”通令清朝官兵对义和团要“严行查办，务净根株”^①。那拉氏心狠手毒，公然要用义和团的头颅作为向帝国主义投降的晋见礼。奕劻和荣禄秉承那拉氏的意旨，“飞饬直隶各军，如遇西兵，切勿开仗。”^②奕劻和李鸿章又向外国主子保证：“直隶一省，虽有联军未至之区，所有华兵将即刻退去”^③。李鸿章甚至“将中国兵队之防线形势，制成报告”给侵略军头目。这群卖国贼对外奴颜婢膝，对内却露出一副凶神恶煞的面孔，丧心病狂地指使清军配合侵略军大砍大杀义和团。

八国联军侵占京、津以后，立即分区占领，实行殖民统治。联军在天津成立殖民统治机构——都统衙门，由俄、英、日三国军官充当头子，统治天津、静海、宁河等广大地区。联军在北京成立“北京管理委员会”，镇压和盘剥北京人民。当时帝国主义为了扩大侵略，勒索更多特权，纷纷增兵京、津，八国联军总数多达十万人左右。为了协调侵略步骤，达到预期目的，在沙俄的支持下，由德皇威廉二世建议，经各国磋商同意，由德国元帅瓦德西任联军总司令。在瓦德西的策划下，八国联军分兵四出攻掠。九月末，俄、德两国合兵攻占芦台，接着俄军东下进犯山海关，英军从大沽乘军舰径取山海关炮台和火车站，德军先占领秦皇岛，十月二十日又夺得北塘，致使津榆铁路全线落入魔掌。十月十二日，英、法、德、意四国侵略军沿芦保铁路向南推进，矛头

^① 《西巡回銮始末记》卷1，《庚子国变记》第82页。

^{②③} 佐原笃介：《拳乱纪闻》，《义和团》第1册，第173、215页。

直指保定。此后，联军还北侵张家口，西侵娘子关、固关，威胁太原。联军所至，无不得到清军的密切配合。驻扎在保定的武卫军，奉李鸿章之命，大肆杀戮义和团。瓦德西说：“当联军（向保定）前进之际，常常发现中国军队与拳队相战之遗迹。各个城镇入口之处，多悬已斩拳队领袖之头，以欢迎联军。”瓦德西十分赞赏李鸿章、奕劻的反革命行径，表示“深信李鸿章及庆王均欲用其全力，以压服拳民运动。”^①由于清军与侵略军狼狈为奸，联合绞杀义和团，所以瓦德西得意忘形地说：“现在余已居然自认为攻打拳党之中国官军统帅矣！”^②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中外反动派的共同血腥镇压义和团，也正是他们联合尊孔丑剧的大表演。他们一个尊孔卖国，一个尊孔侵华，在镇压义和团这一点上，有异曲同工之妙。

以那拉氏为首的清政府，搬出孔孟之道作为对内镇压义和团，对外投降卖国的遮羞布。他们印刷吴桥县令劳乃宣的《义和拳（教门）源流考》，“分行有拳民各属”^③，妄图乞灵于孔老二的“正名”说教，证明义和团是“邪教”，“邪教乱国，治之以国典”^④是理所当然的，借以瓦解义和团，并为绞杀义和团制造理论根据。他们既宣布不能施“仁义”于义和团，又把保护侵略者说成是奉行“春秋之义，不戮行人”。^⑤无怪乎有人提出疑问：“此国家以仁待人耶？莫非另有用意乎？殊难解也”。^⑥这里的“以仁待人”，也确是另有“用意”，那就是投降卖国。正如鲁迅所揭露的那样，这帮卖国贼“大莫大于尊孔，要莫要于崇儒，所以只要尊孔

①② 瓦德西：《拳乱笔记》，《义和团》第3册，第30、129页。

③ 《复臬司（廷雍）电》，《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2辑，第59页。

④ 劳乃宣：《拳案杂存》，《义和团》第4册，第454页。

⑤ 《军机处寄署理福州将军善联等上谕》，《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39页。

⑥ 恒谦：《恒谦手札残稿》，《义和团》第4册，第426页。

而崇儒，便不妨向任何新朝俯首。对新朝的说法，就叫作‘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①

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和它的尊孔并进的。八国联军一边武力侵略中国；一边向清政府建议“熟筹安内和外之策”。^②怎样“和外”呢？著名的侵略分子李提摩太说：“必应斟酌时宜。……查失和之由，大抵因不用外人，……所以欲图振兴，必应请外国明晓中国情况之人，并从各国招延有才之人相助为理”。^③他公然要求清政府把军政大权拱手交给“明晓中国情况”的“洋儒”，对外国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儒家的“仁政”。他早就说过：“中国最重五常，唯仁为首，与西教之爱人如己，同出一源”。^④他认为“要永息教案，中国官待教民，当如待教外人，一视同仁”。^⑤在这里，孔老二的“仁”和西教的“爱人”，成了亲兄弟，“仁”成了爱侵略者及其走狗的代名词。侵略中国的另一个元凶沙俄，在争霸中国的竞赛中，吞并中国领土最多，干的伤天害理的事情最多，侵略态度也最蛮横。可是老沙皇的喉舌竟然恬不知耻地说：“本国办理外交，素以仁爱为怀，凡俄国所获利益，均系顺理成章，并无要挟”。^⑥参加八国联军出兵最多的日本，吹捧孔孟之道特别起劲，什么“文武周公之治世”啦，“孔子之大圣”、“孟子之大贤”啦，“孔孟仁义之国”^⑦啦，等等，说得天花乱坠。后起的暴发户德国，一面从事空前残暴的侵华战争，一面宣扬孔孟的所谓“王道”，用“王道”这块破布来为他们所干的侵略勾当遮羞。他们说什么“办

① 鲁迅：《花边文学·算账》，《鲁迅全集》第5卷，第572页。

②⑥⑦ 王其渠：《有关义和团舆论》，《义和团》第4册，第263、273、265页。

③ 《英教士李提摩太上李傅相书》，《庚子国变记》第366页。

④ 李提摩太：《新政策》，《戊戌变法》第3册，第238页。

⑤ 《记李教士议办晋省教案事》，《庚子国变记》第283页。

理东方之事，不可专意霸道，须向人徐徐开导，使民晓然无疑，如是则商务可兴，而教化亦推广矣”。^①镇压了义和团、侵占了北京和广大中国土地的八个帝国主义强盗，这时更俨然以孔孟之道的保护者自居了。他们打着“以示昭雪抵偿之意，而垂仁义大公之道”^②的旗号，勒令清政府为徐用仪、许景澄、袁昶昶、联元、立山等这些已死的卖国贼开复原官。他们还指责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是“殊悖万国公法，并与仁义教化之道均相抵牾”。^③孔孟之道说来也真够走运，在洋主子看来，它已经够得上与“万国公法”相提并论了。既然如此，那么帝国主义出动武装强盗屠杀义和团，逼令清政府彻底投降，就是维护“万国公法”、奉行“仁义教化之道”的正义行动了。

伴随着帝国主义尊孔而来的，是血腥的大屠杀。八国联军所到之处，疯狂地烧杀淫掠，犯下了滔天的罪行。在津、沽之间，沙俄把塘沽烧成平地，把北塘万户人家杀伤大半。在天津，城内但见死人满地，房屋无存，“俄人所踞之地，被害特甚，抢掠焚杀，继以奸淫，居民逃避一空”。^④在北京，凡义和团设坛之处，都被焚毁。法国侵略军把群众逼至死胡同里，然后用机枪扫射，直至全部杀死为止。庄王府被焚时，当场被活活烧死的就有一千七百多人。德国侵略军奉命“在作战中，只要碰着中国人，无论男、女、老、幼一概格杀勿论”。联军统帅瓦德西供认，联军所至“沿途房屋未经被毁者极为罕见，大都早已变成瓦砾之场”，“至

① 王其渠：《有关义和团舆论》，《义和团》第4册，第241页。

② 《各国钦使照会全权大臣请旨惩办罪魁及昭雪被祸诸臣公文》，《庚子国变记》第263页。

③ 《全权大臣奕劻李鸿章电报》，《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838页。

④ 佚名：《天津一月记》，《义和团》第2册，第157页。

少当有五十万人，变成无屋可居”。^①侵略军攻占北京后，曾公开命令全体官兵抢劫三天，而事实上，直至联军撤出北京，抢劫始终未曾停止过。从公使、各级军官、教士到士兵，无例外地都参与了抢劫活动。从皇宫、颐和园、各级官衙、王公府第直至民居，同样无例外地遭到了抢劫。皇宫、颐和园所藏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物、珍宝金银，包括《永乐大典》等数万册珍本图书，均被抢劫一空。日军从户部抢去三百万两银子后，立即放火烧房，毁灭罪证。北堂主教樊国梁，从立山家里一次就抢走价值一百万两银子的财物。北京的一个目击者写道：“各国洋兵，……俱以捕拏义和团，搜查军械为名，……在各街巷挨户踹门而入。卧房密室，无处不至，翻箱倒柜，无处不搜。凡银钱钟表细软值钱之物，劫掠一空，谓之扰城。稍有拦阻，即被戕害。……此往彼来，一日数十起”。^②一个印度籍的英国兵也说：“凡是士兵所需要的……都是



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纵火焚烧民房，
城内东南角一片断垣颓瓦

通过派出一队一队士兵去抢劫中国人的财产而得来的。……如果士兵需要一些东西，而中国人稍一迟疑的话，就免不了送命”。^③烧杀抢劫之外，侵略军还到处奸

① 瓦德西：《拳乱笔记》，《义和团》第3册，第29页。

② 仲芳氏：《庚子记事》第35页。

③ 转引自《义和团运动史论丛》第113页。

淫妇女，令人发指。

沙俄除了参与八国联军的暴行外，还在出兵侵占东北过程中，奸淫烧杀抢劫，犯下了滔天的罪行。

对于这些罄竹难书的暴行，就连联军统帅瓦德西也无法完全否认，他说：“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因抢劫时所发生之强奸妇女，残忍行为，随意杀人，无故放火等事，为数极属不少”。^①这些可恶可耻的暴行，再清楚不过地揭穿了帝国主义的“文明”、“理性”是什么东西！帝国主义者口口声声攻击谩骂义和团“野蛮”、“残暴”、“杀人放火”，可是，铁的事实却证明：真正野蛮、残暴和杀人放火的，正是帝国主义强盗自己：

八国联军一进攻，清政府很快就投降了。但是，从帝国主义强盗攻陷北京，到《辛丑条约》的正式订立，却拖了整整一年多的时间，这除了帝国主义为逼迫清政府彻底屈服以便取得更大特权外，更主要的是帝国主义之间争霸中国的斗争空前尖锐复杂。

帝国主义出兵镇压义和团时，都各怀鬼胎，企图在争霸中国的竞赛中，扩大自己的特权，抢占更大的地盘。随着军事的推进，以英、俄两个霸主争夺中国为中心的错综复杂的斗争日趋激



侵占北京的
沙俄侵略军的布告

^① 瓦德西：《拳乱笔记》，《义和团》第3册，第34页。

化。沙俄除参加联军外，还单独出兵十七万余侵占东北，并向清政府统治中心直隶扩张。英国除参加联军外，不仅操纵“东南互保”控制长江流域，而且南在两广策划“独立”，加紧扩张，以抵制法国势力，北向山东、直隶扩张，抵制俄国势力南下。美国图谋向直隶、浙江和福建扩展。德国除占山东外，极力向长江流域发展。日本企图进一步吞并福建，并对德占山东不满。法国企图吞并云南，反对英国在两广的扩展。各国对俄占东北都持反对态度，对英据长江流域则认为势难坐视。英、俄在争霸中，互相争夺控制清政府的大权。各国出兵“保护”使馆后，沙俄企图利用它出兵便利的条件，向清政府兜揽借俄兵“以平祸乱”的主张，目标是反对英国。英国支持日本提出反对，说如清政府单借俄兵，日兵必照加一倍。天津陷落后，沙俄企图阻滞联军进京，以换取清政府同意其增兵东北，主张那拉氏继续掌握政权，同意李鸿章任议和全权大臣。英国在长江流域和两广搞分裂，主张尽快占领北京，支持载湉复辟，不同意李鸿章任议和和大臣。在先撤兵后议和，还是先议和后撤兵问题上，各国也展开激烈斗争，实际是各自在挑选傀儡。最后英、日向俄、法作了妥协，承认“皇太后为合例”，并接受李鸿章为议和和大臣，交换条件是清政府接受各国提出的全部条件。此外，各国在联军统帅人选、联合军事行动和赔款数量、如何分配、偿付等等问题上，都充满了矛盾，都进行过拚命的争夺，为此各国公使争得不可开交，各国军队剑拔弩张乃至火并。

历史的进程使帝国主义渐渐认识到如若瓜分中国，势必引起中国人民更坚决的反抗和彼此因分赃不均而造成列强间的武装冲突。在这种情势下，美帝国主义所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就得到其他帝国主义的同意而被肯定了下来。

早在一九〇〇年七月间，正当义和团反帝怒涛汹涌澎湃的时候，美国就提出了第二次“门户开放”政策通牒。它除了进一步肯定“门户开放”的原则之外，特别强调了两点：

第一，“制止乱事扩张至中国他处，并防止其再生”；

第二，“保持（中国）领土与行政之完整，维护条约与国际法所保障之一切权利”。^①

前者就是说中国人民无权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而美国却有镇压屠杀中国人民的“自由”。

后者就是说美国决定采取“以华治华”的方针，维持清朝政权，形式上保持中国的“领土与行政完整”，通过它来“维护条约与国际法所保障之一切权利”，巩固和扩张各国尤其是美国在华的侵略势力。

十月，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接受了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十二月底，它们依据这个政策拟定了《议和大纲》十二条，强迫清政府接受。那拉氏见帝国主义主子仍愿保持她的地位，“曷胜感慨”，立即下令“所有十二条大纲，应即照允。”^②一九〇一年九月七日，奕劻和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同英、俄、美、法、日、德、意、奥、西、比、荷十一国代表，在北京签订了《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是空前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它共有十二款，另有十九个附件，其主要的内容是：

（1）军事控制清政府。帝国主义各国在北京东交民巷一带划定单独的使馆区，“中国民人，概不准在界内居住”，而侵略者却可以在使馆区“常留兵队，分保使馆”。帝国主义还强迫清政府将大沽炮台和从大沽到北京沿线的全部炮台“一律削平”，在

^① 《一九〇〇年美国外交文件》。

^② 《德宗实录》，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甲戌谕。

天津周围二十里内，不得驻扎中国军队。允许外国军队在北京和京榆铁路沿线的山海关、秦皇岛、昌黎、滦州、唐山、芦台、塘沽、军粮城、天津、杨村、廊坊、黄村等十二处地方驻扎。帝国主义还禁止把军火和制造军火的原料运入中国，以两年为限，如帝国主义认为必要还可以延长禁运期限。这样，清政府就完全处于帝国主义军事控制之下，名副其实地成为侵略者刺刀下的政府。帝国主义不仅可以随时用武力迫使清政府就范、决定清政府的命运，而且可以随时直接出兵镇压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2）勒索空前巨额的赔款。帝国主义发动八国联军侵略战争，目的之一就是最大限度地榨取和掠夺中国人民的血汗。因此，条约规定的赔款总数是最高限度的，即按当时中国人口计算，每人一两，共四亿五千万两白银，加上年息四厘，分三十九年还清，本息共计竟高达九亿八千二百多万两，再加上各省的地方赔款至少在两千万两以上，总数就超过了十亿两，等于清政府当时每年财政总收入的十二倍多。条约规定赔款要以海关税、常关税和盐税等作为担保，各通商口岸五十里以内的常关，也为海关总税务司管辖。这样，清政府的财政收入，除田赋外，几乎所有重要的税收，全都被帝国主义所控制。但是这些税收，仍然不足应付赔款的数额。于是，清政府便强迫各省每年摊派二千万两作为赔款之用。所有这些沉重不堪的负担，都统统转嫁到农民和其他劳动群众身上，而清政府从上到下的各级官吏以及地主豪绅乘机加摊加派，肆无忌惮的盘剥、勒索以自肥。中国的社会经济陷于崩溃的边缘，外债永无还清之日，中国人民更深地陷入被奴役被剥削的苦难深渊。沙俄在赔款中抢到了最大的一份，多达一亿三千零三十七万余两，占赔款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九，充分地表现出它的贪婪本性。沙俄的外交大臣拉姆斯道夫竟厚着脸皮

地说：一九〇〇年的对华战争，是历史上少有的“最够本的战争”。^①

（3）穷凶极恶地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条约规定：永远禁止中国人民成立或加入任何反帝组织，违者处死，清政府各级官吏“必须立时弹压惩办”人民的反帝斗争，镇压不力者，“立即革职，永不叙用”。这就从条约上明确规定了清政府作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看门狗的地位。帝国主义为了杀鸡给猴看，还勒令清政府惩办首祸诸臣，并在侵略者被杀、“被虐”的地方，“停止文武各等考试五年”。清政府依照帝国主义开列的名单，惩办各级官吏百余人。

（4）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专门指定皇族亲贵担任外务部大臣。从表面上看，这似乎只是一个行政机构名称的改变，而实际上却是帝国主义对中国内政的露骨干涉，帝国主义强迫清政府提高外务部的地位，确立对外投降的卖国方针，目的就是要使清政府成为地地道道的“洋人的朝廷”。

（5）清政府向侵略者“谢罪”。清政府分派王大臣赴德、日两国，为完全咎由自取而被杀的德国公使克林德、日本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谢罪”，并在克林德丧命的地方建立牌坊，对杉山彬“必须用优荣之典”。条约还规定在侵略者坟墓遭“污”掘之处建碑，“以昭涤垢雪侮之意”。从此，清政府对待侵略者就只有更加俯首帖耳了，而侵略者就更加骄横不可一世了。

《辛丑条约》是空前的不平等条约，它是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一副沉重枷锁，大大加强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掠

^① 罗曼诺夫：《帝俄侵略满洲史》第218页。

夺和控制。它也是清朝封建统治者给自己立下的空前的卖身契，标志着地主阶级完全投降了帝国主义，清政府彻底变成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大卖国贼那拉氏、载湫感激涕零地表示：此后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①，死心塌地充当帝国主义的走狗。

二、义和团高举“扫清灭洋”大旗继续战斗

天津、北京陷落后，义和团英勇不屈，继续坚持战斗。但是，由于中外反动派的联合镇压，革命与反革命力量对比的变化，义和团运动业已从高潮转向低潮。这时义和团的主力从城市撤退到乡村，化整为零，采用游击战术，英勇地反抗帝国主义和清朝封建统治。

一九〇〇年九月，清政府供认：“现在顺（顺天府）直（直隶省）各属‘拳匪’聚集处所，尚有三十余州县之多”。^②其中，以京津、直隶中部地区的义和团斗争较为激烈。

北京城内，义和团神出鬼没，袭击侵略军，捕杀洋教士，打击组织各种“安民公所”的汉奸，张贴揭帖号召人民奋起夺回北京城。在京郊一带，义和团更为活跃，大者“聚有数万”。西山八大处和良乡是义和团的重要据点，京郊义和团常在这里聚集。义和团攻破怀柔县城，杀死密云知县。黄村、海子、红门和三家店等地的义和团对侵略军进行了武装反抗。延庆地区义和团，在马子和的领导下，直到一九〇一年二月还在坚持反侵略斗争。

^① 《上谕》（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945页。

^② 《军机处寄护理直隶总督廷雍上谕》，《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618页。



英勇不屈的义和团

在天津城西一带，由刘十九领导的义和团，以高家村为中心，聚集了纵横三、四十里内的团民约两万人，势力达到数百里外的庆云、盐山。他们用缴获敌人的武器装备自己，扼险筑垒，主动出击，誓欲“灭洋”收复天津。张德成、曹福田退出天津后，在独流、静海组织力量谋复天津，但遭到护理直隶总督廷雍的杀害。十一月间，张德成的弟弟“在白河沟部署其众欲为乃兄复仇，自称静海王”。^①

在直隶中部地区，义和团首先于十月间奋起阻击进犯保定的侵略军。保定陷落后，义和团一面在城郊继续坚持战斗，一面在保定以东的扇形地区，即永清、雄县、任丘、蠡县、博野、祁州、献县、望都、正定等州县，惩罚“富户及教民”^②，抗击侵略军和清

^① 《汇报》第228号，第3册，第224页。

^② 佐原笃介：《拳乱纪闻》，《义和团》第1册，第195页。

军，并准备发动进攻“夺回保定”^①，“恢复北京”。^②

山东义和团也没有停止战斗。袁世凯供认：山东义和团、大刀会“多则数千为一股，少则数百人或数十人为一起，揭竿称乱，防不胜防……市言成虎，风鹤皆兵”。^③山东、直隶边境和胶东地区，是山东义和团活动的中心。

在山东、直隶边境，以德州为中心，形成了三个据点：德州地区以陈某为首的斗争；德州东北地区以孙玉龙为首的斗争；德州西南地区阎书琴余部的斗争。

十月间陈某领导义和团三千人，在德州大战清军梅东益部，法国侵略军二千人赶来伙同清军镇压。陈某率众转移到附近各县，坚持斗争。

在德州东北地区，孙玉龙把济阳、齐东、惠民、高河、邹平、章丘六县的义和团组织起来，孙玉龙任六县总大师兄、大元帅，在一定程度上统一了六县的义和团活动。九月，义和团在济阳杀死候补知县，打垮清军；还攻占阳信县城，“知县不知生死”。^④孙玉龙领导和影响的义和团，甚至深入到清朝在山东统治的巢穴——济南的郊外。

在德州西南地区，阎书琴在冠县梨园屯建立活动中心，聚众数千。八月，袁世凯派军队前往镇压。义和团奋起反抗，重创清军。虽然阎书琴因叛徒出卖而被捕牺牲，但余部仍继续坚持斗争。

胶东地区，义和团在高密、青岛、胶县、潍县、烟台等地，利用险要地形，时而数十成群、数百成伙的分散活动，时而整村数庄

① 佐原笃介：《拳乱纪闻》，《义和团》第1册，第228页。

② 《汇报》第238号，第3册，第301页。

③ 《山东巡抚袁世凯折》，《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749—750页。

④ 《邹平县稟》。

的联合斗争。十一月，在高密附近，义和团手持大斧、铁锤与德军搏斗，杀死二十七名鬼子兵。义和团还“四出伏击德军”，破坏德国修筑胶济铁路工程。在烟台一带，义和团切断烟台到津沽的电线，迫使敌人“电讯均由轮船递送，以致消息不灵”。^①

直隶、山东两省义和团的反抗斗争，到一九〇一年初，都先后被中外反动派镇压了下去。其他各省的义和团活动，也相继失败了。但是，义和团的火种并没有被消灭，经过短暂沉寂，随着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进一步勾结，人民生活的急骤恶化，他们又奋起斗争了。这次反抗浪潮，波及全国大部分地区，但以直隶和四川两省最为激烈。

一九〇二年四月，直隶广宗县景廷宾领导当地义和团和农民群众发动起义，并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扫清灭洋”的革命口号，矛头直指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朝统治者。

一九〇一年春，广宗知县和洋教士议定“教案赔款”一万多两。这样，农民除缴纳“正差正粮”外，还须每亩加派杂差。群众认为这是“洋差”，愤怒地宣布“中国人不纳洋差”，随即推举东召村武举景廷宾为首，聚众抗拒。一九〇二年三月清军进攻东召村，景廷宾率众奋起迎战，最后因寡不敌众，被迫撤退。四月，景廷宾转至巨鹿厦头寺，建“龙团大元帅”名号，竖“官逼民反”、“扫清灭洋”^②大旗，队伍扩大到三四万人。这支起义军的基本群众是广宗县联庄会^③的农民和山东义和团。景廷宾是广宗县

① 《汇报》第264号，第3册，第509页。

② 袁世凯《复陈广宗等处剿办情形并自请核议折》说：“景廷宾……竖旗造反僭称伪号，甚至有‘扫清灭洋’字样”（原件存明清档案馆）。

③ 联庄会，又叫团联会，当时大顺广道二十七州县均有。它原来是被地主绅士操纵的地方自卫武装组织。这个组织的成员还包括有许多自耕农民。《辛丑条约》订立后，随着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激化，广宗县联庄会的性质有了变化，成为景廷宾发动“扫清灭洋”的组织。

联庄会总团头；他的骨干分子如广宗的郑安治、南和的郝振邦（即老慈和尚）、威县的赵老祝（即赵三多），都是义和团的首领；山东义和团也多以柳林团的名义，参加起义的行列。景廷宾领导的起义军“呼官兵为贼，长官为狗”；在厦头寺附近解除了武卫左军后营管带鲍贵卿所募新军的武装，杀死士兵、随从等五十多名；宣布“格杀一洋人，赏钱一百吊，杀一教中人，赏钱十吊”；围攻威县张家庄法国天主教堂，在威县鱼堤村外杀死曾经抗拒义和团、血债累累的法国天主教神甫罗泽溥。景廷宾起义军的“扫清灭洋”活动，“颇得人心”，因而“各县商民，竭力供应”粮饷；直隶南部邢台、内丘、平乡、南和、任县、曲周、肥乡、柏乡、南宫、清河、新河、永年等地的农民以及河南、山东边境的义和团，纷起响应，在地跨直、鲁、豫三省，包括二十四个县份，掀起了革命风暴。

面对着声势浩大的革命风暴，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朝统治集团惊慌失措，清政府悬赏三万元缉拿景廷宾，并下谕说：“‘匪党’起于铁路矿山附近，关系交涉事宜，设法从速扑灭。若一时难平，须扼守东北要隘，俾其窜向西南，既安京师，又免外人借口”。直隶总督袁世凯命令大顺广道庞鸿书、营务处道员倪嗣冲、清河道袁大化“务将景廷宾拿获解省”，叫嚷什么“不得该犯，该道不得回任”。^①德、日军队四千多人、法兵二千三百多人，也从北京开往广宗、冀州一带“助剿”。五月清军包围起义军重要据点——广宗县件只村，用炮火猛攻，景廷宾率众顽强抵抗。经过激烈战斗，清军攻入村内，惨杀数百村民，起义军首领赵洛贵等牺牲，景廷宾率部突围而出，转战成安、临漳。六月，景廷宾等在

^① 《汇报》第379号。

临漳县郭家屯兵败被捕。袁世凯命令倪嗣冲把景解送到法国神甫罗泽溥被杀的威县地方，凌迟处死。七月，景廷宾在威县惨遭杀害。他在慷慨就义前对众高呼：“乡亲们！咱们的人到处有，今天杀了我，明天就会出现更多的景廷宾。”

与直隶景廷宾起义遥相呼应，四川义和团发动了“灭清剿洋”斗争。

一九〇一年五月，义和团在川东一带，通过揭帖提出“灭清、剿洋、兴汉”的口号，号召人民“各执武器，将发剪短”，“以光头现短发为记”，于端午起事。^①一九〇二年四川所属数十州县的义和团，先后掀起了“灭清剿洋”的斗争浪潮。四月，义和团首领李刚中率众八百余人进攻资阳县城。六月，资阳天鼓桥地方团众千余人夜袭英美教堂。在资州（资中县）“樵夫牧竖多有练习，号称灭洋仇教，所在教堂教民时有焚毁杀伤事。”^②首领凌天顺、曾洪春等人率众起义响应资阳的斗争。“川东各邑学习神拳者纷纷而起”^③，其中大足县杨可亭聚集永川、荣昌、大足三县义和团众，转战于永川、大足、铜梁、荣昌四县之间，抗拒清军，杀毙教士教民。以廖观音、曾阿义为首的义和团，战斗在川西平原上，“拥众数千，屡在石板滩、龙潭寺、苏家湾、三水关等处与官兵接仗。”^④上万的义和团众，在首府成都周围活动，吓得清朝大吏胆颤心惊。有人描绘当时的情景说：“拳民近郊，声打教堂，人言啧啧，官心惶惶，群聚督署，强颜筹商，不闻谋略，惟余恐惶。”^⑤川

① 四川大学藏原巴县档案，义和团专卷。

② 《资中县续修资州志》《兵燹》。

③ 《怡云馆文牒略存》。

④ 四川官报，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十六日至十九日刊。

⑤ 王增琪：《聊园诗存》。

北地区，义和团也“愈聚愈众，势愈久而愈炽”，官僚地主“风鹤频惊，民心惶惶”。^①川南地区的义和团也广泛活跃起来。

四川义和团兴起后，把矛头直指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朝封建统治。据反动派记载，义和团“始而打毁教堂，搜杀教民，继则无论民教，以打富济贫为名，择肥而噬，肆意掳杀，城内军火，搜劫一空。”^②义和团的斗争反映了人民群众的要求，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反动派哀叹：“‘妖酋’过境，邻民有挂红放爆者，其被煽一至于此。”“民有金钱向‘贼巢’而馈饷，遂使红巾遍野。”^③

人民拥戴，而中外反动派却残酷镇压。英、法等国派军舰至重庆、叙府（今宜宾）直接威胁川东、川南的义和团。清政府严令川督“认真查拿，净绝根株，以遏乱萌，毋稍大意。”^④八月，清政府派刽子手岑春煊督川“剿办”。他“严查保甲”，“整顿团练”，血腥屠杀义和团和广大农民群众。许多义和团首领，如廖观音、曾阿义等皆英勇牺牲，“扫清灭洋”风暴暂时被镇压下去。

一九〇二年直隶、四川义和团的斗争，是义和团运动的继续和发展。他们的最大特点，是鲜明地提出了“扫清灭洋”的口号。这标志着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觉悟有了显著提高。中国人民从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和某些义和团提出“扶清灭洋”口号而被清政府利用、出卖的历史教训中，看清了清政府投降卖国、充当帝国主义走狗的可耻嘴脸，认识到要反对帝国主义，就必须反对清朝封建统治，从而把“扫清”和“灭洋”结合了起来。

①② 四川大学藏原巴县档案，义和团专卷。

③ 《三水关纪事诗注》。

④ 《德宗实录》，卷498。

三、义和团的历史功绩

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虽然在中外反动派的联合绞杀下悲壮地失败了，但是农民英雄们抛头颅洒热血创造的历史功绩却是永垂不朽的。

义和团的英勇斗争，是中国人民的光荣和骄傲，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革命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

第一，义和团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彻底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迷梦。

义和团运动的主要锋芒直指帝国主义，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民高度的爱国热情和顽强的反抗精神，显示了中华民族无比充沛的生命力。经过义和团铁拳的教训，帝国主义者认识了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无可奈何地宣告瓜分中国政策的破产。八国联军头子瓦德西在给德皇威廉的报告中说：“皇上诚然常有瓜分中国的思想”，可是，“不应忘去者，即中国领土之内，……共有人口四万万，……彼等在实际上，尚含有无限蓬勃生气”。“中国所有好战精神，尚未完全丧失，可于此次‘拳民运动’中见之”。^①

“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②法国一个议员也说：“中国地土广阔，民气坚劲，……吾故谓瓜分之说，不啻梦呓也。”^③瓜分中国既不可能，那就只好扶植清政府，以华治华了。英国外交副大臣说：“中国此后仍须以华人治华地。凡有意开通中国之

① 瓦德西：《拳乱笔记》，《义和团》第3册，第86页。

② 佐原笃介：《八国联军志》，《义和团》第3册，第244页。

③ 王其渠：《有关义和团舆论》，《义和团》第4册，第245—246页。

人，应须小心谨慎，‘团匪’之事即可取以为鉴。”^①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熟悉中国情况，既看出义和团反抗精神的危险，又看出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大可利用，所以他主张“为今之计，列国当以瓜分为最后之一定目的，而现时当一面设法，顺中国人之感情，使之渐忘其军事思想，而倾服于欧人”。^②在他看来，最好的办法“莫如扶植满清朝廷”。^③帝国主义的如意算盘是：扶植清政府，作为奴役中国人民、扩大侵略势力的工具，最后变中国为自己的殖民地。

第二，义和团运动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走狗清朝，动摇了封建统治的基础。

义和团的反帝爱国斗争，是同反封建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义和团虽然把主要锋芒直指帝国主义，但在反帝的同时，并没有停止过“抗清”活动。义和团犹如晴天霹雳，震得清朝统治集团四分五裂。义和团揭露了清朝封建统治者卖国和反革命的真面目，冲击了上自皇帝下至地主老财，惩办了一批“羽翼洋人，趋炎附势，肆虐同群”^④的贪官污吏，多次粉碎清军的反革命围剿，把清王朝统治人民的“纪纲法度”打得“荡然无存”。经过义和团运动的打击，清王朝已经衰弱到这种程度：它既无耻地采取“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卖国政策，甘心充当儿皇帝，乞求帝国主义的联合保护；又被迫打起举办所谓“新政”的幌子，用来欺骗人民，拉拢资产阶级上层，借以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统治地位。

第三，义和团运动提高了人民的觉悟，推动了资产阶级民主

① 王其渠：《有关义和团舆论》，《义和团》第4册，第249页。

②③ 赫德：《中国实测论》。

④ 佐原笃介：《拳乱纪闻》，《义和团》第1册，第112页。

革命的发展。

义和团运动暴露了中外反动派的凶残和虚弱，显示了农民阶级的巨大威力；教育人民群众更加明确地认识到要反对帝国主义，就必须推翻清朝封建统治；促使民族资产阶级中更多的人看到要挽救中国的危亡，就必须联合农民群众革帝国主义走狗清朝的命。一九〇三年有人就提出：“支那民族经营革命之事业者，必以下等社会为根据地，而以中等社会为运动场。是故下等社会者，革命事业之中坚也；中等社会者，革命事业之前列也。”^①他主张中国革命要以“中等社会”即民族资产阶级为领导，以农民群众即所谓“下等社会”为“中坚”。因此，他号召资产阶级革命派要“与秘密社会为伍”、“与劳动社会为伍”、“与军人社会为伍”。^②这表明义和团运动促进了资产阶级左翼向革命转化，推动了资产阶级由与农民分道扬镳而趋向某种联合。

第四，义和团运动深深地影响着亚洲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

义和团的反帝斗争，削弱了帝国主义对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统治，推动了亚洲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义和团运动的消息传到朝鲜后，兄弟的朝鲜人民欢呼“义和团的壮举”，歌颂“义和团英雄唤起了人民宣誓消灭倭洋，形成万里长城般的巨大力量”，“倭洋再也不能立足于中国大陆了”，“是千载难逢的壮举”^③；并相继在左阜郡、济州岛发动武装起义，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义和团运动不仅影响着朝鲜，而且震动着整个亚洲。美国侵略者惊呼：“中国的暴动可能影响波斯和中亚细亚，并引

^{①②} 《民族主义之教育》，《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第408—409页。

^③ 崔泰镇：《义和团运动对朝鲜的影响》，《历史教学》一九五九年2月号。

起阿拉伯民族的总暴动。”“中国、印度、波斯和亚美尼亚现行秩序的垮台，文明的基础（应该读成帝国主义的统治基础）就会发生动摇。”^①帝国主义者所忧虑的事情，正是人民大众所高兴的事情。这说明义和团的铁拳打中了他们的致命处。

义和团农民英雄们的历史功绩，还在于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在义和团运动期间，世界上所有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都一起出动，扑将过来，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这说明帝国主义同中国人民是势不两立的，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而民族要独立，人民要解放，唯一正确的道路就是拿起武器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作坚持不懈的斗争。

义和团运动表明，中国农民阶级不仅是反封建的主力军，也是反帝的主力军。但是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可能最终完成反帝反封建大业的。由于农民的小生产的特点，使义和团的眼光受到限制，不能科学的分析复杂的阶级斗争形势，并在此基础上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提出正确的纲领、口号和斗争策略。他们反对帝国主义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他们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还处于感性认识阶段，他们的反帝斗争，还表现为笼统的排外主义。他们当中的大多数虽然把反帝和反封建斗争联结了起来，但是并没有解决推翻清朝封建政权、建立农民政权的问题。他们当中的少数人甚至受骗上当，一度接受了地主士绅提出的“扶清灭洋”口号，而放松了反清斗争。义和团在组织上也表现出小生产者分散性的弱点，拳坛林立，组织松懈，没有形成集中统一的领导，并且混进一批阶级异己分子而没有清洗出去。据《庚子记

^① 《亚丹斯书信》，《致海约翰》。

事》所载，“有希图分肥入团者，有与人挟仇借势报复者，……有富豪之人恐遭团民欺讹，自立坛场而谓保家者”。这些人都以其阶级的私利为轴心，朝秦暮楚，成了中外反动派破坏义和团的别动队。

义和团运动还表明，对待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态度，是检验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伟大导师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欧美工人的反资本斗争不把被资本压迫的千百万‘殖民地’奴隶最紧密地全部团结起来，那末先进国家的革命运动事实上只不过是一场骗局。”^①

正当中国人民英勇抵抗侵略，帝国主义叫嚷什么中国人“不文明”、“黄种人敌视白种人”等等以造谣和谩骂为他们的侵略罪行辩解时，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列宁为中国人民作了义正词严的驳斥，深刻揭露了帝国主义侵略的实质。他说：“是的，中国人的确憎恶欧洲人，然而他们究竟憎恶哪一种欧洲人呢？并且为什么憎恶呢？中国人并不是憎恶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是憎恶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谓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1856年英法对华的战争）的人，那些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②是的，中国人民憎恨那些把灾难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帝国主义者，是完全正当的。中国人民以革命的暴力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暴力，是完全正义的。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得到国际无产阶级的真正支持。

^① 列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31卷，第238页。

^② 列宁：《中国的战争》，《列宁选集》第1卷，第214页。

一切革命的蠹虫，为了从帝国主义的餐桌上捞取一点残羹剩饭，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摇旗呐喊。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分子们，公然站在帝国主义立场上，支持帝国主义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德国的伯恩斯坦无耻地鼓吹德帝国主义夺取中国的胶州湾是什么“必要的”。法国修正主义头子饶勒斯居然在国会中投票支持法帝国主义派兵镇压义和团运动。这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在对待民族解放运动问题上的叛徒嘴脸，不是暴露无遗了么？

第十章

粉碎沙俄的“黄俄罗斯”迷梦和 抗击英、俄侵略西藏

第一节 反对沙俄独霸中国东北的 “黄俄罗斯”计划

一、“黄俄罗斯”计划的险恶用心

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爆发后，沙皇俄国政府认为独霸中国东三省——黑龙江、吉林、盛京（今辽宁）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便乘机扩大对中国东北领土的侵吞活动。当时，沙皇政府的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就曾直言不讳地对财政大臣维特说：“这给了我们一个取得满洲的借口”，“我们将使满洲成为第二个布哈拉（布哈拉原是中亚的一个汗国，一八六七年被沙俄吞并）”。^①沙俄报纸则公然叫嚣要把“满洲辽东隶属我（即俄国）领土”之内。^②为了实现这一狂妄的侵略企图，“俄国资产阶级拟定了在满洲成立‘黄俄罗斯’的计划”。^③所谓“黄俄罗斯”计划，就是沙皇俄国企图通过武装占领和政治讹诈等手段，使中国东北大片领土变成俄国的殖民地，以达到它永远霸占东北、获得亚洲霸权的侵略目

① 《维特回忆录》。参考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4册，第49页。

② 《俄报对中国策》，《国闻报》一九〇〇年五月十四日。

③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版，第59页。

的。随着沙俄对中国的侵略步步加紧，“黄俄罗斯”计划的实际内容也逐步扩大。它不仅要吞并东北三省，还把吞并中国的蒙古、新疆和西藏，都囊括在“黄俄罗斯”计划的范围以内了。事实上，炮制这个狂妄的侵略计划，是沙皇俄国蓄谋已久的事情，也是它一贯奉行对外侵略扩张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早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沙皇政府就曾多次的举行特别会议，讨论如何从中国和朝鲜攫取不冻港的问题。一八九五年中日甲午战争还未结束，俄国的海军代理大臣契哈乞夫就提出要“占领满洲的一部分”。^①同年，俄国的外交大臣罗拔诺夫更提出“我们必须兼并满洲的若干部分”。^②一八九六年，阿穆尔总督杜霍夫斯科伊则更加露骨地表明，“假使整个满洲轻而易举并且能立即转入俄国的统治”，那我们就“在所有区域建立俄国政权”。^③

义和团运动兴起后，沙皇政府除了派兵参加八国联军，血腥地屠杀京津一带的义和团之外，还急不可待地推行“黄俄罗斯”计划。一九〇〇年七月中旬，它以“保护”中东铁路为借口，迅速调集十七万三千多名侵略军，分兵五路，大举入侵中国的东三省：一路由中东路北端，自满洲里越西兴安岭向齐齐哈尔进犯；一路由海兰泡渡黑龙江进攻瑗珲，越东兴安岭向齐齐哈尔推进；一路由伯力溯松花江向哈尔滨（当时属吉林省）进犯；一路由海参崴出发，经珲春、宁古塔向吉林进犯；一路由旅顺向奉天（今沈阳）进攻。沙俄侵略军先后占领了瑗珲、齐齐哈尔、哈尔滨、宁古塔、长春、营口、奉天等地。十月初，全部占据了东北各铁路线和主要城市。当时，沙皇尼古拉二世竟得意忘形地宣布，中国东三

①②③ 《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44、150、164页。

省的“南南北北都有了我们的军队”。^①俄国资产阶级的喉舌《新时代报》也狂妄地把我国东三省称作“黄俄罗斯”。沙俄的侵略气焰嚣张到了极点。

沙俄侵略军疯狂地推行野蛮的殖民政策，它们所到之处，大肆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一手制造了惨绝人寰的血洗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大惨案，对中国人民欠下了笔笔血债。

海兰泡（原名哈喇泊。哈喇是满语黑的意思，泊或泡都是汉语）位于黑龙江省瑷琿县黑河镇的对岸，本是中国的一个居民村，后被沙俄所侵占，改名布拉柴维申斯克。这里的居民半数以上是中国人，多半是工人和商人。海兰泡惨案是沙俄蓄意制造的。一九〇〇年七月上旬，海兰泡的俄国当局通知中国居民说，中俄两国打仗，要把你们送过江去，各家不许闭门上锁。七月十五日下午，沙俄军队突然封锁黑龙江，扣留了全部船只，不准中国居民过江。并在当晚到处搜捕，把他们驱往黑龙江边。凡是走不动的，都被他们活活杀死。七月十六日，沙俄出动大批步兵和骑兵，挥动武器，刀劈斧砍，枪杀棒击，还用战马践踏，甚至把中国居民推入江中活活淹死。“海兰泡中国商人五千余人，一日尽沉诸江。”^②被枪杀、淹死的中国居民，象冰排似的顺江而下，他们的鲜血染红了波涛滚滚的黑龙江。被杀害的中国居民有上万名，只有极少数人泅水过江，幸免于难。这就是骇人听闻的海兰泡大惨案。

紧接海兰泡大惨案，沙俄强盗又扑向江东六十四屯。江东六十四屯位于黑龙江东岸，从瑷琿县黑河镇对岸的精奇里河口处起，往南直到孙吴县霍尔莫勒津屯对岸，地势辽阔，居民万余，

^① 罗曼诺夫：《帝俄侵略满洲史》第211页。

^②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640页。

是我国人民世代居住的地方。就是根据一八五六年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的《璦琿条约》规定，中国居民不仅有权在这里“永远居住”，而且中国政府在这里也有永久的管辖权，“俄人不得侵犯”。但沙俄在割占中国黑龙江以北的大片领土后，对仅剩下的这块领土，也垂涎三尺。一九〇〇年七月十七日，野蛮成性的沙俄强盗，竟疯狂地对江东六十四屯的中国居民实行了残酷大屠杀，他们到处放火烧房，驱赶中国居民。把搜捕到的中国居民或集中在几个大屋子里活活烧死，或者赶到江边，一齐推到江里，淹不死的就枪杀在江中。这样，就使大批中国和平居民惨遭杀害。八月初，沙俄侵略者又放火焚烧具有悠久历史的璦琿古城。它们前前后后在海兰泡、尼布楚、司特例津、伯力、海参崴等地屠杀中国居民不下二十余万。“璦琿失后，杀戮尤惨”。^①当时，列宁愤怒地谴责了沙俄匪徒这种惨绝人寰的暴行。他指出，沙俄帝国主义象野兽一样疯狂的侵略中国，“它们杀人放火，把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②“沙皇政府在中国的政策是一种犯罪的政策”。^③

在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大惨案之后，沙俄阿穆尔地区军事长官格里布斯基，于八月十二日颁布《条例》，猖狂地叫嚣：“我宣布：其居民根据《璦琿条约》规定一直归中国当局管理的前满洲外结雅地区（即江东六十四屯），及阿穆尔河（即黑龙江）右岸为我军占领之满洲土地，已归俄国当局管辖；凡离开我方河岸的中国居民，不准重返外结雅地方，他们的土地将交给俄国殖民者

①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641页。

②③ 列宁：《中国的战争》，《列宁选集》第1卷，第215、217页。

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宣告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一九二一年，在无产阶级队伍迅速壮大和马列主义广泛传播的基础上，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从此，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以新的革命理论，新的阶级阵容，展开了新的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新篇章。

“一唱雄鸡天下白”。^①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革命战争，终于在一九四九年，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旧中国的反动统治，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创建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过去那种受帝国主义欺凌和国内反动派压榨的苦难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并昂首阔步、坚定不移地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中国的历史经验，是极其丰富极其深刻的，集中到一点，这就是：“整个革命历史证明，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胜利了。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国家的任何别的阶级，都不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达到胜利。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曾经多次领导过革命，都失败了，就是明证。”“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②“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③

① 毛泽东：《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毛主席诗词》，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版，第27页。

②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1368、1360页。

③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的范围加以扩大，炮制了一个《俄国政府监理满洲之原则》。这个“原则”的主要内容是：（1）俄军“临时占领满洲”；（2）迫使中国政府所谓“自愿放弃在满洲之军备权”；（3）由俄国远东军事长官监督清朝东三省的“将军与副都统之行动”，并监督他们“不要扩充军队，不要扩充警察”；委派将军与副都统必须与俄国驻华公使“商妥”；（4）俄国另派外交代表监督中国东北的“外交”；（5）设立军事法庭，“治理”中国居民中“攻击俄国军队或污辱俄国军队长官之罪行”。^①

显然，这个所谓《监理满洲之原则》，是沙俄企图变中国东北为其独占殖民地的侵略纲领，它名义上保存中国东北的行政管辖权，实际上是把中国东北全部置于沙俄阿穆尔军区和关东军司令官的双重控制监督之下。沙皇尼古拉二世立即批准了这套“原则”，企图迫使清政府予以承认。但是，当时沙俄考虑到北京还在八国联军的控制之下，谈判的秘密容易暴露，加之那拉氏已逃往西安，不便直接施加压力，因此，唆使卖国贼李鸿章“请两宫移蹕盛京，在彼与各国开议和局”。^②李鸿章虽然未敢向清政府提出此项要求，但却明目张胆地配合沙俄侵略者扶植增祺傀儡政权。当他得知增祺同沙俄签订了《暂且章程》的报告后，不仅蓄意为增祺遮掩，拖延不报，还告诫增祺等人遇事要“勿稍掣肘，俾臻妥协”，怂恿增祺一伙放手卖国。

但是，《暂且章程》签订的消息传出后，立即引起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和强烈反对，一致要求废除这个卖国的“章程”，坚决收回东三省。清政府慑于人民群众的强大压力，将私自“擅立约章”的增祺革职，并拒绝承认这个《暂且章程》。对此，沙俄提出

^① 参阅罗曼诺夫：《帝俄侵略满洲史》，第222—224页。

^② 李鸿章：《寄彼得堡杨使》，《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28，第24页。

所谓“抗议”，说此明系与俄为难，等等。李鸿章却站在卖国主义的立场上，替沙俄帮腔，要求清政府“俯顺洋情”，并电告增祺，要他“照常办事，联络俄人”。^①清政府随即表示妥协，恢复了增祺的官职，让他继续充当沙俄刺刀下的傀儡。但是终因《暂且章程》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和各帝国主义基于切身利益而出面“干涉”，沙俄政府被迫表示同意“废约”，因而出现了前后长达一年多的废约交涉谈判。

二、沙俄假“废约”、真侵占的诡计

沙皇政府假惺惺地同意废约谈判的真实意图，仍然是想借谈判之机迫使清政府签订一项由它独占中国东北的正式条约，以便使“黄俄罗斯”计划合法化。但它深恐在北京谈判会引起其他帝国主义的干涉，而在彼得堡谈判，却容易为自己所操纵。因此，它提出要清政府派代表去彼得堡谈判。李鸿章完全站在沙俄的立场上向那拉氏建议说，东三省关系重要，“此事应由俄外、户、兵三部主持，自宜在俄商订为妥”。^②清政府在李鸿章的主使下，于一九〇一年一月，命令驻俄公使杨儒在彼得堡同沙俄政府进行谈判，并要杨儒在谈判中，随时与奕劻、李鸿章电商，“互相参酌”。^③

杨儒在同沙俄财政大臣维特的头两次谈判中，曾明确指出，《暂且章程》所订各款“关系甚重，中国吃亏未免太甚”，“不但夺其兵权，且干预内治，侵我主权”；因此，这些条款，“断难照办”，

① 李鸿章：《寄旅顺增将军》，《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31，第18页。

② 李鸿章：《寄西安行在军机处》，《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30，第16页。

③ 李鸿章：《寄彼得堡杨使》，《李文忠公全集》卷30，第29页。

最好的办法只有俄国将我东三省“完全交还”。^①对于这一正义要求，沙俄政府非但不予理睬，反而提出了一个“内容之狠毒，较增祺暂约尤甚”^②的维特口述十三条款（以下简称《十三条款》），主要内容有：中国驻兵东三省须与俄商定；东北三将军之委任由俄国支配，三将军的工作由俄国派员监理；金州划归俄国旅大租借地；东北关税由俄国代管；俄国“购买”山海关到营口的铁路；东北、蒙古及中国北部地区，不经俄国同意清政府不得将任何权益让给他国，也不准中国在此地区内建造铁路；这些条件得到满足后，俄国在东北的军队即“约定年限，分批撤退”。^③以上条款不仅保留了《暂且章程》的主要内容，而且远远超出《暂且章程》所定各项权益范围。沙俄侵略者不容杨儒辩驳，就要杨儒代表“中国允从”。^④其凶狠蛮横可想而知。

但是，杨儒当即看穿了沙俄炮制《十三条款》的险恶用心，断然拒绝签字。沙俄侵略者一计不成，又生一计，采用改头换面的卑劣手法，依据《十三条款》的内容炮制出一份“约稿”，于一九〇一年二月十六日正式抛了出来。这份约稿共十二款，其要点包括：俄国允将满洲全行交还中国，吏治一切照旧；禁止清政府向东北运送军火；沙俄得于东北继续驻兵，凡东北“将军、大员办事不合邦交（即不符合沙俄利益）”，一经沙俄“声诉，即予革职”，中国北境水师陆军，不准他国人“训练”；中俄边界的东北、蒙古“及新疆之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阗、于阗等处，矿（产）路（铁路）及他项利益，非俄允许，不得让与他国或他国人，非俄允许中国不得自行造路”；中国应许俄国“自干路或支路向京造一路，直达长城”。^⑤这不仅是一个并吞东北的“约稿”，而且

^{①②}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4卷，第68、69页。

^{③④⑤} 参见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4卷，第70、71、102—104页。

还将蒙古、新疆都划进沙俄的势力范围，其内容大大超出了《暂且章程》和《十三条款》的侵略要求。可见，沙俄表面上答应交还东北，只不过是骗人的幌子，实际上它的侵略胃口越来越大，气焰愈益嚣张了！它想一口把中国的东北、蒙古和新疆整个地吞噬下去，建立起一个与西伯利亚相连接的“黄俄罗斯”。

“约稿”提出后，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也不愿沙俄独占满、蒙，它们纷纷出面干涉，劝清政府拒签俄约。李鸿章这个大卖国贼却立即出面“庇俄”。他在接到英、美、日、德四国公使向他所提出的“公约（指辛丑条约）未定以前，中国不得与他国立约”的警告后，不仅为沙俄侵略中国百般辩解，而且公然贩卖与俄立约势在必行的谬论。李鸿章出卖东北的这一阴谋，曾被他的政敌、亲日英的买办军阀张之洞、刘坤一所揭破，说他“偏执己见，……为俄人所愚”。^①李鸿章不肯示弱，反唇相讥，说张、刘力阻俄约，显系“为日人所愚”。^②他们之间的齟齬倾轧，反映了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争夺中国的矛盾，同时也进一步暴露了李鸿章这个沙俄走狗的丑恶面目。

在彼得堡的谈判桌上，沙俄代表强迫杨儒画押，并威胁说，“约稿”已无可再改，否则武员必另生枝节，“强割满洲”。但杨儒终究在群众拒签俄约的强大压力和推动下，表示约款必须“无碍我政权、兵权、利权”方可，并对“约稿”各节逐条驳辩，断然拒绝了沙俄这些侵略要求。

沙俄政府大失所望，便要弄诡计，变换花招，于一九〇一年三月十二日提出了一个最后“约稿”十一款，交给杨儒。这个最后“约稿”与二月十六日的“约稿”并没有什么不同，虽然关于沙

^{①②} 《盛宗丞转西安来电》，《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39，第24页。

俄在中国蒙古、新疆享有利益一条不见了，但最后“约稿”第十款却规定，铁路赔款准用他项利益相抵。言外之意，是说俄国随时都可据此向中国索要其他地方路、矿、关税等项利权。“约稿”提出后，沙俄立即强迫杨儒在两周内签字画押，不准更改一字^①，并恫吓说：俄国政府将于四月一日召开会议，把满洲变成俄国的行省，如逾期不签字，东北三省永不归还给中国。卖国贼李鸿章一意坚持卖国路线，他在接到杨儒告急电后，急忙电告杨儒，胡说什么中国“势处万难，不能不允”，应“酌量画押，勿误”。^②随后以那拉氏为首的西安逃亡政府也电令杨儒，让杨“全权定计，朝廷实不能遥断”。^③实际上是要杨儒放手卖国。沙俄得知这一情况后，就千方百计地抓住杨儒，逼他在这个条约上签字画押。但杨儒与李鸿章不同，虽然他遭到沙俄的百般胁迫，仍拒不签字，并对沙俄诱使他在卖国条约上签字的种种丑恶行径进行揭露。在沙俄限定的画押日期迫近时，沙俄财政大臣维特竟无耻地说什么：中国政府“如欲加罪于与俄国订约之人，俄必出场保护”^④，明目张胆地要杨儒充当卖国贼。杨儒当即愤怒地指出：我是“中国官员，欲求俄国保护”，未免“太无颜面”！^⑤顶的维特哑口无言，愤愤离去。此后，杨儒在返回使馆途中跌伤，不久去世。他至死没有有在“约稿”上签字。

这时清政府看到各阶层人民群情激愤，反对签押俄约；加上各帝国主义不断出面干涉，害怕一旦签约会引起各国“效尤”，因此便表示：“中国不敢遽允俄约画押”，要先议公约，再议专

①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4卷，第134页。

② 李鸿章：《寄彼得堡杨使》，《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34，第4页。

③ 《盛宗丞转西安来电》，《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34，第6页。

④⑤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4卷，第139页。

约。^①但李鸿章却不以此为然，而一意为沙俄吞并东北效劳。他恫吓清政府说：“若不切实电令画押，俄必决裂，祸患即在目前”^②，催促清政府迅速地在俄约上签字画押。李鸿章的卖国活动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和申讨。他正是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于一九〇一年十一月七日结束了可耻的一生。据闻，在李鸿章临死的前夕，沙俄侵略分子还闯入他的病房，要他履行约言，签订出卖东三省的条约^③。

李鸿章、杨儒死后，清政府继续与沙俄进行交涉。但是沙俄政府一再制造借口，拒不交还东三省。直到一九〇二年四月，由于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和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矛盾激化时，沙俄才被迫同中国签订了《交收东三省条约》。条约规定：俄军自签字起十八个月内分三批撤完，头六个月“撤退盛京省西南段至辽河所驻俄国各官军，并将各铁路交还中国”；再六个月撤退盛京其余各段之官军及吉林省内官军；再六个月撤退其余之黑龙江省所驻俄国各官军。^④条约还规定，“并不可准他国占据俄国所退各地段”。^⑤撤兵条约的签订并不意味着沙俄独霸我国东北的野心有所收敛，撤兵条约是它迫于形势用来装饰门面的。因此，沙俄在勉强将辽西的侵略军撤退后，就再不肯履行条约规定按时撤兵了，反而向中国提出七项无理要求：（1）中国不得将东三省之地让与他国或租赁与他国；（2）自营口至北京电线，中国宜许俄国别架一线；（3）东三省无论欲办何事，不得聘用他国人；（4）营口海关税，允归华俄道胜银行收储，税务司必须用俄

① 《盛宗丞转西安来电》，《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34，第16页。

② 李鸿章：《寄西安行在军机处》，《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34，第20页。

③ 参见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4卷，第156页。

④⑤ 北京大学法律系国际法教研室编：《中外旧约章汇编》（2），第40—41页。

人，并予以税关管理检疫事务；（5）东三省除营口以外，不得开为通商口岸；（6）蒙古行政悉当仍旧；（7）北京事变（指义和团运动）前，俄国所得利益，不得另有改变。

接着，沙皇就任命侵略中国东北的俄军司令阿列克赛也夫为远东大总督，悍然把中国东三省当作沙俄的殖民地进行统治，以遂其变东北为其“黄俄罗斯”的心愿。但是，在富于光荣革命传统的中国人民面前，沙俄侵略者的“黄俄罗斯”计划是永远不会得逞的。随着沙俄对中国东北的侵略的步步加紧，中国人民的反抗怒火也越烧越旺起来了。

三、“御俄寇”，“复国土”

沙俄对东北的侵略和清政府的卖国投降路线，激起了中国人民、特别是东北人民的极大愤慨。东北地区的人民群众、义和团以及清军中的一部分爱国官兵，不顾清政府的压制和阻挠，奋起抗击沙俄侵略军，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俄运动。

一九〇〇年七月，沙俄侵略军向瑗珲发动猖狂进攻时，瑗珲副都统凤翔率领清军多次打退俄军的进攻。八月初，俄国集结一万多人，分兵三路猛扑瑗珲城。凤翔在当地义和团的大力支援下，仅率三千多名守城清军顽强抵抗，痛击俄军的进攻。但因众寡不敌，瑗珲被俄军攻陷。凤翔率领清军退至兴安北大岭伏击沙俄侵略者。他亲自督战，出其不意地向俄军冲杀，毙伤俄军甚多。战斗中，凤翔身负重伤，三次落马，都复跃马背，誓死以战，直到牺牲。驻防呼伦贝尔地区的清军，在海拉尔一线同俄军接连鏖战，曾踏破俄营九座，大挫俄军兵锋。但因兵力过于单薄，清军大部壮烈牺牲。防守松花江的清军爱国官兵，曾击沉俄

舰两艘，击毙俄军二百多人，给沙俄侵略军以有力打击。七、八月间，黑龙江将军寿山曾命令驻防哈尔滨一线的清军主动会同当地义和团，多次围攻盘踞在哈尔滨的沙俄侵略军，打得沙俄侵略者“坐卧不宁”。

东北人民还自动组织义军，英勇抗击沙俄侵略者。俄寇所到之处，义军“遍野”，“几乎无时不有，无地不然”。^①特别是以哈尔滨地区为中心的沿中东路附近的广大农民、筑路工人，由于饱受沙俄的残酷压榨和俄军的蹂躏，更加不能忍受，群起反抗。以大青山（哈尔滨东南）为根据地的各支义军，经常活动于哈尔滨周围许多州县，不时主动地出击歼敌。例如，一九〇〇年刘振棠领导的义胜军曾攻入沙俄侵略军占据的呼兰城。义胜军撤出该城后，又有一支义军攻袭呼兰城，迫使“俄军溃出”。^②到一九〇一年初，呼兰义军与其他义军汇合，转战于呼兰、木兰和巴彦等地。四月十七日，义军突入巴彦，焚毁县署，“袭俄兵营”^③，远近震惊，给予敌人以沉重打击。

少数民族也积极参加抗俄斗争，沿黑龙江流域的各族人民积极配合爱国清军防御边疆，主动为清军侦察敌情，打击沙俄侵略者。

在吉林敦化、蛟河一带，义军的活动蓬勃兴起。主要队伍有刘罗锅子率领的义军从黑龙江南下，和沙俄侵略军及地方清军多次交锋。韩甸沉和孙楼等领导的义军活跃于敦化和蛟河地区。他们曾分路进攻敦化县城，同俄军激战。另外，杨玉林领导的义军，曾在磨盘山一带同俄军激战，打死“俄官一员，俄兵数十

① 《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1218页。

②③ 《黑龙江志稿》卷32，武备兵事。

名”。^①后来这支义军归入忠义军，使忠义军的队伍增添了一支重要力量，声威愈振。除以上各支义军外，东北各地人民自发组织起来的群众队伍随处皆有，随时给予沙俄侵略者以严重打击，如在依兰崇古尔库就有一支义军击毙俄军十多人，“俄兵败走”。^②在义军打击下，使盘踞在吉林的沙俄侵略者胆战心惊。一九〇〇年末，吉林将军长顺无可奈何地哀叹：“各处‘土匪’四起”，以至“往往俄军前往剿办，亦屡受挫失”。^③加之这些义军采用游击战术，更使敌人摸不着头脑，处境十分狼狈。

在东北的抗俄队伍中，以活跃在辽东地区的忠义军，力量最为强大。

忠义军是一支主要由农民、猎户、路矿工人、伐木工人和义和团余部组成的抗俄队伍。这支队伍提出了具有强大号召力的“御俄寇”、“复国土”^④的响亮战斗口号。一九〇〇年七月，忠义军在珲春一度给沙俄侵略军以有力的打击。珲春失守后，忠义军被迫南退，途中不时与沙俄侵略军进行战斗。由于忠义军坚决抗击沙俄侵略者，又有明确的战斗口号，很受东北人民的拥护，所以这支队伍很快发展到二十万人，吉林南部和辽宁东南部的海龙、兴京、桓仁、凤城、大孤山一带，“纵横数千里”^⑤，都为忠义军的势力所控制。面对凶残暴虐和武装精良的沙俄侵略军，忠义军机智勇敢，运用灵活的战术，随时袭击敌人。他们白昼埋伏，黑夜袭营；或趁敌疲惫，“出其不意击之”；或分成小队伏于侵略军的据点周围，然后诱敌出动，半路截击。仅据部分文献记载，一九〇一年就先后在通化冈山二道沟、桓仁二棚甸子、新宾

①②③ 《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1090、1219、815页。

④ 《通化县志》卷4，《文艺志》，第23页。

⑤ 《通化县志》卷10，第21页。

堡北山、兴京老城河以北等地，多次给沙俄侵略军以沉重打击，歼灭许多沙俄侵略者。

为了阻止沙俄运兵运械，忠义军多次对敌人控制的铁路线进行袭击。其中对海龙西南山城镇车站的袭击，就是出色的一例。当忠义军侦知山城镇车站停下许多侵略军的军用车辆时，立即组织了山城镇袭击战，一举烧毁沙俄侵略军的许多军用车辆，并一度占领了山城镇，使敌人的交通陷于瘫痪。

与忠义军反侵略斗争的同时，义和团余部和被统治阶级诬蔑为所谓“马贼”、“胡匪”等许许多多的抗俄武装群众，到处痛击沙俄侵略者，使其狼狈不堪，“坐卧不宁”^①，无可奈何地发出了“不畏中国之官兵，而畏中国之‘贼匪’”^②的哀鸣。侵略者对人民反侵略武装的诬蔑，恰恰从反面说明人民群众是保卫祖国神圣领土的钢铁长城。正是由于这些遍及东北各地的人民抗俄斗争，使得沙俄侵略者变东北为其“黄俄罗斯”的阴谋遇到“非常严重的困难”。^③

在广大劳动群众武装斗争的推动下，许多爱国的知识分子和绅商也纷纷加入了抗俄斗争的行列。

当沙俄在彼得堡强迫中国代表签押俄约的消息传出后，“通国士夫群焉力阻”。^④上海绅商拍电力主“据理严拒，以保危局”。澳门侨胞锺荣光、杨祝山等一百五十人发出“严拒（俄约）以救危亡”的通电^⑤，反对向沙俄妥协。

① 瓦德西：《拳乱笔记》，《义和团》第3册，第140页。

② 参看《海龙县志》卷17，兵事。

③ 《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94页。

④ 《彼得堡杨使来电》，《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34，第14、32页。

⑤ 《澳门来电》，《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34，第32页。

一九〇三年，沙俄竟违约拒不撤兵，立刻激起了爱国人们的极大愤慨。上海爱国人士在张园举行集会，发起“拒俄”运动，致电清外务部，坚决反对沙俄的七项无理要求，说“我全国人民万难承认”，并通电各国外交当局表示：即使清政府承认，“倘从此民心激变，遍国之中，无论何地，再见仇洋之事，皆系俄国所致，与我国无涉”^①。与此同时，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也展开了更为激烈的拒俄运动。当东京中国留学生闻知沙俄悍然违约拒不撤兵的消息后，“哗然大愤”，纷纷集议，商讨对策。他们在锦辉馆召开拒俄大会，到会者五百多人，会上决定组织“拒俄义勇队”（后改名“学生军”）。留学生们激昂地说：“吾辈徒以国家大义所激，誓以身殉，为火炮之引线，唤起国民铁血之气节。”^②当时有个名叫胡彬夏的女学生说：“我想祖国瓜分，同胞奴隶，我辈有何面目，更在日本留学？愿诸姐妹图之。”她表示“愿从义勇队北行，……即至捐躯殒命，誓无所惜”。^③当场就有二百多人报名参加义勇队，有十多个女学生志愿报名担任护士工作。义勇队推举蓝天蔚为队长，在留学生会馆操练，还派代表回国活动，要求到前线杀敌，表现了可贵的反帝爱国热情。在国内，北京京师大学堂的仕、师两馆学生“鸣钟上堂”，演说拒俄，“言至痛哭流涕，同学齐声应许，震撼天地……”^④；湖北高等学堂的学生举行了罢课，“各处集会，有所商议，遂相约不登校”^⑤；其它各地学生也纷纷表示抗议。这个声势浩大的拒俄运动，有力地支援了东北人民的抗俄斗争。

中国人民、特别是东北人民英勇顽强地抗俄斗争，沉重地打

①②③ 《江苏》，第2期，纪事。

④《京师大学堂学生公致鄂垣各学堂书》，见一九〇三年五月十九日《苏报》。

⑤ 《游学译编》第8册，中外近事。

击了沙俄的侵略气焰，使其妄图吞并中国东三省的“黄俄罗斯”计划未能如愿以偿。但是，老沙皇亡我之心不死！它不但不曾停止对中国东北的侵略与争夺，与此同时还加紧策划侵略、霸占中国的蒙古、新疆和西藏。因此，它必然遭到中国人民坚决的、毫不妥协的反对。沙俄的“黄俄罗斯”计划和侵略行径还威胁着日、英、美等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特权，因此也引起了它们的不满，加剧了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瓜分和争夺。

第二节 列强角逐东北和人民的英勇反抗

一、日俄战争与帝国主义在东北的争夺

沙俄加紧推行独霸东北的“黄俄罗斯”计划的行径，触怒了觊觎中国已久的另一个强盗——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同沙俄一样，当时正在千方百计地推行其旨在侵吞中国东北、蒙古等地区的侵略政策。日、俄两国争霸中国东北的争斗日益激化。早在一八九五年，沙俄伙同德、法出面“干涉还辽”，就曾引起日本的愤恨。一九〇〇年沙俄侵占东北，抛出《奉天交地暂且章程》，日本则立即向沙俄政府提出责问。沙俄政府矢口否认，假称不侵占中国领土，表示只要“不损害俄国利益及铁路，俄政府立即撤兵”。^①实际上，沙俄侵入东北的军队却赖着不走，妄想独占东北。日本从其侵略中国的私利出发，对当时中俄两国在彼得堡的谈判十分不安。

^① 参看《日本外交文书》第34卷，第107、112—114页。

沙俄独占东北、争霸远东的行径也触犯了其他帝国主义在
中国的利益。美国对广阔富饶的东北地区，久已垂涎三尺，早想
挟其雄厚资本排挤其它帝国主义，独占东北市场。在义和团运
动时期，美国就曾伙同英、日两国，竭力反对俄国独占中国东北。
一九〇三年，美国又依据所谓“门户开放”原则，向清政府和沙俄
要求东北取得港口和设使馆等特权，这就同沙俄在中国东北
的利益发生了尖锐的冲突。但是，狡猾奸诈的美帝国主义对日、
俄在中国东北的争夺，表面上表示虚伪的“中立”，而在实际上却
站在日本一方，极力对抗沙俄，企图在日、俄争夺中坐收渔人之
利。

英国害怕沙俄独占东北和向南方扩张势力，会影响到它在
长江流域和中国边疆的侵略利益。因此，也积极支持日本，企图
利用日本抵制沙俄。一九〇二年一月，英、日在伦敦签订了旨在
反对沙俄的军事同盟。其主要内容有：保护英、日两国在中国已
经取得的利益和日本在朝鲜已取得的政治、工商等项利益；如缔
约国一方与第三国（指俄国）进行战争时，另一方要保持中立，并
防止别国援助第三国；如缔约国与其他两国作战，另一方也必须
参战。英国答应如果日俄战争发生，将给日本以财政援助。列
宁指出：“英国同日本结成联盟，准备了日本对俄国的战争”。^①
从此，列强在争夺中国东北的斗争中，形成了日、英、美集团联合
反对沙俄独霸东北的错综复杂的局面。野心勃勃的日本帝国主义，
充当了这个集团的急先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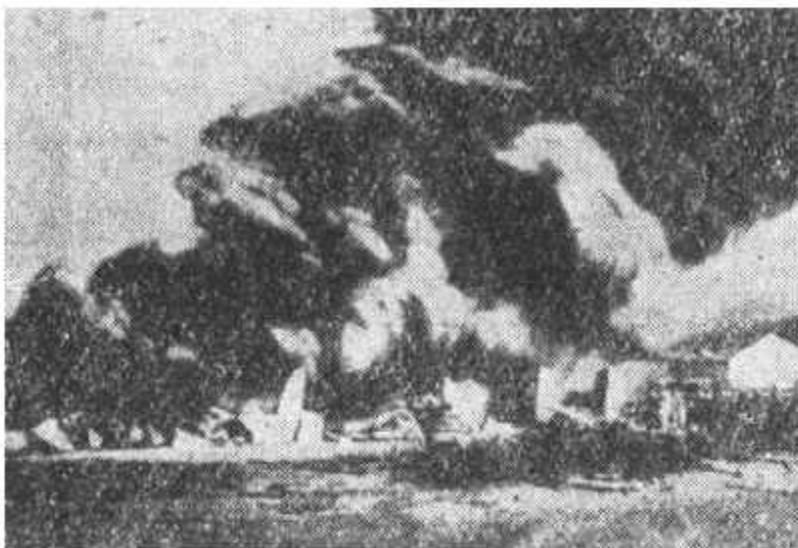
沙俄则力图拉拢法国和德国结成对抗英日同盟的伙伴。
一九〇二年三月，俄、法两国发表宣言，声称两国对于将来远东

^① 列宁：《论单独讲和》，《列宁全集》第23卷，第126页。

或中国发生变化时，为保护两国之利益，保留其自由行动的余地。早在一八九一年，俄、法为了在欧洲对抗德国，就结成了军事同盟，但在远东问题上，沙俄却极力拉拢德国对抗日本。德国一方面为了对抗法国，便竭力煽动俄国加紧侵略东方，调开波兰边境的沙俄军队，削弱法国对德国的压力；另一方面则鼓动日本与俄作战，并答应日本：一旦日、俄战争爆发，即采取中立政策。德国的所谓中立，实际上有利于沙俄集中兵力对抗日本。事实表明，中日甲午战后，列强为争霸远东（主要是争霸中国东北），已经形成为日、英、美和俄、法、德两个对立的集团。但由于法国在实际上并不积极支持俄国，德国又采取中立，因此俄、法同盟的实力没有日、英、美集团力量雄厚。两大集团争霸远东的局面已经形成，沙俄和日本都在拚命地扩军备战，准备厮杀，一场帝国主义战争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正如列宁所说：“‘世界霸权’是帝国主义政策的内容，而这种政策的继续便是帝国主义战争。”^①

日本通过《马关条约》，从中国攫取的大量赔款，绝大部分都用到扩军备战上。到一九〇三年，它的陆军已增加到六十七万人，海军舰只总吨数由六万多吨增加到二十七万八千多吨。军备拨款从一八九六年到一九〇三年多达七亿七千三百万日元。沙俄在日俄战争爆发的前一年，一直忙于增调军队，加紧运送粮食和弹药，补充到中国东北各个战略要地。沙俄还在旅顺和海参崴加紧扩建炮台。日、俄两个帝国主义在加紧备战的同时，都在自己的国内拚命制造战争舆论，作为发动战争的思想准备。一九〇四年二月九日，日本突然袭击旅顺口的俄国舰队，日俄战

^① 列宁：《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列宁全集》第23卷，第26—27页。



旅顺工厂被日军炮击起火，成为一片火海

争正式爆发。

日、俄两个帝国主义强盗，同时开辟了海上和陆上两大战场进行火并。海战集中在旅顺口及其附近的海面上进行，最后日本取得了制海权。

沙俄为挽回败局，派遣波罗的海舰队东驶，以救援旅顺口，结果在对马海峡又被日本舰队击溃。陆战双方主要集中在旅顺、辽阳、奉天三处厮杀。一九〇四年五月，日本侵略军从辽东半岛登陆。一九〇五年一月，日本军国主义集团采用了野蛮残酷的肉弹战术攻占了旅顺口，日军伤亡不下六万人。旅顺口争夺战是一个决定性的战役。日本占领了旅顺，控制了整个辽东半岛，取得了攫取朝鲜和独占中国东北的战略要地。随后，日、俄双方进行了辽阳、奉天战役。在奉天战役中，日俄双方总共投入了六十多万人的兵力，进行空前规模的厮杀火并。结果，沙俄仍然以惨败而告终。在这场可耻的强盗争夺战中，沙俄几乎丧失了全部海军力量，陆军也受到严重的损失。沙俄的侵略行径引起国内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反对，加上一九〇五年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已经爆发，沙皇政府为了集中力量镇压国内革命运动，要求结束战争。日本在这场侵略战争中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损失很严重。它耗费了十亿美元的巨额战费，其中百分之九十是靠发行公债和外债维持的。因此，日本人民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日本也无

力量再继续打下去了。

美国乘日俄双方都厮杀得精疲力尽之机，出面“调停”。一九〇五年九月五日，日俄双方在美国的朴茨茅斯签订了《朴茨茅斯条约》，结束了这场肮脏的帝国主义战争。条约的主要内容是：沙俄承认日本在朝鲜享有政治、经济和军事特权，俄国不加干涉；俄国割让库页岛南部给日本；俄国把从中国攫取的旅顺口、大连湾及其附近海面的租借权及其附属特权，无偿地转让给日本；俄国霸占中国的南满铁路（即长春至旅顺的铁路及其支线）及其附属权益无偿地转让给日本。可见，日俄战争是日、俄两个殖民强盗在英、美、法、德等帝国主义支持和怂恿下，在中国土地上进行的争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战争。《朴茨茅斯条约》严重地践踏和侵犯了中、朝两国的领土和主权，给中、朝人民套上了又一副沉重的殖民枷锁。更不能令人容忍的是，日本根据这个侵略条约，又强迫清政府在一九〇五年十二月签订了《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迫使清政府承认了日本在南满的侵略特权，允许开放辽阳、长春、铁岭、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十六个城市为商埠，允许日本在奉天、营口、安东划定租界和经营安奉铁路等等。这就进一步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

日俄战争是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一场肮脏的帝国主义战争。中国是受害的和被侵略的国家。但是，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不仅无力阻止在中国神圣的领土上进行这场极端不义的帝国主义战争，而且在战争爆发后竟厚颜无耻的顺着日、俄帝国主义的旨意，置国家主权与东北人民存亡于不顾，无耻宣布“局外中立”，划辽河以东为“交战区”，辽河以西为中立区，并严令各地官吏保护外人生命财产和教堂，加强监视和镇压中国人民，特别是战争结束后，两个强盗拿中国领土和权益进行分赃，清政府公然

承认了它们各自在东北的侵略权益，这就充分暴露了清政府的反动腐朽和卖国本质。

《朴茨茅斯条约》的签订，以及清政府在列强面前一意屈从、卖国的态度，丝毫没有使帝国主义收敛对中国东北的侵略野心。随着日俄战争的结束，俄、日、英、美等帝国主义在东北的明争暗斗又出现了新的错综复杂局面。沙俄一方面通过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手段加强对东北北部地区的掠夺和控制；另一方面把魔爪伸向蒙古和新疆，妄图实现其并吞中国北部疆土的黄粱美梦。但是，由于沙俄在日俄战争中的失败，以及《朴茨茅斯条约》的签订，使它深深感到暂时无力独霸中国的东北；它还特别惧怕英、美等帝国主义在此扩张势力而危害它的既得利益。于是，它为了巩固在东北的侵略特权，为了对付实力雄厚的英、美帝国主义，便转而同日本勾结共同瓜分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并争取在日本的默许下，把侵略的矛头指向中国的蒙古和新疆。日本也在这场不义的战争中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引起国内人民的不满；为了尽快恢复实力，为了争取时机以扩大和巩固在中国东北的侵略特权和势力范围，也转而同沙俄勾结。一九〇七年七月三十日，沙俄同日本背着中国缔结了第一次《日俄密约》，它们把我国东北地区划分为南北两部分，即所谓南满和北满。北满划为沙俄的势力范围，南满划为日本的势力范围。沙俄还以承认日本独占朝鲜为条件，换取日本承认沙俄在中国蒙古享有“特殊利益”。

俄、日之间的勾结，急坏了一心想独占我国东北市场的美帝国主义。《朴茨茅斯条约》签订前后，美国的大财阀、铁路大王哈里曼向日本提出了一个主要是联结日本、满洲、西伯利亚与俄欧部分的环球铁路计划，和由哈里曼组织的银行团出资购买南满

铁路及其附属设备的安排，可是由于美国此举触犯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利益，很快就为日本所拒绝。为了插足东北，一九〇七年哈里曼又转促美驻奉天总领事，向奉天巡抚唐绍仪提出在京奉路修筑自新民屯至法库支线，并拟向北延伸的计划。这个计划因遭到日本的拒绝而失败。美国争霸东北的目的未遂，英帝国主义却乘机在东北扩大侵略势力。英国保龄公司于一九〇七年十一月，与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奉天巡抚唐绍仪，签订了一项新法铁路的草合同，不过由于日本的抗议，英国为顾全“同盟”关系，旋即作罢。一九〇九年十一月，美国又向列强提出了“满洲铁路国际化”的主张。它为了侵吞东北，采取分化英、日同盟，与英国合作以击败日本的方针。但是，英国很快识破了美国的用心，拒绝同它合作，而劝它同日本商量有关东北事宜。由于这一计划触犯了沙俄和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直接利益，俄、日两国于一九一〇年七月，又签订了第二次《日俄密约》，以对抗其他列强、特别是美国势力的伸入。美国这一掠夺东北的计划，由于遭到俄、日的坚决反对，也得不到其它列强的支持，而再次宣告破产了。

第二次《日俄密约》签订后不久，沙俄又进行了新的侵略活动。在这年十二月的沙俄内阁会议上，就武装侵占中国东北北部地区的问题进行了讨论，这又一次暴露了它急于兼并我国东北的强盗面目。

美、日、俄、英等国在东北地区彼此争斗、又互相勾结，充分反映了二十世纪初期，帝国主义列强争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斗争的空前激化。

二、中国人民英勇抗击日、俄侵略者

日俄战争给东北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许多村庄被日俄



日本侵略军在东北高粱地架炮装备工事，
毁坏了东北大片田园

侵略者的炮火夷为平地，成千上万的东北人民死于非命，人民的粮食、牲畜和其他财产被洗劫一空，大片的田园、庄稼被践踏。“凡属俄、日军队经过处，大都因粮

于民，菽黍高粱，均被芟割，以作马料。纵横千里，几同赤地”。^①辽东广大地区，呈现一片凄凉景象，人民到处流浪。“盖州海城各属被扰者有三百村，计遭难者八千四百家，约共男女五万多名”。^②辽西地区，俄军四出，搜刮粮食，抢劫马匹，一直骚扰到蒙古和直隶地区。沈阳以北“沿途食物，均为俄兵强夺”，黑龙江则“烽燧所至，村舍为墟，小民转徙流离哭号于路者，以数十万计”。^③战争期间大批工厂倒闭，物价飞涨，日、俄侵略者则乘机滥发军用票（纸币），日本帝国主义发行的一种名叫“手票”的军用票，在东北各地曾发行达一亿九千万元之多；沙俄发行的军用

① 《日俄战纪》第13期，第85页。

② 同上书，第16期，第77—78页。

③ 程德全：《程中丞奏稿》卷2，第27页。

票（羌帖），“其数量颇巨，无法估计”。^①他们大量发行军用票，强迫人民以银币兑换使用，使人民蒙受巨大损失，后来这种纸币全部变成了废纸。日俄战争期间，日俄侵略者都蛮横地干涉中国的内政，践踏中国的主权。它们各自在作战区擅自立官设府，实行军事管制。沙俄侵略者竟无理要求有权“黜陟中国地方官”和“调度”中国军队，要求东北地方“政务应守俄国训令”，“捐税必须缴于俄国政府”。^②日本侵略者则在其占领区成立军政局，在旅顺口设关东府，对当地人民实行残酷的军事独裁统治。

面对日俄强盗的侵略和蹂躏，中国人民特别是东北人民进行了英勇顽强的反抗斗争。一九〇四年五月，日本侵略军占据辽东后，东边道辑安一带的伐木工人和木商，对日寇的“抢劫骚扰”，“忿恨切齿”，纷纷起来和日寇斗争，使盘踞在当地的日军“一宿数惊”。日本侵略者气急败坏，派兵前往镇压，伐木工人“抵死抗拒”，击毙日寇多名。此后，他们采取分散活动，随时出击，打乱了日军修路侵华的计划。^③广大群众的反抗斗争接连不断，群众队伍在一九〇六年曾一度攻入貔子窝街内，击毙击伤日寇民政署的侵略强盗多人，打击了它们的侵略气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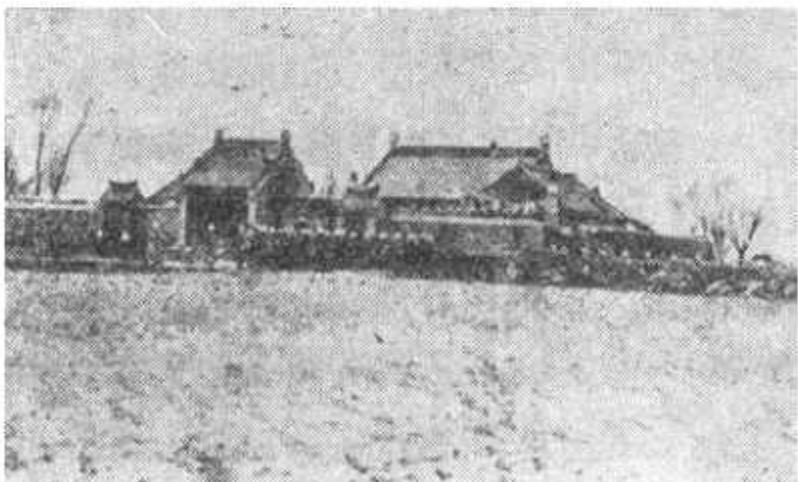
日俄战争爆发后，东北人民抗击沙俄侵略军的斗争到处发生。他们采取各种方式给予侵略者以应得的惩罚。群众拒绝为敌人修筑工事，迫使“俄人不得已自行运土”；并拒绝出售粮食给敌人，使俄军严重“乏食”。他们还拆毁铁路，断绝其交通运输，宁古塔附近和铁岭至哈尔滨的铁路，就曾被拆毁。俄寇强迫居民

① 参见《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在华银行发行纸币概况》，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第174页。

② 《日俄战事纪要》，《东方杂志》，一九〇四年第3期。

③ 参见《辑安县乡土志》，《外交公牒》，第2—5页。

保护铁路，居民“相率他徙”，使侵略者无可奈何。至于各地的抗俄武装力量，更是“日盛一日”。兴京的广大群众组成一支威武雄壮的队伍，与俄寇搏斗，一举攻克兴京城。^①一名沙俄军官带领随从人员耀武扬威地前往内蒙古郭尔罗斯后旗公府，道经五站三道冈子孤店地方，为当地以刘葆珊为首的人民武装“枪毙护兵二名，通事一名，俄员亦以创卒”。^②以农民为主体的抗俄武装在齐齐哈尔截获俄军战马数百匹；在沈阳附近切断俄军的电线，并把海城附近的一个堆积如山的粮台焚毁。在新民屯一带，人民武装袭击沙俄军队。吉林的人民武装经常出没于峰密山一带，“时与俄军冲突，俄帅苦鲁巴金患之”。^③人民武装袭击铁岭俄军辎重队，夺获大批“粮饷军械”，俄军损失六百余名。沙俄侵略者遭到严重打击。一九〇七年五月，东北人民群众的抗俄武装，在绥芬河击毙了一度在中东路沿线以“护路”为名称王称霸、作



沙俄侵略军侵占了东北乡村民房

恶多端的沙俄侵略军头目、骑兵大尉伊万诺夫等四名军官，严厉惩罚了那些在中国土地上耀武扬威、作恶多端的沙俄侵略者。

在如火如荼的抗俄斗争中，由于广大劳动群众所受沙俄侵略者危害最深，反

① 参见《兴京县志》卷10，第7页。

② 《呼兰县志》卷4，《地方交涉案件汇录》，第3页。

③ 《东方杂志》第1卷，第6号，《军事》第264页。

抗也最为强烈。据不完全的记载，从一九〇六到一九一〇年，中东铁路沿线的人民群众，就曾自发地组织起来打击俄国侵略者，先后袭击苹果、绥芬河、苇沙河车站。同时还采用扒铁道、放“响墩”（即在路轨上放置枕木或其他障碍物，使急行的列车出轨）等办法，使沙俄侵略者的列车多次颠覆。由于人民群众的各种各样的斗争，使侵略者遭到严重损失。连侵略者也无可奈何地供认：“仅在几年之内，就损失达百万美元以上”。^①

东北的工人阶级，特别是在中东路做工的中国工人，同在中东铁路做工的俄国工人一样，都深受沙俄强盗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他们不堪忍受压迫和折磨，挺身而出，反对沙皇统治，在战斗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影响下，中、俄两国工人进行了英勇不懈的斗争。一九〇二年前后，哈尔滨机械厂的中国工人，曾多次举行“挂队”（罢工），反对沙俄对中国工人的残酷压迫。一九〇七年一月九日，哈尔滨铁路工厂的中、俄两国工人，举行了盛大集会和罢工。中国工人激昂地说：“俄国沙皇杀了俄国工人，所以我们也要不做工。”同时，哈尔滨的俄国印刷工人，要求提高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也举行了罢工。“中国工人友好地支援了自己的俄国同志，并因此帮助罢工取得了胜利”。中国工人还帮助俄国布尔什维克散发革命传单和其他宣传品。中国售报工人也主动地支持俄国工人“抵制发售沙俄反动报刊的活动”，打击了俄国资产阶级的反动气焰。同年二月，“斯基德利斯基兄弟专利公司”林场里的三千多名中国伐木工人举行了罢工，要求改善政治待遇和增加工资。罢工斗争持续了一个星期，直到满足了

^① 参见《东清铁路沿革史》（俄文版），第398—400页。

自己的基本要求、取得胜利为止。一面坡俄国啤酒公司的中国工人，哈尔滨的马车夫、搬运夫，以及中东路数千名中国修路工人，均为反对沙皇统治多次举行了罢工。工人们的罢工斗争引起了沙皇统治者及中国反动派的惶恐和不安，他们对工人进行了残酷的迫害。但是工人们不甘屈服，斗争此伏彼起，继续发展。一九〇八年，哈尔滨铁路工厂的俄、中工人举行了一年一度的五一节庆祝活动，并进行了罢工；罢工工人和市民约一万人还举行了盛大集会。东北工人的罢工和中、俄两国工人的并肩战斗，沉重地打击了沙俄侵略势力，削弱了沙俄在中国东北的统治。

在广大劳动群众反抗日俄侵略斗争的鼓舞下，东北一些爱国官绅也曾“遍布深怨俄国之檄文”，纷纷表示反抗沙俄侵略者，声援了劳动人民的抗俄斗争。

这一时期，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也投入了抗俄斗争的革命洪流。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丁开嶂等人，就曾积极地奔赴抗俄前线，组织抗俄“铁血会”，奋勇打击沙俄侵略者。

丁开嶂，字晓川，原名作霖，河北丰润人，京师大学堂毕业。一九〇四年正当“日俄酣战之际，开嶂……与同学江苏朱锡麟、译学馆学生奉天张榕各出关组织革命军。朱创东亚义勇队，张创关东保卫军，开嶂立抗俄铁血会，皆假借名义而为革命立基础也。”^①由于朱被捕，张走避，丁遂易名开山，用抗俄铁血会首领丁开山名义，“传檄三省绿林界”。檄文说：“俄人者，自咸丰以来，私移界碑，窃我黑龙江以北，乌苏里以东，已为万国所不取，公法所不韪。近又虎狼蓄心，蛇蝎肆虐，踞关东三省俨为已有。

^① 丁开嶂：《辛亥革命时期的铁血会》，《近代史资料》一九五五年第2期，第21—22页。

奴隶我官府，牛马我人民，剥食我资财，淫掠我妇女，种种禽兽之行，神人共愤；色色野蛮之状，天地难容。”檄文号召人民起来抗击俄寇，“逐长蛇于兴安岭以北”；“大败俄罗斯于东清而后止”^①，使全国“锦绣山河与日星而并寿”，四亿人民“享幸福于无穷”。^②檄文发布后，义军曾与俄军交锋“二十余次”^③，给了沙俄侵略者以应有的打击。不过在反抗沙俄斗争中，铁血会却幻想“东联日本为外援”，看不出日帝和沙俄全是一丘之貉，都是中国人民的大敌，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本身的严重弱点。

日俄战后，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发动了“收回利权”运动，反对沙俄侵权夺利。一九〇五年，从沙俄手中收回了汤源县都鲁河金矿。一九〇七年，哈尔滨华商对沙俄在哈尔滨擅订章程，拟私划土地、进行殖民经营的侵权夺利的强盗行径，表示反抗，“起而奋争，相持经年”，打击了沙俄殖民主义分子的侵略野心。一九〇九年，在直隶保定等地军事学堂学习的东北籍学生，在保定召开同乡会，呼吁各界固结团体，抵御日俄侵权夺利。民族资产阶级收回利权的斗争，虽因本身软弱，成效很小，却支持和声援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壮大了中国人民抗俄斗争的声威。正是由于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长期不断地英勇反抗，使得沙俄变东北为“黄俄罗斯”的迷梦始终未能得逞。

①② 丁开嶂：《辛亥革命时期的铁血会》，《近代史资料》一九五五年第2期，第21—22页。

③ 《东方杂志》，一九〇五年第1期，杂俎，第10页。

第三节 英、俄争霸西藏和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

一、英、俄在中国西藏的激烈争夺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俄、日、英、美等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角逐的同时，英、俄两个帝国主义强盗在中国的西藏也进行着激烈的争夺。它们争夺西藏同争夺东北一样，都是为着瓜分中国、争夺霸权。当时，英、俄两国在亚洲的争夺主要集中在伊朗、阿富汗和中国的西藏三个地区。英国企图占领中国西藏的主要目的，是把英属印度和它在中国长江流域的势力范围联成一片，使西藏变成它由印度进入四川、到达长江和直出东海的战略基地和交通要道。英国殖民主义者荣赫鹏在一份备忘录里叫嚣：英国只有占领西藏，才能够“支援我们在四川的各种活动，把我们由东到西的力量结合在一起”。^①可见，英国企图占领西藏是为了扩展它在中国的侵略势力，建立亚洲霸权。沙俄则把吞并西藏作为“黄俄罗斯”计划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沙俄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就曾说过：“我们皇上的脑袋中有宏大的计划，为俄国夺取满洲，把朝鲜并入我国，还想把西藏并入本国”。^②财政大臣维特也曾公然叫嚣，俄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包括由太平

① 兰不：《不列颠与中国的中亚细亚》（英文版），第294页。

② 《库罗巴特金日记》，一九〇三年二月十六日。《红档杂志》一九二二年第2卷，第31页。

洋海岸至喜马拉雅山之巅”。^①可见，沙俄侵略西藏的主要目标，是妄图从中国的东北直到西北、西南的整个满、蒙、新疆、西藏地区，建立起一个与西伯利亚相连接的“黄俄罗斯”。这样，中国的西藏就成了英、俄两个帝国主义争夺领土、谋求建立亚洲霸权的必争之地。

英国利用它的殖民地印度同中国西藏接壤的便利条件，不断地对西藏进行侵略。它在一八八八年打开了西藏的大门后，步步加紧向西藏腹地的侵略。一八九三年，西藏亚东开为商埠，英印对中国西藏的贸易总额虽然不大，但却逐年增长。西藏主要输出羊毛，由印度输入西藏的英国工业品主要是棉毛纺织品。英国生产羊毛织品的大资本家和印度的英国茶商协会，急切地期望本国政府向中国交涉，改关减税，在西藏自由经商，以便大量地收购羊毛、倾销棉毛织品和印茶。这实际上是要求更多地榨取西藏人民的血汗，掠夺更多的原料。英国资产阶级盘算着英国商品一旦进入西藏内地，不仅呢绒布匹的销售量能迅速增加，而且还可以免除由沿海一带运入内地的各种捐税，经由西藏把洋货运往四川、甘肃、陕西等地区，从而挽回自十九世纪末叶以来，英国对华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总值中所占比重，较鸦片战争前夕大为降低的趋势。因此，英国大资产阶级就竭力支持英国政府发动一场新的侵略中国西藏的战争。

英国垄断资本家对于西藏的金矿更是馋涎欲滴，妄图攫为己有。英人记载，西藏境内黄金遍野。^②英国侵略分子贺尔迪启说：“西藏黄金不是‘丰富’的普通字义可以形容的。它是特大的

^① P.L.麦哈拉：《西藏与俄国的阴谋》，《英国皇家中亚杂志》一九五八年第一期，第31页。转引自《南京大学学报》一九七五年第4期，第95页。

^② 参考《英国百科全书》第22卷，一九四七年版，第177页。

丰富——有可能比世界上任何地方还要丰富”。^①他这样描述的目的，是为了煽动本国资产阶级加紧侵略西藏。一八九九年四月，洛茨柴尔德银行的经理密勒尔，为了掠夺西藏金矿，曾申请印度部给予支持，并建议一旦勘察有所结果，即由外交部向中国勒索在西藏的开矿特权。这个要求暴露了英国垄断资本家抢夺中国西藏矿产的野心。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英国政府，为了夺取原料的来源，“惟恐在争夺世界上尚未分割的最后几块土地或重新分割已经分割了的一些土地的疯狂斗争中落后于他人，总想尽量夺取更多的土地，……不管这些土地在什么地方，也不管采取什么手段。”^②

英国除了发出以武力侵入西藏的叫嚣外，还不断地干着派遣间谍、特务和收买民族败类的侵略活动。当时，一个名叫沙拉张朱拉达斯的孟加拉人，被派往西藏的江孜地区从事间谍活动，收买民族败类，当地唐泽寺的活佛就曾被她收买，中国西藏地方当局发现后，立刻处以极刑，迎头痛击了英国侵略分子的颠覆活动。二十世纪初年，印度总督寇松极力鼓动英国政府加紧侵略西藏。他无视西藏历来是中国领土这一铁的事实，企图抛开清政府而单独与西藏上层谈判，阴谋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为此，寇松在一九〇〇年和一九〇一年两次直接写信给十三世达赖喇嘛，企图以“印度政府”的名义和西藏地方当局“直接交涉”。但遭到西藏地方政府的坚决拒绝。寇松策动西藏“独立”的阴谋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可是这个极端狂妄的侵略分子却贼心不死，气急败坏地要求英国政府派专使带兵打进拉萨，以武力强迫西藏“独立”。英国政府指令寇松等侵略分子伺机寻衅，制造武

^① 贺尔迪启：《神秘的西藏》（英文版）第329页。

^②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第804页。

装入侵西藏的借口。一九〇二年六月，英国借口要重新划定西藏和哲孟雄（今锡金）的边界问题，悍然派英国驻哲孟雄的专员惠德带兵侵占了西藏的甲岗。清政府对英国的侵略行径提出了抗议，并由驻藏大臣派员赴边地会商。英国侵略者不但故意拖延会商，还在一九〇三年派遣一支五百人的军队非法占领西藏边境的干坝宗，加紧准备发动新的侵藏战争。

当英国步步加紧侵略西藏的同时，沙俄也猖狂地向西藏侵略扩张，同英国展开了激烈的争夺。一八八九年，沙俄派遣科布伦奇夫斯基和波达诺维奇先后潜入西藏进行间谍活动。此后，“累年以来，俄人入藏者肩背相望，查勘矿山，测量地形，举动至为叵测”。^①沙俄为了“在亚洲打败英国（夺取整个波斯、蒙古和西藏等等）”^②，还在“助藏抗英”的虚伪幌子下，在西藏一小撮农奴主贵族中间游说，阴谋策动上层农奴主集团进行所谓“西藏独立”的叛国活动。早在一八八八年英军侵略西藏时，“俄人乘间借游历为名，取道后藏而来，甘言厚币，以诱藏番，又因语言文字，不能相通，特予密函三件，约令遇有急难，将函驰送俄境，即可电达，助兵援应”。^③显然，沙俄的用心是极其险恶的。它以厚币为诱饵，以助兵抗英为幌子，加紧向西藏扩张势力，其目的是为吞并作准备。沙俄的特务、间谍极力唆使达赖集团“谋脱清国之束缚，依俄国之援助，以防英人之北侵，谋自国之独立”。^④沙俄侵略者所谓的“助藏抗英”、“保护”西藏、“西藏独立”等等，统统是它们妄图实现“黄俄罗斯”计划的惯用伎俩。贝加尔湖一带

① 《癸卯新民丛报汇编》（一九〇三年）第788页。

② 列宁：《论单独讲和》，《列宁全集》第23卷，第128页。

③ 吴丰培辑：《清季筹藏奏牍》第2册，《鹿传霖奏疏》卷3，第1页。

④ 山县初男：《西藏通览》第53—55页。

的俄籍布里亚特蒙古人信仰黄教，时常有喇嘛到西藏去求经拜佛。沙俄政府就在布里亚特人中物色和豢养宗教特务和走狗。臭名昭著的佐治野夫（即德尔智），就是其中的一个。早在一八八五年，他就潜入西藏，钻进农奴主贵族上层中间，大肆招摇撞骗。日后，他学会藏语，居然窃取了十三世达赖侍讲的要职。他大造亲俄舆论，策动以达赖为首的上层贵族背叛祖国，投靠沙俄，为沙皇政府策划侵藏阴谋。他经常宣扬什么“英人将来侵略西藏可畏，中国政府亦不足赖，唯俄罗斯是将来喇嘛的唯一保护者”。^①当英国在西藏的侵略活动步步加紧，尤其是取得了在西藏开亚东为商埠的特权后，沙皇政府十分眼红，便于一八九八年和一八九九年两次派佐治野夫携带大批“礼物”和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亲笔信窜至西藏，邀达赖派“使者”访问俄国。在佐治野夫的挑唆下，达赖逐步走上了背叛祖国、投靠沙俄的罪恶道路。一九〇〇年九月，达赖秘密派遣大卓尼到俄国同老沙皇密谋策划。一九〇一年六月，达赖正式委派佐治野夫为“特使”，率领所谓“西藏使团”前往俄国进行叛卖活动。沙皇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曾亲自接见达赖的所谓“使者”，并暗示达赖的“使者”：只要西藏接受俄国的“保护”，俄国可以“毁灭英人的诡计”。这就充分暴露出了沙皇俄国企图霸占中国西藏的侵略野心。此后，“俄商及军队潜纵入藏者络绎于途”^②，至一九〇三年间，沙俄已派数百名哥萨克兵潜入西藏。

沙俄侵略势力在中国西藏的迅速扩张，引起一心想独霸西藏的英帝国主义的极大不满。英国侵略分子荣赫鹏公然叫嚣：“倘若这时我们还满不在乎，不加抗议，任由俄国人在西藏建立

^① 黎孤岛：《俄人东侵史》第267页。

^② 朱锦屏：《西藏六十年大事记》第7页。

他们的势力，那么凡邻接西藏的英属各国小邦，都将以俄国为亚洲的真正强国”^①，从而会动摇英国的亚洲霸权。于是，在二十世纪初年，英国乘沙俄一手策划的所谓“西藏使团”访俄事件的机会，一面在外交上同俄国展开激烈的争斗，一面则公然明火执杖地武装侵犯西藏地方。

一九〇一年七月，英国就所谓“西藏使团”事件质问沙俄，并且声明：“若发生任何可能改变或扰乱西藏现状的活动，都将是英国政府所不能容忍的”。^②一九〇二年十月，英国外交部再次警告沙俄：“俄若派兵西藏，英必效之，且所派之兵力，必厚于俄之兵力。”^③沙俄政府在争夺西藏、谋求霸权方面历来不甘落后，不肯示弱。于是，它立即回答英国：“如果该地方现状发生变乱，则俄国政府不能置之不理”。^④可见，在争夺西藏问题上，英、俄两个强盗表现出了一副嘴脸，一个腔调：都要以赤裸裸地武装侵略在西藏建立自己的霸权。但是，由于俄国正在加紧准备同日本争夺中国东北的战争，暂时无力进攻西藏。英国却乘机利用日本牵制沙俄在亚洲的侵略势力，拖住俄国的手脚，并且凭借英印边界直接与西藏接壤的便利条件，抢先武装入侵西藏。一九〇三年十二月，英国借口通商和边界问题，派遣以荣赫鹏为使节、麦克唐纳为军事指挥，率领一万多人的侵略军，越过中印边界，挑起了第二次入侵西藏的战争。十二月十二日，英国侵略军偷越则利拉，十三日攻占仁进冈，十四日占领春丕。随后继续向西藏腹地推进。一九〇四年四月，英军大举进犯江孜。六月，十

① 荣赫鹏：《印度与西藏》第6章，第62页。

②③④ 《英国印度事务副大臣格雷致外交部函》（一九〇一年七月二十五日），《英国蓝皮书》CD，一九二〇，第162、183、187页。转引自《南京大学学报》一九七五年第4期，第98页。

三世达赖逃出拉萨，取道青海，企图经蒙古投奔俄国。但行至库伦（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被清朝当局截住，留在库伦。沙俄间谍则乘机把达赖操纵、控制在自己手中。八月三日，英军攻陷拉萨。九月七日，英国侵略军头目荣赫鹏在布达拉宫内外及交通要道密布军队，以枪炮相威逼，迫使西藏三大寺（别蚌寺、色拉寺、噶尔丹寺）首领在他事先炮制好的《拉萨条约》上签字画押。这个侵略条约的主要内容是：

（1）除亚东开埠外，增开江孜、噶大克为商埠，英国在商埠派驻官员；

（2）赔英兵费五十万英镑；

（3）自印度边界至江孜前藏，沿途要塞一律拆毁，并将所阻碍道路之武备全行撤去；

（4）西藏政府允行以下五端事项：西藏土地不得让卖租典与他国；西藏一切事宜无论何国皆不得干涉；无论何国皆不得派员或代理人进入藏境；铁路、道路、电线、矿产等项利权均不许外国享受；西藏进款、货物、钱币等不许给予外国抵押拨兑。

所谓《拉萨条约》，是英帝国主义撇开清政府而直接强迫西藏地方当局非法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它企图把西藏地方从中国版图里分裂出去，使之成为英国的殖民地。英帝国主义这种分裂中国领土、破坏中国主权的罪恶行径，理所当然地遭到全国人民特别是西藏人民的坚决反对。清政府感到所谓《拉萨条约》“有损主权”，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命令驻藏大臣有泰坚决拒绝签字，要他“切勿画押”，并指斥英国侵略者不应无视中国主权而径与西藏地方当局“立约”。^①英国则急于迫使清政府承认《拉萨

^① 吴丰培辑：《清季筹藏奏牍》第3册，《有泰奏牍》，卷1，第26页。

条约》，要求清政府进行谈判。一九〇五年初，清政府派外务部右侍郎唐绍仪为钦差全权大臣，率参赞张荫棠、梁士诒等赴印度谈判。唐绍仪指出英国和西藏地方当局订立条约是侵犯中国的主权。因此，这个所谓的“条约”根本无效，而应由中、英二国政府重新议约。英国代表理屈词穷，不得不接受以重新议约作为双方进行谈判的先决条件。但在谈判中，英方代表却故意制造出所谓“宗主权”的谬论，企图否认中国对西藏地方的领土主权。唐绍仪等严词驳斥了英方的谣言和诡辩，坚持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不容干涉和侵犯。双方谈判达十次之多，仍无结果。唐等返回北京。一九〇六年四月，清政府再派唐绍仪等与英国驻华全权公使萨道义在北京继续谈判，并签订了《中英续订藏印条约》六款，将原来的《拉萨条约》十款作为附件。英国虽然将《拉萨条约》中的许多侵略权益保留下来，但《续订藏印条约》规定“英国国家允不占并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英国终于在事实上确认了中国对西藏的领土主权，使它企图分割中国领土西藏的阴谋没有得逞。

英国大举入侵西藏时，沙俄正在中国东北同日本进行着激烈的火并。英军占领拉萨，逼签条约，标明它在争夺西藏的斗争中抢到了沙俄的前面。沙皇政府对此恼羞成怒，它一面派遣军队进入西藏，一面多次同英国进行交涉，要求英国保留它在西藏的侵略权益；并以支持达赖傀儡集团回藏掌权的手段，对抗英国独占西藏的侵略计划。沙俄的阴谋活动，立刻遭到了英国的强烈反对。英国企图胁迫、诱使九世班禅额尔德尼作为统治西藏的傀儡。一九〇五年冬，英国侵略者窜入后藏日喀则，劫持班禅至印度，对他百般威胁、利诱，企图策动他搞所谓“西藏独立”。班禅却一再表示效忠祖国，坚决拒绝“乞援英国而独

立”^①，并于次年返回西藏。结果英帝国主义分割中国领土西藏的阴谋又告失败。一九〇六年四月，沙皇政府公然派部队“护送”达赖从库伦返藏，企图让这条走狗控制西藏的局面，保护俄国在西藏的既得利益。因此，英、俄两霸争夺西藏的矛盾日趋尖锐起来。但是，由于当时德帝国主义崛起，要求重新瓜分世界，英、俄两国面临着严重的挑战。于是，英、俄之间都有缓和矛盾、准备同德国作战的愿望。一九〇六年夏天，英、俄两国代表在莫斯科举行瓜分西藏、伊朗和阿富汗的秘密谈判。两个强盗经过激烈地争吵和讨价还价，终于在一九〇七年八月在彼得堡缔结了强盗分赃的《西藏协定》，即所谓的“英俄专约”，遂使双方暂时休战、妥协。“协定”的主要内容是：英、俄双方彼此承认对方在西藏的既得利益，双方同意维持西藏现状，规定英、俄两国“除通过中国政府外，不与西藏直接交涉”。但“协定”却别有用心地把中国对西藏的领土主权，歪曲成所谓的“宗主权”。《西藏协定》是英、俄两霸对中国领土西藏既争夺又勾结的产物，是它们背着清政府和中国人民偷偷地瓜分西藏、宰割中国人民特别是西藏人民的又一严重的侵略勾当，它严重地践踏和侵犯了中国的主权，极大地侮辱了中国人民。它必不可免地引起中国人民特别是西藏人民的仇视和反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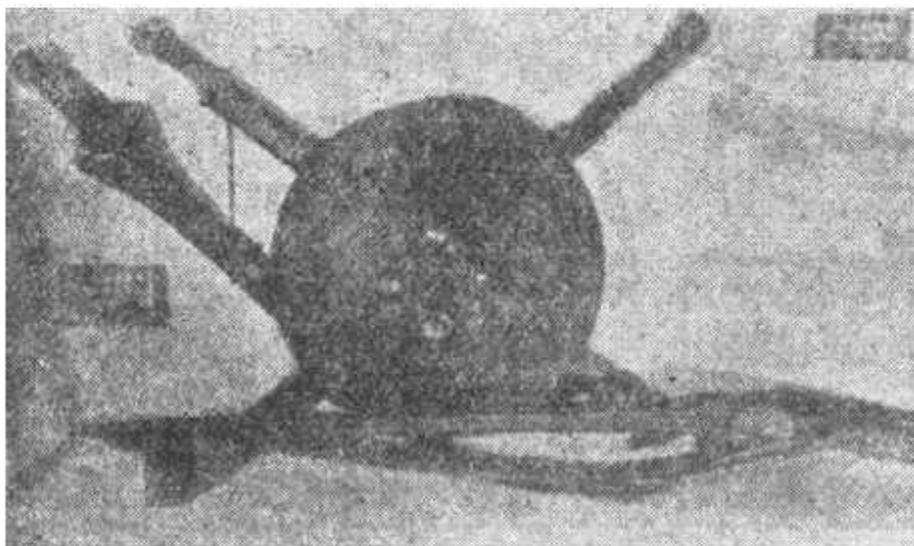
二、抗击英、俄侵略西藏的斗争

英、俄帝国主义对我国西藏的侵略和争夺，激起了中国各族人民特别是藏族同胞的极大愤慨和英勇不屈的反抗。一九〇〇

^① 柏尔：《西藏之过去与现在》第78页。转引自《南京大学学报》一九七五年第4期，第100页。

年十一月，一批以“游历”为名的沙俄武装特务，窜至西藏察木多（昌都地区）骚扰侵略，烧毁民房，抢劫马匹，并杀死杀伤藏族同胞四十人。当地藏族同胞奋起抗击，同沙俄侵略者英勇搏斗。一九〇一年六月，佐治野夫率领所谓“西藏使团”到俄国“访问”，遭到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清政府驻俄代办胡惟德，也当即指斥了这个所谓“使团”的卖国活动，并向沙俄提出严正声明：西藏历来是中国的领土，“使团”未经清政府允许而出访俄国是非法的。他一面立即报告清政府，一面还当面斥责佐治野夫的无耻行径，并严厉地指出：“藏事应请驻藏大臣转奏核办，外务应由朝廷主持”^①。但是，在卖国路线控制下的清政府，却未认真追究达赖集团这一重大的叛国罪行。中国人民、特别是藏族同胞不仅抗击沙俄侵略者，还对明火执仗的英国侵略者进行了针锋相对和百折不挠的斗争。

一九〇三年十二月，英国侵略军突然袭击帕里，激起了西藏



一九〇四年西藏人民抗英时使用过的武器

^① 李鸿章：《寄西安行在军机处》，《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39，第19页。

人民的极大愤慨。西藏地方当局也立即发布了征兵命令，并准备了武器、火药和粮饷等军需品，随时准备痛击英国侵略者。帕里地区的广大藏族人民，拒不供给英国侵略军粮食，也不给他们运载牲畜。当地群众还积极配合爱国官兵在帕里地区的一些险要地方，用羊皮包筑成工事阻止英军前进，多次击退了他们的进攻，给予敌人以沉重打击。一九〇四年一月英军侵占帕里后，蛮横地扣留西藏地方代表，企图迫使他们接受其侵略要求。帕里广大群众闻讯后，立刻手持大刀、镰刀、斧头、木棒冲进英军驻地，把西藏地方代表救了出来。三月，当藏军开到曲眉仙郭地带时，老奸巨猾的荣赫鹏又玩弄花招，他佯称议和，要双方停火，但在议和过程中，却命令英军包围藏军，进行突然袭击。西藏爱国官兵坚守阵地，誓死抵抗，直至全部壮烈牺牲，表现出高度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

在英军继续入侵的过程中，西藏军民随时随地打击敌人。人民群众常于黑夜袭击英军，截击敌人的军火粮食。在康马附近，机智勇敢的群众武装，翻穿着羊皮袄，埋伏在羊群里，等侵略强盗下马抓羊的时候，一齐跃起，用刀砍杀，歼灭了二三十个英国侵略者。从此以后，英国侵略军见到羊群再也不敢肆无忌惮地下马捉羊了。侵略者到处挨打，伤亡很大。

一九〇四年四月初，英国侵略军攻占康马，西藏军民在当天夜里乘侵略军酣睡时，迅速插进敌营。他们手持大刀，奋起直冲，消灭了很多英国侵略者，直到天亮才机智地撤出战斗。英国侵略者惊呼：西藏军民如此的英勇顽强，这在历史上再也“找不到比得上他们的例子”了，他们视死如归，“几十个人会奋起猛攻比他们强大得使他们的斗争成为绝望的敌人，拚死命地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倒下去。一小撮被强征的农民，就会为保卫一个村

庄全体战死，象古罗马爱国者那样”。^①

在藏昌战斗中，西藏军民利用地形，分兵守住东西山头，并在山下道路两侧埋伏重兵，待机歼敌。英国侵略者迫近时，藏军便集中火力射击，英军几次冲锋都被打退，死伤惨重。后来只是由于敌人绕至东山进行偷袭，藏军未及发觉，才不得不撤出阵地。英国侵略军冲破藏昌阵地后，于四月十一日攻陷江孜。

江孜沦陷的消息传出后，西藏爱国军民义愤填膺，立即投入了反击英国侵略者的战斗，展开了一场保卫江孜的大血战。西藏地方当局，还从日喀则飞调一千六百名军队，日夜兼程赶赴江孜，增援当地爱国军民反击英国侵略者的战斗。五月初，少部分藏军绕到江孜东面卡罗拉山布疑，把一部分英军吸引过来后，随即将其包围，然后大部藏军便于五月五日深夜神速地开进江孜，并立即夺回宗山（江孜宗政府所在地），占领了白居寺、曲龙寺、江卡等其他重要据点，形成了对英军的包围圈，同时派出一支尖兵，袭击英军营地。这时英国侵略军以为藏军已经完全溃败，万万没有料到藏军犹如从天而降，并利用英军工事的枪眼向里射击。英国侵略军于酣睡中惊醒，惊慌失措，顾不得穿上鞋子和外衣，彼此拥挤、冲撞，仓惶应战。藏族爱国军民同他们展开了激烈地拚杀和肉搏，沉重地打击了英国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在这次战斗中，英国侵略军头子荣赫鹏，差点被我藏族军民活捉。

西藏军民将英国侵略者包围后，便积极赶筑工事，江孜附近的广大群众，不分男女老少都自动赶来，不分昼夜和爱国官兵一道抢修工事，迅速地完成了工事的修筑任务。藏军把最重要的武器安设在白居寺山顶和宗山这两个据点，其他各工事也都作

^① 康特来：《拉萨真面目》第146页。

好了保卫江孜、同英国侵略者血战到底的准备。

英军在遭到我西藏爱国军民的沉重打击后，竟兽性大发，在他们盘踞的驻地（绍岗和扎奎村的尼姑寺附近）附近的村庄杀人放火，企图造成无人区，使藏军无法凭借民房进行攻击。当地广大群众对于敌人的这种残暴行径，忍无可忍，便纷纷挺身而出，赤手空拳地同侵略者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使侵略者企图制造“无人区”的阴谋无法得逞。随后，西藏爱国军民还在白居寺和宗山两次击退了英军的猖狂反扑，打得它们纷纷逃窜。参加这场侵略战争的英军军官也供认：西藏人民的“勇敢是超等的”，“不能想象还有什么可以比得上他们的个人的勇敢”；而“我们对江孜的占领，仅是更加刺激藏民的反抗”。^①

西藏军民在反击战中接连取得胜利，有力地打击了英国侵略者。英国侵略军士气低落，粮弹缺乏。虽然敌人在五月下旬匆忙由印度调来一支援军，但人数不多，无法扭转败局，只好龟缩在战壕里，被动挨打，固守待援。敌人孤军深入，接连失败，又恐西藏军民切断它的供应路线。荣赫鹏穷蹙无奈，只好冒险亲领一队骑兵，在六月五日黎明前偷偷溜出重围，仓惶逃向春丕调兵。中经康马时，数百名群众包围了他的兵站，一部分群众爬上了屋顶，向荣赫鹏的房里扔石头、打枪，荣赫鹏几乎被杀死。

六月二十三日，荣赫鹏和麦克唐纳率领的增援部队到达江孜。西藏军民同英国侵略者展开了激战。当英军轰塌乃尼寺的围墙、蜂涌越墙攻入寺内时，坚守该寺的藏族军民勇敢地打开庙门，有的手持大刀，有的赤手空拳，同英国侵略军展开了激烈地肉搏战。他们勇猛冲杀，义无反顾。其中有一支来自工布地区的藏族群众武装，勇敢非凡，善于大刀战。在这场肉搏战中，

^① 华达尔：《拉萨和它的神秘》第245—246页。

他们往往把侵略者一个个的连人带枪一劈两段。英军以二百多人的伤亡为代价强行攻占了乃尼寺，立即施行报复，将乃尼寺洗劫一空，并放火烧毁了该寺的大经堂。事后西藏人民把敌人抢走的东西登记下来，登记簿一直保存在朗噶子桑丁寺内，这是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领土西藏暴行的一件铁证。



七月五日，英军大举进犯江孜宗政府所在地“宗山”。坚守山上阵地的西藏爱国军民，

江孜藏姆仗——一九〇四年西藏人民曾在此抗击英国侵略军

连续打击敌人，表现了顽强不屈的反抗精神。据当年参加过江孜保卫战的老人们回忆：英国侵略军“从东北和东南向宗政府进行攻击，首先用炮火轰击山顶，然后再掩护步兵向山上冲锋。藏军守住山，敌人不攻就不开枪，等敌人攻的时候就用火药枪、抛子和石头一起向敌人打。这样敌人围攻了几天仍然打不上去。藏军在山上毫不动摇的进行防守，而且还有时下山摸敌人的营房。山上的水喝干了，即在晚上将人用绳子吊下来取山下的一坑污水喝”。^①最后在弹尽粮绝连污水都全喝干的情况下，英勇顽强的藏族军民还连续坚守三天三夜，打退了敌人的数次进攻。江孜保卫战虽然失败了，但江孜人民是吓不倒的。他们自动起来打击敌人，有的群众以石头作武器消灭英军；还有的群众和尚未

^① 魏克：《一九〇四年西藏人民抗英斗争调查记》，《近代史资料》一九五七年第1期，第33页。

撤走的藏军一起并肩冲杀，仅在紫金寺一地就打死二十多个侵略者。一个藏族青年乔装打进英军营地，杀死了一个英国军官，不幸被捕。敌人用各种酷刑拷问他：“是谁派来的？叫什么名字？”他却激昂地回答：“我叫我！我是我派来的！”敌人从他口中没有得到任何情报。江孜人民的英勇斗争，充分表现了藏族同胞和全国人民一样，具有同侵略者血战到底的高贵的民族气节和不屈不挠的顽强战斗的革命精神。就连英国侵略者也不得不承认“西藏人的英勇是无可争辩的。当我们的榴霰弹在他们头顶上爆炸时，他们勇敢地守住阵地，沉着地向我们的大炮一枪又一枪地进行还击，一点钟又一点钟地支持下去……”。^①

江孜失陷后，英国侵略军疯狂地向拉萨进犯。但他们沿途遭到西藏爱国军民的袭击。例如，朗噶子一带的广大群众就曾组织起队伍，凭险筑堡，手持镰刀、锄头、大刀、梭枪、土枪等原始武器，袭击英国强盗，阻止英国侵略军向拉萨进犯。七月二十五日，敌军到达雅鲁藏布江边时，藏族人民拒绝为其摆渡，给敌人造成很大困难，甚至敌人运输队里的头目布雷赛唐大佐，也于一片混乱之中，堕江淹死。八月三日，英军侵占拉萨。他们到处抢掠财物，侮辱妇女，屠杀人民，焚烧村庄，捣毁寺庙，抢劫大批文物，其中包括“宗教和非宗教的宝贵书籍”、“神像、宗教作品、盔甲、武器、图画、瓷器等物”。^②据英国侵略分子供认：他们抢走的东西，其件数之多，“须有四百多驮子才能驮运”。^③仅编这次掠夺的文物及图书目录就花费了四个多月的时间。英国侵略者在西藏犯下的滔天罪行，是对自诩为“和平使节”的荣赫鹏的绝

① 华达尔：《拉萨和它的神秘》第245页。

② 魏克：《一九〇四年西藏人民抗英斗争调查记》，《近代史资料》一九五七年第1期，第36页。

③ 麦克唐纳：《旅藏二十年》第26页。

顶讽刺。西藏人民饱受英国侵略的灾难，万分痛恨英帝国主义，称英国侵略军为“洋鬼妖精”，并编成歌谣传唱：“年楚河的波浪滚滚，流不尽江孜人民的心头恨，雅鲁藏布江的江水哟，也洗不尽西藏人民满肚子冤……”。^①这是西藏人民对英帝暴行的有力控诉，它不仅激励着西藏人民，而且也激励着全国人民将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西藏人民为保卫祖国神圣领土不怕流血牺牲，而清朝驻藏大臣有泰却一直抱妥协投降的态度，暗中阻挠西藏爱国军民抗战。用有泰自己的话说，就是采用“釜底抽薪”的办法，“任其战，任其败”。^②这是企图借用英国侵略军的屠刀来消灭西藏人民抗战力量的毒辣阴谋。他以为只要西藏爱国军民抗英失败了，他们向英国侵略者妥协投降的事就能马上实现。

以荣赫鹏为首的英国侵略军，满以为占领拉萨签订不平等条约就可以万事大吉了。事实恰好相反，西藏人民并没有被英国强盗的气势汹汹、张牙舞爪所吓倒；更没有因为有泰一小撮卖国贼缴械投降而停止战斗。当侵略军侵占拉萨后，广大人民仍然采取各种办法继续进行反抗斗争。居民们停止了与英国侵略者的交易，拒绝供应英军燃料和粮食。人民群众组织起游击队，不时出没于拉萨城内和郊区，使得敌人胆战心惊，坐卧不安。当拉萨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出后，全国人民一致反对，坚决不答应。广大人民的反抗，迫使清政府拒绝在条约上签字。中国人民首先是西藏人民英勇不屈的斗争，使得英帝企图分割中国领土的阴谋终于遭到可耻的失败。

^① 魏克：《一九〇四年西藏人民抗英斗争调查记》，《近代史资料》一九五七年第1期，第34页。

^② 吴丰培辑：《清季筹藏奏牍》，第3册，《有泰奏牍》卷1，第9页。

第十一章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高涨

第一节 革命风潮一日千丈

一、“洋人的朝廷”

《辛丑条约》签订之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屈辱地位完全确立了。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更紧密地结成反动的政治同盟，残酷地压榨中国人民。帝国主义凭借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掠夺到的权益，“用政治、经济、文化等比较温和的形式”^①，加紧侵略中国。

在政治上，帝国主义极力控制清政府。帝国主义的所谓顾问充斥于清政府的财政、经济、军事、外交等要害部门。美国的精琦当上了中央的财政顾问，日本的坂西少佐充任直隶督练公所军事顾问。他们名曰顾问，实掌大权，清政府的许多重大决策，都受他们左右。帝国主义的军队驻扎在京津、津榆沿线，控制着京津一带，清政府几乎把自己置于帝国主义刺刀的保护之下。庄而皇之的紫禁城失去了昔日的威严，座落在东交民巷的“使馆区”俨然成了清王朝的“太上政府”。帝国主义的传教士深入到我国各地的城镇乡村，横行霸道，控制和窃取各种权利，法

^① 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296页。

国天主教士王安之居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凶杀南昌知县江召棠，陕西竟有知县被教民掌握着。流窜黑龙江的“洋人”更是无法无天，他们公然大摇大摆地闯进各个村镇要粮派款，讹诈钱财，随意捕人，清政府的地方政权也不敢过问。一九〇二至一九〇三年，清政府又分别和英国、美国、日本签订了通商行船条约，使帝国主义获得免征厘金，增开商埠，扩大内河航行等利权。湖南长沙、山东济南、云南昆明、广西南宁、河南郑州、东北沈阳、长春、吉林、哈尔滨、齐齐哈尔等三十八处，陆续开为通商口岸。到一九一一年以前，帝国主义在中国开辟的通商口岸达八十二处之多。帝国主义商船在中国江河横行，军舰在中国沿海游弋。这些通商口岸变成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个个据点。同时，帝国主义在一九一一年以前已经在中国十六个城市设立了“租界”，并继续霸占着香港、台湾、澎湖等地，强行“租借”着澳门、九龙、胶州湾、旅大、威海卫和广州湾。这些地方完全变成了帝国主义控制下的独立王国，他们勾结当地的军阀、官僚、买办、地主和流氓恶棍，建立起非常残酷的殖民统治。

在经济上，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路权、矿权达到了疯狂的程度。粤汉、正太、沪宁、陇海、沪杭甬等十四条铁路被帝国主义所控制。全国九千六百多里的铁路中，中国自己的只有六百多里。帝国主义通过这些四通八达的铁路，控制沿线的城镇、乡村，掠夺沿线的矿产和农副产品。安徽的铜官山矿权被英国霸占；四川巴、万两县的油矿权被法国霸占；云南省有七个府的矿权分别被英、法霸占；山西的矿产被英、意垄断；东北的矿产几乎全被俄、日分占；甚至连顺德、内丘、盐城这样的小矿也被帝国主义侵占；如此等等，中国的路权、矿权不断丧失。与此同时，中国的财政金融也落入了帝国主义的魔掌。继英、德、日、俄相继在中国

开设银行后，美国的花旗银行和比利时的华比银行也在上海设立支行。据统计，到一九一三年，外国在中国设立了二十一个银行和一百零一个分行。帝国主义利用这些银行进行资本输出，设厂开矿，贷款给清政府，逐步控制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中国的海关、常关、盐课管理权这时已全部丧失。中国的许多城市，都设有帝国主义利用中国原料、雇用中国工人所开办的工厂。一九〇一至一九一一年，外国资本在中国投资设立的较大工厂（资本在十万元以上）为过去六十年开设数目的两倍以上，而资本投资额几乎为其五倍。这些工厂残酷榨取中国工人血汗，牟取巨额利润，垄断市场，囤积居奇，压迫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如英国的怡和洋行，共有三十多个企业，从保险、地产、轮船、码头直至电车、铁道、纺纱、缫丝、打包、木材、电灯、制糖、制冰、冷藏等等，无所不有。又如日本的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垄断的企业包括铁路、煤矿、自来水、电车、电灯、染织、酿造、榨油、印刷、旅馆等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垄断企业网。帝国主义控制着中国煤矿机器开采的百分之九十一（一九一二年），生铁生产的百分之百，棉纱市场的百分之七十六点零七（一九〇八年），铁路交通的百分之九十三点一（一九一一年），内外航运的百分之八十四点四（一九〇七年）。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的控制和掠夺，使中国陷入了“其商凄凉，其农憔悴，其士苦，其工苦”，“闻其声则号寒啼饥”，“问其事则鬻儿荡产”的悲惨境地。^①

在文化上，帝国主义通过加紧在中国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办报刊和吸引留学生，奴役中国人民，培养洋奴走狗。到一九〇五年，仅基督教教会所严密控制下的学校总数就多达两千五百

^① 《国魂篇》，《浙江潮》第1期。

八十五所，学生总人数达五万七千六百多名。一九〇七年，这个数字又在猛增，仅美国所办的学校就多达一千一百九十五所，在中国的传教士多达一千四百二十六人。沙俄也在这时创办和加强了北京的《燕都报》、旅顺的《关东报》、沈阳的《盛京报》、哈尔滨的《远东报》，宣扬侵略有理，进行奴化教育，妄图独占东北，肢解中国。值得指出的是，帝国主义这时狂热地展开“尊孔”活动。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一九〇一年狂叫“孔子是圣贤中的圣贤”，“孔子加耶稣”，就“没有不可克服的障碍”。^①英国传教士罗约翰在一九〇三年出版了他的《在满洲的传教方法》一书，大肆兜售他尊孔侵华的反动经验。他毫不隐讳地称孔学是他们侵华的“武器库”，叫嚷“孔子伦理中有无数方法，只要传教士具有同情的智慧，作为武器来利用他们，会有无可估量的价值”。^②一九〇五年，沙俄在其出版的《大百科全书》里，把孔老二吹捧为“志在为人类幸福奠定基础”的救世主。^③沙俄东正教北京主教莫诺肯提，公开宣称“东正教道义纯正”，“堪与夫子之道相辅而行”。^④所谓“相辅而行”，就是把东正教的侵略之道和孔老二的卖国之道结合在一起，同恶相济，侵略奴役中国人民，这就是他们“尊孔”的本质所在。有一个无耻的中国人讲得更明白，他说：“孔教日忠恕而已，西教日爱人如己；孔教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西教日己之所欲，必施于人；孔教以老安少怀友信为仁，西教以医药义塾善举为仁。流异源同，归于天道。”^⑤这真是难得的妙文，几乎不用做任何注解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

① 丁韪良：《震旦学或中国的智者》第247—248页。

② 罗约翰：《在满洲的传教方法》第244—245页。

③ 沙俄《大百科全书》，圣彼得堡一九〇五年版，第11卷，第666页。

④ 北洋洋务局编：《乙巳年交涉要览》卷2，第88页。

⑤ 陶浚宣、程宗裕编：《教案奏议汇编》序。

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①

帝国主义采取政治、经济、文化等形式掠夺中国的结果，使中国呈现了“谓之不亡不可，谓之亡亦不可”的严重局面。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愤怒地指出：“俄罗斯，自北方，包我三面；英吉利，假通商，毒计中藏；法兰西，占广州，窥伺黔桂；德意志，胶州领，虎视东方；新日本，取台湾，再图福建；美利坚，也想要，割土分疆。这中国，那一点，我还有分！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



一九〇一年后帝国主义在中国争霸图

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压制我”，众百姓，“拱手降洋”。^②这字字带血、声声含泪的言词道出了亡国大祸的迫在眉睫，揭露了清政府卖国崇洋的反动本质。

清政府在彻底投降帝国主义之后，还挂出了一块“新政”的招牌。所谓“新政”，就是把康有为、梁启超在戊戌变法时提出的口号接过来，也搞什么“变法维新”。一九〇一年，清政府下

^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655页。

^② 陈天华：《猛回头》，《辛亥革命》第2册，第151页。

诏要进行“变法”，并设立“督办政务处”，从事“新政”事务。清政府在这时提出办“新政”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的。一方面，《辛丑条约》之后，清政府“儿皇帝”的地位确定了，它要苟延残喘，必须乞求帝国主义主子的支持，这就需要在各个部门来一个“变法”，变得更好地去充当帝国主义的走狗；另一方面，由于清政府在义和团运动中的反革命两面派嘴脸和卖国贼面目彻底暴露无遗，人民反清斗争与日俱增，使清朝统治摇摇欲坠，于是清政府妄图用这种“变法革新”的姿态去欺骗人民，抵制革命。如果具体剖析一下“新政”的内容，清政府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镇压人民革命的反革命企图就昭然若揭了。

第一，清政府“新政”的重要内容是改革军制，编练新军和警察，强化反革命的军队。一九〇一年，清政府下令各省设武备学堂，并在本年内淘汰绿营、防勇十分之二、三，从中精选部分人员组成常备、续备、巡警等军。一九〇二年，清政府为了推广北洋和湖北编练新军的经验，急命河南、山西、山东、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各省派代表到北洋、湖北学习操练，学成回去编练新军。一九〇三年，清政府在中央设立练兵处，主管练兵事务，并在各省分设督练公所。一九〇四年，清政府将新军的官制、训练、招募条件、退休征调、给养军器等作了严密规定，同时把新军明确分为常备军、续备军、后备军三等，做好了编练新军的一切准备。一九〇五年，清政府又制订了在全国编练新军三十六镇（镇相当于师）的庞大计划，统一分配和布置，限各省分别在二至五年内按时练成。为了加强对人民的监视和镇压，清政府还在一九〇五年设立了巡警部（后改为民政部）。

第二，清政府在“新政”中调整一些机构，颁布一些法令，以适应帝国主义侵略的需要。除于一九〇一年七月将“总理各国

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外，一九〇三年清政府还设立了商部（后改为农工商部），聘请张謇等在实业界势力雄厚的人作顾问，并陆续颁布了《奖励公司章程》、《商会简明章程》、《公司律》、《公司注册试办章程》、《华商办理农工商实业爵赏章程》等一系列关于发展工商业的规章条令，企图以此来拉拢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使张謇一类人去死心塌地维护清王朝的反动统治。为了向帝国主义主子献媚，清政府颁布了《商标注册暂拟章程》、《重订铁路简明章程》、《重订矿务暂行章程》等一系列法令，明确规定要保护帝国主义在华修筑铁路、开采矿产、兴办工厂、资本输出等项特权，为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大开方便之门。同时，清政府还在“裁冗员”的旗号下，对一些机构和官员进行调整，把那些和帝国主义关系不大的机构撤销，将一些不适应卖国投降的官员罢免。清政府的“新政”，就是要博得帝国主义的欢心。

第三，清政府假“新政”之名，推行尊孔读经。从一九〇一年开始，清政府陆续采取废科举、废八股、办学堂和派留学生等措施，并令各省设立学堂，在中央成立学部以管理全国学堂。这无非是由于以前那种私塾、科举作为推行尊孔读经的工具不灵了，现在换一块学堂的招牌，以便照旧贩卖黑货。清政府明确规定各学堂以四书、五经为主课。一九〇三年清管学大臣张百熙、荣庆和湖广总督张之洞所订《学堂章程》中进一步规定，“中小学堂宜注重读经，以存圣教”。“若学堂不读经书，则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谓三纲五常者，尽行废绝，中国必不能立国矣”。^①其后，清政府更把读经作为大小学堂的必修科目，定“忠君、忠孔、尚公、尚武、尚实”为办学的总纲。更为荒唐

^① 《学堂章程》，《大清新法令》第11册。

的是，各学堂还炮制赞扬孔丘的歌曲，命学生歌唱，每至孔丘诞辰，各学堂致祭作乐，歌功颂德。清政府还在各地大修孔庙，把祭孔从中祀改为大祀。那拉氏无耻地宣称：“孔子至圣，德配天地，万世师表，允宜升为大祀，以昭隆重”。^①派往外国的留学生，清政府也把“尊君、尊孔”作为他们的做人标准。可见，清政府的这种废科举、办学堂和旧的私塾、科举考试没有什么两样，只是换了一块新招牌，而尊孔读经逆流却比过去更猖狂了。

第四，清政府利用搞“新政”来解决财政危机。帝国主义索取大量赔款，使清政府感到府库空虚，庞大的官僚集团荒淫无耻的生活耗费，使清政府财力枯竭。因此，清政府假“新政”之名，向广大劳动人民巧取豪夺。什么纳钱交粮、烟税、酒税、戏捐、学捐、油房捐、赔款捐，捐上加捐，税上加税，名目繁多，不胜枚举。清政府本来每年收入纹银七、八千万两，一九〇三年增到一亿两，一九一一年猛增到三亿两。数年间，人民的负担增加了三倍。再加上那些承办“新政”的贪官污吏，为了贪污中饱，任意增税加捐，广大人民被逼得流离失所、家破人亡，挣扎在死亡线上。仅湖南一省，灾民达十余万人。灾民们全靠“剥树皮，掘草根，勉强过活”，最后“树皮草根剥掘都尽”，只好沿街乞讨，“老弱者横卧街巷，风吹雨淋冻饿而死者，每日数十人”。至于卖儿鬻女，更不可胜数。更为悲惨的景况是，“妇女无处行乞，母子相抱而泣，或将三五岁幼孩忍心抛弃，幼孩饿极辄取街上粪渣食之”。^②这一幅幅惨不忍睹的灾民图，是对清政府“新政”的血泪控诉。

“凄凉读尽支那史，几个男儿非马牛！”封建势力和帝国主

^① 《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总第5607页。

^② 《湖南荒象志》，《汇报》第2974号。



官肥民瘦图

义勾结在一起，把人民推向了绝境。帝国主义是清王朝的后台老板，清朝是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清朝既是封建的朝廷，也是洋人的朝廷。因此，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时就主要表现为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走狗清朝的矛盾。当时的一些报刊曾指出：清政府“惟以媚外为宗旨”，“甘心为外人之傀儡而不辞”，“外人不过间接以亡我，而政府乃直接亡我”。^①中国人民逐渐认识到，要解除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首先要推翻清政府。清朝政府一日不去，中国一日不能自主，瓜分之祸一日不息。推翻帝国主义走狗清朝的统治，就成了中国人民最迫切的要求。

二、群众斗争风起云涌

二十世纪初年，社会上普遍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这世界不得了，富的富（得）不（得）了，穷的穷（得）不（得）了，不造反，不得了。”这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矛盾的极端尖锐化，而且道出了

^① 《论中国之前途及国民应尽之责任》，《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461页。

广大劳动人民不忍黑暗，要奋起造反的心声。随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动统治的加紧，很快出现了一个人民革命的高潮。工人阶级的反抗斗争接连不断，农民阶级的武装暴动如火如荼，少数民族人民的武装起义层出不穷，汇合成惊天动地的革命风暴，席卷全国。

辛亥革命前，中国的产业工人约五、六十万。一九〇二年，上海耶松船厂的广大工人群众，不忍地狱般的黑暗生活，一年之内发动了两次大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反对资本家对工人的迫害。

一九〇三年，云南个旧锡厂工人掀起反抗法帝国主义修筑铁路，侵占锡厂的斗争。数日内，群众响应者万余人，攻下临安、石屏等地。河西、江川、宁州、泸西、元江各处工人群众也揭竿而起，清朝官吏惊呼：“势等燎原，几难收拾。”^①这场斗争一直坚持了三个多月，显示了无产阶级的巨大力量。

一九〇四年，成都兵工厂全厂六百多工人举行了持续十六天的大罢工，抗议资本家克扣工资。盛京辑安一带的伐木工人举行武装起义，反对日本掠夺我国木材。

一九〇五年，汉口铜货帮三千多工人举行声势浩大的罢工，反对资本家克扣工资。同年，上海华新纱厂工人举行了反对日本吞并该厂的罢工斗争，愤怒的群众痛打出卖该厂的中间人，洋鬼子吓得狼狈逃窜。这年五月，安源煤矿工人，面对帝国主义分子的横行霸道，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工人们团结起来，向帝国主义分子冲去，把洋楼打得稀巴烂，帝国主义强盗吓得夹着尾巴逃往湖南。事后，他们心有余悸地供称：“各工人势甚汹汹，几

^① 《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总第5053页。

成不了之局，烦言啧啧，人心惶惶”。^①

这时工人群众的斗争虽然仍是自发的、分散的，但却此起彼伏，接连不断，从一九〇一到一九〇五年，较大的工人斗争达二十五次之多。这些涓涓细流，必将汇成滚滚的波涛，汹涌激荡。

农民阶级是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一九〇一年，山西高平县爆发了反捐税、反洋教的群众斗争。广大农民群众不满清政府借“新政”为名，增收苛捐重税，他们在铁匠牛文炳的率领下，奋起反抗。他们在各村发布告白、“鸡毛传单”，誓与清政府“决一死战”。十一月十三日，数千群众冲入县城，打开监狱，将六名义和团首领救出，并把洋教士住过的房屋统统捣毁。

一九〇三年，山西永济县发生了群众性的反抗柿酒税斗争。永济县山丘纵横，柿树成行，过去农民用柿酿酒，向无酒税。清政府办“新政”后，永济县令随便抽收酿酒税，激起群众愤怒。数千群众组织起来，涌进县城，把县衙捣毁。县官吓得惊慌而逃，被迫停止收酒税。同年，云南镇边厅彝族张朝元聚众三千余人，佯族李三明、刀文林云集五、六千人，先后发动起义，互相配合，“攻据汉土城寨”。同时，声势浩大的广西会党大起义也在这一年爆发了。广大农民群众和受革命影响的部分清军纷纷起来，矛头直指地主豪绅、贪官污吏、洋商洋教士。一九〇四年，起义大军迅猛发展，遍及全省，控制了广西几十个州县。七月，起义军攻下柳州，分兵三路，直趋广东、贵州、湖南，各地人民纷纷响应。清政府急派十几万大军前来镇压。起义军虽然英勇抵抗，但终因寡不敌众，于一九〇五年失败。这次起义极大的振奋了

^① 一九〇五年六月十二日《时报》。

全国人民，推动着人民群众革命高潮的到来。

一九〇四年，江西乐平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抗“抗捐”的群众斗争。革命群众在夏廷义的率领下冲进县城，夺取洋枪，捣毁收税的捐局、厘卡和绅士的房屋。大小官吏惊恐万状，抱头鼠窜，江西巡抚急速加派瑞澂带兵千人，赶往乐平。由于混入革命队伍的奸细的出卖，抗捐斗争失败了。同年，云南省永善县革命群众组织红灯教，竖起造反大旗，明确提出要“打灭洋教，重兴拳会”，给洋教士以重创。广西省罗县欧四等人发动武装暴动，两千多人立即响应，一举攻占了罗县县城，清朝官吏望风溃逃。

一九〇五年以后，农民群众的反抗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各地反抗斗争的次数在增加，规模在扩大。一九〇五年，四川巴塘藏族人民发现清朝驻藏帮办大臣凤全袒庇洋人，怒不可遏，聚众三千余人，杀死凤全及其随员五十多人和法国天主教司铎两人，并焚毁教堂、粮署，给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以应有的打击。同年，湖北宜城县“屯农”发动了反抗清政府减价征缴屯田的斗争，他们鸣锣聚众，响应者云集，数日内汇集三万多人，将县署包围，把土豪驱走，和清军搏斗，震动了湖北全省。山西绛州教士为非作歹，抢占民产，清朝官吏有意包庇，激起人民反抗怒火。当地会党首领童文修等率众起义，起义队伍兵分两路，一路攻入绛州城，一路攻入茅津渡，声势大振，当地部分清军投入起义队伍。清政府极为恐慌，急调河南和山西清军联合把起义军绞杀。

一九〇六年，河南遂平县苗金声率众起义，反抗当地官吏袒护教民，欺压百姓。当起义队伍攻至武城，敌人早有准备，于是转攻西平县的大王庄和金钢寺，向城南进军。清军惊恐，电请省里派兵镇压。当时湖北清军首先赶到，将起义军残酷镇压。同年，陕西省扶风、渭南两县人民对清政府增派铁路捐税不满，奋



一九〇六年南昌人民反帝斗争

起抗争。他们使用原始武器将从华州到华阴的洋人的教堂、电线、电杆和洋学堂全部击毁。接着，攻入城内，把洋教堂、官钱局、官盐局全部砸烂，教民望风逃避，官吏被迫宣布停征路捐，惊慌而跑。清政府立刻调附近清兵前来，残杀乡民，把革命风潮镇压了下去。

一九〇七年，江西南康县人民不满传教士的作威作福，举行暴动，上下二百余里同时响应，烧毁教

堂、教民房屋，杀死教士，袭击保护教堂的清军。起义军执旗持械，围攻赣城，“图攻郡城”。清朝急调广东、湖南的军队才把起义镇压下去。同年六月，四川开县谭汝霖等不忍洋教士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率众将县里教堂、学堂和教民霸占的民房砸毁。开县知县亲率防勇团丁前来镇压。谭汝霖率众迎战，轰毙团勇，夺去军械，清军大败，退守县城。广大群众闻讯，纷纷起来参加战斗，声威大振。于是分为三队，一队奔万县，一队围攻开县县城，一队往新宁。大队所过之处，洋学堂、酒捐局、油厘局全被打毁，绅士财产一律抢光。大长了革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洋教士、土豪劣绅的威风。

工农群众前仆后继、风起云涌的革命斗争，不仅沉重打击了

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政府的反动统治，而且在斗争中使自己得到了锻炼提高。他们的斗争具有极其鲜明的特点：

第一，人民群众的斗争发起快、次数多、规模大。许多地方的斗争在一天内聚众千人，在几天内就聚众万人，甚至几万人。只要有一人登高疾呼，响应者就遍及各地。正象清朝官吏所供认的：“一有倡首发难之人，遂成星火燎原之势”，“虽拥一妇人女子、稚儿顽童，一朝而可以啸聚千百人。”^①这说明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哪里点火，哪里燃烧。一九〇五年的群众斗争为九十多次，一九〇七年便增到一百九十多次。各次人民群众的斗争有的遍及全县或几十县，有的遍及一省或数省。例如广西全省十五个府，除桂林、平乐两府外，其他十三府的群众斗争，“无处无之”。山东曹州府十一个县，县县爆发了群众反抗斗争。甚至连清政府统治最严密的直隶也是各种反抗力量“啸聚成群，所在皆有”。^②清朝官吏一再哀鸣“遍地是‘匪’”，“无地不‘匪’，无人不‘匪’。”透过这些诬蔑的字眼，可以明显地看到群众斗争的烈火遍地燃烧。

第二，人民群众的斗争具有极大的广泛性。一九〇三年六月，两广总督岑春煊在奏折中说，当时参加反抗的“有会而‘匪’者，有兵而‘匪’者，有民而‘匪’者，有商而‘匪’者，有官而‘匪’者。”岑春煊的攻击，从反面透露了当时投入反清斗争行列的阶层的广泛性。不仅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和部分士兵反抗清朝统治，一些商人、中小地主和下级官吏也由于本身利益受到侵犯而图谋反抗。据一些官吏在奏折中讲，一九〇一年山东潍县商人罢市，一九〇四年江苏镇江各县罢市，一九〇五年江苏清江罢

^① 《光绪二十九年四月署理四川总督岑春煊折》，《清军机处档案》。

^② 《光绪二十七年直隶总督李鸿章片》，《清军机处档案》。

市，福建厦门商人罢市，一九〇七年广州钦州罢市，甚至有些身着“庠序衣冠”的士绅，也参加了群众的斗争。同时，不仅汉族人民反抗激烈，蒙、藏、回、苗、彝、僮、黎、侏佻等兄弟民族的群众起义也经常出现。全国人民的普遍觉醒，迅速趋向革命，标志着清朝统治即将土崩瓦解。

第三，人民群众的斗争形式多种多样。遍及全国的人民群众斗争，有的继续高举义和团的革命旗帜，采取反洋教的方式，从反对洋教士的胡作非为引向反对清政府的苛政暴敛；有的采取抗捐抗税的形式，从直接反对清王朝的残酷剥削引向反对其主子帝国主义者；有的采取反饥饿的形式，从人民生活中最迫切的问题引向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有的利用过去的秘密结社，更大规模地展开斗争，如大刀会、小刀会、三合会、龙华会、哥老会等等；有的公开采取“揭竿而起”的方式，聚众起义，据守山林，和清政府展开面对面的斗争。他们的斗争策略也极为灵活，遇强敌，分散隐蔽；强敌追，分为数股；敌逃跑，集中出击，使得清朝官吏哀叹：这些起义“旋灭旋生，猝难尽绝”。^①

第四，人民群众的斗争锋芒有着明确的针对性。他们开始把反清政府和反帝国主义的斗争结合起来。工人群众在斗争中，既反对资本家，又打击帝国主义侵略分子。农民群众在抗捐抗税和反饥饿斗争中，既打击封建地主，又捣毁洋行、商店；在反教会斗争中，既焚教堂，杀死传教士，又击毙保护教堂的贪官污吏。这些都反映了人民斗争觉悟的极大提高。

在工农群众自发的革命浪潮的推动下，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收回帝国主义霸占的路权、矿权的反帝爱国运动蓬勃开展。

^① 《光绪二十八年九月署理四川总督岑春煊折》，《清军机处档案》。

一九〇三年，湖南、湖北、广东的绅商发起收回美国霸占的粤汉铁路，广大人民群众踊跃参加，坚决要求清政府废除与美国合兴公司签订的出卖粤汉铁路的章程。经过两年的坚决斗争，于一九〇五年将粤汉铁路赎回，由三省自己筹款修筑。这次斗争的胜利，是对各省人民的极大鼓舞。一九〇四年，四川广大群众奋起揭露清政府出卖川汉铁路的卖国罪行，要求自行筹款修路。一九〇七年，河北、山东、江苏三省商民士绅发起了自办津浦铁路的斗争。江苏人民也群起反对英国修筑沪宁铁路。浙江和江苏的商民为了收回苏杭甬铁路的修筑权，自己成立商办铁路公司，并加紧筹集股份，组织人力，要动工修筑。他们不畏清政府的镇压和英帝国主义的恫吓，举行集会，发刊文章，和英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政府展开面对面的斗争。一九〇七年，有的学生以身殉路，有的工程师绝食而死，显示了他们誓死争回苏杭甬铁路的决心和勇气。

广大人民群众在争回路权的同时，掀起了收回矿权的热潮。一九〇五年，黑龙江省人民经过坚决的斗争，收回了被沙俄占据的都鲁河金矿。同年，山西绅商及广大群众要求清政府撤销和英国订立的卖国的“采矿条约”，决心收回英国福公司在—八九八年霸占的山西平定、盂县、潞安、平阳、泽州五处的煤矿、铁矿和石油矿。斗争展开后，不仅受到山西全省人民的大力支持，而且远在日本留学的山西籍留学生也发表声明，反对英国福公司的强盗罪行。在革命群众的强大压力下，英国福公司不得不在一九〇七年撤走，五处矿权收归山西人民所有，他们成立“保晋矿务公司”，自行开采。这场斗争的胜利，大长了革命人民的志气。一九〇八年，奉天（辽宁）人民经过英勇斗争收回了锦西暖池塘煤矿。山东中兴煤矿排除了德国的股份，收归华商自办。

一九〇九年，四川商民组织江合公司，收回了江北厅煤矿。安徽路矿公会联合各界人士，发起组织了“铜官山煤矿抵制会”，发动群众和英帝国主义分子斗争，终于收回了铜官山煤矿的开采权。湖北、云南等地也陆续展开斗争，收回了一些矿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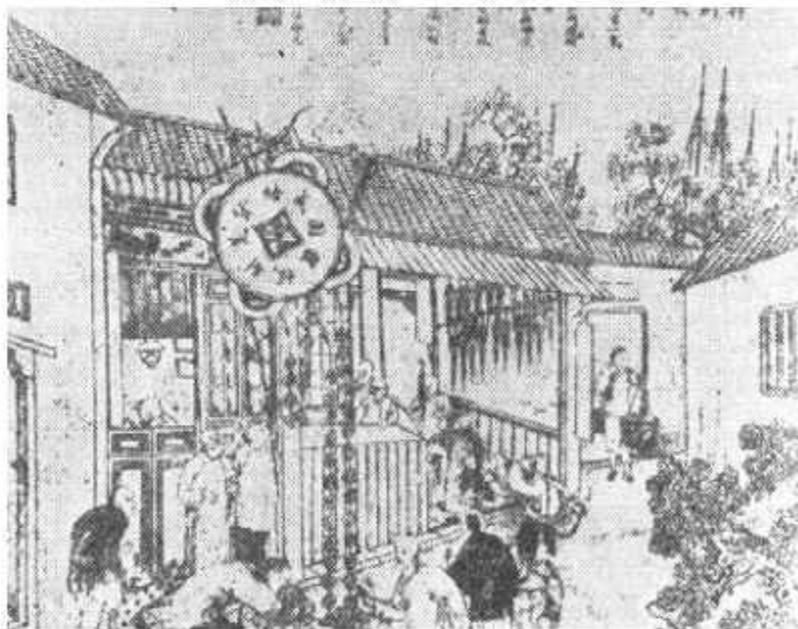
在遍及祖国各地的收回利权的爱国运动中，一九〇五年的反美爱国斗争尤其振奋人心。

美国为了开发西部的金、银、煤、铁矿山，在鸦片战后的几十年间，从中国拐骗十多万华工。这些华工被美国看作最廉价的劳动力，资本家随意侮辱，任意鞭打，他们被关在木笼子里，听候使用。华工不仅开矿，而且修铁路、开荒地、开果园、洗衣、织布。美国西部的繁荣，倾注着华工的血汗。七十年代后，美国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接连发生，许多工商业倒闭，大批工人失业，工人们展开了规模巨大的罢工斗争。美国资本家为了镇压工人运动，转移斗争视线，煽动排华活动。他们叫嚷什么：美国工人之所以失业，生活苦，是华工、华侨夺了他们的饭碗。他们煽动群众把华工的金钱抢走，房屋烧毁，把檀香山华侨居住的唐人街全部烧光，甚至鞭打屠杀华人。有一矿山，一次就杀死华人两万多。不仅如此，凡是经过美国国境的中国人都要遭受非人的虐待。中国人抵美，美国常关就以检疫为名，把他们关在木笼子里，横加凌辱，连清政府的外交官也逃不过。

美国政府的这种法西斯暴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中国人民通过各种报刊向美国政府发出强烈抗议。一九〇四年，正值清政府和美国政府于一八九四年订立的《中美会订限制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款》期满，中国人民纷纷要求废除这一不平等条约。凶狠的美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正义呼声不但充耳不闻，而且惨杀华工日甚一

日。长期充积在中国人民心头的怒火迸发了。一九〇五年五月，上海工商界召开大会，声讨美帝国主义迫害华工的罪行，号召展开强大的抵制美货运动。他们提出的具体办法是：（1）不购用美货；（2）一律不用美国轮船运货；（3）不作美国商行的买办翻译；（4）被迫为美国做工的工人一律停工；（5）华人子弟一律不入美国所立学堂读书。他们并向各省发出呼吁，要求采取一致行动。全国各地的工人、农民、学生、妇女、商人以及一些爱国资本家，直至儿童都热烈响应，踊跃参加，立即展开抵制美货活动。上海缝纫工人不作美国布料衣服，刻字工人不刻印美货商标；香港搬运工人不运美国货物；广州食品工人不用美国面粉；汉口、镇江、营口等地的码头工人拒绝装运美货；国内各地的学生不用美制文具书籍；嘉定各县的农民群众将美货统统烧毁；甚至连南洋、日本、美洲、欧洲各地的华侨也动员起来，不用美货。当时祖国各地反美集会轰轰烈烈，演说之举激浪滚滚，电报传单频传交飞，形成了近代史上空前规模的反美运动。

反美爱国运动的猛烈展开，使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政府极为恐慌。清政府急忙下令查禁各地的集会演说，逮捕参加爱国运动的各方人士。美帝国主义一面进行外交恫吓，



广州人民宣传反美运动的纸鸢

一面和上海以及其它一些地方的买办资本家勾结起来，千方百计地加以破坏。美帝还向那些参加了反美斗争但和帝国主义有某些联系的资本家、商人施加压力，威胁利诱，迫使其屈服。随着这场运动的深入发展，资本家和商人退缩了下来，而买办洋奴又从中破坏，加之清政府的疯狂镇压，最后运动遭致失败。

反美爱国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却广泛地宣传了反帝爱国思想，提高了全国人民的觉悟，沉重地打击了美帝国主义，推动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

“山雨欲来风满楼”。全国人民的反抗斗争犹如滚滚长江波涛，一浪高过一浪，猛烈的冲击着清政府这只即将沉没的破船。一个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就要到来了。正如孙中山所敏锐地指出的那样：清王朝可以比作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已从根本上彻底地腐朽了”。^①“中国现今正处在一次伟大的民族运动的前夕”。^②

三、革命、保皇决分二途

热火朝天的人民革命运动，使以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为阶级基础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以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为阶级基础的资产阶级保皇派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袖孙中山回忆当时的情况说：一八九五年广州起义失败后，“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惟庚子失败之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

^{①②} 孙中山：《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孙中山选集》上卷，第62、63页。

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吾人睹此情形，中心快慰，不可言状，知国人之迷梦已有渐醒之兆。加以八国联军之破北京，清后、帝之出走，议和之赔款九万万两而后，则清廷之威信已扫地无余，而人民之生计从此日蹙。国势危急，岌岌不可终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自此萌芽矣。”^①这表明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在二十世纪初年，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与此同时，以康有为、梁启超为头子的资产阶级保皇派也在猖狂地活动。早在一八九九年，康有为就在加拿大建立了保皇会。随后又在南洋、欧、美、澳等地到处设立保皇组织。没过几年，保皇派的势力“凡百七十余埠，遍于五洲，会众以数十万计”^②，形成了一股反动的政治力量。这些保皇分子，一面在经济上到处骗取华侨商人的钱财，在世界各地设立公司、银行，牟取暴利，作为保皇的活动经费，当时的上海广智书局、广西天平山锡矿、香港华益公司和振华实业公司、墨西哥银行和轮船公司、纽约的杂碎馆和琼彩楼等，全被保皇派所占有；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大搞保皇活动。康有为伙在温哥华、维多利亚等地为载湫祝寿，乞讨载湫多活几年，幻想有朝一日载湫复辟，自己好作开国元勋。保皇势必反对革命，他们“反对革命，反对共和，比之清廷为尤甚。”^③

革命派和保皇派，一个要革命，一个要保皇，两个营垒，两条路线，针锋相对。但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康、梁一伙保皇派反革命真面目的认识，却经历了一个较为曲折的过程。

① 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74—175页。

② 《开国前革命与立宪之论战》，《建国月刊》第8卷，第6期，第3页。

③ 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73页。

戊戌变法失败后，孙中山等许多革命派认为康、梁吃了清政府的苦头，这下该幡然猛醒，改弦易辙，奋起反清了。孙中山几次派人去找康、梁，谋求和他们联合反清。但康有为死抱住他的改良主张不放，反复强调：“今上圣明，必有复辟之一日。余受恩深重，无论如何不能忘记，惟有鞠躬尽瘁，力谋起兵勤王，脱其禁锢瀛台之厄，其他非余所知，只知冬裘夏葛而已”。^①可是，狡猾的梁启超，为了挖兴中会的墙角，扩大保皇会的阵地，乘康有为离开日本之机，十分亲热地表示要和革命派合作到底，并假惺惺地表白只要合作，孙中山可当会长，他自己当副会长。梁启超这一“进步”姿态，使不少革命党人受骗上当。

革命派在日本横滨设立的兴中会分会，团结了不少革命志士。梁启超一伙恨得要命，为了扩充保皇势力，他打着“合作”的旗号，把革命派在横滨创办的中西学校抢夺过来，改为大同学校。他们在大同学校大搞尊孔保皇，“每星期日，生徒须对孔子像前行三跪九叩礼。”谁不服从，就“迫令退学”。他们讲课答题，全“歌颂圣君誉扬新政”^②，搞得乌烟瘴气。甚至有一次孙中山到大同学校去都遭到了冷遇。同时，梁启超一伙摇唇鼓舌，大肆在兴中会中活动，诱骗蒙蔽了不少兴中会会员倒向保皇派的行列，兴中会横滨分会几致瓦解。

兴中会檀香山分会是孙中山最早建立的，它犹如一把火炬，屹立海外。一八九九年冬，康有为指示梁启超到檀香山去建立保皇会。善耍阴谋诡计的梁启超找到了孙中山，极力表白要“合作到底，至死不渝”，并骗取了孙中山的亲笔信，介绍梁到檀香山。梁一到那里，就以孙中山的“亲密战友”自居，到处招摇撞

^{①②}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49、51、52页。

骗，胡说什么保皇和革命目标一致，殊途同归，只不过为了掩护革命，在国内能公开活动，“用保皇会的名义则进行可以便利”。加上他带有孙中山的亲笔信，致使许多兴中会会员纷纷加入了保皇会，连孙中山的哥哥孙眉也不例外。革命派在檀香山的阵地被保皇派窃据了。

孙中山等革命派在广东和长江流域经过长时间的艰苦努力，把广东三合会和两湖哥老会联合了起来，于一九〇〇年春夏之交，在香港召开兴中会、哥老会和三合会联合大会，推举孙中山为总会长，准备利用北方义和团运动兴起，清政府无暇南顾的时机，发动一次武装起义。可是，保皇分子又打出“殊途同归”的旗号，通过诱骗手法，把哥老会龙头拉了过去，不搞反清，而搞“勤王”，结果惨遭失败，使兴中会在长江流域辛辛苦苦经营起来的群众基础遭到严重摧残。

一九〇一到一九〇四年，保皇派为了夺取更大的地盘，陆续出版了《清议报》、《新民丛报》、《外交报》、《东方杂志》、《扬子江》等刊物，以此为阵地，向革命派进攻。为了迷惑革命派，梁启超这时装出一副折衷公允的面孔，大肆贩卖孔老二的中庸之道。一九〇一年，他在《清议报》上发表一篇《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的妙文，极力鼓吹“道相行而不相悖”，把自由与专制、利己与爱他、独立与合群等一系列的社会现象说成是合二而一，同出一源。他还把自己打扮成求团结合作的化身，攻击革命派“不识群义”。这无非是企图抹煞是非界线，在“合作”的幌子下将革命势力一举消灭。为了进一步向革命派灌迷魂汤，梁启超还陆续发表了《过渡时代论》、《新民说》、《论立法权》等论文，高谈什么“大变革”、“大破坏”。将其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主张标榜为“无血破坏”，用以对抗革命派的“有血破坏”。这充分说明梁启超的所

谓“变革”、“破坏”，其实质是让清政府做出一点改革的姿态，分给他们一部分权力，抵制革命派发动的暴力革命。一九〇二年，康有为发表了《辨革命书》，赤裸裸地为清政府歌功颂德，对革命派恶毒攻击。他把载湫吹捧为仁至义尽的旷世圣主，推行的完全是“大地各国所未有”的“古今至仁之政”。^①他胡说：革命者开口必攻清政府，“此为大怪不可解之事”。^②一九〇三到一九〇四年，梁启超见群众革命斗争风潮已甚，其伪装赞同革命难以骗人，就索性摘去了“合作”的假面具，接连发表了《论俄罗斯虚无党》、《新大陆游记》、《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等论文，公开咒骂革命如蛇蝎猛兽，使人民“朝避猛虎夕长蛇，新鬼烦冤旧鬼哭”。甚至胡说：“中国每当国内革命时代，即外族势力侵入时代也。”^③他还极其恶毒地要清政府出兵屠杀革命派，叫嚷什么“后膛枪出而革命绝”。

保皇派从组织到政治思想领域大肆向革命进攻，从反面教育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孙中山认真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深感过去只专心致力于武装斗争而没有注重抓舆论宣传工作的不足，认识到击退保皇派的进攻，肃清“保皇毒焰”，是将革命向前推进的关键，他明确指出：“非将此毒铲除，断不能做事”。^④于是他积极组织革命力量，向保皇派开战，决心夺回被康、梁一伙骗去的阵地。

一九〇〇年四月，在孙中山的积极倡导和支持下，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保皇派盘踞的横滨办起了《开智录》，鼓吹反清革命，驳

^{①②} 康有为：《辨革命书》，《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214、212页。

^③ 梁启超：《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807、810页。

^④ 孙中山：《致黄宗仰乌目山僧函》。

斥保皇谬论，开始了革命和保皇的交锋。一九〇三年七月，孙中山亲自奔赴横滨，向那些受保皇派蒙蔽的青年讲述国内外的形势，谈论革命，讨论反清救国的道理和方法，帮助他们从思想上划清革命和保皇的界线。同年八月，孙中山为了组织革命力量，还在东京的青山创办了一所军事学校，不少革命分子积极入校学习。孙中山在青山军事学校的誓词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①的革命纲领，这就从思想上武装了资产阶级革命派，使他们明确了斗争目标，看清了革命和保皇的根本区别。青山军事学校立即变为革命派鼓吹革命的生气勃勃的场所。此后，孙中山不辞辛苦，又转战檀香山。檀香山这时已被保皇派控制，孙中山以仅有的十几名革命分子为骨干，并改组《隆记报》为兴中会机关报，大张旗鼓地宣传反清有理，保皇有罪，揭露保皇派的反革命面目，使许多误入保皇会的兴中会会员幡然醒悟，投奔革命阵营，革命空气又重新弥漫海岛。这就更加激起了保皇派的仇视，他们在保皇派的机关报《新中国报》上连刊文章，恶毒攻击孙中山。孙中山针锋相对，接连写了《驳保皇报》、《敬告同乡书》等文，将康、梁一伙的丑恶面目揭露得淋漓尽致，把保皇派的谬论驳得体无完肤。孙中山尖锐地指出：“革命与保皇，理不相容，势不两立”，“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梁启超“一人而持二说，首鼠两端，其所言革命属真，则保皇之说必伪，而其所言保皇属真，则革命之说亦伪矣”。康有为的《辨革命书》就是要人们“不可行革命，不可谈革命，不可思革命”^②，死心踏地充当清王朝的奴仆。孙中山的这些言论，似钢刀利剑，打中了保皇派的要害，使保皇势力

^① 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第74—75页。

^② 孙中山：《敬告同乡书》，《孙中山选集》上卷，第51、52页。

在檀香山一蹶不振，使当地侨胞“耳目为之一新”，坚定了跟随孙中山反清革命的决心。

一九〇四年春，孙中山从檀香山到达旧金山。旧金山有一个反清秘密团体致公堂，人员遍布美洲许多地方。九年前孙中山曾在这里宣传革命，使致公堂变为一个重要革命组织。但此后被康、梁一伙破坏，保皇势力竟把持了致公堂部分权力。孙中山团结致公堂总理黄三德等一起宣传革命宗旨，打击保皇派的气焰。他们将保皇派占领的致公堂的机关报《大同日报》夺回来，由革命派担任主编。《大同日报》连刊革命文章，使革命思想荡及全美。经过实地的调查研究，孙中山感到致公堂在保皇派的破坏下人员混杂，思想混乱，有必要从组织上、思想上进行一次整顿。他协助黄三德等人，对所有致公堂会员重新登记，注册载明。同时为致公堂重订新章程，明确指明致公堂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致公堂的纯洁性，增强了战斗力。同年夏，孙中山又和黄三德一起到洛山矶、华盛顿、费城、芝加哥和纽约等数十城市的华侨中宣传革命，各地致公堂热烈欢迎，保皇分子望风而避，革命派在美国的华侨中打下了基础。紧接着，孙中山又赶往欧洲，把在德国、比利时、法国留学的革命分子组织起来，成立了革命团体，加入者近百人。从此，保皇派在欧洲失去了立足之地。

孙中山在和保皇派的斗争中，表现了坚毅的革命精神。他一旦认清了保皇派的反革命真面目，就组织革命派奋起反击。从日本战斗到檀香山，从美国又奋战到欧洲，终于夺回了被保皇派占据的阵地，取得了胜利。一九〇四年后，孙中山“漫游所到，凡有华侨之处，莫不表示欢迎，较之往昔大不同矣。”^①在东南

^① 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75页。

亚，革命派在华侨中组织的中和堂，“分会遍设槟榔屿、吉隆坡、怡保、坝罗各埠，从者日众”。^①革命势力在一天天壮大，保皇势力在一天天缩小。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对保皇派的反击，从政治上、组织上划清了革命和保皇两条路线的界线，使革命思想深入人心，为革命派在组织上进一步发展，舆论上扩大宣传，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四、民主潮流浩浩荡荡

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和康、梁一伙保皇派作斗争的同时，开展了大规模的舆论宣传工作，为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大喊大叫。

在这场大造革命舆论的运动中，年青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一批勇敢的闯将。他们在义和团运动后，面对民族危机的严重，目睹阶级压迫的加深，许多人由爱国趋向革命。他们不满中国的现状，仇恨帝国主义的侵略，痛感民族的危亡，愤恨清政府的腐败，积极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象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②

日本的东京，中国的上海，是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极为活跃的两个地方。“凡留学生一到日本，急于寻求的大抵是新知识。

① 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第75页。

②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1358—1359页。

除学习日文，准备进专门的学校之外，就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演讲”。^①“东京留学界之思想言论，皆集中于革命问题”。^②一九〇二年春，正值明朝灭亡二百四十二周年，革命派积极活动，准备以纪念明朝的灭亡，来申斥清王朝的罪行，唤起大家反清革命。他们经过串联，有数百人要求参加这一活动，并写出了纪念会宣言书，分发海外华侨，声势越搞越大。这可吓坏了清朝驻日公使蔡钧，他乞求日本政府横加阻止，致使纪念会没有在东京开成，而改在横滨举行。一九〇三年春节，留日青年学生借团拜宣传革命。许多青年登上讲台，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他们愤怒揭露清政府卖国崇洋，大声疾呼亡国灭种危在旦夕，强烈呼吁大家积极投入推翻清政府的斗争。参加团拜会的青年，个个怒发冲冠，表示和清廷不共戴天，决一死战。有的青年索性把名字改为“‘扑满’、‘打清’之类”，“这些大号，自然和实际的革命不甚相关，但也可见那时对于光复的渴望之心，是怎样的旺盛”。^③

在上海，一九〇二年蔡元培等组成了中国教育会。从文化教育入手，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恰好在这一年，东京留学生与驻日公使蔡钧发生冲突，一部分人被逐回国，上海南洋公学也发生学潮，二百多名学生退学。蔡元培等马上设立爱国学社，接纳这批人入学。不久，南京陆师学堂也有一部分学生退学来到爱国学社。这些立志改革现状、热情奔放的青年，聚集一堂，意气风发，倡言革命，爱国学社变成了宣传革命的场所。他们经常在张园集会，批评时政，鼓吹革命。他们翻译了大批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作品。卢骚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

① 鲁迅：《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鲁迅全集》第6卷，第556—557页。

② 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75页。

③ 鲁迅：《杂忆》，《鲁迅全集》第1卷，第204—205页。

理》、赫胥黎的《天演论》等等成了他们的必读书。还有美国独立史、法国革命史等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书籍，他们也如饥似渴地学习。他们力图运用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天赋人权等作为思想武器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在翻译阅读西方资产阶级作品的同时，这批青年知识分子又办起了各种报刊。宣传革命的《国民报》、《游学译编》、《新湖南》、《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苏报》、《大陆月刊》、《童



革命派发行的书刊

子世界》、《女子世界》、《中国白话报》等刊物先后在东京和上海等地出版。革命派以这些报刊杂志为阵地，大力鼓吹革命，抨击清政府，宣传民主思想，批判改良主义，阐明政治主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随着革命民主思想的广泛传播，涌现了许多出色的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章炳麟、邹容、陈天华、秋瑾就是他们杰出的代表。

章炳麟（一八六九——一九三六年），号太炎，浙江余杭人。青年时期，他就注意研究法家著作，并推崇他们反抗外族入侵的正义行动。甲午战争后，他在民族危机的强烈刺激下，孜孜不倦地阅读日本和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社会学方面的书籍，从中寻求“学理”，并开始投入救亡图存的活动，参加康有为等改良派主办的《强学会》，为梁启超等在上海创办的《时务报》撰写文章，鼓吹维新变法。一八九八年，他曾被张之洞拉去主编《楚学报》，但他不受张之洞的笼络，旗帜鲜明地反对张之洞宣扬孔孟之道、鼓吹“忠君”思想的《劝学篇》，结果被赶出武昌。但这时他对清政府反动面目的认识仍十分肤浅。一八九九年五月，他写了一篇《客帝论》，鼓吹为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可以承认清政府为“客帝”，让它“悔过自新”，发奋图强，共同御侮。八国联军的侵入，《辛丑条约》的签订，从反面给章炳麟上了重要的一课，使他不得不面对严酷地现实来重新考虑问题，促使他走上反清革命的道路。他开始认识到，清政府已彻底变为帝国主义的走狗，要御侮必须反清，于是，他写了《客帝匡谬》，纠正了自己过去的错误，指出不推翻清政府，“欲士之爱国，民之敌忾，不可得也”。一九〇〇年，他坚定不移地反对唐才常以“勤王”为号召的“自立军”活动，毅然剪去发辫，并写了《解辫发》一文，表示与改良派决裂。同年，他编辑出版了在这以前所写的包括《商鞅》、《尊荀》等五十篇文章的论文集——《馗书》。一九〇一年，他写了《秦献记》，以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高度赞扬了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秦始皇建立秦王朝的功绩，肯定了秦始皇厚今薄古的重要措施——“焚书坑儒”，大力提倡秦始皇的变革精神。这年初，他看望了他的老师俞樾，俞樾搬出孔老二的一套，骂章太炎“不忠”、“不孝”。敢于造反的章太炎并没有在骂声中妥协，他写了《谢本

师》一文，驳斥了俞樾的谬论，宣布和俞樾断绝师生关系。一九〇二年，他又修改出版了《癸书》，其中增加了《学变》等一系列尊法反孔的文章，为蓬勃兴起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大造舆论。

一九〇三年，章炳麟针对康有为一伙保皇派为清政府歌功颂德，写了著名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严正指出：清政府是人民的仇敌，帝国主义的

帮凶。载湫小丑，“未辨菽麦”，只会“尊事孔子，奉行儒术，崇饰观听”，“以便其南面之术，愚民之计”。象载湫这样的皇帝，连自己性命都握在那拉氏手里，望他改革立宪，犹如“酿四大海水以为酒”，白日作梦。针对康有为“只可立宪，不可革命”的谬论，章炳麟有力驳斥道：要立宪必须经过革命，不革命就无法立宪。

“流血成河，死人如麻，为立宪所不可幸免者”。“以一人之诏旨立宪，宪其所宪，非大地万国所谓宪也”。他热情奔放地歌颂革命能改变一切，指出“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针对康有为散布的“天命论”，章炳麟一针见血地指出：“拨乱反正，不在天命之有无，而在人力之难易。”“民主之兴，实由时势迫之”，“合众共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章炳麟还揭露了康有为的



癸 书

卑劣用心，指出康有为名为“致书”华侨商人，实为致书清政府表功，是“热中于复辟以后之赐环”。康有为是载湉的“私友”，人民的“公敌”。^①这篇文章打中了康有为的要害，剥下了保皇派的画皮，为推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传诵一时，影响颇大。

邹容（一八八五——一九〇五年），字蔚丹，四川巴县人，是一位朝气蓬勃、敢打敢冲的革命青年。少年在校读书时，就注意时政，敢发议论，常与那些孔孟之徒辩论，“指天画地，非尧舜、薄周



革命军

孔，无所避”。^②一九〇一年冬，邹容冲破封建家庭和亲友的阻挠，启程赴日留学。一九〇二年春到达日本东京，并很快投入了热火朝天的革命运动。留学生的每次集会，他一定慷慨陈词，鼓吹革命。同时，他抓紧一切时间认真学习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和美国、法国、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史，从中吸取养料。一九〇三年，他回到了上海，为热气腾腾的革命气象所感动，立即投入了爱国学社所组织的革命活动。同

年，邹容以酣畅淋漓的笔墨，写出了《革命军》。章炳麟为之作

^① 章炳麟：《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752—760页。

^② 章炳麟：《赠大将军邹君墓表》，《辛亥革命》第1册，第365页。

序，并在《苏报》上加以介绍。《革命军》出版的消息象一股春风，很快传遍大江南北，人们争相购读。

《革命军》是一本系统讲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书，分七章，主要论述了三个问题。

第一，抨击清政府，论证反清的必要性。邹容明确指出：清政府是一个卖国政府，它“割我同胞之土地，抢我同胞之财产，以买其一家一姓五百万家奴一日之安逸”。为了换取帝国主义支持，清政府“驱策我、屠杀我、奸淫我、笼络我、虐待我”，今日加赋，明日增税，直至“鬻妻典子而后已。而又美其名曰薄赋，曰轻税，曰皇仁”，实际“则是盗贼之用心杀人而曰救人也”。邹容作了一首奴才歌，十分形象地揭露了清政府从政治思想上残酷统治人民的恶果。“奴才好！奴才好！勿管内政与外交，大家鼓里且睡觉。古人有句常言道：‘臣当忠，子当孝’，大家且勿胡乱闹。”鉴于中国在清政府的统治下这种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状况，邹容急切地呼吁：“天下事不兴则亡，不进则退”，为了使中国不亡，必须打倒清政府。

第二，擂起革命的战鼓，阐明革命的重要性。邹容在《革命军》的开头，就“破嗓裂喉”，热情颂扬革命，指出：“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要打倒清政府，不可不革命；要使中国独立，不可不革命；要使中国民主自由，不可不革命；要使中国富强，不可不革命。“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邹容号召人们要奋起革命，“作十年血战之期，磨吾剑，建吾旗，各出其九死一生之魄力”，同清政府“驰骋于枪林弹雨之中”。

第三，歌颂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论述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必然性。邹容在《革命军》中反复强调要用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去教育人民，使他们懂得封建专制制度的反动性，懂得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的合理性，懂得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观念。邹容明确指出：“自世界文明日开，而专制政体一人奄有天下之制可倒。自人智日聪明，而人人皆得有天赋之权利可享。”为了实现这种天赋之权利，他提出推倒清政府，建立中华共和国；区分省分，选举议员，选举总统；人人为国民，男女平等；生命自由及一切利益之事，皆属天授，不可夺之等项主张，表述了较为完整的资产阶级政治观念。书的末尾，邹容激情满怀地高呼：“中华共和国万岁！”^①

《革命军》虽然是那么薄薄的一本小册子，但却是投向当时中国社会的一颗巨型的精神炸弹。短短几年间，《革命军》发行百万册以上，“不翼不胫”、“飞走海内”，读了没有不“拔剑起舞，发冲眉竖”的。它教育了整整一代的资产阶级革命者。正如亲身经历过辛亥革命的鲁迅所指出的：“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作的《革命军》”。^②

革命派在政治思想领域里发起的强大的攻势，使清朝统治者恨得要命，怕的要死。一九〇三年六月底到七月初，清政府以《苏报》登载了章炳麟介绍《革命军》的文章和邹容、章炳麟诋毁政府，谋为不轨为借口，勾结帝国主义，通过上海租界巡捕房逮捕章炳麟、邹容等人，封闭了苏报馆，制造了轰动全国的“苏报案”。在租界的会审公廨上，清政府作为原告一方，章炳麟、邹容作为

^① 邹容：《革命军》，《辛亥革命》第1册，第333—364页。

^② 鲁迅：《杂忆》，《鲁迅全集》第1卷，第205页。

被告一方。堂而皇之的清政府居然和中国人民打起官司来，而地点却在上海的租界里。清政府的洋奴嘴脸完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审判中，章、邹二人据理力驳，使清政府的代表理屈词穷、丑态百出，大灭了敌人的威风。清政府黔驴技穷，乞求帝国主义毫无道理地将章炳麟判处三年徒刑，邹容两年徒刑。邹容在狱中倍受折磨，最后死去，年仅二十一岁，为革命献出了年青的生命。

邹容死后，革命派利用报刊杂志，发表许多文章、诗歌，表彰他的英雄业绩。成千上万的青年志士苦读他的《革命军》，燃起了革命烈火，投入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洪流。

另一重要的革命宣传家陈天华（一八七五——一九〇五年），字星台，湖南新化人。少年时就有反清思想。戊戌变法的失败和义和团的被镇压，使他更感到国内政治空气窒息，为了寻求民族解放、国家富强的真理，一九〇三年赴日留学。他到达东京后立即投入了爱国革命运动。他忧愤祖国民族灾难的深重，仇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蚕食鲸吞，写血书数十封，邮寄国内各学堂，唤起人们反帝激情。他和湖南留日学生杨笃生等创办《湖南游学译编》和《新湖南》杂志，写了许多宣传民主革命、介绍欧美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的文章。一九〇三年他写成了《猛回头》、《警世钟》两本通俗小册子。

这两本小册子表述了明确的反帝爱国思想。《警世钟》的开头，就用血泪交织的语言，沉痛地呼号祖国被瓜分的惨景：“嗟呀！嗟呀！来了！来了！甚么来了？洋人来了！洋人来了！不好了！不好了！大家都不好了！老的，少的，男的，女的，贵的，贱的，富的，贫的，做官的，读书的，做买卖的，做手艺的，各项人等，从今以后，都是那洋人畜圈里的牛羊，锅子里的鱼肉，由他要

杀就杀，要煮就煮，不能走动半分。”在这种“瓜分豆剖逼人来，同种沉沦剧可哀”的严重状况下，陈天华强烈呼吁向帝国主义作斗争。他号召大家举起革命大旗，挥舞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他说：“洋兵不来便罢，洋兵若来，奉劝各人把胆子放大，全不要怕他。读书的放了笔，耕田的放了犁耙，做生意的放了职事，做手艺的放了器具，齐把刀子磨快，子药上足，同饮一杯血酒，呼的呼，喊的喊，万众直前，杀那洋鬼子，杀投降那洋鬼子的二毛子。”

“只要我全国皆兵，他（指帝国主义）就四面受敌”。陈天华坚定地表示，要“杀尽仇人方罢手。”他相信只要大家团结一致，就会打败帝国主义的侵略。

这两本小册子还表述了鲜明的反清革命思想。《警世钟》和《猛回头》明确指出：清王朝是亡国的祸根。即使是它办的“新政”，也“不过借此掩饰掩饰国民的耳目，讨讨洋人的喜欢罢了”，不但没带来“一线光明”，“那黑暗反倒加了几倍”。清政府将人民搞得如“风吹萍叶，莫定西东”，“烽烟滚滚血横流”。所以，要救亡，必须杀尽“媚外的汉奸”，举行暴动，反清革命。^①他希望通过一场“十万横磨如电闪，一霎入幽燕。挟秋霜，挥落日，扫浮烟”^②的威武雄壮的武装革命，来建立一个政治上独立、民主，经济上繁荣昌盛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猛回头》、《警世钟》文字浅显通俗，内容激动人心，书中充满爱国热情和扣人心弦的言词，对于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人民是极有感染力的。因此，它很快地便流传全国各地，特别是在两湖各学堂和新军军营传播更广，对宣传反清革命，促进武昌新军起义，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① 参见陈天华：《警世钟》、《猛回头》，《辛亥革命》第2册，第112—170页。

^② 陈天华：《狮子吼》，《陈天华集》第92页。

此外，在女革命家中，秋瑾是一个杰出的代表。秋瑾（一八七五——一九〇七年），浙江山阴县（今绍兴）人，是一个出身于小官僚地主家庭的“名门闺秀”。但在民族危机的强烈刺激下，在革命风雷的鼓舞下，她迸发出爱国激情。一九〇〇年，她到了北京，进一步目睹了清王朝的腐败，帝国主义的凶恨，就下决心“匡济艰危”，献身祖国。一九〇四年四月，她冲破封建家庭的层层束缚，自筹旅费奔赴日本留学。一到日本，她就投入了火热的革命斗争。她发起并参加了以反清为宗旨的“共爱会”和“十人会”，创办《白话》杂志，积极参加各项革命活动。她“每大会集……必抠衣登坛，多所陈说，其词淋漓悲壮，荡人心魂，与闻之者，鲜不感动愧赧而继之以泣也。”^①秋瑾虽是一个妇女，但她有旺盛的革命斗志、豪迈奔放的性格和火一般的炽烈感情。为了宣传革命，打击敌人，她写了不少文章和诗歌。她在《对酒》诗中写道：“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②表现了她为革命赴汤蹈火、视死如归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秋瑾还是孔孟之道的积极批判者。她猛烈地冲击孔老二宣扬的“男尊女卑”等等吃人的儒家旧礼教，响亮地提出：“那些腐儒说什么‘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夫为妻纲’这些胡说，我们女子要是有志气的，就应当号召同志与他反对。”^③她明确指出：妇女要解放，必须“自立”，“欲自立”，非参加革命不可。^④一九〇七年，她在上海创办《中国女报》，在发刊词中响亮提出要“结二万万大团体于一致，通全国女界声息于朝

① 陈去病：《鉴湖女侠秋瑾传》，《辛亥革命》第3册，第184页。

② 秋瑾：《对酒》，《秋瑾集》第48页。

③ 秋瑾：《警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秋瑾集》第5页。

④ 秋瑾：《致湖南第一女学堂书》，《秋瑾集》第5页。

夕”，“使我女子生机活泼，精神奋飞，绝尘而奔”，投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放一大光明灿烂之异彩”。^①秋瑾的这些宣传活动，对民主革命的兴起，尤其是对广大妇女的走向革命，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宣传活动，推动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蓬勃兴起。他们那种饱满的政治热情，感情充沛的言词，悲壮激烈的行动，对于在清政府黑暗统治下的中国人民发生了巨大的感染力，起到了革命的先锋和桥梁作用。

但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们大部分人对于帝国主义本性认识不清，主要是宣传反清，没有把斗争矛头直指帝国主义，并且在宣传民族主义中，还夹杂着大汉族主义。他们没有和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他们的宣传活动还主要局限在知识分子中间。这就使得他们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随着运动的深入，他们有的人就落伍了。

第二节 孙中山创建同盟会及其三民主义

一、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

民主思想的广泛传播，有力地推动了革命组织的建立。继兴中会成立后，在二十世纪初又涌现了一些革命的小团体。

一九〇三年冬，上海爱国学社的蔡元培等人，和军国民教育会浙江籍留学生合作，并设法和正在狱中的章炳麟取得联系，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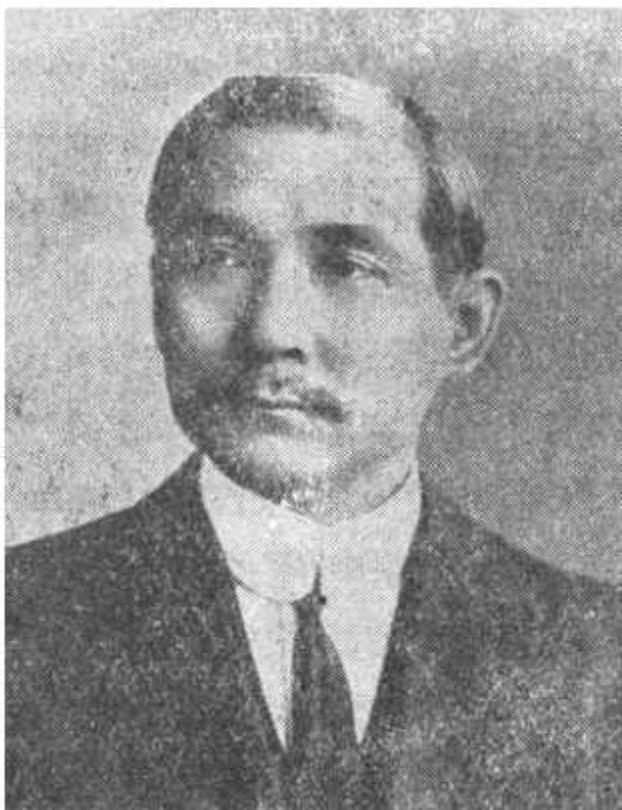
^① 秋瑾：《〈中国女报〉发刊词》，《辛亥革命》第3册，第183页。

上海成立了光复会，以推翻清朝统治为宗旨，联络江浙一带会党为进行革命的主要力量。一九〇四年春，光复会陶成章等人为了联络会党，举行革命，帮龙华会起草了《龙华会章程》，明确提出了“要把田地改作大家公有财产，也不准富豪们霸占”的口号，反映了广大贫苦农民的迫切要求，得到了江、浙一带人民尤其是会党广大群众的热切拥护，光复会的组织不断扩大，在长江流域一带颇有影响。

一九〇四年二月十五日，黄兴、陈天华、宋教仁、刘揆一等在湖南成立华兴会，提出了“驱除鞑虏，复兴中华”的革命口号，确定了雄踞一省与各省纷起响应推翻清朝的战略方针，并组织“同仇会”，作为联络会党的专门机关。当时参加华兴会的有数百人，他们分头活动，准备武装起义。黄兴等人和湖南会党首领马福益取得联系，决定把马福益能调动的十万会众作为主力，并让长沙武备学堂的华兴会员联络长沙新军，共同起义。同时布置兵力于岳州、常德、浏阳、宝庆、衡州，准备义旗一举，五路响应，夺取湖南，进攻北京。他们计划在那拉氏七十寿辰，即十一月十六日这天行动。不料在临近起义的日子里事机败露，清军四出捕人，黄兴被迫逃往上海，奔赴日本，长沙起义流产了。

一九〇四年夏，湖北革命党人吕大森、张难先在武昌成立科学补习所，以补习科学为名从事革命工作。他们从实际的斗争中认识到，要运动军队非亲身投入行伍不可。于是许多革命党人纷纷投入湖北新军，进行艰苦的宣传革命和发展组织工作。

从兴中会、光复会、华兴会到科学补习所，这些小团体都把推翻清政府作为革命的目标，都在积极联络会党和新军作为发动起义的主要力量，都主要活动于东南沿海和长江流域一带。它们在实际斗争中也都感到组织狭小，力量不足，不能适应全国



孙 中 山

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这些共同的特点和共同的要求，成为他们联合起来建立一个统一组织的基础。

一九〇五年，革命形势蓬勃发展，组织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政党的时机已经成熟。因为民主思想的深入人心，为成立资产阶级政党准备了思想条件；革命小团体的涌现，为成立资产阶级政党打下了组织基础；在舆论宣传和

革命小团体中出现了许多精干的宣传家和组织活动家，为成立资产阶级政党作好了干部准备。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派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积极开展建党工作。七月，孙中山到了日本，同黄兴、宋教仁等商组统一的革命政党。但有的华兴会员出面反对，孙中山对这些人作了耐心的工作。孙中山指出：革命必须内部统一。中国现在怕的不是帝国主义瓜分，而是我们革命队伍的不团结。现在各省干各省的事，互不相统，即使将来革命成功了，也会出现二十多个地方政权之间的斗争，那时帝国主义从中干涉，必然会亡国。黄兴等人非常赞同孙中山的主张，支持孙中山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团体，成立统一的革命政党的工作。

七月三十日，各个革命团体的代表七十多人在日本东京召开第一次联席会议，讨论筹组统一政党。到会人员分属十七省

籍，唯甘肃省没有赴日留学生而缺席。会上，孙中山提出建立中国革命同盟会。一些沉醉于驱除满族实行民族复仇的分子，反对这个名称，主张叫对满同盟会。孙中山等革命派和这些人作了坚决的斗争，反对把民族革命变成民族复仇，主张把满洲贵族和满族人民分开，坚持叫中国革命同盟会。还有少数人以当时革命仍在秘密进行为借口，反对同盟会用“革命”二字。经过激烈争论，最后孙中山作了让步，遂定名为中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在讨论同盟会的纲领时又出现了激烈的斗争。孙中山提出同盟会的纲领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而有些人却坚决反对把“平均地权”作为同盟会的政纲。对此，孙中山则寸步不让，明确指出：平均地权的社会革命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同等重要，要为民众谋幸福，解决象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那种贫富不均的社会问题，就必须平均地权。同盟会既是革命政党，就要看得远，就要“将种族、政治、社会三大革命，毕其功于一役”。^①结果孙中山的主张得到了通过。同盟会成立的预备会议，排除了各种干扰，取得了成功。

八月十三日，东京留学生界举行集会，欢迎孙中山，到会者一千三百多人，盛况空前。孙中山当场发表激动人心的演说，给资产阶级革命派以巨大的鼓舞。八月二十日，同盟会正式举行成立大会，到会者三百多人。大会一致通过了《中国同盟会总章》，选举孙中山为总理，并依照《总章》的规定，设同盟会总部于东京，各地分设支部，由总部统一领导，总部下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选举黄兴为执行部庶务长，代表孙中山在东京主持日常工作。此后又编定了《革命方略》，规定了同盟会纲领的实施计

^① 冯自由：《二民主义与三民主义》，《革命逸史》第2集，第143页。



同盟会成立

划和其他各项具体方针政策。其中有《军政府宣言》（即同盟会宣言）、《军政府与各国民军之条件》、《招军章程》、《招降清朝兵勇条件》、《略地规则》、《对外宣言》、《招降满洲将士布告》。十一月，创办《民报》，作为同盟会的机关刊物。同盟会成立后，立即分派人员到国内外各地设立支部，扩大组织，不及一年，入盟者逾万人。

同盟会是一个有明确政治纲领和完整组织机构的资产阶级政党，它是二十世纪初年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成长壮大的必然产物。从一九〇五年前后，在人民群众反帝爱国运动的推动下，民族工商业又有较大的发展。例如在棉纱业中，一九〇五年上海设立振华纱厂，江苏常熟设立裕泰纱厂，宁波设立和丰纱厂。一九〇六年太仓设立济泰纱厂，无锡设立振新纱厂。一九〇七年崇明设立大生第二厂，萧山设立通惠公纱厂，江阴设立利用纱厂。此外，缫丝、面粉、榨油、碾米、卷烟、火

柴、造纸、造船、采矿等民族工业都有较大的发展。同时，这个时期的许多手工工场逐步向机器工业生产过渡。如天津的肥皂业，山东烟台的缫丝业，奉天大连等地的榨油业，广东三水的缫丝业，武进的印刷业，东蒙大布苏的造碱业，天津的铅油制造业，杭州、武进、芜湖的碾米业，四川的炼铜业，云南个旧的锡矿业，江苏宝山的制薄荷油业等，都在不同程度的部分采用机器生产。据统计，从一九〇五到一九一一年，新设厂矿三百二十二家，资本额为七千七百三十四万二千元。这七年的资本总额为前三十余年资本总额的一点四倍。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有了较显著的增长。民族资产阶级迫切要求建立一个符合自己利益的政权，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束缚，独立自由地发展资本主义。同盟会的成立，正是民族资产阶级这种要求的集中体现。

同盟会的成立，使全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有了一个统一的领导。原来的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小团体，活动范围局处一隅，号召力也仅限于某些地方。兴中会多活动于广州、香港和海外华侨，华兴会局限于两湖，光复会则活跃于江、浙。这些小团体基本上没有脱离旧式会党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内部也各立门户，行动不一。同盟会将这些小团体合为一大团体，把地处一隅的组织发展为全国性的革命组织，把旧式会党的痕迹去掉，采用近代政党的组织形式，这无疑是一个巨大进步，它将大大促进革命运动的发展。

同盟会的成立，统一了全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那些分散的革命小团体各有各的政纲，十分不统一。华兴会、光复会着重于“驱除鞑虏，复兴中华”，兴中会起初也只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几乎都没有涉及土地问题。同时资产

阶级革命派在宣传革命中还夹杂着一些大汉族主义、民族复仇主义、甚至无政府主义等错误思想，给一些人造成思想上的混乱。同盟会把政纲明确规定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个字，就使资产阶级革命派有了一个明确的奋斗目标，从思想上武装了起来。

同盟会的成立，壮大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力量。同盟会成立后，参加者络绎不绝，尤其是一批年青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的加入，为同盟会增添了新生力量。这批青年富于政治热情，容易接受新鲜事物，敢打敢冲，逐步锻炼成同盟会的骨干力量。同时，同盟会将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在各地发展的革命力量，集中起来，统一使用，统一调动，有助于打击敌人，发展革命的大好形势。后来孙中山曾兴奋地回忆说：同盟会成立后，“革命风潮一日千丈，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①

但是，同盟会毕竟是一个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资产阶级自由派、地主阶级反满派的松散联盟。它在思想上、组织上，以及在组织武装斗争上都没有达到很好的统一。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纲并没有被全体同盟会员所接受。同盟会中的有些人出身于大地主阶级家庭，靠封建剥削过活，他们可以接受孙中山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和“建立民国”的主张，却十分反感孙中山的“平均地权”。还有些受种族复仇主义和封建专制思想影响很深的人，不仅反对“平均地权”，而且对“建立民国”也漠不关心，他们积极的仅仅是反满，反对清政府。思想认识的不一致必然导致组织上的分裂。全体

^① 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76页。

同盟会员仅在反对清朝皇帝这一点上有共同语言。所以随着革命的深入，同盟会中又产生一些独立活动的团体，有的甚至把同盟会的政纲也随便改来改去。

总之，尽管同盟会本身存在着不少难以克服的弱点，但它的成立却标志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进一步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纲领阐发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这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旧三民主义。



同盟会机关报——民报

所谓民族主义，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其核心是武装推翻清朝满洲贵族统治，解除民族压迫。孙中山这种民族主义思想，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清王朝推行民族压迫政策的产物，它

反映了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内外民族矛盾错综复杂的交织在一起的历史特点。二十世纪初年，清王朝和帝国主义完全勾结起来，更紧密地结成反动的政治同盟，共同压迫和奴役中国人民。清王朝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因此，要反帝，要取得民族独立，首先必须推翻清政府。这是民族革命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孙中山曾明确指出，帝国主义“贪欲无厌”，清政府“助桀为虐”，“为之鹰犬”，“故欲免瓜分，非先倒满清政府，则无挽救之法也。”^①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推翻清政府，客观上就打击了帝国主义，摧毁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工具。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人民的反帝要求。同时，当时清政府在国内还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对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任意欺凌压榨，这种民族矛盾也是极端尖锐的。要解决这种民族矛盾，实现国内各民族的平等，唯一的方法是推翻清朝的满洲贵族统治。这是孙中山民族主义的又一重要内容。孙中山曾经多次强调，这并不是民族复仇主义。他指出：我们讲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种族的人，便要排斥他”，如果认为“民族革命是要尽灭满洲民族，这话大错。”^②这样，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就把反对国内民族压迫同反对卖国政府、挽救民族危亡结合了起来。另外，当时清王朝为了苟延残喘，拚命集权，强化军队，人民没有一丝一毫的民主自由，要反抗，唯一的路是武装夺权，任何改良主义都是行不通的。孙中山就明确指出：清政府“死命把持政权”^③，要实现民族革命，只能拿起枪杆。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具有三大优点：第一、抓住了当时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同人民大众的矛盾的集中反映——革命人

① 孙中山：《驳保皇报》。

②③ 孙中山：《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孙中山选集》上卷，第73、74页。

民和清政府的矛盾。第二、把满洲贵族和广大满族人民区分开来，和当时一些人宣传的民族复仇主义划清了界限。第三、既抓住了革命的根本问题——政权问题，又采取了暴力革命这样一条夺权道路。因此，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有利于和改良主义划清界限，有利于推翻反动的清王朝，在当时起到了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奔向革命的积极作用。

但是，孙中山虽然有强烈的反帝爱国思想，但并没有深刻认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对帝国主义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希望有的帝国主义国家来援助中国革命。这就忽视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最主要的矛盾，放跑了中国人民最主要的敌人帝国主义，只抓住了“走狗”，而放掉了“主子”。在他主持下制订的《对外宣言》中，公然宣布“所有中国前此与各国缔结之条约，皆继续有效”，赔款外债，“照旧承担”；“所有外人之既得权利，一体保护。”这样的外交方针，实质是讨好帝国主义。孙中山企图不正面反对帝国主义，而取得民族独立，只能是幻想，其最后失败是必然的。

所谓民权主义，就是“创立民国”，其核心是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用资产阶级专政代替封建地主阶级专政。孙中山的这种民权主义，是他向西方寻找真理和当时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当时，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已经开始衰落和走向反动。但是，把这种东西搬到中国来，仍然有着进步意义。因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对外没有民族独立，对内没有政治民主；随着民族工业的逐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在逐步壮大，它们强烈要求改革现状，夺取政权；无产阶级虽然诞生了，但还没有当作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政治舞台；因此，历史的旗帜只能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是企图在帝国主义时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

土地上竖起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大旗，这种旗帜在当时具备着既有革命性又有绝对不能成功的双重特点。不过，孙中山对资产阶级共和国充满着信心。他指出：“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来分作两次去做。讲到那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照现在这样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①将来推翻了清政府，“现在恶劣政治，固然可以一扫而去，却是还有那恶劣政治的根本，不可不去。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②他还深刻地指出：皇帝思想就是亡国思想，铲除这种思想，荡涤封建专制的毒素，就是政治革命的根本。他主张按照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给国民以民权，让国民来选举总统，选举议员，制订宪法。他根据西方资产阶级国家三权（立法、司法、行政）分立的学说，提出制订五权分立（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的宪法的主张，绘出了一幅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的蓝图。这样，孙中山就把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结合了起来，既提出了夺取政权问题，又提出了建立政权和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权问题，从理论上解决了当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同当时一些人还存在的推翻清政府后重建汉族帝国的陈腐观念划清了界限，也驳斥了改良主义者所鼓吹的君主立宪的反动主张，从思想上武装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

当然，孙中山在这里所宣扬的民主、自由、平等有着鲜明的阶级烙印。资产阶级民主同封建制度比较起来，在历史上是一个大进步，但它只能是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穷

^{①②} 孙中山：《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孙中山选集》上卷，第75页。

人和被剥削者是陷阱和骗局。不仅如此，孙中山比较注意打倒封建皇权，却忽略了摧毁封建皇帝的统治根基——整个地主阶级，尤其是对汉族地主抱有幻想。同盟会发布的《招降满洲将士布告》，一开头就对封建的官僚、军阀、地主讲什么：“我辈皆中国人也”，“论情谊则为兄弟，论地位则为仇讎”，只要你们“奋激而起”，或“隐忍未发”^①，就是革命的盟友。这一方面为地主、官僚、军阀乘机钻入革命队伍进行破坏提供了可乘之机，另一方面又模糊了革命群众的阶级意识，削弱了革命的反封建意义。直到辛亥革命失败以后，孙中山才认识到：“吾人虽革去满洲皇统，而尚留陈腐之官僚统系未予扫除，此真吾辈破坏之道未工之过也。”^②

所谓民生主义，就是“平均地权”，其核心是解决土地问题。孙中山提出民生主义，并不是偶然的。当时中国封建土地制度依然占着统治地位，民族资产阶级需要市场，需要动员革命主力军农民参加民主革命，因而要求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同时由于孙中山考察和研究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看到那里阶级矛盾尖锐，无产阶级革命正在兴起，为预防中国将来也发生类似的革命而主张解决土地问题。孙中山指出：“英国财富，多于前代不止数千倍，人民的贫穷，甚于前代也不止数千倍，并且富者极少，贫者极多。”在孙中山看来，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没有进行社会革命，“解决土地问题”。^③因此，他主张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贫富不均的现象作为前车之鉴，大搞社会革命，实行民生主义。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具有两大特点：首先是“同社会主义空想、同使

① 《招降满洲将士布告》，《辛亥革命》第2册，第33页。

② 孙中山：《救国之急务》，《孙中山选集》上卷，第427页。

③ 孙中山：《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孙中山选集》上卷，第76、77页。

中国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即防止资本主义的愿望结合在一起的”。^①这显然反映了孙中山对广大劳动人民的真挚同情和对西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赞助，使他的民生主义涂上了一层主观社会主义的色彩。其次，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是“同宣传和实行激进的土地改革的计划结合在一起的。”^②他抨击大地主垄断土地，主张“平均地权”，这就为消灭封建土地制度、发展资本主义开辟了道路。列宁指出：“按照马克思的学说，土地国有就是：尽量铲除农业中的中世纪垄断和中世纪关系，使土地买卖有最大的自由，使农业有最大的可能适应市场。”所以，平均地权是“纯粹资本主义的、十足资本主义的土地纲领”。^③孙中山“平均地权”的方针是革命的，但其方法却是改良的。他主张“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的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④这显然是一种改良主义的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法。它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制止大地主的土地兼并，仅仅有利于资本家去发展工商业，根本不能解决广大穷苦农民无地或少地的问题。虽然如此，孙中山“平均地权”的主张，还是触及到了中国革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土地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反映了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尖锐对立，促进了农民对地主的斗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仍不失为民主主义的精华。

但是，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本身有着严重的缺点。孙中山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寄于同情是难能可贵的，但他把民生主义误认为社会主义，要“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

^{①②③} 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425、427页。

^④ 孙中山：《同盟会宣言》，《孙中山选集》上卷，第69页。

一役”^①，这就十分错误地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种性质不同的革命界限，完全变成了不能实现的空想。孙中山没有将平均地权和农民无偿地获得土地的问题联结起来，他反对用暴力革命的方法去夺取地主的土地，反对农民起来“夺富人之田为己有”^②，反对农民起来推翻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毛主席曾经深刻地指出：“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动摇的阶级，他们需要市场，他们也赞成‘耕者有其田’；他们又多半和土地联系着，他们中的许多人就又惧怕‘耕者有其田’。”^③这就决定了孙中山的“平均地权”不可能实现的历史命运。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的政治路线，集中到一点，就是坚持武装斗争，推翻清朝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毛主席指出：“旧三民主义在旧时期内是革命的，它反映了旧时期的历史特点。”^④三民主义的政治路线，是帝国主义时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旧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兴起的产物。它是要用革命的方法，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精神来改造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它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要求，反映了当时中国人民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权利的迫切愿望。孙中山在概括其三民主义时写道：“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中国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制，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制，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制，故要社会革命。”^⑤在那群魔乱舞、民族灾难深重的黑暗时代，孙中山高高举起了三民主义这面

① 孙中山：《民报发刊词》，《孙中山选集》上卷，第72页。

② 孙中山：《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孙中山选集》上卷，第78页。

③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976页。

④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654页。

⑤ 孙中山：《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孙中山选集》上卷，第79页。

革命旗帜，起了极大的革命作用。它是动员广大群众起来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思想武器，是激励人们奋起革命、冲锋向前的强大动力。对此，伟大导师列宁曾经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孙中山纲领的每一行都渗透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它充分认识到‘种族’革命的不足，丝毫没有对政治表示冷淡，甚至丝毫没有忽视政治自由或容许中国专制制度与中国‘社会改革’、中国立宪改革等等并存的思想。这是带有建立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①

孙中山制订三民主义、观察国家民族命运的思想武器是民生史观。民生史观是他的思想路线。孙中山站在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立场上，从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他向西方资产阶级学来了机械唯物论和进化论等，并继承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提出了宇宙起源的观点。他既认为宇宙起源于物质性实体，断定从地球的形成到人类生命的诞生，都是“物质进化”的结果；又承认独立精神力量的存在，说什么“总括宇宙现象，要不外物质与精神二者，精神虽为物质之对，然实相辅为用。”^②他把这种观点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就形成了民生史观。所谓民生，他指的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他把民生看作高于一切的“历史的重心”，而不辞千辛万苦地企图解决它。他认为历史是不断前进的，历史的进化不是“循序渐进”，而是飞跃发展，因此，新陈代谢是不可抗拒的，历史发展的速度是越来越快的，人类的前途越来越光明。他对于近代历史的发展，更是充满无限的希望。他说：“近代文明进步，以日加速，最后之百年，已胜于以前之千年，而最后之十年，又胜已往

^① 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424页。

^② 孙中山：《军人精神教育》。

之百年，如此递推，太平之世，当在不远。”^①他从这种历史观出发，认真研究了当时的中国社会，得出了必须进行民主革命的结论。他认为清王朝已不合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而中国要前进，就必须“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②，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实行“共和革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解决“平均地权”问题，这反映了孙中山的革命精神和对人民生存问题的深切关心。但是，他把社会发展的动力归之于人的求生欲望和本能这个精神因素，却是非常错误的。因为任何民生都是受一定的生产方式所决定和制约的，生产方式的变更促使民生的改变。要解决民生问题，必须实行改变生产方式的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阶级斗争。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是阶级斗争，而不是民生问题。尽管他天天在从事阶级斗争，但他是用抽象的民生来解释阶级斗争，他既不承认中国有阶级斗争，更不承认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他认为中国人都贫，并没有大富的特殊阶级，中国人所谓贫富不均，只是大贫与小贫而已。他由否认阶级斗争而导致了“社会互助”论。他错误地宣称：“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也；人类顺此原则则昌，不顺此原则则亡。”^③正因为他只讲阶级互助，不讲阶级斗争，因而在三民主义中不敢直接提出反帝的口号，对汉族封建地主、官僚抱有联合反清的幻想，不许农民用暴力夺取地主的土地，既要发展资本主义，又要避免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孙中山的这种物质和精神并重，承认历史发展，但又否认阶级斗争的观点，实质上是唯心主义的二元论。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那样：“三民主义的宇宙观则是所谓民生

^{①②③} 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42、168、141—142页。

史观，实质上是二元论或唯心论”。^①孙中山的这种二元论，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的两重性在哲学上的反映，这种观察人类命运的思想武器，必然要打败仗。

第三节 “革”与“保”的路线斗争 ——近代第三次思想解放潮流

一、革命派和保皇派的大论战

同盟会成立之后，革命风雷激荡全国，康有为、梁启超一伙保皇派十分惊慌，他们大肆制造反革命舆论，妄图扑灭革命烈火。一九〇五年，保皇派以《新民丛报》为基地，对同盟会的政纲进行了恶毒的攻击。革命派并不示弱，立即以《民报》为阵地，给予猛烈反击。两军对垒，旗帜鲜明，论战激烈。同盟会在《民报》第三号上发表题为《民报与新民丛报辩驳之纲领》的号外，列举了双方在十二个问题上的根本分歧。其中主要的是：“《民报》主共和，《新民丛报》主专制”；“《民报》以政府恶劣，故望国民革命，《新民丛报》以国民恶劣，故望政府以专制”；“《民报》以为革命所以求共和，《新民丛报》以为革命反以得专制”；“《民报》鉴于世界前途，知社会问题必须解决，故提倡社会主义，《新民丛报》以为社会主义不过煽动乞丐流民之具。”随后，《民报》发表一系列专文，对保皇派的反动谬论逐条驳斥。革命派和保皇派都集中了精干分子展开了激战。

^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649页。

在香港和广州，保皇派利用《岭海报》（在广州）《商报》（在香港）向革命派进攻；革命派以《中国日报》（在香港）为阵地进行反击。

在新加坡，保皇派的《南洋总汇报》和革命派的《中兴日报》展开论战。

在檀香山，革命派的《民生日报》对保皇派的《新中国报》给予痛击。

在旧金山，革命派办的《大同报》和保皇派的《文兴报》进行激烈的论争。

如此等等，双方在国内外的二十多种报刊都投入了论战。

革命派和保皇派的论争基本上围绕以下三个问题进行的。

要不要革命，要不要推翻清政府，是革命派和保皇派争论的第一个问题。

康、梁一伙从维护清朝封建政权的立场出发，大肆宣扬“忠君保皇”，极力鼓吹载湉的“圣德”。他们胡说：光绪帝不复位，中国必亡；光绪帝一复位，大地莫强。对以光绪帝为代表的清政府是万万不能造反的，谁要造反，就是“贼寇”，谁要反清，就是“祸首”。

革命派则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自古以来都被那君臣大义的邪说所误。所谓“忠君”，这是吃人的信条，奴隶的枷锁，反对人们造反的刑具，必须砸烂。象载湉这样的“小丑”，“一手掩尽天下目，一人独压万人上”。^①敲中国人民的骨髓，以博取他一人

^① 《中国尊君之谬想》，《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543页。

的淫乐，根本谈不上什么“圣德”。以载湉为头子的清政府，“其君则盗魁也，其官吏则群贼也，其朝署则割地鬻权所也”。^①督抚仰外人鼻息，利权任外人索取，赔款代外人搜刮，教案听外人裁决，中国的利权、财权、兵权、交通权等全受外人控制。中国本似一完美之人，被清政府“东割一肠肺，西断一咽喉，四分五裂，鲜血淋漓”。^②这样卖国的清政府，“实中国富强第一大障碍，欲救亡而思扶满”^③，实际是向操刀者摇尾乞怜。“为独立计，为救亡计”，必须打倒清政府。因此，对清政府是革还是保，是区分革命还是反动，进步还是保守的试金石。康、梁恰恰在这个问题上被革命派驳得哑口无言，其反革命面目暴露无遗。

于是，康、梁一伙又搬出“革命亡国”论向革命派进行攻击，叫喊什么革命会造成连年战争，流血成河，亡国灭种。

革命派勇敢地回击道：这是“杞人之忧也”，“不知革命而骇革命”也。革命犹如治病，清政府已经病入膏肓，非用刀砍不行，“舍革命无由”。^④革命派指出：清“政府之待人民以兵力”，人民就必须对它还之以武力。^⑤清政府“竭其残暴手段以压抑之”，人民就必须“出其相当能力以反抗之”，这样的“杀人流血之暴祸”，“革命是也”。^⑥所以，“杀人流血”是清政府逼出来的，革命必须流血，不流血不能革命。至于保皇派用“亡国灭种”来恐吓，这是“见将溃之疽而戒勿施刀圭，遇拂衣之火而嘱毋毁墙壁也”。“试

① 《醒狮》第1号，第2页。

② 《中国尊君之谬想》，《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543页。

③ 吴稚：《意见书》，《辛亥革命》第2册，第433页。

④⑥ 《论支那立宪必先以革命》，《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128—132页。

⑤ 《中国新报》，《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册，第817页。

一翻（英、日）两国之立宪史，其杀人流血之数，殆不减于中国列朝一姓之鼎革。”^①革命派向保皇派郑重宣布，他们不仅要革清王朝的命，而且上下古今，宗教道德，政治学术，一视一听之微物，都要加以革命的洗礼。“革命者，救人救世之圣药也！”^②

康、梁一伙为了反对革命，又抛出了“革命召瓜分”的谬论，胡说革命一起，外国就要入侵，中国会被瓜分。

革命派批驳说：这是欺人之谈。革命可以杜瓜分之祸，而决不会招致列强的瓜分。保皇派这种叫嚷是媚外恐外思想迷住了心窍，不懂得对于帝国主义列强，我愈畏缩，他欲窥伺，我能奋发，他就会敬畏。象清政府这样日日向外人叩头，天天向外人乞怜，难道中国就不会被瓜分吗？中国被瓜分的原因是由于不能自立，所以不能自立是由于清朝反动统治，因此革清朝的命，便能免除瓜分之祸。同时，革命派因受到全国人民风起云涌的反帝爱国运动的鼓舞，认为在打倒清政府的革命中，只要四万万人投入战斗，帝国主义就不敢出兵干涉，也不可能轻而易举地征服中国。即使帝国主义一旦干涉，中国人民发奋抵抗是必然的。有的革命派坚定地表示：“瓜分”谬论吓不倒我们，外侮愈烈，我们众心愈坚。诚然，在革命派中有这种强烈反帝思想的是极少数，但他们这些言论，却有力地驳斥了保皇派“革命召瓜分”的反动谬论。

要不要兴民权，人民群众能不能享受民主权利，是革命派和保皇派论争的第二个问题。

一九〇六年，梁启超写了一篇《开明专制论》，对孙中山等革

^① 《论支那立宪必先以革命》，《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128—132页。

^② 陈天华：《中国革命史论》，《陈天华集》第3页。

命派宣传的民权主义大肆攻击。谬论之一就是：中国今日只能行专制，不能行“共和”，更不可兴民权。

革命派严厉驳斥道：封建专制是中国几千年来延续的“弊政”，在这种专制统治下，人民一无自由，二不平等，三无民主权利，完全是皇帝的“奴隶”。它把中国人引向世界“劣败之林”。中国人民早就不堪忍受。因此，仅仅推翻清政府，犹如“改朝换代”，还不能扫除封建专制的恶果，必须同时举行政治革命，清除封建专制的毒焰。革命派还进一步指出，按照人类“进化之公理”，今日之专制政体已不合时代潮流，“开明专制”是亡国之道。清政府一日不去，专制政府就一日不倒，亡国大祸则一日不可免。谁搞专制，谁就是逆潮流而动，“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①革命派坚定地说：兴民权，才是时代的潮流。无权利者，非国民也；无责任者，非国民也；无自由之精神者，非国民也；不平等者，非国民也。民权，民权，“得之则存，舍之则亡！”

保皇派被驳得张口结舌，于是以退为进，说什么我们主张现在实行专制，然后实行君主立宪，进一步实行共和政体。

革命派反驳道：不对。事物发展总是要后来居上。中国现在本来落后于欧美，还蹒跚而行，亦步亦趋，何时才能解放呢？孙中山指出：这就象铁路上用的机车，现在已大有改进，难道我们修铁路还用“最初粗恶”之机车吗？“于此取譬”^②，保皇派不是十分可笑吗？

康、梁一伙大肆攻击民权主义的谬论之二，是什么中国现在

^① 孙中山：《同盟会宣言》，《孙中山选集》上卷，第69页。

^② 孙中山：《中国民主革命之重要》，《孙中山选集》上卷，第65页。

“民智未开”，中国人“既缺乏政治习惯”，“又不识团体公益”，根本没有享受民主权利、当“共和国民之资格”。

革命派回答说：这是一派胡言。当今，不是“民智未开”，而是民智大开，民主共和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人民群众中间到处蕴藏着反清革命的种子。“即以目近而言，民族主义提倡以来，起而应之者，如风之起，如水之涌，不可遏抑，是岂绝对无能力者所能之耶？”^①孙中山指出：“鄙人往年提倡民族主义，应而和之者特会党耳。至于中流社会以上之人，实为寥寥。乃曾几何时，思想进步，民族主义大有一日千里之势，充布于各种社会之中，殆无不认革命为必要者。”^②革命派还指出：人民群众的智慧是在斗争中发生发展的，“民智”是在革命斗争中提高的。一九〇五年的“东京罢学事件”和上海反美罢市运动，都说明中国人“能力发舒，一日千里。”象这样民主共和的思潮已经变成了广大人民的革命行动，难道中国人民还不懂“政治习惯”吗？革命派进一步指出：中国人民既然能够推翻清政府，就一定可以享受民主权利。何况自由、平等、博爱是人类的本性，欧美国家的人可以选举议员、选举总统，中国人同样可以这样做。革命派大声疾呼，必须“扩张民权”，“民权主义万岁！”^③

保皇派攻击革命派民权主义的谬论之三，就是“民权兴”，“内乱生”。保皇派胡说什么你们名曰兴民权，实际搞内乱；即使

^① 《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121页。

^② 《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第2册，第4页。

^③ 《民权主义！民族主义！》，《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册，第815页。

将来你们能“颠覆政府”，你们之间也会争权夺利，内乱不休。康有为写了一篇洋洋万言的《法国革命史论》，将法国革命后各派争权的原因归结为设议院，兴民权。

革命派驳斥这种谬论说：恰恰不是“民权兴，内乱生”，而是民权不兴，内乱必生。中国历史上“草昧英雄崛起”，打倒了旧王朝，然后“彼此相争”，各据一方，根本原因是他们把国家当做“私人的财产”，只推翻旧皇帝，而争做新皇帝，没有革除封建专制的统治，没有举行政治革命，兴民权，设共和政府。革命派满怀信心地说：我们这次革命，不只是打倒皇帝改朝换代，更重要的是要建立民族的国家、民主立宪政体和实行民生主义，这就革除了封建专制的弊病，改变历史上群雄相争夺相戕杀的局面，而为中國革命史开一新纪元。至于说法国大革命中曾出现内乱，这是仅仅看到了表面现象而没有看到实质所在。法国大革命彻底摧毁专制之淫威奠定了民权之基础。正是由于这次大革命，民权自由的旗帜，到处飘扬，唤起全欧之大革命，尊人权贯自由平等之精神，于政治社会经济发生一大变革，世界所以有今日之进步者，完全是由法兰西之革命促成的。

要不要解决土地问题，要不要“平均地权”是革命派和保皇派论争的第三个问题。

以康、梁为头子的保皇派，大都出身于大地主家庭，他们代表的是由大地主、大官僚向民族资产阶级上层转化的那部分人的利益。他们同封建土地所有制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很大一部分财富是由封建剥削而来的。他们一听到革命派要“平均地权”，就气急败坏，群起反扑。梁启超拍胸跺脚，发誓骂道：“虽以匕首搦吾胸，吾犹必大声疾呼曰：敢有言以社会革命即土地国有制，与他种革命同时并行者，其人即黄帝之逆子，中国之罪人

也，虽与四万万人共诛之可也。”^①

梁启超气势汹汹地质问革命派：中国土地制度完美无缺，一没有贵族兼并土地，二土地极为平均，三“赋税极轻”，你们要“平均地权”，这不是危害“国本”，反对人民“殖富”吗？

革命派斩钉截铁地答道：否。中国的土地制度不是完美无缺，而是弊病百出。正是由于地主垄断土地，“民生之穷，未有甚于中国今日也”。那些大地主，“高语仁义，哗言功利”，残酷地掠夺人民，劳苦农民终年耕作，“汗被体，泥涂足，岁云秋矣”，一无所得，而大地主“坐而视仓箱之盈”。那些手艺工匠，也是困苦不堪。陶瓷工人家无瓷器，木匠盖房自家屋却无一椽，缝纫工人家中“衣架不足以去寒”。^②象中国北方的农村，实际还是“农奴制度”。农民不仅每年拿出十分之七的东西奉献给地主，而且象终身奴隶一样，“生杀与夺”之权都操在地主的手里。这样的土地制度不可不改革。有些革命党人严正指出：“土地者，一国之所共有也，一国之地当散之一国之民。今同为一国之民，乃所得之田，有多寡之殊，兼有无田有田之别，是为地权之失平。”^③所以，必须“均配土田，使耕者不为佃奴。”^④

保皇派又跳出来：你们“平均地权”，是博取“下等社会之同情”，是煽动“赌徒”、“乞丐”起来暴动。

孙中山说：我们就是要实行“平民革命”。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朱执信也说：“政治革命之主体为平民”，“社会革命的主体为细民”，我们的革命就是要动员这些下层的力量，他们是“中国革

① 《开明专制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189页。

② 《哀贫民》，《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册，第786页。

③ 《悲佃篇》，《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册，第752页。

④ 《五无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册，第755页。

命运动之力”^①，而靠“豪右之族”是根本不行的。有的革命党人更为坚决，公开表示：“今之田主，均大盗也”，“故豪富之田”，就是要夺，而“欲借豪富之田，又必自农人革命始。”^②这表明资产阶级革命派中的某些人，要到农民那里寻找力量，举行革命，这是十分可贵的。

保皇派忧心忡忡，叫嚷什么：这样一来，你们不是要让“目不识丁”的贫民当议员吗？

朱执信理直气壮地答道：讲对了！试问，无立锥之地的贫民就没有资格当议员吗？贫民同样有两眼两足，同样“耳聪目明”，难道仅仅因为穷就不能当议员吗？天下那里有这样的“不通之言”呢！我们政治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抑豪者而利细民”，所以“贫民专政”^③只能是对政治革命的促进。

以上三个问题的争论，归根到底是要不要实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政治路线，即要不要武装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在这场论战中，资产阶级革命派充分表现出坚持革命，反对改良，坚持前进，反对倒退，坚持革新，反对保守的生气勃勃的奋发向上精神。他们那种对前途充满信心的乐观精神，对保皇派不屈不挠的斗争毅力，对错误论调口诛笔伐的战斗热情，都是应该赞扬的。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二十世纪初，“这个阶级不是在衰落下去，而是在向上发展”^④。

①③ 《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438、441、443、444页。

② 《悲佃篇》，《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册，第754页。

④ 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424页。

二、回击尊儒反法逆流

在革命派和保皇派展开革命、还是保皇的大论战中，同时进行着尊法反儒还是尊儒反法的斗争。这是几千年来的儒法斗争在新形势下的继续。

尊儒反法向来是反动派反对革命的思想武器。早在一九〇一年康有为就接连写了《〈中庸注〉序》、《〈孟子微〉序》、《〈论语注〉序》、《〈大学注〉序》等书，竭力吹捧孔老二“荡荡如天”，“广大配天地，光明并日月，仁育覆后世充全球”。^①一九〇二年，梁启超写了《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一文，表面上反对将孔学定为孔教，实质上说孔学比任何宗教都高，吹嘘“孔教者，悬日月，塞天地，而万古不能灭者也”。^②一九〇五年，保皇派机关报《新民丛报》在一期中专门摘录了孔、孟、程、朱、陆、王等人的话，鼓吹尊孔读经。一九〇六年，康有为尊孔的调门更高了，狂叫“应大呼孔子万岁！”^③一九〇七年，康有为指使其门徒陈焕章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成立昌教会（后改为孔教会），并编写《孔教约编》，要译成英文，广为散发。同时陈焕章为了宣扬孔教，用英文写成了《孔门理财学》。在狂热鼓吹尊孔的同时，他们对历史上坚持革新，反对守旧，坚持前进，反对倒退的法家进行了恶毒地攻击。梁启超攻击荀况“误尽天下，遂使吾中华数千年，国为无法之国，民为无法之民”。^④胡说“王安石变法，为世诟病。数百年来，变法二字，

① 康有为：《〈中庸注〉序》，《康南海文集》第5卷。

② 梁启超：《保教非所以尊孔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170页。

③ 《法国革命史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330页。

④ 《论立法权》，《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159页。

为一极不美之名词。”^①麦孟华攻击商鞅“专恃功利主义，而偏缺道德教育。”梁启超更是咒骂法家“徒知治标而不治本”，攻击秦始皇“焚百家之语，坑方术之士，而思想一窒。”^②尊儒反法的谬论一时甚嚣尘上。

击退这股尊孔反法的逆流，打倒孔丘这尊偶像，给法家以正确的评价，这是关系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能否向前推进的重大问题，是革命派和保皇派之间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同康、梁一伙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第一，批判孔老二，解除思想桎梏。

早在一八九七年，孙中山就揭露“四书五经”养成人们“盲从之性”，“不敢违反”^③封建皇帝的反动统治。一九〇二年，章炳麟在《馗书》中痛斥孔孟之道是卖国之道，帝国主义侵华是掌握了孔老二的“秘方”；《论语》自相矛盾，前言不答后语，只不过是孔老二反动言论的大杂烩。一九〇六年，章炳麟在日本东京发表著名演说，斩钉截铁地宣布：孔教“极坏”，“使人不脱离富贵利禄的思想”，“我们今日要实行革命，提倡民权”，“孔教是断不可用的。”同年，他写了《诸子学略说》一文，进一步揭露了孔丘的反革命狰狞面目和儒学的反动本质。他痛斥孔丘象柳下跖所揭露的那样是一个“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寄生虫，是一个专门以“富贵利禄为心”的野心家，是一个如墨子所刻画的“便辞利口”、“覆邦乱家”的那样政治骗子，是一个“污邪诈伪”的反革命两面派。他批判以孔丘为代表的儒家是“腐儒”，引诱人们“沽之哉，沽之哉”，“封侯富贵”，升官发财。“儒术之害，则在淆乱人之思

^① 《敬告我同业诸君》，《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221页。

^② 梁启超：《保教非所以尊孔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168页。

^③ 孙中山：《伦敦被难记》，《孙中山选集》上卷，第23页。

想。”他还揭露孔老二的“中庸之道”是“国愿”，“无可无不可”，其“宗旨多在可否之间，议论止于函胡之地。”章炳麟对孔学的这些批判，推动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反孔运动的展开。一些人纷纷起来向孔老二开火，向儒家宣战。陈君衍写了著名的反孔文章《法古》，痛斥孔老二是历代反动派的统治工具，“所以那些独夫民贼，喜欢他的了不得”。邹容在《革命军》中更充分揭露了儒生的丑态。他指出：那些儒生就是对孔庙中为孔丘上供的冷猪头垂涎三尺，他们利用孔丘一伙鼓吹的“一团和气，二等才情，三斤酒量，四季衣服，五声音律，六品官阶，七言诗句，八面张罗，九流通透，十分应酬大本领，钻营奔竞，无所不至”。有的革命派还指出：清政府就是利用孔老二的“酸腐”说教，鼓吹儒家的“圣贤古训”，作为迫害人民的“快刀利剑”。^①陈天华嘲笑那些儒生“八股以外没有事业，五经以外没有文章”，怒斥“那些迂腐小儒，至今还说，忠君，忠君，遵旨，遵旨”，这是要把人民弄到“没有种子方休”。^②柳亚子进一步指出：“还有一般迂儒，来拍皇帝的马屁，立出种种荒谬绝伦的邪说，说什么‘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又说什么‘君使臣死，不得不死。’任他把你浑身剥做肉酱，不敢喊一声冤，叫一声痛；任他把你妻女来抢夺，还要三跪九叩首的谢恩。”^③把小儒的丑态揭露得淋漓尽致。革命派还认真研究了我国的历史，大胆地指出“国亡于儒”，“使中国而于致今日也，其儒之罪哉！”他们和儒家势不两立，号召人们要“溲儒冠、裂儒服以为国民倡”。^④

① 《国民意见书》，《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901页。

② 《警世钟》，《辛亥革命》第2册，第113、126页。

③ 《民权主义！民族主义！》，《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册，第813、814页。

④ 《国民新灵魂》，《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574页。

第二，批判封建礼教，扫荡奴隶哲学。

革命派在向孔丘开炮的过程中还向封建礼教展开了激烈的进攻。他们尖锐指出：“礼立于中国三千年矣，而中国文弱也几千岁。”“礼之耗人血消人气”，“我四万万人消没于礼之一字也。”^①他们揭露封建礼教中的“君为臣纲”就是“叫人尊君亲上，把君民、官民的名分定得顶严，百姓有共皇帝或共官吏为难的，动不动就说他是乱臣贼子。”^②封建皇帝就是利用孔老二这一套，维护君权。“君主无圣人，则其压制臣民较难，惟有圣人而君主乃得操纵自如，以济其奸。”“圣人与君主，互相为因，互相为果”，狼狈为奸。^③那些皇帝装腔作势给“圣人”“祭庙、拜圣像、用圣言，彼非真信圣人也，信圣人之学说之足以驾驭国民也。”^④革命派还对“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封建教条进行了批判。他们指出：“君可不敬，臣不可不忠，父可不慈，子不可不孝”^⑤，夫可为所欲为，妻却毫无任何自由。尤其是广大妇女被封建礼教“黑暗沉沦在十八层地狱”，“身儿是柔柔顺顺的媚着，气虐儿是闷闷的受着，泪球儿是常常的滴着，生活儿是巴巴结结的做着，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马。”^⑥所以封建礼教是吃人的魔鬼，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宋儒尊三纲”，“名为尊圣道，实则塞人民之心思耳目”。^⑦其实，他们“日日言五帝三王而淫虐愈甚，日日言治国平天下而糜烂愈甚。”“惟其礼乐大兴于是乎有虚

① 《权利篇》，《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479页。

② 《国民意见书》，《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913页。

③④ 《中国尊君之谬想》，《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545页。

⑤ 《权利篇》，《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481页。

⑥ 《敬告姊妹们》，《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册，第845页。

⑦ 《道统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736页。

伪。”^①革命派进一步指出：“凡所谓儒者，皆奴隶之学也。”^②“重礼则养成卑屈之风，服从之性，仆仆而惟上命是听，任如何非礼，如何非法，而下不得不屈从之。”^③对于这种奴隶哲学，必须“思之”、“痛之”、“改革之”。

第三，批判“法家亡国论”，坚持革命暴力。

保皇派对法家的攻击，名目很多，但主要之点就是攻击法家实行“暴民政治”，专恃“暴力”，不施“仁政”。因此，革命派在猛烈地批判孔学的同时，勇敢地回击了康、梁一伙对法家的污蔑，大胆地肯定了法家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他们指出：秦皇、汉武“南征北伐，演轰轰烈烈有名誉有光彩之事业，此岂非我民族可赞可叹可歌可泣之历史，足令后世子孙拔剑起舞，而生继承祖宗盛业之雄心者乎？”^④章炳麟赞赏荀况的“法后王”精神，推崇韩非的“法治”思想，歌颂秦始皇创立的中央集权的秦王朝，表彰汉文帝“好刑名之言”，赞美王充是汉朝了不起的人物，肯定诸葛亮的赏罚严明，钦佩曹操的“用人唯才”。他尤其对著名的法家商鞅给予极高的评价，在《商鞅》一文中，表扬商鞅敢于发挥革命暴力的作用，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推行其法家路线，因而使秦国富强起来。他指出：那些攻击商鞅的儒生是只见“鞅初政之酷烈，而不考其后之成效。”如果拿商鞅和儒生比，一个是高山、一个是水沟。革命派对法家如此赞扬，是为了阐明这样一个道理：新兴的封建制代替腐朽的奴隶制不通过暴力革命不可能实现，

① 《广解老篇》，《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430—431页。

② 《劝同乡父老遗子弟航洋游学书》，《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389页。

③ 《权利篇》，《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481页。

④ 《论中国之前途及国民应尽之责任》，《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465页。

而新生的资本主义制度要代替没落的封建制度，同样必须坚持暴力革命。这就迎头痛击了保皇派“只可立宪，不可革命”的反动谬论。

第四，批判“天命论”，坚持“人定代天”。

康、梁一伙保皇派还大肆贩卖孔老二“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反动“天命论”。他们胡说什么人世间的一切都是由“天命”所定；让载湉当皇帝，搞“君主立宪”，这是由“据乱世”到“升平世”，是上天安排的，不许变动；人生的遭遇、祸福、寿夭是天老爷所定，“虽至仁圣，难与命争。”他们还大肆宣扬鬼神迷信，叫嚷“不迷信鬼神者，即拂弃一切，则愚民无所惮而纵恶。”他们就是这样疯狂地鼓吹“天命论”，借以抵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革命派绝不容许“天命论”的流毒到处泛滥。他们严正指出：“天”是人们杜撰出来的，事物的发展不在天，而在“人也”。他们提出了一个十分鲜明的战斗口号——“革天”。他们揭露孔老二所鼓吹的“天命论”是反动派的武器，罪恶的渊藪，精神的牢狱。历代的封建帝王，利用“天命”，“私其国、奴其民”，“愚弄黔首，矫诬天命，揆国人所用而独有之，以保其子孙帝王万世之业。”^①那些祸害人民的坏蛋，妄称“天命”，“假符窃讖，以扰乱天下之安宁”。而一般信“天”的人们，“供天香，进天灯，敬天神，拜天老爷”，“馁尽无量英雄之气”，“以阻人群之进步”，“中国数千年之坐误于此者多矣！”所以“天之不可以不革也。”^②革命派进一步指出，“天者冥冥而无足凭者也”，就是说“天”是没有权威，没有意志，没有神性的。他们赞扬“人定胜天”的口号，进一步提出“人定代天”，“代天者，以己之权行己之志，无所谓天者也。”^③

^① 邹容：《革命军》，《辛亥革命》第1册，第334页。

^{②③} 《革天》，《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716—718页。

他们要行的志，就是要通过革命手段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去代替清王朝的封建主义。革命派在批判“天命”的同时，向神学迷信发起进攻。他们认为神学“崇奉一尊，则与平等绝远也。欲使众生平等，不得不先破神教”。^①他们向基督教信奉的上帝挑战，大胆地质问：如果说上帝是创造主，那末上帝是谁创造的呢？他们揭露帝国主义者“口言上帝，直以上帝为其杀人戮人之前导。”^②革命派这些反天命、反神学的言词，如锋利的钢刀，戳穿了康、梁一伙的妖言诡辩。

鲁迅指出：“二十世纪的开始以来，孔夫子的运气是很坏的。”^③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孔学的批判，是革命派和保皇派大论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把孔老二这个封建社会里的偶像从神圣的庙堂里推了下来，剥开了孔“圣人”的画皮，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封建思想对人们的束缚，也回击了康、梁一伙掀起的尊儒反法逆流，推动了民主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

三、论战的意义和局限

革命派和保皇派的这场大论战，从历史刚刚揭开二十世纪的帷幕就开始了交锋，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七年全面展开，斗争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涉及问题之多，都是空前的。在论战中，革命派以昂扬的斗志，严密的推理，激烈的言词，击溃了保皇派，终于夺取了思想阵地的领导权。一九〇七年八月，保皇派的喉舌——《新民丛报》实在办不下去了，被迫停刊。十月，梁启超在

① 《无神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503页。

② 《续无神论》，《浙江潮》第3期。

③ 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鲁迅全集》第6卷，第317页。

日本东京开“政闻社”成立大会，他刚一上台，革命群众就奋起怒斥，他丧魂落魄，从后台溜走了。这年冬天，为了躲避热火朝天的革命斗争，梁启超流窜到了横滨乡间。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他眼看论战失败景象，抑止不住心头的悲愤，写了一首悲凉凄惨的诗：“泪眼看云又一年，倚楼何事不惨然。”“伤离念远何时已，捧土区区塞逝川。”保皇派妄图捧区区保皇之土，去塞民主革命的滚滚洪流，最后只能落得个“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境地。

革命派在这场大论战中的胜利，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是继太平天国反孔斗争、戊戌变法时期改良派和顽固派论战之后第三次思想解放潮流。对此，毛主席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毛主席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指出：“纪念他在中国民主革命准备时期，以鲜明的中国革命民主派立场，同中国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①

经过这场大论战，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得到了广泛的宣传，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甚至连保皇分子也不得不承认：“数年以来，革命论盛行于国中，……其旗帜益鲜明，其壁垒益森严，其势力益磅礴而郁积，下至贩夫走卒，莫不口谈革命，而身行破坏。……革命党指政府为集权，詈立宪为卖国，……立宪党者，不过为名义上之鼓吹。气为所慑，而口为所箝”。他们无可奈何地哀鸣：“革命党之势力”，“如决江河，沛然而莫之能御也。”^②论战的胜利促进了革命力量的壮大，而革命力量的壮大又促使舆论宣传工作的更大规模地展开。一九〇七年，上海一些革命志士

^① 毛泽东：《纪念孙中山先生》，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二日《人民日报》。

^② 《论中国现在之党派及将来之政党》，《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册，第607—608页。

成立《南社》，很快就有一千多人加入，他们以研究文学为名，鼓吹反清革命，影响颇大。同时上海的革命派编印了《女界钟》、《自由血》、《苏报案纪事》等书，创办了《神州女报》、《神州日报》等报刊，扩大革命宣传。香港设立《东风报》，广东设有《国民日报》、《南越报》，贵州设有《西南日报》、《黔报》，湖北设有《武昌白话报》、《汉口商务报》等，东北设有《长春日报》、《东陲公报》、《大中公报》，华北设有《民意日报》、《国风日报》、《帝国日报》，这些几乎遍及全国的报刊，成为革命党人鼓吹反清革命，提倡“国民精神”，互通声息，互相鼓舞的重要舆论阵地。正如毛主席所说的：“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①

经过这场大论战，批判了尊儒反法的社会思潮，在一定程度上解除孔孟之道的封建伦理观念对人们的束缚，激励人们奋起革命。一九〇七年后，孔孟之道赖以维护的君权在人们心目中开始破产。保皇分子承认：“今世民权自由之大义，如日中天”，“近数年来，自由民权之学说，膨胀于国民之脑中，莫不愤慨于国权之衰弱，而切齿于政府之腐败者。”^②鉴于这种民权思想潮流势不可挡，保皇派不敢公开宣扬维护封建专制政体，而积极劝说清政府搞君主立宪去抵制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他们向清政府开出这样的反革命“秘方”：“实行改革，以与天下更新，则革命党不期弭而自弭。”^③这说明孔老二一伙鼓吹的“三纲五常”已经不足以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了，说明“三纲五常”在群众中已失去了

①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

②③ 《论中国现在之党派及将来之政党》，《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册，第612、613页。

市场，而自由、平等的民主思想却充实着人们的头脑，促进着人民的觉醒。

经过这场大论战，进一步划清了革命派和保皇派的界限，使人们更清楚地认识了保皇派的反革命本质。一九〇七年以后，保皇派的势力在国内外逐步萎缩，活动市场也只有几个小据点了。甚至一些一贯为康、梁卖命的保皇分子也不得不宣布退出保皇会。例如在加拿大的温哥华，“保皇党之登报退会者相继不绝”。在缅甸的仰光，连当地保皇党机关报《商务报》的主笔都宣布要同保皇派一刀两断，愿接受革命真理。在新加坡，有许多受保皇派毒害的华侨从“梦中惊醒”，反戈一击。保皇派的各种论调被人们斥之为“政治吗啡”，保皇派头子梁启超被骂作“文妖”。保皇分子一个个成了孤家寡人，臭不可闻。这样就保证了孙中山三民主义政治路线的贯彻推行。

但是，不容否认，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论战中对不少问题的解释是错误的。在驳斥保皇派提出的革命会招致瓜分的问题上，虽然有个别人提出过反帝的口号，但大部分革命派始终不敢正面反对帝国主义。他们简单地把中国被瓜分的原因仅仅归之为清朝腐败，认为只要推倒了清朝，中国就可杜瓜分之祸。他们还强调自己发动的革命不是“排外”，而是“文明革命”，不会有损帝国主义的利益；他们甚至向帝国主义许愿，表示将来革命成功后，照常承认一切不平等条约；有的人甚至天真地认为干涉别国内政不符合国际法规定，而西方“文明之国”决不会这样做的。正因为他们对帝国主义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因此在对保皇派的驳斥上就显得是软弱无力。在驳斥保皇派提出的革命会引起下层群众暴动的问题上，革命派认为只要注意调和内部，进行“有秩序的革命”，就能把群众运动严格限制在自己铺设的轨道

上，而不会发生内乱。十分明显，他们既不把信心寄托在广大人民的力量上，又自认为是全体人民利益的代表者，自信能够掌握局势。这说明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即使在革命时期，对人民群众也不能摆脱固有的阶级偏见。在回击尊儒反法的逆流中，革命派也并不是坚决彻底的。他们有的人敢于指名道姓地批判孔老二，但也有人颂扬孔老二；有的人批判宋明理学，但却歌颂孔丘、孟轲；甚至有的人在同一篇文章中既说几句孔老二的坏话，又说孔老二有这样那样的“功绩”。在对法家的评论上，有的肯定秦始皇在历史上有进步作用，有贡献；有的又咒骂他是中国专制暴君的鼻祖，攻击“焚书坑儒”。诸如此类，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历史上的儒法斗争的认识是十分肤浅的。他们只不过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用他们的观点、方法来探讨儒家和法家，决不可能对历史上的儒法斗争作出科学的评论。他们在评论历史上的儒法斗争中出现的各种矛盾现象，是他们政治上的两重性在思想文化上的反映。这表明他们不可能彻底批判儒家，正确地评价法家。

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七年，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革命朝气的几年。他们这样大张旗鼓地批判保皇派，为革命派推翻清朝封建政权做了舆论准备，推动着辛亥革命的迅速爆发。但是，斗争的胜利，并不等于斗争的结束。“战斗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的袭用”，随着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革命派和保皇派的斗争也在更加尖锐激烈地继续进行。

第四节 哀求立宪和武装反清

一、围绕预备立宪的论争

面对日益高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洪流，清政府积极谋求对策。一九〇五年，清政府继“新政”的阴谋破产之后，又挂出了“预备立宪”的招牌，七月，派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在欧美、日本逛了一圈，让梁启超拟了一个“立宪”方案，于一九〇六年归国，纷纷奏请“立宪”。在载泽上那拉氏的密折中说：实行宪政有三大好处，一曰，“立宪之国君主，神圣不可侵犯”，“相位旦夕可迁，君位万世不改”，可以“皇位永固”；二曰，一旦改行宪政，列国之鄙我者，转而敬我，“将变其侵略之政策，为和平之邦交”，可以“外患渐轻”；三曰，革命党所以鼓动人心者“曰政体专务压制”，一旦“改行宪政，则世界所称公平之正理，文明之极轨，彼虽欲造言，而无词可借，欲倡乱，而人不肯从，无事缉捕搜拿，自然冰消瓦解”，达到“内乱可弭”。^①他们认为“欲防革命之危机，舍立宪无他道”。他们以一九〇五年俄国沙皇假立宪为例，说明“立宪”是对付人民的一种以退为进的手段。这就道破了清政府假立宪的动机和实质。那拉氏非常赏识载泽的这个反革命建议，七次召见出洋大臣，并开“御前会议”反复策划，认为假立宪确实对维持苟延残喘的清朝统治大有好处。于是，在九月一日发出了“预备仿行宪政”的谕旨。

^① 《奏请宣布立宪密折》，《辛亥革命》第4册，第28—29页。

反动派是绝不会自动放弃手中一丝一毫权力的。清政府在诏旨中宣布，立宪的原则是“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不能立即实行宪政，首要任务是改革官制，整顿法律，广兴教育，清理财政……若干年后“查看情形”，再“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在这期间，天下的“臣民”要忠君爱国，保守和平，尊崇秩序，切勿革命，以养成“立宪国民”的资格。“预备仿行宪政”实际上变成了一纸永远不兑现的空头支票。清政府假立宪之名，行反对人民革命之实的罪恶用心跃然纸上。

对于清政府这样的“预备立宪”，究竟怎么看，是好还是糟，不同的政治集团表明着不同的政治态度。

以康、梁为头子的保皇派，一听到清政府要立宪的消息，就高叫“伟哉！此举！”犹如捞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到处炫耀。一九〇七年，远在海外的康有为宣称什么目前光绪皇帝不危，无须再保，于是把原来的保皇会改组为国民宪政会，并无耻地表示不再和那拉氏计较旧怨，准备回国和清政府携手推行宪政。梁启超也在日本东京成立了政闻社，把湖南、湖北、江西、江苏、浙江、福建、河南、山东、云南、贵州、四川、广东等各省在日本的立宪分子拉在一起，发宣言，订纲领，为清政府的预备立宪摇旗呐喊。《政闻社宣言书》提出四大纲领：一曰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二曰厘订法律，巩固司法权之独立；三曰确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权限；四曰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利。并奴颜婢膝地向清政府表白他们“对于皇室，绝无干犯尊严之心”，“对于国家，绝无扰紊治安之举。”^①政闻社还出版机关刊物《政论》，为清政府预

^① 《政闻社宣言书》，《辛亥革命》第4册，第115页。

备立宪大造舆论。一九〇八年二月，政闻社迁到上海，联络国内立宪团体，秘密走访王公大臣，并向南北各省扩大其组织机构，为立宪奔走呼号。

直隶总督袁世凯、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等汉族大官僚对立宪也表示附和。但他们的真正目的是想借立宪打击皇族亲贵，迫使他们交出更多的政权，改变那种皇族亲贵把持朝政的局面。这不过是大狗与小狗之争，反映着清政府内部矛盾的尖锐和危机的严重。

国内的立宪分子张謇、郑孝胥、汤寿潜、谭延闿等最为活跃。他们听到清政府宣布要立宪，如猿得芋，闻声起舞。就在一九〇六年，张謇联络江苏、浙江、福建等地的官僚、名士、资本家在上海成立了预备立宪公会，郑孝胥为会长，张謇、汤寿潜任副会长。接着，汤化龙在湖北成立宪政筹备会，谭延闿在湖南成立宪政公会，丘逢甲等在广东成立自治会，和清政府一唱一和，遥相呼应。参加这些团体的大都是官僚地主兼资本家，有的是铁路股东，有的是工厂主，有的则是资产阶级化的地主士绅。这些人既在经济上有一定的实力，又在清政府官场里有不同程度的政治地位。例如张謇，他中过状元，曾任翰林院编修，又创办或参加投资纺织、交通、农牧、渔盐等各种工厂企业二十五个，资本高达九百万元。同时他还是南通一带拥有三千二百多亩土地的大地主，又在苏北创建垦牧公司，对农民进行封建剥削。郑孝胥官至四品京卿督办龙州军务，又是大生纱厂的股东。汤寿潜曾授两淮盐运使，又是浙江商办铁路公司的经理。谭延闿是进士出身，并与湖南的矿业资本家联系密切。汤化龙也是进士，同时参与汉口银行公会、湖北商团联合会的事情。这种亦官、亦绅、亦商的状况，决定了他们在经济上妄想通过立宪取得清政府对他们所办

工厂企业的进一步保护，尽快地发展他们的工商业，在政治上企图通过立宪，从清政府那里分享一些权利，改变他们目前那种没有实权的现状。但他们最怕的是一旦革命起来，把清政府打垮，会破坏了他们所需要的社会秩序，损害了他们工矿企业的发展，因此对革命恨入骨髓。

以上三类人，有个共同的目的，就是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企图让清政府作一些立宪的姿态，好平安渡过革命风潮，继续维持反动统治秩序。康有为曾不打自招地说过：他向来不忧外国之并吞，而深惧革命之内乱，立宪不立宪尚其次，而革命不革命乃真要事。张謇曾供认，“革命风炽，而立宪之说以起”。“立宪，可以安上全下，国犹可国。”^①梁启超在给康有为的一封信中就说得更为露骨。他说：革命派“真心腹大患，万不能轻视者也，近顷江西、湖南、山东、直隶到处乱机蜂起，皆彼党所为。今者我党与（清）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命党死战，乃是第一义，有彼则无我，有我则无彼”。^②十分清楚，他们不共戴天的仇敌，是革命党而不是清政府，同清政府“死战”是假，通过立宪扑灭革命才是真的。正是出于这样一个共同的反革命企图，康、梁一伙和张謇之流串通一气，并暗地里和那些附和立宪的汉族官僚勾勾搭搭，发起了一个颇具规模的立宪活动。

立宪派为了达到他们的反革命目的，曾大肆宣扬“立宪救国论”。他们开动宣传机器，竭力颂扬清政府预备立宪的“功德”，胡说五大臣“出洋游历，考察政治”，是清政府吸取了日本“区区岛国、崛起东海”的经验，是要“取列邦富强之精髓，以药我国垂

① 张謇：《啬翁自订年谱》。

② 赵丰田：《梁任公年谱长编》。

危之痼疾”。这是中国人“莫大之幸福”。^①他们耸人听闻地把立宪比作一艘遇到风浪的船找到了“指南针”。只要这个“指南针”一到手，国家就会保证安全，人民就会增进幸福，中国可开文明之花，揭独立之旗。他们还断言，中国“自强不自强之机，则断然取决于立宪。”宪政“不立”，“吾国必亡”。^②梁启超更为狡猾地把立宪说成是拯救人民于大旱之中的及时雨。他胡说，人民对于清政府立宪，“如渴望饮，如饥望食，如寒望衣，如喝望荫，如风雨望蔽，如蹙望杖，如瞽望相，如临河望筏，如陟险望梯，如久病望医，如大旱望云霓霖雨”。^③一言以蔽之，立宪就有一切。

资产阶级革命派和立宪派相反，始终对清政府反对革命的预备立宪进行抵制和批判。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消息一经传出，革命党人吴樾就怀揣炸弹，进入北京火车站，要和五大臣拚命。但刚一上车，因人群拥挤，炸弹爆炸，五大臣中有两人受伤，吴樾当场牺牲。同时，革命派写了大量的文章，揭露清政府预备立宪的阴谋，批判立宪派的反动谬论。孙中山指出：“宪法二字，近时人人乐道，便是满洲政府，也晓得派遣奴才出洋考察政治，弄些预备立宪的上谕，自惊自扰”。^④革命派形象地揭露道：清政府立宪就象是一个恶鬼改变一下鬼脸，来欺骗人们。清政府的立宪又如一只破船，“水要进来，拿一块烂手巾勉强塞住”。^⑤革命派急切地呼吁：“同胞！同胞！其以满政府派五大奴入欧，即以

① 《论立宪与教育之关系》，《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360页。

② 《论立宪与外交之关系》，《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册，第576—577页。

③ 《论请愿国会当与请愿政府并行》，《辛亥革命》第4册，第131页。

④ 孙中山：《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孙中山选集》上卷，第79页。

⑤ 《劝告国人反抗伪立宪文》，《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第24页。

此为立宪之确据乎？呜呼，此真保皇家之好梦耳”。求清政府立宪，就如缘木求鱼，求慈善于魔鬼。清政府的立宪诏旨，虽“童子愚昧，亦知其伪”。^①有的革命派还进一步揭露道：清政府“看见革命的势力，一天大一天，就想利用立宪两个字，骗骗汉人，叫他不要讲革命”。其实，“预备立宪，就是预备排汉的代名词，也就是预备实行专制的代名词。”清政府“设一个陆军部，想夺各省的兵权；设一个度支部，要夺各省的财权；又设一个邮传部，想握全国的交通机关，另外又设一个农工商部，想骗商人的财产，又想握各省实业权”。^②清政府的这种立宪就是“谋中央集权，拿宪法做愚民的工具。他的心事，真是一天毒一天”。^③照清政府这样立宪下去，只能是满洲贵族享幸福，广大人民无幸福；满洲贵族有自由，广大人民无自由；满洲贵族有权力，广大人民无权力。这完全是强权宪法，满洲贵族宪法，是清政府压迫人民“使之万劫而不可复之宪法也”。^④这种立宪，只能亡国，不能救国。革命派曾尖锐地指出：清政府立宪是“非媚外不可的”。那个积极鼓吹立宪的郑孝胥就供认：要中国立宪，“除非把中国一切地方，尽行开放，同外国人杂居”。^⑤这是赤裸裸的卖国主义。因此，革命派得出结论：中国如果真立宪，必须经过革命，必须打倒清政府。清政府标榜的“立宪”根本不可能实行。对于立宪派的可耻嘴脸和卑劣用心，革命派也毫不留情地予以揭露。他们斥责立宪派的请愿活动“手段卑劣”，“迷乱后生”，“诳误国民”，是“颺汤止

① 《四川讨满洲檄》，《辛亥革命》第2册，第324页。

② 《渝立宪党》，《辛亥革命》第2册，第364、371页。

③ 《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孙中山选集》上卷，第74页。

④ 《满政府之立宪问题》，《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550页。

⑤ 《渝立宪党》，《辛亥革命》第2册，第366页。

沸，抱薪救火”，“希冀个人之富贵，抛弃民族之积耻。”^①他们揭露张謇、汤寿潜几个人的立宪活动是想“升大官发大财”。

革命派对清政府预备立宪以及对立宪派的揭露与批判，戳穿了清政府的阴谋，驳倒了立宪派的谬论，剥下了立宪派假立宪之名、行保皇之实的画皮，划清了“革”与“保”两条路线的界限，促进了革命运动的发展。

二、立宪派的叩头请愿

一九〇七年秋，清政府为了掩人耳目，作出一点立宪的姿态，宣布在中央开始筹设资政院，令各省筹办谘议局，作为中央和地方的谘询机关；责成宪政编查馆编写议院选举法和君主立宪法大纲；并假惺惺地宣布要在今后逐年推行宪政。

清政府的这些举动使立宪派眉飞色舞。但他们看到革命风潮一日千里，深感清政府的步子太慢，不足以达到尽快扑灭革命的目的，就准备来一个联合大请愿。一九〇八年六月，张謇以预备立宪公会的名义，向湖南宪政公会、湖北宪政筹备会、广东自治会及河南、直隶、山东、山西、安徽、四川、贵州等省的立宪派头目发信，相约齐集北京，要求清政府速开国会。康有为也在海外把二百余埠的华侨立宪分子联合起来，上书清廷，请速开国会。梁启超把持的政闻社在《为国会期限致宪政馆电》中，明确要求清政府在三年内召开国会。八月，各省请愿代表相继到达北京，向都察院呈递国会请愿书，他们联络近四万人在这份请愿书上签了名，以显示他们的声势。

^① 吴稚：《意见书》，《辛亥革命》第2册，第432—436页。

但是，清政府的立宪本来是一出假戏，是要借立宪为名集权皇族，这批立宪分子看不出清政府这种花招，一定要把假戏真做，又动员了这么多人签名，这不能不引起清政府的愤怒和恐慌。于是，清政府采取了个杀鸡给猴看的手法，说政闻社“良莠不齐”，“纠结党类”，“阴谋煽惑，扰乱治安”，下令严拿康、梁党徒，将政闻社社员陈景仁革职拿问。立宪派吃了一记响亮的耳光，纷纷如鸟兽散。

清政府虽然驱散了立宪派，但也不能不正视其岌岌可危的现实，不能不应付一下立宪派的立宪要求，缓和一下和立宪派的矛盾，于是在一九〇八年九月间宣布预备立宪以九年为限，九年后正式召开国会，推行宪政。同时还颁布了一个《钦定宪法大纲》。这个大纲共二十三条，其中关于“君上大权”的就有十四条，规定皇帝有颁行法律、黜陟百司、设官制禄、宣战议和、解散议院、统帅陆海军、总揽司法权等至高无上的权力。关于臣民义务的九条，除了纳税、当兵等项义务外，还有一些在封建专制法律许可范围内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权利和自由。这样的宪法，和封建专制政体没有什么两样。连立宪派看到之后，都极为不满，纷纷指责清政府，要求来点实际的行动，缩短预备立宪期，速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梁启超向清廷沉痛陈述：“宪政之能成立与否，则数千年国家之存亡数万万国民之生死系之。”现在定九年预备期，这是“涂饰耳目，敷衍门面”，自欺欺人，根本达不到立宪的目的。他向清廷苦苦哀求，希望清廷“庶几改之，余日望之！”^①其他的许多立宪分子也对清政府的立宪骗局表示失望，纷纷活动，准备再次苦谏。

^① 《立宪九年筹备案恭跋》，《辛亥革命》第4册，第155页。

正当立宪派蠢蠢欲动之际，十一月间，载湫和那拉氏相继死去，三岁的溥仪继位，改一九〇九年为宣统元年，其父载沣任摄政王，总揽大权。载沣进一步假立宪之名，行皇族集权之实。他鉴于清朝统治集团中满汉官员矛盾的尖锐，又对汉族地主官僚代表袁世凯拥有大权忧心忡忡，就借口袁脚有病将其开缺回籍。接着，他任命其弟载洵为海军大臣，载涛为军谘大臣，自封代理陆海军大元帅，弟兄三人分掌军政大权。为了掩盖皇族集权，载沣下诏重申预备立宪的决心，命令各省务必在一九〇九年成立谘议局。

立宪派对成立属于所谓地方议会性质的机构谘议局异乎寻常的感兴趣。他们纷纷和各省的达官贵人纠合在一起，攫取了谘议局中的各级权力。各省谘议局几乎清一色地由立宪派分子任议长，如张謇任江苏谘议局议长，汤寿潜任浙江谘议局议长，谭延闿任湖南谘议局议长，汤化龙任湖北谘议局议长，蒲殿俊任四川谘议局议长。这些立宪派头目以“国民代表”的资格自居，批评时政，发表演说，通电来往，准备发起一次全国性的大请愿，再一次促清政府加快立宪步伐。张謇对此最为积极，他在十月就发表了《请速开国会建设责任内阁以图补救书》，严厉指出：清政府不速开国会，就要众叛亲离，那时就连我们这些立宪派也只能“袖手旁观”，眼看着革命党把清政府推翻。他要求清政府必须缩短预备立宪时间，在一九一一年召开国会，组成责任内阁。张謇同时呼吁各省组织起来，联合请愿。十二月，湖南、湖北、江西、江苏、浙江、福建、山西、广西、吉林、黑龙江等十六省谘议局的代表在上海开会，组成国会请愿同志会，并决定分道奔往北京，向清廷上书苦谏。张謇慷慨激昂，专门写了《送十六省议员诣阙上书序》一文为代表们送行，竭力鼓吹一个“请”字，叫嚷清

政府一次不答应，我们就第二次再请愿，二次不行，再来三次，三次不行，“至于无穷”，何时答应，何时而止。

一九一〇年一月，各省谘议局代表齐集北京，向都察院呈递请愿书，要求代奏清廷。结果清廷无视他们的苦求，以“国民知识不齐”为理由，坚持九年立宪期，给立宪派泼了一盆冷水。立宪派并不甘心失败，他们本着张謇制订的请愿精神，又筹备第二次大请愿，并在北京组成国会请愿同志会，指责清政府顽固鄙陋，不达民情，反复向清政府讲述只有立宪，才能消灭革命，收拾人心，国会早开一天，君权早稳定一天，民气早平静一天。国会请愿同志会还创办了《国民公报》，并派人到各地作宣传组织工作，忙得不亦乐乎。与此同时，远在日本的梁启超也不断给他们打气，发表了《论请愿国会当与请愿政府并行》，鼓励立宪派要“竭诚尽敬以请愿国会”。^①一九一〇年六月，立宪派组织了十个请愿团体，号称代表二十多万人，下跪上书清廷，哀求速开国会。清廷召开御前会议，以“财政困难，灾情遍地”为借口，加以拒绝，立宪派又碰了一鼻子灰。但是，立宪派并没有从中吸取任何教训。他们一面发表文章，声泪俱下地向清政府陈述不开国会，国必大乱，乃至于亡；一面又组织人力，准备第三次请愿。张謇向各省谘议局议长发函，邀请他们到北京，组成“议长之请愿团”。同年八月，各省谘议局在北京开联席会议，通过向刚刚成立的资政院提出《请开国会案》，并推汤化龙为主席，蒲殿俊为副主席，决定借资政院开会之机，发动大请愿。为了壮大声势，他们和各省的督抚取得联系，请求一致行动。许多督抚也看到如果不速开国会，必然大局难支，人心涣散，就由云贵总督李经羲出面，串通程德

^① 梁启超：《论请愿国会当与请愿政府并行》，《辛亥革命》第4册，第127页。

全、锡良等人，征得十八个督抚的同意，两次向清廷发出了请开国会和速组责任内阁的电报。同时，立宪派为了造成声势，在许多城市发起了请愿活动，天津有一千多人赴督抚衙门请愿，福州有数千人向督抚乞求立宪，开封、太原天天有人到衙门呼吁速开国会，奉天各府县则纷纷写信给谘议局，准备集合“万数千人”到省城去叩头请愿。各地频繁展开的请愿活动，给在京的立宪派头目壮了胆。十月，资政院正式开会，经过立宪分子的反复哀求，通过了《请开国会案》。十月二十六日，资政院又通过了《陈请速开国会具奏案》，再一次请求清政府于一九一一年召开国会。这时清政府眼见各地革命党人频繁活动，立宪派又这样吵闹不宁，迫不得已允许缩短预备立宪期，将九年改为五年，决定在一九一三年召开国会，并要于一九一一年先成立新内阁。同时，又下令遣散各地请愿代表。

这时，江浙等立宪派分子如张謇之流，一方面慑于清廷的压力，另一方面又自我安慰，认为总算清廷作了点退让，就不再坚持在一九一一年召开国会的要求，停止了请愿活动。但湖南、湖北、四川的代表，则准备发动第四次大请愿。东三省的立宪派更陆续派代表赴京。这下可触怒了清廷，命令马上将东三省的代表押送回籍，并通知京内外各地对请愿活动严行禁止，随时弹压。天津学生听到这个命令，愤怒异常，不少学堂宣布罢课，并通电全国要求采取一致行动。清政府凶相毕露，派出几百名警察镇压学生运动，同时将天津学界请愿会的负责人温世霖发配新疆。立宪派分子惊恐万状，纷纷潜逃。从此，他们的请愿活动就烟消云散了。

一九一一年五月，清政府裁撤军机处等机构，公布了新订内阁官制。载沣任命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由他筹组新内阁，在

总理、协理和各部尚书十三名国务大臣中，汉族官僚仅四名，蒙古旗人一名，满族八人，而八名满人中，皇族又占五名，被人们讥讽为“皇族内阁”。清政府借预备立宪集权皇族的阴谋暴露无遗。立宪派分子企图从清政府手中分一点权力的愿望已成泡影。但他们仍然执迷不悟，张謇、汤寿潜等写信给载沣进行苦谏。各省谘议局议长、副议长赶赴北京召开第二次联合会议，上书力争，提出现在所组内阁，不合君主立宪条例，要求改组。然而清政府却恶狠狠地回答：这是“君上大权，议员不得妄行干涉”。并把请愿代表逐出北京。立宪派分子一个个大失所望，痛哭流涕，发表《宣告全国书》，叫嚷如此下去，中国前途“旦暮不保”。张謇也发出哀鸣：“是时举国骚然，朝野上下，不啻加离心力百倍，可惧也！”^①立宪派已经预感到革命风暴的即将来临，纷纷收起了立宪叫器，准备另谋出路，投机革命。

立宪运动是对民主革命的一种反动。它随着革命的高涨和清王朝的岌岌可危应运而生，也随着清王朝的拚命集权而四处碰壁。它的失败，从反面教育了人们，使大家看到，要实现民主政治，必须坚持武装反清的革命道路。

三、革命派的武装起义

和立宪派相反，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揭露批判清政府立宪骗局的同时，发动了一系列的武装起义，始终坚持了武装推翻清政府的革命路线。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从孙中山组织革命的小团体起，他就进行了几次反清的武装起义。到了

^① 张謇：《啬翁自订年谱》。

同盟会时期，更充满了武装起义的事迹，直至辛亥革命，武装推翻了清朝。”^①

一九〇六年，革命派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萍浏醴起义。萍乡、浏阳、醴陵一带，地处江西、湖南交界，会党势力雄厚，群众基础较好，革命气氛甚浓，加之水灾严重，豪绅横行，人民无法生活下去，反抗怒火愈演愈烈。这时，同盟会会员刘道一、蔡绍南等从日本来到这里，积极宣传革命，组织起义。起义军拟分三路进兵，一路据浏阳、醴陵，进攻长沙；一路据安源路矿为根据地；一路从宜春、万载东去南昌，进取江西。十二月四日，起义首先在浏阳的麻石爆发。接着，萍乡、浏阳、醴陵相继发动。酝酿已久的萍浏醴起义爆发了。

起义军定名为“中华国民军南军革命先锋队”，推洪江会首领龚春台为都督，发布檄文，宣布“破除数千年之专制政体”，“建立共和国”，“使地权与民平均”。^②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忱拥护。安源煤矿工人纷纷前来参加战斗，贫苦农民积极投奔革命队伍。旬日内，起义军迅速增至三万多人，占据文家市、上栗市、桐木、宜春等地，威震长江流域。孙中山闻讯后，急派宁调元等人到苏、皖、湘、鄂、赣等省，发动起义，以图响应。东京的许多同盟会员纷纷请求回国，参加战斗。

这时，清政府调集湘、鄂、赣、苏四省军队前来镇压，帝国主义的军舰也闯入长江，伺机干涉。但是起义军毫无惧色，手持刀矛，英勇奋战，屡败清军。起义军坚持苦战一个多月，终因敌强我弱，缺乏坚强的领导核心，旗号不一，互不相统，而被清军各个击败。反动派四处清乡洗劫，疯狂进行反攻倒算，革命党人遭到

^① 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10页。

^② 《中华国民军起义檄文》，《辛亥革命》第2册，第477页。

重大牺牲。

反革命的屠杀吓不倒革命人民，萍、浏、醴起义激励着革命志士继续前进。一九〇七年，出现了一个武装起义的高潮。这年春，孙中山到越南河内，建立同盟会支部，联络两广会党，运送枪炮弹药，发动了西南的六次武装起义。

一九〇七年五月，革命党人和三合会联合，在广东潮州黄冈发动起义，一举攻下黄冈，用孙中山名义布告安民，附近官吏望风潜逃。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急率清军前来镇压，起义军誓死抵抗，用刀矛迎战，击退敌兵多次进攻。但因为敌我力量悬殊太大，起义失败。

接着，孙中山又指派邓子瑜等人往广东惠州联络会党，在七女湖举行起义。起义枪声一响，归善、博罗、龙门等处闻声响应，一举夺取了当地清军防营的枪械，击毙清军水兵多人，震动惠州。清军增派大量援军，将起义镇压下去。

一九〇七年秋，广东钦州、廉州一带人民不满清政府的苛捐重税，开展了规模巨大的抗捐抗税斗争。清政府派郭人漳等带兵前往镇压。黄兴等人图谋发动起义，一面派人和抗捐抗税的群众联系，相约举行武装起义；一面又亲自到郭人漳处活动，让他反戈相向，以便实现雄据两广、进取长江、挥师北伐、推翻清王朝的战略计划。郭人漳大耍反革命两面手法，表面上未表示异议，但等到革命党人于九月在钦州王光山发动起义，率军万余人，攻下防城，进逼钦州后，郭人漳竟向革命党人射出罪恶的子弹，屠杀起义军，使防城得而复失。起义军因毫无思想准备，败退于两广交界的十万大山。钦、廉、防城起义又失败了。

一九〇七年十二月，孙中山和黄兴亲率革命党人进攻广西镇南关，夺取炮台，准备和退入十万大山的革命队伍会合，进取

广西。但十万大山的队伍道远难来，孙中山等坚守炮台七昼夜，被迫退往越南境内。清政府勾结越南反动政府，胁迫孙中山离境。孙中山临行前，指示黄兴再一次在钦、廉和云南河口一带发动起义。

一九〇八年三月，黄兴率领一支以华侨革命分子为骨干的二百多人的短枪队，攻入两广交界的钦州、廉州、上思一带，历时两个月，大小数十战，还是无法打开局面，败退下来。

同年四月，革命党人黄明堂在云南河口发动起义，率军击杀清兵，攻占河口，布告安民，声威大振。清政府调兵反攻，黄明堂坚守二十多日，弹尽粮绝，退往越南。革命党人在西南发动的第六次起义又失败了。这几次大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却使民主革命思想在西南广泛传播，为推翻清朝的反动统治创造了条件。

正当革命派在西南和清政府的反动军队作战的时候，长江下游一带的革命党人也打响了武装起义的枪声。光复会领袖徐锡麟为掩护革命用钱捐纳为道员，充任安庆警察学堂监督，暗中进行革命活动，联络革命青年，进行革命宣传，积极准备起义。秋瑾则以她所主持的绍兴大通学校为基地，联络会党，运动军、学界，秘密组织“光复军”，和徐密谋于一九〇七年七月中旬在皖、浙两省同时起义。六月间，清政府已有觉察，到处查拿革命党人，徐锡麟怕日久生变，乘七月六日巡警学堂毕业典礼，巡抚恩铭及文武官员前来祝贺之机，枪杀恩铭，并率学生杀向军械局，准备开仓取枪举行起义，结果被清军包围，双方激战六小时，徐锡麟被捕，大义凛然，从容就义。远在浙江绍兴的秋瑾还没有来得及响应起义，清军就包围了大通学校，逮捕了她。在审讯时，敌人对秋瑾施以酷刑，逼其招供革命党人。秋瑾毫不畏惧，一言不发，只写了“秋风秋雨愁煞人”七个字，英勇就义于绍兴轩



孙中山亲书追悼秋瑾烈士的挽幛

亭口下，表现了一个革命党人可贵的革命品质。在安庆充任清新军队官的革命党人熊成基，由于来不及响应徐锡麟起义，就继续隐蔽下来。一九〇八年十一月，熊成基乘载活和那拉氏相继死去，人心惶惶之机，率马炮两营千余名新军起义，进攻安庆，和清军激战一昼夜，攻城不下，转攻合肥，因兵力只剩八、九十人，加之追兵又至，熊成基逃走，起义失败。

起义接连失败，并没有使孙中山灰心。同盟会领导人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感到过去起义失败的原因在于地点选择偏僻，运送弹药困难，主要依靠会党，指挥不一，战斗力不强。所以在孙中山的指示下，黄兴设同盟会支部于香港，在广东新军当中活动，利用新军力量，秘谋再次起义。经过革命党人的艰苦努力，新军中许多人倾向革命，不少人加入了同盟会。一九一〇年二月，广州新军和巡警发生冲突，同盟会员倪映典乘机率三千新军起义，进攻省城。但因势力孤单，倪映典中炮牺牲，死难和被捕者三百多人，广州新军起义又失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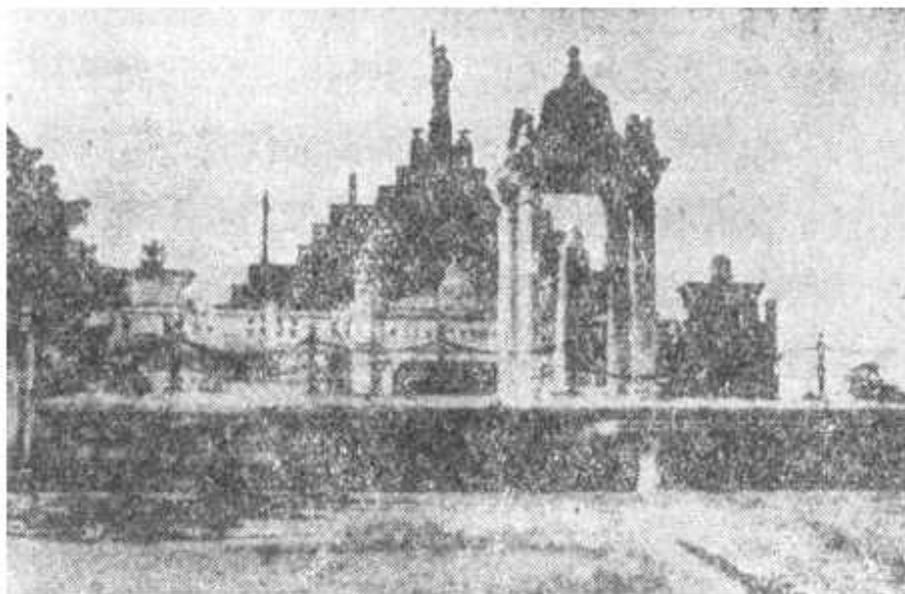
这次起义失败之后，许多革命党人泄气了。他们“举目前途，众有忧色，询及将来计划，莫不唏嘘太息，相视无言”。^①针对

^① 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80页。

这种情况，孙中山在马来半岛的槟榔屿召集会议，大讲“革命风潮已盛”的大好形势，热情鼓励大家振奋精神，坚持战斗。这次会议决定集同盟会的精干力量，和清政府决一死战。会后，革命党人很快投入了紧张的起义准备工作。孙中山亲自到华侨中募款，派人到国外购买武器，黄兴在香港组织统筹部，在广州布下三十多处秘密据点。他们并选出敢死队八百多人作为先锋，计划先占领广州，再分兵出湖南、江西、福建，夺取长江中下游，然后大举北伐。许多华侨纷纷回国，准备参加战斗，革命党人决心为革命百死不辞。

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起义的枪声在广州城头响了。黄兴率敢死队攻入两广总督衙门，两广总督张鸣岐穴墙而逃。黄兴下令焚烧总督衙门，并率队转攻督练公所，正遇大队清军，双方展开激烈巷战。革命党人将生死置之度外，英勇战斗，杀死大量清军，自己也有较大牺牲。黄兴手指和腿脚俱受轻伤，忍痛率余部一面迎击敌人，一面后退，最后被迫化装逃至广州河南。其余各路队伍，也和清军展开激烈巷战，彻夜相攻，但都先后失败。许多革命党人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不少人落入敌人魔爪，慷慨就义。广州人民激于义愤，不顾清政府的迫害，冒着生命危险，收殮烈士遗骸七十二具，葬于黄花岗，这就是著名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所以这次起义也被称为黄花岗起义。

黄花岗起义虽然损失了同盟会的许多骨干分子，但它直接推动了武昌起义的爆发。正如孙中山在《黄花岗烈士事略序》中所指出的：“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止，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

革命党人发动的十多次武装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清朝反动统治，并宣传了革命，振奋了人心。革命党人赴汤蹈火，肝脑涂地的英勇战斗精神，激发了人们旺盛的革命斗志。革命党人用暴力革命的实际行动向革命人民昭示，只有坚持武装反对帝国主义走狗清朝，才是唯一正确的革命路线。这和立宪派叩头请愿的保皇路线形成鲜明的对照。

革命党人发动的起义所以遭到失败，主要原因是：第一，他们搞单纯军事冒险，没有发动群众。萍、浏、醴起义和一九〇七年的钦州、廉州起义只是利用了一下群众的自发斗争，而其他各次起义依靠的全是会党和新军。会党和新军虽然也是群众的一部分，但会党是一些原始形式的民间秘密结社，不加以改造，不能充分发挥其革命的战斗作用；新军终究是清朝的军队，也不能作为联系群众的纽带。这样，革命党人不去做艰苦的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工作，结果使自己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起义虽然发动，却根本无法坚持下去，有的甚至几小时之内就瓦

解了。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革命党人没有扎根于群众，起义之失败是必然的。这种现象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他们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阶级地位决定了他们不敢依靠群众；而英雄史观又使他们看不起群众。他们有的人鼓吹“有秩序革命”，迷信只要英雄振臂一呼，革命即可成功。甚至有些人对武装起义也不感兴趣，专门搞暗杀活动，希望刺杀一两个清朝的头面人物，获得革命成功。这是十分错误的。

第二，没有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镇南关起义只夺了个炮台，徐锡麟起义连一个学校都没有掌握，钦州、廉州之役幻想依靠郭人漳反正，就连黄花岗起义也没有在广州一带建立起坚实的地盘，结果使这些起义只能打一两个胜仗，不可能夺取最后胜利，只能打速决战，不能打持久战。同时，因为没有根据地，武装起义中的人力、物力、财力都出现了矛盾。参加起义的革命党人都是临时集中的，更不用说什么严格训练；其枪弹大都从海外运来，数量有限；其钱财基本上靠从华侨中捐募，也不能维持日久。这种人力、物力、财力的不足，使起义队伍经不起敌人的反攻。

第三，没有统一领导、统一指挥。徐锡麟和秋瑾起义虽先有联络，可最后各干各的；西南的六次起义也是互不相统，各自为战；熊成基起义只是自己单干；倪映典起义也没有很好做统一部署。没有统一计划，没有统一行动，分散了革命力量，结果被敌人各个击破。这反映了同盟会的组织涣散，领导不力。

这一系列的武装起义失败之后，一些革命党人悲观失望了，他们被“黎明前的黑暗”迷住了眼睛，看不到革命的高潮就要到来。但是，全国各地的许多革命党人仍然在失败中摸索前进，开

展艰苦的革命活动，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

在湖北，科学补习所在一九〇四年被破坏后，革命党人又于一九〇六年成立日知会，组织革命斗争。日知会遭破坏后，他们又于一九〇六年冬建立群治学社，后改名振武学社。一九一一年一月，革命党人又将振武学社扩大改组为文学社，在新军、会党、学生中积极开展革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不到半年，参加文学社的人达三千以上。

在湖南，革命党人焦达峰秘密联系会党，在军队、学堂中进行串联，准备武装起义。

在长江流域，一九一一年夏，宋教仁、谭人凤等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积极联络新军，发展组织，密谋起义，大大推动了长江流域的革命工作。

在河南，同盟会员创办《河南》杂志，鼓吹革命，在黄河两岸策动武装斗争。

在陕西，同盟会员井勿幕等在各阶层人士中积极进行扎扎实实的宣传组织工作，创办学堂、印书局，散发宣传品，会员扩展到十余县，积极联络哥老会、“刀客”组织，汇成一支反清力量。

在四川，同盟会员吴玉章（永珊）等积极展开革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在贵州，张百麟等组织“自治学社”，几乎遍及全省，积极在学堂、军队、会党中开展工作，并办《西南日报》，宣传革命，推动着革命高潮的到来。

在直隶，尽管清政府严密控制，同盟会也已建立，秘密开展反清活动。一九一一年春，旨在抗击沙俄侵略的“抗俄铁血会”和“共和会”等组织在北京开会，成立“革命联合会”，促进了直隶革命的发展。

在东北，宋教仁等在一九〇七年已建立辽东支部，和吴禄贞、蓝天蔚等革命党人一起发展革命力量。一九〇九年，孙中山又派廖仲恺等到吉林，发动群众，开展革命工作。

如此等等，同盟会的组织几乎遍及全国。一处革命火起，便立即变成燎原之势。

第十二章

推翻帝国主义走狗清朝的辛亥革命

第一节 武昌起义天下应

一、人民革命斗争的高涨

在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的同时，人民群众反抗的暴风骤雨，迅猛异常。当时形势的特点是天下大乱。一九〇九年的群众反抗斗争为一百三十多次，一九一〇年就猛增到二百九十多次。全国各地的人民群众纷纷起来摧毁清政府的统治根基，使清王朝这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更加摇摇欲坠。

一九一〇年四月，长沙爆发了轰动全国的抢米风潮。一九〇九年长沙、衡阳一带发生严重旱灾，洞庭湖沿岸又出现了特大水灾，这就使两湖一带粮食颗粒无收，各家仓廩空虚，贫苦农民离乡背井，沿街乞讨，饥民遍野。但外国洋行和湖南巡抚岑春煊勾结起来，抢购粮食，私运出境，获取暴利。当地的地主劣绅和奸商也大肆收买粮食，囤积居奇，投机倒把。长沙城里的米价与日暴增，甚至一日数涨，各米店挂出“早晚市价不同”的告示，人心惶惶。往年米价一石不多于二、三千文，至一九一〇年四月猛增到了八千文。十二日，长沙城南有一个挑水工人因劳动一天的收入买不到一升米，悲愤交集，全家投河自杀。消息传来，长期压在劳动人民心头的仇恨，如万顷波涛，一起迸发了出来。

十三日，农民群众、铁路工人、手工业工人、流浪的灾民纷纷涌向湖南巡抚衙门，愤怒声讨清政府压榨人民的罪行，要求减价卖米。人越聚越多，巡抚衙门被围得水泄不通。巡抚岑春蓂胆颤心惊，竟疯狂下令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当场打死数十人，伤者无数。英勇的中国人民绝不俯首对屠刀。当晚，成千上万的群众手拿棍棒，举行暴动。他们很快将一百多家米店、碓房捣毁，放火焚烧抚署，高呼：杀死岑春蓂，为死难同胞报仇。岑春蓂吓得屁滚尿流，诡称自杀，仓惶逃命。接着，愤怒的群众向城内外的洋行、洋教堂、洋学堂开火。什么天主堂、内地会、伦敦会、美以美会、联传道会，全部砸烂；什么怡和洋行、太古洋行趸船、美孚油行、卜内门公司、亚细亚油行、英美烟公司、三井商店、日丰商店，统统摧毁；什么大清银行、税关、官钱局，一抢而光。愤怒的群众为所欲为，打翻压在他们头上的一切仇敌，使得那些地主官僚、洋奴买办和帝国主义分子纷纷钻进帝国主义的轮船，夹着尾巴逃往汉口。清政府急速从各地调来大批军队，英、美、法、日、德也调来十几艘军舰游弋于湘江之上。中外反动势力联合向革命人民开刀，硬把长沙这次反帝反封建的抢米暴动镇压了下去。但是，这次暴动的政治影响是反动派无法扼杀的。连英国的一家报纸也不得不供认：“黑铁已伤中国黄汉之心，赤血将洒神州白日之下。”^①长沙抢米风潮传出后，在全国引起了连锁反应。

长沙附近，宁乡、益阳、安化、宝庆、常德、衡州、浏阳等地先后爆发了焚烧教堂和抢米风潮。

湖北崇阳县人民打毁县署，要求减价卖米；武穴、广济、沔阳发生抢米暴动。

^①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

江西抚州群众连抢米行十三家，新喻、梓树、湖口、吉安继起响应，捣毁米店。

安徽南陵、蒙城、凤台、宣城等地发生饥民暴动。

江苏清江人民捣毁大丰面粉公司，宿迁人民抢永丰面粉厂，扬州、宝应、东台、奉贤等地饥民也奋起抢米。

直隶涿州、良乡人民起来抢米。

奉天安东、五道沟、六道沟、凤凰厅也掀起了抢米暴动。

长沙抢米风潮震动了全国，到处出现反帝反封建斗争热潮。

一九一〇年六月，山东莱阳人民抗捐抗税的斗争是对清政府的又一沉重打击。

清政府在搞预备立宪骗局的过程中，以立宪为名，向广大劳动人民派捐增税，人民被逼得走投无路。他们“认税必饿死，不认税必诛死，与其坐而待死，不如斗而死”。^①莱阳人民正是在这种“不斗则死”的情况下拿起了武器。六月初，在曲诗文的率领下，三、四万乡民聚集为一支强大的队伍，向土豪劣绅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革命群众到处捣大户，捉富豪，吓得土豪劣绅、孔孟之徒四处流窜，无家可归。接着，农民队伍向县城进发，把县城团团围住。从十三日一直包围到第二天早晨。县官朱槐之心惊肉跳，采取狡猾的以退为进的策略，虚假地答应农民的七项要求。清政府见朱槐之对群众镇压不力，立即把他撤职，改派心狠手毒的奎保继任县官。奎保一到任，就穷凶极恶地叫嚷：“吾官可不作，而捐税必不可免；吾头可断，而曲诗文等不可不拿！”^②他并电请山东巡抚孙宝琦派大量军队前来镇压。六月二十九日，孙派军队星夜赶往莱阳。群众闻讯后，男女老少，包括和尚尼

^① 一九一〇年九月二十四日《帝国日报》。

^② 一九一〇年八月十六日《汇报》。

姑，都拿起锄头、棍棒、梭标、土枪，连夜聚集一起，达四、五万人，和清兵对阵，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凶恶的清军用大炮轰击农民军阵地，曲诗文率部退入山林。清军凭借武器优良，继续追击，农民军死伤很多。为了保存力量，曲诗文率部转移，莱阳被清军占领，抗捐暴动最后失败了。

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直至胜利——这是革命人民的逻辑。山东莱阳抗捐斗争虽然失败了，却唤起许多地方的人民起来斗争。仅一九一〇年，象莱阳这样的抗捐斗争就有数十起之多。河南长葛县县官向人民加派巡警费，激起群众愤怒，没等乡绅分户派捐，各乡就鸣锣聚众，五、六千人冲入县城，声讨县官的罪行。县官想先发制人，先向群众威吓，继又调卫队弹压。愤怒的群众不怕威吓和武力，涌进县署，砸了个稀里哗啦，县官惊魂未定，钻进厕所躲藏，显示了人民群众的强大威力。江苏阜宁知县李某，横行乡里，随便抓人，激起人民反对，全县商人一律罢市，各乡农民纷纷造反，“将知县衙署拆毁，拘李知县置之狱，绝其饮食”。^①广东连州人民反抗清政府钉门牌的斗争，不仅规模大，而且持续数月之久。

原来清政府在假立宪当中，为了盘剥人民，进行户口调查，重钉门牌，提取重税。那些充任“调查员”的劣绅又乘调查之机骚扰各家，荼毒人民。人民群众早已恨之入骨。从九月起，连州各乡人民就向这些劣绅展开了斗争。他们将酒捐、屠捐公司和学堂的器具打毁，烧毁“调查员”的房屋，要求赶走“调查员”，不准钉门牌，除去各种捐税。他们还到各乡串联，互约坚持斗争到底，赶制武器，自卫反击。十月初，各乡群众集合起来，举行暴

^① 《江苏阜宁商人罢市知县被民人拘囚》，《辛亥革命》第3册，第396页。

动，攻破离连州县城三十里的三江城，将城里美国教堂焚烧，愤怒声讨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斗争的烈火越烧越旺了，清政府派来军队镇压。革命群众毫不畏惧，举旗列队，在李观妹的指挥下，和清军展开激战。接着两广总督又增派水师、炮船和大批新军将李观妹包围。由于敌我悬殊，李观妹率部突围出走，战斗失败了。清政府最后靠武力才把连州的门牌钉齐。但是，这次斗争沉重打击了清政府的反动统治。连亲身参加镇压连州人民的官吏也不得不供认，人民和清政府之间是“冤仇结于骨髓”，“民气之悍，民心之愤，已成危象”。^①象这样反钉门牌的事件，在江西、广东、广西、云南、安徽、江苏等省，到处发生，层出不穷。“聚众毁学，拆屋伤人之事，几于无地不有，无日不有”^②。

一九一一年，人民群众反抗的急风暴雨，来势更猛。一月二十一日，汉口英“租界”巡捕房警察蛮横无理，居然把中国一名人力车工人踢死，激起工人群众的满腔怒火。第二天，一千多人力车工人聚集英国巡捕房前，愤怒声讨帝国主义的暴行，要求惩办凶手。英国领事竟然命令英军开枪，打死中国工人十多人。驻汉口的清军也无耻地前来镇压。工人群众怒不可遏，冲上去和反动派激烈搏斗，当场把清军头目齐耀珊的左眼打伤。接着，武汉各界几万人集会，声讨英国强盗和清政府的反革命暴行。驻汉口的清军头目丧魂落魄，尤其怕群众暴动触犯了洋大人的在华利益。他们忠实执行清政府的卖国投降路线，认为“风潮迭起，与其助长民气，不如退让洋人”。^③于是，一面派军队镇压革命群众，一面派兵去保护英“租界”，一时岗哨林立，遍布各街。

① 《连州事件日记摘录》，《近代史资料》一九五五年第4期。

② 《东方杂志》，《辛亥革命》第3册，第393页。

③ 一九一一年二月十一日《汇报》。

同时清朝官吏还千方百计为洋人开脱罪责，胡说什么二十一日死的那位人力车工人是出于“鼠疫”，并不是被踢死的，还煞有其事地到处成立“防疫公所”，并三番五次派人给英领事赔款道歉。清军镇统张彪亲自坐镇英“租界”，派军队到处捕人，硬把革命风潮镇压了下去。但是，革命的烈火是扑不灭的，工人群众的革命斗争推动了武汉革命形势的跃进。

以上仅是全国各地人民反抗斗争中的几个典型，从中可以看出当时人民群众反抗斗争的显著特点是一触即发，此呼彼应。长沙抢米风潮波及全国；山东莱阳抗捐引起数省反应，知县稍一增税即被人民群众监禁，江苏省反钉门牌的斗争在一九一〇年一处火起，就几乎燃遍全省，“几于铜山西鸣，洛钟东应。计八府三直隶州，以滋事闻者几居其半”。^①湖南省仅一九一〇年“竖旗倡乱”，奋起造反的就遍布宁乡、益阳、湘潭、安化、巴陵、武冈、新化、龙山等二十一个州厅县。贵州一省在一九一〇年的人民反抗斗争就有七十三起。而广东省在一九一一年，三合、三点、小刀、剑仔等会党，积极和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取得联系，“劈立师团，设堂打单，明目张胆啸聚乡村”。^②这些遍及祖国各地的反抗斗争说明了人民群众和帝国主义走狗清朝的矛盾已发展到白热化程度，那怕有零星之火，也可引起燎原之势，将清政府这个快要倒塌的房屋烧毁，任何力量也无法挽救其彻底毁灭的命运。正如伟大革命导师列宁所指出的：“如果没有群众革命情绪的蓬勃高涨，中国民主派不可能推翻中国的旧制度，不可能争得共和制度”。^③一九一〇年后人民群众革命斗争在全国的普遍

① 《江苏江宁县乡民殴伤调查员》，《辛亥革命》第3册，第395页。

② 《宣统三年两广总督张鸣岐折》，《清军机处档案》。

③ 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426页。

高涨，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武昌起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铁路风潮鼎沸腾

随着革命风暴的席卷全国，一九一一年五月又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

保路运动是由帝国主义掠夺中国路权和清政府卖国求荣而引起的。帝国主义为了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十分注意夺取铁路修筑权。这是因为一旦夺取了铁路，不仅可以利用它调运军队，镇压人民的反抗，而且可以直接控制沿线的城镇乡村和矿物物产。帝国主义夺取的条条铁路，构成了纵横交错的压榨中国人民的吸血管。因此，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在收回利权运动中收回川汉、粤汉等铁路的修筑权非常仇恨，他们一面在报上刊登文章恶毒攻击中国人民“不借外款，不雇外国技师”，自己修路，造成“中国前途叵测”，一面又威胁利诱清政府借外款修筑铁路，从而将铁路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一九〇九年六月，清政府与英、法、德三国银行团签订了湘、鄂境内粤汉铁路和鄂境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借款五百五十万英镑，并规定修筑粤汉、川汉路要分别用英、德两国的总工程师。美国得知这一消息后，以“利益均分”为借口，在一九一〇年挤进了三国银行团，从而结成四国银行团，向清政府施加压力，逼其尽快订立借款修路合同。清政府不敢得罪帝国主义，却蛮横地向中国人民开刀。一九一一年五月九日，清政府在邮传部大臣大买办盛宣怀的策动下，悍然实行所谓“铁路国有政策”，下令将已准交商办的铁路干线一律“收归国有”。十八日，又命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强行接收广东、四川、湖南、湖北四省铁路公司。紧接着，二十日就和四国银

行团签订了《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湖北境内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借款六百万英镑，以两湖厘金盐税作保，将一千八百里的铁路修筑权拱手送给了帝国主义。清政府这种“铁路国有”政策完全是一种“夺路转送外人”，为帝国主义敲诈勒索中国人民的卖国政策。连当时的清朝官吏都这样供认：铁路国有“乃举吾国之国权、路权，一畀之四国”。“损失国权，莫此为甚”。^①

清政府这一劫掠和卖国的罪行，立即激起了湖北、湖南、广东和四川各阶层人民的一致反对。这两条铁路的修筑权是经过这四省人民长期斗争，才由帝国主义手里夺回而归商办的。四省铁路公司，历年筹集了四千多万两资金，除广东全是商股以外，其他三省还有用各种捐税征集来的“民股”，四川、湖南甚至按田亩抽收租股，因此包括的阶层比较广泛。本来就在清政府剥削下困苦不堪的穷苦农民，出于满腔爱国热忱，为了修中国人自己的铁路，忍饥挨冻，才交上了修路的股钱。有一首《来日大难歌》，充分表述了广大穷苦农民的这种爱国热情。歌词写道：

“自从光绪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年）把路办，银子凑了万万千。也有官的商的款，也有土药烟灯捐。最可怜的是庄稼汉，一两粮就要出这项钱。要办铁路为的是那一件？怕的是外国人来占路权。”^②人民为了爱国而修路，清政府为了卖国而“铁路国有”，这就形成了尖锐的对立，人民是绝不能饶恕清政府的。当时四川各地流传着一首《川人吁天歌》，将清政府在“铁路国有”的幌子下进行卖国活动的反革命手法揭露得十分深刻。“天呀天！我四川，万不料今年遭此大变。抢我们财产，夺我们利权。摧毁我们做亡国奴，逼我们永远受熬煎。”“这样强横的政府，野蛮的手

^① 《四川保路同志会电文要录》。

^② 《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第13号。

段，加倍的压制，分外的专权。”“卖路是卖国的引线，重债是亡国的见端。今既夺我路，灭我权，一切交与外人管。”“任人监督，受人熬煎，民命国命都危险。”这样危害“民命国命”的“铁路国有”政策，不能不激起全国人民的反抗怒潮。

首先起来反对的是湖南人民。五月十三日，绅商学界各团体刊发传单，抨击清政府的卖国罪行。十四日，长沙举行了各阶层群众一万多人的集会，反对铁路“国有”。十六日，长沙、株洲的一万多铁路工人举行游行示威，倡议商人罢市，学生罢课，全省拒交租税，以对抗清政府收回路权。六月以后，湖南许多地方商人罢市，学生罢课，“纷纷各回原籍，沿途演说，秘密开会”。“各属风潮相继而起者，指不胜数”。^①反抗的烈火迅速燃遍了全省。许多地方都在相传“某日焚某署，某日攻某城”，“风声鹤唳，一日数惊”。^②保路运动正向武装起义的方向发展。

在湖北，人民的反抗斗争更为激烈。汉口商人一律罢市，革命党人詹大悲等在《大江报》上连刊文章，愤怒揭露清政府的卖国罪行，号召人民不要对清政府抱一丝一毫的幻想，准备和清政府决战。詹大悲写了一篇《大乱者救中国之药石也》的文章，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纷纷行动起来，鼓吹反清革命。湖广总督瑞澂怕得要命，查封了《大江报》，逮捕了詹大悲。但这更激起了群众的反抗怒火。数千群众举行集会，有人当场砍断手指，挥泪演说，高呼救国口号。会场上群情激愤，决心争回路权。他们派出代表前往北京，绝食三天三夜，抗议清政府媚外卖国。宜昌到万县的线路，本来已经动工修筑，清政府借“铁路国有”，迫令停工，筑路工人、商人奋起抗争，和警察发生了冲突，清政府又调

^① 一九一一年七月三十一日《光华日报》。

^②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三日《天铎报》附刊《川鄂大事纲目》。

兵前来镇压。数千名工人抡起铁锤，挥动棍棒，奋勇抵抗，当场打死清兵二十余人。

在广东，两广总督张鸣岐虽然采取高压政策，广大人民的反抗斗争却有增无减。广东股东召开了粤汉铁路股东会议，一致抗议“铁路国有”，誓死争归商办。张鸣岐闻讯，派人威逼这些股东，股东们逃到了香港，仍然坚持斗争。他们组织了保路会，要和湖南、湖北、四川一起联合争路，并召开万人大会，宣布要和卖国贼斗争到底。香港同盟会员办的《中国日报》等报纸，也连发文章，大力声援，吓得张鸣岐下令禁止报纸入粤。远在海外的留学生和海外华侨也积极投入了保路运动。留日学生提出“路存与存、路亡与亡”的战斗口号，决心和清政府斗争到底。旅美华侨更激愤地表示：“粤路国有，誓死不从”，“泰山可移，商办之局，断难摇撼”。“有劫夺路权者，格杀勿论”。^①

四川人民的保路运动不但十分激烈，而且更为广泛深入。六月中，川汉铁路股东代表在成都开会，会场上情绪激昂，一致痛骂卖国贼盛宣怀，当场决定成立“保路同志会”，并发表宣言，通电全国，痛斥清政府“听一人之私言，置全国以孤注，朝廷为亿万众集怨之府，而悍不一顾；夺商民数千万血资之产，而不许一呻”。对于这样“古今中外”少有的野蛮政府，“惟据死力争”。^②紧接着，各县纷纷成立保路同志会，甚至广大妇女也成立了“四川女子保路同志会”，决心“以我四千余年无用之妇女，化为保国保种之柱石”，“当此大厦将倾，千钧一发之际”，^③为国立功。保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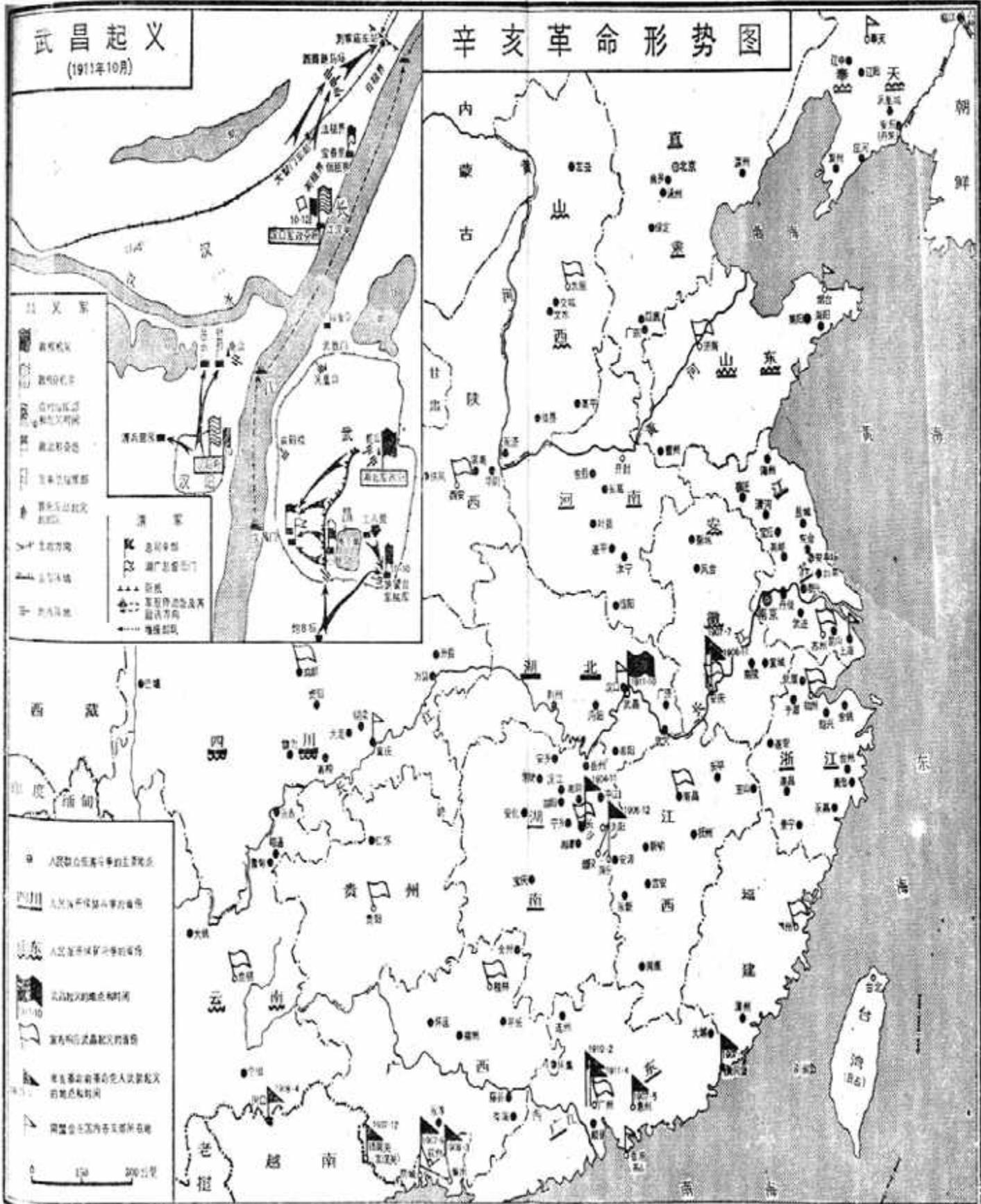
① 甦民：《满夷猾夏始末记》。

② 《四川保路同志会宣言》，《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183页。

③ 《为组织四川女子保路同志会告川中妇女书》，《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188—189页。

武昌起义 (1911年10月)

辛亥革命形势图



的漫天烽火迅速烧遍了全川。不到半月，保路同志会会员发展到十万多人，全省工人、农民、学生、市民以至僧道人士也都参加到斗争行列里来。四川西北的少数民族也群起响应，投入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工农劳动群众表现得尤为坚决。据时人记载说：

“最足动人者，则下等社会贫苦人，发言之精当，忠悃之纯挚，有为士大夫所不到。”^①“忠愤所播，小民尤易入脑，愤不欲生”。^②

四川保路运动急风暴雨般的展开，使清朝官吏惊慌失措。四川护理总督王人文看到民情激愤，担心危及反动统治，于是奏请清廷暂缓接收铁路。清政府下令将他撤职，改派大刽子手赵尔丰继任四川总督。赵尔丰不顾人民的强烈反对，在八月间又强行收回川汉铁路宜（昌）万（县）段。消息传到成都，正在开会的成都铁路公司立刻大哗。保路同志会和铁路公司马上召开紧急大会，参加群众达几万人。会场上怒吼声、责骂声、口号声、号哭声响彻云天。商人提出罢市，教师、学生提出罢课。最后会议一致通过了全城罢市、罢课的决定。会还没散完，全城已有一半的商店关了大门。

成都罢市、罢课的消息象闪电般迅速传遍了全省。四川“南拈邛雅，西迄绵州，北近顺庆，东抵荣隆，千里内外，府县乡境，一律闭户”。^③各报刊天天登载着贫民暴动，捣毁自治局、经征局，打毁外国教堂，与巡警械斗的消息。一位清朝官吏向清政府这样报告当时的情况：“比闻川省风潮日烈，皆以盛宣怀丧权误国，欲得而甘心。月余以来，屡开全省股东大会，每次到会者近万人，誓与路共存亡”。^④四川保路运动并开始向武装暴动发展。

① 《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第8号。

② 《城口厅同志之爱国热》，《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194页。

③ 一九一一年七月十五日《民立报》。

④ 《宣统政纪》，《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336页。

在保路运动向武装反清进一步发展的关键时刻，立宪派“文明争路”的反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革命派武装保路的革命路线展开了尖锐的斗争。

立宪派面对着汹涌澎湃、日趋高涨的群众运动，十分惧怕。他们深恐斗争发展下去会破坏封建统治秩序，因而力图加以控制。他们到处散布“文明争路”的言论，要人民只求保路，不要反抗官府，更不可聚众暴动，企图用叩头请愿的办法，哀求清政府“收回成命”。他们所要求的仅仅是把自己那一股款项退回。他们甚至成立“官商学界联合会”，出面阻止和破坏群众的斗争，维持反动的社会秩序。他们到处张贴告示，要群众勿暴动；勿在街上演说；不要打教堂；不要侮辱官府；要商店立即照常营业。立宪派绞尽脑汁，想出了一个花招，印制了大量载湉的牌位，牌位两旁写上载湉的两句话：“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强行发给群众，供在每家门口，烧香顶礼膜拜。他们还在大街上扯上黄布，供上载湉的牌位。一时载湉的牌位满天飞，使人又笑又气。立宪派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竭力表白自己对清王朝忠心耿耿，一方面是以此束缚群众手脚，不让群众公开举出反清旗号。但是，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希望劝说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反动派发出善心，回头是岸，是不可能的。”^①反动透顶的清政府对立宪派的“苦心”哀求，根本不予理睬，而且还暗令赵尔丰对群众加强镇压。九月七日，赵尔丰逮捕了谘议局正、副议长蒲殿俊、罗纶等保路同志会和川路股东会的负责人，并枪杀请愿群众三十多人，造成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立宪派“文明争路”的反革命路线在铁的事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① 毛泽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第1376页。

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在开始并没有掌握保路运动的领导权，但他们始终坚持武装保路，坚持把保路运动发展为武装反清。保路运动一开始，他们就明确指出：“不建铁路固死，建铁路亦死；铁路成固死，铁路不成亦死。”“何以得不死？则革命之策是也。吾果革命，则川汉铁路，吾自集股，吾自建筑，何畏他人制我死命，何用他人越俎代庖”。^①保路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以后，他们深为革命群众的英勇斗争精神所鼓舞，一面积极参加保路运动，一面从中因势利导，希望通过保路运动来“激扬民气，导以革命”，^②借保路之名，鼓动人民以行革命之实。四川的革命党人在五月下旬后，“集合同志，开会于成都，决议借名保路，提挈人民，组织民军，共同革命”。他们积极参加“保路会”的活动，“以保路为推倒满清工具，而实行鼓动股东开会”。一些同盟会员还暗地联络会党，准备武装起义。八月初，同盟会员龙鸣剑、王天杰等与四川哥老会首领秦载赓、罗子舟等在资州举行会议，决定组织四川保路同志军，发动武装斗争。九月七日，即“成都血案”的当天，他们又裁截木板数百块，上写省城业已发难，望各地速起救援的字样，然后将木板涂上桐油，包上油纸，投入河中，顺流而下，这些被革命党人称作的“水电报”把消息传遍川南、川东各地。九月八日，保路同志军进围成都，附近州县群起响应，纷纷成立保路同志军，总数不下二十万人。四川全省都沸腾起来了，形成了波澜壮阔的群众大起义。清朝官吏惊呼“川省大局，岌岌可危”。九月二十五日，同盟会员吴永珊（吴玉章）、王天杰等首先在荣县建立革命政权。这是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最先建立的革命政权，虽然没能长期坚持下来，但它对于周围的影响很大。

① 《四川革命书》，《辛亥革命》第2册，第315页。

② 《四川光复》，《辛亥革命》第6册，第4页。

清政府吓得手忙脚乱，在不到半个月时间里先后调派端方和岑春煊入川，加紧对四川人民起义进行镇压。但是，端方率湖北新军入川，却造成武汉空虚，给武汉革命党人发动武昌起义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

三、武昌起义全国响应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爆发了。领导这次起义的是同盟会员组织的两个革命组织“文学社”和“共进会”。

“文学社”成立于一九一一年一月，它是在“振武学社”遭敌人破坏后，又联络“益智社”、“神州学社”、“武学研究会”等革命小团体而成立的。“文学社”最主要的宗旨是反清革命，对于“平均地权”等则不太关心，因为他们认为革新政治是其他同盟会员的事情，当前首要任务是“武力推翻满清，达到民族平等地位”。但它有着严密的组织，由同盟会员蒋翊武任社长，王宪章任副社长，同盟会员刘复基任评议部长，各级领导均采用选任或推任的方法，互相联系极其严密，基本是单线联系。发展人员也很慎重，参加者大部分是贫苦知识分子和新军中的士兵。“文学社”继承了“科学补习所”、“日知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的传统，从运动军队着手，不“轻率发难”，很多革命党人投笔从戎，到新军中当兵，进行艰苦、扎实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他们创办《大江报》，进行公开的宣传活动，同时利用一切机会，采取编制歌曲、吟诗联句、放映幻灯、做游戏、讲故事、问出身经历等各种形式，鼓吹革命，宣传反清。经过他们的艰苦努力，士兵“遂无不乐入革命党者”，不到半年，人数发展到三千多人，为武昌起义打下

了雄厚的基础。

“共进会”成立于一九〇七年秋，它是一部分和会党联系密切的同盟会会员如孙武、焦达峰、刘公、张伯祥等在日本东京成立的。其主要宗旨是推翻清朝统治，建立民国，他们对于“平均地权”不仅不关心，还以会党群众不易理解为借口，把它改为含糊不清的“平均人权”。一九〇八年十月，共进会逐步派人回国，联络会党，准备发动起义。孙武、焦达峰等到了武汉，着手联络武汉一带的会党，秘密进行组织工作。由于准备不足，几次起义都遭失败，会务一度停顿。一九一〇年冬，孙武又重返武汉，准备响应黄兴等在广州发动的黄花岗起义，将武汉的许多小团体如德育会、忠汉团、自治社、竞存社、将校研究团等并入共进会，成立共进会鄂部总会，由刘公、孙武等领导，成为与文学社并驾齐驱的主要革命团体。共进会和文学社有着共同的特点，就是不“轻率发难”，宣传深入细致，组织严密扎实，他们的许多人也投入行伍，进行宣传组织工作，到一九一一年春已发展了二千多人。

但是，文学社和共进会之间由于阶级地位的不同，彼此矛盾，互不团结。共进会的领导人出身较富，孙武家富“巨万”，刘公号称革命党人中的“财主”，刘英则是名门望族。而文学社的领导人蒋翊武等是一批土里土气的穷书生。如果说文学社的领导人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末共进会的领导人则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蒋翊武等对共进会的领导人不信任，认为他们是“穿西服的洋老爷”，“计谋又高，派头又大”，瞧不起自己这样的穷书生。刘公、孙武等常乘文学社经费困难之机，想把文学社合并过来。而文学社又以他们人员较多为理由，要共进会服从文学社领导。彼此互相摩擦，一时难于统一。可是，飞速发展的革

命形势却迫切要求他们消除成见，携起手来；而推翻清朝反动统治的共同革命要求，使他们具有联合的基础。尤其是一九一一年四月黄花岗起义失败后，随着铁路风潮的汹涌澎湃，文学社和共进会都正紧张地准备在武昌发动起义，因而急需彼此统一力量，统一部署，统一行动。这年秋天，发动起义的大好时机来临了。同盟会中部总会积极建议文学社和共进会联合起来。八月下旬，他们终于接受了同盟会中部总会的建议，联合成立了起义的领导机关，积极筹划，准备起义。九月二十四日，共进会和文学社的代表六十多人，在武昌胭脂巷十一号举行联席会议。会上详细研究、热烈讨论了发动起义的时间、组织、军事计划及领导人选。会议推举蒋翊武为湖北革命军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刘公任未来的军政府总理；决定在武昌小朝街设军事总指挥部，负责有关武装起义事宜，在汉口长清里九十八号设政治筹备处，负责将来建立革命政府的各项工作；并决定十月十一日以放火为号发动起义。会后，革命党人立即拟定文告，绘制旗帜，制造炸弹，配制弹药，印刷钞票，购置手枪，紧张地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

十月八日中午，孙武等人在俄租界的宝善里制造炸弹，由于不慎，一枚炸弹突然爆炸，孙武受重伤，送往医院。这时蛮横的俄国巡捕闻声赶来，将革命机关所藏的旗帜、文告、名册、手枪、弹药统统查抄，并报告清朝当局。一时街上岗哨林立，侦探密布，形势异常紧急。

十月九日，蒋翊武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如何对付风云突变的形势。会议决定当晚十二点发动起义，以南湖炮声为号，并分派多人到各处秘密布置。蒋翊武、刘复基、彭楚藩等在武昌小朝街总指挥部的楼上，兴奋而焦急地等待着南湖的炮声。但是

到十一点半仍毫无动静。突然巡警破门而入，将刘复基、彭楚藩等逮捕，蒋翊武在杂乱中逃走。这时南湖的炮声仍未传来。原因是送命令的邓玉麟胆小犹豫，没有把命令送到南湖炮队。九日晚发动起义的计划流产了。

湖广总督瑞澂在抓到刘复基、彭楚藩之后，得意忘形，当晚就开庭审讯刘、彭和另一个因送炸弹被捕的革命党人杨洪胜。刘、彭、杨三人大义凛然，威武不屈，在法庭上大骂清政府的倒行逆施，揭露瑞澂一伙的丑恶嘴脸，把审判官的种种非难驳得哑口无言，目瞪口呆。他们在庭上高呼：“民国万岁！”“孙中山和未死同志万岁！”表现了一个革命党人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十月十日晨，瑞澂凶狠地下令将刘、彭、杨杀害。但是，三位烈士的鲜血并没有白流，它唤起了千百万人起来战斗。正象当时的革命党人、文学家胡石庵在《三烈士赞》中所写的：“龟山苍苍，江水泱泱，烈士一死满清亡，掷好头颅报轩皇，精神栩栩下大荒，功名赫赫披武昌。”^①

十月十日一整天，革命和反革命两方面都十分紧张。瑞澂在杀害三烈士后，到处捕人，下狱监禁。革命派在听到三烈士就义的消息后，悲愤交集，痛不欲生，决心立即拿起枪杆为死难烈士报仇。他们暗地串联，秘谋当晚起事。晚上七点多钟，工程营第八营的革命党人熊秉坤等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各标、营、测绘学堂的革命党人奋起响应，一时火光烛天，枪声大起。南湖炮队也攻进了城里，响起了隆隆炮声。驻扎在塘角的辎重队放火助威，向清军冲杀。革命党人很快就攻占了楚望台军械库、凤凰山、蛇山和各城门，然后集中全力进攻湖广总督衙门。瑞澂一伙

^① 《辛亥首义回忆录》第4辑，第22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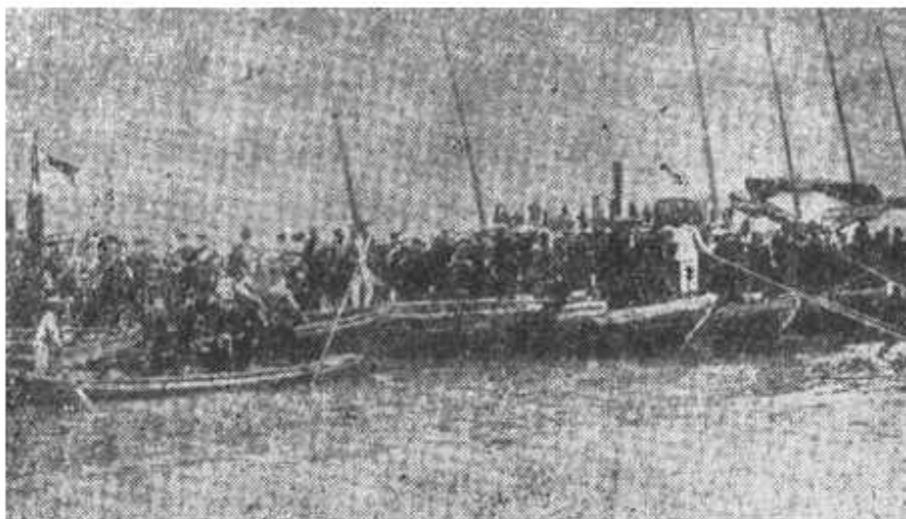
革命军占领武昌后的统制衙门

清朝官吏丧魂落魄，打穿督署后墙，仓惶逃命。经过一夜的激战，革命党人攻下了总督衙门，解放了武昌城。接着，起义军又于十一日攻下了

汉阳，十二日攻下了汉口，武汉三镇全解放了。

革命在武汉的胜利，是广大起义士兵和人民群众英勇奋战的结果。革命军战士经常枵腹战斗，和敌人彻夜相攻。他们那种奋勇杀敌的不怕死精神，严守纪律和雷厉风行的作风，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革命军“无一兵入民家之房，无一人夺民家之食”^①，更无人临阵退却，或枪杀百姓。因此，当革命军攻下湖广总督衙门之后，附近居民就自动协助救火、清理战场。十一日攻克汉阳后，兵工厂的工人全部迅速复工，夜以继日地赶制军火，有力地支援了革命。同时，各家商店立即开市，商会保证每天送往前线几百担馒头，还为军政府先后代筹了数十万经费。军政府出示招募新兵、扩充革命武装四协（相当于四旅），武汉工农群众和学生踊跃报名参加，五天之内即告满额，而四乡农民前来从军仍源源不断。当时广大人民特别是工农群众，都主动积极协助革命军痛击反动军队。十月十八日在汉口刘家庙迎战清军时，“有铁路工人数百人，不避炮火，起而拆毁铁路，顷刻

^① 《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第5册，第128页。



革命军从武昌渡江作战

之间拆毁十余丈。……火车行近毁路处，民军炮队瞄准敌人的火车，各炮齐放，火车中了一炮，轰然一声，车头脱轨，列车尽倒于轨外。敌兵死伤不可数计，其余纷纷逃出。民军见此情况，群起奋击。齐呼‘杀！杀！杀！’沿途农民及伏在稻田的铁路工人，亦奔起杀敌。有的拿锄头，有的拿铁锤，有的拿刀矛，一声呼喊，如暴风骤雨雷轰电闪一般，蜂拥而往。一时炮声、枪声、驰骤声、叫喊声、啼哭声、欢呼声，混成一片。敌人除死亡而外，都抱头鼠窜，形成瓦解土崩的景象”。^①这种生动活泼的战斗场面，表现了广大工农群众对清朝政府的痛恨和对于民主革命的热烈支持。战斗结束后，群众主动送饭送菜，热情慰劳革命军，“好多老百姓，挑着担子，提着篮子，成群结队而来。就近一看，馒头也有，烧饼也有，饭菜鱼肉也有，送饭的男女老少都有”。^②绘成一幅十分感人的图景。第二天，革命军攻克刘家庙，附近“贫民皆雀跃欢呼”。

^{①②} 蔡寄鸥：《鄂州血史》第115、116页。

在此前后，由于广大工农群众的有力支援，武昌革命军迅速攻占京山、天门、潜江、监利、汉川、黄川、宜昌、荆州、沙市等数十个州县，巩固和扩大了武昌起义的胜利成果。鄂北光化江湖会也举行起义，进占襄阳，附近谷城、南漳、枣阳等县群众纷起响应，革命浪潮激荡着整个湖北。

辛亥革命首先在武昌爆发，这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刻的经济根源和政治根源。

第一，武汉地处我国中部，称为九省通衢，是帝国主义侵略较早和压迫最深的地区之一，也是清王朝统治的重心所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显得特别尖锐激烈。二十世纪初年，帝国主义在武汉设立的各种企业多达一百八十余家，它们还控制海关，开辟租界，教士横行于各地，兵舰游弋于长江，疯狂地掠夺原料、倾销商品、输出资本和进行政治压迫，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清政府命张之洞等在这里举办“新政”，使成千上万的人民破产流亡，武汉的灾民多达二十余万，苦力工人也近十万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榨的结果，不能不造成蓬勃兴起的人民革命运动。加之武汉地区水陆交通较其它地方发达，资本主义比较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力量较为雄厚，会党和广大人民的反抗斗争较为活跃，为民主革命思想的迅速传播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这使武汉逐步变为革命和反革命斗争最激烈的地区，使革命爆发的条件较其它地方更为成熟。张之洞的一个走卒曾说：“辛亥革命曷为成功于武昌乎？论者以武昌地处上游，控扼九省，地据形胜，故一举而全国响应。斯固然矣。抑知武汉所以成为重镇，实公（指张之洞）二十年缔造之力也。其时工厂林立，江汉殷富，一隅之地，足以耸动中外人之观听。有官钱局、铸币厂，控制全省之金融，则起事不虞军用之

缺乏。有枪炮厂，可供战事之源源供给。成立新军，多富于知识思想，能了解革命之旨趣，而领导革命者，又多素所培植之学生也。精神上、物质上，皆比较彼时他省为优。以是之故，能成大功。”他最后叹息说：这全是“公所不及料”，以至“种豆得瓜”。^①这一段为张之洞评功摆好的言论，说明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武汉疯狂压榨的结果，造成了自己在精神和物质上的对立面，造成了自己的掘墓人。

第二，武汉革命党人艰苦而扎实地宣传和组织工作是促使武昌起义爆发的最重要原因。武汉革命党人和其它地方革命党人不同，他们不草率发难，急于求成，而是比较深入群众作扎实地工作。从科学补习所、日知会，到文学社、共进会，都派人到新军中当兵，宣传革命。当时“秀才当兵，已成普遍现象”。^②他们自办印刷所、图书室、学校、书报社等，翻印传播《革命军》、《猛回头》等革命书籍，使新军士兵几乎人手一册。他们还潜伏乡间，“每值村镇演戏集会，虽远在数十百里外，辄徒步往，或杂人丛，或登台演讲”^③，宣传反清革命。有的革命党人甚至深入到手工业工人的生产工地，一边干活，一边传播革命思想，使许多人“醉心于革命”。他们的组织工作也较完善，加入组织者要经过考察、审查、教育和填写志愿书。如加入文学社者，“须得本社社员三人以上之介绍，经本社派员考查，确认为与本社宗旨相合、愿守本社一切规章者，方得为本社社员”。^④社里设有正副社长、文书、会计、评议各部，经推选产生，完全是政党性质的组织。同时他

① 《张文襄公十八鄂记》第7页。

② 《辛亥革命实践记》，《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第49页。

③ 《湖北革命知之录》第134页。

④ 《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第8页。

们还把革命组织和新军编制系统结合起来，二十人为一排，五排为一队，一旦起义爆发，不用打乱原先的新军编制，即可行动作战。这样比较深入的宣传和严密的组织，使武昌起义时即使孙武失事、三烈士就义、蒋翊武出走、反动派追捕，也可以向前推进革命，不失时机地打响了武昌起义的枪声。

第三，武昌起义是在敌人统治薄弱的环节首先打开缺口，而先取得胜利的。清政府虽然在武汉千方百计地加强自己的统治，但革命党人长期艰苦地开展革命工作，使敌我双方的力量发生变化，尤其是革命党人在清朝统治的柱石——新军中建立了革命组织，扩大了革命力量，挖了清朝的墙角。到了一九一一年秋天，“川鄂因争路事，闹得满天风云，四民鼎沸”，清廷“仍然用高压手段专事镇压”^①，急派其爪牙端方率武汉半数以上的新军到了四川，这就削弱了清政府在武汉的统治力量。当时驻守武昌的新军只有十八个营，约九千人。其中革命党人占三分之一以上，真正和革命顽抗到底的只有三个营和一些警察、督署卫队。从人心所向、人员多寡来讲，革命方面占着优势。孙中山说过：“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的。”^②这话是有道理的。

总之，起义首先在武昌取得胜利，既非偶然，也不是轻而易举的，除了武汉革命党人的努力外，近代中国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激化以及全国民主革命运动的高涨是一个决定的因素。武昌起义的胜利，又反过来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随着武昌城头的枪声，全国各地革命党人闻风响应，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到处燃起了反抗帝国主义走狗清朝的烈火。各省和各地区

^① 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42页。

^② 转引自冯玉祥：《我所认识之蒋介石》第161页。

纷纷树起义旗。

十月二十二日，湖南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率会党和新军起义，攻入长沙，逐走巡抚余诚格，占领湖南巡抚衙门，成立湖南军政府，焦、陈二人分任正副都督，给武汉革命党人以极大鼓舞。

同一天，陕西革命党人运动新军起义，杀死清西安将军文瑞，建立革命军政府。

十月二十三日，九江革命士兵起义。三十一日南昌新军起义，第二天光复南昌，结束了清政府在江西的统治。

十月二十九日，山西革命党人举行起义，杀死清巡抚陆钟琦，成立山西军政府，使清政府大为震惊。

十月三十日，云南同盟会员起义，宣布云南独立。

十一月三日，中部同盟会在上海发动起义，成立军政府。

十一月四日，贵州光复。

十一月五日，安徽、江苏光复。

十一月七日，广西宣布独立。

十一月九日，广东宣布独立。

接着，福建、四川、山东等省都宣布脱离清朝统治。从十月十日武昌起义开始，到十一月下旬，全国大多数地区都响应武昌起义而举起义旗。各地革命军捕杀清朝官吏，惩办土豪劣绅，打毁外国教堂，痛殴帝国主义传教士，形成一股不可阻挡的革命潮流。即使在那些没有宣布独立的省区，也无不发生规模大小不等的民变和会党起义。河南信阳附近的铁路工人和农民组成的一支数百人武装，以拆铁轨、扳反舵的方法袭击军车，使满载着清军的列车倾覆。他们还爆炸弹药库，烧毁粮仓，给反动统治者以沉重打击。嵩山、洛阳一带地方，大批农民军占据重要城镇，声势浩大。甘肃西宁府（今青海西宁）黄会、哥老会等农民千

余人举行反清起义。在东北地区，奉天庄河、复州（今辽宁省复县）联庄会首领顾人宜在顾家岭率众起义，建立中华民国军政分府；辽阳、辽中、凤凰城（今辽宁凤城）等地的民军在革命党人领导下也竖起民主共和的大旗。在内蒙古地区，蒙汉等各族人民在革命党人的带领下，曾积极响应起义。归化（今呼和浩特）城的巡防营，陶林厅（今察哈尔右翼中旗）的巡警和会党，丰镇的农民军，以及包头的巡防队都举行了暴动。远在西北的新疆伊犁和西南边疆等少数民族地区也都发生起义。连临近京畿的直隶雄县的农民也冲破反动统治，竖起“北洋革命军”的大旗，发动起义。一些革命党人发动驻扎滦州、保定一带的新军响应革命，准备进攻京畿。另一些革命党人则联合北方的各革命团体在天津组织北方革命协会，准备直接向清王朝冲击。各省区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和席卷全国的群众自发斗争，汇合成波澜壮阔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洪流，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三次革命高潮。腐朽反动的清王朝，在这个迅猛的革命洪流的冲击下，终于很快地垮了下来。

第二节 建立政权的斗争和南京临时政府

一、袁世凯东山再起

当武昌起义的强劲东风吹遍全国的时候，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朝乱作一团。清政府在十月十日还传令嘉奖瑞澂“弭乱”有功，十一日就意外地收到了瑞澂拍来的武昌为革命党占领的电报，真似晴天霹雳，使之惊恐万分。这时，清王朝的京畿部队三

万多人集中到了永平（今卢龙）进行秋操，剩下的也正在奔往永平的路上。于是清政府一面命令瑞澂、张彪革职留任，戴罪立功，拚死夺回武昌；一面



清朝官吏惊慌而逃

下令停止秋操，把永平和驻扎保定的陆军拼凑两镇，由陆军大臣荫昌率领冯国璋、段祺瑞两镇北洋军南下进攻革命军。

帝国主义听到武昌城头的枪声更为惊骇。一位美国银行团驻华代表的老婆在信中这样供认：“全北京现在都因汉口的革命而处于人心惶惶的状态。……此间的外交家们吓得要死”，到处传说“革命要蔓延开了，另一次义和团要闹起来了，清朝要被推翻了。昨天伦敦《泰晤士报》的著名记者莫里循在东交民巷骑着马跑来跑去，说是清朝的末日已经临头了。总的来说，目前人人都战战兢兢”。^①由于武昌起义的迅雷不及掩耳，帝国主义狡猾地打出“中立”的旗号，妄图避开革命炮火的直接冲击，伺机进行破坏。十月十日晚，瑞澂逃到长江中一艘清朝兵船上，得到英国炮舰的保护。十月十一日，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打电报给英国外交部，说“武昌全部革命，焚毁官署”，“本大臣现请英水师统帅竭力相助”。^②十月十三日，美国政府立即训令其驻中国、法国、英国、俄国、日本、德国的公使，指使其设法纠合反动势力，干涉中国革命。帝国主义的军舰纷纷闯入长江中游，到十月十六日，

^① 《司戴德传》第412页。

^② 《英使朱尔典致英外部葛垒电》，《辛亥革命》第8册，第263—264页。

武汉江面上的外国军舰就多达十三艘，二十日又增至十六艘，炮口直指资产阶级革命派占据的武汉三镇，妄图将武昌起义的烈火扑灭下去。这有力地证明了帝国主义“中立”是假，破坏革命是真。

帝国主义在准备直接武装干涉的同时，还积极寻求所谓“强有力”的走狗去绞杀革命。他们凭着自己的反革命经验，感到在人民革命怒涛的冲击下，“清朝面临的前途，实属暗淡”。他们认为“南方事变清楚地表明了清政府的……极端无能、软弱和不得民心”。^①为了维持中国半殖民地的统治秩序，必须选择新的走狗。他们经过精心选择，看中了一九〇八年被清政府罢官回河南彰德的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为了使袁世凯出山，武昌起义的第二天，帝国主义就大造舆论，叫嚷什么“非袁莫属”、“非袁则亡”，如果清朝政府获得象袁世凯那样“强有力的人的襄助，叛乱自得平息”。美帝国主义更为积极，专门派代表“入宫觐见”，要清政府“起用袁世凯”，并且厉声告知清政府“不是任他（指袁世凯）作一个寻常的高级官吏，而是作为朝廷的顾问兼皇权执行者”。^②

对于袁世凯，清王朝中的实权派载沣一伙是颇有戒心的。三年前，载沣为了集权皇族，罢斥了他，如今再起用，从心眼里不舒服。但他面对革命烈火和洋主子的胁迫，不得不一面派人到河南找袁世凯接头，一面在十月十四日给袁世凯以湖广总督的重任，兼办“剿匪”事宜。

但是，袁世凯对清政府的这个委任并不感兴趣。因为他嫌职权太小。袁世凯虽然在老家“养病”，但北洋六镇新军仍然在

① 《红档杂志中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335页。

② 贝洛夫：《1911—1913年的中国革命》第60页。

他的心腹爪牙冯国璋、王士珍、段祺瑞的控制之下，部队每一种动向，他都了如指掌。别看他经常站在洹水边上垂杆钓鱼，可是朝廷中的任何一件事都无法瞒过他。他凭着自己的反动政治经验，断定清政府已经衰弱到非求他出山不能收拾危局的地步。因此，他一面以“足疾未愈”为借口拒绝出山，一面指使南下的冯国璋要“慢慢走，等等看”，让革命党把事闹大，迫使清政府交出全部权力。他暗地里指使爪牙透信给清政府，必须交出水陆各军的指挥全权，他方肯出山。他还派心腹去美国驻华使馆密谋策划，企图依靠美国促使清政府交出实权。十月十五日美国一家报纸专门发表了一篇《时代宠儿袁世凯》的社论，赤裸裸地表示他们支持袁世凯上台，并指出清政府给袁世凯权力太小，使袁不能回京任职。社论严厉警告清政府，任何低于内阁的位置，都和袁世凯的才干不相称，如果不让袁回京主持政事，就要失去各国的信任。清政府中的袁世凯部下、故旧也纷纷要求清政府起用袁世凯，军机大臣那桐甚至提出辞职，举袁世凯以代。在帝国主义和国内亲袁派的威迫下，载沣只得于十月二十日派徐世昌到河南找袁世凯劝驾。袁世凯有了帝国主义和部下、故旧的撑腰，更加不可一世。徐世昌从河南带回了袁世凯出山的六项条件：（1）明年即开国会；（2）组织责任内阁；（3）宽容参与此次事件诸人；（4）解除党禁；（5）须委以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之全权；（6）须与以十分充足之军费。袁世凯明确表示，六条缺一不可，否则决不出山。这六项的要害是第二、五项，至于召开国会、解除党禁、宽容革命党人云云，只不过是向南方革命军灌迷魂汤，诱使那些妥协分子向袁世凯投降。清政府看到这六项条件后，皇族亲贵大臣坚决反对，和袁世凯形成僵局。

可是，伴随着武昌起义的枪声，各省响应者风起云集。荫昌

在信阳和孝感两城间奔来跑去，指挥不了北洋军队，连吃败仗，急切希望袁世凯出山，自己好推卸打败仗的责任。载沣一伙惶惶无主，不得不向袁世凯让步，召回荫昌，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授予他指挥水陆各军的全权，并以袁的心腹冯国璋为第一军军统，段祺瑞为第二军军统。

然而，袁世凯见清政府没有全部答应他的要求，仍旧拒绝出来。

十月二十九日，山西省宣布独立，革命的烽火已经烧到了清政府脚下，载沣和袁世凯都为之震惊。同一天，第六镇统制、革命党人吴禄贞和驻滦州的新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蓝天蔚密谋响应武昌起义，并先以张、蓝两人的名义通电清廷，提出十二项主张，要清政府在本年内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制订宪法、特赦国犯、削除皇族特权等。电文极其强硬，表示如果清廷不答应，就要率军进攻北京。他们还扣压了沙俄从西伯利亚运往湖北援助清军扑灭革命的一列车军火，并准备调兵进逼通州、南苑，吓得载沣丧魂落魄，准备逃命承德，其他皇族亲贵也不再敢反对让权与袁世凯了，他们心里明白，与其亡于革命党，还不如屈从于袁世凯。十月三十日，载沣下罪己诏，解散皇族内阁，宣布解除党禁，命资政院起草宪法，第二天即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全权筹组新内阁。载沣一伙将权力全部送给了袁世凯。

其实，武昌起义迅速在各地引起的连锁反应，早就使袁世凯坐不住了。当时他心目中有一个如意算盘，这就是利用南方革命军的力量，来迫使清政府交出全部权力；凭借北方清朝统治的力量去压迫南方革命军投降，以一箭双雕来建立起自己的专制独裁政权。如今革命烈火眼看烧到了北京，如果清朝灭亡了，他的如意算盘就破灭了。于是，就在清政府任命他为内阁总理的

当天，他就拔腿奔往湖北孝感，督促冯国璋调动军队猛攻汉口，给革命军以重大打击。十一月二日，清军攻陷了汉口，放火连烧三天三夜，三十里繁华的街道，到处是残垣断壁，“人心愤激，达于极点”。同时，为了稳住北方的阵势，袁世凯收买凶手，在石家庄刺杀了在北方活动多年的坚强革命党人吴禄贞，并将滦州新军中倾向革命的将领或撤职或调离，解除了他们手中的兵权，从而破坏了他们进攻北京的计划。经过这一番表演后，袁世凯才于十一月十三日回到北京组织新内阁。十六日，袁氏内阁成立，内阁成员除了赵秉钧、王士珍、唐绍仪这样一些袁的心腹爪牙外，还拉进立宪派头子梁启超、张謇等人以装璜门面。随后，袁世凯又把自己直接统治的拱卫军调入北京，命令冯国璋总统禁卫军，掌握了北京的一切要害地方。就这样，袁世凯采用软硬兼施的手法，掌握了清王朝的全部权力，成为全国反革命势力的总头目。

袁世凯掌握清朝实权后，就集中全力对付南方的革命军了。他用军事镇压革命派的反抗，用政治欺骗诱逼革命派就范，一打一拉，双管齐下，终于扼杀了辛亥革命。

二、新政府和旧人物

毛主席说：“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拚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①武昌起义爆发后，全国范围内的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更为尖锐复杂。

^① 转引自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

袁世凯的重新上台，使全国的反革命势力有了一个中心。那些被武昌起义的枪声吓得惶惶不可终日的大小牛鬼蛇神又重新活跃起来。他们混进革命队伍，而心却向着袁世凯。他们借着各省相继独立后筹建新政府的时机，一个个粉墨登场，展开“摘桃子”的阴谋活动，篡权复辟。因此，当时围绕政权问题，就出现了激烈的两条路线斗争。一条是以立宪派、旧官僚和革命派的叛徒为代表的反革命篡权路线；一条是以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代表的坚持资产阶级掌权的革命路线。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是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还是建立一个挂着“共和”招牌的地主买办阶级专政的国家。这实际上是武昌起义前革命和保皇两条路线斗争在新形势下的继续。

立宪派原来依附于清朝统治，他们敌视革命，反对共和，主张实行君主立宪。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们面对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预感到清王朝的命运已经保不住了，为了防止革命的深入，保全本阶级的利益和维护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秩序，决定变换反革命策略，趁天下大乱之际，混水摸鱼。其重要代表人物有两湖地区的汤化龙（湖北）、谭延闿（湖南），江浙地区的张謇（江苏）、汤寿潜（浙江）、李平书（上海）等。他们摇身一变，把自己打扮成为共和制度的拥护者，宣称自己是主张“反满兴汉”的，赞成推翻清政府。他们削尖脑袋钻进革命阵营，企图把领导权抢到自己手里。

旧官僚是在革命高潮中才在自己的脸上涂上一层赞成革命的油彩，披上一张拥护共和的画皮。他们这一类人，对于清王朝本来就是忠心不二的。当清王朝逐步衰亡时，他们“流涕陈言，至于痛哭”。^①但曾几何时，清王朝“落花流水春去也”，他们为了

^① 程德全：《程雪楼先生书牍》卷上，第9页。

保住自己的生命财产，表面上承认革命，暗地里却想方设法地改变政权的性质。正象鲁迅所指出的那样：“清的末年，社会上大抵恶革命党如蛇蝎，南京政府一成立，漂亮的士绅和商人看见似乎革命党的人，便亲密的说道：‘我们本来都是草字头，一路的啊’。”^①

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武昌起义后，开始急剧分化。其中一部分意志不坚定的分子，看到革命胜利了，认为该我捞一把，弄个官做一做了。在这些人的脑子里，什么三民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全飞到九霄云外去了，只要有官做，谁当权都行。他们很快被立宪派、旧官僚拉了过去，做了反革命的俘虏，充当地主、买办、官僚的应声虫，起着极其恶劣的破坏作用。那些比较坚定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对资产阶级共和国充满信心，对立宪派、旧官僚的攘夺政权不满，敢于斗争，但他们在政权问题上犯有很大的幼稚病，对这个革命的根本问题认识不清，不敢坚定地为本阶级争权，有的人甚至感到只有把当过清朝大官的头面人物请上台才行。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在这里最集中地暴露出来。因此，在建立政权的过程中，这部分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与立宪派、旧官僚、革命派的叛徒有过斗争，反击过反动派的篡权活动，但并没有取得很好的成效，而最后不得不归于失败。

武昌军政府由革命逐步走向妥协甚至反动的演变，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十月十一日上午，武昌全城光复后，革命党人立即在谘议局开会筹组革命政府。立宪派的头面人物汤化龙、张国溶、刘赓藻也乘机钻了进来。汤化龙在会上宣称：“革命事业，兄弟素表赞

^① 鲁迅：《补白》，《鲁迅全集》第3卷，第107页。

成。但是此时武昌发难，各省均不晓得，须先通电各省，请一致响应，以助成伟举。”^①立宪派极力主张用黎元洪的名义通电全国。刘赓藻在会上大声嚷道：“黎元洪现在城中，我已得到消息，知道他的隐藏地方，如果大家一定要找他，我愿介绍前往。”^②

黎元洪是湖北黄陂人，当过北洋海军军官，武昌起义前是第二十一混成协的协统。他对革命恨之入骨，十月十日还亲手杀死两个革命党人。用这样一个人的名义向全国发通电，这关系到由谁任都督、由谁掌权的大是大非问题。因此遭到一些革命党人的反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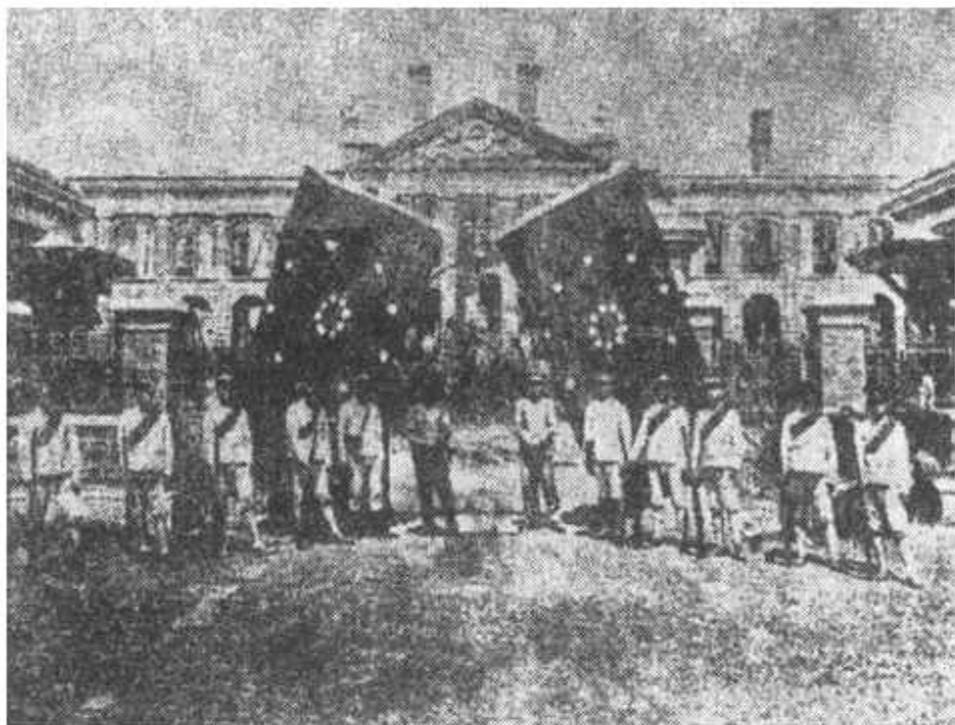
革命党人李翊东驳斥刘赓藻道：“不然，唯其他做了满清的协统，就不能当我们革命军的都督。”张振武也尖锐地指出，我们革命必须由真正革命的人作领导，黎元洪昨天还杀死我们两个人，“他明明反对革命，还能够领导我们革命吗？”^③许多革命党人同意这种看法。但是，吴兆麟等人这时却站出来大肆宣扬黎元洪“忠厚爱兵”、“德高望重”。吴原来是黎元洪的部下，武昌起义时任新军排长，指挥革命党人作过战，有一点名气，所以他的话博得了一些人的喝采。立宪派也乘机鼓噪而起，于是，大家决定由吴兆麟去请黎元洪来开会。

吴兆麟很快从黄土坡一家床底下把黎元洪弄来了。会上有人提出要黎元洪任都督。黎一方面对革命十分仇恨，一方面又怕清军将来把革命扑灭后自己要掉脑袋，所以坚决不接受。革命党人张振武见黎这种顽固态度，坚定地指出：“他既这样的坚决不就，为什么定要勉强他就。好在通电尚未发出，不如将他杀

① 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74页。

② 《辛亥首义回忆录》第2辑，第160页。

③ 蔡寄鸥：《鄂州血史》第89—90页。



武昌军政府

掉，以振军威。”^①吴兆麟等反对他的主张，最后达成了—个妥协方案，先把黎监视起来，仍用他的名义布告全国；组成一个谋略处，处理有关军事等方面的重要问题。十一日晚上，由革命党人掌握的谋略处即开始办公，并作出了—下几点决定：（1）军政府设在武昌谘议局；（2）废除宣统年号，改为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3）都督用黎元洪名义布告地方及通电全国；（4）革命军旗为十八星旗。接着，武昌军政府宣布了废除—切苛捐杂税的法令，并颁布了《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武昌呈现出—片热气腾腾的革命景象。

但是，斗争仍在继续。立宪派、旧官僚对于军政府中黎元洪挂空名、谋略处掌实权的局面非常不满，他们窥测方向，伺机夺

^① 蔡寄鸥：《鄂州血史》第91页。

权。十月十三日，武汉三镇解放了，革命风潮席卷全国，胜利在望。黎元洪——这个三天来不言不语、不怒不笑的泥“菩萨”，看到有机可乘，开始装出一副“革命”的姿态。他主动找看管他的士兵聊天，还找剃头匠剪掉了辫子，对革命党人表示异常的“恭顺”。十月十七日，帝国主义驻汉口领事团虚伪地承认军政府为交战团体，这更使黎元洪活跃起来了。立宪派分子这时也积极为黎出谋划策，胡瑞霖借口作战胜利和“外交成功”，提出了在十七日这天“祭告天地”，由黎亲读祭文和誓词，企图用这种方法使黎独揽军政大权。幼稚的革命党人并没看出这个阴谋，从上海来的同盟会中部总会负责人之一谭人凤也同意了。结果黎元洪大摇大摆登上阅马场的祭台，宣读胡瑞霖拟好的鼓吹孔老二天命论的文告，谭人凤授旗授剑，黎元洪成了一时哄动全国的“革命元勋”。

在黎元洪“祭告天地”的同时，汤化龙、胡瑞霖等在私下拟了一个军政府组织条例。根据这个条例，都督下设民政、军政两大部，都督统辖两部并兼任战时总司令；民政部设政事部长，下设外交、内务、财政、司法、交通、编制、文书等七局。他们用这个条例取消原来的谋略处（这时已改为参谋部），而新成立的各部人选共十八人，其中有十五位是旧官僚、立宪党人，几乎全是清一色的旧人物。

对于这种明目张胆地反夺权，一些革命党人曾给予了坚决的反击。在他们的抗争下，十月二十五日，又重新召开都督府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才推翻了原来的组织条例，调整了原来的各部人选。被汤化龙包揽大权的政事部取消了，所属的七个局也全改为部，直接统属于都督。一些革命党人担任了外交部长、理财部长、内务部长等职，而汤化龙只弄了个编制部长的闲散差

使。立宪派、旧官僚的篡权活动受到了一定的打击。

但是，汤化龙一伙绝不会善罢甘休。十一月三日举行的“黄兴拜将”，就是他们向革命派继续反扑的又一阴谋。

正当汉口军民和清军在刘家庙一带激战的时候，黄兴等革命党人于十月二十八日来到了武汉。黄兴的到来，给革命派以巨大鼓舞，许多革命党人都要推黄兴为两湖大都督。这可吓坏了立宪派和旧官僚，他们巧言诡辩，极力反对。汤化龙叫嚷什么：“大敌当前，目前首要任务是在驱逐清兵出境，促成各省响应，至于黄兴个人的委任和公推的问题，此时不应该过于争执，以免影响军事前途，亟应团结军心，黄兴由黎元洪委任，就是团结一致的最好机会，不可更张，以生内乱。”^①吴兆麟也胡说什么如果黄位居黎之上，黎元洪就会辞职，革命就要失败。那些天真烂漫的革命党人，包括黄兴本人，被他们这些“团结对敌”的漂亮言词所蒙蔽，被他们这些恐吓讹诈所屈服，最后除少数人坚持反对外，都同意了他们的意见。于是，十一月三日，湖北军政府在武昌阅马厂搭起拜将台，仿西汉刘邦拜韩信为大将的故事，举行盛大的拜将仪式。黎元洪以元首的姿态，将印信、聘任状、令箭捧付黄兴，并授以武汉战守总司令职。黄兴发表演说，感谢黎元洪的委任。

这次“登台拜将”完全是汤化龙、胡瑞霖等一手策划的。通过这次拜将，黎元洪取得了超乎一切的地位和权势，而真正的革命元勋黄兴，却反而成了黎手下的一位将领，要事事受他节制，没有自决权力。立宪派的这一招，进一步巩固了黎元洪的反动统治，湖北军政府完全变成了他们的一统天下。最后，黄兴被逼

^① 《辛亥首义回忆录》第2辑，第194页。

走，蒋翊武被撤职，许多革命党遭杀害。刀把子落在了反动派手里。

武昌军政府由革命到反动的演变，宣告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的失败。革命派用枪杆子夺来的政权，却被反动派用“和平演变”的方式，篡夺了过去。这是武昌起义后革命派丧失政权的第一类典型。

第二类情形是起义取得了成功，革命党人掌握了政权，但由于缺乏警惕，上当受骗，被反革命势力采用流血政变的手法篡夺了过去。湖南、贵州等地都属于这种类型，而以湖南最为典型。

湖南是最早响应武昌起义的，十月二十二日焦达峰、陈作新率革命党人在长沙起义，击杀清军头目黄忠浩，获得了胜利，焦、陈二人分任湖南军政府的正副都督。焦达峰是一位二十五岁的血气方刚的青年，他任都督后，“用人行政，一秉大公；博采民意，广纳人才，且力除苛税”，“日废秕政以数十计，接见民众无间晨昏”^①，受到了下层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引起了地主、买办、官绅和立宪派的痛恨，远在湖北的黎元洪闻讯后默默“不语”，心中不满。湖南立宪派头子谭延闿更是恨之入骨，暗地里和当地封建顽固势力相勾结，密谋发动反革命政变。谭延闿一伙收买黄忠浩部下的旧军官，鼓动他们为黄忠浩报仇，甚至支持黄忠浩的死党梅馨等人开秘密军事会议，策划谋杀焦、陈二人。与此同时，谭延闿一伙还到处煽风点火、造谣中伤，咒骂焦达峰是“匪”，根本不配当都督；攻击他克扣军饷，贪污腐化；诬蔑他招贫苦农民入伍是“黜退旧伍而代以会匪”，拚命打击焦达峰的威信，离间他和新军广大士兵的关系。在军政府里，谭延闿千方百计窃夺

^① 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第2编，第302页。

权力，排挤限制焦达峰。在军政府成立的那天，立宪派分子就吵吵嚷嚷，援引武昌为例，要求给谘议局议长谭延闿与焦达峰一样的权力，声称若不使谭延闿和汤化龙一样任政务部长，“其事必僨”。结果谭延闿攫取了军政部长的要职，控制了总务、财政、交通、民政、教育、盐政、警政各科，享有和焦达峰对等的权力。然而谭仍不满足，在他的操纵下又成立了一个都督府参议院，规定都督的调兵、用人、发布命令、实施行政事务等等，甚至发一电报，都必须通过都督府参议院同意，使焦达峰事事要受立宪派牵制。

对于谭延闿一伙这样明目张胆的篡权活动，焦达峰等革命党人异常愤怒，立即给予反击。十月三十一日，焦达峰召开改革政治机构会议，提出将军政部和参议院取消，集中一切权力于都督府，以利于统一行动。会上，革命党人纷纷表示赞同，立宪派受到重大打击，谭延闿无可奈何，当场辞退了军政部部长和参议院院长等职。

谭延闿一伙受到打击后，怀恨在心。他们乘大批新军北上援助湖北革命军，长沙戒备松弛，焦、陈势力单薄之机，勾结反动军官梅馨发动了反革命政变。谭延闿指使一伙人在长沙北门外制造了“和丰公司纸币挤兑风潮”，然后让立宪派假惺惺地前往都督府请求弹压。陈作新不知是计，轻骑前往，行至半路，伏兵四起，惨遭杀害。接着，乱兵冲入都督府，焦达峰措手不及，被乱刀砍死。谭延闿踩着焦、陈二人的血尸，爬上了湖南都督的宝座。

政变发生后，反动派弹冠相庆，鸡犬升天。远在湖北的汤化龙还打电报给谭延闿祝贺：“闻公出，钦喜无量。”^①旧军官、旧官

^① 《湘事记》卷1，第17页。

僚和地痞流氓纷纷投入谭延闿门下，政变“有功”之人一个个加官晋爵，杀人凶手梅馨被提为镇统。但革命人民闻讯后，愤怒至极。长沙一带的会党群众“声言将毁都督府，四城竖红旗”。^①这使谭延闿至为惊恐。为了躲避人民的斗争锋芒，谭延闿玩弄两面派的手法，一面转嫁杀害焦、陈二人的罪责，归之为乱兵所杀；一面又令下半旗为焦、陈致哀，并厚葬焦、陈，安慰家属，鼓动立纪念铜像，甚至还亲往焦、陈灵柩前放声痛哭，企图用眼泪洗去手上的血迹。一些天真的革命党人被谭延闿的这种假象迷住了眼睛，和立宪派、旧官僚言归于好，谭延闿在湖南的反动统治得到了巩固。

第三类情形是在革命洪流的冲击下，立宪派和旧官僚摇身一变，投机革命，宣布响应武昌起义，和清政府脱离关系，即所谓“和平光复”。这实际上是换汤不换药，仅仅挂了个都督府的招牌，旧有的封建统治机构原封没动。江苏、广东、广西等省都是这类典型。

江苏宣布“独立”，是在革命逐步高涨的声势下被迫进行的。在这以前，邻近的九江和南昌都已宣告独立，而上海的军民也发动了起义，苏州的立宪派和富商豪绅为“自保免祸”，要求巡抚程德全抢先一步，宣告“独立”，以躲避革命的冲击。十一月五日，程德全宣告“独立”。为了表示“革命必须破坏”，把抚衙大堂屋上的檐瓦用竹竿挑去几片，并在抚衙门口换上一块“民国军政府江苏都督府”的招牌，巡抚改称都督，通令各衙署一律高悬“兴汉安民”的白旗。原来的老官僚江苏巡抚程德全，摇身一变，就成了江苏革命军政府的都督。这就算是完成了“独立”，进行了“光

^① 一九一二年五月六日《民权报》。

复”。在这种情况下，原来的反动统治秩序实际上完全保留下来了。江苏独立后，程德全第一个告示便是“照得私藏军火，军法应干斩决；苏省独立告成，防范尤宜严密”。^①“独立了”，“防范尤宜严密”，这无疑是不准人民革命。

但是，尽管程德全严密统治，革命党人还是进行了反击。程德全上台不久，苏州的同盟会员就联合一批工商界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组织了“洗程会”，坚持和程德全为代表的反动势力进行斗争。他们先利用江苏筹饷局，限制打击程德全的爪牙；接着，发动驱程运动，他们秘密开会，准备发动武装起义。不料走露风声，程德全立即调兵包围了他们，逮捕杀害。事后，程德全把“洗程会”诬为“洗城会”，说他们要血洗苏州城，借以疯狂镇压革命派。可见，程德全的“和平光复”并不“和平”，其实是对反动势力讲和平，对革命力量严加摧残。

广东的“独立”，比江苏更为滑稽。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广州后，立宪派和旧官僚一看风声不对，就各派代表齐集谘议局开会，乞求总督张鸣岐宣布独立，并举张鸣岐为都督，龙济光为副都督，赶制三千六百面新旗，准备张挂。十一月八日，召开新政府成立会，准备把刻好的都督印奉送张鸣岐，结果张早已逃走，龙济光也坚决不干，最后不得已才举革命党人胡汉民为都督，因胡不在广州，只好举蒋尊簋为临时都督，算是“独立”了。十一月九日，广州城里旗帜高挂，爆竹如雷，“五羊城中，焕然一新世界矣”。^②其实，外表虽新，骨子里仍是旧的。

广西的“独立”也很简单。广西巡抚沈秉堃见大势已去，便于十一月六日指使人在桂林街头遍贴“恭请沈都督宣布独立，广

^① 《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63页。

^② 《广东光复记》，《辛亥革命》第7册，第232页。

西前途万岁”的大标语。第二天，他就在立宪派的前呼后拥下，脱下清朝官服，就任大都督。“革命”之容易，令人吃惊。

此外，还有些省、市、地区，如山西、上海、江西、安徽等省，后期虽然革命党人掌握了政权，但情况并不更好些。他们有的在旧势力的围攻和影响下，很快地变成新的官僚、军阀了；有的本来就是革命的投机者，如山西的阎锡山，他掌权后与旧的军阀、官僚几乎没有什么差别，这种政权实际上已蜕化变质。

因此，武昌起义后，虽然全国革命形势在不断发展，到处是光复，到处有鞭炮声和庆祝活动，但多数地方政权却沿着不同的途径，相继落入反动势力的手中。鲁迅描写光复后的绍兴说：“……满眼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什么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钱店掌柜是军械司长……。这军政府也到底不长久，几个少年一嚷，王金发（浙东洪门会党首领、光复会员——编者注）带兵从杭州进来了……。他进来以后，也就被许多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所包围，大做王都督。在衙门里的人物，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子了，天气还并不冷。”^①这实际上是全国的一幅缩影，在全国各省区具有普遍性。

以上情况表明，武昌起义之后，各地区虽然都在建立新政权，都挂上了革命军政府的牌子，但掌握实权的大多是摇身一变的旧人物。如果在这些基层政权的基础上组织一个统一的革命的中央政府，那将是空中楼阁，只能昙花一现。

^① 鲁迅：《范爱农》，《鲁迅全集》第2卷，第423页。

三、创建南京临时政府

立宪派、旧官僚在攫取了各省市的大权之后，纷纷四出活动，奔忙于组织中央政府，他们共同的企求是能在中央政府中占一席位，使革命赶快收场，使其地位逐步稳固下来。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这时被各地新政权建立的锣鼓鞭炮声冲昏了头脑，醉心于“三分天下有其二”的胜利局面。他们当中有许多人为了本集团和个人在中央政府中谋取权位，不惜抛弃革命原则和立宪派、旧官僚同流合污。“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竟然成了一些革命党人的政治主张。曾经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旗帜的同盟会，这时更加松懈，急剧分化。这就使在筹组中央政府过程中出现了错综复杂、十分激烈的明争暗斗。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立宪派、旧官僚和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逐步分为两大政治集团。一是以黎元洪为头子的武昌集团，一是以上海都督陈其美、江苏都督程德全为代表的上海集团。武昌集团以首义地区自居，认为组织中央政府要以他们为中心，建都于武昌，乃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黎元洪纠合谭延闿、汤化龙、蓝天蔚、孙武、刘成禺等一帮人，办报纸，发声明，奔走于武昌、上海，活跃于湖南、湖北，妄图把最高领导权夺取到自己手里。上海集团也在频繁活动，陈其美、程德全把立宪派头子张謇、汤寿潜拉来，并和同盟会员伍廷芳、王宠惠、钮永建等一帮麇集上海的政客纠集一起，大肆宣传要南北统一，民政统一，政体统一，要建立共和时代的有力枢机——中央政府。上海集团把上海看作东南的中心，根本不把黎元洪一伙放在眼里，他们力图以自己为主体建立中央政府，控制最高领导权。

两个集团从各自的政治目的出发，在武昌和上海同时开展筹组中央政权的活动。十一月九日，武昌集团由黎元洪向独立省市发出通电，让他们拟制各部部长的名单，并速派代表到武昌开会，商讨组织中央临时政府。上海集团本来准备抢先在上海建立一个各省联合机构，但因一时推不出向各省发电的领头人，结果落在了武昌后面。十一月十一日，他们变换形式，改由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联名向上海都督陈其美发电，要求各省谘议局和都督府各派一人到上海开临时会议。十二日，江苏、浙江的都督府代表又向各省发电，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十五日，一些省份的代表到沪，召开第一次联席会议，定名为“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正式成立了组织，这又抢在了武昌集团之前。

但是，上海集团深知武昌为首义之地，武昌军政府在当时有相当的号召力，如果完全和武昌集团弄成僵局，对他们并没有什么好处。因此在第二次会议上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就是承认武昌为中央军政府，同意由湖北都督府代行中央政务，但上海交通便利，人员聚集，筹组中央政府的代表会议应在上海召开。武昌集团得知这一方案后，黎元洪一伙极力反对，说什么“既认湖北为中央军政府，则代表会亦自应在政府所在地，府会地隔数千里，办事实多迟滞，非常时期，恐失机宜”。^①并派代表前往上海与他们磋商。上海集团虽然和武昌集团争夺中央领导权，但出于急不可待地在中央政权中捞席位的心情，也想利用一下武昌集团在当时的影响，就作了暂时退让，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开会决定同意武昌方面的意见，各省除留一名代表在上海作对外联络工作外，全到武昌集合，讨论组织临时政府问题。

^① 《中华民国政府成立》，《辛亥革命》第8册，第12页。

当各省代表陆续到达武昌的时候，袁世凯正调兵猛攻汉阳，黄兴统帅的湘鄂联军节节败退，二十七日汉阳失守，武昌也处于清军的炮火之中。各省代表只好把开会地点改在汉口英租界的顺昌洋行。十一月三十日召开第一次会议。接着通过了两项决议：一项是《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第二十一条，规定中央政府由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产生；参议院由各省都督府各派参议员三人组成；总统由各省都督府代表选举；临时大总统有统治全国之权和统率海陆军之权；参议院有议决预算、检查出纳、立法、宣战、媾和、任用部长之权。另一项决议是“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大总统”。这项决议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袁世凯这时在北方大放“和谈”烟幕，宣称赞成“君主立宪”，对南方显示好感，使一些革命党人受了骗；另一方面是因为各省代表大都是立宪派、旧官僚和资产阶级政客，在他们的心目中早把袁世凯奉为领袖，希望将总统的宝座奉献给袁世凯，尽快结束革命。

但是，正当这些代表在汉口争权夺利的时候，十二月二日，苏浙联军攻下了南京。南京的光复，与汉阳的失守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上海集团颇为神气，武昌集团相对削弱。陈其美立即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一面大造舆论，说汉阳失守，武昌危在旦夕，武昌集团已失去了组织中央政府的资格；一面在十二月四日串通程德全、汤寿潜，并把原来留在上海作对外联络工作的各省代表召集起来，举行都督府代表会议，选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定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由大元帅主持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同时电告正在汉口开会的各省代表。黎元洪一伙得到电报后，非常不满，立即向各省都督发出通电，表示：第一，由于武昌实在危急，同意以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各省代表立即陆续到南京开会；第二，反对黄兴当大元帅，望上海集团“设法

声明取消，以免淆乱耳目”。^①显然，武昌集团在国都问题上作了让步，但在最高权力上却寸步不让。于是，在汉口和上海的各省代表陆续于十二月十日以后到达南京。十六日，正式召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但是，恰好在这个关键时刻，袁世凯通过立宪派和旧官僚放出了空气，说袁世凯就要“反正”，赞成共和。与会代表信以为真，就决议暂不选举临时大总统，把这一位置留给袁世凯，并承认上海集团举黄兴为大元帅的决定，还在《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上加上一条：“临时大总统未举定以前，其职权由大元帅暂任之”。

这一决定，把临时大总统拱手送给袁世凯，博得了立宪派、旧官僚的欢心。但他们对于黄兴当大元帅，并不放心。虽然黄兴在武昌起义后就在政权问题上患了严重的幼稚病，对立宪派和旧官僚妥协退让，不去争阶级的权，划不清革命和反革命的界线，可是他毕竟是仅次于孙中山的一位声势赫赫的革命派领导人，立宪派和旧官僚从心底里恨透了他。因此，黄兴当选大元帅后，立宪派和旧官僚就大肆反对。程德全的部下声称，黄兴当大元帅，我们就“将举兵攻兴”，居然用武力压制黄兴。他们还借汉阳失守，给黄兴戴上“汉阳败将”的帽子，打击黄兴的威信。在这种情况下，妥协性十足的黄兴并没有奋起斗争，反而极力要求辞职。十二月十七日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改选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

黄兴当副元帅的消息传出后，“一时党人意气以大元帅降为副元帅为奇耻大辱，有在代表会跳嚷大叫着，忽迁怒于未独立之北方各省代表，目为汉奸或袁党，甚至以手枪拟之。其实未独立

^① 蔡寄鸥：《鄂州血史》第162页。

之北方各省代表固未尝敢有所主张也”。^①但革命党人这样抗争，并没能扭转大局。黄兴甚至连副元帅也不想当，接连辞职，还给别人讲：“我们革命，不是争权位的。”^②他一味和立宪派、旧官僚讲“厚道”。这样一来，临时政府实际上还是一个空架子。

正当临时政府难产的时刻，十二月二十五日孙中山从海外归来。孙中山为革命辛苦奔波几十年，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全国人民心中享有崇高威望。所以，他的回来，使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筹组临时政府的僵局被打破了，革命党人又重新活跃起来，即使那些立宪派、旧官僚也不得不表面上拥护孙中山，赞成组织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孙中山回国后这种新气象的突然出现，使袁世凯一伙十分惊慌。唐绍仪在给袁世凯的密电中讲：“孙文来沪，挈带巨资，并偕同泰西水陆军官数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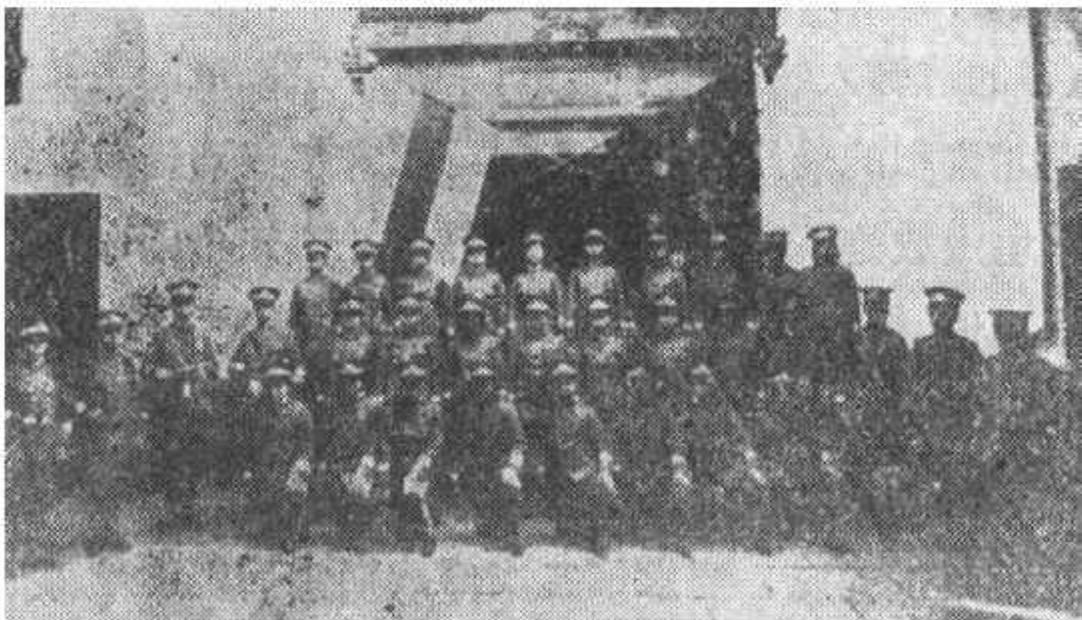
孙中山从海外归来

^① 《辛亥首义回忆录》第4辑，第79页。

^② 蔡寄鸥：《鄂州血史》第163页。

员，声势愈大。正议组织临时政府，为巩固根本之计。”^①张謇也发出悲鸣：近日“急进之徒，日日言临时总统，一若总统出现，大功已成也者，按之事实岂其然乎？”^②因此，袁世凯指使立宪派、旧官僚积极活动，暗中阻挠临时政府的成立，企图给自己保住临时大总统的席位。张謇尤其卖命，他一会儿宣传组织临时政府花钱太多，一会儿又叫嚷他绝不当财政部长，花言巧语，迷惑人心。但孙中山并没有被吓倒，坚持立即组织临时政府。

立宪派、旧官僚见一招不成，又来一招。他们利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故意在政府之前加上“临时”二字以便使孙中山只当临时过渡性的大总统，使新政权成为临时性政权；同时还决定孙中山当选后要致电袁世凯，表示一旦袁世凯赞成共和，南北达成协议，就让位与袁世凯。有了这么多的附加条件，十七省代表才于十二月二十九日举行临时大总统选举会，孙中山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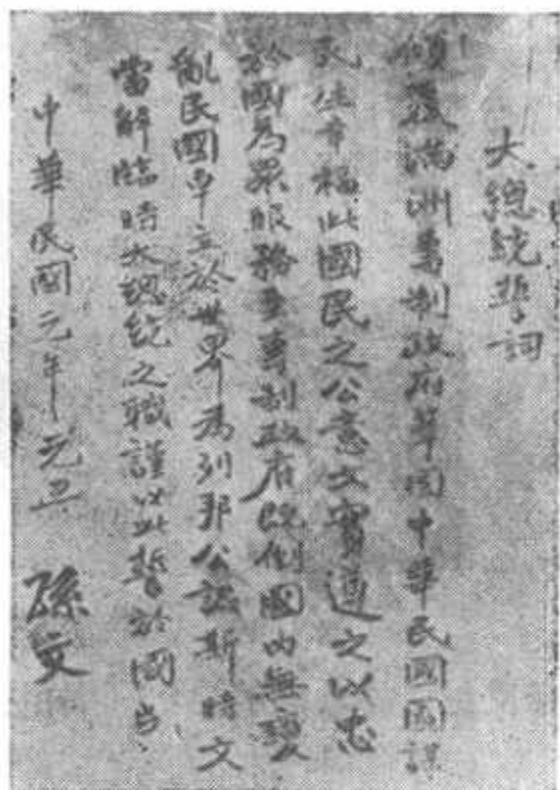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

^① 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第293页。

^② 张謇：《张季子九录》，《政闻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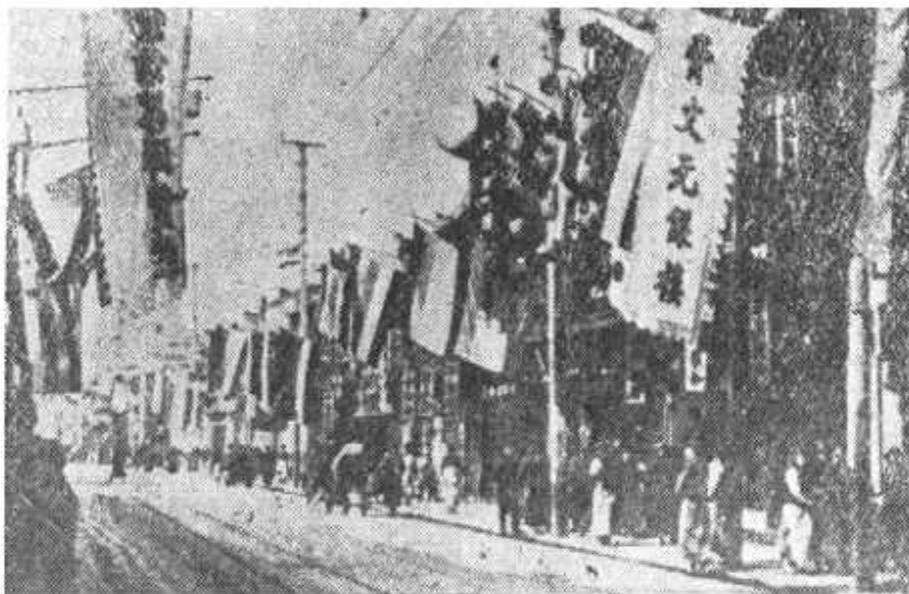
十六票当选。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布中华民国成立。一月三日，各省代表会议选黎元洪为副总统，并通过了孙中山提出的国务员名单，组成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决定采用阳历，以一九一二年为民国元年。一月二十八日，将各省代表会议改为临时参议院，由各省代表会议代表充任参议员。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南京临时政府经过曲折的斗争终于诞生了。



大总统誓词

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敲响了清朝的丧钟，宣告了两千多年来封建帝制在中国历史上的终结，它是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方面的重要标志，也是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一个胜利成果，符合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孙中山在就职宣言中宣布反对民族压迫、坚持民族团结；反对分裂割据、坚持全国统一的政策，受到各族人民的欢迎和拥护。孙中山还强调指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并明确讲明当时各省响应武昌起义的“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①这对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激发各族人民反

^① 孙中山：《大总统宣言书》，《辛亥革命》第8册，第16页。



上海各界庆祝民国成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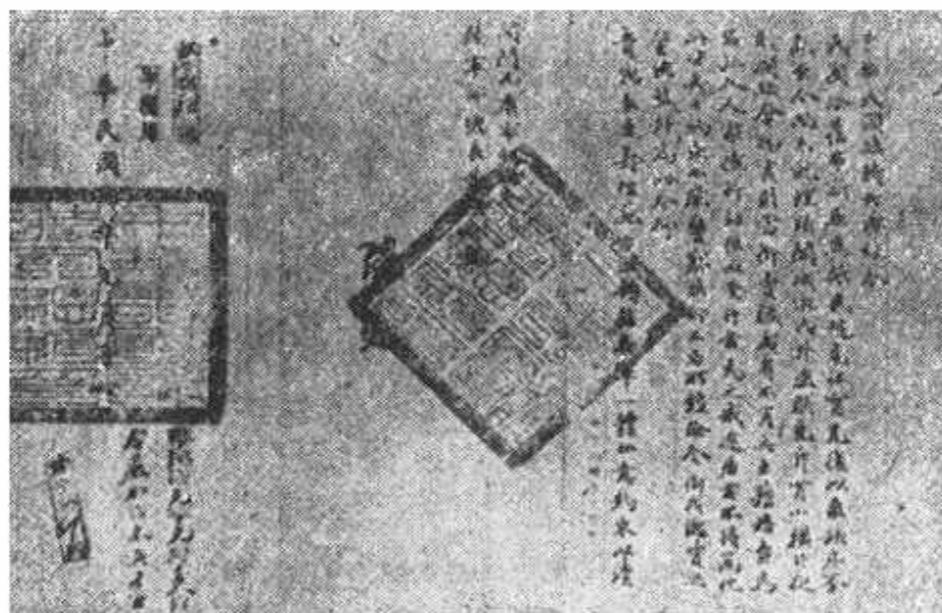
帝反封建的斗争精神和巩固祖国领土的完整具有积极意义。

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不但振奋了国内大陆上的各族人民，而且给陷于日本殖民统治苦难深渊的中国台湾人民以极大鼓舞。从一九一二年三月起的两三年内，台湾同胞为“驱逐日寇，收复台湾”，先后发动了八次规模较大的抗日斗争。其中同盟会员罗福星在一九一二年发动的大起义，有数万人参加。起义失败后，罗福星在狱中坚持斗争，并慷慨赋诗，表达他对祖国的热爱。他在《祝我民国词》中写道：“中土如斯更富强，华封共祝著边疆，民胞四海皆兄弟，国体苞桑气运昌。”^①这体现了台湾与祖国大陆休戚相关的共同命运，和台湾人民对南京临时政府的殷切期望。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颁布了一些进行民主改革，符合人民利益的政策法令。在保护人民权利方面：命令各官厅焚毁刑具，禁止刑讯、体罚；废除封建等级制度，革除“大老爷”的称呼；剪除

^① 《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册，第496页。

辫子，禁止裹足，禁止种植、吸食和贩卖鸦片，禁止赌博；通令保护华侨，禁止买卖华工；禁止买卖人口，废除奴婢卖身契约和一切主奴名分；对受歧视的“疍户”（水上居民）等所谓“贱民”，在法律上给以与其他人民一律平等的政治地位。在发展实业方面：颁布了一些奖励工商业发展的规章制度，鼓励人民兴办实业，从事农垦，鼓励华侨在国内投资，并协助维持了一些有实际困难的企业公司，取消了为安徽铜官山招纳日股合同等等。所有这些政策法规，都有利于解除封建制度的束缚和压迫，有利于民族资本的发展。



孙中山发布的命令

值得指出的是，南京临时政府在文化教育方面提出了一些进步的主张和采取了一些革命的措施，如提倡男女平等、奖励女学、废止读经等，体现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进取精神，给当时的社会变革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一九一二年一月十九日，临时政府刚成立不久，即由教育部颁发《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十四条，规定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要求各种教科书要合乎共和国宗

旨，旧教科书和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有的省教育厅还发出通告，如再有让学生读“四书”、“五经”者，一经查出，严加惩戒，学校勒令解散，教员要予以处罚。广东省教育厅查禁了当地尊孔组织“广州孔教青年社”，四川巴县教育局将该县文庙砸毁。有的革命派还坚定地指出：孔孟之道是“亡国灭种”的祸根，必须“永远不奉孔教”。在这些激进的革命分子带动下，当时一般进步的人们“视孔老之道，如虎狼蛇蝎，去之惟恐不速”。“各省毁孔庙，撤孔像，去孔位之事，日有所闻”。^①这是对尊孔派的又一次沉重的打击。它表明了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的进步性和革命性。

但是，必须看到，南京临时政府虽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占主导地位，然而它毕竟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派和立宪派、旧官僚的联合政府，封建军阀官僚（副总统黎元洪、内务总长程德全）、立宪派（实业总长张謇、交通总长汤寿潜）都占着重要职位；而作为这个政权的立法机关——临时参议院，不少成员也都是立宪派或官僚政客，这就大大削弱了这个政权的革命性和战斗性。至于地方政权——各省的都督府，当权者更多是旧官僚军阀和立宪派分子，因此，南京临时政府很难发挥其作为中央政权的职能，身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也并不能充分行使他的权力。

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和立宪派、旧官僚军阀的破坏，南京临时政府没有也不可能解决当时对内、对外两方面的根本问题。

在对内问题上，南京临时政府并没有去触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没有使广大劳动人民获得真正的民主权利，更没

^① 张知睿：《新注四书白话解说》，上海书业公所石印本，卷首。

有满足广大农民的土地要求。同盟会虽曾提出过“平均地权”的纲领，但在临时政府所宣布的施政方针中，却避开了平分土地这个广大农民急迫要求解决的根本问题。当广大农民群众为自身的利益自发地起来进行反封建斗争时，临时政府并没有加以切实的领导。相反地，各地地方政府竟然要求群众停止斗争，甚至站在群众的对立面，动辄以“行动越轨”等罪名进行镇压。对于人民组织起来的反封建武装，则诬以“假冒革命党”，予以逐杀、解散。

在对外问题上，临时政府对帝国主义存在着天真幼稚的幻想。在其对外主要文件《临时大总统宣告各友邦书》中，正式承认清政府同帝国主义各国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承认清政府所借的外债、所承诺的赔款以及所让与各个国家和个人的种种权利等等，幻想借此换取帝国主义的同情和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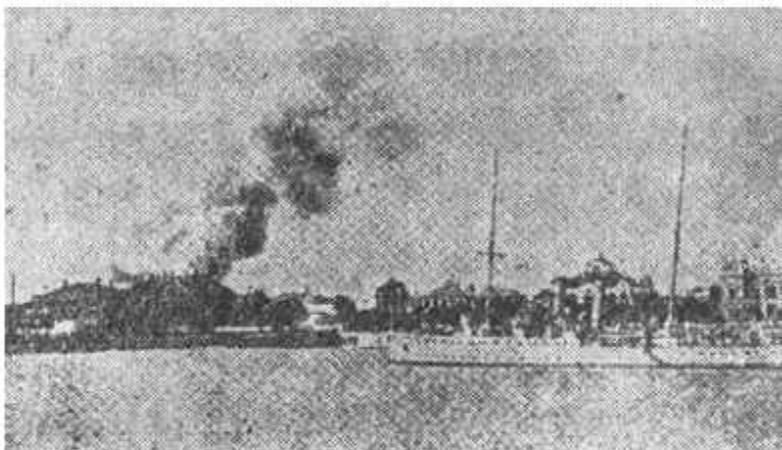
临时政府既不依靠人民群众并切实地解决他们的根本问题，又对内外反动势力采取妥协和退让，这就必然导致它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猖狂进攻面前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以至最后夭折。

第三节 袁世凯窃国

一、和谈阴谋

在历史上，一切反动派总是交替使用镇压与和谈两手来绞杀革命。袁世凯为了扑灭革命，篡夺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同样使用了军事镇压与和平谈判的反革命两手。

他早在出山之前，就一面指使冯国璋对革命派增加军事压力，一面利用其爪牙刘承恩和黎元洪同乡的关系，令刘给黎写信，进行和谈的试探。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一日，袁世凯奔往湖北孝感后，再一次令清军猛攻汉口，并第二次命刘承恩写信给黎元



清军火烧汉口

洪，要求和平谈判，结果被武昌军政府拒绝。十一月二日，清军攻陷了汉口，袁世凯认为逼武昌军政府进入圈套的时机已到，便

第三次命刘承恩写信给黎元洪，要求立即进行和谈。黎元洪接信后，召集军政府会议，讨论如何回答，当场遭到许多革命党人的反对，他们义正词严地指出：“袁世凯是什么东西，他打了个胜仗，就劝我们投降吗？”^①《民立报》也在十一月二日发表了一篇《议和驳谬》的社论，一针见血地指出：“共和与专制之战争”，“其势不两立也”，“西文各报近日宣传议和之事满纸皆是”，这是“摇惑人心”，如果听他们的话，就要“误大事”。^②在革命党人的坚决抗争下，黎元洪不敢答应袁世凯的要求。但袁世凯并不死心，十一月十一日又特派刘承恩、蔡廷干为代表，带上自己的亲笔信，由英国驻汉口领事从中介绍，前往武昌军政府，要求开始议和谈判。这一次由于有了“洋人”从中作媒，革命党人不敢公开违抗帝国主义的“建议”，军政府就立即召开会议，接待了这两位使

^① 蔡寄鸥：《鄂州血史》第130页。

^② 《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54—55页。

者。刘、蔡提出：只要革命党承认君主立宪，即可立即停战，否则要继续进攻。这种苛刻的条件和威吓的口气，立刻遭到在场的革命党人张振武、甘绩熙等人的反对，他们抽出指挥刀，大叫“谁主和，谁吃刀！”^①同时又有“民众团体，在都督府门前作示威运动，刘、蔡失意而去。”^②接着，袁世凯又密派其长子袁克定潜赴汉阳，找当时的战时总司令黄兴，建议联合行动，但遭拒绝。黄兴怕和谈影响了军心，特发告同胞书，指出：“现袁已派心腹多人，分途驰往各省，发布传单，演说谕众。冀离间我同胞之心，涣散我已成之志。设心之诡，用计之毒，诚堪痛恨。……故此密谕同胞，……查拿前项演说之人，销毁传单。”^③这对袁世凯的和谈骗局是一个迎头痛击。这时，袁世凯急于回北京组阁，又见和谈没有希望，就施出了硬的一手，进行军事镇压。他在离开孝感前就下令清军进攻汉阳。

十一月二十七日，清军攻陷汉阳，然后在龟山架起大炮轰击武昌。十二月一日，武昌都督府中炮起火，黎元洪吓得魂不附体，急忙逃往离武昌九十里的葛店。武昌城内人心惶惶，谣言四起，军政府的首脑人物也束手无策，举棋不定。帝国主义看到这是促成南北议和的最好时机，英国公使朱尔典劝告袁世凯只管令清军在龟山放炮，不要渡江进攻武昌，并通知英国驻汉口领事戈飞出面调停，提议双方停战。武昌军政府接受了戈飞的建议，开始停战三天。三天期满后，英国领事又通知双方继续停战三天。这时袁世凯从北京拍来电报，声称要派唐绍仪等人前往武昌和黎元洪商讨大局，要求第二次停战期满后再继续停战十五天。正在汉口英租界开会筹组中央政府的各省代表，因其中许

^{①③} 蔡寄鸥：《鄂州血史》第130—131页。

^② 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第279页。

多人是立宪派和旧官僚，巴不得革命赶快收场，就同意了袁世凯的建议，并决定派伍廷芳为代表和唐绍仪开始议和谈判。

十二月九日，唐绍仪等到达汉口，准备议和。但这时武昌集团和上海集团为了争夺最高领导权，矛盾重重。上海集团坚决反对在汉口议和，并通知袁世凯说：武昌集团根本无权谈判，和武昌集团达成的任何协议都属无效。袁世凯的本意是以黎元洪为谈判对象，因为黎毕竟是旧官僚，一谈就会通的。但此时武昌集团并没有力争要在汉口谈判，加上伍廷芳在上海，就同意了上海集团的意见，通知唐绍仪一行前往上海。

十二月十八日，唐绍仪和伍廷芳正式开始议和谈判。消息传出后，一些激进的革命党人以及下层广大官兵表示坚决反对。他们明确指出：“我们既要革命，必将昏暗的清政府和北方军阀，彻底打倒，共和方能巩固”。这次议和的出现，就是因为黎元洪一伙“竭力迎合袁的意旨，和了可以保全他的地位。”许多革命党人坚定地表示：“他们讲他们的和，我们非打不可。”^①南方许多



上海女国民军

^① 耿毅：《辛亥广西援鄂回忆录》，《辛亥革命资料》第478页。

起义的省份，纷纷组织北伐军、女子北伐队、敢死队，江浙联军在南京举行誓师大会，举徐绍楨为北伐总司令，积极准备北伐，完成革命统一大业。与此同时，各地反对议和的电报如雪片飞来。

驻淮钦军支队发出电报指出：“清廷请和，计在缓战，得以征练蒙兵，借款购械。袁贼收集旧党，准备兵火”，所以绝不能议和。

粤军第四军发出电报说：革命就要铲除专制，“除自建共和国外，更何和议可言？”“倘竟议和，死不敢从。”

粤海军司令处发出电报说：“议和停战，祸终洪水。今日之事，万众一心，惟求速战”；如果害怕流血，我们将遭惨败，“万劫不复”。

沪军政府发出通电指出：“和议难信，人心惶惶，万勿为袁所愚，而误大局”。

檀香山华侨也发出电报说：“和议若成，全国分裂，革命再起。毋亏一篑功，贻万世祸”。

锡金军政分府发出通电指出：“袁贼居心叵测，以议和为缓兵之计，万不可信。”^①

象这样反对议和的电报，全国各地都有。这说明当立宪派、旧官僚牵着革命派中那些妥协分子的鼻子向袁世凯投降的时候，许多革命党人仍然坚持革命。他们对“议和”的看法有许多是真知灼见，代表了革命派的正确路线。

但是，这些正确意见并没有被当时革命党人的实际领导者黄兴所采纳。他从汉阳败退后，慑于袁世凯的军事压力，一味地妥协退让，寄希望于袁世凯反正，对议和充满幻想，企图通过“和谈”来取得“廉价”的胜利。他经常参加立宪派、旧官僚在张謇的

^① 以上电报见《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257—260页。

密友赵凤昌的“惜阴堂”召开的秘密会议。和谈刚开始，他就致电袁世凯，保证袁“若能赞成共和，必可举为总统”，实际是要自动交出政权。叛徒汪精卫名义上是南方代表的参赞，实际上是袁世凯打入革命队伍的内奸。“南北协商，由精卫居间说合。”^①窃踞上海军政府都督的陈其美，名义上是革命党人，实际上早与立宪派沆瀣一气，只想革命早停，他好当官揽权。而作为革命派的另一重要人物宋教仁，也在南方资产阶级上层人物的影响下，趋向妥协。黄兴、宋教仁的这些言行，代表了右倾妥协派的错误路线。

帝国主义为了帮助袁世凯扑灭革命，也向革命派施加压力。十二月二十日，即谈判开始的第三天，英、俄、美、德、法、日驻沪领事奉各国公使的命令向谈判代表提出意见书，要求“尽速成立和解，停止现行冲突”，为袁世凯张目。同时，帝国主义还对革命军进行军事威胁，到十二月下旬，英、美、法、日、俄、意等国驻华侵略军多达七千余人，分别在京、津、塘沽、山海关、秦皇岛等战略要地虚张声势，进行恫吓。日本更以“保侨”为名，由山海关调兵向京津推进，对革命军施加压力。帝国主义除在政治、军事方面对革命力量进行压迫外，还从财政上卡革命派的脖子。武昌起义爆发后，掌握海关大权的洋税务司就全部截留了南方革命地区的海关税。总税务司安格联遵照英国公使的指示，令把已光复各口岸海关税务司夺取的全部税款存入汇丰银行，以“确保关税不致为革命党用作军费”。安格联凶相毕露地叫嚷：“让税款跑到革命党的库里去是不行的！”^②可是，他们却积极地为清政府和袁世凯提供贷款。

^① 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第282页。

^② 《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第13篇，第8页。

资产阶级立宪派在配合实施袁世凯和谈阴谋中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唐绍仪一到上海，就找张謇密谈，请他出谋划策。张謇明确表示他们这批人对拥袁做大总统不成问题，而关键在于和“同盟会要人之谈判”。“我只能代表苏、浙两省人民贡献意见，而不能保证同盟会之必能听从。此事全仗你的手腕及能力如何。”^①张謇还和汤寿潜、赵凤昌串联在一起，朝夕“会商组织政府”问题^②，企图压革命派就范，左右南北和谈。革命派与反革命派妥协的南北议和中，张謇实际上处于幕后操纵者的地位，形式上的会议在英租界市政厅举行，实际上幕后密谋和起草电文一直在张謇党羽赵凤昌的“惜阴堂”进行。张謇一伙秉承袁世凯的反革命意旨，挟北方势力压制南方；借南方势力胁制北方，两面开弓，为袁世凯夺取政权效犬马之劳。

由于帝国主义的步步进逼，立宪派和旧官僚的推波助澜和革命派的妥协退让，使袁世凯的和谈阴谋终于得售。经过唐绍仪和伍廷芳的第一次会谈，达成了湖北、陕西、山西、安徽、江苏和奉天的停战协定。但事实上停战的只是革命军，袁世凯却借停战之机大举进攻。十二月二十日，袁世凯策动清军攻陷了太原，山西革命军败退晋北忻县。陕西革命军也受到清军的夹攻。袁世凯的爪牙倪嗣冲又从河南攻入安徽西部的颍州。但是，袁世凯在和谈烟幕下向革命军进攻的炮声，并没有使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一些人猛醒，他们仍然在谈判桌上作“南北统一”的美梦。十二月二十日，伍廷芳和唐绍仪又举行第二次会谈，讨论国体问题。伍廷芳虽然坚持采用共和制，但作出了重大让步，保证只要袁世凯和革命军一起推倒清朝，就把临时大总统的位置送给袁

^① 刘厚生：《张謇传记》第194页。

^② 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第167页。

世凯。唐绍仪既无力强迫革命派承认君主立宪，也无权承认革命派的共和。于是，来了个滑头的办法，既承认共和是人心所向，又说共和与君主立宪只是形式问题。经过一系列的讨价还价，终于达成了一个调和方案，就是召开国民大会，就君主和民主问题付之公决。清政府得到消息后，也开了个御前会议，批准了这个方案。袁世凯对这个谈判的初步成果，非常满意，再加上南京各省代表会议已作出不选举临时大总统的决定，虚位以待袁世凯，这就使他眉飞色舞，准备爬上临时大总统的宝座了。

二、诱骗和逼宫

当袁世凯和谈阴谋得售的时候，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袖孙中山从海外归来，这对袁世凯妄图窃取总统宝座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孙中山一到上海，就坚定地表示：“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也。”^①《民立报》也发表题为《和乎战乎》的社论，明确指出：“武昌师起以来，以数万人之流血而得复东南半壁，然而大敌尚在，壮志未酬，我当局乃过重人道，欲以口舌之力，结此大革命潮流，是已我之过矣。”“议和也，停战也，胡为多是一举哉？”社论在结尾满怀激情地希望不久将在“北风凛烈，军旗飞扬”中欢送北伐军讨袁。^②一些激进的革命党人也支持孙中山，反对和谈。孙中山一面积极筹组中央政府，一面组织大军北伐。一九一二年元旦，孙中山就临时大总统职，南京临时政府宣告成立。一月十一日，孙中山组成六路北伐大军，湘鄂为第一军，宁皖为第二军，淮扬为第三军，烟台为第四军，关外为第五军，山陕为第

^① 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85页。

^② 《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234页。

六军。准备取道河南、山东、直隶，夺取北京。形势急转直下，使袁世凯目瞪口呆。

老奸巨猾的袁世凯于是又使出了硬的一手，压孙中山妥协。他立即拍电斥责唐绍仪，声称南北和谈必须以君主立宪为前提，而且南北议和没达成协议，“南人先组政府，公举大总统，有悖协约本旨”，并令唐绍仪辞职，造成议和谈判的决裂局面。同时打电报质问孙中山为什么先组临时政府。接着又拿出武力相威胁，指使北洋军将领段祺瑞、姜桂题、倪嗣冲等四十二人，在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当天，发出通电，叫嚷必须坚持君主立宪，如果少数人决定采用共和政体，他们就要誓死抵抗。但是袁世凯在暗地里仍然指使唐绍仪、杨度等，通过汪精卫与革命方面秘密协商。和谈表面上破裂，而背后却一直在秘密地进行。与此同时，袁世凯又求助其后台帝国主义出面干涉。帝国主义纷纷露出凶相，对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施加压力。军事上，英、美、德、日各国军舰驶进长江，耀武扬威；俄国军队在我东北北部进行威胁；日本军队在我国东北南部、内蒙东部蠢蠢欲动。外交上，他们以袁世凯出来“统一”南北为承认中华民国的条件，不承认南京临时政府是中华民国的中央政权。舆论上，帝国主义报纸颠倒黑白，对革命派横加指责、诬蔑和攻击，叫嚣什么“和谈破裂，伍（指南方代表伍廷芳）与其党徒，实尸其咎”。财政上，帝国主义加紧对南京政府的经济封锁，海关税收分文不给，致使南京临时政府财政军费十分困难。

混进革命政权的立宪派和旧官僚，也乘机配合帝国主义和袁世凯向革命派进攻。他们对南京临时政府表示冷淡，甚至采取对抗态度。他们的大多数总长都不到南京执行职务，冷眼旁观，有的甚至公开充当袁世凯的帮凶。窃据南京临时政府实业

总长的张謇，一方面向袁世凯发出《劝告袁内阁速决大计》的密电，说：“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方，一切通过。……愿公奋其英略，旦夕之间戡定大局，……为公身名俱泰，无穷之利。”并通令勉励北洋军人“作华盛顿（指袁世凯）之助”。^①另一方面利用南京临时政府面临的严重财政困难，进行要挟，胡说什么“财政一端，关系重要。列强之能承认，全视此为关键。”他提出要孙中山“担任募集外债一万万两或至少五千万两以上”^②，借以压迫革命派。接着，他又以军事统一为名，公然要求解散革命党组织。他竟猖狂地对黄兴说：“总之军事非亟统一不可，而统一最要之前提”，“销去党名为第一，此须公与中山先生早计之，由孙先生与公正式公布”。^③

在内外反动势力的夹攻下，革命派内部的分化日益加剧，对反动势力妥协的倾向普遍增长，黄兴、宋教仁等极力主张对袁世凯退让，一些同盟会的右翼分子也和立宪派、旧官僚一鼻孔出气，散布各种流言蜚语，攻击孙中山“理想太高”，“舍不得丢掉大总统的位置”。他们都希望迅速结束革命，以便在这个新的政府里捞到一官半职。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和一些激进的革命党人发动的北伐进展缓慢，各地的北伐军队伍日趋解体。孙中山被迫不得不对袁世凯妥协退让。一月十五日，孙中山打电报给袁世凯，表示“文不忍南北战争，生灵涂炭。故于议和之举，并不反对。”^④接着，幕后进行议和谈判的南北双方又达成了协议：只要清帝退位，孙中山就解去临时大总统职，公举袁世凯为大总统，并拟定了一个清帝退位优待条件。

①② 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第150—151、170页。

③ 张謇：《与黄克强书》，《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第172页。

④ 蔡寄鸥：《鄂州血史》第178页。

袁世凯得到南方这一保证，算是吃下了一颗定心丸，于是转过头来，开始逼宫。在这之前袁世凯曾指使段祺瑞等通电反对共和，并借口与革命军作战从清廷弄去了八万两黄金，现在突然一反过去的保证，又以“拥护共和”的姿态出现，要清帝退位，并秘密策动奕劻向清廷提出。一班皇族青年亲贵如良弼、载涛等竭力反对，并筹组“宗社党”，要和南方革命军作战，同时主张除掉袁世凯这个不忠于清室的“奸雄”。鉴于这种状况，袁世凯觉得这时该用革命军来压清廷了，他到处散布革命党人无孔不入，遍布京师。一月十六日袁世凯入朝经过东华门时，恰好遭到自称革命党人的炸弹的袭击，袁乘机称病不出。清廷相信了袁世凯的捏造，更加惶惶不可终日。在十七、十八日两次召开御前会议，研究退位问题，但毫无结果。十九日召开第三次御前会议，袁世凯指使心腹赵秉钧、梁士诒、胡惟德列席参加，在会上摊牌。赵秉钧秉承袁世凯的意旨，提出了一个方案，主张同时取消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君主政府，在天津另组一个统一政府，实际上由袁世凯坐一统江山，清朝亲贵这才看清了袁的嘴脸，一致表示反对。梁士诒、赵秉钧、胡惟德一再恫吓，一会说如果不接受此案，袁内阁要全体辞职；一会说这样下去，英、俄、日会乘机干涉；一会又说，军费枯竭，财政困难，要被革命军打败。但清朝亲贵们没有一个能听进去的。会议不欢而散。会后良弼等“宗社党”分子积极活动，准备组织新内阁，取代表袁内阁，和革命军拚死到底。

南京临时政府也反对袁世凯一伙提出的方案，立即打电报给袁世凯，提出四项条件：（1）清帝退位，放弃一切主权；（2）清帝不得干预临时政府组织事宜；（3）临时政府地点须在南京；（4）孙总统须俟列国承认临时政府，国内改革成就，和平确立，方行辞职；袁世凯在孙总统解职以前，不得干预临时政府一切之

事。一月二十二日，孙中山又发表声明，揭露袁世凯在天津另组政府的阴谋。孙中山指出：袁世凯的用意是不想推倒清政府，“且欲取消民国政府”；是不想实行民主共和，而要坚持君主立宪。他提出了五项条件：（1）清帝退位，由袁同时知照驻京各国公使，并转达南京临时政府；（2）袁须宣布政见，绝对赞成共和主义；（3）孙中山接到外交团或领事团通知清帝退位布告后，即行辞职；（4）由参议院举袁为临时总统；（5）袁被举为临时总统后，誓守参议院所定之宪法，始能授受事权。南京临时政府和孙中山提出的这些条件，表面看来十分强硬，对于袁世凯企图取消南京临时政府的阴谋有抵制作用，但是在政权由革命派还是反革命派掌握这一根本问题上同样没有力争，在把大总统位置让与袁世凯这一要害问题上并无改变，相反倒被袁世凯利用来当作逼宫的一种武器，借口南方革命党人的威逼，去要挟清帝退位。

袁世凯得到孙中山的声明后，进一步夸大事实，大造“革命党人潜伏京师”，不久要发生暴动的谣言，威吓清廷。恰在这时，汪精卫等在天津找到了革命党人彭家珍，以良弼是目前实现共和最大障碍为理由，要彭入京刺杀。彭家珍出于对清廷的仇恨，潜往北京，在一月二十六日良弼退朝回家时，出其不意投出一颗炸弹，将良弼的一条腿炸断，第二天就死去了。这一下可使那些皇族亲贵心胆俱裂，对袁世凯的谣言深信不疑，许多王公大臣纷纷离开北京逃往天津、青岛、大连等地，一时跑不掉的也乞求袁世凯给予保护。接着，袁世凯又指使北洋军将领段祺瑞、姜桂题、倪嗣冲等四十余人，在一月二十七日联名向内阁军谘府、陆军部和各王公大臣发出通电，要求立即采用共和政体。三个星期前，这帮军阀还誓死反对共和，如今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

弯，这当然不是他们真心放弃旧主张，而是服从于袁世凯的政治需要。当处于胆颤心惊的皇族亲贵读到这份通电后，更加丧魂落魄，感到大势已去，清廷难保，只好丢掉皇冠，苟全性命了。一月二十九日、三十日，清廷连开御前会议，决定“逊位”以取得优待条件。袁世凯得到消息后，病即“大愈”，即在二月三日打电报催伍廷芳将优待清室条例速定下来。五日，南京参议院通过了优待条例和张謇起草的《清帝退位诏书》，同时电告袁世凯。袁世凯为了掌握新政府的组织权，在退位诏书中擅自加上“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①二月十二日，清廷公布了退位诏书，并宣布退位，袁世凯即以临时政府首领的名义执掌了大权。十三日，袁世凯就电告南京临时政府，伸手要临时大总统的宝座了。在电报中，袁世凯大耍反革命两面派手法，表面上讲了一些极为漂亮动听的言词：“南京孙大总统，……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所公认。今由帝政一跃而跻及之，实诸公累年之心血所造成，亦民国无穷之光荣与幸福。大清皇帝既明诏辞位，……则宣布之日，为帝政之终局，……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见于中国。”^②这些冠冕堂皇的话，使南京临时政府一些首脑人物晕头转向，他们竟把袁世凯视为创造共和的“功臣”。

二月十四日，孙中山放弃了待各国承认临时政府方能辞职的条件，向参议院提出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并在咨文中说：“现在清帝退位，专制已除，南北一心，更无变乱”，“从此帝制永不留于中国之内，民国目的，业已达到。”完全沉醉于胜利之中了。孙

^① 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第315页。

^② 蔡寄鸥：《鄂州血史》第184页。

中山还向参议院提议，“此次清帝逊位，南北统一，袁君之力实多。”“举为总统，必能尽忠民国。”^①二月十五日，召开了临时总统选举会，到会有十七省代表，袁世凯以十七票当选。当天，参议院就致电袁世凯，告诉他被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吹嘘他是“中华民国第一华盛顿”。至此，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政治代表袁世凯的篡权活动，在帝国主义的支持和软弱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妥协退让中得到初步实现。内外反动派弹冠相庆，庆贺“南北统一”，即把革命力量“统一”到反革命方面。

三、争都与复辟

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一时被袁世凯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所蒙蔽，但对他仍有一定的警惕。孙中山在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时，又布置了一道虚弱的防线来对抗袁世凯，要袁世凯履行三项条件：（1）临时政府设于南京，不能更改；（2）袁世凯亲到南京受任之时，临时大总统及国务员始行解职；（3）《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参议院所制定，新总统必须遵守；颁布之一切法律章程，非经参议院改订，仍继续有效。这三项条件的第一、二项是“调虎离山”，企图使袁世凯离开北京的老巢；第三项是“套虎于网”，给袁世凯以法律上的约束。孙中山想用这样的办法来保证在中国推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

对于孙中山的用意，富于反革命经验的袁世凯看得一清二楚。他感到孙中山提出的遵守临时约法问题，这是将来的事，可以暂时放一放；而建都问题，即要实行，必须力争。帝国主义列强

^① 蔡奇鸥：《鄂州血史》第185页。

完全和袁世凯坐在一条板凳上，拚命反对建都南京，这是因为他们在北京享有驻兵权，在东交民巷有一个“独立王国”，迁都南京就意味着削弱他们的在华统治实力。立宪派、旧官僚也不愿使袁世凯的反革命实力下降，极力反对孙中山的三项条件。张謇还为袁世凯策划了不南下就职的妙法，他在给袁世凯的信中说：

“目前第一难题即要公南来。解此题者只有二法。一从在京外交团入手，一从北数省人民着手。”^①这里的所谓从“外交团”入手，就是求助于帝国主义干涉；所谓从“人民”着手，就是要袁利用其军阀爪牙发通电。后来袁世凯果然极其巧妙地采用了张謇的献策。至于混入南京参议院的立宪派、旧官僚以及革命派的叛徒，同样反对建都南京。二月十四日，参议院讨论建都问题，结果以二十票对八票的绝对多数通过建都北京。孙中山得此消息，异常气愤，立即让参议院复议，坚决主张建都南京。十五日参议院重新讨论，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最后才以十九票对七票的多数，通过了建都南京的决议。接着孙中山连电袁世凯，催他南下就职。

袁世凯是绝不肯远离北洋军阀巢穴而南下就职的。他在给孙中山的回电中，编造了一大堆“理由”，说什么“北方军民，意见尚多分歧，隐患实繁；皇族受外人愚弄，根株潜长；北京外交团，向以凯离此为虑，屡经言及；奉江两省，时有动摇；外蒙各盟，时来警告。内讧外患，递引互牵，若因凯一去，一切变端立见，殊非爱国救世之素志。”^②孙中山对此并不以为然，在电催袁南下就职的同时，派蔡元培、宋教仁、汪精卫、钮永建等为迎袁专使，奔赴北京。

^① 张謇：《张季子九录》，《政闻录》。

^② 蔡寄鸥：《鄂州血史》第188页。

二月二十五日，迎袁专使团蔡元培等到达北京。两面三刀的袁世凯，特开正阳门进行隆重欢迎，为专使团举行盛大宴会，并假惺惺地与专使们商谈南下路线，表示“极愿早日南行”；但在暗地里却指使其爪牙北洋军第三镇统制曹锟于二月二十九日晚在北京制造“兵变”，纵火抢劫，造成混乱，连迎袁专使团的寓所也被骚扰，专使们几乎遇难。紧接着，通州、保定、天津也演出同样事件。帝国主义立即紧密配合，以“保护使馆和侨民”为借口，命令驻扎京津的侵略军整装待命，在通衢大道上巡逻示威，替袁世凯保镖。日本立即从山海关一带调一千多士兵，杀气腾腾开往北京，英、俄、德等国也纷纷从旅顺、香港、哈尔滨、青岛增调二千多士兵进京“护卫”，竭力为袁世凯制造北方的恐怖气氛，大有八国联军入侵重演之势。在此同时，那些立宪派、旧官僚也大叫大嚷，反对袁世凯南下就职。黎元洪带头发通电恫吓革命派：“舍南京不致乱，舍北京必至亡。”汤寿潜攻击孙中山要袁南下就职是干涉立法权。江苏都督庄蕴宽（此时程德全已调任南京临时政府内务总长）甚至向孙中山抗议，要求重新讨论建都问题。北洋军阀头目段祺瑞、冯国璋等更是蛮横地通电叫嚷：“临时政府必应设于北京，大总统受任必暂难离京一步”。袁世凯一伙这样连骗带吓，使迎袁专使们相信了北方政局不稳的说法。三月二日，他们向南京临时政府发电说：“北京兵变，外人极为激昂”，“培等睹此情形，集议以为速建统一政府，为今日最要问题，余尽可迁就，以定大局。”^①迎袁专使们完全落入了袁世凯的圈套。

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扼腕叹息，毫无办法，只好让步。三月六日，南京参议院议决六条，其主要内容有：（1）准许袁大总

^① 尚秉和：《北京政府成立》，《辛亥革命》第8册，第552页。

统在北京就职；（2）袁就任后将国务总理和国务员名单拟定并电知参议院同意；（3）南京临时政府事宜交接完毕，孙大总统始行解职。袁世凯得知南方的决定后，欣喜若狂，迫不及待地于三月十日在北京就临时大总统职，装腔作势地宣誓要“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达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①他用这种娓娓动听的言词去欺骗资产阶级革命党和广大人民群众。但是，假的就是假的，连一个帝国主义侵略分子都看出了破绽，描述袁记“民国”是“行政、法庭、税收、警察一切都仍照旧……”。固然，现在采用了总统、副总统之类的堂皇称号，人人口里都讲着自治、宪法和共和，但是在新瓶子里装的仍是旧酒”。^②

到这时，孙中山的三项条件还剩下最后一条，即以《临时约法》来约束袁世凯。在袁世凯就临时大总统职的次日，三月十一日，孙中山在南京颁布了参议院匆忙通过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部约法分七章、五十六条，是一个资产阶级宪法性的文件。它以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学说为指导思想，确定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家制度；肯定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制度和三权分立的组织原则；采取了资产阶级宪法中的虚伪的民主自由原则；确认了保护私有财产的原则。它在国家机构的体制上，特意将原来《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规定的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内阁总理由议会的多数党产生，总理对总统要办的事项，如不同意，可以驳回；总统颁布命令须由总理副署才能发生效力。它企图用缩小总统权力，增大总理职权的办法，来限制袁世凯专制独裁的手脚，保卫革命成果，维护民主共和制度。这表现了资产阶

^① 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280页。

^② 贝洛夫：《1911—1913年的中国革命》第81页。

级革命派的民主主义立场。但是，这样的一纸空文，根本约束不了诡计多端的大野心家袁世凯。袁世凯既然攫取了国家的最高权力，他就完全可以进一步篡改这个“约法”。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如果没有政权，无论什么法律，无论什么选出的机关都等于零。”^①毛主席还深刻指出：“中国现在的事实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即使颁布一种好宪法，也必然被封建势力所阻挠，被顽固分子所障碍，要想顺畅实行，是不可能的。”^②历史事实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这样，袁世凯在内外反动势力的支持下，在对革命派步步进逼中得到了他梦想取得的一切。革命派在步步退让中只好完全听命于袁世凯的摆布。三月十三日，袁世凯又一次打破了革命派希望由自己的领导骨干组阁的幻想，提名唐绍仪为国务总理。三月二十三日，南京参议院只好表示完全同意。革命派原先希望由黄兴担任陆军总长，袁世凯却坚持要段祺瑞充当，结果由于立宪派头子张謇勾结内奸汪精卫从中破坏，革命派的这一幻想又告落空。三月三十日，唐绍仪内阁宣告组成，要害部门的大权都掌握在袁世凯的党羽手中，革命党人只是成为点缀或陪衬而已。四月一日，孙中山宣布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五日，临时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迁设北京。至此，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不到一百天就为反革命的北京临时政府所取代。资产阶级革命派所追求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成为昙花一现的历史陈迹，轰动一时的辛亥革命在中外反动派的联合镇压下宣告失败。

以袁世凯为头子的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标志着大地主大买办阶级政权的复辟。从此，中国开始陷入北洋军阀政府反动

① 列宁：《杜马的解散和无产阶级的任务》，《列宁全集》第11卷，第98页。

②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毛泽东选集》第693页。

统治的灾难深渊，它比清王朝的反动统治有过之而无不及。正如孙中山后来沉痛地指出的：“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①

第四节 历史意义和经验教训

一、值得纪念的丰功伟绩

辛亥革命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朝的一系列伟大斗争的继续和发展，是继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运动后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第三次高潮。

辛亥革命是具有更完全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来，即中国社会开始由封建社会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来，中国人民就开始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个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而辛亥革命，则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这个革命。”^②因为辛亥革命的组织者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了这次民主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派在革命前组织了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提出了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要求推翻清朝封建君主专制政权，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并企图实现解决土地问题的“平均地权”的“经济革命”。

辛亥革命的伟大功绩，在于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国。

① 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04页。

②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627页。

毛主席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说：“纪念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①皇帝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长期以来，反动的封建统治阶级竭力宣扬孔孟之道的天命论和“三纲五常”，把封建专制皇帝打扮成具有绝对统治权威、神圣不可侵犯的神的化身，使之成为实行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辛亥革命居然把这个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从它的宝座上一脚踢了下来，把它赶跑，宣判它为“小丑”、“民贼”、“独夫”，从此埋葬了在中国存在了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共和制。这不能不是一个很大的胜利和巨大的变化。这对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孔孟之道的“天命论”是一个沉重打击和深刻批判。这个巨大的胜利和变化，促使人民群众日益觉醒，大大地激发了人民的革命精神，使民主主义思想、共和国观念深入人心，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辛亥革命以后，虽然还有反动派宣扬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复辟之道，想重温皇帝的美梦，妄图复辟帝制，但他们在这个势不可挡的历史潮流面前，被冲击得象肥皂泡似地很快就消失了。

辛亥革命赶跑了皇帝，推翻了清朝统治，这就打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来，清朝封建统治者就执行着对外投降、对内镇压人民革命的反动政治路线。这样一来，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就同中国的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错综而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帝国主义的侵略，威胁着中国人民的生存，压迫着中国的经济不能发展，阻碍着中国的政治不能进步。帝国主义是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的主要支持者，而中国封建地主阶级则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社

^① 毛泽东：《纪念孙中山先生》，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二日《人民日报》。

会基础。清政府不仅是封建的朝廷，尤其是“洋人的朝廷”；不仅是保护封建剥削制度的权力机关，尤其是帝国主义掠夺和统治中国的工具。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爆发的辛亥革命，矛头直指清政府，革了清朝的命，也就打击了帝国主义。毛主席指出：“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①从此以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半殖民地统治秩序更加动摇，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日益向着更广泛和深刻的方面发展。

辛亥革命在经济上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它为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辛亥革命的暴风骤雨，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动摇了封建统治的基础，也就一定程度地削弱了中外反动势力对于民族资本主义的束缚和压迫。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一系列保护奖励工商业的政策和法令，各地相继出现了各种实业团体，从而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随着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无产阶级队伍壮大起来。无产阶级队伍的迅速壮大和斗争，加快和改变了中国革命的进程。辛亥革命后八年，作为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起点的五四运动就爆发了。

辛亥革命促进了被帝国主义奴役的亚洲人民的解放斗争。一九一二年一月，当南京临时政府刚刚成立之际，列宁就满怀激情地说：“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将给亚洲带来解放、使欧洲资产阶级的统治遭到破坏”。^②一九一二年，旅居中国的越南爱国侨民在辛亥革命的直接影响下，组织了越南独立党，提出民族解

^① 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毛泽东选集》第1402页。

^②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列宁全集》第17卷，第457页。

放和建立独立的共和国的主张。一九一三年，荷属东印度的爪哇等岛的印尼人民及其他殖民地人民，在辛亥革命的鼓舞下，都广泛地掀起了革命民主运动，有力地冲击了帝国主义在亚洲的殖民统治。由此可见，辛亥革命在国际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和亚洲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革命，彼此支持，互相激荡，形成了世界范围的革命风暴，“标志着二十世纪初所揭开的全世界历史的一个新的阶段。”^①亚洲变落后为先进的时代开始了。因此，即使在帝国主义援助袁世凯绞杀革命、破坏民主的暗淡的日子里，列宁仍然满怀信心地说：“不管各种‘文明’豺狼切齿痛恨的伟大的中华民国命运如何，但是，世界上任何力量也不能在亚洲恢复旧的农奴制度，也不能铲除亚洲国家和半亚洲国家人民群众的英勇的民主精神。”^②

总之，辛亥革命是以巨大的历史功绩，载入中国近代史册的。

二、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破产

辛亥革命时期，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政权问题上的要求，是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用它来代替封建君主专制的清政府。这是他们组织和发动辛亥革命的基本出发点。

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上的产物，是鸦片战争以来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关于民主政治思潮的重要结晶。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

① 列宁：《亚洲的觉醒》，《列宁选集》第2卷，第448页。

② 列宁：《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列宁选集》第2卷，第439页。

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这样具体历史条件下，是进步的、革命的方案。

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提出，是同盟会和它的领袖孙中山的一个贡献。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实践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就意味着用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家制度去代替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的国家制度，因而是一场严重的斗争。而决定这一斗争胜负的关键问题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能否战胜握有经济、政治和军事实权的地主买办势力以及他们的支持者外国帝国主义列强。因此，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必须解决民族资产阶级和地主买办势力及其后台老板外国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然而，在对待和解决这两个矛盾的问题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从一开始就没有也不可能有彻底的革命观点，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和为实现这一纲领而斗争的正确路线。这是因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在帝国主义时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块土壤里生长起来的，它从娘胎里就带来一种软骨病，先天不足，后天亏损。一方面，由于他们遭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束缚，所以要求实行民主革命；但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所以，他们又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这种软弱性和妥协性，在辛亥革命的过程中集中地暴露出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推翻地主买办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起强有力的革命专政。

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夺权以前，在其政纲中明确主张中国“必须以一个新的、开明的、进步的政府来代替旧政府”，“把过时的

满清君主政体改变为‘中华民国’”。^①这是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但是，由于阶级的局限，他们不懂得清朝的国家政权是地主买办阶级和帝国主义压迫中国人民的工具，错误地以为只要推翻清王朝，变君主专制为民主共和，就能保障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他们注意“反满”和政权形式的更易，而忽视了变地主买办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国体问题。这一点在同盟会对满洲将士的招降书中有突出的表现。招降书尽管有孤立清政府和争取革命同情者的意思，但良莠不辨，敌我不分，甚至规定起义后的秩序，要由那些地主绅士们去负责维持。这些都充分表现了资产阶级革命派争取汉族的封建官僚、军阀、士绅作为“盟友”的妥协立场。毛主席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②资产阶级革命派恰恰在这个问题上，缺乏革命原则，不把汉族的军阀、官僚、豪绅、地主当做革命的对象，甚至还极其有害地把他们当作革命的同盟者，这样，资产阶级革命派就麻痹了自己，模糊了群众的视线，给武昌起义后资产阶级革命派继续革命和创建政权的实际行动，带来了严重的影响。

武昌起义以后，清政府很快就土崩瓦解了，革命的发展把创建政权的问题提到了日程上来，这时摆在革命派面前的已经不是宣传和阐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一般方案问题，而是如何把这个方案变成现实的实际问题。在这个革命的根本问题上，资产阶级革命派从一开始就表现了软弱、动摇和缺乏坚定的革命态度。在武昌起义的第二天成立的武昌军政府，本来是革命的产

① 孙中山：《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孙中山选集》上卷，第63页。

②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3页。

物，是广大人民群众用鲜血和生命换取来的成果。但是，软弱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却没有利用这一革命形势，依靠人民群众把政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并充分利用革命政权这一重要工具，去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革命大好形势，把革命夺权斗争进行到底。相反，他们却向地主买办势力寻求妥协，居然把军政实权拱手交给了所谓有“声望”的旧军阀黎元洪和立宪党人汤化龙，结果使这个新生的军政府从一开始就走上和反动势力妥协的轨道。这种在革命中产生的政权却落在反革命手中的现象之所以产生，固然和当时革命的主要领导人不在武昌有关，但主要还是民族资产阶级软弱、动摇和妥协的结果。当时革命的领导者之一蒋翊武就说过：“革命党人之不争权利，以免将来发生裂痕也。”

武昌起义以后，各省纷起独立，尽管宣布独立的形式多种多样，但总的趋势却是革命派打先锋，立宪派和旧军阀、官僚接受政权，清朝的官僚和保皇党徒一变而为民国的元勋。改变的只是政权的一块招牌，而不变的是政权的地主买办阶级本质。这种“新瓶子装旧酒”的严酷现实，并没有引起革命派的足够重视和警惕。相反，革命派中的一些人，企图以“廉价革命”来换取“廉价胜利”，认为这是清朝官僚“投降”革命，是促使革命成功的一条捷径。资产阶级革命派急切幻想革命早日成功，因而对凡是拥护共和的人，都愿与他们联合起来，而不管他们骨子里是真拥护，还是假拥护。在他们宜“取宽大主义，免增怨毒”的错误思想指导下，敌人变成了盟友，彼此握手言欢，“咸与维新”了。鲁迅针对许多独立后的地方政权普遍存在着的“新政府、旧人物”这种奇怪的现象，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深刻的讽刺，说它是：“狐狸方去穴，桃偶（指大大小小的牛鬼蛇神）已登场。”^①南京临时

^① 鲁迅：《哀诗三首》，《鲁迅全集》第7卷，第862页。

政府就是在各省这种相继“独立”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如同沙滩上的房屋一样，没有可以依靠的牢固基础。这就给地主买办阶级的政治代表搞反革命篡权复辟活动提供了重要条件。马克思说过：“陈旧的东西总是力图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①地主买办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们就是赶着革命的浪潮，利用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弱点，表面上装作承认“共和”，暂时栖身于革命政权内部，从中逐步窃取革命领导权，使民国只成了一个空洞的形式，而实质依然是地主买办阶级的专政。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自然也就宣告破产了。

第二，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建立一支强大的革命武装，作为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坚强支柱。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残暴专政下，中国革命的“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②无数历史经验都雄辩地证明毛主席关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③这一伟大论断的正确。政权，只能用武装去夺取；政权，也只能用武装来保卫。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了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曾主张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他们注意到在军队中争取革命士兵和下级军官的工作，注意争取和依靠过去民间的反清秘密团体“会党”，并收到一定的成就。

然而，资产阶级革命派却没有认识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武装斗争在革命中的特殊作用和重要地位，没有深刻的理解建立一支强有力的革命武装，作为夺取和巩固政权、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坚强支柱的重要意义。因此，他们所发动的

^① 马克思：《致弗·波尔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4页。

^{②③} 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08、512页。

一连串武装起义，都不是以在群众中进行耐心的、艰苦的组织和教育工作为基础的群众武装起义，而只是一种脱离广大群众的单纯的军事投机和军事冒险。在多次起义失败的打击下，资产阶级革命派中有一些人又由悲观失望而走上专门搞暗杀的道路。他们既没有在充分发动群众、武装群众的基础上建立起一支真正强大的革命军队，更没有利用当时的革命形势积极掌握军队的领导权，以至起义的新军和会党武装多数为立宪派和旧军阀、官僚所掌握。辛亥革命中组织起来的革命军队——民军，不仅数量少，而且战斗力弱，根本没有力量来创建和保卫中央和地方革命政权。特别是当武昌起义刚刚成功，南京临时政府刚刚成立，混入革命政权、并窃取了领导权的旧军阀头子黎元洪，为了篡权复辟，企图破坏和瓦解革命武装，公开叫嚷“共和国立，革命军消”^①时，资产阶级革命派竟毫无警惕与抵制。资产阶级革命派由于其剥削阶级的本质和软弱性，决定了他们的政权观是：政权到手，革命到头。起义功成，就应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他们害怕继续革命，害怕延长武装斗争，希望迅速实现“统一”，因此对反革命势力瓦解革命武装的阴谋，不仅认识不清，缺乏警惕，反而随声附和，随波逐流。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虽然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导者黄兴担任了陆军总长，但实际由革命党人直接掌握的军队很少。到一九一二年三月，袁世凯窃取了临时大总统后所组成的内阁，虽然同盟会占多数，号称“同盟会中心内阁”，但黄兴并未能担任陆军总长，袁世凯的党羽段祺瑞任陆军总长，刘冠雄任海军总长，资产阶级革命派把军权让了出去。

不仅如此，资产阶级革命派中的许多人，还自动解散了革命

^①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

武装。例如，广东独立后，资产阶级革命派自己承认，光是省城内被裁撤的民军就有几万人。四川的几十万保路同志军全遭遣散，有的甚至还被当作“会匪”惨遭杀害。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始终没有建立一支强大的革命的军队，没有能够掌握军队的领导权，结果便没有可以依靠的支柱借以抗衡帝国主义列强的干涉，迎击袁世凯篡权窃国的阴谋。辛亥革命的历史证明，“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①因此，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最后只能因为没有强大的革命军队作后盾而化为泡影。

第三，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一个坚强的革命组织作为领导革命的核心力量，因而无法保证革命队伍意志的统一和行动的统—。

作为领导辛亥革命的政党——中国同盟会，由于没有一条正确的组织路线，从成立时起，内部就不够团结，组织上就不够巩固。早在武昌起义前就出现了组织分裂和派别活动的现象。原来的革命小团体光复会实际在单独活动，同盟会中部总会和同盟会总部闹独立性，共进会和文学社与同盟会总部联系很少，甚至把同盟会的总纲随便改动。这说明同盟会在思想上、组织上极不统一。起义胜利后，随着革命运动的进展和深化，随着革命运动遭遇到困难和挫折，以及内外敌人的拉拢勾引和瓦解的活动，同盟会中的派别活动更加严重，已经不能保持一个统一的组织形式对革命和政权进行领导了。有的甚至认为在推翻清朝以后，党的消灭是必然的，否则倒不足以见其“大公无私”。有的同盟会会员更从同盟会中分离出来，和立宪派、旧官僚混在一起，

^① 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11页。

组织什么“民社”、“共和统一会”、“共和促进会”、“共和建设会”等，为个人争权夺利。既然实践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司令部和南京临时政府的领导力量——同盟会，思想上缺乏统一信仰，组织上松懈无力，内部矛盾重重，那么辛亥革命的失败，也就难以避免了。正如孙中山在一九二四年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总结这一历史经验时所说的：“夫当时代表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者，实为袁世凯，其所挟持之势力，初非甚强，而革命党人乃不能胜之者，……未能获一有组织、有纪律、能了解本身之职任与目的之政党故也。使当时而有此政党，则必能抵制袁世凯之阴谋，以取得胜利，而必不致为其所乘。”^①

第四，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彻底批判复辟倒退的孔孟之道。

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了推翻反动腐朽的清王朝，创建新兴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把武器的批判和批判的武器结合了起来。在武装起义的同时，在文化思想战线上，以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民主主义理论为武器，与清朝封建统治者及其依附势力资产阶级保皇派康有为、梁启超之流所掀起的尊孔复古思潮，展开了尖锐的斗争。经过激烈的论战，击溃了尊孔逆流，从而在政治上粉碎了康、梁一伙的保皇阴谋，为辛亥革命的到来作了重要舆论准备。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利用所掌握的革命政权这个工具，试图把反孔斗争继续推向前进，颁布了一些“废孔”措施，有力地推动了反对封建旧文化的斗争。这对暂时稳定新生的革命政权起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由于软弱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跟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在政治上的民

^① 孙中山：《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孙中山选集》下卷，第521页。

主要求是很不彻底的，因而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他们不肯也不可能跟西方帝国主义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思想进行彻底的决裂。这就决定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批孔斗争，不能不是有限度、软弱无力和极不彻底的。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不懂得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的习气、习惯、传统和偏见是民主革命的巨大阻力，不懂得彻底批判孔孟之道对夺取政权、特别是巩固政权的深远意义。因而在批判中往往采取保留的态度。如陈天华就认为：“如谓宗教必不可无，则无宁仍尊孔教”。^①章太炎也认为孔丘在教育等方面有不能磨灭的功劳。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孔丘的批判，远没有形成一个广泛的群众运动，在批孔的广度和深度上都是很肤浅的，封建主义的思想阵地，远未彻底扫除。这样，孔孟之道依然在群众中间散发着臭气，并且毒害他们。鲁迅在《风波》这篇小说里就深刻地揭露了这一点。鲁迅所刻画的七斤和七斤嫂等，他们是敢于蔑视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他们赞成剪辫子，在他们身上有一种自发的反封建的革命要求；但同时，由于反动统治阶级利用孔孟之道实行思想统治，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去注意农村的思想发动，也由于小生产者农民本身的弱点，他们身上又毫不例外地受着封建传统思想的毒害和束缚。鲁迅特别说明了九斤老太在封建思想的长期毒害下，已经变成了一个保守、落后、头脑僵化、只知道尊奉和恪守旧观念生活的人物，“一代不如一代”成了她的口头禅。九斤老太的这句口头禅正是她不满现实、留恋过去的一句真实的内心独白，也是她对一切事物下的结论。

反映旧制度的旧传统、旧观念、旧习惯是一种巨大的社会阻

^① 陈天华：《绝命辞》，《陈天华集》。

力，它只能有利于反动派而不利于人民。在辛亥革命时期，由于没有彻底批判孔孟之道，这就使得尊孔复古、倒退复辟的反动思想，依然在某些人们头脑中保留有相当的市场，他们往往被这种旧思想紧紧地束缚了手脚，而不能觉醒。毛主席说：“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要从旧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它就必须清除这个基地。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①而这一点，正是地主买办阶级反动势力利用孔孟之道进行复辟的一个有利条件。袁世凯搞篡权复辟就是以孔老二作为敲门砖的，他为换取帝国主义洋大人对自己篡权复辟活动的支持，也是以孔孟之道作为卖国的理论根据和遮羞布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也根本不可能对地主买办阶级实行包括文化思想领域内的全面专政，而地主买办阶级却利用传统习惯和复古倒退思潮，进行了全面的反革命复辟。

第五，资产阶级革命派不敢依靠农民群众，没有触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基础。

毛主席说：“封建主义是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同盟者及其统治的基础。”^②封建的土地制度是旧中国地主买办阶级专政的经济基础。因此，土地制度的改革，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个主要内容。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了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同盟会纲领中提出了解决封建的、半封建的土地制度的“平均地权”的主张，并且就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制度的问题，与资产阶级保皇派展开了大论战。

^①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第123页。

^② 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1208页。

但是，同盟会的多数成员却停留在资产阶级自由派和地主阶级反满派的水平，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仍然有所保留。就是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提出了“平均地权”的口号，但是他们反对农民起来“夺富人之田为己有”，反对广大农民起来革命，而主张采用所谓“核定地价”的办法来解决土地问题。这实际上反映了他们惧怕农民群众用暴力摧毁封建统治根基的心理。因此，辛亥革命后，中国广阔的农村依然如故。一方面反动的封建势力没有受到打击，封建土地所有制没有丝毫触动；另一方面，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通过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去“唤起民众”，真正组织和依靠中国民主革命主力军农民来参加革命斗争。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孙中山是中国最早的革命民主派，他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派、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乡村农民，实行武装革命，提出了‘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但是可惜，在他掌握政权的时候并没有主动地实行过土地制度的改革。”^①“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②

第六，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帝国主义的本质认识不清，存在着幻想和畏惧。

毛主席指出：“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③帝国主义绝不允许在它控制下的中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建立独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它们勾结中国反动势力，共同绞杀革命，阻挠

①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976页。

②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6页。

③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591页。

资产阶级所向往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实现。因此，资产阶级革命派为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所遇到的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就是外国帝国主义。

但是，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对于帝国主义的本质却认识不清，他们一直对帝国主义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们当中不少人甚至认为，由于他们走的是西方资产阶级走过的路，所以西方资产阶级会帮助他们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的资产阶级国家。他们不敢正面反对帝国主义，力求避免触动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他们在对外宣言中，宣布承认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国家间所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继续偿付赔款和外债，保护外人既得权利，希图以此来换取帝国主义对革命的同情和对革命政府的承认，以为得不到帝国主义的承认，革命政府就不能生存。资产阶级革命派还认为，“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中国的危亡完全是由于清朝统治的腐败使列强得以“乘虚攻弊”的结果，只要推翻清朝，建立共和民国，根本问题便可解决。因此，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袁世凯的联合压迫下，他们竟愿意交出政权以换取袁世凯“反正”，“令全国大势早定，外人早日承认”。^①结果南北和谈“成功”，革命半途而废了。帝国主义采取间接的方式援助中国反动派达到了绞杀革命的目的。

正是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既没有勇气也没有力量从根本上去触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因此，辛亥革命的结果只是赶跑了一个皇帝，只是在形式上建立了“民国”，中国人民依然处在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统治之下，过着极端痛苦的生活。

^① 黄兴电，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七日《民兴报》。

辛亥革命的历史表明，在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取得彻底的胜利。“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①

^①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1360页。

第十三章

反对帝国主义走狗北洋军阀的斗争

第一节 反击袁世凯尊孔复辟逆流

一、反攻倒算和“二次革命”

袁世凯窃取民国临时大总统以后，立即向革命人民进行反攻倒算，着手建立专制独裁统治，阴谋复辟封建帝制，妄图实现其“将万世一系之专制君主易为袁姓”^①的狼子野心。

辛亥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却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势力，打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秩序。以袁世凯为头子的北洋军阀虽然窃夺了中央和许多省份的政权，但并没有囊括整个中国。以孙中山为领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被迫交出了中央政权，但终究保留了民主共和的形式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继续掌握着江苏、江西、安徽、广东等七、八省地盘和十几万军队。人民群众的革命力量虽然遭到摧残，但是自发的反抗烽火仍在到处燃烧。

面对这种局势，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势力深感不安，都想方设法地力图使中国政局按照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英帝国主义的喉舌伦敦《每日电讯》，早在一九一二年三月，

^① 《袁世凯之隐衷》，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七日《时报》。

就忧心忡忡地说：“中央权力既弱，统一之策难期。”^①一九一三年四月，德国外交大臣雅哥叫嚷什么：“据我的意见，总统选举举行后立刻承认不仅意味着袁世凯权力的实际增加，而将相当加强其反对中国南部分裂运动的地位。”^②当时帝国主义列强都想扶植袁世凯集权专制，以便压服南方资产阶级革命力量，扑灭人民群众的革命火焰，稳定自己在中国的统治。

大地主大买办阶级也把维持自己反动统治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的身上。辛亥革命虽然赶跑了皇帝，推翻了君主专制制度，但是广大农村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动，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地主豪绅的统治依然如故，建立在这种旧的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地主阶级专政的封建官僚的国家机器，只是换了一块民国的招牌，而被原封不动的保存下来。过去那些效忠于清王朝的官僚政客，现在摇身一变而成了民国的显要。大地主财产世袭的要求，希望由皇帝的世袭秩序重新表现并重新巩固起来。买办资产阶级为了保持自己的资财和剥削阶级的地位，支持袁世凯搞专制的统一，成了北洋军阀统治的社会支柱。那些满脑子孔孟之道的官僚政客，对封建王朝充满依恋之情，对共和制度充满刻骨仇恨。他们匍匐在袁世凯面前，支持袁世凯搞专制，复辟帝制，企图攀龙附凤，借以巩固自己既得的政治经济利益。袁世凯正是在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利用封建官僚的国家机器，依靠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和封建买办官僚政客的支持，从总统爬上皇帝的宝座的。

列宁指出：“在革命已经爆发、闹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什么人都来参加革命，有的是由于单纯的狂热，有的是为了赶时髦，有

① 《辛亥革命》第8册，第521页。

② 孙瑞芹译：《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3卷，第262页。

的甚至是为了贪图禄位，在这时候做一个革命家是不难的。”^①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高潮中，有一些人怀着追名逐利的个人野心卷进了革命洪流，参加了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但是，随着革命运动的深入，这些人屈服于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势力的武力威胁和政治诱降，而成了革命的叛徒，堕落为复辟派。他们抱着“从龙”之愿，拥戴袁世凯，企图捞个“开国元勋”，高官厚禄。例如汪精卫、孙毓筠、刘师培、胡瑛、李燮和之流，就是这一类人。他们是新生的地主买办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代表，是袁世凯建立独裁统治的社会基础之一。

袁世凯搞复辟，还同他的家庭出身和个人经历有着密切关系。他出生在一个封建官僚恶霸地主家庭。他的父亲是地主武装的头子，曾同清军一起屠杀捻军和老百姓。他本人是一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受到中外反动派赏识的北洋军阀头子。他长期在孔孟之道和封建官场的污泥浊水中滚爬，心里充满着强烈的权势欲望和封建帝王思想，幻想着有朝一日能黄袍加身，建立传子传孙、“万世一统”的世袭统治。他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竭力纠集死党，拼凑反革命的黑班底。他积极扩军，把北洋六镇扩充了好几个旅，派段芝贵编练拱卫军二十营，派倪嗣冲在皖北编练二十多个营，并指使他的大儿子袁克定，办起一个“陆军模范团”，自任团长，袁克定任副团长。“模范团”所有官长都要宣誓绝对服从袁世凯的命令，为袁氏父子效忠出力，“不惜牺牲性命”，做到“杀身成仁”。北洋军和“模范团”成了袁世凯反攻倒算、复辟帝制的“御林军”。

富有反革命经验的袁世凯深深知道，要搞专制独裁、复辟帝

^①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第250页。

制，首先必须从镇压人民革命、反攻倒算开始，收回地主买办阶级在辛亥革命中失去的权力；而且反攻倒算愈是彻底，反革命的权力愈集中，帝制复辟的阴谋就愈有实现的可能。因此，袁世凯窃国后，就以镇压革命为己任，疯狂地向革命人民进行反攻倒算，实行“独裁者的专制的统一”^①，为帝制复辟开辟道路。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每一次革命以后，反革命总是王权赖以复辟的生存条件。”^②

袁世凯进行反攻倒算、集权专制，有两个明显的特点：第一，凭借他所窃据的国家头目的合法地位，充分利用他所篡夺的国家权力；第二，篡改和利用孙中山曾经提出过的“统一”的旗号，高喊什么“统一军令”、“统一政令”、“统一政权”、“统一国家”、“统一行政”、“统一制度”、“统一民国”，甚至学校也要“统一”“尊孔读经”，也就是要把军、政、财、文等大权，全部“统一”到他手中。因此，袁世凯的反攻倒算、集权专制，搞得特别凶狠和特别残暴。

“有军则有权”，这是袁世凯从开始其反革命生涯以来多年积累的经验 and 坚守不渝的信条。因此，他的集权专制首先是从“统一”军权开始的。袁世凯一朝权在手，便三令五申强调：“军人乎，国之爪牙”，“对于本大总统，有服从之义务”^③，“服从命令为军人之第一要义”。^④袁世凯规定“军人不得私组政团”^⑤，“不准干预政治”^⑥，否则，就要严加“取缔”，按法“惩办”。袁世

①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972页。

② 马克思：《对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审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302页。

③ 袁世凯：《告诫军人训令》，《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2，第28页。

④ 袁世凯：《布告军界文》，《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2，第6页。

⑤ 袁世凯：《致南京留守黄兴函》，《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6，第1页。

⑥ 袁世凯：《复王芝祥军统函》，《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6，第4页。

凯还以“近日军队复杂”为借口，下令“实行收束之方”。^①十分清楚，袁世凯的这些命令，矛头都是针对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都是为了收缴资产阶级革命派手中的军权而发的。他是要资产阶级革命派把军权全部交出来；不准资产阶级革命派到军队中去发展革命党和进行革命活动；不准资产阶级革命派利用军权干预他的集权专制；要求军队必须忠诚于地主买办阶级、忠诚于他这个反革命头子，为其集权专制、复辟封建帝制的反革命事业服务。这实际上就是向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人民群众发布逼降令、宣战书。

先下一声“统一”令，接着袁世凯就挥舞起杀人的屠刀，恶狠狠地向资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人民群众砍将过来。

一九一二年八月十五日，袁世凯仿效孔老二杀革新人士少正卯的卑劣伎俩，无中生有地以“蛊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图谋不轨”的罪名，枪杀了参加武昌起义的革命党人、前湖北省军务司副司长张振武和湖北将校团长方维，制造了一起“中外震惊”的谋杀案件。

在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三年间，仅在辛亥革命首义之区的湖北，袁世凯及其爪牙就血淋淋地残杀了二千多参加辛亥革命的革命党人和革命将士。袁世凯的表弟、河南督军张镇芳，两年之间，在河南也滥杀了成千上万的群众和革命党人。

袁世凯这一系列的反攻倒算、倒行逆施，引起了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和激烈反抗。

袁世凯是个“腰藏万把刀，面带三分笑”的极其凶恶、狡诈的家伙。他同历史上的反动派一样，为了平息舆论，欺骗群众，麻

^① 袁世凯：《莅参议院宣言》，《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首，第3页。

痹革命党人，攫取更大权力，在挥舞屠刀大砍大杀的同时，还故作姿态，与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派握手言欢。一九一二年八、九月间，袁世凯在“共商国是”的幌子下，邀请孙中山、黄兴入京会谈。

袁世凯的军事镇压和政治欺骗的反革命两手政策，对资产阶级革命派起了极坏的分化作用。在新的阶级斗争形势下，面对袁世凯的反革命两手政策，在要不要维护辛亥革命成果、坚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问题上，资产阶级革命派内部的路线分歧和斗争日益突出起来。孙中山等少数人，虽然存在着妥协性一面，也曾一时受骗上当，但革命性一面还是其主流，他们仍然坚持民权主义、民生主义，而且一旦认清袁世凯的反动面目以后就坚持武装反袁；而以宋教仁、黄兴等为代表的多数人则不同，妥协右倾思想占了上风，他们认为：“今，革命之事毕矣。”^①

一九一二年八月，孙中山到达北京。老奸巨猾的袁世凯以欢迎总统的盛大礼仪隆重接待，并在会谈中装出十分恭顺和谦虚的样子，表示赞成革命。孙中山讲什么，他就赞成什么。如孙中山说，北京内外受困，最好要迁都南京；袁世凯答应可以考虑。孙中山说，现在欧美许多国家都实行币制改革，中国也该实行；袁世凯点头称是。孙中山说，中国以农立国，应该实行“耕者有其田”；袁世凯也表示“事所当然”。当时，孙中山正热心于建筑铁路，以实现“民生主义”；袁世凯就授予孙中山以“筹划全国铁路全权”，并高呼“孙中山先生万岁！”

在对待袁世凯的态度上，黄兴、宋教仁是右倾妥协派的代表。早在“南北议和”时，黄兴和宋教仁等就极力主张对袁世凯

^① 宋教仁：《代草国民党大政见》，《民国经世文编》第2册，第40页。

妥协退让。临时政府北迁后，黄兴本任“南京留守府留守”，统率南方部分军队。但到一九一二年六月，他竟屈服于袁世凯的军事压力和政治诱惑，自请撤销南京留守府，解散南方军队，把资产阶级革命派仅有的一点权力也拱手让了出去。八月，黄兴和同盟会的实际负责人宋教仁，未经孙中山的同意，不顾同盟会内一些人的激烈反对，在“新旧势力合作”、“朝野合作”的口号下，把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国民公党等几个小党团合并，改组成国民党。虽然名义上孙中山担任理事长，但实权操纵在代理理事长宋教仁手中。改组后的国民党，加入了不少官僚、政客和立宪派人物，同原来同盟会上层右倾妥协派合流。国民党的政纲把同盟会秘密时期的“平均地权”改为“采用民生政策”；取消了同盟会公开后的“男女平等”的主张，并把具有斗争意义的“力谋国际平等”改成了不敢冒犯帝国主义的“维持国际和平”。国民党和同时期的其他党派已没有多大的区别，丧失了早期同盟会的革命性。九月，黄兴到北京后，到处拉拢官僚政客加入国民党，他甚至把独夫民贼、反革命头子袁世凯当成自己的同志，劝袁世凯参加国民党并担任国民党的首领（袁未加入）。

宋教仁更是一个典型的议会迷。清政府被推翻以后，宋教仁认为革命已经成功了。因此，他说：“以前，是旧的破坏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时期。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①以“建设”代替“破坏”，以“政治的见解”代替“铁血的精神”，这无疑是宣布放弃革命。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正是在这种右倾思

^① 蔡寄鸥：《鄂州血史》第225页。

想指导下进行的。宋教仁说，他所要努力以赴的“大革命最终之目的”，就是“在将来建设一良好政府与施行良好政策是已；而欲建设良好政府，则舍政党内阁莫属”。^①他幻想用《临时约法》和国会来限制袁世凯的专制独裁，幻想争取议会中的多数来组织“责任内阁”，实现欧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在宋教仁的奔走活动下，在一九一二年十二月到一九一三年二月的国会选举中，国民党在议会里取得了大多数席位，成了第一大党。宋教仁欢喜若狂，满以为可以根据《临时约法》的规定，出组“责任内阁”，当上内阁总理了。为此，他遍游湖南、湖北、安徽、南京、上海，到处发表讲演，鼓吹应由多数党组织责任内阁。

但是，贪得无厌、寸权不让的大野心家袁世凯却收买共和、统一、民主三个小党，合并成进步党，以梁启超、张謇、汤化龙等立宪派和旧军阀、官僚为主干，来和国民党相对抗。接着就以刺杀宋教仁为突破口，挑动内战，向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全面的进攻。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即在国会开会前夕，宋教仁在各地游说后，准备由上海乘火车进京活动，不料在上海车站惨遭暗杀。宋教仁临死前，还致电袁世凯，说什么“望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民确立不拔之宪法，则仁虽死犹生”。可见，宋教仁对窃国大盗、阴谋复辟帝制的袁世凯始终没有切实的觉察。柳亚子曾写了一首词，哀悼宋教仁：“不用吾谋恨，当年计岂迂！操刀慳一割，滋蔓已难图。小丑空婴栏，元凶尚负隅。伤心邦国瘁，不独恸黄墟。”^②诗的头两句，是带着谴责和遗恨的心情说的，因为当年主张北伐、反对向袁世凯妥协是被看作不切实际的迂阔，现在却怎样呢？第三、四句是指没有把革命进行到

^① 宋教仁：《国民党欢迎会演说词》，《宋渔父》第1集，后编。

^② 《宋渔父先生哀诔三》，《宋渔父》第1集，后编。

底，姑息养奸，以致袁党坐大，欲去不能了。宋教仁之死，证明了在帝国主义时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议会政治”是绝对行不通的。

宋教仁被刺后，袁世凯表面上故作震惊，说：“竟有这种事呢？”“这是怎么好？国民党失去宋遯初（宋教仁的字），少了一大主脑，以后越难说话。”他大耍“贼喊捉贼”的把戏，下令“追查”，声称“务得确情，按法严办”。

但是，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一时全国舆论哗然。事实查明，刺杀宋教仁的凶手是武士英，指使人是袁世凯的“长江侦察科长”应夔丞，亲自布置暗杀的是袁世凯的特务头子、内阁总理赵秉钧和内务部秘书洪述祖，而幕后的策划人正是袁世凯自己。因此，当时有人写了《挽宋教仁联》，揭露说：“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即应夔丞），他说是赵秉钧，我说是袁世凯。”

刺杀宋教仁是袁世凯发动内战的一个信号，“宋案”发生后，袁世凯便秘密下动员令和大借外债，决心以武力消灭南方的革命力量。一九一三年四月二十六日，袁世凯同俄、英、法、德、日组织的“五国银行团”，签订《善后借款合同》，以盐税收入作抵押，借款二千五百万英镑，作



赵秉钧给应夔丞（桂馨）的密信

为反革命内战经费。对于这次借款，革命导师列宁曾写道：“中国的新借款被用于反对中国的民主派：‘欧洲’拥护准备实行军事独裁的袁世凯”。“整个欧洲的当权势力，整个欧洲的资产阶级，都是与中国所有一切反动势力和中世纪势力实行联盟的。”^①

“宋案”和“大借款案”发生后，袁世凯和国民党的斗争更为激化。这一严重的阶级斗争，反映到国民党内部，就使早已存在的路线斗争更加尖锐。血的教训，惊醒了孙中山，使他认清了袁世凯的反革命本性。他毅然表示“非去袁不可”，力主“武力讨袁”，准备发动“二次革命”，举起了反袁的旗帜。但“武力讨袁”的主张，反响极为冷落，只有李烈钧等少数人响应。国民党内右倾妥协派黄兴、陈其美等多数人，对袁世凯心存幻想，对反袁斗争缺乏信心，不愿放弃已经到手的利禄，不愿重起干戈，主张“法律解决”。他们认为，有国会，有司法，可依法处置，坚持静待法律解决。他们极其天真地向袁世凯建议组成特别法庭，审理“宋案”。袁世凯假意赞成，暗中指使司法总长许世英，以“不合编制”为名，加以拒绝。孙中山对黄兴“法律解决”的右倾妥协主张进行过批评，“颇以公（指黄兴）言为不然”，但黄兴“不之听”^②，固执己见。还有一些人，以叛徒、内奸汪精卫为代表，投合袁世凯反革命两面政策的需要，在南北之间进行“调停”。这时，国民党内部在讨袁问题上，不仅主要领导人物之间意见存在严重分歧，而且属于国民党势力的各省，也是各怀心事，无法统一。

袁世凯摸清了国民党内部对反袁斗争缺乏准备和一致意见，于是先下手为强，六月下令解除了李烈钧等人的都督职务，

^① 列宁：《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列宁选集》第2卷，第450页。

^② 孙中山：《致黄兴书》，《孙中山选集》上卷，第96页。



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指示同志赴各地起义

接着发表《传语国民党人》的最后通牒，公开指责、威胁孙中山等人“除捣乱外无本领”，要“举兵征伐之”。^①七月十二日，袁世凯便派北洋军进驻江西，发动反革命内战；黎元洪也派军相助。在孙中山指示下，李烈钧于同一天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组织“讨袁军”，发布《讨袁檄文》。十五日江苏宣布独立，十八日广东、安徽两省宣布独立，二十日福建宣布独立，二十二日上海国民党有关方面组织讨袁军，二十五日湖南宣布独立，八月四日四川宣布独立。这些省份虽然宣布独立，但各省区内部意见不一，江苏都督程德全、福建都督孙道江、湖南都督谭延闿本身就不主张独立，只是迫于形势，而不得不宣布的；彼此之间互不统属，没有统一的领导与部署；大都缺乏实力，只有江苏、江西军事力量较强。于是，袁世凯派北洋军阀段芝贵率第一军攻江西，冯国璋率第二

^①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49—50页。

军攻南京。七月二十五日湖口失陷，八月十八日南昌失陷。黄兴在孙中山的命令下虽然也到南京参加了反袁，但于八月二十九日由于前方兵败而出走。九月一日，南京被暂时依附袁世凯的封建军阀张勋攻陷，遭到野蛮的焚掠屠杀。其它独立各省份情况更差：上海方面组织起来的讨袁军不久瓦解；江苏都督程德全在宣布独立后便溜往上海；安徽都督柏文蔚独立时和以后没有在安庆，八月六日即被人宣告他的“罪状”，宣布取消独立；八月九日，福建取消独立；八月十二日、九月十二日，湖南、四川也先后宣布取消独立。至此，“二次革命”从起兵不到两个月就以失败而告终，资产阶级革命派掌握的地方政权全部丧失，北洋军阀势力则进一步扩张到整个长江流域。“二次革命”虽然是孙中山发动的一次武装反袁斗争，是维护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的一次努力，但是宣布独立的七省打算不同，行动不一，有的动摇妥协，投机观望，先后宣布取消独立；有的内部分歧，涣散无力，很快瓦解。特别是国民党已放弃了同盟会在辛亥革命前的革命纲领，丧失了同盟会原先的民主革命气息，成了争权夺利的官僚政治集团，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拥护。而帝国主义却在政治经济各方面全力支持袁世凯，进步党和旧官僚对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又大卖力气，在国会中通过“讨伐”案。所有这一切主客观原因，造成了“二次革命”的失败。“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逃亡日本，但继续坚持反袁斗争；黄兴则远走美国，更加右倾妥协。

袁世凯在镇压“二次革命”后，便全力对付国会和《临时约法》，“力谋国权之统一”。^①他在“二次革命”期间和稍后，没有

^①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120页。

立即解散国会和内阁，这是因为他还要暂时利用一下国会把他推上“合法”的正式大总统的宝座，还想要利用内阁来部署他解散国会的命令。于是，他一方面收买、分化国民党议员，使国民党分裂为各种小集团；另一方面则利用进步党人。一九一三年七月，他任命进步党熊希龄组织内阁。九月，内阁正式组成，其中包括有进步党人梁启超、张謇等人，号称“第一流人才内阁”，实则用以欺世惑人。

熊希龄内阁组成后，接着演出了一场选举总统的丑剧。本来国会于一九一三年四月召开后，应该先制订宪法，然后依据宪法选举总统。但袁世凯却迫不及待地要做总统，而对制订宪法并不感兴趣。他指使其党徒、各省都督，由黎元洪领衔通电叫嚷：先选总统，后制宪法。同时他又乞灵于帝国主义，说什么不先选出总统就得不到列强的承认，而帝国主义也就作出这一姿态，支持袁世凯的阴谋。就这样，国会议员们在袁世凯的威胁利诱下，居然先炮制出一个《大总统选举法》。袁世凯急于要在武昌起义三周年时登上总统宝座，于是胁迫国会匆忙在十月六日投票选举。他怕国会中的进步党议员靠不住，就先指使他的亲信梁士诒高价收买一批议员组成“公民党”，作为选他做总统的御用工具。十月六日这天，袁世凯派便衣军警、地痞、流氓数千人，打着“公民党”旗帜，把选举会场包围得水泄不通，声称：“非将公民所瞩目的总统选出，不许选举人出会场一步！”议员们从上午八时到下午十时，共十四个小时被包围在会场里，饿着肚子，连续投票三次，最后好不容易选出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公民党”才欢呼雀跃而去。

袁世凯被选为正式大总统后，国会对他不再有用，于是就转而废弃国会。十月十日，他在宣誓就任正式大总统时，宣言要

为集权专制而“修明法度，整饬纪纲”。^①他攻击国会是“暴民专制”^②，胡说什么国会继续存在，“政权无由集中”^③，“不宜于统一国家”。^④政权如果不集中到他袁世凯手里，就会“贻害全国”，“转至乱亡”。因此，“议会政治之万不宜于今日之中国也”。^⑤十一月四日，他借口国民党议员与“二次革命”有牵连，下令解散国民党，撤消国民党议员资格，派出军警连夜追缴他们的议员证书、徽章。这样，国会议员被逐者超过半数，已不足开会法定人数，国会事实上被扼杀。在国会无法活动以后，袁世凯制造了一个御用机构“政治会议”，由他指定一些军阀官僚、封建余孽和进步党人组成，作为其反动统治的遮羞布。一九一四年一月十日，经这个“政治会议”议决，由袁世凯正式宣布命令，解散了国会。国会从选举袁当大总统到被袁解散，时间仅三个月。随后，袁世凯又下令撤销各省省议会，停办地方自治。这样，象征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国会以及各地有关机构就被袁世凯一扫而光。在这些都办妥之后，给袁世凯副署反动命令的熊希龄内阁，也就失去了效用，于一九一四年二月被袁世凯一脚踢开。

袁世凯在当上正式大总统并解散国会之后，立即转过手来向《临时约法》开刀，要求“政治会议”修改约法。这个御用工具马上议决，并于一九一四年二月召开一个新的造法机构“约法会议”，这个同样由地主、官僚、买办、军阀和进步党人拼凑起来的班子，连忙炮制了一个迎合袁世凯独裁专制的《中华民国约法》。一九一四年五月一日，由袁世凯正式公布。这个袁记“约法”把总统的权力扩大到和君主专制时代的皇帝一样，规定在总统府下设政事堂，大总统下设国务卿，作为辅助总统的办事机构和人员。据此，袁世凯立即设立政事堂并任命他的心腹清末军机大

^{①②③④⑤}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101、121、111、122页。

臣徐世昌为国务卿，资产阶级的内阁制完全被取消。按照袁记“约法”规定，成立“参议院”代行立法之权，“参政”全由袁世凯任命，七十个“参政”中尽是一些封建余孽、进步党人、反动政客等。六月二十一日，袁氏“参议院”成立，黎元洪任院长。这个“参议院”又制定了一个“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可以无限期连任，而且被选举人由现任总统推荐。这样一来，袁世凯不仅可以终身担任总统，而且还可以把他的子孙推荐为总统候选人，由袁家后代世袭总统。这正如毛主席所说：“他们和专制皇帝有什么分别呢？他们的宪法也好，总统也好，都是假东西。”^①

袁世凯解散了国会，废弃了《临时约法》，就把辛亥革命后仅存的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形式也彻底消除了，建立起了他的专制独裁统治。这样，“中华民国”只是虚有其表的一个招牌了。正如当时的一首诗所说的：“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②至此，袁世凯已经集中全部权力，扫除了政治障碍，为帝制复辟铺平了道路。只要摘掉“民国”这块招牌，帝制时代即可复现。

二、投靠洋大人，充当儿皇帝

袁世凯从其大半生的反革命经历中懂得，自己之所以能够由清朝的一个无足轻重的奴才爬到民国总统，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得到了帝国主义的支持。如今要实现专制独裁、复辟帝制的阴谋，那就更需要帝国主义的大力支持了。于是，他利用“大总统”至高无上的地位，肆无忌惮地出卖国家民族利益去换取帝国主义对他进一步的支持。

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毛泽东选集》第694页。

② 蔡济民：《书愤诗》，一九一二年九月十三日《民主报》。

一九一二年三月，袁世凯刚当上临时大总统，就急急忙忙地发布了一道《通飭保护外人文》，声言“敦睦”（即卖国）邦交是北洋军阀政府的对外方针，要各地官吏和驻军“切实保护”所有外国在华的“生命财产”，要用武力防止人民群众的革命活动触犯帝国主义的利益。^①四月，袁世凯在参议院发表宣言，无耻地恭维在辛亥革命中乘机敲诈勒索中国人民的各个帝国主义是什么“悉皆和平中正”，对这些“友邦”的“睦谊”和“赞助之诚”，表示感激涕零；大肆叫嚷什么对帝国主义要“以开诚布公、巩固邦交（即卖国）为重。凡从前缔结之条约，均当切实遵守，其已缔结而未办之事，迅速举办。”^②袁世凯为了避免触犯洋主子，特地发布命令：“禁止报纸对外国公使作任何攻击。”^③这还不够，袁世凯在一九一二年十月，再次发布宣言，公开宣布要把中国全国利权彻底向帝国主义“开放”，借以同帝国主义“沟通感情”，还极其无耻地吹嘘这种卖国主义的做法，是什么“效法列强先进之精神”。^④这样，袁世凯一上台就亮了相，即要自动做帝国主义温顺恭敬的奴才。一九一三年，袁世凯为了求得帝国主义支持镇压“二次革命”，特地向各国驻京公使表示，他的政府的一贯态度是“力求所以贻外人之望”。^⑤一九一三年十月，袁世凯当上正式大总统后，更宣告与帝国主义讲“敦睦”，讨取洋主人的欢心和支持，是他的政府对外政策的“唯一之基础”。^⑥总之，袁世凯为了搞专制独裁、进而登上皇帝的宝座，在对内残酷镇压人民群众的同时，对

① 袁世凯：《通飭保护外人文》，《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2，第3页。

② 袁世凯：《莅参议院宣言》，《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首，第4页。

③ 《德国外交文件中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3卷，第344页。

④ 袁世凯：《国庆纪念日宣言》，《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首，第11页。

⑤ 袁世凯：《通告各国公使书》，《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5，第7页。

⑥ 袁世凯：《答外交团颂词》，《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首，第27页。

外竭力推行崇洋卖国的投降主义路线，不惜把中国的大好河山作为投靠洋大人的贡品。

一九一四年八月，帝国主义国家爆发了重新瓜分殖民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时，西欧帝国主义国家忙于狗咬狗的互相厮杀，暂时无暇东顾。日本帝国主义便趁机扩大其侵略势力，妄图变中国为它独占的殖民地。它以对德宣战为借口，出兵山东，占领德国租借中国的胶州湾和胶济铁路沿线各地。日本得知袁世凯想当皇帝，便由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暗示支持并趁机要挟，于一九一五年一月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袁承认。当日置益手递条文的时候，曾对袁世凯说：“若开诚交涉，则日本希望大总统再高升一步”。这就是说，你袁世凯不是想当皇帝么，日本是赞成的，但必须承认这个“二十一条”。卖国贼袁世凯笑纳条约，低首而退。

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共分五号：

（1）承认日本享有原德国在山东侵占的一切权利，并加以扩大；

（2）延长日本租借旅顺、大连两港和南满、安奉（丹东至沈阳）两铁路期限为九十九年，承认日本在东三省南部及内蒙古东部的特权；

（3）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附近矿山不准公司以外的开采；

（4）中国沿海港湾岛屿只能租借给日本，概不让予第三国；

（5）中国政府必须聘请日本人作政治、军事、财政顾问，中国警政和兵工厂由中日合办，日本有在武昌和九江、南昌间，南昌和杭州间，南昌和潮州间的筑路权，有在福建省内进行铁路、矿山等投资的优先权。

这些条件实际上是要把中国的广大地区和中国政府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变中国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要袁世凯充当日本卵翼下的儿皇帝。

当日本强迫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时，俄国积极支持日本的侵略行径，并向日置益提供有关情报，充分暴露了沙俄的侵略本质。

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要袁世凯保守秘密并全部接受。经过几个月谈判，日本于五月七日提出最后通牒，限四十八小时内答复。袁世凯复辟帝制心切，于五月九日，除第五号“容日后协商”外，全部承认。

除此之外，大卖国贼袁世凯为了实现其专制独裁和当儿皇帝的迷梦，还先后和俄、美、日、英等帝国主义国家签订过一百多个不平等的合同、协定和条约，大借外债、拍卖税收、铁路、矿山和领土等主权，以换取帝国主义主子的支持。

由此不难看出，近代中国反动派的复辟活动，是同卖国活动紧紧结合在一起的。复辟狂也必然是卖国贼。

袁世凯竭力推行投降主义路线，大肆拍卖国家主权的活动，使帝国主义主子体会到：袁世凯确实是一个比清政府更合心意的忠实走狗。因此，美、日、英、俄、德等帝国主义回过头来，对于奴才袁世凯的反革命复辟事业竞相支持，以便通过袁世凯在中国捞取更大的利益。

在经济上，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实行专制统一需要反革命军费，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立即送去二千五百万英镑的巨款。袁世凯图谋恢复帝制派儿子袁克定到德国活动，德皇威廉二世立即表示支持，并写密信给袁世凯，答应“财政器械给以大力援助”。

在军事上，袁世凯“围剿”白朗起义军，一九一四年二月间，俄、美、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马上派军事人员到河南信阳等地“观战”，并出谋划策，要“中国政府宜用飞机抛掷炸弹、电石，将‘匪军’全部一举剿灭”，假若“中国无此等飞行家，可向外国聘任之”。^①沙皇俄国立即派出了飞行员协助袁世凯对白朗起义军进行狂轰滥炸。

在政治上，袁世凯要当正式大总统，帝国主义“外交团”表示这是“能为中国开始一新幸福时代之先步”，“各国于此举，亦利助成”。^②袁世凯要恢复被推翻的君主专制制度，梦想当皇帝，帝国主义立即表示支持。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屡屡传言：“中国应该有皇帝”，“袁大总统可以放心进行”；英国赞同说：“若中国无内乱，则随时可以实行”帝制复辟；美国声称：“亟盼”帝制运动“能在短期内顺利完成”，并派古德诺在袁世凯身边充当顾问，公开鼓吹帝制。美国传教士李佳白也竭力帮腔鼓吹，说：“治理中国永久之政策，舍专制必无适宜之体”^③。他还上书支持袁世凯“为君主之治”^④，当中国的大皇帝。沙俄则尽力帮助袁世凯镇压人民革命，为帝制复辟扫清障碍。



袁世凯亲往德国使馆
进行勾结的丑态

① 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大公报》。

② 《外交团谒见颂词》，《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首，第28页。

③ 李佳白：《中国果适用专制独裁乎？》，《尚贤堂纪事》第6期，第10册。

④ 《节录李佳白博士上大总统书》，《尚贤堂纪事》第6期，第10册。

袁世凯明明是靠大肆拍卖国家主权换取了帝国主义主子的支持，却恬不知耻地吹嘘这是自己的“外交成功”，并向各帝国主义国家感恩不尽，极力阿谀奉承：称颂美国“互相扶助之美德，长存不衰”^①；称颂日本“敦睦邻好，厚爱我中华民国有加无已”^②；称颂英国对他的支持，表示“本政府莫名欣感”^③；称颂沙俄“永矢亲睦之意”，表示“欣感良深”^④；甚至称颂日本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是“双方信好，东亚之福”。^⑤看，袁世凯奴颜婢膝、媚敌卖国到了何等地步！其实，袁世凯卖国外交的“成功”意味着什么呢？这正象列宁所愤怒谴责的：这些帝国主义列强“与那个野心家、卖国贼、反动势力的朋友袁世凯联合起来扼杀‘落后’亚洲的共和制度！”^⑥

三、掀起尊孔复古逆流

在历史上，一切已被推翻的腐朽没落阶级，总要制造反革命舆论，总是“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⑦袁世凯和一切复辟派一样，为了实现专制独裁、复辟帝制的阴谋，一上台，就立即抬出孔老二的亡灵，刮起尊孔复古的妖风。

一九一三年六月，袁世凯发布《通令尊崇孔圣文》，狂叫：“天

① 袁世凯：《致谢美国承认中国民国书》，《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首，第14页。

② 袁世凯：《答日天皇祝词》，《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首，第18页。

③ 袁世凯：《答英国公使呈递国书颂词》，《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首，第18页。

④ 袁世凯：《答俄国公使呈递国书颂词》，《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首，第23页。

⑤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146页。

⑥ 列宁：《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列宁选集》第2卷，第450页。

⑦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一九六六年八月九日《人民日报》。

生孔子，为万世师表”；孔学如“日月之无伤，江河之不废”；孔孟之道是“国家强弱，存亡所系”。因此，他袁世凯的中华民国，要“根据古义，将祀孔典礼，折衷至当，详细规定，以表尊崇，而垂久远”。^①一九一四年一月，袁世凯指使他的御用机构“政治会议”，通过了祭天、祀孔两个议案。下令全国一律施行祀孔典礼。北京文庙由大总统主祭；各地文庙由地方官主祭。这年的九月二十八日，袁世凯身穿离奇的古衣冠，亲率文武百官到孔庙，大行三跪九叩礼，演出了民国以来第一次祀孔朝圣大丑剧。十二月二十三日，袁世凯又穿起特制的古怪祭服，亲率百官拥进北京天坛进行祭天活动。这一年，袁世凯还发布《崇圣典例》，给孔老二的子孙后代加官晋爵，让他们仍旧享受清朝封建专制时代的“荣典”。一九一五年二月，袁世凯通令全国学校恢复被南京临时政府废止的“尊孔读经”，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把“尊孔尚孟”列为“教育要旨”。

袁世凯一面通过他所控制的政权大造尊孔声势，一面网罗社会上的封建余孽、军阀、官僚、反动文人等反动势力，借用孔教会社的力量，充当吹鼓手。

一九一二年夏，保皇派头子康有为从国外写信给他的弟子陈焕章、麦孟华，要他们在上海筹组“孔教会”。在帝国主义分子、传教士李佳白支持下，他们与清朝“遗老”沈曾植、梁鼎芬等于十月七日在上海组织起“孔教会”，袁世凯政府立即批准立案，并称赞说：“该会阐明孔教，力挽狂澜，以忧时之念，为卫道之谋，苦心孤诣，殊堪嘉许。”^②一九一三年九月，孔教会在曲阜召开第一次全国大会，袁世凯对参加这次会的人给以“核减车价”的优

^① 袁世凯：《通令尊崇孔圣文》，《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2，第51页。

^② 《教育部批》，《孔教会杂志》第1卷，第1号。

待。在这次会议上，推康有为任总会长，决定将总会迁往北京（次年又迁曲阜），并印行《孔教会杂志》。袁世凯赞助支持孔教会的尊孔活动，其目的是想加以笼络，把它拉入自己的怀抱，为我所用。但袁世凯搞专制独裁、帝制自为和孔教会拥溥仪复辟的宗旨有分歧。因此，袁世凯对孔教会存有戒心，于是，他指使亲信于一九一三年四月，在北京另立“孔社”，以徐世昌为名誉社长，徐琪、饶智元为正副社长，印行《孔社》杂志，设立什么“博闻图书馆”、“信古传习所”，并大搞什么孔老二的“诞生纪念会”等等。袁世凯对这些活动或派代表参加，代为致辞，或捐助款项，给以支持。“孔社”并在各地设立分社，成为由袁世凯直接操纵的全国性的御用尊孔工具。此外，一九一二年，王锡蕃等在济南成立“孔道会”，次年移北京，推冯国璋为名誉会长，康有为为会长。一九一二年六月，赵戴文等在阎锡山指使下组织“宗圣会”。一九一三年九月，沈维礼等人上海发起成立“寰球尊孔总教会”，得到黎元洪的支持。一九一五年八月，大劣绅、反动文人叶德辉在长沙成立“经学会”，鼓吹尊孔读经。这批反动家伙对辛亥革命、共和制度仇恨至极。康有为在武昌起义后不久就咒骂共和“为暴民无政府之政，可以亡国，今共和告成数月矣，惨状弥布”。^①在一九一三年二月，他主办了反动刊物《不忍》杂志，在创刊序言中，他猖狂喊叫对辛亥革命的一切都“不能忍”，大肆攻击辛亥革命造成了“举国礼坏乐崩，人心变乱”^②的局面，狂吠什么“自共和以来，教化衰息，纪纲扫荡，道揆凌夷，法守隳斲，礼俗变易”^③，胡说“共和政体不能行于中国”，“中国今日之时，无立民

① 康有为：《中华救国论》，《民国经世文编》第2册。

② 康有为：《议院政府无干预民俗说》，《不忍》第2册。

③ 康有为：《中国学报题辞》，《不忍》第2册。

主之理也”。^①他还配合袁世凯的反攻倒算，恶毒咒骂秦始皇“以六经为无用，而焚书坑儒”，“不行仁义，此秦所以亡也”。他攻击法家的法治路线是：“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其祸倍甚”。^②劳乃宣在辛亥革命爆发后，就在《民是报》上抛出《共和正解》，疯狂反对共和制度。一九一四年，他更诬蔑辛亥革命建立的共和制度是“三纲沦，九法斁，千圣百王相传之遗教，扫除破坏，荡然无复几希之存”。叫嚷什么“纲常名教，中国数千年相传之国粹，立国之大本”^③，必须恢复才不至于亡国。

这批妄图开历史倒车的封建余孽，疯狂吹捧孔老二，妄图把孔孟之道奉为“孔教”，当作他们的救命稻草。康有为在《不忍》杂志抛出“宪法草案”，主张“以孔教为国教”，胡说什么“有孔教乃有中国，无孔教是散中国矣”。一九一三年八月，陈焕章、梁启超、夏曾佑、王式通等以孔教会名义，向参众两院提出“请定孔教为国教”的请愿书，因遭到全国舆论的反对，而未能得逞。但是，这帮尊孔小丑并不甘心失败，他们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支持下，仍然大搞尊孔活动。各地的尊孔团体和黎元洪、冯国璋一类军阀官僚也都写黑文，发通电，大造“孔教”的反革命舆论，刮起一阵阵阴风。

这伙反动分子还在各地上演“祀孔”丑剧。一九一三年二月，扬州“尊孔崇道会”在孔庙祭孔，与会的牛鬼蛇神丑态百出，“大半苍苍白发，豚尾犹存，其行礼时，均三跪九叩首”。^④同年九月三日，孔教会在北京国子监举办“秋丁祀孔”，又在曲阜“祭

① 康有为：《救亡论》，《不忍》第7册。

② 康有为：《中国颠危误在全法欧美而尽弃国粹说》。

③ 劳乃宣：《续共和正解》，《桐乡劳先生遗稿》卷3。

④ 一九一三年三月一日《民主报》。

孔”。九月二十八日孔丘生日，在国子监举行“祭祀典礼。鲁迅在日记中曾辛辣地嘲骂了这出“祭孔”丑剧：“至者仅三四十人，或跪或立，或旁立而笑；……顷刻间便草率了事，真一笑话。”^①

袁世凯一伙和这帮封建余孽大刮尊孔反法妖风时，尽管他们在拥立谁当皇帝这一点上的意图并不一样，但其反革命目标是相同的，都是想利用孔老二这块“敲门砖”来敲开复辟之门。因此，他们彼此配合，互相呼应。袁世凯指使怂恿下掀起的这一阵阵尊孔反法的恶浪，是为袁世凯搞专制独裁、复辟帝制鸣锣开道的。

袁世凯是怎样利用孔孟之道作为搞专制独裁、复辟帝制的思想理论武器的呢？

第一，以孔老二的“克己复礼”作为开倒车、搞复辟的反动政治纲领。

袁世凯上台不久，就首先恶毒污蔑和猖狂攻击资产阶级革命派推翻帝国主义走狗清朝、创建资产阶级共和国、反对袁世凯专制独裁统治的革命行动，是什么“越礼”。^②他大肆散布“今不如昔”的滥调，攻击辛亥革命后的中国是“波邪充塞，法守荡然”^③，“纲纪隳丧，流弊无穷”^④，“几成为土匪禽兽之国”。^⑤怎么办？袁世凯提出“欲遏横流，在循正轨”^⑥，要“循礼”。他说：“本大总统深惟中华立国，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经，……惟愿全国人民恪循礼法，共济时艰”^⑦；必须“恢复（旧）

① 《鲁迅日记》上册，第73页。

②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68页。

③⑥ 袁世凯：《通令尊崇孔圣文》，《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2，第51、52页。

④⑦ 袁世凯：《通令国民尊崇伦常文》，《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2，第17、17—18页。

⑤ 《政府公报》第642号，一九一四年二月二十日。

秩序……非此无以靖地方，亦非此无以立国也”。^①显而易见，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代表袁世凯为了向辛亥革命实行彻底的反攻倒算，把孔老二的“克己复礼”当成他“立国”、“恢复秩序”即搞专制独裁、复辟被打倒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反革命政治纲领。由此，袁世凯提出了“道德为本，法律为用”^②的反动口号。所谓“道德为本”，就是把孔老二那套“克己复礼”、“忠信孝悌”的伦理道德，作为立国的根本。所谓“法律为用”，就是用封建统治阶级的法律作为镇压革命和统治人民的手段。袁世凯说：“奉公守法者则为是为善，越礼犯上者则为非为恶。”^③他把“循礼”还是“越礼”，作为“是非善恶”的标准，要人们去奉他袁世凯之“公”，守他袁世凯之“法”，规规矩矩地听候他的摆布，让袁世凯放肆地搞反革命复辟活动。相反，谁要是维护辛亥革命中出现的资产阶级共和制度，反对尊孔复辟，那袁世凯就可以给你横加一条罪名，叫做“越礼”。而“越礼”就是“为非为恶”，他袁世凯为了捍卫孔孟的“圣训”，就要镇压你。袁世凯就是这样打着“克己复礼”的破旗，向广大的革命人民疯狂进行反攻倒算、搞反革命复辟的。

第二，叫嚷孔孟的“大一统”、“定于一”，借以实现专制独裁和复辟帝制。

袁世凯为了实现反革命的“大一统”和反革命的“定于一”，又从孔孟的“经典”中寻找理论根据。他宣称：“《春秋》著‘大一统’之文，孟子垂‘定于一’之训，微言大义，深入人心”。他说：孔孟的“大一统”、“定于一”的“圣训”，与近代资产阶级法学家所说

① 袁世凯：《通告各国公使书》，《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5，第6页。

② 袁世凯：《莅任正式大总统宣言》，《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首，第6页。

③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68页。

的“统治权‘唯一不可分’之原则，实为先后相符”。袁世凯强调：综观历史，“断未有政权能一，而其国不治，亦未有政权不一，而其国不乱且亡者！”^①按照袁世凯的这个反革命逻辑，除了全部权力都统一到他的手里，中国就再没有出路了，“统一”是他的“救国万应丹”。因此，作为国家的头目，他应该“总揽统治权”，“力谋统一”。^②袁世凯还无耻地宣称，即使他复辟封建帝制，“去共和之余毒，复古国之精神”，其目的也无非是使以后的国家“定于一统”。^③可见，袁世凯所要求的“统一”，绝不是中国人民的统一，绝不是中国民族的统一，而是封建买办阶级反人民、反民族、反革命的统一。谁要是反对袁世凯的反革命统一，袁世凯就可以打出“卫道”的黑旗，给你扣上“破坏统一”^④的“暴徒”、“叛兵”、“乱党”^⑤的罪名，然后“用兵定乱”。^⑥袁世凯武力镇压“二次革命”，就是身体力行了《春秋》“大一统之义”。袁世凯搞帝制复辟，准备让他的子孙世袭罔替，就是身体力行了孟轲“定于一之训”，将统治权定于袁氏一家之手。袁世凯就是这样引证孔孟之道的“大一统之义”、“定于一之训”，来“证明”自己搞专制独裁“家天下”的必要性。

第三，宣扬“忠信笃敬”、“礼义廉耻”，奴役人民，驱使其爪牙为自己搞专制独裁、复辟帝制卖命。

袁世凯一再叫嚷要以孔老二的“忠信笃敬”、“礼义廉耻”作为“民国”的道德标准。袁世凯特别强调说：“忠之为义，亘古不

①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121、122页。

② 袁世凯：《通告各国公使书》，《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5，第6页。

③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320页。

④ 袁世凯：《莅任正式大总统宣言》，《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首，第6页。

⑤⑥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51、57页。

废”，即“效忠于君”，“效忠于国”。^①也就是说，全国的官民，要效忠于地主买办阶级专政的反动国家，要效忠于他这个反革命头子，要效忠于他复辟的反革命事业。袁世凯在他所控制的北洋军这支反革命武装中，千方百计地树立他的个人权威。他的死党向士兵灌输袁世凯是他们的“衣食父母”，是升官发财的靠山。甚至还在各营中设立袁世凯的长生禄位牌，要士兵供奉。

袁世凯专门颁行了《告诫军人训条》，强迫官兵遵行。其中第一条规定就是军人要“本忠诚，守信义”。^②袁世凯在《告诫军人训令》中要求军人严于“克己”，做到“四毋”：“毋出位以侵权，毋忘分而旷职，毋逞忿以轻生，毋苟全以惜死。”^③

袁世凯对“陆军模范团”的成员更是竭力灌输孔老二的“臣事君以忠”的思想，来培养对袁家父子的“忠心”。

袁世凯就是这样利用孔孟之道这一腐朽没落的剥削阶级意识形态，来奴役和镇压人民，培养为专制独裁、帝制复辟效劳的忠实爪牙。

第四，扯起“天才论”、“天命论”的破旗，为登上皇帝宝座制造舆论。

袁世凯为了实现帝制复辟的阴谋，还求助于孔孟之道的“天才论”、“天命论”。为了把自己装扮成“真命天子”，他特地征引了儒家“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④，“天生民而之君，使司牧之”^⑤的反动谬论，要人们相信他的复辟帝制“盖有天命，非人力所能施”，而且天老爷这种意志是“久稽”

① 袁世凯：《通令整肃官箴文》，《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2，第72页。

② 袁世凯：《告诫军人训条》，《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2，第30页。

③ 袁世凯：《告诫军人训条》，《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2，第28、29页。

④⑤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285、322页。

（长久拖延）不得的，现在他就是秉承“天意”，象牧养牛羊一样地来统治人民的。^①他无耻地宣称：“国体既定帝国，帝位必归圣人”。“圣人”又是谁呢？当然是袁世凯自己了。请听袁世凯的自吹自擂：“四年以来，国家多故，拯民水火，登之衽席，我四万万蒸黎身家子姓，实托我大总统一人之覆帔！”^②大有孟轲当年所说的“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③的派头。

袁世凯批阅审定的、由杨度公开发表的《君宪救国论》，更是拚命宣扬“上智与下愚不移”之类英雄创造历史的反动唯心史观，吹捧袁世凯是什么“盖世英才”。^④因此，由他这个“天才”来当皇帝，自然是“顺应天人”、“承天建极”^⑤了。袁世凯不仅胡说自己“是天才”，应该当皇帝，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而且认为自己的儿子和老子同一个血统，也是“天才”、“全才”，应该享有老子同样的特权当皇帝，“父传子，家天下”，“传之万世”^⑥，世袭罔替。

第五，鼓吹孔丘的“大同”，为媚敌卖国寻找借口。

袁世凯为了给其卑鄙的卖国行径寻找借口和遮羞布，又无耻地打出孔孟“小国师大国”的反动旗号，作为他卖国投降的理论根据。他在一九一三年十月《莅任正式大总统宣言》中说：“孔子喜言大同”。“凡我国民，既守本国自立之法律，尤须知万国共同之法律，与各国往来，事事文明对待，万不可有歧视外人之意见，致生障碍，而背公理”。要切实承认清政府与外国签订的一切卖国条约。“凡我国民，当知此为国际上当然之理”。^⑦在同

① 孙曜：《中华民国史料》中册，第74、75页。

②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287—288页。

③ 《孟子·公孙丑下》。

④⑤⑥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181、288页。

⑦ 袁世凯：《莅任正式大总统宣言》，《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首，第8—9页。

年的《通令尊崇孔圣文》中，袁世凯还鼓吹：“孔学博大，与世推移。……以天下为公为大同。”^①在这里，袁世凯用封建卫道士加买办洋奴的语言，大谈孔老二的“大同”说教，并以此为根据制造了所谓“文明无国界”的谬论，把出卖祖国主权说成是“当然之理”，把承认和签订卖国的不平等条约说成是同帝国主义“礼尚往来”。袁世凯这样胡诌的险恶用心究竟是什么呢？其一，他妄图使中国人民本着所谓“大同”之教，服服帖帖地遵守帝国主义在中国建立的半殖民地统治秩序，毕恭毕敬地给帝国主义当奴隶，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不能有丝毫的不满表示，更不能进行反抗斗争；其二，要使他自已如同那拉氏一样，“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使帝国主义强盗为所欲为地践踏中国的国家主权，把中国“公”之于国际帝国主义，成为任其宰割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

袁世凯的尊孔活动得到了帝国主义的积极支持。披着传教士外衣的美国侵略分子李佳白，在上海开办的“尚贤堂”中，特增设“国粹科”，聘孔教会发起人之一姚丙然为该科教务长。一九一二年九月在孔教会开场前夕，李佳白即拉引孔教会发起人陈焕章在“尚贤堂”讲演“孔教论”。孔教会出场后，李佳白立即捧场，于十一月间刊行陈焕章的《孔教论》，并与李提摩太一起撰写序言，大加喝采。李佳白在一九一三年又出版《尊孔》一书，胡说什么“孔教昌则民国愈固”。在孔教会大肆鼓吹“明定孔教为国教”时，李佳白立即配合发表《读孔教会请愿书》，肆口胡言：如果不定孔教为国教，“大非民国前途之福”。^②他还卖力宣扬读经，说什么“见华人倡言废经，极其骇惶，幸有恢复读经之议，并自基

^① 袁世凯：《通令尊崇孔圣文》，《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2，第50页。

^② 《孔教会杂志》第1卷，第8号。

本小学起”。^①沙俄贵族、文化特务盖沙令，于一九一二年窜到中国，先后在青岛、北京、上海等地与那些封建余孽、复辟分子相勾结。他到处发表尊孔演说和文章，恶毒攻击说：“今之最险者”就是“孔教或被废弃”，并胡说什么孔孟之道是“中国独一无二之根本也。国家新命之所托，舍孔教奚属哉？”这个沙俄侵略分子到处鼓吹尊孔，妄图扼杀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他狂喊乱叫：只有尊孔，才能实现中国“古道之复兴”，才不致“人人之心皆为革命所颠倒”。^②这个沙俄反动家伙还特别鼓吹孔老二的“礼”，说“礼”是“孔学之花”。并向袁世凯献策：你要想当皇帝，“首要问题……就是乞求孔夫子的权威”，从而“达到”你所切望的“一切改革”^③，明目张胆地鼓动袁世凯之流要死抱住孔老二“克己复礼”的纲领，借助于孔老二的幽灵，以达到其复辟的目的。德国侵略分子卫礼贤，于一九一三年“协助”钻在青岛的一些清朝“遗老”，创设“尊孔文社”。袁世凯的日籍顾问有贺长雄和美籍顾问古德诺都鼓吹尊孔，参加“祭孔”活动。有贺长雄还发表《宪法须规定明文以孔教为国家风教之大本》的黑文，配合孔教会的活动。

帝国主义这些洋儒们支持中国的封建复辟派，大搞尊孔活动，就是妄图用孔孟之道这剂鸦片烟来麻醉毒害中国人民，以期达到侵略中国的目的。李佳白供认不讳地说：“采用中国方法，讲中国经书，能使华人反教仇外之趋向渐次消灭，且以得着中国许多有势力之朋友。”^④

① 李佳白：《论小学读经》，《国际公报》，一九二五年。

② 盖沙令：《论孔教乃中国之基础》，《中国之新命必系于孔教》，《孔教会杂志》第1卷，第1号。

③ 盖沙令：《一个哲学家的旅行日记》第2卷（一九一四年）。

④ 《李佳白博士重述其对于中国之友谊计划》，《国际公报》第5卷，第45、46号合刊。

不难看出，孔老二这具政治僵尸，不仅具有封建性的品格，而且还具有买办性的品格，一身二任。中国的反动派想利用孔老二这块敲门砖来敲开他们的复辟之门，利用孔孟之道这块遮羞布来投降卖国。而外国侵略者则想利用这块敲门砖来打开侵略中国之门。正因为如此，袁世凯的尊孔复辟、尊孔卖国与帝国主义的尊孔侵华又结合了起来。而袁世凯遂成为尊孔、卖国、复辟三位一体的可耻典型。

四、“洪宪帝制”丑剧

袁世凯在镇压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和各地农民的反抗斗争，破坏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大肆制造了尊孔复辟舆论，并取得了帝国主义的支持以后，就加紧推进帝制复辟阴谋。一九一四年二月，他开始举行县知事考试，恢复封建时代的考试制度。三月，他制订公布了《觐见条例》，恢复了封建皇帝的“陛见”制度。七月，他恢复封建时代的各种官制，将辛亥革命以来各省的都督改称“将军”，在北京设“将军府”由段祺瑞主管；各省民政长改称“巡按使”，各地区观察使改称“道尹”。七月二十八日，他公布《文官官秩令》，把文官分为卿、大夫、士（各又分上、中、下）九等，总统府秘书也改称“内史”等等。各种官职名称古色古香，上面只欠一个皇帝了。

袁世凯把这一切安排就绪后，他那复辟帝制的丑剧就接连上演了。一九一五年八月，首先由袁世凯的政治顾问、美国人古德诺发表一篇《共和与君主论》的奇文，作为袁氏帝制丑剧的开场锣鼓。古德诺以所谓“总结”中外历史经验为名，歪曲历史，借古讽今，恶毒诬蔑中国“大多数之人民智识，不甚高尚，……故无

研究政治之能力。四年以前，由专制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难望有良好之结果也。”他还胡说什么：“中国百姓，习于君主，鲜有知大总统者，故君主恒为人所尊敬”。他的结论是：“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这是唯一的出路，否则“断无善果”。^①紧接着，又由袁世凯的顾问、日本人有贺长雄抛出了《共和宪法持久策》的黑文，恶毒诬蔑中国人不适合共和政体，鼓吹君主实较民主为优，中国必须象日本那样实行君主制，集权于袁世凯一身，国家才不会分裂等谬论。两篇黑文，一个腔调，就是公开鼓吹由袁世凯作统治中国人民的皇帝，才是“适宜”的，“名正言顺”的。袁世凯把这些公开策划恢复帝制的谬论视为至宝，不惜血本，用巨款买下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的一个版面，专供这两个吹鼓手大放厥词、大造复辟帝制的反革命舆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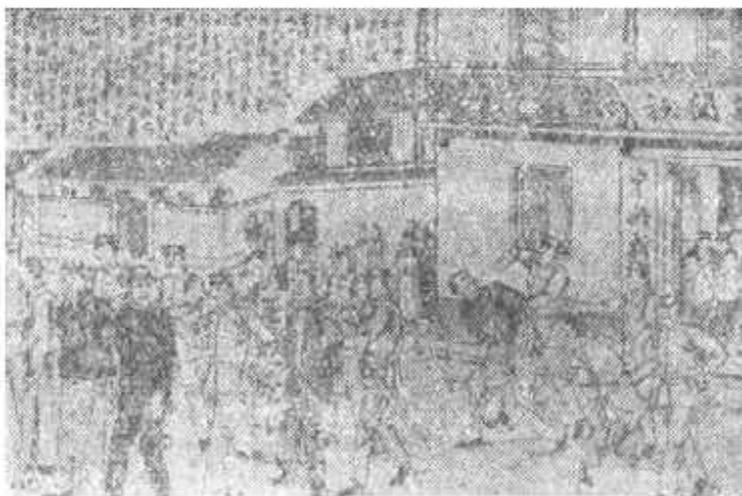
紧跟洋博士后面，袁世凯的御用爪牙也如蝇逐臭，鼓噪而起。一九一五年八月，在袁世凯的授意下，为袁世凯所收买的反动政客杨度、老君主立宪派严复和同盟会叛徒孙毓筠、胡瑛、李燮和、刘师培等人，组成了所谓“筹一国之治安”的“筹安会”（后改名为“宪政协进会”），假借研究学术为名，公开宣传、策划帝制复辟。他们在成立宣言中，对古德诺“君主实较民主为优”的复辟舆论大加赞扬，吹嘘古德诺是“大政治学者”，他对中国应该实行君主制的主张，是“以共和国民，而论共和政治之得失，自为深切明著”；大肆诬蔑共和国体不适合中国“国情”，悍然宣称“中国则尤不能不用君主政体”，如果“长此不图，祸将无已”。^②“筹安会”还打着儒家所谓“拨乱世反诸正”的破旗，提出立国之道不外二端，首是“拨乱”，次是“求治”。妄称共和制度不能求治，反而

^{①②}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170、171、172、173、174—175页。

滋乱。提出中国“拨乱之法，莫如废民主而立君主。求治之法，莫如废民主专制而行君主立宪。”^①杨度还在《君宪救国论》这篇又长又臭的黑文中，为袁世凯称帝而贩卖孟轲“定于一”的黑货。他胡说什么：“所谓一者，元首有一定之人也”；“君主则有一定之元首，皆所谓定于一也。”^②露骨地鼓吹“去共和”、“求君主”，请袁世凯出来当皇帝。“筹安会”还公推孔老二第七十六代孙孔令贻为“名誉理事”，孔令贻派出“代表”参加它的一切活动，彼此狼狈为奸，充分暴露了“筹安会”的反动本质。

“筹安会”一登场就亮了相，它完全是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摇旗呐喊的哈巴狗。因此，立即遭到全国人民的激烈反对。纷纷要求取缔“筹安会”，请诛“六君子”以谢国人。并愤怒批驳那种所谓“中国不适于共和，不能不用君主政体”的反动谬论，“真狗彘不食之语也！”^③

袁世凯对人民的愤怒呼声置之不理，反而公开替“筹安会”开脱罪责，说什么：“筹安会乃绩学之士所组织”的“自由研究”机关，“政府未便干涉”。^④



袁世凯箝制言论，查封报社

袁世凯还大耍两面派手法，对天赌咒发誓说：我袁世凯对“帝王总统，均非所愿恋，汶上秋水，无时去怀！”^⑤他还装腔作势地说：

^① 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2册，第114页。

^{②③④⑤}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186、188—189、242、240、241、240页。

我“已备数椽之室于英（国）伦（敦），若国民终不见舍，行将以彼土作汶上”^①，当从此不再过问政事的隐士，以终天年。同时，袁世凯又派出武装警察严密保护“筹安会”和杨度等人的住宅，又给予巨额经费，以资活动。在这里，“筹安会”到底为谁家筹“长治久安”之策，又是为谁家所豢养，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经过“筹安会”的一阵蛙鼓鸦噪之后，袁世凯又导演了一场假造“民意”和所谓“劝进”的丑剧。

一九一五年九月一日，“筹安会”拉拢各省旅京人士拼凑了各省“公民请愿团”，向参政院请愿，要求“变更国体”，由袁大总统登极做皇帝。六日，袁世凯特派政事堂左丞杨士琦到参政院发表自己的“宣言书”。首先他假惺惺地表示：“维持共和国体，尤为本大总统当尽之职分”，现在大家“请愿改革国体，于本大总统现居之地位，似难相容”。接着，来了个大转弯，说：“然大总统之地位，本为国民所公举，自应仍听之国民”，“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②这无疑是说，我袁世凯是不想当皇帝的；如果“民意”需要我袁世凯当皇帝，那我袁某只好“自应仍听之国民”，变更国体，去登金銮宝座了。袁世凯的爪牙们，见到这个情景，都纷纷跑出来与“筹安会”争功夺宠。袁世凯的心腹宠臣梁士诒想当“新朝宰相”，在九月组织起所谓“全国请愿联合会”，逐渐取代了“筹安会”的地位，成为鼓动复辟帝制的中心。在他们的鼓动和收买下，一时间，全国各地五花八门的“请愿团”闻风而起，纷纷出笼。什么“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等等，光怪陆离，乌烟瘴气。

这时，袁世凯当皇帝的心切，但表面上又要装出尊重“民意”

^{①②}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235、257页。

的样子，于是授命代行立法院职权的参议院，就“国体变更”问题，征求国民“公意”。参议院按照袁世凯所要求的“立法贵简，需时贵短”^①的原则，于十月八日炮制了《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从十月二十五日开始选举国民代表大会代表，三天之内，各省“国民代表”全部选出。从二十八日起，开始国体投票，结果全国“国民代表”一千九百九十三人，全部赞成君主制，无一人反对。同时，各省都写有文字完全一样的推戴书：“余等国民代表，代表国民之真意，劝今大总统袁世凯，进位为帝，并授以国内至大至尊之君权，天许以此位，传其子孙，以至万世。”表面上看起来，好象是袁世凯当皇帝，真是出自“民意”，众望所归。其实这纯粹是骗人的鬼把戏。事实上，从选代表到投票，以至推戴书，全是袁氏党徒们依照主子的旨意而一手搞起来的，推戴书由他们密电全国各地，规定“此五十字，无论如何，不可更改”。^②为了达到预谋的目的，他们答应从帝国主义的借款中拿出一部分来“犒赏”这帮走狗。在这期间，一些尊孔复辟小丑也爬出来献媚。十二月五日，“孔道会”头目王锡蕃等致电“国民会议事務局”、“宪政协进会”拥袁称帝，说：“自闻君主问题之表决，皆盼我皇帝应天顺人，不日即正大位”。^③孔丘的七十六代孙、“衍圣公”孔令贻也致电袁世凯及“宪政协进会”，胡说什么：“共和国体既不适用于中华，君主立宪已征大同于民意”，“亟应早正帝位”，并且表示在登极之日孔府将“提灯庆贺”，“悬彩庆贺”。^④

仅仅“国体投票”，袁世凯还嫌不够，他授意参议院于十二月

①②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258、272页。

③ 《爱国白话报》一九一五年，第833号。

④ 《孔府档案》第6593号。

十一日以国民代表大会的名义，向他上“总推戴书”。这时他又一次施展两面派伎俩，一方面导演“劝进”，一方面又故作“谦虚”，假装不受。他搬弄孔老二那套“信义”的说教，说什么：“制治保邦，首重大信，民国初建，本大总统曾向参议院宣誓：愿竭能力发扬共和，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此于信义无可自解者也。”但是话头一转，又说：“改用君主立宪”，民意所归，“本大总统自无讨论之余地！……惟有丰功伟德者，始足以居之”。^①弦外之音就是想要参议院替他洗刷背叛民国的罪名，讴歌他的“丰功伟德”，以便在他那野心家、阴谋家、卖国贼的丑恶面孔上，涂上一层油彩，抹上一层灵光，用以欺世盗名。

袁世凯的爪牙们对主子的真实意图，自然心领神会。于是，参议院当天下午开会，仅花了十五分钟，就起草通过了二千多字的第二次推戴书送去。

这份“杰作”对袁世凯竭尽歌功颂德之能事，肉麻地吹捧他是“功崇德茂”、“迈越百王”的“圣君”。把他背叛民国、帝制自为的罪行，完全倒栽在人民的头上。说什么：“前次之宣誓，有发扬共和之愿言，此特民国元首循例之词”，是顺从“民意共和”；现在，“民意已改”，“民意君宪”，“民国元首之誓词当然消灭”，当皇帝是“以民意为准的”。共和也好，帝制也好，“凡此皆国民之所为”，跟袁“皇帝渺不相涉”，“有何嫌疑之可言”？把袁世凯美化成“无负民国”的“大忠仆”，是“千古鼎革之际，未有如是之光明正大”的伟人。^②这样，就把袁世凯的反革命滔天罪行洗刷得一干二净，把袁世凯捧上了天。这完全是颠倒是非，信口雌黄。

这时，袁世凯见他导演的戏法已经成功，该走的过场已经走

^{①②}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274、275、280、282、283页。

了，于是在十二月十二日，就高唱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予之爱国，讵在人后？”的滥调^①，接受了“推戴书”，当上“中华帝国”的皇帝。十三日他接受文武百官朝贺。十五日他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又分别封一百二十八人以五等爵位。十九日他公开设立“大典筹备处”。三十一日他下令从一九一六年元旦起改为“洪宪”元年，准备于元旦登极。袁世凯当皇帝还纪念着孔老二，一九一六年元旦，命令孔丘七十六代孙孔令贻“仍袭封衍圣公，并加郡王衔”。^②

大野心家、大阴谋家袁世凯就是这样沿着尊孔与卖国的路线，一步一步爬上了几皇帝的宝座。而袁世凯一登上“洪宪皇帝”御座，就杀气腾腾地宣布：“今日名分已定，天泽凛然，正宜严君臣上下之分，生乱臣贼子之惧，去共和之余毒，复古国之精神”。^③充分暴露出他挥舞孔孟之道的黑旗，复辟封建帝制，镇压人民的毒辣阴谋。

然而，历史的规律是无情的。不可一世的袁世凯，曾几何时想到过他的末日来临呢。其实，早在《红楼梦》里就曾给这种骑在人民头上的达官贵人和来去匆匆的历史过客谱写过一支绝妙的讽刺曲：“气昂昂，头戴簪缨，光灿灿，胸悬金印，威赫赫，爵禄高登——昏惨惨，黄泉路近！”^④如果把这支曲子当作袁世凯的“挽歌”，倒是非常恰如其分的。袁世凯尊孔、卖国、复辟三位一体“大功”告成之日，恰恰正是他走进坟墓之时。一场反尊孔复辟的革命斗争，终于在全国迅速兴起了。滚滚向前的革命洪流，

①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284页。

② 《孔府档案》第6593号。

③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320页。

④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第1卷，第63页。

很快就把袁世凯掀起的尊孔复辟逆流葬入海底了。

五、全国人民反复辟怒潮

袁世凯窃夺辛亥革命果实后，继续实行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专制独裁统治，对外投降卖国，对内镇压盘剥人民，大搞尊孔复辟，激起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无比愤怒。全国各地掀起了接连不断的反袁尊孔复辟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工农劳动群众是斗争的主力军，站在了斗争的最前列。

早从一九一二年起，各地工农群众就掀起了反抗以帝国主义走狗袁世凯为代表的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压迫的斗争浪潮。如一九一二年七月一日晚，景德镇窑工在唐桂卿率领下“密议起义”，“聚众多人，围攻宪兵营房，夺取枪械子弹”^①，并于七月三日在饶州准备大举起义。与此同时，山西浮山县爆发了“洪汉军”起义。辛亥革命后，山西人民对袁世凯、阎锡山的反动统治极为愤慨，流传着“清朝改民国，换汤不换药；百姓地狱苦，官绅天堂乐”的歌谣。七月十日，浮山农民群众在陈采章率领下，以“杀富济贫”为口号举行起义，攻破县城，处死残害人民的县知事，焚烧全县粮银簿子及大地主住房，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势力。这时，“洪汉军”发展到三千多人，在附近各县活动。一九一三年一月七日，攻克绛县东关。先后多次击败袁世凯、阎锡山调来镇压起义的反动军队，斗争一直坚持到一九一五年六月间。一九一二年的十二月七日，上海银楼雇工三千人举行罢工，但遭到当局镇压而失败。一九一三年五月底到六月初，汉阳兵工厂工人

^① 《东方杂志》第9卷，第2号。

因反抗北洋军阀政府以跌价纸币发工资而罢工，斗争取得了胜利。同年，福建莆田县数十乡群众为反抗勒索压迫，在黄濂率领下抗纳钱粮，于八月十三日在壶公山起义，先后数次击败袁世凯政府派往镇压的反动军队，并攻克仙游县。这年十月间，福建德化县群众反抗帝国主义传教士的压迫，“焚新旧教堂两座”。^①十二月八日，云南大理县清军在革命党人影响下起义，曾经“占城劫械”。这些都是在一九一二年辛亥革命后不久爆发的。在此期间，农民反袁斗争规模较大、时间较长的是白朗起义。

白朗起义是帝国主义、地主阶级残酷压迫剥削农民的结果。据调查，白朗的家乡河南宝丰和鲁山两县，由于封建压榨残酷，每年都有百分之十至二十的农民无法生活，出外逃荒，农民反抗封建压迫的斗争接连兴起。在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的同时，白朗即在宝丰县开始率领农民起义，反对清王朝的反动统治。袁世凯窃国后苛捐杂税更加酷重，农民生活极为痛苦，参加反抗斗争的越来越多。因而白朗起义队伍不断发展，活动范围日益扩大。一九一三年四月，白朗军攻克河南禹县，提出“打富济贫”的口号，附近贫苦农民踊跃参加，声威大振。接着进入豫南桐柏一带开展斗争。他们采取避开反动军队主力，在运动中打击敌人的战术，先后攻克新野、邓县及湖北随县等地，然后回师北返，攻克河南唐县、方城、卢氏等县，于十一月间攻占宝丰。在反动军队围攻下，白朗再次挥师南下，越京汉线东进，攻克商城、固始、罗山、潢川、光山等地，准备打过长江与资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反袁。他们曾与孙中山建立过联系。一九一四年一月底，白朗军攻克安徽六安、霍山。但这时“二次革命”已经失败，袁世凯控制

^① 《东方杂志》第10卷，第6号。

了长江流域，增派几省反动军队围堵白朗军，甚至出动了由沙俄飞行员驾驶的飞机。但是白朗军毫不畏惧，英勇斗争，将飞机击毁，使其“不可复用”。^①为了避开反动军队主力，白朗军于二月二十七日突围西上，三月八日，攻克鄂北老河口，歼敌两千余，打了大胜仗。并在老河口召开了军事会议，决定西走陕、甘，然后入川。这时白朗军已超过万人，经整编后向陕西进发，越过豫、陕交界的荆紫关。四月初，白朗军到西安附近，五月底进入甘肃，六月又折回河南。他们沿途遭到反动军队伏击，损失不小，也有不少人乡土观念严重，离队回乡，部队力量分散。

白朗军所到之处打击封建地主势力，帮助贫苦农民。当时，一些反动分子无可奈何地惊呼：白朗军将“殷商富户焚掠一空”^②，“令殷富输纳财物”。^③白朗军反抗封建地主压迫的斗争获得了农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他们踊跃参加白朗起义。袁世凯建立专制独裁统治后，白朗起义军自称“公民讨贼军”，提出“逐走袁世凯，设立完美之政府”^④等口号。白朗军在荆紫关曾发布布告，谴责袁世凯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反动统治是“神奸主政，民气不扬，虽托名共和，实厉行专制”。^⑤袁世凯进行帝制复辟时，白朗军在陕西曾遍贴布告，愤怒指斥“袁贼世凯，狼子野心”，“欲帝制自为”，“摧残吾民”，“是故痛心疾首，奋起陇亩”。^⑥可见，这

① 闲云：《白朗始末记》，《近代史资料》一九五六年，第3期。

② 《重修信阳县志》卷15。

③ 《东方杂志》第10卷，第9号。

④ 《白朗起义调查报告》；闲云：《白朗始末记》，《近代史资料》一九五六年，第3期。

⑤ 《北洋政府邮政总局档案》，转引自《试论白朗起义的性质》，载《史学月刊》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号。

⑥ 一九一四年四月二十四日《大公报》。

支起义军的斗争口号和目标有了进一步发展。从“劫富济贫”发展到反帝制复辟，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白朗军对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也给以沉重打击。他们焚烧了一些侵略者残害欺压人民的据点，在老河口曾将帝国主义进行经济剥削和侵略的机构——煤油公司、烟草公司等焚毁。也烧毁了一些为非作歹的传教士的巢穴，如在甘肃“焚毁岷州教会，洮州老城教会被焚一部分”。^①

帝国主义侵略者对这支农民起义军恨之入骨。当时，各国驻华公使一再敦促袁世凯政府，“迅速扑灭”，说什么“此案非与大惩创，不足以儆将来”。^②一九一四年二月间，俄、美、英、法等帝国主义派军事人员到信阳等地“观战”，研究镇压人民的方法。袁世凯政府勾结帝国主义，包括使用外国飞行员、调动了二十多万军队，血腥镇压了这次震动中外的农民起义。白朗受伤，不久牺牲。

白朗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影响却是很大的。它由开始的数百人，发展到最多时达两万人，曾转战于河南、安徽、湖北、陕西、甘肃五省，为时三年之久，沉重地打击和削弱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袁世凯的反动统治力量。

白朗起义军虽然被中外反动派所绞杀，但人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走狗袁世凯的斗争仍然此伏彼起。特别是从袁世凯政府在一九一四年颁布《验契条例》等一系列加重敲诈勒索人民的反动条例以来，全国各地农民群众以抗捐抗税的形式，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袁斗争。这个期间规模较大的斗争如下：

一九一四年二月，山东乐安县爆发了农民反抗验契的斗争。

^① 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四日《大公报》。

^② 一九一三年十月二十一日、十一月三日《大公报》。

这年初，乐安县农民群起拒绝袁世凯政府验契勒索。二月二十三日，乐安县知事亲往该县碑寺口催逼，农民聚议：“与其坐受剥削，不如打死县官，同归于尽”。遂于二十四日夜集合在碑寺口起义，“将巡警县队枪支夺去”，“所有呈验未发契纸悉付之一炬”，^①并将群众痛恨的县知事杀死。

三月六日，山西孟县群众“因抗办煤厘、验契各项，聚众暴动”，农民数千人焚毁县署及劣绅房屋。

三月八日，云南东川农民因反抗苛捐杂税，在李正品率领下起义，攻打四川会理县城，又攻占汤丹铜矿。

三月间，安徽定远县藕塘数百群众起义，号称“江淮侠义军”，攻入定远县城。

五月间，奉天安东县（今辽宁丹东）新增收牲畜税，统捐局派员四处催逼，农民“以生计困难，不堪重税，延不完缴”。县署竟派兵逮捕群众举出的交涉代表。于是乡民“鸣锣号召在铜矿岭聚众数千人”，“围攻四区警局，抢去枪枝子弹”^②，进行抗捐斗争。

六月十日，直隶临榆县农民因反抗县知事派员下乡“按户查催验契”，乃聚众进入县城抗捐，“全城因而罢市”。^③同时，永年、行唐县人民也聚众反抗苛捐，进入县城县署，“击毁公案”，“声称将摘去堂上功德牌匾额”。^④

六月间，山东、河南、江苏境内群众组织“万佛共和会”，“颇似义和团，其总会设在江苏徐州、河南淇县、山东兖州”。^⑤同时，广东西江一带亦发生农民反抗捐税起义。

八月，浙江仙居群众七千人由周文广率领，攻打县城未下。

① 一九一四年三月十四日《北洋政府胶东观察使吴永致内务部总长朱启铃函》。

②③④⑤ 《东方杂志》第11卷，第1号。

十月十一日，攻占东阳县城。

九月八日，奉天本溪群众联合会党“攻入县署，揭讨袁军旗帜，向县署警署投掷炸弹，即占领之”。^①

十一月间，广东佛山镇、电白县俱发生起义。十二月间，四川涪陵、长寿，江西万年，河南夏邑，贵州威宁、毕节、水城、大定一带，都发生群众抗捐斗争。一九一四年间，苏北海州（今东海县）、阜宁一带，聚众四、五千人活动，时聚时散，并曾与白朗军联系。

一九一五年一月，奉天新民县因反对北洋政府开办“清丈”，“乡民二、三百人，各执枪械围攻该乡清丈局，相持两昼夜”。^②

三月间，湖北乾城大王岩煤矿工人反抗压迫，“聚众罢工，其为首工人被公司拘送警署，致激众怒，群将公司焚毁，伤矿警多人”。^③

五月，河南洛宁县，八月间，甘肃宁县，也发生反抗验契税的斗争。甘肃庆阳、合水、环县等陇东各县人民掀起大规模的抗捐抗税运动。八月二十七日，环县群众在张人才率领下起义，杀死县知事，占领县城，号称“忠义军”，往攻庆阳，焚教堂二座，“聚众至数千之众”。^④同时，泾州（今泾川）乡民亦举行抗捐。

十一月二十一日，江西万载县人民“因该县办理烟酒公卖事，过于操切，致起骚动，聚众将县署捣毁”。^⑤

十二月，黑龙江宾县、阿城等地“聚众反抗”“举办清丈”。^⑥

十二月二十九日，黑龙江五常县乡民，“联合榆树、舒兰等

① 《东方杂志》第11卷，第4号。

②③ 《东方杂志》第12卷，第3、4号。

④ 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五日《北洋政府甘肃巡按使张广建致陆军部电》。

⑤⑥ 《东方杂志》第13卷，第1号。

属，到处捣毁清丈、统税、货牙各局”。^①各地纷纷响应，如阿城、海龙、西安（今辽源县）、盖平、岫岩、绥中、东丰等地人民群众，展开抗纳捐税、反抗清丈的斗争。

一九一五年冬，四川什邡、新都农民在巫人杰率领下起义，一九一六年五月攻克绵竹县城，斗争坚持到十月。

一九一六年春，在冀中爆发了“山北社”组织的反清丈斗争。五月间，最初发生于易县，因山北村民拒交果捐被拘，群众乃“散布传单，联络邻县，秘密结合。易县、涞水、涞源、涿县、房山、固安等县均已联合一起，订有合同”。他们声称：“前清退位，新政兴，诈骗杂捐层层迭出，不知如何禁止？因此各村共同商议，有事相助，有祸同挡”。^②他们结合起来，“专图抗税”，反对清丈事务所，“聚众将各事务所捣毁”，使当地清丈无法进行。

这个时期人民群众还展开了反对卖国的“二十一条”的斗争。当“二十一条”的内容和谈判情况被报纸揭出后，全国人民立即掀起大规模的讨袁抗日爱国运动。还在一九一五年二、三月间，上海各阶层人民就纷纷成立爱国团体《爱国对日同志会》、《劝用国货会》、《救国储金会》、《排斥日货同盟》等组织，反对“二十一条”谈判，宣传抗日救亡。二月十一日，中国留日学生千余人在东京集会，反对“二十一条”谈判。三月十八日，《爱国对日同志会》在上海张园召开三、四万人的群众大会，议决拒用日货。三月间，汉口人民在租界内上演抗日戏剧；烟台、福州、厦门等地举行抗日示威；东北各地散发抗日传单，表示“宁为中华鬼，不为日本奴”。全国各地工人、农民、学生和国外爱国华侨、留学生纷

① 《东方杂志》第13卷，第2号。

② 一九一六年五月《北洋政府京兆尹王达致内务部折呈》，《东方杂志》第15卷，第6号。

纷组织起来抵制日货，宣传爱国，反对“二十一条”。袁世凯无耻承认“二十一条”后，全国人民更接连不断地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爱国活动。上海码头工人首先举行罢工，散发传单，决议抵制日货。上海日本企业中的中国工人纷纷罢工，反抗日本侵略者和北洋军阀政府。湖南长沙日资企业的中国工人，也举行集会，宣布罢工。中国无产阶级在讨袁抗日斗争中，以英勇顽强的姿态投入战斗，表现出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北京群众连日集会示威，有时达二、三十万人，反对“二十一条”。沈阳群众愤怒地向日本商店投掷炸弹。汉口日本侵略者策划举行所谓“庆祝会”，五月十三日，群众闻知，立即拥上街头示威游行，全市停止夜市，粉碎了侵略者的狂妄计划。其它各个城市如烟台、福州、厦门等地的革命人民到处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广大爱国青年学生纷纷组织爱国救亡团体，进行反抗斗争。海外侨胞发动了爱国运动：集会宣传、捐款资助、抵制日货。全国人民当时喊出了一个共同声音：反对日本侵略，反对袁世凯卖国，废除卖国条约。揭露袁世凯“乘间潜帝而求助日本”，“以求帝位”而“甘心卖国”的罪行。中国人民轰轰烈烈的反抗斗争给予日本帝国主义以极为沉重的打击，使得“二十一条”一开始就未能生效，而且对卖国贼袁世凯进行了声讨，提高了人们对帝国主义的认识，促进了人们反帝爱国热忱的进一步高涨。

一九一五年冬到一九一六年春，袁世凯大搞帝制活动，并派兵镇压反袁斗争，在各地勒派什么“大典筹备费”、“国民代表选举费”、“征滇费”等苛捐杂税，直接把他们从事复辟帝制的挥霍，压在人民群众身上。山东当局把这项杂捐按烟酒专卖包捐办法，转包给商人办理，更加加重对人民的剥削。三月二十二日，山东肥城县农民数千人入城请愿，警队开枪杀死群众二人，民情

大愤，“当将县署及四乡清丈局四处焚毁”^①，东平、东阿、平阴、新泰等县纷起响应。袁世凯悍然称帝，更加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抗怒潮。他们绝不容许赶跑了一个清朝皇帝，再来一个“洪宪”皇帝骑在人民头上。陕西哥老会义军突起，旗帜鲜明地提出保护共和、推翻帝制的革命口号，发表讨袁檄文，一时威震广阔秦川。河南人民再度打出白朗的义旗，兴师讨袁。陕西、四川的革命群众、会党，亦“乘机响应”，纷起反抗。全国士农工商，各界人民，纷电声讨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滔天罪行，指出袁世凯是“吾侪之大敌，叛国之元凶”^②，“数其罪恶，秃天下之笔，穷一世之纸，不能或详尽也”^③；要求“诛除逆贼”袁世凯，杀掉梁士诒、杨度等帝制犯，“以谢天下”。

上述这些人民群众的反袁斗争，具有这样几个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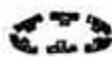
第一，发生的地区和参加阶层十分普遍。从东北三省到南海之滨，从川陕高原到江淮平原，全国各地燃遍了反袁烈火，斗争此伏彼起，连绵不断。参加斗争的社会各阶层比较广泛，有近代产业工人、手工业工人、农民、城市贫民、学生、爱国的工商业者和知识分子，形成了一股反袁洪流。这说明，反袁斗争具有广泛深厚的群众基础，人民群众是要革命的，是要前进的；说明了野心家、阴谋家、卖国贼袁世凯要投敌卖国，搞反攻倒算，尊孔复辟，必将遭到人民群众的坚决反对。

第二，主要坚持武装斗争。广大人民群众从切身经验中体会到，辛亥革命的成果是靠武装斗争取得的，袁世凯搞反攻倒算、尊孔复辟是依靠他手中掌握的反革命武装来进行的；要反击袁世凯的复辟逆流、保卫革命成果，也必须拿起刀枪，针锋相对。

^① 《东方杂志》第13卷，第5号。

^{②③} 黄毅：《袁氏盗国记》下篇，第1章，第13、11页。

人民群众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



白朗起义活动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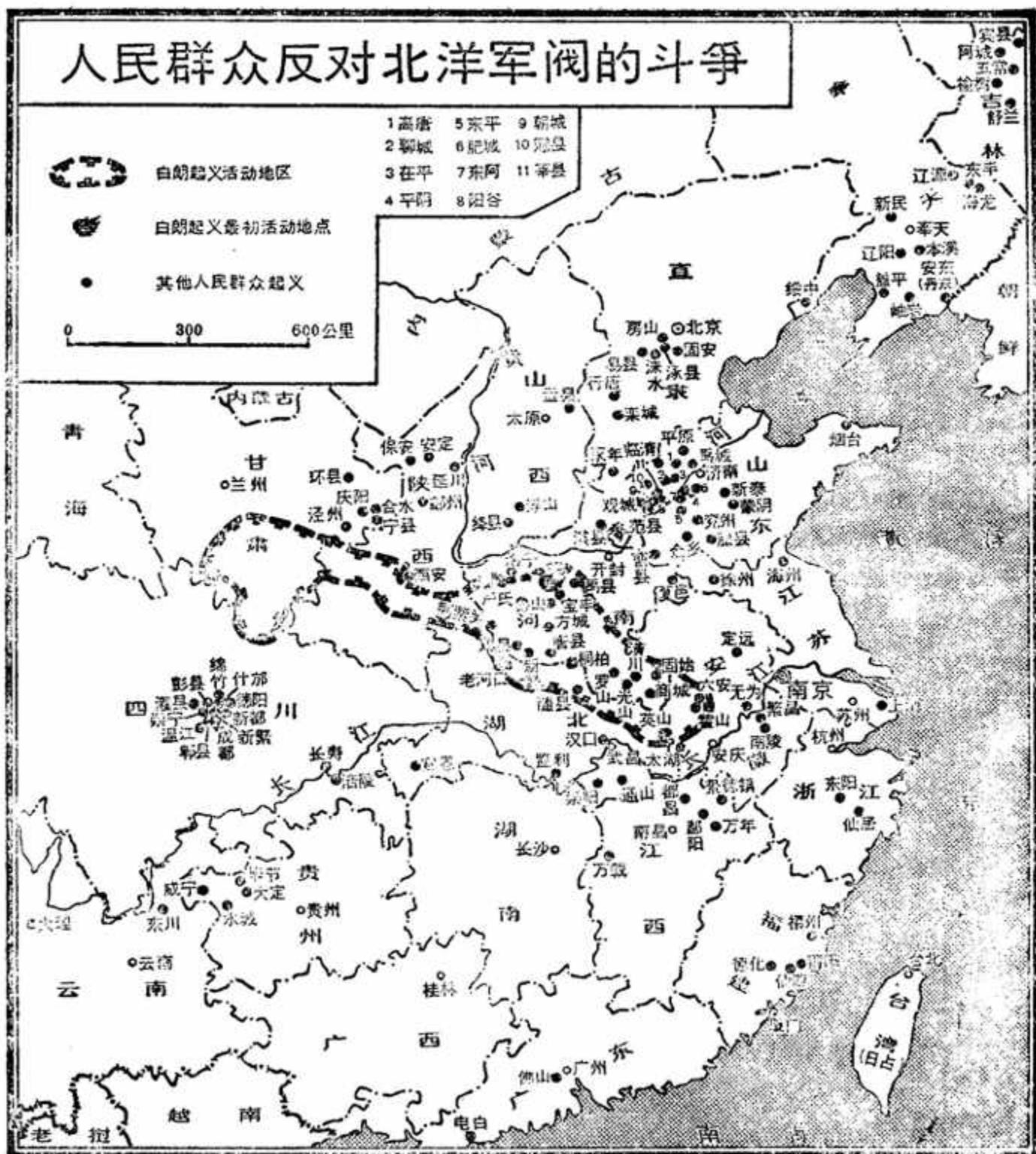
白朗起义最初活动地点



其他人民群众起义

0 300 600公里

- | | | |
|------|------|-------|
| 1 高唐 | 5 东平 | 9 聊城 |
| 2 聊城 | 6 肥城 | 10 冠县 |
| 3 在平 | 7 东阿 | 11 莘县 |
| 4 平阴 | 8 阳谷 | |



他们摒弃了资产阶级革命党内部右倾妥协派所追求的“政党政治”的议会道路，高举武装革命战旗，反剥削，反压迫，反独裁，反卖国，反帝制，到处掀起武装起义，以铁拳狠狠打击袁世凯。

第三，革命口号在斗争中日益发展。广大人民群众在反袁斗争中，随着袁世凯集权专制、尊孔卖国、帝制复辟的逐步升级，随着袁世凯野心家、阴谋家、卖国贼嘴脸的日益暴露，口号和目标也就进一步明确起来。从反对清丈田产、抗捐抗税，到反对袁世凯专制独裁统治，进而发展为反对袁世凯帝制复辟的斗争；不仅提出要打倒袁世凯，而且有的如白朗起义军提出要建立农民阶级的“完美之政府”，涉及到了革命的根本的问题——政权问题。

第四，对袁世凯的复辟活动给了致命性的打击。这些轰轰烈烈的工农群众斗争沉重地打击了袁世凯的反动统治，大大削弱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基础，使袁世凯地主买办阶级的统治日益处于人民群众的包围之中，使袁世凯的帝制复辟活动日益陷于孤立的境地。正是在人民群众的铁拳打击下，“洪宪帝制”遭到彻底失败。

工农群众是反对袁世凯尊孔卖国、复辟帝制斗争的主力军。它极大地鼓舞、推动和支持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反对袁世凯尊孔卖国、复辟帝制的斗争。

一九一三年，袁世凯公布《通令尊崇孔圣文》，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中华新报》发表社论，揭露袁世凯“借祀孔子之名，为收拾人心之具，帝制复活之实”。^①一九一四年，袁世凯大搞祀孔祭天，资产阶级革命派又在《北京日报》发表文章，指出这是“帝

^① 马大中：《大中华民国史》。

制复活”的“先声”，要大家提高警惕，不然“总统二字，行将消失”。^①

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失败后，继续坚持反袁斗争，坚决表示要以“以前反对君主专制之决心”^②，反对袁世凯，“欲竟辛亥之功”。^③一九一三年十二月初，他被迫逃往日本。为了集结革命力量，一九一四年七月八日，孙中山在日本另组“中华革命党”，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宗旨，坚持武装讨袁的道路。随后又派出大批党员前往上海、华南、华中、东北各地区，深入十几个省份，从事联络军队，筹划武力反袁。黄兴这时却与另一批国民党人，因政见分歧，拒绝参加中华革命党，而另组“欧事研究会”，在组织上公开与孙中山闹分裂。一九一五年孙中山发表《讨袁檄文》，揭露袁世凯搞祭天尊孔把戏是为了复辟帝制，“祭天祀孔，议及冕旒，司马之心，路人皆见”。^④一九一六年五月，孙中山发表《第二次讨袁宣言》，明确指出：“袁氏推翻民国，以一姓之尊而奴视五族，此所以认为公敌，义不返顾。”他号召“国人”起来进行反袁斗争，并指出这场斗争“不徒以去袁为毕事”^⑤，而且要永远铲除帝制。他所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曾在广东、湖北、湖南、江苏、浙江、山东、奉天等地举行过一些小规模的武装反袁起义。

资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章太炎在这时也从一度的受骗中惊醒过来，与尊孔反法逆流进行了英勇的战斗。章太炎在一九一三年辞去东三省筹边使职务，“托事南行”。袁世凯镇压

① 马大中：《大中华民国史》。

② 张国淦：《孙中山与袁世凯的斗争》，《近代史资料》一九五五年，第4期。

③ 孙中山：《致黄兴书》，《孙中山选集》上卷，第97页。

④ 孙中山：《讨袁檄文》，《孙中山选集》上卷，第98页。

⑤ 孙中山：《第二次讨袁宣言》，《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01、102页。

“二次革命”后，他于八月十一日到北京。他只身临大总统府之门，“以大勋章作扇坠”，“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①袁世凯老羞成怒，把他软禁起来，直到袁死后才被释放。在这段期间，他先后发表了《驳建立孔教议》和前已写成的《秦政记》、《秦献记》等著名文章，并把对弟子的讲学收为《葑汉微言》一书。他嘲讽了袁世凯的祭天尊孔是欺骗“群黎百姓”，“徒可自欺”。^②他针对康有为之流倡立孔教的逆流指出：“近世有倡孔教会者，余窃譬其怪妄。”他痛斥建立孔教会“是犹素无创痍，无故灼以成瘢”，是“又规摹（董）仲舒而为之矣”。章太炎指出把孔教树为“宗教”，是“杜智慧之门，乱清宁之纪，其事不便”。^③他蔑视孔教会，规定凡是要加入他开办的国学会都必须首先脱离孔教会。袁世凯对章太炎进行了各种威胁和利诱，但章太炎毫不动摇，不为袁世凯所用。正如他自己所说：“时袁氏帝制萌芽已二岁矣，往日当事数遣客来伺余意，道及国体，余即以他语乱之，间亦以辞章讽刺”。^④章太炎的这些著作，在当时的思想领域中打击了尊孔反法、复辟倒退的反动思潮，在政治上为粉碎袁世凯帝制丑剧制造了革命舆论，作出了功绩。当然，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使他在斗争中不可能彻底。章太炎到了晚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⑤，退回到“尊孔读经”中去了。

由于全国人民反袁斗争的推动，由于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社会上其他各种力量，眼看袁世凯日益陷入孤立境地，也纷

① 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全集》第6卷，第550页。

② 章太炎：《隆礼杀论》，《章太炎先生所著书》第8册，《检论》，卷2。

③ 章太炎：《驳建立孔教议》，《章太炎先生所著书》第16册，《文录》，卷2。

④ 《章太炎先生自撰年谱》，《近代史资料》一九五七年，第1期。

⑤ 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全集》第6卷，第547页。

纷起来进行了反袁活动。在这种情势下，一些由资产阶级立宪派演变而来的进步党人，以梁启超为代表，这时感到袁世凯复辟帝制必将为全国人民所共弃，就由为袁世凯摇旗呐喊转而想乘机篡夺反袁领导权，以利将来夺取政权。梁启超在一九一五年八月三十一日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再三表明心迹，说“自始不敢妄倡共和，至今仍不敢迷信共和”。他反对袁世凯当皇帝，是因为如果做了皇帝，“吾恐天下人遂不复能为元首谅矣”。^①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进步党人是要“当此普天同愤之时”，自求“树立”起来。蔡锷原是梁启超的学生，受梁的影响，辛亥革命时期曾任云南都督，后被袁软禁于北京。他秘密回到云南后，于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发表通电，宣布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向四川、贵州、广西进军，进展很快。不久贵州、广西相继独立。这时袁世凯垂死挣扎，调兵遣将进行反扑，同时求援于帝国主义。

可是，帝国主义眼看袁世凯就要垮台，这条走狗再没有力量继续维护它们的殖民利益，只好重新换马，象抛掉清政府一样地抛掉袁世凯这个奴才，而另外扶植新的走狗。例如，日本扶植段祺瑞，以便在袁倒台时，让他劫收政权，达到继续掠夺利权和妄图霸占中国的可耻目的。为此，日本在一九一五年十至十二月，当袁世凯正准备做皇帝时，联合英、俄、法、意等国公使，几次警告袁世凯，要延缓改变国体。云南宣布独立后，日本又拒绝袁世凯派特使去日本访问，对袁世凯称帝态度暧昧。其它帝国主义国家眼见人民反袁力量强大，也对袁世凯帝制自为采取消极态度。在这种形势下，北洋军阀内部也开始分崩离析。袁世凯的

^①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230、224页。

心腹和手下两员大将段祺瑞、冯国璋原来都以总统继承人自居，希望有朝一日能接袁世凯大总统的班，袁世凯称帝使他们大失所望，因此不愿为帝制卖力。段祺瑞在一旁冷眼相看，坐等袁世凯倒台后，再出山收拾残局。冯国璋坐镇南京，与护国军暗通声气，示意支持，并联合四省将军，密电袁世凯要求“取消帝制”，要挟袁交出权力。在全国人民一致反对和众叛亲离的情况下，袁世凯的反动统治迅速土崩瓦解。

袁世凯眼看大势已去，被迫于三月二十二日取消帝制，总共当了八十三天的短命皇帝。皇帝当不成，袁世凯还想当大总统，继续保持权位，进行垂死挣扎，不肯退出历史舞台。但遭到全国人民反对。广东、浙江、陕西又相继独立。五月八日，西南独立各省在广东肇庆成立军务院，不承认袁世凯为大总统。五月底，袁世凯忠实爪牙陈宦和汤芎铭控制的四川和湖南也声言独立。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这个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大卖国贼、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在全国人民一片喊打和唾骂声中，在仓惶、恐



孙中山在日本为帝制撤销举行庆祝会时摄影

惧、狼狈的情况下死去，可耻地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正象毛主席所深刻指出的：“‘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蠢人的行为的一句俗语。”^①“袁世凯想打老百姓的脚，结果打了他自己，做了几个月的皇帝就死了。”^②

袁世凯的垮台表明：一切妄图倒转历史车轮的阴谋家、野心家，不管如何猖獗一时，到头来，总是落得身败名裂的可耻下场。

第二节 短命的张勋复辟和 段祺瑞的反动统治

一、军阀割据

袁世凯垮台以后，帝国主义各国失去了它们侵略中国的共同走狗，于是，极力物色培植新的代理人，积极支持各派军阀，继续为其侵略利益服务。清末以来出现的北洋军阀势力这时失去了共同的头子，形成了各系军阀。这伙代表着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反动势力，也都各自寻找帝国主义作为靠山。各派军阀在不同帝国主义国家支撑下，互相争夺地盘，扩大权势，形成军阀割据和混战的局面，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中国人民为反对北洋军阀复辟卖国继续进行着英勇的斗争。

袁世凯手下的两员大将段祺瑞和冯国璋，在袁世凯死后，更明显地分裂为两个主要的派系，即皖系和直系。皖系以安徽人

^① 毛泽东：《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会议上的讲话》第5页。

^②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毛泽东选集》第695页。

段祺瑞为头子，在袁世凯死后控制了北洋政府的中央政权，并占据着安徽、陕西、山东、浙江、福建等省的地盘，权势最大，还有一些较小的军阀依附于它。直系以直隶（今河北）人冯国璋为头子（冯死后以曹錕、吴佩孚为头子），控制着江苏、江西、湖北、直隶等省，势力仅次于皖系，与皖系军阀相对抗。以奉天（今辽宁）人张作霖为头子的奉系军阀，在护国战争期间乘机控制了整个东北地区，成为在直、皖两系之间举足轻重的又一支军阀。

在南方的各派军阀中，较大的有云南军阀唐继尧为头子的滇系，和以广西军阀陆荣廷为头子的桂系。此外，还有一些军阀，如盘踞在山西的阎锡山，盘踞在徐州、兖州一带的张勋，以及在四川境内分别控制几个县或十几个县的大大小小的军阀，它们都不属北洋军阀嫡系，也割据一方，相互争夺、混战。

从民国元年以来，各派军阀之间不断混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特征之一。毛主席深刻地指明了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两种，“即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①当时中国是一个半封建的农业国，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大约占国民经济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各派军阀进行封建军阀割据，存在着可能性。同时，中国又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受几个帝国主义国家支配，帝国主义的不统一，影响到中国统治集团间的不统一。帝国主义各国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采取分裂、剥削政策，它们各自寻找自己的代理人以适应其侵略的需要。英、美帝国主义扶植直系军阀作为它的走狗。日本帝国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趁机扩展侵华势力，就扶植当时控制北洋政府中央政权的皖

^① 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选集》第49页。

系军阀作走狗。当时东北南部是日本帝国主义势力范围，它又扶植奉系军阀张作霖。其它军阀，如西南军阀与直系军阀接近，就投靠英、美帝国主义；山西军阀阎锡山投靠段祺瑞，就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张勋则与德、日帝国主义勾结，充当德、日帝国主义的走狗。

这些帝国主义国家为了分裂、剥削中国，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支持各派军阀搞封建割据。它们供给这些军阀军火武器、经费；派遣各种顾问，控制军阀；为了扩大侵略势力还支持军阀之间混战不已。这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中国内部各派军阀的矛盾和斗争，反映着帝国主义各国的矛盾和斗争。”^①帝国主义所造成和支持的军阀割据、混战，使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更加残酷地盘剥中国人民，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

袁世凯死后，由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黎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北洋政府中央政权实际操纵在段的手中。段祺瑞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并为了取得各系军阀的支持，被迫宣布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国会复会后，于十月补选冯国璋为副总统。冯怕丢掉军阀地盘，在南京接受了这个职位。袁世凯集中的军阀权力，变成分散的军阀权力。各省的将军改为督军。日本帝国主义这时积极支持段祺瑞，企图扩展在中国的侵略势力。而梁启超这时又积极去投靠段祺瑞。他唆使唐继尧以抚军长的名义撤销了在护国运动时成立的军务院，并带着进步党议员赶回北京，将进步党改称“宪法研究会”（又称为“研究系”），在国会中支持段祺瑞，投靠皖系军阀做官。冯国璋的直系军阀以及黎元洪同皖系军阀段祺瑞相对抗，争夺权势。而英、美帝国主义则

^① 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选集》第47页。

扶植直系军阀冯国璋以及黎元洪作工具，与日本帝国主义支持的皖系相抗衡。国会中以张继、吴景濂为代表的旧国民党议员组成“宪政商榷会”（通称“商榷系”），支持直系军阀冯国璋以及黎元洪。直系军阀和皖系军阀、黎元洪和段祺瑞、各派军阀之间，展开了争夺权势的争斗。这些争斗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争夺。

帝国主义支持的军阀纷争，在中国要不要参加当时正在进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问题上首先爆发出来。段祺瑞的皖系军阀企图借“参战”名义取得日本借款，利用借款和日本的支撑，扩大皖系军事力量，进行所谓“武力统一”，以消灭异己势力。所以，力主对德宣战。日本帝国主义则支持段祺瑞参战以达到其趁机扩大在华侵略势力的目的。冯国璋的直系军阀和黎元洪为了维护自己的地盘权势，害怕皖系军阀乘机扩展势力，则反对皖系的参战主张。于是，段祺瑞指使以皖系督军为骨干组成的“督军团”，胁迫国会和黎元洪同意参战。黎元洪在美国支持下，主张“中立”，起而反对，展开了所谓“府（黎元洪的总统府）院（段祺瑞的国务院）之争”。段祺瑞御用的“督军团”，便通电要求解散国会。恰在这时，报纸揭露了段祺瑞以允许日本训练中国军队和控制兵工厂等为条件，向日本借款一亿日元的卖国行为，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黎元洪利用群众反段要求，在英、美帝国主义以及直系军阀支持下，先发制人，于一九一七年五月，断然下令免去段祺瑞的国务总理职务。结果，段祺瑞愤而去津，唆使皖系并联络奉系军阀宣布脱离北京政府而“独立”，并准备进攻北京。段祺瑞还在天津设立了独立各省总参谋部。皖系军阀与直系军阀及黎元洪之间的矛盾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北洋政府几乎陷于瓦解。黎元洪一筹莫展，求救于自成一派的封建军阀张

勋，来京调解。梁启超向段祺瑞献计，要他先利用张勋赶走黎元洪，解散国会，许其复辟，然后借“反复辟”名义，再打倒张勋，掌握大权。这样，为了“调停”黎元洪和段祺瑞的矛盾，各派政治势力都把目光集注在驻扎徐州一带的军阀张勋身上。张勋则乘机演出了一幕“清帝复辟”的丑剧。

二、张勋复辟和段祺瑞卖国

继袁世凯帝制自为之后，一九一七年发生了张勋拥戴溥仪复辟事件。它的出现同样不是偶然的。“洪宪帝制”被推翻后，封建土地制度依然没有触动，封建军阀官僚也依然存在，而“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是地主中特别凶恶者。”^①他们的人还在，阶级还在，他们时刻梦想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梦想复辟清朝。这就是说产生皇帝的社会基础并没有消灭。

具体说来，张勋复辟的社会基础，是封建地主阶级中最反动、最腐朽、最愚蠢的旧贵族、旧官僚，主要由三个方面的反动势力组成。一部分是封建军阀，以张勋为代表。张勋本是一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受到清王朝和袁世凯赏识的反动将领。在清末官至江南提督。辛亥革命时在南京拚死反抗江浙联军。辛亥革命后残酷镇压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在袁世凯的庇护下历任江苏都督、长江巡阅使等职，控制着反动武装“定武军”，一直阴谋复辟清王朝。他是清王朝复辟集团的头子，被复辟派称为“武圣”。此外，曾任清末陕甘总督的蒙古王公贵族升允，也是

^① 毛泽东：《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毛泽东选集》第113页。

武装复辟势力的代表人物。他纠集东北反动满蒙王公、八旗残部、反动会道门拼凑起来的“勤王军”，是张勋复辟集团中又一支反革命武装。另一部分是以康有为、劳乃宣为代表的封建官僚、反动文人，即清朝遗老。他们大都是清末大官僚以及保皇党人。辛亥革命后，他们丢掉官职或升官的机会，蜷伏在全国各地。这帮家伙都是孔老二的门徒，他们摇笔鼓舌，咒骂共和，公开嚎叫：非复辟不能救中国，为复辟清王朝制造反革命舆论。康有为在辛亥革命后由保皇党头子而成为复辟派的“祖师”，被复辟派称为“文圣”。还有一部分人是封建王公贵族，他们在辛亥革命后失掉了当年的特权和威风，逃到大连、青岛等地租界内，勾结帝国主义，阴谋复辟，代表人物是溥伟（清朝恭亲王）、善耆（清朝肃亲王）。这一部分人，是皇族集团中“矢志复辟”的死硬派。^①

这伙由封建军阀、遗老文人、王公贵族组成的封建“逸民”，带着他们对民主共和的仇恨和复辟清帝的反革命祸心，相互勾串，分头活动。袁世凯帝制自为被粉碎以后，他们仍贼心不死，蠢蠢欲动，图谋一逞。他们使用手中没有被剥夺的工具大搞尊孔、卖国、复辟活动。

张勋和他所统率的“定武军”，顽固透顶，腐朽至极。辛亥革命后头上还留着辫子，迎送宾客时仍用跪拜礼节，坚示他们复辟清朝的死硬愚顽野心，人们当时称张勋军队为“辫子军”，讥称他为“辫帅”。为了扩大这支反革命复辟武装，张勋勾结德、日帝国主义，购置军火，几年间将“辫子军”扩充到两万多人。先后驻扎在兖州、徐州一带，派出军队控制、护卫曲阜孔庙，镇压当地劳动人民反抗“孔府”剥削压榨的斗争。张勋还亲自到孔庙磕头致

^① 《溥伟致升允书》（原件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祭，几次演出祀孔丑剧。与此同时，张勋还和那些封建官僚、反动文人、王公贵族相互呼应，串通声气，一方面为复辟清朝作组织准备，一方面大搞尊孔复古活动，为清帝复辟做反革命舆论准备。

封建官僚、反动文人在辛亥革命以后散处各个城市，在复辟派中人数较多。这帮社会渣滓在各地先以举办酒会的形式，召集什么“五角会”、“一元会”，麇集在一起，狂饮滥嚼，趁机发泄对共和制度的不满，纠聚复辟力量；进而采取举办诗社和读经会的方式，利用吟诗读经，攻击民主共和制度，宣扬尊孔复古的反动思想，拼凑反革命会社，妄图扩大反动影响。而纠集人数最多，活动最疯狂的是康有为直接指挥的孔教会。

孔教会于一九一二年在上海成立之后，在全国各地设立支会或分会。康有为及其弟子陈焕章、梁启超等人猖狂地叫嚣以“昌明孔教”为宗旨，奉孔丘为教主，以谋实现“道有一尊，学无异说”^①，并大肆网罗蜷伏在各地的反对革命、反对进步的各种牛鬼蛇神。就连屠杀义和团的刽子手劳乃宣，和孔老二的后代孔祥珂等人，以及一些反动文人也被拉进来了。这些形形色色的反动腐朽势力结成了复辟党。孔教会从成立起就得到张宗昌、吴佩孚、徐世昌、冯国璋、王士珍等军阀、政客、买办的支持。他们或名列会籍，或资助打气。一些买办资产阶级也推波助澜，配合呼应。孔教会从开张筹办，到招摇活动，又都得到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支持。沙皇贵族盖沙令、美国侵略分子传教士李佳白、德国侵略分子传教士卫礼贤，实际上是孔教会的幕后策划者与创办人物。他们发表演说，书写文章，为孔教会的成立和活动大造舆

^① 《孔教会公呈》，《孔教会杂志》第1卷，第1号。

论；而孔教会成立后就被拉入李佳白的“尚贤堂”，成为“国际教务联合会”的一员。所以孔教会不但是收罗封建余孽、虾兵蟹将的复辟集团和叫嚣尊孔复古、反对共和的场所，又是帝国主义奴化思想和封建主义反动思想结合的一个典型。

孔教会在袁世凯帝制自为时，曾积极配合，并得到袁世凯的庇护和利用。袁世凯倒台之后，孔教会并不死心，又为复辟清王朝而大刮尊孔妖风。

一九一六年八月，国会复会后，陈焕章、张尔田等又第二次向国会提出“定孔教为国教”的请愿书，胡说什么：“孔教若不为国教，则中国必亡。”^①一九一六年九月，康有为在报上发表文章，叫嚷要求“以孔教为大教，编入宪法，复祀孔子之拜跪”。^②康有为在这年还致电北洋政府，请求“立飭各省祀孔子，仍行拜跪礼”，歇斯底里地叫嚣什么：“中国人不敬天，亦不敬教主，不知其留此膝以傲慢何为也。”^③张勋紧密配合，于一九一六年到一九一七年初，联合一些地方军阀几次致电北洋政府、国会，要求定孔教为国教。在一九一七年二月二十三日由张勋领衔的通电中，竟扬言如不通过“国教案”就要以武力解散国会，另组造法机构，说什么“安见宗教之战，不于我国见之！”^④一时各地尊孔会、社和封建军阀又喧闹起来。一九一六年底，“道德学社”在北京成立，由北洋政府参谋总长王士珍任社长，江朝宗为名誉社长、张炳楨为名誉学长，刊行《道德学志》，吵吵嚷嚷要“阐明圣学、敦崇道德”。一九一七年三月，上海孔教会更出面纠集各地的尊孔

① 《孔教会上参众两院请定国教书》，《宗圣学报》第2卷，第5册。

② 一九一六年九月二十六日《时报》。

③ 康有为：《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民国经世文编》第39册。

④ 《张勋等联名争孔教为国教电》，《宗圣学报》第2卷，第6册，第18号。

会、社，拼凑出一个“各省公民尊孔联合会”，以陈焕章为会长，张勋、康有为为名誉会长，订简章，立宗旨，设分会，搞请愿，大演“定孔教为国教”的闹剧，妄图把“国教”定入宪法之中^①，一时间闹得乌烟瘴气。

这伙以复辟清帝为职志的封建余孽，还通过他们的反动报刊《不忍》杂志、《孔教会杂志》、《国是报》、《中国学会报》等，发泄他们对共和制度的不满，吹捧孔老二，为清帝复辟出场鸣锣开道。如康有为就叫喊什么：“弃孔教，则荡佚为禽兽，国必将亡。”^②胡说只有保存帝制以统五族，才能弥乱息争。

张勋复辟集团，既是复古倒退的尊孔派，又是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卖国贼。辛亥革命后，为了复辟，他们加紧同帝国主义勾结，大搞卖国的罪恶活动。他们虽然没有掌握国家政权，缺乏签订条约的条件，但是通过一些王公贵族升允、溥伟、善耆等与帝国主义勾搭，取得了俄、德、日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相助”。受善耆指挥的升允，一九一三年曾与沙俄签订了一个密约，规定由沙俄出兵进攻张家口，“共诛叛我清室（的人）”，要“奉皇上复辟”，并议定沙俄“兵费实用若干，由清室照数认还”。^③溥伟曾密信提示升允，只要沙俄支持清朝复辟，“将来尽可许以重酬”，并且授权升允“主持断行”。^④一九一六年，善耆为了报答日本财阀大仓喜八郎提供的复辟活动经费，答应“将来事成之时”，把东北三省的“土地、山林、牧场、矿山、住宅、水利等”作为“担保”^⑤，从而要把

① 《各省公国尊孔会开会纪事》，《宗圣学报》第2卷，第6册。

② 《康南海与中央电》，《孔教十年大事》卷8，第99—100页。

③ 《郑孝胥日记》癸丑年。

④ 《溥伟致升允书》（原件藏历史博物馆）。

⑤ 《借款合同》，见章伯锋译：《日本与宗社党的关系》，《近代史资料》总35期。

整个东北三省主权卖给日本帝国主义。一九一七年初，张勋、徐世昌又暗中派陆宗輿赴日本，与日本政府密商复辟条件。徐世昌表示如果日本政府肯出力援助，复辟事成后，愿以兵工厂合办，给予军队、警察一部分之管理权为报酬。德国帝国主义为了保持并扩大在华利益，表示“竭力支持清朝的复辟”^①，并以经费和武器源源接济张勋。复辟前夕，还订立了德国“承认帝国新政府，新政府成立后，首宜开复中某（德）国交”^②的草约。由此可以看出，尊孔、卖国、复辟是张勋复辟集团的主要特征。

张勋的复辟活动是在反动武装和康有为一伙封建余孽以及俄、德、日等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进行的。一九一六年六月到一九一七年五月，他纠集各省军阀代表先后四次在徐州开会，被推为安徽、江苏、江西、湖北、河南、山东、直隶、甘肃、奉天、吉林、黑龙江、福建、广东十三省“省区联合会”的盟主，授予他“便宜行事”的大权。因此，张勋的气焰更为嚣张，加快了复辟步伐。一九一七年六月七日，张勋利用“府院之争”，伪装“调停人”，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带领辫子军三千余人北上。张勋到天津后，即通电胁迫黎元洪解散国会。十四日张勋到京后，康有为、张镇芳、雷震春、梁鼎芬等复辟丑类也纷纷窜到北京，逼走黎元洪，筹划复辟。六月三十日晚，张勋等窜入故宫，召开“御前会议”，决定立即复辟。当夜三千“辫子兵”也进入北京城内，布满皇城内外，全城实行戒严。七月一日凌晨，张勋、康有为等人换上清朝冠服，率领群丑，进入清宫，拥溥仪复辟帝位。当天，发表了一系列康有为等事先拟好的“上谕”，恢复“宣统”年号，大肆叫嚣“以纲常

① 孙瑞芹译：《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资料选辑》第3卷。

② 《郑孝胥日记》丁巳年四月。

名教为精神之宪法，以礼义廉耻收溃决之人心”。^①同时，大授官爵，任命各地总督、巡抚。张勋自封为议政大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康有为任“弼德院”副院长；劳乃宣封为学部副大臣；升允当上了大学士。其余小丑也分别授予官职。倾刻之间，这班亲贵、遗老又穿起袍褂补服，叩头作揖，做起清朝官儿来了。清帝复辟后，孔老二的后代、那位“衍圣公”孔令贻也欣喜若狂，立刻捧场，致电张勋说：“恭蒙明诏，日月重光”，“肃电致贺大喜”。^②

在张勋复辟短短的十二天当中，一些清朝遗老又从阴暗的角落里爬出来，连忙从估衣店、装殓铺找来纱袍补褂，安上假造发辫，戴上红顶花翎，匍匐来京，招摇过市。据记载说：“有识者则指于道旁曰：此某尚书也，此某侍郎也、某巡抚也、某关道也、某翰林编修也。彼辈携手下车，扬扬得色。”^③真是千奇百怪、魔舞翩跹。

反动的阶级本能使他们总是高估了自己的力量，低估了人民的力量。张勋一伙以为一经复辟，“薄海远近，望风兴起”，“必将天旋地转”。^④但是，历史的规律并不是依照反动派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的巨轮是拖不回来的”。^⑤辛亥革命以后共和观念深入人心，经过反袁斗争人民斗志更加高昂。中国人民怎么能容忍被推翻的清朝皇帝再来执政。当张勋复辟的消息刚一传开，“全国民情，莫不反对”^⑥，很快就形成了一个反复辟的怒潮。

① 《东方杂志》一九一七年，第4卷，第8号。

② 《孔府档案》第8059号。

③ 佚名：《复辟真相始末记》。

④ 《郑孝胥日记》丁巳年。

⑤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毛泽东选集》第696—697页。

⑥ 一九一七年七月六日《英文京报》。

北京的一些报刊《晨钟》、《公言》、《民言》、《真共和》、《新震旦》、《国民公报》等，在张勋复辟的当日一律停刊，以示抗议。天津等地报刊，更是公开“破口大骂”复辟罪行。^①上海各界“自复辟之事实实现以来，人心愤激”^②，上海各报则连日刊载《普天同愤录》，发表各方面声讨复辟的通电。七月一日，上海教育会和商会、江苏教育会共同集会，声讨张勋复辟，并且定于七月七、八、九日三天全体悬挂五色共和旗以示抗议。七月三日，湖南长沙万余人召开拥护共和、反对复辟的大会，会上群情激昂，有人当场断指血书“护法讨贼”四字。晚上有人在戏台上发表演说，痛斥复辟罪行。在全国人民反复辟斗争怒潮的推动下，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上海召开会议，一致声讨清帝复辟，表示“誓不与共天日，协议扫穴犁庭计划”^③，并发表《讨逆宣言》，表示了维护民国的决心。七月七日，孙中山、章太炎等因在上海的活动成效不大，于是南下广州，准备在西南筹建护法根据地和组织反复辟的新政府。孙中山在这场斗争中，接受了过去的教训，态度比较坚决，认识也比较敏锐。他把反复辟与反对整个北洋军阀统治的斗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把反帝制和“建设真正之共和国”结合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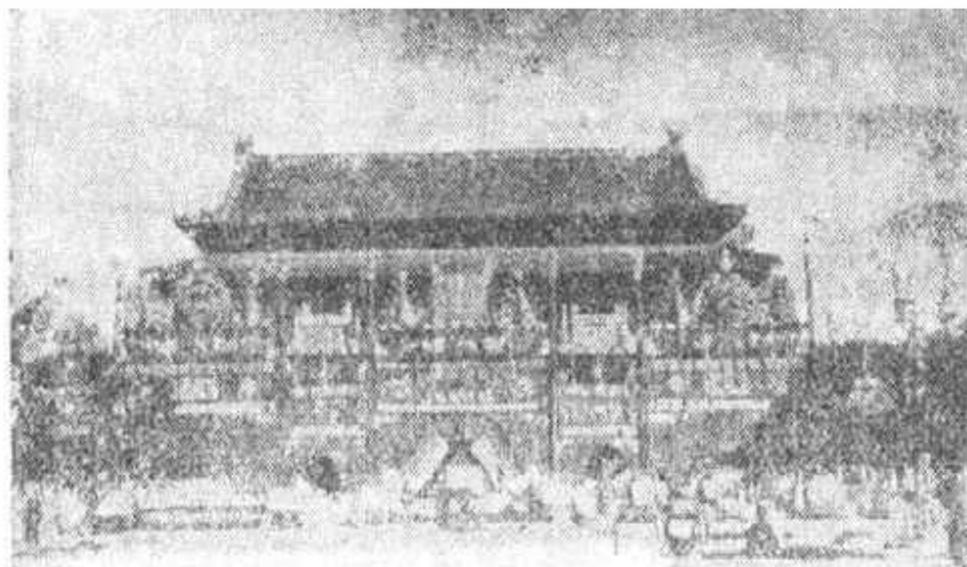
张勋复辟这幕丑剧一开场，就陷于全国人民愤怒声讨之中。正当革命人民风起云涌反对张勋复辟，把敌人逼进死胡同的时候，曾经积极支持清帝复辟的北洋军阀，感到大势已去，为了窃取反复辟斗争的领导权，维护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独裁统治，于是接过“反复辟”的旗号，乘机而起。那个曾与张勋称兄道弟的冯国璋，在七月三、四日，连续发表通电，假惺惺地表示反对“张勋

^① 一九一七年七月三日《英文京报》。

^{②③} 一九一七年七月二日《时报》。

叛国”。他以民国的“忠臣”自居，慷慨陈词：“忝膺重寄”，“国存与存”，表示要与民国共存亡，“兴师讨逆”，与张勋决一死战。皖系军阀段祺瑞慑于人民群众反对复辟的声威，同时眼看张勋已落入人民反抗斗争的包围之中，又见到黎元洪被逐，国会解散，他的目的已经达到，遂于七月四日，与冯国璋联名通电“反对复辟”。段祺瑞在马厂“誓师”，组织“讨逆军”，讨伐张勋。日本帝国主义眼见张勋复辟遭到全国人民反对，就顺风转舵，不再支持张勋了，而去扶植其它走狗，以便利用这个机会操纵中国政局。日本给段祺瑞以财政支持，扶植他重新上台。研究系政客梁启超也依附段祺瑞，“反对复辟”，以便从中渔利。美、英帝国主义害怕复辟引起更大的“动乱”，影响自己在中国的既得利益，因此决定抛弃张勋，扶植新的傀儡，维持一个有利于帝国主义的“强有力”的军阀政权。

为了更快地从张勋手里接收权力，中外反动派紧密勾结，互相配合。七月九日，帝国主义驻北京公使团发出照会，要求解散张勋的武装。十一日，段祺瑞统率“讨逆军”围攻北京，腐败的



张勋复辟失败，天安门庆祝共和的情况

“辫子兵”一触即溃。张勋惶惶如丧家之犬，灰溜溜地钻进荷兰使馆，以求活命。其余复辟丑类纷纷作鸟兽散。就这样，这场复辟丑剧，可怜得很，只上演了十二天便草草收场了。从来的顽固派，所得的结果，总是和他们的愿望相反。他们总是以损人开始，以害己告终。”^①这就是张勋之流的必然结局。张勋复辟及其垮台是辛亥革命后尊孔复辟与反尊孔复辟斗争的继续。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的迅速垮台，再次说明了反动势力的复辟，只能是短命的，任何反动势力也改变不了历史前进的总趋势。

张勋复辟垮台以后，反复辟的果实，被北洋军阀所窃取，段祺瑞恬不知耻地自称是“再造民国”的“功臣”，入京继续充当国务总理，黎元洪通电辞职，由副总统冯国璋继任总统。北洋政府的实权仍控制在段祺瑞手中。这时帝国主义之间狗咬狗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方酣，日本帝国主义趁欧美帝国主义相互厮杀、暂时无力东顾之机，极力扩充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通过扶植段祺瑞皖系军阀，图谋控制中国。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急剧增长，加深了它与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但美国于一九一七年四月卷入了帝国主义大战，因忙于参加世界大战，无暇与日本在中国展开竞争，只好暂时妥协。一九一七年十一月，由美国国务卿兰辛和日本外相石井，订立了《兰辛石井协定》，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利益，日本再次承认美国对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这是美、日帝国主义共同侵略奴役中国的强盗协定。它以牺牲中国，谋取美、日之间的妥协。但美、日之间的争斗仍在进行。

段祺瑞把持北洋政府中央政权以后，竭力策划扩大皖系军

^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毛泽东选集》第695页。

阀势力。他一面大量出卖国家民族主权，勾结日本帝国主义，以扩充皖系军阀的力量，一面发动军阀混战，消灭异己，搞皖系军阀的所谓“武力统一”。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鼓动唆使下，一九一七年八月十四日，段祺瑞政府正式对德、奥宣战。段祺瑞借“参战”为名，大借外债，购买军火，充实经济力量，来组织和扩充“参战军”，用以进行军阀混战，实行“对外宣而不战，对内战而不宣”的政策。日本帝国主义则采取“菊分根”政策，象把菊花分根移植一样，将日本资本输入中国，大量借款给段祺瑞政府，掠取中国种种特权，企图把中国变为它的独占殖民地。日本组织了“银行团”作为对华输出资本的总机构，一九一七年八月，段祺瑞政府设立“中日合办中华汇业银行”，以汉奸陆宗舆为总裁，作为卖国借款的经手机关。在以后两年间，日本派侵略分子西原龟三来中国奔走，段祺瑞则派陆宗舆、曹汝霖出面画押，以各种名义大借日款，被称为“西原借款”。这宗借款总数至今尚未查清，据估计有一亿四千五百万日元，而段祺瑞向日本借款的总额则达五亿日元。通过借款，日本帝国主义从段祺瑞这个大卖国贼手中夺取了我国难以数计的特权。如所谓“吉长铁路借款”等，就使日本控制了我国东北、华北的许多主要铁路；所谓“吉黑金矿森林借款”，则把东北的金矿、森林权益拍卖；所谓“无线电台借款”、“有线电报借款”，则使日本窃夺了中国的电讯事业；所谓“参战借款”、“军械军火借款”，日本则控制了段祺瑞政府的军事大权。通过这些借款，日本还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段祺瑞同日本订立了军事协定，允许日本在中国驻兵等等。就这样，段祺瑞把国家的权益任意抵押给日本，日本帝国主义不但在经济上盘剥压榨中国，而且把它的侵略势力渗入到内政、财政、军事各个部门，段祺瑞政府中有日本顾问，军队中有日本军官，使

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大大膨胀起来。

三、人民群众的反军阀斗争和孙中山的“护法运动”

北洋军阀割据混战、投降卖国、尊孔复辟，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激起了人民不断反抗帝国主义走狗封建军阀统治的斗争。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土地兼并日益严重。据调查，以江苏昆山县为例：一九〇五年自耕农占总农户的百分之二十六，佃农占百分之五十七点四；但到了一九一四年，自耕农只占百分之十一一点七，佃农占百分之七十一一点七。这说明土地兼并剧烈，农民丧失土地的过程在加速进行。而北洋军阀本身就是大地主，他们利用权势兼并土地。例如，袁世凯在河南彰德等地就占有土地四万亩左右，徐世昌在辉县占田五千多亩，冯国璋在苏北占田七十万亩，段祺瑞在东北占有大片土地，张作霖在东北有田一百五十万亩，张敬尧在霍邱、倪嗣冲在阜阳各都占田七、八万亩。他们不但是大地主，而且又多是资本家，是全国各地厂矿的大股东。如段祺瑞就是龙烟煤矿公司及八个机器煤矿的大股东。冯国璋在苏北办有盐垦公司，在直隶有金矿三处，在南京还有几个钱庄等等。他们集中的大量土地和财富都浸透着劳动人民的血泪。

买办资本依附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也搜刮了大量财富，许多北洋军阀本身就是大买办。他们凭借特权，控制着一些经济命脉，并通过借外债、举内债、购买军火、把持税收而大发横财，组成了几个买办资本集团。如以梁士诒（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

为头子的交通系集团和以日帝走狗曹汝霖、陆宗輿为头子的新交通系集团，控制了铁路事业和相关的交通银行。另外还有所谓“北四行”集团，即北方的金城、盐业、中南、大陆四个银行，都控制在北洋军阀政府大官僚吴鼎昌、周作民、梁士诒、徐树铮手中，为军阀政府经理内外债、税收、财政，并控制北方的大工矿企业，成为军阀吮吸人民血汗的工具。此外，还有江浙、上海一带受英、美帝国主义卵翼的“江浙财阀”集团，拥有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浙江兴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等，并控制了一批工矿、航运事业。除此而外，还有一些较小的“华南财团”以及地方性的买办资本集团。这些买办资本集团为帝国主义、封建军阀效劳，残酷地盘剥压榨人民。

在封建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下，各系军阀不断扩充军队、补充军火，军费迅速膨胀。一九一〇年清政府军费开支为一亿零二百万元。北洋政府时，一九一六年为一亿五千三百万元，一九一八年为二亿零三百万元。^①这只是北洋政府的开支，并不包括地方军阀的开支在内。当时关税、盐税都控制在帝国主义手中。军阀政府为了对付如此庞大的开支，就用发行历年遽增的内外债度日。一九一二年北洋政府（不包括地方军阀举办的）发行内债六百二十四万八千四百六十元，到一九一九年，则增至二千八百三十五万八千七百元。^②

北洋军阀政府及各地方军阀除靠借债度日外，还铸造硬币、滥发纸币，并无止境地增设各种苛捐杂税。据估计，从一九一二——一九一九年，田赋增加了七倍，盐税增加了三倍，烟酒税增加了三倍，印花税增加了六倍。而且军阀任意预征捐税，有的

^①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608页。

^② 千家驹：《旧中国公债史资料》第10页。

地方竟预征到三十年后的田赋。

军阀割据、混战和反动统治给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摧残破坏，国家情况日益败坏，人民被逼得活不下去，全国人民纷纷起来进行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军阀的斗争。

中国工人阶级站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最前列，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使工人斗争日益增长，形成自发斗争的高涨时期。

农民是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主力军。这段时期中，规模较大的农民反抗斗争有：

一九一六年八月，湖北宣恩、监利农民起义，攻破县城；九月，湖北通山、崇阳起义，攻占通山县城；同时，四川崇宁、温江、郫县、灌县、彭县等处农民在邹天平等率领下聚众起义，名称“定国军”，斗争坚持到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四日，四川新繁农民三百余人在李黑王率领下起义，攻入县城，焚毁知事公署、征收局，夺取枪械。十一月十一日，陕西郿县农民起义，攻入县城。

一九一七年一月二日，四川德阳县农民二百余人攻入县城，砸毁了“知事署、征收局”。二月五日，云南蓝坪县农民起义，攻入县城。二月初，陕西保安、延川、安定等县农民起义，攻入县城。三月，安徽无为、繁昌、南陵等县农民数千人起义，夺取水陆警署枪械。四月，陕西宜君、延长农民在郭金榜率领下起义，攻克县城。七月，山东曹县农民攻入县城。

一九一八年三月，山东滕县、峄县农民反抗斗争兴起，攻克新泰县城；到四月间，发展为史殿臣、范玉林、于三黑、顾德麟等五大股，在滕县、峄县、金乡、蒙阴、禹城、平原一带活动，打击侵略者传教士，攻占东平、恩城、茌平、临清等县，并进入河北境内。

三月间，安徽英山（今属湖北）农民自称“护国军”，攻入县城夺取军械，开放监狱，并攻打霍山、太湖。五月，直隶栾城农民起义。六月，江西鄱阳、都昌人民自称“赣北护法军”，攻占鄱阳、都昌县城。八月，山东农民起义，在白天祖率领下曾攻克濮城、阳谷、莘县，并攻打曹县、冠县、博平、朝城、观城、范县等地，十月十一日攻占肥城。

这一时期人民群众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由于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加深，封建买办军阀压榨剥削、卖国投降的日益严重，而更加蓬勃发展，日趋高涨。这些革命斗争的浪潮，猛烈地冲击着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地主买办势力，使它们的统治基础和力量日益虚弱动摇，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而这些斗争既大大提高了群众的觉悟，使群众加深了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本质和凶恶面目的认识，又极大地鼓舞、推动和支持了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

段祺瑞把持北洋军阀政府实权之后，在研究系头子梁启超等人献策和支持下，拒绝恢复被张勋复辟时解散了的国会，悍然废弃国会和《临时约法》，另谋制造一个更能为他效劳的工具和装饰品。一九一七年七月中旬，孙中山曾致电段祺瑞要求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段不予理睬。孙中山认识到段祺瑞等人是“以伪共和易真复辟”，明确提出打倒假共和、建立真共和，号召维护《临时约法》，恢复旧国会，开展“护法运动”。一九一七年七月十七日，孙中山率领受革命影响、宣布脱离北洋政府的海军两舰，由上海到达广州。七月二十二日，前海军总长程璧光通电提出“拥护约法，恢复国会”，率领海军第一舰队到达广州。接着旧国会商榷系和政学系（由一部分进步党人和一部分国民党人组成的极右翼政治派系）的大部分议员到达广州，参加孙中山的

“护法”运动。这时，桂系军阀陆荣廷和滇系军阀唐继尧也响应“护法”，宣布独立。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想利用“护法”的名义和孙中山的威望来对抗段祺瑞，以保护他们自己的军阀地盘。八月二十五日，南下的旧国会议员在广州召开非常会议，议决成立军政府，通过《军政府组织大纲》，设大元帅及元帅二人。在《临时约法》未恢复前，行政权由大元帅掌握。九月一日，选出孙中山为大元帅，唐继尧、陆荣廷为元帅。十日，军政府成立，但西南军阀并不真心“护法”，唐、陆并未就职，他们并不听命于军政府。

护法战争打响后不久，南北双方内部都出现了矛盾和分裂。段祺瑞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调兵遣将发动对南方的战争。这时，皖系的段祺瑞与直系的冯国璋、曹锟、吴佩孚发生了利害冲突。一九一七年十月，段祺瑞派北洋军中直系军队进兵湖南，既想“武力统一”南方，又想削弱直系力量。直系军阀与西南军阀本来都以英、美帝国主义为后台老板，直系想保存力量，争夺北京政权，因之在冯国璋指使下消极怠战，节节失利。并由曹锟等直系头目发表通电，提出“和平统一”，和段祺瑞的“武力统一”相对抗。于是，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遭到第一次失败，被迫于十一月辞去国务总理职务。北洋军阀中直、皖两系矛盾激化。段祺瑞辞职后积极纠集各省皖系军阀，并拉拢奉系。十二月，段祺瑞唆使北方军阀在天津开会，主张继续对西南用兵。一九一八年三月，段祺瑞派其爪牙徐树铮勾结奉系军阀张作霖入关，他又重新上台。段祺瑞重新上台后，“武力统一”的口号叫得更响。四月，段祺瑞派直系头目吴佩孚进兵湖南，攻下岳州、长沙，抵达衡山、衡阳，但却任命皖系军阀张敬尧任湖南督军。曹锟、吴佩孚不满意，便按兵不动。八月，并通电反对段祺瑞用兵南方，

主张和平解决，直系军阀纷纷响应。而这时西南军阀也想联冯制段，便通电响应，直系与南方军阀开始合流。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英、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矛盾重新尖锐，因而直、皖两系军阀争斗越演越烈。段祺瑞又从日本借款中拨出巨款，由亲信徐树铮收买政客组成“安福俱乐部”，操纵国会选举，以打击直系军阀。一九一八年八月，选出由安福系把持的新国会，梁启超等人的研究系政客失宠被摒弃。九月，段祺瑞利用安福系控制的国会，排斥冯国璋当大总统，另选北洋派老官僚徐世昌为大总统。

在护法军政府内部，桂、滇系军阀陆荣廷、唐继尧以及政学系头子、旧官僚岑春煊等，原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只是想利用“护法”和孙中山的名望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他们在帝国主义的拉拢下，和北方直系军阀逐步勾搭，并在军政府内部排挤孙中山。一九一八年一月，南方非常国会中的政学系议员和西南军阀唐继尧、陆荣廷合伙，在广州组成“西南自主各省护法联合会”，图谋排除孙中山，以便与直系军阀妥协。孙中山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通电辞去军政府大元帅职务，指斥南北军阀“如一丘之貉”。五月十八日，广州国会非常会议在西南军阀和政学系政客把持下，议决废除大元帅制，改为总裁制，接着选出陆荣廷、唐继尧、孙中山、岑春煊等七人为总裁（八月，推定岑春煊为主席总裁）。孙中山虽是七总裁之一，实权却掌握在南方军阀手中，孙中山无法实现自己的主张，便于五月二十日愤而离广州回上海。南北军阀合流，孙中山遭到军阀的排挤，“护法运动”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军阀的破坏下遭到失败。孙中山想依靠军阀的力量来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希望终于幻灭。

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主张维护民主共和制度，是辛亥

革命以来旧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尾声。它在反对北洋军阀反动统治这一点上，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护法运动仅仅提出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根本没有触及到当时社会的根本问题，一点也没有联系到工农群众的迫切要求，不涉及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根本任务，没有也不可能发动广大的人民群众参加，而是依靠这一部分军阀反对另一部分军阀，把斗争的希望寄托在军阀身上，结果遭到失败是必然的。

第三节 反对俄、英侵略中国边疆的斗争

一、挫败沙俄侵略内外蒙古

辛亥革命爆发前后，正当中国人民为推翻清朝反动统治而斗争的时候，念念不忘“黄俄罗斯”迷梦的沙俄侵略者，认为进一步吞并中国领土的机会又到了，便迫不及待地乘机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妄图乘机占领中国北部边疆，改变中俄边界。沙皇尼古拉二世就曾恶狠狠地狂叫什么：不要“将机会错过”。^①俄国资产阶级的反动报纸，也趁机摇舌鼓噪，大造侵华舆论。列宁当即愤怒地揭露：沙俄“政府和自由派的报纸（‘言论报’）为了俄国资本家的利益，利用中国发生革命运动的时机掀起了一个宣传运动，叫嚣占领与俄国接壤的中国的几个省份”。^②事实正是这样。武昌起义爆发后的第四天，俄国外交部就立即电示其驻华

① 王光祈译：《库伦条约之始末》第11页。

②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列宁全集》第17卷，第457页。

公使，要他乘机迫使清廷“以书面确定”俄国在蒙古的特权地位。十月二十一日，沙俄代理外交大臣尼拉托夫在给沙皇的上奏中建议：“为我国利益起见，对中国问题，应尽可能与东京内阁交换意见，以便不错过加强我国在中国地位的适宜时机”。尼古拉二世欣然接受，并批复说：“赞成你所述情由。在我们战争结束以后，我常有这种见解，即俄国在远东方面应与日本携手”。^①十月二十三日，俄国总理大臣同日本驻俄公使交换了有关中国政局问题的意见，认为民军胜利将危及两国在“满蒙利权”；因此，俄、日两国应当根据一九〇七年和一九一〇年两次《日俄密约》进而瓜分中国的满洲和扩大对中国蒙古地区的侵略。这样，俄、日两个帝国主义强盗进一步勾结起来，利用辛亥革命的时机，加紧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沙俄在日本的支持和怂恿下，肆无忌惮地侵略我国的东北、蒙古和新疆等地区。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俄国代理外交大臣上奏沙皇说，“由我国利益观点看，现在中华帝国的解体在各方面都是合意的”，应乘此时机“完成我国移民事实及巩固我国的边疆”。尼古拉批示：“对。”^②十二月，沙俄迫使清政府签订《中俄满界约》（即《满洲里界约》），割去我国满洲里附近一千四百平方公里领土。

沙俄企图侵占我国蒙古地区的野心由来已久。早在一七六三年，沙俄殖民侵略者就曾狂妄地叫嚣：应把戈壁沙漠作为中俄两国的“天然边界”，沙漠以北（即外蒙）应当“纳入俄国”的版图。^③从此，沙俄便不断地向我国的蒙古地区进行扩张。到了二十世纪初年，由于俄国在日俄战争中的失败，它在中国东北的扩张受到挫折，便集中力量向蒙古地区进行侵略和颠覆活动。辛

^{①②} 《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336—337、351页。

^③ 《俄中问题》第190页。

亥革命前夕，沙俄政府极力收买和挑唆外蒙古地区的一小撮反动的活佛、王公背叛祖国，投靠沙俄。一九一一年七月，沙俄侵略者精心导演的外蒙古脱离中国的所谓“独立”的丑剧，终于登场了。一小撮被沙俄收买的外蒙古反动王公、活佛在库伦集会，密谋“独立”。扮演这场丑剧的首恶分子，把会议的召开和通过的决议都及时地通知了沙俄的外交代表。并派出由亲俄的叛国分子杭达多尔济亲王率领一个所谓的“代表团”，于八月十五日潜赴彼得堡。沙俄外交大臣竭力进行拉拢。经过双方密谋，沙俄保证以武力支持外蒙古的所谓“独立”，外蒙古叛国代表团则“承认俄国保护”，并给俄国以种种特权。八月十七日，沙俄政府的公报说：“在蒙古事务上所遇到的危机对我们来说并非偶然，很久以来我们就对蒙古人给予援助和保护；我们在蒙古的某些代表在说服蒙古人方面贡献很大，使它们确信如果和中国破裂，他们是会得到俄罗斯援助的。”^①可见，这些背叛祖国、投靠沙俄的民族败类的所谓“独立”活动，是沙俄侵略者精心策划的，也是它们多年来通过各种手段进行煽动和挑唆的结果。

外蒙古叛国代表团从俄国返回库伦后，一些反动王公、活佛秉承沙俄旨意，加紧进行背叛祖国的罪恶活动。沙俄也随即“派马步队八百余名”侵入外蒙古，进驻库伦，还给外蒙古反动王公、活佛送来枪枝弹药和二百万卢布的贷款；接着用刺刀支持叛国分子强行驱逐清政府驻库伦的办事大臣三多。十二月一日，在沙俄的导演下，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粉墨登场，发表所谓“独立宣言”，成立了“大蒙古国”，自称“大蒙古国皇帝”，以“共戴”为年号。沙俄政府则立即从军事、财政和外交等方面，大力扶植哲布

^① 伊·亚·兹拉特金：《蒙古人民共和国史纲》第105页。

尊丹巴傀儡政权；并在所谓“援助”的幌子下，控制了外蒙古的政治、军事和财政经济大权，为进一步吞并我国的内外蒙古地区作准备。

一九一二年六月，沙俄再次向中国提出承认外蒙古“自治”，不准中国在外蒙古驻兵和移民等，蛮横无理地干涉中国的内政。十一月三日，沙俄迫使哲布尊丹巴傀儡集团签订了所谓《俄蒙协约》，并附有《商务专约》。协约规定：俄国政府“扶助蒙古保守现已成立之自治秩序”，并为蒙古编练军队；不准中国军队进入蒙古，不准汉人移居蒙境；不经俄国允许，蒙古不得与中国或别国“立约”。《商务专约》规定，俄国人可在蒙古自由居住、经商和从事其他事业，俄国人在蒙古有享用矿产、森林、渔业等权利，并可在蒙古租买地段、建造厂局、设立邮政和筑路等等。沙俄企图利用这两个条约进一步控制外蒙古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命脉，使外蒙古脱离祖国的怀抱而变为俄国的殖民地。对此，沙俄外交大臣沙查诺夫曾直言不讳地说：“蒙人对于实行自治一事，现在尚无此项能力，不过是替我们煮了一碗好汤，叫我们慢慢哽咽而已。换言之，我们对于蒙古势必从此担任保护之责，或者甚至于非将外蒙加以合并不可。”^①

沙俄破坏中国统一，侵占外蒙古的无耻行径，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特别是蒙族人民的强烈反对。当时，北京政府外交部在《俄蒙协约》签订后的第四天（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七日），就向俄国驻华公使提出抗议，并严正声明俄国与外蒙叛国集团所订任何条约，“中国政府概不承认”。还在一九一二年一月，孙中山就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名义致电内外蒙古各王公，严正指出：

^① 王光祈译：《库伦条约之始末》第19页。

“俄人野心勃勃，乘机待发，蒙古情形，尤为艰险，非群策群力，奚以图存。”劝诫他们兹此“国势陆危”之际，万勿轻信“浮言”、上沙俄的圈套，希望他们把南京临时政府“五族共和”的民族政策，“遍告蒙古同胞，戮力一心，共图大计”，“并请速举代表来宁，参议政要”。^①与袁世凯谈判的南方代表，也曾致电蒙古王公，宣布“民国独立，汉、满、蒙、回、藏一律平等，确无疑义”。^②希望他们拥护共和，促成民族团结。内蒙各地的爱国王公纷纷集会，表示拥戴共和，声讨哲布尊丹巴的叛国罪行，要求外蒙古取消所谓的“自治”。

在北京的蒙古爱国王公庄严宣布：蒙古拥护各族联合一体的中华共和国，断无独立之理，并强烈要求哲布尊丹巴集团放弃所谓的“自治”。他们还以“蒙古王公联合会”的名义，于一九一二年十一月十五日通告国内外，坚决否认非法的《俄蒙协约》；并强烈谴责哲布尊丹巴集团“妄称独立，伪立政府”，与俄国“擅订协约”的叛国罪行。《通告》还明确地表示：“该伪政府另有与外国协商订约等事，无论何项事件，何项条约，应一律无效。”^③显然，这份《通告》表达了蒙古大多数爱国王公和广大蒙族人民坚决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哲布尊丹巴集团卖国投俄，反对沙俄侵略我国蒙古地区的严正立场。

在举国一致反对沙俄策动外蒙古“独立”的斗争中，“北京街上，遍开反对俄国奸计大会。各种报纸大声疾呼：‘全国应联合起来，以保护昔日中国在蒙版图’。”^④北京各界人民愤怒痛斥沙

^① 《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4号，见《近代史资料》一九六一年第1号，《辛亥革命资料》第30页。

^② 郭孝成：《蒙古独立记》，《辛亥革命》第7册，第291页。

^③ 《庸言》第1卷，第1号（一九一二年十二月一日），《时事日志》第4页。

^④ 王光祈译：《库伦条约之始末》第76页。

俄分裂外蒙古的无耻行径，坚决反对《俄蒙协约》。北京商界也自动“排斥俄货”。^①全国各地的各种报刊和群众团体，广泛地揭露和抗议沙俄侵略我国外蒙古的罪行。这时，孙中山虽然辞去了临时大总统，但仍然十分关心外蒙古问题，坚决反对《俄蒙协约》。一九一二年十一月十六日他打电报给参议院，希望参议院“协助政府，否认《俄蒙协约》，坚持到底”。当时，全国群情激愤，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对《俄蒙协约》、反对沙俄侵略的爱国热潮。不但国内各族人民、各个阶层都广泛地参加了反俄斗争的爱国行列，就连在日本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也在东京召集了有三千人参加的集会，强烈谴责沙俄的侵略罪行；并且发表声明，坚决反对《俄蒙协约》。一九一三年二月七日，内外蒙古赞成共和的各王公在阿拉善地方集会。会议决议：内外蒙古均应悬挂五色国旗，要求各国承认中华民国五族统一；蒙人应遵守中华民国律例；北京中央政府派兵驻守内外蒙古各要塞，与当地蒙民共同巩固边防；内外蒙古不得私造枪械，不得私借外债等。

但是，大卖国贼袁世凯为了镇压各地风起云涌的反袁斗争，竟不惜出卖中国的主权，去换取沙俄的支持。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五日，他竟无耻地同俄国签订了《中俄声明》，尽管沙俄不得不“承认外蒙古土地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但袁世凯却承认了外蒙古的所谓“自治”，听任沙俄肆意奴役和掠夺我国的外蒙古地方。沙俄的资产阶级报纸毫不掩饰地说：“俄国已把蒙古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②一九一四年初，沙俄又无视中国对外蒙古西北部的唐努乌梁海地区的领土主权，悍然派侵略军强行侵占，并非法宣布唐努乌梁海人民“为俄罗斯保护下的臣民”。一九一五

^① 陈复光：《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第428页。

^② 转引自列宁：《“帝国主义”笔记》，《列宁全集》第39卷，第764页。

年六月，在沙俄的强逼下，又签订了《俄、中、蒙协约》，强迫中国重申承认外蒙“自治”，承认《俄蒙商务专条》有效。这样，沙俄便进一步控制了外蒙古地区。

沙俄在策划外蒙古“自治”的同时，又把侵略魔爪伸向我国黑龙江省呼伦贝尔地区，阴谋煽动当地一小撮蒙古王公叛国投俄。呼伦贝尔地区水草丰美，又富于森林矿产，早为沙俄所垂涎。为了进一步吞噬这块鲜美肥肉，沙俄在策动外蒙古“自治”后，又怂恿呼伦贝尔的一小撮民族败类进行叛乱。一九一二年一月，沙俄暗助一小撮反动的蒙古王公，纠集匪徒千人，“均持俄械”，发动叛乱，攻占海拉尔。接着，沙俄派兵伙同叛匪侵占胪滨府（今满洲里），声称“独立”，并驱赶当地中国地方官吏，扼住交通要道，妄图永久霸占。一九一三年二月，沙俄派马队二千多人闯入海拉尔，蛮横地驱逐当地居民。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大卖国贼袁世凯在沙俄诱迫下再次妥协屈服，签订《中俄呼伦贝尔条约》，把呼伦贝尔地方划为“特区”，规定非经俄国准许，中国军队不得进入区内；中国将来如在该地区修筑铁路，需借外债时，中国政府应先与俄国政府“商办”。但是，这个侵略条约立即遭到中国各族人民的坚决反对。中国人民经过坚决的斗争，终于粉碎了沙俄吞并呼伦贝尔地区的可耻阴谋。

沙俄在呼伦贝尔策动叛乱的同时，又策动了内蒙古哲里木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反动王公乌泰等人的叛乱。

乌泰早在一九〇〇年以前即与沙俄勾结。一九一二年八月，乌泰在沙俄支持下，勾串科尔沁右翼后旗的反动王公拉喜敏珠尔，组织反动军队数千人，侵袭洮南府，并陷镇东县。他们公然发布所谓《东蒙古独立宣言》，攻击民国“既废孔孟之教，……佛教何能保存？……共和实有害于蒙古。今库伦皇帝遣人劝导

加盟，俄国复以兵器弹药相援，兹即宣告独立，以绝中国。”^①从这份仇视共和国的反革命的叛国宣言中可以看出，乌泰叛乱是在沙俄和外蒙古反动叛国分子的煽动和支持下进行的；反动的“孔孟之教”则是他们叛国投敌的思想武器。乌泰等一小撮叛匪的卖国行径，激起了内蒙古人民和爱国王公的憎恨和反对。在中国人民的支援下，中国政府派军队驰救洮南府，克复镇东县，迅速讨平了叛乱，乌泰逃往外蒙古。

野心勃勃的沙俄侵略者，在策动乌泰反动集团叛乱失败后，仍然贼心不死，于一九一三年又派遣由沙俄军官训练指挥的外蒙古伪军数千名，分路南下侵入我内蒙古地区。他们与当地反动封建主和土匪武装相勾结，到处烧杀抢掠，使内蒙古各族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内蒙古人民忍无可忍，奋起反抗沙俄侵略者。全国各地人民闻知“内蒙危机”，群起声讨沙俄的侵略罪行。在人民群众的强大压力下，中国政府出兵讨伐俄伪军。经过三年奋战，中国军民击溃了俄伪军，消灭了同沙俄勾结的一小撮反动封建主和大股土匪，收复了内蒙古全境，粉碎了老沙皇妄想把沙俄帝国主义版图扩张到长城脚下的黄粱美梦，维护了祖国的统一。

二、抗击沙俄侵略新疆

辛亥革命时期，沙俄在积极从事劫掠我国东北、内外蒙古的同时，对我国新疆地区也进行了频繁的侵略活动。

一九一二年夏，沙俄蓄谋制造了“策勒村事件”。策勒村是

^① 滨田纯义、柏原孝久：《蒙古地志》（日本文）大正八年（1919），上卷，第1544页。

新疆和田县的一个大镇。长期以来，大批俄商不断来此“贸易”，任意盘剥和凌辱当地居民，并以经商作掩护进行颠覆活动。辛亥革命爆发后，沙皇政府以为有机可乘，便指使其驻新疆各地的俄国领事和冒称俄侨的特务，“四出煽诱”，诋毁中国革命，诱骗新疆居民加入俄籍，策动民族败类举行叛乱。策勒村的俄国奸商头目色依提，十分猖狂，公然贴出“通告”，说什么“中国现无力量，回人可从速投俄，利益甚多，中国官吏再不能管束，粮税亦不须完纳，渠水可任意引用……”。^①当地绝大多数居民热爱祖国，坚决反对沙俄的侵略阴谋，不上圈套。但也有一小撮民族败类在沙俄侵略者的威胁利诱下投入俄籍，依仗沙俄侵略势力为非作歹，欺压中国居民。策勒村群众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愤然而起，将盘踞在当地的沙俄侵略者包围起来，并打死罪大恶极的沙俄侵略分子二十多人，给予沙俄强盗以应得的惩罚。

事件发生后，沙俄竟借端派兵侵入新疆，并炸开喀什城。沙俄侵驻喀什的领事，则利用兵临城下之机，向新疆的地方官提出处死中国官绅、居民一百八十人以及赔款、道歉等无理要求。八月底，沙俄增兵千余，盘踞喀什，并且收买叛国分子马福兴在南疆组织“独立回教国”，然后进犯天山北路。沙俄领事还依恃刺刀一再煽动居民接受沙皇的“保护”，胁迫他们“作强国（沙皇俄国）居民”。凡此种种，其目的是妄图把我国新疆地区并入沙俄的版图。这种无耻的侵略行径，立即遭到全中国人民、特别是新疆人民的强烈反对。富有光荣抗俄斗争传统的新疆各族人民，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倡导下，纷纷行动起来，迅速组成数千人的大军，坚决反击沙俄侵略者。他们经过坚决的斗争，终于把沙

^① 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502页。

俄侵略者赶出了喀什，沉重地打击了沙俄的侵略气焰。

沙俄在南疆的侵略被中国人民击败后，又向北疆发动侵略。一九一三年六月，沙俄调集大批外蒙古伪军配合沙俄侵略军向新疆阿尔泰地区侵犯。七月初，俄伪军三千人攻击中国察汗通古驻军，中国军队英勇还击，击毙沙俄侵略军二百多名，并缴获大批军需辎重，敌人狼狈败逃。但是贼心不死的沙俄侵略者，随后又调集大批军队分几路进犯察汗通古。结果又被中国军队打得丢盔弃甲，狼狈逃窜。

沙俄武力侵犯失败以后，就转而大耍阴谋，胁迫阿尔泰反动王公帕勒塔于十月和十二月先后订立《临时条约》和《中俄军队停战条约》。这两个非法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出后，举国上下一致反对。北洋军阀控制的中央政府，迫于人民的压力，将帕勒塔撤职，宣布这些非法条约一概无效。

但是，沙俄侵略者却一意孤行，增调重兵分两股入侵中国阿尔泰地区：一股与外蒙伪军勾结向西侵袭；一股从斋桑泊方面向东进犯，并悍然非法移来俄国农民三百户，强行开垦我阿尔泰布尔根河（今乌仑古河）一带土地。他们还妄图诱骗当地哈萨克族人民背叛祖国，投入“俄籍”，以便吞并我阿尔泰地区。广大哈萨克族人民热爱祖国，严词拒绝诱骗，使沙俄吞并阿尔泰地区的阴谋遭到失败。

沙俄侵略新疆遭到接二连三的失败后，竟狗急跳墙，于一九一六年十月，采用突然袭击的卑劣手段，武装进犯我国南疆喀什地区，残酷屠杀手无寸铁的维吾尔族居民五百多人，妄图用血腥屠杀摧毁中国人民的反抗意志。但是沙俄侵略者的暴行，只能激起各族人民的更大反抗，他们同仇敌忾，决心与侵略者战斗到底。

老沙皇对内的疯狂镇压和对外的不断侵略扩张，注定了它必然灭亡的命运。一九一七年，俄国爆发了二月革命，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打倒了老沙皇，推翻了万恶的沙皇专制制度，把尼古拉二世送上了历史的断头台。紧接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新疆各族人民奋起截击沙俄侵略军和外蒙古伪军，解除了他们的武装，将沙俄侵略者驱逐出境。沙俄帝国主义妄想变新疆为“东土尔克斯坦”的阴谋，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三、粉碎英国分裂西藏的阴谋

辛亥革命前后，英帝国主义采取收买西藏统治集团中的民族败类进行分裂中国的阴谋活动。一九〇八年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乘达赖十三世来到北京的机会，大加笼络，竭力挑拨西藏地方和清朝中央政府的关系。一九一〇年，达赖返回拉萨后就里通英国，并于次年春，在英帝国主义的引诱下，逃往印度，公开叛国，投入英帝国主义的怀抱。清政府下令革去达赖名号。英印政府竟通知达赖说：“当达赖喇嘛愿意留在印度境内时，他和他的随从是会受到尊重的接待的”。^①与此同时，英国政府又无耻地说什么：“西藏不但与我们毗邻，而且更与我们边界上其他邻国有密切关系”，因此，“对于西藏的混乱局面不能漠然视之”。^②英国以此作借口，对清军驻藏和达赖革职事向清政府提出无理的“抗议”，粗暴地干涉中国内政。武昌起义后，英印总督明多则乘机暗助餉械，唆使达赖派亲信擦戎等潜回西藏，组织军队，发

① 《印度事务大臣致印度总督》，《英国蓝皮书》帙5240，第218页。

② 《爱德华·格雷爵士致（英国驻华代办）麦克恩·幕勒电》，《英国蓝皮书》帙5240，第195页。

动叛乱；接着达赖在英帝国主义的“保护”下重返西藏，宣称所谓“西藏独立”。妄图把西藏从中国的版图中分裂出去。英国侵略军还先后胁迫帕里、江孜、日喀则等地中国军队解除武装。这就进一步地侵犯了中国的主权，破坏了中国领土的统一和完整。

但是，英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这种罪恶行径，立即遭到了全国人民尤其是西藏人民的强烈反抗。全国许多报刊愤怒谴责英帝及其走狗的滔天罪行。西藏广大农奴拿起刀戟进行反抗，数万名僧侣和一些爱国的上层人士也投入了战斗。

一九一二年四月，在全国人民反对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的怒涛推动下，当时的北京中央政府声明西藏是“我中华民国领土”，拒绝承认英帝国主义策划的所谓“西藏独立”；并于六月十四日派遣四川督军尹昌衡率领川军入藏平乱；接着又派蔡锷所部滇军入藏增援。川、滇两军节节胜利，达赖匪军纷纷向西逃窜。英帝国主义眼看达赖傀儡政权即将覆灭，便以“调停”为名进行干涉。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提出五项条件，阻止中国军队进入自己的领土西藏，阻止中国对西藏行使主权。在英帝国主义的威逼下，大卖国贼袁世凯竟然命令川、滇军停止入藏。袁世凯的屈膝妥协，更加助长了英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它得寸进尺，竟派兵三千侵入拉萨。但是，西藏人民是决不向英国侵略者屈服的。这年，拉萨驻军被迫撤退时，许多藏族人民不顾生命危险随军转移，表现了西藏人民热爱祖国、反对分裂的强烈愿望和决心。英国侵略者和达赖匪徒却对各阶层爱国人民进行血腥屠杀，没收田产，劫掠财物，一些寺院被夷为平地，使西藏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可是，西藏人民并没有被反动派的屠杀所吓倒，为了维护祖国的独立和统一，他们继续坚持战斗。他们赶走了英帝侵藏头目贝尔，痛打了卖国贼擦戎，使得英国侵略者和

一小撮民族败类惶恐不安，胆颤心惊。

英国武装入侵西藏的阴谋破产后，便加紧对袁世凯所控制的北京政府施加压力。它以不承认中华民国和“以实力助藏独立”相威胁，迫使袁世凯派代表与英国谈判关于西藏问题。袁世凯卖国求荣，竟屈服于英国的压力，同意在印度北部的西姆拉召开破坏中国主权的“中英藏”三方会议，即所谓“西姆拉会议”。这是英国勾结西藏叛匪分裂中国西藏的又一个阴谋。会议由英国代表麦克马洪一手把持，他抛出了事前准备好的《西姆拉条约》草稿和“西藏地图”，公然把西藏、西康、青海全部地区和云南、四川、新疆、甘肃部分地区，都划归“西藏”范围，并把西藏分为“外藏”与“内藏”，“外藏独立”，“内藏自治”。这个条约草稿还包括：中国不得驻兵藏境；中国政府与西藏有争议时，由印度政府判决；英人在西藏得自由经营商业，中国不得加以限制；西藏内政暂由印度政府监督，等等。显然，英帝国主义提出的这些内容，其目的是要把西藏等广大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成立在其羽翼下的所谓“西藏国”，把西藏变成它任意宰割的殖民地。英国侵略者的这一罪恶阴谋，遭到了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在中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参加西姆拉会议的中国代表，不但拒绝在《西姆拉条约》上签字，并且根据中国政府的训令在一九一四年七月三日正式向会议声明：“凡英国和西藏地方本日或他日所签订的条约或类似的文件，中国政府一概不能承认。”^①会议宣告破裂。中国政府当时还指示驻英公使于一九一四年七月三日和七日，两次正式照会英国政府，作了同样的声明。此后，历届中国政府都坚持了这个立场，一直坚决否认非法的《西姆拉条约》，屡次向

^① 《中印边界问题》（增订本），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一九六二年版，第34页。

英印政府作了抗议和声明。西藏地方当局也表示了同样的态度。这样，由英国片面提出而没有中国政府签字的所谓《西姆拉条约》，自然不具有任何效力，而只是作为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纪录的一张肮脏的废纸。英帝妄图分裂中国的阴谋再次遭到破产。

为了达到分裂中国的罪恶目的，英帝在“西姆拉会议”期间，还在会外耍弄诡计，勾结西藏叛匪于一九一四年三月在德里地方，背着中国代表，用秘密换文的方式，捏造了一条所谓划定中印边界的“麦克马洪线”，把中国西藏东南部九万平方公里（约等于一个浙江省）的一块领土划归英属印度。“西姆拉会议”根本没有讨论过中印边界问题，更没有提出过“麦克马洪线”，西藏地方当局也从未承认过“麦克马洪线”。就连当时统治印度、侵略中国的英国政府，多年来也不敢公开把这条线标在地图上。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在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给印度驻华大使馆的照会中说：“中国政府认为，所谓麦克马洪线是完全非法的”，“西姆拉条约本身就没有法律效力”，“所谓麦克马洪线是一个比《西姆拉条约》更肮脏，更不能见人的东西”。^①

第四节 中国革命的新曙光和近代 第四次思想解放潮流

一、民族资本的“黄金时代”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后，特别是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

^① 《中印边界问题》（增订本），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一九六二年版，第33、34、35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其发展的规模和速度，都是空前的。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这是民族资本的“黄金时代”。

辛亥革命虽然失败，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当时，一些资产阶级人物认为清政府已被推翻，革命已经成功，发展工商业具备了条件。他们高喊：“今兹共和政体成立，喁喁望治之民，可共此运会，建设我新社会，以竞胜争存，而所谓产业革命者，今也其时矣。”^①于是，在一九一二年间，他们纷纷发起组织旨在发展实业的工业建设协会、实业协会以及国货维持会等团体。这些团体，一时之间，如雨后春笋，从江南到华北，从东北到西北，星罗棋布，遍及全国。一些海外华侨也争先恐后，踊跃投资，从事国内近代工业建设。这样，全国很快就出现了一个兴办资本主义工业的热潮。辛亥革命前夕那种民族工业萧条衰败的状况，有了一些改变，从复苏走向新的发展，表现了辛亥革命的重要推动作用。

辛亥革命以后，广大工农群众的反帝爱国斗争，尤其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乘机加紧侵略中国的斗争，也大大推动了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如一九一五年全国人民反对大卖国贼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时所掀起的抵制日货运动，有力地支持了民族工业抵抗日本新的经济侵略，成为中国民族资本工业发展的有力因素。

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帝国主义国家先后卷入了战争漩涡，忙于相互厮杀和争夺。战争本身加剧了资本主义的危机，削弱了世界资本主义。因此，

^①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862页。

英、法、德、俄几个侵略中国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都受到了影响，一时无暇东顾，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压迫和掠夺。如以一九一三年的指数为一百，英国对华商品输出在一九一八年降为五十一·五，法国降为二十九·六，德国货物几乎完全停止进口。外国商船出入口的吨数，一九一八年较战前的一九一三年，也减少了百分之十四。在这个时期，由于交战的帝国主义国家把国民经济转入了战时轨道，大肆扩军备战，民用工业削减而日用品深感不足，于是从中国进口大量面粉和其他货物。这样，就为中国民族工业暂时空出了一些国内和国外商品销售市场，从而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有利时机和条件。

由于上述一些原因，从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一九年，中国新建的近代工业厂矿，多达四百七十多个，投资近九千五百万元，加上原有企业扩建投资，新增资本至少达一亿三、四千万元。而从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到辛亥革命时期的五十年间，资本一万元以上的厂矿，先后才创办了约七百个，资本总共只有一亿三千余万元。这就是说，这八年发展的速度超过了辛亥革命前五十年发展的速度。

这一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的民族资本近代工业，主要是以纺织业和面粉业为主的轻工业。

纺织业，由于大战期间及战后初期，英、日等国洋纱在中国市场上大大减少，而棉纱又盈利丰厚，在高额利润刺激下，引起民族资本投资的热潮。一九一一年全国只有纱厂二十家，纱锭五十万枚，资本一千七百万万元。到了一九一九年，增至三十五家，纱锭六十五万余枚，加上正在筹备和即将开工的二、三十家，投资总额达六千多万元，增加近四倍。缫丝厂在一九一一年仅有二百六十多家，到一九一七年增至四百六十余家。丝织厂从

一九一二年开始设立，到一九一九年已有七十余家，并开始使用电力织绸。

面粉业，由于欧战中各帝国主义国家民用工业缩减，国内外市场的需要，增长的幅度更大。一九一一年全国面粉厂和机器磨房约有四十家，到一九一九年增至一百二十余家，资本从六百多万元增至约四千五百万元，每昼夜生产能力，从四万三千袋增到十八万八千余袋。大战期间，面粉由战前的人超变为出超，一九一九年出超额超过一千万海关两。

其它，如火柴、针织、毛纺织、碾米、榨油、卷烟、蛋粉、罐头食品、搪瓷、造纸、玻璃、肥皂、制革等轻工业，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重工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和束缚下，发展是极端困难的。但是，在大战期间，中国的重工业，利用欧美帝国主义国家暂时放松侵略的间隙，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

钢铁冶炼业，汉冶萍公司从一九一四年开始，先后兴建了大冶铁厂等六个钢铁厂。一九一六年成立了龙关（后改名为龙烟）铁矿公司，资本五百万元。两年后，北京石景山钢铁厂开始兴建。一九一七年上海成立和兴钢铁公司，资本五十万两。一九一九年扬子机器公司在汉口设立炼铁厂。这时各地还兴办了许多采铁的矿场。

机械采煤工业，矿区扩大，矿井增加，全国华资机器煤矿的产量，由一九一二年的八十余万吨增到一九一九年的三百三十余万吨。

机器制造和修配业，一九一一年，上海使用动力的机器厂和手工业机器修造厂总共只有三十家，而一九一九——一九二〇

年间，增加到一百二十余家。

工矿企业增长，又促进了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一九一一年，本国资本轮船只有约九百只，运输能力约九万吨。到了一九一九年，增加到近一千五百只，运输能力达十五万吨。一九一五年和一九一九年成立的中国轮船公司和中华航业公司的轮船可以远航到旧金山、横滨、爪哇等地。

由于重工业、轻工业的发展，对资金周转的需要也日益增加，银行业也相应得到发展。全国华资银行在一九一一年仅有十五家左右；到一九一九年，包括军阀创设的在内，迅速增到六十余家。

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势力也逐渐深入农村，不仅大量工业品在农村销售，而且许多资本家还直接在农村设立原料收购站、加工工厂、农业推广站，来扩大工业产品的收购和生产，以满足工业生产发展的需要。这就进一步破坏了农村中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基础，把农民进一步卷入商品市场，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商品化。农业中商品生产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经济作物的发展和粮食作物的商品化。这一切又为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欧帝国主义国家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某些压迫和侵略，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曾经在一个时期内给了日本帝国主义以独霸中国的机会。”^①这一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独霸中国而加紧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和掠夺，日本这时的对华经济侵略，和它本身的发展相适应，主要是资本输出。例如，日本的对华投资总额，一九一三年约为四亿九千万日元，

^①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129页。

一九一九年则增到十四亿多日元以上，六年之间增长了将近两倍。日本在华商行由一九一二年的七百家，增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千家，七年之间增长了七倍。日本的对华贸易额，从一九一二年的九千多万海关两，增到一九一九年的二亿四千多万海关两。

日本帝国主义对华资本输出，首先是高利贷资本输出，即通过政治借款的手段，来加强对北洋军阀政府的控制，以达到在中国攫取开采矿产、修建铁路、“合办”企业等各种特权的目的是，进一步加紧控制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和掠夺中国人民。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二〇年间，日本对中国公开借款增加了百分之二百七十四。其中，一九一七——一九一八年间最多，包括已付未付，总数达六亿多日元。在日本的勾引下，段祺瑞北洋军阀政府，把财政、军事、矿山、铁路等各项主权大量地出卖给日本帝国主义。

日本对华资本输出的另一种形式是企业投资。一九一三——一九一九年间，日本对华企业投资由三亿八千多万日元增到八亿八千多万日元。除不断扩大原有的企业外，还增设了许多新企业。在发展最快的纺织业中，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一三年相比，日本在华纱厂纱锭增加了近三倍，超过英国。日本在华企业许多又是具有垄断性质的。例如“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就是日本对华进行政治、经济、军事侵略活动的一个庞大机构。一九一九年，由它直接经营的企业，投资将近三亿七千万元，此外还在二十多个公司中有大量投资。其他，如“东亚兴业会社”、“东洋拓殖会社”、“满蒙毛织会社”、“满洲制粉会社”、“东亚烟草会社”等，都是较大的垄断组织。

日本还采取对华商业贷款的毒辣手段，大肆掠夺中国的企业。由于贷款条件极其苛刻，致使许多企业逐渐为日本资本所控制，有的更为日本资本所吞并。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机会通过各种方式，迅速在中国扩展侵略势力，因此，在重工业方面，几乎控制了中国生铁和铁矿的全部生产，控制了煤矿生产的三分之一；在轻工业方面，占有比重也很大，棉纺织业，日本资本占全部开工设备的四分之一以上。

至于美国，参战最晚，在大战期间，它也极力向中国扩张自己的侵略势力。在此期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额大大增加了。一九一三年美国对华贸易额只占中国对外贸易总值的百分之七点五，到一九一九年就增至百分之十六点四，而居帝国主义对华贸易的第三位。一九一三——一九一九年间，美国在华商行数，则从一百三十六个，很快增到三百零九个。美国还在中国一些重要城市，继续设立了美国人的商会和托拉斯等垄断组织。它们还搞了一整套侵华计划。从一九一六年开始，美国的托拉斯和银行就在给予中国政府借款和攫取铁路修筑权等方面大肆进行活动，先后贷给北洋军阀政府两笔五百万美元的款子。西摩来公司获得了几乎网罗整个中国而形成一条铁道网的五条铁路的修筑权。

这一时期，帝国主义在华势力虽有减弱，但并没有撤走，对中国的压力虽有减轻，但并没有解除。同时，国内封建势力也并未消失，依然是地主买办阶级的统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得到进一步发展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当然不会改变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点，改变其原有的弱点。这表现在：

第一，民族资本近代工业的发展，水平仍然低下。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内封建势力的统治，造成了中国工业的极端贫乏和落后，即令在中国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民族工业的发展水平仍然是非常低下的。以一九一三年俄国的几种工业产额和纱锭

设备，与一九一九年中国的产额和设备相比较，煤：一九一三年俄国为二千八百九十万吨，一九一九年中国为二千零一十四万六千八百一十八吨；钢：一九一三年俄国为四百二十万吨，一九一九年中国为三万四千八百五十一吨。纺锭：一九一三年俄国为七百六十六万八千锭，一九一九年中国为六十五万八千七百四十八锭。以中国和当时资本主义发展比较落后的俄国相比，就更可看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之低下。

第二，民族资本近代工业发展不平衡。首先是轻工业与重工业的发展不平衡。中国民族工业的基础十分薄弱，主要集中于轻工业，重工业企业的数量不多，规模一般也不大，煤铁等采矿冶炼业生产技术落后，机器制造业几乎还没有建立，机器设备等全靠外国进口。一般说来，这固然是由于轻工业投资少、资金周转快，提供利润多，符合资本家追求利润的目的，而更主要的是因为在帝国主义时代，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帝国主义国家不允许中国发展重工业，即使有一些重工业，也都直接间接掌握在帝国主义手中。因此，中国民族工业就不能不始终沿着轻工业的道路发展。

帝国主义的侵略也造成了在一种工业内部结构上的不平衡。例如，钢铁工业体系就不完整，一面矿砂大量出口，输往日本，另一方面钢铁和机器设备却完全依赖进口。各种工业体系的不完整，就更加加深了它对帝国主义的依赖，并使其内部更加不平衡。

工业的地区配置也不平衡。新式工业多集中在沿海和通商口岸，使生产基地脱离了本国的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造成了中国民族工业跛足、瘫痪的畸形状态。例如，中国最为发展的棉纺织业，一九一八年，全国纺锭的百分之八十多集中在江苏，而上

海一地就占全国纺锭的百分之六十一多；但在广大的内地许多省份却连一枚锭子都没有。

第三，民族资本近代工业的资金缺乏，直接受到帝国主义垄断资本的控制。据估计，中国近代工业在欧战时期集积起来的资本，总共只不过三万万元。一九一九年注册工厂三百七十五个，资本总共才一万万四千万元，平均每厂才三十多万元。这些能注册的工厂还算是各行业中规模较大的。由于资金缺乏，中国许多重要的企业在大战期间都向帝国主义举借过外债。借款条件十分苛刻，利息很高，所以不论什么企业，只要一经举借外债，就常陷入无力自拔的地步。尽管这些企业名为华人资本、仍在华人经营下生产，但实际上已经是在为偿付外资贷款的本息而开业，是在为帝国主义攫取最大限度的利润服务了。这些民族资本的企业已经直接遭受外国帝国主义的控制，随时有被外国资本吞并的危险。这充分说明，就是民族资本繁荣的时代，也无力独立进行生产或扩大再生产，表现了它的软弱本质。

第四，民族资本近代工业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和商业投机性。在国际资本支配下的中国，由于工业发展得不到保障，加上封建经济在全国经济中仍占绝对优势地位，高额的封建地租和高利贷，不仅限制了工业吸收新的资本，而且一般资金握有者与其从事没有确实把握的工业投资，宁可购买土地或加强商业投资与投机活动。这一时期，农村中各种垦殖公司虽有发展，但多数实际上是在资本主义外壳下，将土地出租给佃农，进行封建地租剥削。同时在厂矿中，仍旧维持着封建把头和封建式的学徒制等剥削压迫形式。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仍然保持着与本国封建势力又矛盾、又依赖的状态。

这个时期，随着民族资本近代工业的发展和民族资产阶级

力量的增长，它们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矛盾也更加扩大。民族资产阶级对外提出抵制外货、实业救国和收回利权等口号；对内反对军阀割据混战，要求统一，表现了它的革命性的一面。但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的力量还是十分软弱。辛亥革命失败以后，民族资产阶级反对军阀统治和混战的斗争，往往只是限于纸上空文，没有切实的行动。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少数革命派虽然还坚持革命斗争，但脱离工农群众，看不见劳动人民雄厚的革命力量，提不出正确的政治纲领，找不到出路，失去了前进的方向，而处于绝望之中。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表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肩负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领导中国革命达到胜利的光荣职责，就历史地落到正在成长壮大的中国无产阶级的肩上。

二、无产阶级开始向自为阶级过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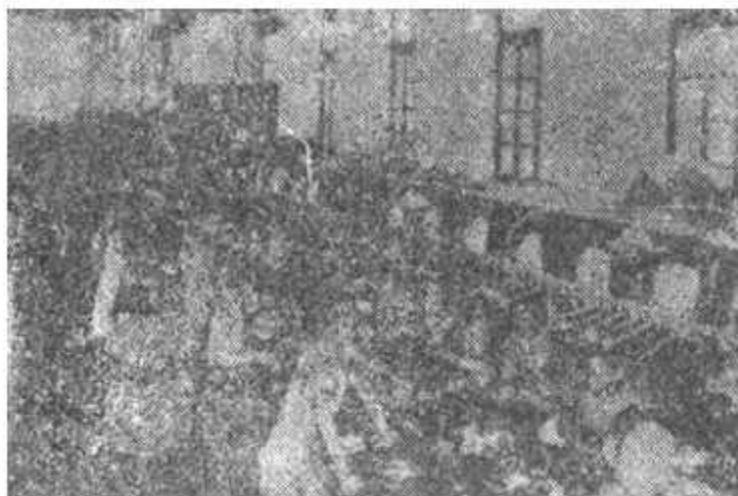
毛主席说：“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是“同这种资本主义新经济同时发生和发展着的新政治力量”。^①

辛亥革命后，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和日、美在华投资设厂的增加，作为它们的对立物——中国无产阶级的队伍，迅速地壮大起来。中国近代产业工人的人数，由辛亥革命前的五、六十万人，增加到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的二百万人。这是中国社会中一支新起的产业大军。中国无产阶级已经是一个逐渐壮大了的阶级。此外，城市里还有手工业工人和店员等约一千万人，农村中还有为数很大的雇农（长工、月工、零工等），在经

^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656页。

济地位上和产业工人相似。

由于中国社会经济特点，特别是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发展和分布的不平衡性，所以，中国工人的分布也极不平衡。中国境内近代



二十世纪初工厂童工劳动情况

工业虽然不多，但中国无产阶级集中程度却是很大的。从地区来说，大多数集中在东南沿海各省，尤其是集中在上海、广州、天津、武汉、青岛、大连、哈尔滨、香港等十几个大城市，每地都集中几万、十几万乃至几十万人。上海一地就集中了三、四十万产业工人。从企业类别来说，主要集中在矿山、铁路、纺织、卷烟、火柴、航运、造船等几个企业部门。从工厂拥有工人人数来说，由于工业资本集中趋势日益加强，在这些企业部门和大城市中，大企业中的工人人数又占了全部工人总数的极大比重。据十三个省的不完全统计，

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一〇年前后，雇佣五百名工人以上的厂矿有一百五十六家，集中了二十四万多工人，占当时全国产业工人总数的百分之三十至四



二十世纪初中国茶叶工人劳动情况

十。中国近代产业工人这样高度集中的情况，在世界上是少有的。这一特点，使中国无产阶级较早地具备了联合、团结的条件，较早地提高阶级觉悟，形成强大的战斗力。

辛亥革命以后，在北洋军阀统治下，中国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几乎没有改善，相反的，在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和封建军阀的残酷统治下，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更加沉重。在经济上，中国工人的劳动时间、劳动条件、工资收入等丝毫没有改善；残酷压榨工人的封建把头制和包身制依然存在。在政治上仍然毫无民主权利。工人们一切集会、言论、罢工的自由都被剥夺了。工人稍有反抗，中外资本家马上就密报巡捕房，前来抓人。北洋军阀袁世凯一九一二年颁布的《治安



军阀野蛮地屠杀和镇压人民

警察条例》和一九一四年颁布的《治安警察法》都把“同盟罢工”定为骚扰“安宁秩序”、妨害“善良风俗”的“犯罪”行动，公开宣布要“采取一切力量

来制止一切工人的集会及行动”。

辛亥革命以来，到五四运动前夕，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残酷压迫和剥削，由于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日益壮大，政治觉悟不断提高，中国无产阶级的反抗斗争日趋高涨，与辛亥革命以前相比，有很大的不同：

第一，斗争规模空前扩大。从一八七〇年到一九一一年的四十年间，工人罢工约一百零五次，而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一九年五

四运动前夕的七年间，罢工就达一百三十次。同时，罢工的次数和参加罢工的人数逐年增多。一九一六年罢工十七次，一九一八年为三十次，一九一九年就增加到六十六次。一九一九年有明确记载的二十六次大罢工，人数达九万一千多人。有许多工矿企业，一次参加罢工的就达几千人。在这几年内，无产阶级的反抗斗争，不仅人数众多，而且次数越来越频繁，斗争越来越激烈。



中国无产阶级罢工新闻剪集

第二，开始由分散的斗争转向有组织的斗争。这个时期，工人在斗争中逐步抛弃了过去的行帮组织，开始组织工会。一九一二——一九一三年间，上海、武汉、广州、香港等地工人已组织了一些工会，起过一些领导罢工和照顾工人福利的作用。一九一五年七月，苏州工人在罢工中还成立了自己的纠察队。一九一六年，也有的地方重新成立工会。这个时期，工人在斗争中逐渐克服了行会、地区之见，出现一处罢工，多方声援的同盟大罢工。天津法租界工人一宣布罢工，北京法文报馆工人即罢工声援，法国驻北京使馆的中国工人也举行罢工，山东工人也想方设

法支援天津工人。各地铁路工人、饭馆旅店工人、人力车工人为天津罢工工人捐款、送物资，并派代表前去慰问，表现了无产阶级大公无私、团结互助的高贵品质。

第三，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性质日益突出和鲜明。一九一五年日本帝国主义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卖国贼袁世凯欣然接受，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广大工人群众站在斗争的最前列。上海日本大阪公司和三井煤栈的中国工人举行罢工，并遍发传单，不准为日商做工。其他在日本企业做工的工人闻讯，也都举行了罢工，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湖南长沙在日商开办的工厂和商店中做工的工人，举行集会，宣布罢工，号召群众不要购买日货。一九一六年天津法租界工人反对法帝国主义企图扩充法租界、侵占老西开的斗争，更显示了无产阶级的巨大力量。十一月十二日，法租界工人同时罢工，给法帝国主义以致命打击。电灯公司工人罢工，使法租界变成一片黑暗；饭店、旅馆工人罢工，使侵略分子吃不上饭；清洁工人罢工，使法租界臭气熏天，法人家庭雇佣的中国男女工人罢工，使侵略分子乱作一团；所谓“繁荣灿烂”的法国租界，“以我民一怒之故，几化鬼市荒墟”。^①在工人群众罢工的推动下，天津市商人罢市，学生罢课，掀起了一个反帝高潮。工人罢工一直坚持了五、六个月，显示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标志着中国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日益提高。

第四，越来越众多的女工冲破封建礼教牢笼参加罢工斗争。在北洋军阀反动统治时期，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的贫困化，越来越多的妇女，参加了无产阶级的队伍。她

^① 《国内大事》，《新青年》第2卷，第4号。

们在整个工人中所占的比重不小，特别是在纺织业、火柴业等一些轻工业中，比重就更大些。有的工厂女工竟成为主要劳动力。女工在工厂里从事十分繁重劳累的劳动，而工资都要比男工少。同时，她们除受封建政权、族权、神权压迫外，还受夫权的束缚。因此，她们的反抗斗争也是十分激烈的。这个时期，女工参加罢工，反对帝国主义、封建统治者和资本家的斗争，规模也是越来越大。例如，一九一二年十一月，广东顺德丝厂就有五千妇女举行罢工斗争。连当时的报纸也惊呼：其规模之大，“实为中国向所未有之举”。^①

以上这些，都为中国无产阶级为着以独立的姿态参加五四运动而作了准备，它预示着中国无产阶级即将作为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阶级力量走上政治舞台，它具有“自觉性的萌芽状态”。^②

三、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③适应新政治和新经济的发展，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应时而起。

辛亥革命以后，革命果实被帝国主义走狗、地主买办阶级代表袁世凯等人所篡夺，“中华民国”名存实亡。他们为了巩固其反动统治，从政治、经济和文化思想上向中国人民发动了猖狂反扑。封建买办势力同帝国主义互相勾结，大肆鼓吹复古倒退，强

① 一九一二年十一月八日《时报》。

②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第246页。

③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655页。

力推行尊孔读经。一时尊孔复古、神鬼迷信的乌云弥漫于中国文化思想界。“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①打退这股逆流，宣扬和振奋民主精神，推进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成为当时中国革命者的重要任务。

由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新的政治力量的增长，一个新的革命运动正在酝酿，一个新的革命洪峰即将到来。在这种革命形势的推动下，一部分经历了辛亥革命失败痛苦、正在继续追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首先对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服务的旧文化发起了新的攻击，掀起了一次比辛亥革命时期猛烈得多、影响要大得多的新文化运动。这场斗争以一九一五年九月，他们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为其开始的标志。从第二卷起，杂志改名为《新青年》，一九一六年底迁到北京出版。李大钊（一八八八——一九二



一九一五年九月创刊的《青年杂志》
（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

七年）、鲁迅（一八八一——一九三六年）等激进民主主义者，先后成为这个进步刊物的编辑或主要撰稿人。许多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和《新青年》建立了联系，使它逐渐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

在五四运动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

^①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1359页。

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①

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口号是提倡“民主”与“科学”。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提倡“民主”，是因为辛亥革命后，虽然建立起一个“中华民国”，但并没有建立起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因此，在政治上，它要求维护和发展辛亥革命的成果，实现西方法兰西式的民主政治。在思想上，它要回击尊孔复古逆流，冲破孔孟之道的束缚，追求科学真理，摆脱封建主义的精神枷锁。所以，新文化运动是当时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反对顽固的封建复古思想，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反对地主买办阶级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

针对封建军阀窃取辛亥革命的成果、进行帝制复辟的现实，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极力抨击封建专制制度，大张旗鼓地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他们指出，民主与君主不能两立，自由与专制不能并存，君主生则民国死，专制活则自由亡。他们愤怒地指出，当时所谓“筹安之徒”与“复辟之辈”一律是“国家之叛逆、国民之公敌”，对于这样的丑类，必须采取毫不妥协的态度，“诛其人，火其书，殄灭其丑类，摧拉其根株，无所姑息，不稍优容”。^②他们大力宣扬“人权”，宣传个性解放，提倡男女平等。他们还鼓吹国民政治，要人们排除陈腐的专制制度，去争取人人参与政治的权利。他们幻想一个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在中国出现，因而发表了许多批评专制主义的封建制度、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文章。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激

^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660页。

^② 李大钊：《民彝与政治》，《李大钊选集》第56页。

进民主主义者的这些主张虽然不可能实现，但对当时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科学”口号的提倡，是因为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认为，辛亥革命后，士、农、工、商、医都“不知科学”。提倡科学，就是要破除迷信、盲从和武断。他们针对封建军阀利用鬼神迷信，扰乱人们思想，大搞反攻倒算的局面，宣传无神论观点。利用当时自然科学的成就，在《新青年》上发表许多驳斥鬼神迷信的文章，大讲“猴子变人”的道理，批判“君权神授”、“祸福天定”的谬论。他们还进一步对封建道德神学基础的唯心主义提出了大胆的否定，指出中国和欧洲自古以来的唯心主义神学尽管流派很多，“要皆以宇宙有一具绝对理性、绝对意思之不可思议的、神秘的大主宰。曰天，曰神，曰上帝，曰绝对，曰实在，曰宇宙本源，曰宇宙本体，曰太极，曰真如，名称虽殊，要皆指此大主宰而言也。”并明确宣布，这些是毫不足取的。与唯心主义神学相反，唯物主义者主张：“吾人以为宇宙乃无始无终自然的存在。”^①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希望在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的基础上，促进人们树立起积极、进取和科学的精神，号召青年勇敢地冲决一切网罗，把一个行将死亡的古老的旧中国，改造成为一个具有青春活力的新国家。

随着运动的深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把斗争矛头集中指向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孔学。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康有为反对共和，北洋军阀的卖国，以及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无一不是打着孔老二的旗号进行的。严酷的现实，使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感到孔孟之道是反动派复

^① 李大钊：《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李大钊选集》第79页。

辟封建专制制度的思想工具，是束缚人们思想的精神枷锁。向反动的孔孟之道发动进攻，也就是向当时的地主买办势力进攻。于是，他们掀起了一个大规模的批孔热潮，揭开了“打倒孔家店”的序幕。

李大钊，字守常，河北乐亭人，留学日本。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后，李大钊在日本秘密进行反袁活动。一九一五年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他立刻写文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面目，号召人民奋起自救。他坚决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一九一六年回国办报纸。一九一七年一月起，陆续发表了《孔子与宪法》、《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等文章，指出：孔丘是“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如将尊孔列入宪法，“其宪法将为陈腐死人之宪法，……非光天化日中之宪法也”，孔丘是“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如将尊孔列入宪法，那末这个宪法就是“专制之宪法”、“为野心家利用之宪法”。^①又指出，伦理道德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的，“孔子之道……其势力迟早必归于消灭”。为了“掙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掙击专制政治之灵魂”，李大钊坚决表示：“虽冒毁圣非法之名，亦所不恤矣。”^②

在反对封建专制统治，批判它的反动思想理论基础孔孟之道的激烈斗争中，鲁迅冲杀在最前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是最英勇的旗手。

鲁迅，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一九〇二年留学日本学医，后认为文艺最能改变国民精神，改学文学。辛亥革命后，一直在教育界工作。他洞悉中国社会的情况，痛感在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中国又一天一天沉入黑暗，心中充满激愤，

^① 李大钊：《孔子与宪法》，《李大钊选集》第77页。

^② 李大钊：《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李大钊选集》第80页。

一直在探求和思索着中国革命出路。一九一七年伟大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使他受到极大的鼓舞。鲁迅在一九一八年发表的文章中说：“他们因为所信的主义，牺牲了别的一切，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①鲁迅用这些向往社会主义革命的语言，来欢呼十月革命的胜利，颂扬它的伟大历史意义。马列主义在中国开始传播，打开了鲁迅的思路，鼓舞他勇猛地驰上批孔战场，奋起投入新的战斗。一九一八年五月起，他在《新青年》上陆续发表了中国新文学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以及《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政论文和许多文笔犀利的杂文，对黑暗的旧社会和反动没落的社会意识孔孟之道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和无情的鞭挞。

鲁迅攻击的矛头首先对准整个万恶的封建制度和孔孟之道。《狂人日记》就是他投向旧社会的一把无比锋利的投枪，是一篇充满革命正气的讨孔檄文。鲁迅塑造了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反孔勇士“狂人”的形象，借“狂人”的口，愤怒谴责罪恶的封建制度，鞭挞维护虚伪、残忍的“孔孟之道”的反动势力。鲁迅在《狂人日记》中以满腔的愤怒，深刻地揭露那些封建统治者，在他们高唱孔丘的“仁义道德”的时候，“不但唇边还抹着人油，而且心里满装着吃人的意思”。他控诉封建社会是“吃人的地方”：“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吃人”，这是对整个封建制度最本质的揭露，是对以孔孟之道为中心内容的旧文化旧道

^① 鲁迅：《热风》，《鲁迅全集》第2卷，第76页。

德最深刻的批判！鲁迅描绘了“吃人”和“被吃”这种压迫剥削和被压迫被剥削的旧社会阶级对立和阶级压迫的黑暗现实，指出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实际上是反动统治者“吃人”的历史。孔孟之道的“仁义道德”，就是充满了“吃人”血腥味的反动教条，是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鲁迅高度概括了反动势力及其代表人物的阶级本性是“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刻划了反动派“又想吃人，又是鬼鬼祟祟，想法遮掩”的虚伪凶残的两面派嘴脸。他严正警告：“我诅咒吃人的人”，“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号召人们起来把那“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①的万恶的旧社会推翻。“打倒吃人的礼教”，遂成为革命人民的一个有力的战斗口号。

鲁迅在他的政论和杂文中，无情地抨击了浸透孔孟毒汁的“三纲五常”，坚决谴责复古主义者宣扬的“忠孝节烈”，批判了“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父权主义和夫权主义，号召人们起来“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痛苦”^②的强盗，鼓舞人们反对那些为了推行尊孔复辟路线而制造的“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的反动教条。鲁迅说：“时候已是二十世纪了；人类眼前，早已闪出曙光”^③，而那一帮顽固派却要搞复辟。他还痛斥那些宣扬“国粹主义”，反对一切变革的封建卫道士是“现在的屠杀者”。鲁迅及其他激进民主主义者对反动的孔孟之道的尖锐批判，使那些反动顽固派们极为恐惧，他们一方面恶毒攻击新文化运动“覆孔孟，铲伦常”，哀叫“世道浇漓，人心不古，国粹将亡”^④；一方面无耻吹嘘什么“中国精神文明更好”，“道德天下第一”，“古人所作

① 鲁迅：《狂人日记》，《鲁迅全集》第1卷，第281、284、285、289页。

②③ 鲁迅：《我之节烈观》，《鲁迅全集》第1卷，第115、104页。

④ 鲁迅：《热风》，《鲁迅全集》第2卷，第71页。

所说的事，没一件不好，遵行还怕不及，怎敢说到改革？”^①鲁迅无情地嘲笑那些“保存国粹”的顽固派的丑恶，说只要他们认为是国粹的，“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国粹所在，妙不可言。”^②顽固派们所吹捧的这种所谓“国粹”，正如一个健康人脸上的“瘤”，额上的“疮”。他们正是把痈疽当宝贝，废物当珍奇，他们是新思想、新文化的凶恶敌人。鲁迅坚决主张割掉这些毒瘤，“扫除了昏乱的心思，和助成昏乱的事物（儒道两派的文书）”。^③

鲁迅当时虽然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还没有明确的无产阶级观点，但十月革命对他的影响是很深的。基于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认识和仇恨，他对旧社会的反动本质已有一些朴素的阶级观点。一方面，他无比痛恨旧社会，深刻地解剖旧社会，对封建制度和旧文化旧道德的攻击和揭露，恰好打中要害。另一方面，他满怀激情地憧憬新社会，向往一种新的政治领导力量的到来。他说：“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要随喜赞美这炬火或太阳；因为他照了人类，连我都在内。”^④

鲁迅的战斗，集中反映了长期遭受压迫、剥削的人民群众渴望解放的强烈愿望。鲁迅坚持了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的政治方向。他揭示出以孔孟之道为灵魂的旧社会吃人的本质，要求推翻产生和利用孔孟之道的旧社会。他这种认识，达到了同时代激进民主主义者最高的认识水平，鲁迅为新文化运动立下了丰功。鲁迅的革命道路是和中国革命前进的方向完全一致的。

^{①②③④} 鲁迅：《热风》，《鲁迅全集》第2卷，第31、37、33、45页。

吴虞（一八七一——一九四九年），字又陵，四川新繁人。清末留学日本。辛亥革命后任北京大学、四川大学等校教授。在袁世凯、张勋之流掀起尊孔复辟逆流时，他写文章反对封建礼教，抨击儒家谬论，参加了“新文化运动”的行列，对封建家族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抨击十分激烈，影响较大，曾经名噪一时。但是吴虞毕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由于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用资产阶级政治纲领去批判孔孟之道，因而尽管他看到了孔学在维护封建专制统治中的反动作用，激烈抨击封建礼教，但又吹捧孔老二在春秋末年“自是当时之伟人”^①；他不但对法家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没有给予必须的肯定，反而不分青红皂白地对儒法两家采取了一锅煮的态度，甚至攻击法家。后来，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和无产阶级的登上政治历史舞台，他也就丢掉“反孔”的口号，退出斗争行列，抽鸦片，写艳诗，消沉，颓唐，倒退堕落成为一个封建文人了。

资产阶级民主派陈独秀（一八八〇——一九四二年），在新文化运动初期主编过《新青年》杂志，曾以“反孔”面目作伪装，出了风头。但他在工农革命日益高涨，无产阶级即将起而领导革命斗争的转变时刻，始终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立场，害怕人民革命。他之所以“反孔”，“非谓孔教一无可取”，只是因为他认为孔孟的伦理道德“适与欧化背道而驰”^②，不合资产阶级口胃而已，他的主张是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建立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完全以“欧化为是”。^③他还把孔教当作“国粹”，吹嘘成为中国历史上“有力之学说”。^④他混淆儒

① 《通信》，《新青年》第2卷，第1号，第4页。

②③ 《通信》，《新青年》第3卷，第1号，第11页。

④ 《通信》，《新青年》第3卷，第1号，第24页。

法斗争，攻击古代著名的法家秦始皇，胡说什么：“秦火以还，百家学绝”，居然把孔学所以成为“支配中国人心”的统治思想归罪于焚书坑儒，把帐算到了秦始皇的头上。^①这完全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当时社会主义学说已在欧洲广泛传播，国内有人要求《新青年》加以介绍。陈独秀却认为，社会主义理想甚高，学派也很复杂，宣传和实践这种学说，中国似可缓于欧洲。特别是他不敢把当时批判旧文化的斗争和政治上反对封建军阀复辟帝制的斗争结合起来，把《新青年》的任务只限于“志在辅导青年，不议时政”。^②他看不起工农群众，却拜倒在诸如段祺瑞等反动军阀“大人物”的脚下，把国家进步的希望寄托在这些所谓“大人物”身上。及至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使中国革命开始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以后，陈独秀混进无产阶级革命队伍，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彻底堕落为尊孔派，最后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耻叛徒、帝国主义和地主资产阶级的一条乏走狗。

混进反封建文化队伍的买办资产阶级文人胡适，原来就是一个尊孔派。他在新文化运动兴起后，卷进了反孔洪流，那不过是投革命之机而已。他站在买办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对孔老二假批真保，无耻吹捧孔老二是“气象阔大的人物”，甚至胡说他是什么春秋末期的“积极的救世派”。^③对于法家，他咬牙切齿地加以诅咒和攻击，胡说法家的主张是“极端狭隘的功用主义”，把秦始皇焚书坑儒的革命行动诬蔑为什么“大劫”。^④十月革命后，随着革命的深入，他更是进一步公开亮出了尊孔的黑旗，并极力宣

① 《通信》，《新青年》第3卷，第1号，第24页。

② 陈独秀：《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新青年》第5卷，第1号，第1页。

③④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第143、76、384页。

扬反动的“实用主义”哲学，对抗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成为中外反动派的忠实走狗。

为了适应反对封建制度和儒家旧礼教、旧道德斗争的需要，新文化运动又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反对那种以雕琢晦涩的文言文，来宣扬陈腐思想的旧文学，提倡以通俗易懂的白话文，来表达新鲜思想的新文学。鲁迅不仅是反孔的主将，也是文学革命的旗手。《狂人日记》和他的其它白话小说、政论文和杂文，就是出色地把反封建的革命内容和白话文形式结合起来的文学革命的第一批典范成果，起到了“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①的作用。鲁迅为中国新文学开辟了现实主义的道路，树立了光辉的里程碑，他是当时文学革命的杰出代表。

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仍然是属于旧民主主义范畴的文化运动，是辛亥革命在文化思想领域里的继续，也是资产阶级新文化反对封建旧文化的一次空前激烈的斗争。它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继太平天国、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之后的第四次思想解放潮流。《青年杂志》创刊时，连赠送交换在内，每期只印一千分；但到一九一七年时，最高额已达一万五、六千分。读者们称《新青年》为“青年界之良师益友”、“青年界之明星”、“青年界之金针”，有的说读到它“神经感奋”，有的说“青年得此，如清夜闻钟”。^②

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为这场斗争注入了新的思想因素，从而使它更为深刻和广泛。新文化运动揭穿了封建文化老八股老教条的丑态，从政治上思想上给封建主义以沉重打击，起了解脱封建主义束缚的作用，启发人们重新思考问题，追求真

^①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818页。

^② 《通信》，《新青年》第2卷，第1号，第6页；第5号，第5页。

理，从而为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扫除了一些障碍。而这一点，也正是作为近代中国第四次思想解放潮流的新文化运动所特有的重要历史意义。

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对封建文化是经过了一个大“破”的过程的。这时所立的虽然还主要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但经过了这一个“破”的过程，在客观上却极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列宁说：“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是极其有利的。从无产阶级的利益着想，资产阶级革命是绝对必要的。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得愈充分，愈坚决，愈彻底，无产阶级为争取社会主义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就愈有保证。……在某种意义上说来，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要比对资产阶级更加有利。”^①列宁说得完全正确。政治上如此，文化思想上也是如此。

但是，正因为这个运动仍然属于旧民主主义的范畴，它就具有很大的阶级的和时代的局限性。新文化运动的参加者们，看不到旧文化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不能从根本上加以反对。他们也看不到要依靠的社会力量，使运动局限于知识分子圈子里。特别是他们的绝大多数人还不了解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提不出正确的解决办法，找不到前进的方向，没有把文化思想上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和现实政治生活中反对封建军阀反动统治的斗争紧密结合起来。他们中间不少人不能正确对待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不能正确处理中西文化的关系，影响了运动的发展。历史证明，中国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不能完成民主革命任务，在文化思想上也不能彻底批判封建主义。政治

^①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选集》第1卷，第541页。

上、文化思想上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只有中国无产阶级才能完成。

正当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的时候，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的伟大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了。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社会历史新纪元，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推翻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的灯塔，照亮了全世界，也照亮了中国革命的道路。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革命树立了光辉榜样，使中国人民在黑暗的夜空中看到了晨曦，看到了自己民族解放的新希望。这正如毛主席所说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①

一九一九年，在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的号召和鼓舞下，中国爆发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又是一场伟大的彻底的文化革命运动，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毛主席指出：“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②这个文化革命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对反动孔学的批判。五四运动期间，由于自己的长成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中国无产阶级作为一个觉悟了的独立

①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1360、1359页。

②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660页。

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宣告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一九二一年，在无产阶级队伍迅速壮大和马列主义广泛传播的基础上，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从此，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以新的革命理论，新的阶级阵容，展开了新的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新篇章。

“一唱雄鸡天下白”。^①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革命战争，终于在一九四九年，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旧中国的反动统治，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创建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过去那种受帝国主义欺凌和国内反动派压榨的苦难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并昂首阔步、坚定不移地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中国的历史经验，是极其丰富极其深刻的，集中到一点，这就是：“整个革命历史证明，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胜利了。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国家的任何别的阶级，都不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达到胜利。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曾经多次领导过革命，都失败了，就是明证。”“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②“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③

① 毛泽东：《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毛主席诗词》，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版，第27页。

②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1368、1360页。

③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近代中国史稿
《近代中国史稿》编写组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32印张694,000字
1976年12月第1版 1976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11001.306 定价(上下册)2.40元
(只限国内发行)

(只限国内发行)

书号 11001·306

定价(上下册) 2.40元